

· 公共政策经典译丛 ·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 找回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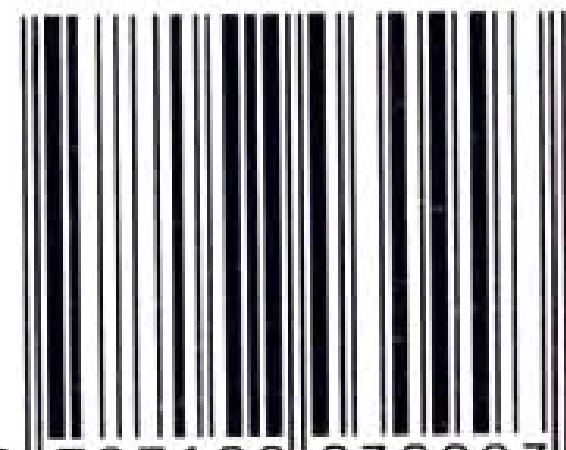
[美]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 编著

方力维 莫宜端 黄琪轩等 译



ISBN 978-7-108-03099-3



定价：46.00 元

9 787108 030993 >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找回国家 / (美) 埃文斯, (美) 鲁施迈耶, (美) 斯考克波  
编著; 方力维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4

· (公共政策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099-3

I. 找… II. ①埃…②鲁…③斯…④方… III. 公共政策—  
文集 IV. 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7954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5.75

字 数 430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 总 序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中国改革发展事业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这项光荣的历史任务向中国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恢复发展以来,公共政策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许多实际政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时至今日,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中国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知识框架和研究方法。因此,当我们面对中国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实践的各种复杂问题时,难免感到力不从心。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种政策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学习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成果。

西方公共政策的学科化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突出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其发展受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的综合影响。这些学科的许多经典著作都曾对公共政策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过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内许多同行在发展公共政策学科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工作,使中国读者能够全面了解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掌握其最新的发展动向。但是,从目前已经翻



译过来的原著看,系统的教科书比较多一些,而研究性的专著则相对较少。这就使得我们中国的读者对西方公共政策的有关理论难以有全面的把握。

鉴于上述情况,本译丛的目的就是从西方公共政策自身体系和它的基础学科中精选出一批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原著来加以翻译和介绍,以便让中国的读者能对国外公共政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国外公共政策理论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有更好的把握,同时也为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套译丛的出版,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体系的研究”(批准号 70125005)的资助。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内外公共政策领域诸多学者的帮助,以及三联书店的领导和编辑们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和帮助正是中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不竭动力。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 序

社会科学同人类社会一样,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使命就是发现有潜力的研究议程并大力推动其发展。本书是本协会研究计划委员会(the Research Planning Committee)有关国家和社会结构的第一本出版物。近年来,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和一种制度组织的视角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始建于1983年的研究计划委员会的目标,便是要促进这些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长期稳定的交流。

一直以来,比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流理论范式对于将国家看作一种制度组织或是潜在的自主行为体并不重视,“国家”概念也极少出现在研究当中。然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国家看作一种行为主体,认为尽管它明显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在塑造着社会和政治过程。因此,人们认识到,必须要尽快完善国家结构与国家能力的概念化工作,以更充分地解释国家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被重组的;从而探索在多种背景条件下,国家的干涉或者不作为,以及国家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将怎样对社会产生影响。

本书收集的大部分论文最早在“国家理论在当前研究中的应用”会议当中提出,该会议于1982年2月在纽约基斯科山(Mount Kisco, New York)举办,由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和全美学术团体协会(ACLS,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拉丁美洲研究与西欧研究联合委员会共同资助。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地聚集了众多领域(尽管并未覆盖全部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都致力于国家在社会

和世界背景下的比较研究和理论化等前沿工作。与会者包括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当中既有理论学者,也有熟谙欧洲、拉丁美洲或亚洲事务的区域专家。1982年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为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奠定基础,在协会的资助下,八位与会学者继续进行探讨,其中包括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埃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以及本书的三位编著者。

与本书得以集结的那场会议一样,本书和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各知识领域长期以来惬意的孤立状态,促进彼此间的对话与交流。因此,本书的每一个主要篇章都围绕有关现代国家的一系列相关议题而展开,而每一篇内所收纳的文章则对这些议题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地域上的表现分别进行探索。第一篇,“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将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国家战略研究与对发达工业民主国的不同、凯恩斯主义范式的探索收集到一起。第二篇,“国家与跨国关系”,范围(尤其是时间跨度上)涉及甚至更广。它包括一份对现代欧洲早期发动战争与国家缔造历史的分析,以及两项对国家与“二战”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工业国)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讨论。最后,第三篇,“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研究对象从19世纪的美国和英格兰,一直到今天尼日利亚北部的约鲁巴以及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民族国家,目标都是探索国家对政治分化和集体行动的影响。

本书不仅融汇了诸多依时间和地区而划分的不同的区域专家的关注,还试图调和一般性理论辩论和具体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对后者来说,深度案例研究与比较能够展示出有关国家组织、公共政策及



其前因后果的**不同情形**。如同本书编者在绪论和结论中更详细阐述的那样,完善社会科学界对国家结构和国家行为理解的最好的方法论策略是“分析归纳法”,即通过比较和历史研究来处理理论相关的问题。

很清楚,对于“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国家”是否会对社会变革进程产生独立的影响这一问题,现在是到了该超越那纯粹推理式的种种理论争论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认同国家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同时社会经济关系反过来也会影响和限制国家结构和行为这样的假设,将能够启发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识别、准确地定义,并解释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同所带来的现象上的差异。有价值的命题一定是关于促进或削弱国家自主性的条件、关于国家干预的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关于国家行为的无意后果,以及关于国家政策与结构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假设推论。

随着概念化和案例描述、命题生成与假设检验等重要步骤的进行,从多处地方都可以获得理论灵感。然而,现在就开始对国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宏大的理论合成还为时太早。依据部分证据而任意地过度抽象化,错用暂时性变量和比较性差异导致所谓的“谬位抽象谬误”(fallacies of misplaced abstraction),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社会科学宏观研究。而进行深入的比较历史研究,其过程虽然复杂艰辛,但这种方法能够为一般化理论打下坚实的基础,因而它可能最终还是在理论上最有成果的研究方法。

本书所集作品的全部作者都致力于理论建树,又通晓至少一个地区或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读者们通读全书,就会亲眼见证一场有关各种理论观点和假设命题的盛大辩论,这些观点和命题则来自对许多源流深思熟虑的折衷,这些源流主要包括马克斯·韦伯、阿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奥托·欣策,以及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典和当代学者

们的各种理论。而且,读者们将会看到,这些理论思想与具体历史模式的碰面,将不仅会为各种问题提供答案,同时还会带来新的问题并提供新的假设命题。我们编者已然从编纂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愉悦,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还尽力将通读各章后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及其暂时性结论聚拢到一处;但对于结论部分的标题我们只能试探性地命名为“迈向更加充分了解国家的大道”。它代表着我们对自身位置的体认,同时也是向本文集的读者们发出的一份诚挚的邀请,欢迎您和我们共赴前程。

这里还需要赘言几句,我们想要对本旅程的第一站、对本书的发表提供了莫大帮助的人们和机构表示真诚的感谢。本书不仅是一本文集,还是一项集体成果。所有参与1982年基斯科山会议的学者对书中各位作者的思想以及我们的编辑理念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成员们,还有对该委员会的研究议程提供意见和建议的其他一百多位学者,也从根本上影响着本书中的不少观点。从会议一直到手稿的生成,全美学术团体协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拉丁美洲和西欧研究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们所给予的支持和学术热情贯穿着整个追求的过程。而作为协助这些委员会工作的人员,里德·安德鲁斯(Reid Andrews)和鲍勃·盖茨(Bob Gates)在项目初始阶段给予了我们难以估量的鼓舞和建议;如果没有他们在1981年所表示的确信——相信这些萌芽中的思想值得探索,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本书的面世。在过去的两年中,玛莎·杰哈特(Martha Gephart)——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助理,不仅孜孜不倦地帮助我们打理各种琐碎事务,还不时地给予我们中肯的建议。她为这一项目的持续进行立下了汗马功劳。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苏珊·艾伦—米尔斯(Susan Allen-Mills)自始

至终都帮助本书顺利出版。从1982年会议一直到文稿提交,数月来,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候选人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以及布朗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候选人简·祖瑞克(Jane Szurek)承担了关键性的编辑任务。我们还要感谢刘易斯·兰姆菲尔(Louis Lamphere)、玛丽安·鲁施迈耶(Marilyn Rueschemeyer)以及比尔·斯考克波(Bill Skocpol),他们不仅给予了知识上的贡献,还耐心地忍受了我们为编辑此书和协调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一些相关事务而拨打的冗长电话。事实上,集结本书最有价值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编辑过程的集体合作。从一开始,我们的联合编辑既不仅仅便利了行政管理,也不单单顺应了劳动分工,它还是一次难得的学术合作的机会,这一过程证明了协作本身也是一种受益匪浅的经历。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

1984年8月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 目 录

总 序 .....	1
序 .....	1
绪 论 .....	1
一 找回国家	
——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 .....	西达·斯考克波 2
第一篇 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	53
二 国家与经济转型	
——一种支撑有效干预的	
条件分析 .....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彼得·埃文斯 60
三 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	艾丽丝·阿姆斯登 105
四 国家结构与国家以凯恩斯主义应对大萧条的可能性	
——以瑞典、英国和	
美国为例 .....	玛格丽特·韦尔 西达·斯考克波 143
第二篇 国家与跨国关系 .....	223
五 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	
有组织的犯罪 .....	查尔斯·梯利 228
六 跨国联系与国家的经济角色	
——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与	
工业国家的分析 .....	彼得·埃文斯 262

七 开放的国际经济中的小国	
——瑞士和奥地利国家与社会的	
趋同均衡 .....	彼得·卡岑斯坦 310
第三篇 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 .....	343
八 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	
——从美国视角看 19 世纪的	
英格兰 .....	艾拉·卡茨纳尔逊 349
九 霸权与宗教冲突	
——大英帝国统治与约鲁巴的	
政治分化 .....	戴维·莱丁 388
十 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国家权力与	
公民社会的力量 .....	艾尔弗雷德·斯特潘 433
结 论 .....	471
十一 迈向更加充分了解	
国家的大道 .....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 472
作者简介 .....	499
索 引 .....	503
译后记 .....	559



# 绪 论

# 一 找回国家

## ——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

西达·斯考克波

近十年来,比较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突然兴起了一股对“国家”的兴趣。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被用作解释研究者感兴趣的现象的原因,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或一种制度组织(institution)<sup>①</sup>的国家都受到了高度重视,来自所有主要学科不同理论倾向的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为数已十分可观,所探讨的领域也非常宽广。从事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研究的学人,考察了国家在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促进民族国家经济发展,以及与跨国公司进行谈判等方面的作用。<sup>[1]</sup>对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感兴趣的学者,探索了在开展社会项目、管理国内与国际经济问题等方面国家的参与。<sup>[2]</sup>比较史学研究者则探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革命中国家的解体与重建,国家对阶级结构、种族关系、妇女权利以及社会抗议模式等方面的影响。<sup>[3]</sup>经济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对作为产权确立者和作为市场的监管者或扭

---

① 对本书中“state as an institution”这一表述的翻译让各位译者颇有些为难。直到通译完全书之后,译者才决定将“institution”一词翻译为“制度组织”,但其含义既有国内学者习惯性想到的“制度(言其抽象与稳定)”之意味,又确指有形体存在的一种组织结构(强调其有形且具有组织凝聚力)。——译注

曲者的国家进行了理论构建。<sup>[4]</sup>而文化人类学家则探究了非西方背景下“国家”的特殊涵义和行为特征。<sup>[5]</sup>

虽然没有明显的共同研究议程或通用理论将这些不同的研究联系到一起,但我仍将在本文中证明,这当中有不少的研究或是论点互为补充,或是分析策略非常相似。证明这一观点的最好方法是,考察一系列的比较和历史研究所强调的议题,这些研究都十分重视国家的行为主体身份,关注国家如何通过其政策及其与社会集团模式化的关系来影响政治和社会过程。但首先,有必要先强调一下“找回国家”<sup>[6]</sup>这一说法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的再定位。

## 从社会中心理论到重新对国家产生兴趣

毋庸置疑,当前学术界正进行着一场变革,因为不久之前社会科学领域主流的理论和研究议程还很少会提到国家,即使是(也许有人会认为尤其是)在政治和公共政策决策议题上也是如此。尽管确实存在十分重要的例外现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主流的研究视角仍是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解释政治和政府的行为时采用社会中心论的方法。<sup>[7]</sup>在这些视角中,国家被视为过时的概念,代表着对民族国家特定的宪政原则的干瘪无味的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取而代之的概念则被认为是更适合科学的、普遍性的研究。<sup>[8]</sup>“政府”主要被视为一个平台,经济性的利益集团或规范化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或者互相斗争或者彼此结盟,从而塑造公共政策决策。这些决策被理解为是对需求群体(demanding groups)间利益的分配。相关研究则集中于社会对政府的“输入”(inputs)以及政府“产出”(outputs)的分配效果。政府本身并没有被认真地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因此在比较研究当中,相



比较于由所有社会的政治系统所共享的一般“功能”(functions)而言,政府组织间的差异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于是,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会发现,多元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会促使研究者不断地去探讨那些他们最初在概念上并不重视的现象。多元主义者在探索特定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决定性变量时,常常会发现政府领导人提出的议案远远超乎社会群体或选民的要求;有时甚至还会发现在特定的公共政策决策中,政府机构才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在多元主义理论的前提假定中,调和这些意外发现的方法极其有限。<sup>[9]</sup>在对纽黑文市(New Haven)的政治所进行的经典的多元主义范式研究中,尽管市长理查德·李(Mayor Richard Lee)对城区改造(urban renewal)提出强有力的个人提案这一案例被广泛引用,但没有一项研究是完全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某些类型的市长在创新性利用联邦资金方面的潜能的。<sup>[10]</sup>在有关“官僚政治学”的重要著作中,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以及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的《官僚政治学与外交政策》,政府机构都被个别对待,就好像它们纯粹是经典多元主义中的竞争性社会利益集团的对应物一样。<sup>[11]</sup>在这种研究方式中,美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和行为都退出了研究者的视野和分析范畴。<sup>[12]</sup>

与多元主义者一样,研究背景更为广阔的、致力于比较政治发展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者,尝试将其宏大理论应用于西欧历史或者应用于某些特定的非西方政体时,常常会发现历史范式和顺序与初期理论概念和假设中提出的命题难以匹配。由于相对于有关社会经济“差异”的任何内在的一般性逻辑而言,国家建设中具体国际国内斗争显得更为重要,“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研究表明这是一个极端进化主义的概念)这一范式也随之走向终结。在这一研究领域,

最有成效的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在1954—1972年这最后的阶段所提倡并资助的那些历史性的研究<sup>[13]</sup>。通过将案例分析和比较史学证据与该委员会的宏大理论相对峙,这些研究中有关国家的思想和结论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动机上的被动反应模式。

许多年轻的学者从另一条理论路径也在不断地提出新的概念和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喜欢批判性思维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发起了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激烈争论,到现在已经提供了大量的概念错综复杂、经验数据涵盖广泛的文献。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依附型国家政府的本质与作用。<sup>[14]</sup>总之,新马克思主义者探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另一种理解途径。有些学者视其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有些学者则将之看作是政治性阶级斗争的竞争舞台。

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学者的争论催生了有价值的概念和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比较和历史研究中的许多文献,在确定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假设命题等方面都从中吸取了养分。然而,从理论层面来看,事实上所有研究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深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假设的影响,而毫不允许他们自己去质疑:国家是否真的从本质上就是阶级或阶级斗争的体现,其职能真的就只是维持和扩大特定的生产模式。<sup>[15]</sup>由于这种定义性的裁断,自主性国家行为的许多可能的形式就被排除在考虑之外。更有甚者,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常都喜欢寻求对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一般化——而且通常是以极端抽象的方式——比如用单一的生产模式、单一的资本积累的状态,或者是用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来进行概括。这就难

以为国家结构与行为的跨国差异和短期变动等因素赋予因果性变量的重要地位,从而削弱了某些新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框架的有效性。<sup>[16]</sup>

至此,上面主要讨论了自“二战”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然而,多元主义者和结构功能主义者不愿意研究国家,批判性思维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不肯承认国家具有真正的自主性,这两者都与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来的研究倾向遥相呼应。这种现代社会科学随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一同出现,因而很可以理解其奠基性理论家会认为社会的变革动力(social dynamics)以及社会利益(social good)不是来自过时的、早已被取代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而是来自公民社会——不同的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如理解为“市场”、“产业劳动分工”或者“阶级关系”,等等。这些奠基性理论家们,尽管政治立场有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一样势不两立(现在这两位对手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里的墓穴只相隔一条小道,这倒也并非完全不相称),但他们全都认同工业资本主义战胜了国家间的军事扩张主义和领土敌对状态。对这两派的所有理论家来说,19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预示了一切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

世界历史历经血腥的世界大战、殖民征服、国家建设革命,以及民族主义反殖民运动,进而从19世纪英国霸权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向“二战”之后美国霸权下的世界和平期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目光,也偏离了原有的将国家视为有影响力的和自主性的组织行为体的中心解释模式。<sup>[17]</sup>这并不是说,人们忽略了诸如政治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类的现象,而是说对这类现象的理论解释,偏重于采用经济落后或不幸地坚持非西方式的“传统”价值观之类的思路。只要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英国,和作为其继任者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国能够被信以为真地看作是无可争议的“主流社会”,西方社会科学就



能有效地控制住其在主要的理论范式中轻视以国家为中心的解釋模式所带来的问题。而这些主要的理论范式都致力于理解现代化,理解其原因和发展方向。对英国和美国这些“最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经济变革仿佛就是自发产生和渐进发展的,而政治学的基本研究素材,似乎就只有政府立法部门的决策。

然而,“二战”后的发展事实使得各种各样以社会中心论来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现象的创举,变得越来越不可靠。随着20世纪30—50年代“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的兴起,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标准做法,公共社会开支也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蓬勃发展。殖民主义帝国体系的解体簇生了数十个“新兴民族国家”,而且人们很快就看到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并不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组织和政策选择过程中简单地复制。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英国和美国都确定无疑地在一个国际经济竞争更为激烈也更不确定的世界当中遭受到巨大的压力。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毫不奇怪,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和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制度结构的观点会变得时髦起来。

当代的社会科学家愿意采纳国家中心主义的解釋,而且不只是将它应用于极权主义国家和后发展国家,还应用于英国和美国自身,比如,最近一些观点就强调国家结构明显地塑造了英美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内容,还深入思考了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可能会对当前在国家工业复兴中的努力如何产生妨碍或促进作用。<sup>[18]</sup>简而言之,由于对大型公共部门的争论已经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也由于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竞争性的、众多实体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英国和美国尤其显得是一种特殊的国家社会模式,宏观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进行一种范式转移,该转移蕴涵着对国家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 是否大陆欧洲视角的复兴

在19世纪,即使是在工业化已全面启动之后,倾向于欧洲大陆的社会变革与政治现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家都不赞同那些关注思考英国的理论家们不再重视国家特征的观点。尽管他们也积极认同自由主义理念,但这些研究社会现象的大陆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仍然坚持国家是一种机制性的现实,重视国家对公民社会所施加的作用和在公民社会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在比较社会科学学者再次强调国家的重要性时,也许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为何许多研究者都在重新强调——当然其中肯定也有很多的修正和拓展——诸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奥托·欣策(Otto Hintze)这样的著名德国学者对“国家”的基本解读,这些德国学者广为人知的著作流传至今。

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声称对一定的领土及该领土之上的人民拥有控制权的强制性团体。<sup>[19]</sup>行政、立法、(税赋)征收以及强制机构,是一切国家的核心所在。这些组织在不同国家中的构成会有不同,它们也有可能是镶嵌在某种宪政—代议制系统当中。这种系统由议会进行决策,通过选举来竞争关键性行政和立法职位。尽管如此,在下面一段话中,艾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明确而犀利地指出了韦伯式视角的精髓所在:

必须将国家视作比“政府”(government)还要宽广的范畴。只有持续性的行政、立法、官僚和强制系统,才会不仅要尝试构造某个政体中的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还会力图构造公民社会内部的诸多重大关系纽带。<sup>[20]</sup>



按照这一视角,国家自然不会涵盖一切,其他的组织与机构也会塑造社会关系和政治,而研究分析必须致力于探索国家的结构和行为与这些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韦伯式的国家观的确是要求我们超越将国家视为纯粹的竞争舞台的视角,后一视角认为国家只不过是社会集团提出要求并致力于政治斗争或妥协的一个平台。

而且,正像奥托·欣策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将国家看作控制领土的组织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离开对一切政体的基本共同特征的纠缠并转而考虑跨国背景(transnational contexts)约束国家结构与行为的各种不同路径,其中,跨国背景是随历史而不断变化的。<sup>[21]</sup>通过国家间相互主宰与竞争的地缘政治关系,通过观念和公共政策模式的国际间交流,还通过贸易、生产活动的分工、资本流动以及国际金融等全球经济模式,这些背景不断地冲击着个体的国家。因此,国家必须站在国内社会政治秩序与跨国关系二者的交叉面上,而且在后一领域,国家必须努力谋求生存并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正如我们所知的,也正如韦伯和欣策所概念化的,自欧洲历史中诞生之后,现代国家从来就是一个由彼此竞争和相互裹挟的国家所组成之系统的一个部分。

尽管明显是在韦伯—欣策式观点的启发之下,社会科学界对国家的兴趣正日渐浓厚,但在理论上重新定位的实际工作却才刚刚开始。在学界理论习惯性地拘泥于社会中心主义思路的大环境下,从事这项工作显然会异常艰辛。即便是近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新多元主义流派启用有关“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一些非常抽象化的术语进行的理论建构,也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丰富、能够包容众多比较历史学研究的论据及发现的概念或解释性命题。<sup>[22]</sup>

本文无意于继续分析这类一般性理论的不足,我将转而探讨本书所选取的一些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看看它们为我们对社会和跨国背景下的国家的认知提供了何种启示。我们会关注到当前学术界中两

种略有不同但同样重要的发展趋势。首先,我们将考察有关国家自主性以及国家作为试图实现政策目标之行为体的能力的论证。然后,我们将探讨有关国家对政治的内容和运作的影响的争论。本次考察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提出任何一种有关国家或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新的一般性理论。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并不想这么做;而且,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篇述评性文章能够实现的目标。相反,我只是希望能够为今后有关跨越不同主题和全球不同地缘文化区域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性的概念框架,以及一些范围适中的议题和假设命题,并对此略作一些说明。

### 国家的自主性与能力

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只有国家确实能够提出这种独立目标时,才有必要将国家看作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进一步思考,人们于是会想到可能需要考察国家实施这种官方目标时的“能力”(capacity),尤其需要考察其遭遇强势社会集团的现实或潜在的反对,或者是面临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时的情况。那么,什么是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决定因素?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关注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最新研究的观点。

#### 国家作为行为主体

这些研究采用了多种推理路径——或单一或混合的方法——来解释国家为何会形成自身目标,以及如何形成并追求这种目标。国家与跨国结构以及与信息的国际流动之间的关联,会鼓励国家的主要官员追求转型战略,即使这样做,有可能会遇到政治上很强势的社

会力量的冷遇甚至抵触。同样,国家对维持控制与秩序的基本需求,既有可能会激起直接的镇压,也有可能反而会激发国家推动型改革(state-initiated reforms)。确切地说,若论谁更可能在这种环境下采取行动,似乎组织凝聚力很强的国家官僚集体,尤其是与当前主流社会经济利益相对独立的职业官僚集团,更有可能在国家危机时刻,启动特别的新型国家战略。此外,官僚集体还可能会用其独特的方式细化早已确立的公共政策,并在较长时间段内采取相对持久的行动。

国家超越本国视野的倾向、在其维持国内秩序时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以及国家官员集体能够吸引和利用到的组织性资源——韦伯—欣策式国家所具有的所有这些特征,就能够帮助解释自主性国家行为。在艾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和艾伦·凯·特里姆伯格(Ellen Kay Trimberger)的解释中,上述这些因素的组合,极为清晰地勾勒出了能被称之为自主性国家行为的极端情形——在这些历史场合中,重要的精英分子动用军事力量控制了整个民族国家,然后雇用官僚机构从上往下地实施改革或进行革命性变革。

斯特潘的著作《国家与社会:比较视角下的秘鲁》(*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考察了拉丁美洲的国家精英发动“包容性”(inclusionary)或“排斥性”(exclusionary)统合主义政体(corporatist regime)<sup>①</sup>的努力。<sup>[23]</sup>斯特潘对这类事件采用的一个关键

---

① “corporatist”或“corporatism”目前在国内有多种翻译(大概是不同学科翻译不同),如“统合主义”、“合作主义”、“法团主义”,等等。西方学者用来指西欧的一种政治实践,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府一起协商政治的模式;西方在研究某些拉美国家时也会提到这一用法。事实上,国内的三种翻译各有所指,“法团”当强调政治参与方的合法性团体性质,“合作”突出这种政治实践相对于英美的“竞争式”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同特点,而“统合”显然是强调了政府其中的主导性作用。事实上可能西方学者也没有一致认定政府在这种模式当中起了多大程度的主动作用。鉴于本书22页末尾对“corporatist”的一种非正式解释,全书统一采取“统合主义”译法,还请各位读者在阅读时再细细辨别其中意味,对译者在翻译上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也恳请读者谅解。——译注



的解释要素就是一群拥有战略性地位的官僚骨干的形成,他们处在国家组织内部并利用国家组织获得巨大的组织力量,还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性认知——即相信通过国家干预,确保政治稳定并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可欲求性。对1964年巴西的“排斥性”统合主义政变和1968年秘鲁的“包容性”统合主义政变,斯特潘都强调他所谓的“新型军事专家”(new military professionals)的早期社会化经历(prior socialization)。这些职业军官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内接受学校训练,这些训练,教授他们有关民族经济规划和镇压叛乱的理念及技巧,同时还教授他们更为传统的军事技能。于是,当意识到政治秩序和民族经济发展出现危机时,这些新军事专家们就利用国家权力来规避或转移非主导阶级和集团对国家秩序的威胁;他们还会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或者进一步规范民族的工业化事业,他们将这些看成是改善本国在现代世界中之国际地位的基本要求。

艾伦·凯·特里姆伯格的《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聚焦于一系列历史案例:日本的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革命<sup>①</sup>,埃及的纳赛尔革命(Nasser revolution)和1968年的秘鲁政变。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有自主动力的”(dynamically autonomous)官僚(其中包括军官)攫取了国家权力并进行了重新组织。随后,官僚们利用国家摧毁现有的主导阶级——上层地主阶级或贵族阶级,并重新定位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sup>[24]</sup>和斯特潘一样,特里姆伯格也强调由早期职业兴趣和社会化导致的凝聚型官僚精英集团的形成,这些精英们都怀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倾向;

---

① Ataturk revolution,指20世纪20—30年代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amel)领导的土耳其革命,国内称为“凯末尔革命”。革命胜利后,为革新土耳其人有名无姓的习惯,取消象征封建等级的旧称号和头衔,国民大会于1934年授予凯末尔姓氏——阿塔图尔克(Ataturk),其意为“土耳其之父”。西方学界以此命名此次革命事件。——译注

她同斯特潘一样重视精英分子对遏制来自下层的一切可能性反抗的关注。然而,也许是因为特里姆伯格实际是在解释有关国家塑造社会的自主性行为这类更为彻底的转型事件,因而她比斯特潘更加强调在类似于突如其来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这样的国家自主性中外国威胁的作用;她还强调了一个为斯特潘所忽视的结构性变量:国家精英与主导性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里姆伯格指出,“当那些持有高级内政或军事职位的官员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一个官僚国家体系或其一部分就可说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1)他们不需要自居于主导地位的土地、商业或工业阶级中招募;(2)在晋升到高级职位后,他们与前述这些阶级没有密切的私人或经济上的联系。”<sup>[25]</sup>特里姆伯格还检验了国家精英与主导性经济阶级的关系,用以预测“在遇到危机状态——即当现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受到外部力量或来自底层之反抗的威胁时”<sup>[26]</sup>,作为应急反应,一个国家可能采取的社会经济变革措施的广深程度。当官僚精英维持与现有主导阶级的联系时,可能出现的是国家推动型威权主义改革(state-initiated authoritarian reforms),1806—1814年的普鲁士、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1964年后的巴西都是如此。但是只有在危机出现时,国家的官僚精英与主导阶级没有联系或没有结成联盟,才会出现更为彻底的结构性变革,包括真正地剥夺主导阶级的地位,特里姆伯格才把这种情况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sup>[27]</sup>因此,特里姆伯格显然已经赋予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概念一种新的分析能力,即可以用来预测在国家和阶级力量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组合下可能出现社会政治结果。<sup>[28]</sup>

### 立宪政体中的国家自主性

虽然采用的术语有相似也有不同,斯特潘和特里姆伯格对国家自



主性的研究所处理的都是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非宪政体制下的统治官僚试图利用整个国家来指挥并重构社会和政治。而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国家自主性更为受限的案例进行了梳理,他们集中研究了自由民主立宪政体中的公共政策决策的历史,如英国、瑞典和美国。<sup>[29]</sup> 尽管形式各异,但他们所采用的基本的分析要素却是相同的,包括:国家的国际导向(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国内的秩序维护职能,以及官僚集体确立并追求自身政策的组织上的可能性。

休·赫克罗(Hugh Heclo)在《英国和瑞典的现代社会政治》(*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一书中,对两个国家的失业保险和老年救济政策的长期发展演变进行了比较历史性的解读。<sup>[30]</sup> 尽管书中没有如此清楚地表述出来,但赫克罗的著作确实是社会政策决策领域有关国家自主性行为的一项研究。不过赫克罗所重视的自主性国家行为并非只有强制(coercion)或支配(domination)行为;还包括了民政官员在诊断社会问题、拟定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的参与过程中投入的智力活动。赫克罗如是说:

政府不只是“很有权力”(power)(或类似涵义的动词形式);它们也会困惑(puzzel)。决策是代表社会的集体困惑的一种形式;它包括决定(deciding)和了解(knowing)。制定养老金(pension)、失业(unemployment)和退休金(superannuation)政策的过程早已超出了判断迎合何种需求的范畴,而涉及了解(knowing)什么人可能需要什么、什么是有需求的、什么应该被需求的,以及如何将民众支持(哪怕是最大程度的赞成)转化成具体的集体行动。这一过程是政治性的,这并非因为一切政策都只是权力和冲突的副产品,而是因为有些人是以他人的名义采取行动的。<sup>[31]</sup>

根据赫克罗的比较历史研究,在社会政策领域,英国和瑞典的民政官员一直以来都比政党或利益集团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赫克罗认为,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危机状态只能激起政党和利益集团的零星反应。正是民政官员吸取有关信息、分析和专家意见等行政资源,拟定出新的政策条款,其细节内容之正确性略逊于实际的社会条件,但要远胜于“感知到的前期政策之缺陷”,即“政府官僚自身对所做过的事情的认知”。<sup>[32]</sup>赫克罗的资料还显示,瑞典的官僚对社会政策的自主性塑造要强于英国,这是因为自工业化初期,在充分自由化和民族政治民主化之前,瑞典前现代的中央集权式官僚政府就需要主动探知社会问题并为管理这些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方案。

赫克罗没有对塑造这种独特的政府自主性之时机和内容的影响因素多做分析,但他确实提供了一些事实,证明了在工人失业引发社会混乱的情况下,民政官员对维持秩序之紧迫性的敏感度;他还指出了行政官员对外国社会政策之先例与模式的持续不断的关注。总之,赫克罗证明了,行政官僚集体能够对主要政府政策的内容及其发展施加直接或间接的渗透性影响。赫克罗的工作也为我们提示了,即便是在名义上为立法和选举团体所操控的立宪政体中,如何就社会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国家行为的作用进行定位和分析。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很有必要简单地浏览一下这两项研究,它们探讨的也是自主性国家行为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影响,但研究的对象却是美国,而实际上,所有的学者都同意美国比任何其他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政体都更加缺乏前述自主性所需的结构性基础。美国没有从前工业化和前民主化时代所继承的中央集权式官僚政府形式,而且,联邦体制形成的权威分散(dispersion of authority)、主权在全国性政府各个部门间的划分(division of sovereignty),以及联邦行政分支机构与国会委员会之间密切的共生关系,这些都确保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

的国家权力都是碎片化、散布式的,到处可见组织化的社会利益渗透其间。同时,全国性政府还缺乏以下这些能够支持强势国家权力的可能的基础:如一个声望很高、自我意识很强、拥有可预期的途径进入关键性行政职位的职业公务员体系,权威的规划部门,对国家中央银行的直接行政控制权,或者是对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公共所有权。正因为美国政府具备如上特征,因此学者们极少会采用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来解释美国的政策发展问题。

尽管如此,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其《捍卫国家利益》(*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一书中,还是使用了这一概念来解释20世纪美国在原材料的生产和营销的国际投资方面外交政策的连续性。<sup>[33]</sup>当克拉斯纳选择这一“议题领域”(issue area)进行系统性历史调查时,其实只是一种聪明的试探性策略:这一议题领域恰好处在国家正当的地缘政治利益和(通常是)强势私人公司的经济利益二者的交会处。因此,克拉斯纳可以探讨,在国外进行原材料生产方面,到底是企业利益在短期内的怂恿会塑造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界定,还是自主性的国家利益会发挥长期作用。他发现的是后一种模式,并认为原因在于在这种分散型的、社会渗透性很强的弱势美国政府中居于某种特殊位置的行为者: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而言,最主要的国家行为者是总统和国务卿,而最重要的机构是白宫和国务院。这些人物和机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与特定的社会压力高度绝缘,而且他们还拥有一系列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促进国家的普遍利益的义务。<sup>[34]</sup>

可惜的是,克拉斯纳并没有细致分析国家的“绝缘的”(insulated)部分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别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否由于政府机构

不同的组织特征才导致了这些机构或多或少的绝缘性。相反,克拉斯纳主要强调了联邦行政机构的不同部分屈服于国会之影响的程度。<sup>[35]</sup>而且,他也无法解释总统和国务院可能只是服从于阶级利益而不是受驱利型企业之影响的问题。<sup>[36]</sup>尽管如此,克拉斯纳的确是指出了,当涉及明显的海外军事干预这类地缘政治问题和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的意识形态理念等问题时,有关原材料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偏离强势公司的利益需求。因此,克拉斯纳的研究启发我们,美国政策决策中国家会发挥明显作用的情况恰恰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只要韦伯—欣策式国家观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而无论采取政府自主性行为的整体潜力有多么不利。正如内特尔(J. P. Nettie)曾经说过的,“无论国家内部可能是或不是什么样子的……从来就……很少会出现对国家主权及其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自主性的挑战”。<sup>[37]</sup>

我自己和肯尼思·芬戈尔德(Kenneth Finegold)关于新政农业政策之由来的研究,也同样证明了在一个“弱国家”的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也会出现国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国家作用往往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政策领域内,尽管这种作用不会在所有政策领域都清晰可辨,甚至有时他们还会无意中创造出各种政治性力量,使得进一步的自主性国家行动严重受限。<sup>[38]</sup>芬戈尔德和我认为,“一战”后的那段时期,美国农业部是“弱势政府机构海洋中一个强势的政府孤岛”<sup>[39]</sup>。我们认为,新政对农业进行干预是对一种长期存在的“农业危机”所产生的一种政策性反应,而不能简单地归为强势农场主利益集团要求的直接结果;我们将这种干预归结为新政初期政府行政能力、首要公共规划以及联邦农业专家之政府实践经验等独特性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的观点与休·赫克罗有关英国和瑞典的创新型内政官员的研究发现非常接近。我们发现,从本质而言,20世纪早期美国的全国性政府的部分机构允许职业官僚在有限的政策范围内发挥作



用,其作用的方式正是瑞典或者 1900—1920 年间英国的官僚所采用的方式。

但是,我们还特意对新政在农业上的行政干预之政治命运进行了追踪。我们发现,在美国政府结构的总体环境下,这种初期的自主性国家干预行为,无意中增强了一个特殊的游说集团——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的势力,使其拥有了影响国家选举和行政调节之最终结果的举足轻重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帮助它“攫取”了对 1936 年后之联邦农业政策的优势影响地位。后来的政府规划行为,尤其是那些影响到经济、种族或社会阶层的力量之再分配的行动,都受到由农业社团联合会所支持的商业性农业既得利益的严重束缚,并最终归于无效。

简而言之,“国家自主性”不是任意政府体系中的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特征,它可以获得也可能会丧失。危机的确可以借由社会精英或者行政管理者促成政府战略和政策的形成,这些精英或行政官员非借助危机不能动员出其采取自主性行动的潜力。而随着强制力机构和行政管理组织在其内部结构和在其与社会集团及政府的代表性部门之间的相关关系上的转型,自主性国家行为的结构潜力也同样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尽管跨国研究能够大体推测出某一政府系统是否具备“较强的”或“较弱的”自主性行动的倾向,但这一概念的充分内涵,只有通过切实的历史研究才能获知,因为历史研究对于给定政体中的结构性变化和背景形势的变革更为敏感。

### 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么

接下来,我们还有必要来谈一谈自主性国家行为的合理性问题(rationality)。通常情况下学者们认为,这类行为与其被看作是由利益集团、选民或特定的企业等团体的需求推动所强烈影响下的政府决



策,倒不如用“资产阶级利益”或“社会普遍利益”或“国家利益”来形容更为合适。<sup>[40]</sup>按照这种视角,国家官员都被认为是特别善于超越来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或自私狭隘的社会集团的目光短浅的局部性要求,从而构筑整体的和长远的战略。然而,对国家自主性概念有所怀疑的学者通常会反驳说,我们不能只从字面意义来看待政府官员自身有关自我合法性的观点、他们自称了解实情的声明,以及所谓代表了“普遍的”或“国家”利益的说辞。这些批判者指出,国家官员并没有特殊的资格可以声称他们拥有关于全部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知识。此外,他们的合法性象征或许仅仅是对那些用来帮助特定的利益或阶级派系的政策的掩饰而已。

这种对国家行为的超理性特征的质疑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彻底放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部分或完全自主的国家行为有可能超越社会行动者及那些为社会行动者所严重限制的政府部门的干预而发现问题甚至找到“解决方案”。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将部分依赖于有关国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能够做什么且应该怎么做合理理念的有效性及其(更为重要的)适当的运用;同时还部分取决于某一自主性国家机构的职权范围与处理某类既定问题所需之行为的规模与力度之间的适配程度(或不匹配程度)。举例来说,要对一个全国性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协调体系进行规划,是不可能由仅仅管辖特定区域或管理某类交通运输方式的政府机构来实现的,而无论那些政府机构中的官员是多么的知识渊博或具有自主行动的能力。总之,自主性政府动机有可能是愚蠢的或是误导性的,而且,自主性动机有可能是片面的、局部的、彼此之间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可能,国家行为在某些时候还可能是前后连贯的、适当的。

当然,无论多么的适当(对于处理某类给定的危机或问题),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自主性国家行为都绝不可能真正的“大公无私”。这

不仅是因为所有的国家行为都必然地会有益于某些社会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另一些社会利益集团(即使受益方并没有刻意追求或引发某些国家行为);更是因为自主性国家行为会规律性地采取那些能够增强其权威、政治生命以及对国家组织的社会控制(正是国家机构中的当政者创造了这些相关的政策或政策理念)的形式。我们可以假设,所有自主性国家行为的一大(或明显或潜在的)特征就是全体政府官员之特权的加强。政策结果是否理性或许取决于“理性”如何定义,甚至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根本就是偶然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同于社会行动者之要求的政策也会出台。有意致力于国家自主性研究的学者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发掘国家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会提出这种与众不同的政策;然后人们才有可能质疑国家在处理上述问题方面的合理性,此时,我们也将能够抛弃那种国家无所不知或彻底无私的不切实际的假设来探索(国家自主性)这一问题。

### 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

一些比较历史学者不仅考察了自主性国家行为的基础层面,同时还探讨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即对国家实施其政策的各种能力(capacities)做出解释。当然,对国家能力的解释与对国家自主性目标的形成的解释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国家官员最有可能着手那些看起来有可行手段的问题。尽管如此,国家偶尔也确实会追求那些超出其能力范围的目标(不论目标是政府自己的还是强势社会集团强加的)。而且,当国家试图从事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或者当其采取的手段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构性变化或社会政治反应时,国家政策的实施往往都既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又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情况。因此,国家实施战略与政策的能力本身就值得严格分析。在这里,我无意对这一重要领域里的实质性发现进行一次全面的探讨;相反,我将只简单阐

述当前国家能力研究中涌现出的部分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

有关国家能力的一般性基础的基本概念中值得一提的并不多。但很显然,主权完整(sov<sup>er</sup>eign integrity)与国家<sup>对</sup>特定领土的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是一切执行政策之国家能力的前提条件。<sup>[41]</sup>除此之外,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与丰富的财政资源是国家有效追求各类目标的基础。因此毫不奇怪,国家建设的历史就是在集中构筑这些国家权力的普遍性源泉。<sup>[42]</sup>这些资源中的一部分正好植根于变化缓慢且相对不易为短期操纵所影响的制度性关系当中。比如,国家机关能否吸引并留住拥有技术过硬和动机强烈的有事业心的就职者?答案或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历史演化而成的精英教育制度、政府组织,以及与政府机关竞争受教育人才的私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国家来说,最好的状态或许是一套规则的流动程序:从精英大学毕业或者是那些接受过熟练的技能培训的人,成为政府官员,因为社会地位高而一直保持雄心壮志,最后能成功地进入到非政府行业。但是,如果这种状态不是从工业时代之初就已经历史性地建立起来的话,之后是很难清除那些不为政府所喜欢的其他模式的。<sup>[43]</sup>

决定一国财政资源的因素或许比较容易随时间进行操纵,尽管并非永远能够如此。一国能够动用的岁入和公债(credit)的数量与形式,取决于该国政府与国内社会阶层之间或与外国政府之间的政治权衡与讨价还价,而这种权衡与谈判能力是结构性的,但也会历史性地发生转变。任何对国家能力的研究需要选择的基本要素都涉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数量,以及国家聚集并调度这些财源的可能的弹性程度。政府精英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下采取策略来征集税收和获得贷款,而国内制度安排和国际形势则会增加政府精英变革这种束缚条件的难度:一个国家可以依赖于出口税吗(比如,依靠出口某种稀缺的自然资源,或是某种不堪国际市场的突然波动的产品)?<sup>[44]</sup>一个非霸



权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否允许其通过获得军事援助而完成其国家建设,还是它必须依赖于那些坚持只进行非公共投资并限制受援国的国内政治选择的国际银行或援助机构?<sup>[45]</sup> 一个国家的哪些现有权威能够征集税收、获得贷款,或者是能投资于有盈利潜力的公共企业? 在现存的宪法—政治体制下,还有多大“空间”来改变国家所不喜欢的财政征集模式?

最后,一个国家有哪些权威和组织手段对它所喜欢的各类财政资源进行调度? 哪些特定种类的税收的确是被严格地用于特定的目的,而决策官员们无法轻易变更其用途?<sup>[46]</sup> 国家到底能否引导(或控制)贷款流向特定的企业或产业部门? 难道既定的宪法—政治实践只能接受总账式支出模式? 任何国家能力的研究都必须探讨上述各类问题。将上述问题的答案全部综合起来,就能对有关一个国家在实现其所追求的任何目标时有可能动用的直接或间接杠杆获得一个最好的全面把握。对于一个国家现有的(或很快能达到的)能够创建或强化国家组织、雇用人员、获取政治支持、补贴经济企业以及资助社会项目的的能力问题,该国筹集和运用财政资源的手段,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sup>[47]</sup>

### 追求特定政策的国家能力

任何试图探索国家实现目标之能力的研究,似乎都必须从一国之领土完整、财政手段以及行政人员供给这几个基本问题入手;然而,关于国家能力的最富成果的研究似乎都集中于特定的政策领域。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所言:

没有理由事先假定(一个国家)在所有政策领域内都是同样的强势或软弱。一个国家或许没有能力改变其医疗体系结构,但

或许却能够建造一个高效的交通网络,而另一个国家或许能够相对较容易地让人民任意迁徙,却无法解决民众的医疗保障问题。<sup>[48]</sup>

那些研究综合型国家推动式变革战略——如某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或是某个由官僚支持的重要的改革事件——的学者,或许需要评估该国家实现跨多个领域的转型目标的整体能力。而且,正如克拉斯纳所指出的,这样一种认识是有用的,即“尽管各国内部的问题领域各有不同,在(比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国家权力模式上的差异。”<sup>[49]</sup>尽管如此,最出色的整体评估或许仍需要从调查特定的领域入手,这是因为,关于一国之权力的最重要的事实也许就是不同政策领域中的权力不均衡。即使是对一场影响深远的来自上层的革命或改革来说,最明显的结果也许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诸方面所产生的各不相同的转变。

因此,在《宪政主义、阶级与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约束》这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中,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和肯尼思·普鲁伊特(Kenneth Prewitt)论证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是如何部分地被美国全国性政府的不均衡的能力所束缚的:对外干预能力很强,却缺少“对由于一种略逊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所引发的成本的内部分配进行指导”所必需的国内规划能力。<sup>[50]</sup>再举一例,艾尔弗雷德·斯特潘根据其对秘鲁政府在重新建构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度和重新指导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成功程度的不均衡现象的细致研究,对秘鲁的“包容式统合主义”(inclusionary corporatism)事件中的许多前后矛盾且出人意料的结果,得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结论。<sup>[51]</sup>

许多有关国家实现特定种类的目标之能力的研究,都采用“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这一概念来指称某一国家所可能支配的相



关手段。<sup>[52]</sup>而要确定在某类特定议题上国家官员或许能够动用的制度性机制的性质与范围,则必须进行跨国比较。比如,苏珊·费恩斯坦(Susan Fainstein)和诺曼·费恩斯坦(Norman Fainstein)就对西北欧国家和美国的城市政策做了比较。因而他们能够得出结论说,相对于西欧国家,美国的全国性政府缺乏一定的用于处理城市危机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中央计划性机构、国家控制的投资资本储备,以及政府直接管理下的国家福利项目。<sup>[53]</sup>

与此相类似,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也将六个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管理自身经济中的国际贸易、投资与货币流动等问题的一系列相关研究综合起来,<sup>[54]</sup>从而能够相当清楚地描绘出日本和法国一类的国家与英美一类的国家之间所能自由运用的战略的不同,前者所拥有的政策工具使之能够将政策应用到特定的工业部门层次之上,而后者则必须依赖于对财政与货币参数的总体性宏观经济调控。与费恩斯坦的研究一样,这项工作也是采用在某一特定政策领域内将不同国家并列参照的方法,从而使相关的政策工具突显出来。然而,这两项研究都没有将“工具”视作国家管理者有意识的短期创造;相反,两项研究都采取宏观性解释,用有关不同国家历史的宏大的制度范式来解释,为何有的国家现在具备或者是不具备处理特定问题或危机的政策工具。

### 国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关关系

对具体的国家能力的充分研究,不仅使研究者得以考察国家在处理特定问题时可能拥有的资源和工具;同时也使人们必然地注意到国家自身以外的因素。研究者会将国家与特定类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具有特定利益与资源的行为主体生活于其中)对照考察。对相关关系分析视角(a relational perspective)的一个明显应用,就是调查

国家相对于国内或跨国的非政府性行为主体与结构,尤其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群体的力量。国家有哪些能力能够改变或者抗拒这类行为主体的要求,或者是转变其对抗性的结构?答案不仅来自国家自身的特性,而且也取决于国家在资源与形势上相对于那些非政府性行为主体的优势清单。斯蒂芬·克拉斯纳就是用这种相关关系分析法,来解释美国政策制定者在与大公司的互动中执行对外原材料政策的努力,那些大公司的偏好与既往的行为常常偏离政府所定义的国家利益。<sup>[55]</sup>

艾尔弗雷德·斯特潘也同样是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秘鲁军事领导人在利用国家权力改变外国资本在其东道国中的投资模式上的成功与失败。<sup>[56]</sup>斯特潘出色地提出了一套逻辑一致的因果假设来解释糖业、石油,以及制造业这些不同工业部门中的不同结果。他考察了每一个部门的制度特征:对清晰明确的政策目标的负责程度、技术能力、监管能力、国家所控制的资源,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他还考察了现有的投资与市场的特征,因为它们影响到秘鲁或外国的多国公司所能期望的从任何进一步投资中获取的利益。这一研究的整个论证过程过于复杂,本文无法在此一一复述,但其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外国投资这一问题领域以及秘鲁这一案例。通过自觉地应用相关关系分析法,来分析国家与多国公司在它们既相依存又相冲突的行为中彼此能够运用的资源之间的对比平衡,斯特潘为我们在多个政策领域内进一步探索国家能力问题,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模式。

但是,在彼得·卡岑斯坦的《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中,对国家能力研究所用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却略有不同。在这本书里(前文已经提到),主要的解释目标不是国家相对于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权力,而是国家管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互依赖”问题的战略。在这本由卡岑斯坦所编纂的文集中,最集中引用的一个概念是“政

策网络”，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关系范式。用卡岑斯坦的话来说：

社会与政府中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目标的行动者构成了主要的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集团。前者代表了生产关系（包括工业、金融、商业、劳工以及农业）；后者来自政治权威结构（主要是国家官僚体系与政党）。统治联盟……在每一个发达工业国家中都发现了各自的制度性表达途径——在执行对外政策时连接公共与私人部门的、各不相同的政策网络。<sup>[57]</sup>

卡岑斯坦认为，对外经济政策的确定与执行超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联。国家的目标与强势阶级的利益都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策倾向。而政策的执行则不仅受到国家所能运用的政策工具的约束，还受到来自关键性社会集团的有组织的支持的影响。

因此，诸如工业重组之类的政策目标能够获得有效实现，也许是因为中央国家行政部门能够控制信贷并能干预工业部门。然而，同样的情况也许会出现在那种产业都被组织成愿意与国家官员合作的、守纪律的行业协会的国家当中。简言之，一项全面的分析需要考察国家的组织机构与利益，需要详细说明社会经济集团的组织与利益，还需要调查国家与社会行为主体间互为补充以及相互冲突的关系。这就是《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的贡献者们一贯使用的方法，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以及日本的对外经济目标。这一方法还被用于分析上述国家的政策网络在执行现有的或酝酿中的替代性经济战略时的能力问题。

斯特潘的《国家与社会》与卡岑斯坦的《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两书中所采用的相关关系分析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所有有关国家

作为行为主体与结构的研究中的一些要点。在分析政策制定与社会变革时,将国家重新置于中心地位的确需要打破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决定论假设。但这绝不意味着旧有的理论重心可能只是向后转:(今后的情况)既不会是所有的国家研究都被对阶级或集团的关注所替代,也不会是纯粹的国家决定论调取代社会中心主义的解释。当前最好的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对国家与社会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的需要。我们也将在此转入考察另一组研究,在这里,关于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全面的相关关系研究方法显得更为重要。

## 国家与政治模式

前面主要聚焦于作为一系列组织机构的国家,通过这种组织,官员们得以组成集体并执行各种战略或政策。当国家出现在当前的社会科学讨论中时,至少非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是以此来援引这一概念的:(国家)好比一个行为主体,在解释决策与社会变革时,(国家的)独立性可能需要得到更为严肃认真的对待。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思考国家的社会政治影响的方法,这是一种替代性的指称框架,它通常表述不甚明确,但或许比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主体的观点更为重要。这第二种方法也许应该叫做“托克维尔”式的方法,因为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中精湛地运用了这一方法。<sup>[58]</sup>按照这种视角,国家的重要性不仅出于政府官员目标取向的行为,更因为其组织结构及其整体行为模式会影响政治文化,鼓励某些(而非另一些)类型的社团的形成与集体政治行动,并使得某些(而非另一些)政治议题的出现成为可能。



自然,以国家的“强”或“弱”当作或多或少的独立且有效的官员行为的表征,是这一视角所探讨的议题中的组织结构与整体行为模式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第二种方法完全就是对我们前面部分所探讨的那些理念的补充,但在此处,研究者的工作方式却截然不同。依照托克维尔式的观点来探讨国家的行为,研究人员并不会通过对国家战略或政策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详细剖析来追踪那些行为的效果;相反,调查者会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思考国家的结构及行为是如何无意识地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社会各部门的政治能力、理念与需求的。因此,托克维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的论证的大部分,是在分析法国绝对君主制度是如何通过其制度性结构与政策实践无意识地削弱了贵族的特权与政治能力,唤醒了农民与城市平民阶级,并激起知识分子对现状进行抽象化的、理性主义的抨击。托克维尔的论证中充斥着政府的行为,尽管他其实很少提及国家官员们的行为与目标。

### 对工业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国家结构与政治的比较研究

展示这种对国家的政治社会行为的宏观性解释的当代成果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概述几位比较历史学者的发现,这些学者都曾聚焦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差异与不同。类似的结果已经,或者应该能够在其他类型的国家里找到——比如在外围国家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中,或者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但相关的分析要点应该是一样的。因此,我在这里只局限于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研究进行比较,我将透过大量研究成果来勾勒出各种有关国家的结构与行为,是如何影响政治文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与集体政治行动,以及政治中的议题日程等方面的观点。

在《作为一个概念变量的国家》这篇影响长达十年的极不寻常的

开创性文章中,内特尔描绘出了美国、英国和大陆欧洲国家的“国家性”(stateness)在制度与文化上的一系列的差异。<sup>[59]</sup>他的一部分非常生动有效的比较提到了政治文化的各种维度,也就是那种广为流传的关于政治权力的本质及其核心理念,以及关于在政治中能够获得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的主张。而在其名为《宪政主义、阶级与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约束》的文章中,艾拉·卡茨纳尔逊和肯尼思·普鲁伊特应用并扩展了这些源自内特尔的思想。

内特尔指出,由于各类政府体系所经历过的各不相同的历史路径,大陆欧洲国家认为“主权”属于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英国人视其当属议会中的政党,而美国公民则拒绝将任何具体的机构视作主权的代表,他们将主权归于法律与宪法。根据内特尔的分析,在欧洲,行政体制一直以来就被视作自主性行为的一个领域,现有体制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都倾向于将之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但在美国,则如同卡茨纳尔逊和普鲁伊特细致地指出的那样:

宪法并没有建立……[一个行政上集权的]政府,使之管理社会事务并促使其朝向一种清晰明确的公共福利观念发展;相反,它确立了一种政治经济,而公共福利正是这一政治经济体中个体偏好的总和……美国是一个立法与诉讼的政府……政治成为种种努力使社会和经济利益转变成法律的斗争……这种政治文化将政治权力定义为使某一法律获得通过。

不满之情绪经常表现出的是试图迫使通过一项新的且更利于其自身的对宪法的解释……在这种无穷尽的反复洗牌的过程中,宪法自身绝不会成为目标。相反,宪法原则使那些要求获得“美国生活方式”的公平份额的主张具有了合法性,而宪法的解释与再解释则成为促进再分配的手段。<sup>[60]</sup>

简而言之,不同种类的国家不仅在进行决策、动用强制性力量,以及实施司法行为等方面千差万别,在引发各种有关“政治”自身之意义与方法的不同理念以及影响民族社会中一切群体与阶级之行为的观念的生成与延续方面也不尽相同。

集体行动的方式,无论是社会集团提出政治要求还是政治领导人力图动员其支持者,同样也部分地受到国家的结构与行为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的证明可以广见于有关西方国家的研究之中,这些研究包括对社会抗议的原因与形式的探索、对“统合主义”这种以政府组织形式制度化(governmentally institutionalized)的利益协商机制的考察、对作为选民及国家权力行动之中介的政党的探讨。

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及其同事考察了17世纪以降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暴力性和非暴力性集体抗议的演变形式,并在这项研究当中指明了国家结构以及政府官员的行为影响集体抗议的时机、目标与形式的方式方法。按照梯利的研究,发动战争与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形成之间的无情联系,意味着在那个时代,大多数“集团竞争”(collective contention)<sup>①</sup>都促使人们(尤其是地区精英与地方社团)积极捍卫既有的权利来抵抗王室征税官和征兵人员。<sup>[61]</sup>后来,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创造出了新的抗议形式——通过英国的议会政治、法律过程,以及选择性针对政府的镇压行动的互动,来进行联合式“社会运动”。<sup>[62]</sup>集体行动中的社会运动方式,往往因需要适应特定国家的结构和政治习惯而变化,它们还会散布到许多其他的现代国家中去。我们还可以从梯利的这部著作中找出其他许多有关国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的案例。梯利本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是一位强有力的倡导者,他呼吁把国家重新引入

① 指王朝/国家间的战争。——译注

对社会抗议的分析——这属于政治社会学领域,而在此之前都由社会系统论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主导。<sup>[63]</sup>

如果说集体行动问题是社会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那么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就是政治科学中的常青树。正如苏珊娜·伯杰(Suzanne Berger)所指出的,近来研究西欧国家的学者已经不再将“利益集团看作社会的映像”。相反,他们发现“国家干预的时机与特征”不仅影响到“(利益集团的)组织策略与战略”,还会影响“对利益自身的定义与满足感”;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依据其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干预的历史顺序和干预形式,活跃在任意一个欧洲国家政治中的利益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结构。<sup>[64]</sup>此外,西欧国家利益集团的研究者还对“统合主义”模式的原因与动力机制进行了激烈争论。在这种模式下,排他性地代表既定的功能性社会经济利益的利益集团具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并拥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威性权利。有些学者直接强调国家主动创造了统合主义形式;另外一些对这种强国家中心主义观点持更多怀疑态度的学者,则转而分析特定的国家结构和政策鼓励或弱化各统合主义集团的代表权的各种途径。<sup>[65]</sup>

当我们思考美国的情况时,上述各个要点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在1979年的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中,罗伯特·索尔兹伯里(Robert Salisbury)问道:“为什么美国没有统合主义?”而格雷厄姆·威尔逊(Graham K. Wilson)则于1982年对这一质疑做了回答。<sup>[66]</sup>两位学者都同意,正是美国所具有的这样一些基本的(互相关联的)结构特征——如联邦制、依据地理单位划分代表区的重要性、非纲领性政党、行政官僚职权分散,以及在全国性政府的分权体制中国会及其特殊委员会的重要地位,等等——都鼓励了相互竞争、利益狭隘且纪律松散的利益集团的大量繁殖。简言之,美国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几乎不会使统合主义在政治上(无论是对官员还是对社会集团来说)变得可



能或可信。在美国,即使是抗议运动也倾向于分特定问题或不同地理区域;国家结构、既得利益集团和对抗性集团全都可能相互模仿彼此的组织形式及目标。

与利益集团一样,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中最重要也最持久的集体政治行动的形式,就是在选举中互相竞争的政党。在一系列优秀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中,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证明了这种政党是如何形成各自的运作模式的——或者采取分肥制或者对有组织的选民集团进行纲领性动员。<sup>[67]</sup>谢夫特指出,政党的运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在建立民主投票制度时的国家权力形式。以德国为例,在民主选举出现很久以前绝对君主们就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官僚体制。当以获取选票为目标的政党出现时,它们无法为其党员提供“职务分肥”,因为(在出身于倾向通过大学教育获取国家公职的中上阶层的公共官员之间)已经建立的联盟坚持使公共官僚免受党派控制。因此,德国政党被迫采用各种意识形态式的、纲领性的诉求,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到反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诸此种种<sup>[68]</sup>。作为对比,谢夫特又展示了意大利前民主制时代中央行政的区域性不均衡与19世纪的美国民主制下自主性联邦官僚的缺乏是如何使分肥式政党得以瓜分各自国家内的行政职位的,这种经历也决定了选民们将受到非纲领性号召——尤其是分享公职或其他公共控制资源的“分配式”安排——的诱惑。

谢夫特的全部研究还涉及英国、法国,以及对20世纪美国的地区比较,这里无法进一步罗致于此。通过逻辑严密的分析和生动的历史细节描绘,谢夫特向我们展示了演变中的国家行政结构,对在公共官员与社会选民之间充任协调人的政党的目标与组织形式的影响。和众多研究投票与政党的学者不同,谢夫特并没有只把政党看作表达社会政治偏好的媒介手段。他认识到,政党也是有主张和

企图利用国家权力的组织,是希望促进其自身利益与持久运转形式的组织。决策的路径不仅是从选民偏好到政党平台再到国家政策,同样也是(或者更多的是)从国家结构到政党组织再到选举政治的内容。

若要将公共行政的结构与政党组织的结构综合考虑,需要费一番心思来“选择”那些将进入到(或者是远离)某个社会的“政治日程”(political agenda)的政治议题的类型。在研究有关美国城市政治中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决策的著作中,马修·克伦森(Matthew Crenson)提出了上述观点,其结论之意义超越了其书本身。<sup>[69]</sup>克伦森指出,大佬操控、分肥运作的城市机器通常更喜欢重视那些能够创造出可分割性利益或成本的政治议题,这些利益或成本将能够在争取特定商业类或地理类选民的支持的各项独立谈判中进行有等差的分配。然而,空气污染控制产生的是不可分割的集体性利益,因此,机器政府和分肥型政党会尽力避免考虑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克伦森进一步分析道,整个政治日程可能被相同类型的议题所主导:或是最为“集体性的”或是最为“特定性的”/分配性的议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部分是因为政府和政党的组织性需求会产生相似的议题;同时还是因为一旦政治觉悟和群体动员偏向了某一个方向,人们就会倾向于沿着同一路径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国家—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能够塑造政治文化和集体行动的方式一样,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辩证性关系(dialectic)影响到政治的基本议题内容。

### 国家与社会阶级的政治能力

了解了上述与各国不同的国家结构相关的政治的诸多方面,就不会奇怪政治的“阶级性”(classness)也会因国别而异,这是因为阶级利

益融入国家政治的程度(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主流的政治文化、集体行动的方式,以及发起并解决影响广泛的集体性(社会的或阶级的)议题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即阶级和阶级矛盾在工业社会中总是存在。但阶级利益与冲突的政治表达绝不是自发产生或由经济决定的;它取决于各阶级产生觉悟、组织起来并获得代表权的能力。而国家的结构与行为则或直接或间接深刻地塑造了这种阶级能力。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经典智慧进行反思。

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直接的批判性对话,他指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对政治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态度可以用国家中心主义的术语来进行解释。<sup>[70]</sup>根据伯恩鲍姆的研究,集权而官僚主义的、与社会泾渭分明的法国政府,实际上鼓励了法国工人的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和政治上的战斗性,而集权但与社会分殊较小的英国“上层建筑”(establishment)则促使英国工人及其领袖选择了议会式的渐进主义策略与私人合同式工资谈判方式。

艾拉·卡茨纳尔逊的《城市战壕》一书以及马丁·谢夫特的论文《工会与政治机器:19世纪末期美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与解体》都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即美国产业工人阶级在跨国比较中政治能力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特定的国家性因素<sup>[71]</sup>。美国的民主化(表现为白人男子的普选权)恰好发生在其资本主义工业化启动阶段。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选举竞争将工人也卷入政体的运作,这一过程的发生不是通过官僚阶级或“上层建筑”,而是经由深深扎根于地方社区,以分肥方式运作的政党。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工会和工人没有将自身与政治协会或党派联合起来,向主导性的政治特权阶级和一个自主的行政当局争取选举权。共同的观念与组织并没有将美国工人的



工作与住所连接起来。早期美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体验到的“政治”，仅仅是由核心政客们按照民族或种族阵线组织起来的严格局限于地方群体的事务。工作场所的抗争，最终被为面包和黄油而斗争的工会所接管。“就这样”，卡茨纳尔逊总结道：“公民权利及其前提条件被赋予了公共社区性的内涵，而变得与劳动关系无关。美国人对阶级的这种割裂式的理解，主要是由联邦宪政体制的运行所创造出的政体特征而导致的。”<sup>[72]</sup>

国家结构不但影响从属阶级的能力，还会影响有产阶级的能力。仅仅是简单地假定主导集团具备某种“阶级利益”——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或坚持一种适合其财产权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绝对不行的。究竟如何（甚至是否）秩序得以维护以及经济积累得以持续，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的国家结构和这种结构所帮助塑造的主导阶级的政治能力。因此，我在1973年讨论巴灵顿·摩尔的《极权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时就提出，19世纪英国主要的地主和资本集团的“改良主义”（reformism）并非仅仅是阶级经济利益的产物，它同时也是这些集团在分权化的行政与镇压当局，以及进行政治决策的议会中的所占有的既得政治利益的复杂均衡的表现。<sup>[73]</sup>同样，我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关于某些农业国家的革命性转型的论证，主要也是对上层地主阶级的政治能力的比较分析，而这种能力正是由君主制官僚国家的结构与行为所塑造的。<sup>[74]</sup>

同样地，当我们将上述讨论的要点搁置美国环境时，思路会更加清晰。与美国的产业工人阶级一样，美国的资本家也缺乏在全国政治中追求本阶级利益的政治能力。这就是苏珊和诺曼·费恩斯坦在解释当代美国在应对城市危机时的政策的不连贯性和低效性时所给出的理由之一，西北欧国家的措施要得力得多，在对主导和从属阶级的利益做出反应方面情况也是如此。<sup>[75]</sup>从历史上看，美国相对软弱、分



权化且分散化的国家结构,加上较早的民主化,以及缺乏政治上团结统一的工人阶级,都允许并鼓励着美国的资产阶级分裂成多种狭隘的利益阵线并接受一种反国家的、自由放任式的意识形态。<sup>[76]</sup>可以证明,美国商业集团长期以来都受益于这种状态。然而,由于在政治上不团结或者(如新政高潮时期)与秉持干涉主义的政府机构或行政当局颇为疏远,美国的商业集团无法有效地影响或约束国家的改良主义干预,其利益也就常常容易反复受到攻击。<sup>[77]</sup>于是,美国企业就经常感觉自己很难对那些可能有益于整体经济的国家提案给予持续的支持。

很显然,产业工人和资本家并不代表工业民主国政治中的全部社会集团。还有大量有关国家结构与政策对集团利益和能力的影响的研究致力于用历史和比较的视角来解释农场主和小商人的政治参与。此外,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重要研究在探索国家形成与现代“职业”(professions)的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expert)知识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sup>[78]</sup>但是,无需再继续考察这些文献,本节的基本论证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把“社会”、“经济”或者某种“文化”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或者全部都看作是独立于国家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因素,那么全方位政治的基础就不是单纯地存在于三者当中的某种因素之中。公共生活的意义以及社会集团得以意识到其政治目标并开展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的集体形式,并非只是来源于社会,而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之交会面上。因此,不论其政治能力如何,利益集团和阶级这类明显的纯社会经济现象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国家的结构与行为,而反过来,这种国家结构与行为也正是社会行为主体努力谋求加以影响的。

## 结 论

本文广泛探讨了当前有关国家作为在政治中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和制度结构的研究,尽管所考察的对象不可避免地经过了选择。文中讨论了两种致力于将国家作为重要变量引入有关社会变革、政治及决策的比较历史研究中的分析策略,这两种方法既互为补充又可互为替代。一方面,可以把国家视为组织机构,通过这些组织,官僚集团可以追求其独自的目标,只要它们可以利用与社会现实相关的国家资源,就能以或高效或低效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而另一方面,国家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被视为组织结构与行为,影响社会中一切集团或阶级的政治意图与策略。

回顾本文序言中提及的近年学界思想和历史的倾向,关于那些让人们保持持久兴趣的各种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现在当不再有是否应该认真地引入国家作为解释变量的这一问题了。然而,关于如何考察国家及其影响,尚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存在。我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性结论在此可以直言不讳:与其在晦涩而抽象的概念辩论中纠缠不清,不如沿着本文所阐述的分析策略不断前进。遵循这些研究路径,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比较的和历史的调研,发展出一系列中层规律,从而回答国家在革命和改革中的作用、国家所追求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国家在政治冲突与议程上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随着这类比较历史学的研究项目不断深入,我们很有可能能够作出有关国家与社会结构的相关关系的理论解释。可以肯定,这种新的理论解释绝不会雷同于结构功能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这类的大系统理论。只要我们在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将国家引入其合适的中心位置,我们就不得不尊重社会政治结构固有的历史真实

性,进而我们就会注意到国家层面的发展与变化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之间不可避免的相关关系。我们不需要一种新创的或翻新的关于“国家”的宏大理论。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对能够解释现代世界中的国家的历史、社会结构,以及跨国关系等现象的因果规律的立论坚实、分析透彻的理解。

### 注 释

本章是一份修订稿,原稿《找回国家:当前理论与研究的错误引导与重大启发》(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False Leads and Promising Starts in Current Theories and Research)最早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协会一次名为“国家与社会结构:当前理论的研究启示”(State and Social Structures: Research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Theories)的会议上,该会议于1982年2月25—27日在纽约基斯科山第七山泉会议中心(Seven Springs Center, Mt. Kisco, New York)举行。会议上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后来,帮助我考虑要对那篇会议论文进行修改的主要原因是皮埃尔·伯恩鲍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肯尼思·芬戈尔德和埃里克·诺德林格诸公会后给予的反馈,还有斯蒂芬·克拉斯纳惠赠的尚未发表的文章《评论:关于国家的研究方法:替代思想与历史动态》[发表后的文章见 Stephen Krasner, “Review Article: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 (2) (January, 1984), 223 - 246], 以及雷蒙德·杜瓦尔的《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国家》[Raymond Duvall,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Context”, 即将发表在 *The Democratic State*, ed. , R. Benjamin and S. Elkin(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5)]。我尤其要感谢在1982—1983年间与我共事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国家与社会结构委员会的同事们的讨论与交流,他们是:彼得·埃文斯、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彼得·卡岑斯坦、埃拉·卡茨纳尔逊、斯蒂芬·克拉斯纳、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 还有查尔斯·梯利。

[1] 重要的研究包括 Alice Amsden: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statism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1979): 314 - 380;

Pranab Bardhan, "The State, Class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1982 - 1983 Radhakrishnan Memorial Lectures,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 Douglas Bennett and Kenneth Sharpe, "Agenda Setting and Bargaining Power: The Mexican State versus Transnational Automobile Corporations", *World Politics* 32(1979): 57 - 89; Peter B.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Nora Hamilton, *The Limits of State Autonomy: Post-Revolutionary Mexico*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Steven Langd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Kenya* (London: Macmillan, 1981); Hyun-chin Lim,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System: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1963 - 1979"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Richard Sklar, *Corporate Power in an African State: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Mining Companies in Zamb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Ellen Kay Trimberger,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78)。

[2] 重要研究包括 Douglas Ashford, *British Dogmatism and French Pragmatism: Central-Local Policymaking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Pierre Birnbaum, *The Heights of Power: An Essay on the Power Elite in France*,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David Cameron,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1978): 1243 - 1261; Kenneth Dyson and Stephen Wilks, eds., *Industrial Cri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ate and Indust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eter Hall, "Policy Innov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Nexus in France and Brita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66(1983): 43 - 59; Peter A. Hall, "Patterns of Economic Policy among the European States: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in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Europe*, ed. Stephen Bornstein, David Held, and Joel Krieger (London: Allen & Unwin,



forthcoming); Hugh Hecllo,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tiy Press, 1974);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eter Katzenstein, ed. ,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Steven Kelman, *Regulating America, Regulating Swed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1);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eodore J. Lowi, "Public Policy and Bureau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in *Comparing Public Policies: New Concepts and Methods*, ed. , Douglas E. Ashford, vol. 4 of *Sage Yearbook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Beverly Hill, Calif. : Sage, 1978), pp. 177 - 196; Leo Panitch, ed. , *The Canadian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cial Power*(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Theda Skocpol and John Ikenberry, "The Political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6(1983): 87 - 148; S. Tolliday and J. Zeitlin, eds. , *Shop Floor Bargaining and the Stat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John Zysman, *Political Strategies for Industrial Order: State, Market and Industry in France*(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3] 重要研究有 Michael Adas, "From Avoidance to Confrontation: Peasant Protest in Pre-Colonial and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1981): 217 - 247; Betrand Badie and Pierre Birnbaum, *The Sociology of the State*,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ierre Birnbaum, "States, Ideolog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Western Europ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2(1980): 671 - 686; Jose Murilo de Carvalho, "Political Elites and State Building: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Brazi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4(1981): 378 - 399; Mounira Charrad, "Women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s, Law and the Family in Tunisia, Algeria, and Morocco”( Ph. D. diss. ,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Daniel Chirot, *Social Change in a Peripheral Society: The Creation of Balkan Colony*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Stanley B. Greenberg, *Race and State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 – 1966*(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 Joel S. Migda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seph Roth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 – 192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Ezra N. Suleiman, *Politics, Power, and Bureaucracy in France: The Administrative Elit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rles Tilly, ed.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Studi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o. 8(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and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4] 特别是 Douglass C. North,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tate in Economic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6( 1979): 249 – 259;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 New York: Norton, 1981); and Robert H.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5] 特别是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6] 社会学家可能早已看出本章的标题是对 1964 年乔治 C. 霍曼 (George C. Homan) 在美国社会学协会上的主席发言“把人找回来” (Bringing Men Back In) 的一种效仿。当然,我们两人谈论的话题完全不同,但我们对具体的群体行为的重视以及希望对其进行解释的迫切愿望却是相似的,这与某些结构功能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分析性抽象概念的特征截然不同。

[7] 最重要的例外研究包括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开拓性的国家中心主义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and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莫里斯·贾诺威茨 (Moris Janowitz)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如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和 *Social Control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以及詹姆士·威尔逊在《政治组织》[James Q. 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一书中前瞻性的概念探索。而马丁·西摩·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在其诸多政治社会学的著作中也一直敏锐地保持着对政府代表权的不同制度结构的效果的观察。此外,莱因哈特·本迪克斯 (Reinhard Bendix) 坚持发展出了一种用于研究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心主义的韦伯式分析方法,以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发展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对照;而 S. N. 艾森施塔特 (S. N. Eisenstadt) 和斯坦·罗甘 (Stein Rokkan)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将功能主义与韦伯模式相结合的进行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

[8] 具体的研究范式说明请参见 Gabriel Almond,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16 (1965): 183 – 214;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Gabriel Almond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David Easton,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9 (1957): 383 – 400; and 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Knopf, 1951)。

[9] 埃里克·A. 诺德林格 (Eric A. Nordlinger) 的《论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为了容纳当选政治家或行政官员的自主行为而将多元主义假设扩展到概念的极致。明显地,诺德林格将“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纯粹定义为公共官员的有意识的偏好(conscious preferences),据说这类官员只要不是故意屈从于社会行为者的要求就会自主行动。诺德林格坚持公共官员像选民、经济精英以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一样有自己的欲求以及与政治相关的资源,按此假定,官员只不过是拥有与多元主义所假定的变动不居的“政治过程”中所有行为主体相同的身份(dignity)。因此,诺德林格实际上是在说,国家自主性只不过是政治领导力的创造性练习。无论国家拥有什么样的组织和能力,依据定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官员都只是在某个职位上做这些练习。依我看,诺德林格一书的价值不在于这一相当乏味的一般性结论,而在于后来者可以从该书提供的一些类型中找到值得研究的有关国家自主性的变化范围的假设。

[10] 参见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Raymond E. Wolfinger, *The Politics of Progres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4); and Nelson W. Polsby,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在思考上述研究中到底有何不足时,若弗雷·富热尔的批判性讨论《政府结构与政治组织:一种以政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Geoffrey Fougere,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s: A Polity Centered Approach”(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78)]给了我很大助益。

[11] 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and Morton S.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1)。

[12]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其《捍卫国家利益》(*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 27)一书中对官僚政治学研究视角的讨论使我受益颇多。克拉斯纳一书还阐述了采取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的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具体有何不同。

[13] 参见 Leonard Binder, James S. Coleman, Joseph La Palombara, Lucian W. Pye, Sidney Verba, and Myron Weiner, *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



ment, Studi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o. 7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Gabriel Almond, Scott D. Flanagan, and Robert J. Mundt, *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Tilly, ed.,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and Raymond Grew, ed., *Crisi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o. 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梯利和格鲁的书公开批评了资助其项目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所鼓吹的理论观点,梯利所呼吁采用的研究方法,在如今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使命中得到了提倡。

[14] 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为重要的有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and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Gösta Esping-Andersen, Roger Friedland, and Erik Olin Wright, “Modes of Class Struggle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Kapitalistate*, no. 4 – 5 (1976): 186 – 220; John Holloway and Simon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London: Arnold, 1978); 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 Timothy O’Hage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Claus Off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German Political Studies* 1 (1974): 31 – 57; Goran Therborn,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s. 1 and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980)。

对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最出色的总结有: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David A. Gold, Clarence Y. H. Lo, and Erik Olin Wrigh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Monthly Review* 27 (1975), no. 5: 29 – 43; no. 6: 36 – 51; Bob Jessop,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 (1977): 353 – 373;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Ralph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 在所有参与新马克思主义大辩论的学者当中,弗雷德·布洛克在将国家视为真正有自主权的行为主体方面走得最远。请参见他的《统治阶级并不统治: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注解》[Fred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volution* 7(1977): 6 - 28]; 以及《超越相对自主性》[“Beyond Relative Autonomy”, in *Socialist Register* 1980, ed.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London: Merlin Press, 1980), pp. 227 - 242]。一致的观点还可以参见特里姆伯格的《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 以及我本人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反应: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新政的案例》一文[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 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 *Politics and Society* 10(1980): 155 - 201]。布洛克和我共同批判了对国家自主性的过分强调问题(见 Carnoy,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Chap. 8); 此外,布洛克、特里姆伯格和我一起对该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参见 Ralph Miliband, “State Power and Class Interests”, *New Left Review*, no. 138(1983): 57 - 68]。

[16] 新马克思主义众多国家观点的视野使得他们更适合(值得尝试)进行跨生产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进行跨国家的比较。然而,这种跨生产模式的比较研究却非常有限,赛伯恩(Therborn)的《统治阶级》(*Ruling Class*)就是凤毛一羽。

[17] 我并不是要简单地延续过去的传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正是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更替时期,就出现了大量更加重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 Harold Lasswell,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1941): 455 - 46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originally 1944)。

[18] 有关的一些措施建议,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ravelling the Paradox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Weakness”, 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ed. Katzenstein, pp. 51 - 87; Stephen Blank, “Britai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Problems of Pluralistic Stagnation”, in *Between and Plenty*, ed. Katzenstein, pp. 89 – 138; Andrew Martin,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Strateg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0(1977): 323 – 354; Paul M. Sacks, “State Structure and the Asymmetrical Society: An Approach to Public Policy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2(1980): 349 – 376; and Dyson and Wilks, eds., *Industrial Crisis*.

[19] 有关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主要论述,参见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originally 1922), vol. 2, chap. 9; vol. 3, chaps. 10 – 13。

[20] Stepan, *State and Society*, p. xii.

[21] 参见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ed. Felix Gilbe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originally 1897 – 1932)。

[22] 新多元主义理论对国家自主性最重要的探讨,参见注释9。注释14所引用的普兰查斯(Poulantzas)和奥菲(Offe)的著作则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关国家自主性理论的重要代表。普兰查斯所用的方法实际上非常糟糕,因为他只是简单地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个必要特征。普兰查斯认为,无论不同国家之国家组织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实证联系有多么不同,国家是“相对自主的”;他还断定,国家总是要努力稳定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

[23] Stepan, *State and Society*, chaps. 3 and 4. 参见 Alfred Stepan,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of Internal Warfare and Military Role Expansion”, in *Authoritarian Brazil*, ed. A. Stepa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47 – 65。

[24] Trimberger, *Revolution from Above*.

[25] 同上,第4页。

[26] 同上,第5页。

[27] 因此,在评价斯特潘的工作时,特里姆伯格认为,通过强调巴西军事集团与巴西及多国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斯特潘可能已经解释了巴西政变的镇压性和“排斥性”的本质(相比之下,秘鲁“包容性”的改革涵盖了群众性政治动员

和对庄园主财产的没收)。事实上,斯特潘确实提到[见“新专业主义”(The New Professionalism),第54页],巴西的军事专家是和地方精英们一起接受训练的,这其中包括产业家、银行家和商业精英,在1964年以前,这些人也可以进入巴西高等军事学院(the Superior War College of Brazil)学习。

[28] 因此,特里姆伯格的工作也算是对本文注释22中讨论的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理论之问题的批判。

[29] 有关法国的国家自主性、其结果及其局限性的研究尤为丰富。我有意单列于此是因为,法国是可以应用国家自主性概念的一个如此明显的例子。相关文献可参考:注释2和3中已经提到的Birnbaum, Hall, Suleiman和Zysman。还有Stephen Cohen, *Modern Capitalist Planning: The French Experie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以及Richard F. Kuisel, *Capitalism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France: Renova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0] Hecllo, *Modern Social Politics*.

[31] 同上,第305页。

[32] 同上,第305-306,303页。

[33]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34] 同上,第11页。

[35] 也可参见Krasner,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pp. 51-87。

[36] 因此,克拉斯纳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将他自己的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论点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持——国家的行为是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结构性的理论观点区别开来。克拉斯纳的应答是,国家政策具有“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目标,这就是反对阶级利益观的证据。但这种处理还没法说服我。如果一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不能够作为阶级意识或国家意图的证明,那么,可能就会有人强调,美国海外干预行动中可察觉的地缘政治“利益”确实是起作用的。如果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有一定的理解,就不会认为“自由世界”合法化这种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了。



[37] J. P. Nettle,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 (1968), 563 - 564.

[38] Kenneth Finegold and Theda Skocpol, "Capitalists, Farmers, and Workers in the New Deal-The Ironi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August 31, 1980). 该论文后来部分发表于 Theda Skocpol and Kenneth Finegold,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 in the Early New De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7 (1982): 255 - 278。

[39] Skocpol and Finegold, "State Capacity", p. 271.

[40] 克拉斯纳的《捍卫国家利益》(*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和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层》都表达了这一观点, 尽管两人所用的方法截然不同。

[41] 或许应该说只有那些拥有绝对的行政—军事控制能力的国家或国家建设运动, 才能(并才有可能)实施那些与这一首要目标相关的政策。这一原则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与在革命性的过渡时期所进行的国家建设的斗争同时出现的诸多社会变革。

[42] 参见 Tilly, ed.,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 Michael Mann, "State and Society, 1130 - 1815: An Analysis of English State Finance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80), vol. 1, pp. 165 - 208; 以及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3] 参见伯纳德·西尔伯曼(Bernard Silberman)关于涉及职业化过程的国家官僚体系化的替代模式的重要著作:《国家文官化:一项比较研究》(*State Bureau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44] 比如, 由于国际原油销售而获得的意外的税收增加, 不仅会使得国家免受社会控制而更加自主, 同时也由于其社会根基和政治契约十分脆弱, 因而在危机时刻会更加弱不可挡。这也是我在《食利国家与伊朗革命中的伊斯兰什叶派》["Rentier State and Shi'a Islam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1

(1982): 265 - 283]一文中的主要思路。美国知识分子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共同组建的近东与中东研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最近开展的一个名为“阿拉伯石油生产社会中的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 in Arab Oil-Producing Societies)的项目正是要调查石油收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45] 参见罗伯特·伍德的《外国援助与欠发达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政府》[Robert E. Wood, "Foreign Aid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0(1) (1980): 1 - 34]。伍德的文章主要记录并讨论了大部分外国援助的反建国效应(anti-state-building effect), 但这篇文章也指出, “由援助而建立的‘过度发展’的军事机构能够推动国家主义的发展, 这是外国援助方所未曾预见。”(第34页)台湾和韩国似乎就是这方面的好例子。

[46] 参见 John A. Dunn, Jr.,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marked: Transport Policy and Highway Finance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 (1978): 29 - 53。

[47] 有关国家财政的社会分析的“经典”论述, 请特别参考洛伦茨·冯·斯坦的《论征税》(Lorenz von Stein, "On Taxation")和鲁道夫·戈德希德的《公共财政问题的一种社会学方法》(Rudolf Goldscheid,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Public Finance"), 两文均见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ed. Richard A. Musgrave and Alan T. Peacock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分别在第202 - 213页和第28 - 36页。

[48]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 58.

[49] 同上。

[50] Ira Katznelson and Kenneth Prewitt, "Constitutionalism, Clas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 in U. S. Foreign Policy", in *Capitalism and the State in U. S.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ed. , Richard Fage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8.

[51] Stephan, *State and Society*, chaps. 5 - 8.

[52] 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在财富与权力之间》(*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一书中讨论了这一概念,见该书第 16,297 - 298 页。

[53] Susan S. and Norman I. Fainstein, "National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ocial Problems* 26(1978): 125 - 146; 尤其见 pp. 140 - 141。

[54]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55] Krasne,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尤其是第二和第三部分。

[56] Stepan, *State and Society*, Chap. 7.

[57]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p. 19.

[58] 在此我要感谢杰夫·温特劳布(Jeff Weintraub),是他指出这第二种方法与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59]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pp. 559 - 592. 探讨相关问题的最近一项研究是肯尼思·戴森(Kenneth Dyson)的 *The State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of an Idea and Institu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0] Ira Katznelson and Kenneth Prewitt, "Limits of Choice", in *Capitalism and State*, ed. Fagen, pp. 31 - 33.

[61] Charles Tilly,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pp. 109 - 144.

[62] 同上,第 145 - 178 页。

[63] 若想了解梯利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方法对早期社会学路径批判的基本情况,参见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64] Suzanne Berger,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Governability of European Society", *Items*(Newsletter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35(1981): 66 - 67.

[65] 参见 Suzanne Berger, ed.,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eds.,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vol. 1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olog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9), 以及 Gerhard Lehmbruch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ds., *Patterns of Corporatist Policy-Making*, vol. 7 of *Modern Politics*

*Series* (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2) 。

[66] Robert Salisbury, “Why No Corporatism in America?” in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ed. Schmitter and Lehmbruch, pp. 213 – 230; and Graham K. Wilson, “Why is There No Corpor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rporatist Policy-Making*, ed. Lehmbruch and Schmitter, pp. 219 – 236.

[67] 参见 Martin Shefter, “Party and Patronage: Germany, England, and Italy”, *Politics and Society* 7(1977): 403 – 451; “Party,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Patterns of Evolution and Decay*, ed. Louis Maisel and Joseph Cooper, vol. 4 of *Sage Electoral Studies Yearbook* (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9) , pp. 211 – 265, 以及“Regional Receptivity to Reform: The Legacy of the Progressive Er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8(1983): 459 – 483.

[68] 事实上,谢夫特(“Party and Patronage”, p. 428)指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可能更愿意利用分肥制度来获取农民选票的政党也不得不诉诸于意识形态号召,因为官僚集团的自主性力量太强大了。因此,他们采用反犹主义和国家主义“理念”来动员农民这样一个通常被认为是本质上倾向于接受分肥式诉求的阶级。

[69] Matthew Crenson, *The Un-Politics of Air Pollution: A Study of Non-Decision-making in the Cities*(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尤其是 chaps. 5 and 6。

[70] Pierre Birenbaum, “States, Ideolog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We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2(1980): 671 – 686.

[71]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and Martin Shefter, “Trades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orthcoming in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Zolberg(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72] Katznelson and Prewitt, “Limits of Choice”, p. 30.

[73] Theda Skocpol, “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4(1973): 1 – 34.

[74]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75] Fainstein and Fainstein, “National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

[76] 同上, 第 39 – 40 页; 以及 David Vogel, “Why Businessmen Distrust Their State: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American Corporate Execu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1978): 45 – 78。

[77] 参见 David Vogel, “The ‘New’ Social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egulation in Perspective*, ed. Thomas McGr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5 – 185。

[78] 参见 Gerald L. Geison, ed., *Professions and the French State, 1700 – 19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4); Arnold J. Heidenheimer, “Professions, the State, and the Policy Connection: How Concepts and Terms Evolved over Time and across Language Boundaries” (Paper presented at a panel, Professions, Public Policy and the State, Twelfth World Congres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Rio de Janeiro, Brazil, August 12, 1982); Terry Johnson, “The State and the Professions: Peculiarities of the British”, in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d. Anthony Giddens and Gavin Mackenzi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86 – 200; Dietrich Rueschemeyer, *Lawyers and Their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Dietrich Rueschemeyer, “Professional Autonomy and the Social Control of Exper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ed. R. Dingwall and P. Lewis (London: Macmillan, 1983); Bernard Silberman, “State Bureaucratization”; and Deborah A. Stone, *The Limits to Professional Power: National Health Car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第一篇

## 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

编者

现代民族国家所承担的功能真可谓多种多样,既发动战争又提供福利保障,还或有意或无意地重新塑造着其所在社会环境的诸多方面。然而,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令现代社会科学家最为着迷的国家行为还是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一次又一次地,社会学家总在质疑,国家是怎样地在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上影响市场和阶级关系的,其影响的结果又如何呢?

然而,对“国家”与“经济”的相关关系的探讨,时常会绕开对历史的和跨国的差异进行解释这一艰难的任务。这种局面是通过下面一种或两种路径形成的。首先,大量关于现代国家的研究都是规范性的,探讨的是国家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总之,就是在“自由市场中”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应该或不应该“对”“自由市场”做什么的问题。后来,当分析性的而非规范性的研究出现之后,学者们又反复沉迷于非常抽象的理论模型,从“市场”或“资本积累”所需的必要功能条件中提炼出关于国家干预的超历史的逻辑或约束条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从事分析性的而非主要是规范性的

研究,在他们之中,又有部分学者在历史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对不同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后果保持着高度敏感。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对欧洲和北美原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贡献。《找回国家》在本篇中选取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概念性的洞察,其灵感则来自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小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以及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这些巨匠们的工作;但这些文章所关注的则是比欧洲工业化更具当代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它们反思了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对发达的工业民主国施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之动因的研究兴趣的不断升温。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和彼得·埃文斯的文章以及艾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在通常所谓20世纪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干预行为。在《国家与经济转型》一文中,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提出了有关为进一步深化经济转型所需的有利于或不利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条件有许多假设和前瞻性的问题。为了将注意力从国家行为损害市场功能这一问题丛生的议题,即国家研究中主流的规范性分析和抽象的理论研究所经常关注的议题——上转移出来,鲁施迈耶和埃文斯集中探讨了国家的官僚体系以及国家和主导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等具体层面。总之,这样的模式能够帮助解释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在追求资本积累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分配方面的效果上的差异。

鲁施迈耶和埃文斯使我们对那些可能同时或先后既增强又削弱国家能力之相交与相矛盾的倾向变得敏感起来。比如,国家通常同时需要政策协调上的集权和在收集信息及在各种异类环境中实现政策目标等方面的分权。而拥有这种矛盾需求的国家的行为效力,则取决于对平衡两种对立趋势这一永恒而又难以驾驭的难题的“解决之

道”，而这种解决方式又随着时间和国别的不断变化而极不稳定。鲁施迈耶和埃文斯反复地指出这样的两难困境，还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解决方法，在其中，国家结构和国家与主导阶级的关系可能会约束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选择。两位学者举例论证了他们的思想要点，其中既有坦桑尼亚政府增加农业生产率的失败教训，也有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国有经济企业或多或少的成功表现。

在《国家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文中，艾丽丝·阿姆斯登也采用宏大的比较视角来分析整个第三世界进行有效经济干预的条件，但她的文章主要深入探讨了在近年经济发展中表现异常优秀的一个特殊案例。她在文章中问道，台湾当局在结构、历史、社会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方面的哪些特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台湾“经济奇迹”，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在一个由罕见的征服取向的军国主义分子主宰的政体支持下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个致力于经济上自给自足和积极储备武器、兵力及外交支援，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的国民党的政权，是如何最终走向利用政权干预来鼓励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

正如阿姆斯登在文中所揭示的，台湾当局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采取一些非常有效的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相比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一个外来征服者政权通常相对于先前存在的主导性农业利益集团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然而，她在文中指出，其他一些由政权支持的、意欲促进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或者是碰巧推出的，或者是直到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改善的岛内经济状况促使国民党政权“放弃”部分（并非全部）军国主义目标和组织特征之后才设计出来。

认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的想法往往都是想当然的判断，就连许多专业的经济学家也会落此窠臼。而从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全盛时期到现



在,当今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过的许多政府干预也一直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和不适当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盎格鲁—美国人地区和在盎格鲁—美国人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地区,这种论调尤其普遍。尽管我们至今仍在同一个世纪<sup>①</sup>,当“凯恩斯时代”在发达工业国家似乎行将终结或者至少即将走到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时,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训导可能再次大行其道。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时代”已经成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代,国家对经济发展和相关的社会分配所采取的行动主义(activism)既为人们所期待,也为人们所称赞。尽管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干预行为非常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在意欲推动经济发展时所采用的许多其他种类的干预,如国有企业或强制性的农村土地改革等,但上述说法仍然是有根据的。

凯恩斯经济学与先于其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范式一样,将私人企业与市场动力视作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尽管如此,公共政策决策和理论经济学领域所说的“凯恩斯革命”,则以该理论所提出的由公共权力部门经深思熟虑在财政和货币方面施行干预这一明确的原理而著称。民族国家的官员——当然是在政府内外的经济专家的建议之下——在理论上已经有权在稳定就业这一必要的政治考虑与政府为确保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需的适当因素而承担的新的职责之间进行协调。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已然很得意于利用或开发其能力,在满足充分就业的前提下追求国民经济的增长这一目标之下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予以监督,以及为调节公共开支、税收水平和货币管制而设计战略。

玛格丽特·韦尔(Margaret Weir)和西达·斯考克波的文章考察

---

<sup>①</sup> 指本书出版时的20世纪。——译注

了资本主义工业民主国家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干预的起源,还在跨国层面细致地分析了这种战略被采用的时机和所采取的形式两大变量。为什么在大危机时期,是瑞典而不是作为第一个工业民主国的英国有意地采用了以赤字财政为支撑的公共工程作为同时实现再就业和国民经济恢复两大目标的措施?为什么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改革整体方面大致相似,但瑞典接受的是“社会凯恩斯主义”,即将积极的宏观经济管理与为社会福利目的而实施的高水平的公共开支相结合;而美国则最终采纳的是“商业凯恩斯主义”,非但不重视公共开支,反而赞成削减税收和利用“自动稳定器”?为回答这些问题,韦尔和斯考克波考察了国家结构和公共“政策遗产”(即前期政府所采用的干预形式),她们认为,这两个因素既影响了政府官员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反应,还影响了社会集团和政党对这类反应的需求。

本篇中的三篇文章都应用了本书第一章阐述过的部分分析战略(同时也扩展到了更为复杂的系列议题)。他们不是简单地对那些事先给定的在某种短期意涵上可能或不可能“成功”的政策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各种各样的甚至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措施,在其中,特定结构的国家可能既有意又无意地对长期经济转型——或者对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政策变迁,如凯恩斯主义的引入或是工业化从“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做出了贡献。

鲁施迈耶和埃文斯以及阿姆斯特登都非常强调重视研究具体社会背景下的国家对相对较长时段的经济转型的贡献。前两位作者强调,虽然国家对经济过程强势且有效的干预可能最初是源自凝聚力强、相对独立于主导社会阶级的官僚集团,但这种干预很有可能恰好会削弱国家的自主性和进行进一步干预的能力,因为受到政策影响的集团会动员起来,对政府当局施以压力或者对相当部分的政府机构进行渗透。要想证伪这一判断,就必须透过各种类型的国家结构对有关特定

种类的国家干预的众多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剖析和比较。与此同时，阿姆斯特登则通过她的关于台湾地区的特殊案例证明了长期历史分析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仅仅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无法发现日本殖民统治对后来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作用，也无法发现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即由大陆人掌权的当局重新调整其组织和政策，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经济增长。

这些文章展示了从宏观制度和时间尺度方面进行调研的价值所在。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指出，从一种可能是更为“普遍性和综合性的视角”来看，国家官僚体系的建构正是国家对经济问题采取行动的能力基础，而不会只是成为私人企业或局部性社会利益的囊中之物。然而，这种“国家建设”不能被理解成仅仅是一种有意进行的组织设计这类短期行为，因为特定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建设或重建发生在国家的整个制度性结构之内，也发生在国家官员与其所在社会中（或跨国层面上）的集团的既有关系的背景之下。事实上，当新的问题出现时，国家通常不太可能去创造新的国家组织，它一般首先会极力地去适应现有的组织。反过来，这种情况往往已然对国家的适应范围构成了限制，而原因或者是他们的内部组织结构不当，再或是他们与阶级或政治关系的相互嵌入，妨碍了他们接受或是执行新的政策目标。

后来，在回答国家对某种突然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做出反应的适应能力问题时，韦尔和斯考克波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了各国的差异。她们从整体国家结构和国家、政党与知识专家之间的关系角度，考察了特定的国家组织的布局，用以解释英国政府舍不得放弃失业带来的好处、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的不适应性，以及瑞典采用公共工程管理作为新的经济复兴战略的适应性。阿姆斯特登也探讨了台湾（地区）在政权能力方面的适应性问题。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结构一部分植根于岛屿的历史，一部分植根于该党在中国大陆的过去。阿

姆斯登指出,1949年之后,继承自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控制时期的鼓励农业增长的强政权能力使国民党颇为受益;但同时,一旦从中国大陆新移植到台湾岛,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并不能也不愿意尽快发展工业化,这是因为懂经济的技术专家都被调离了公共政策的重要职位。

读者将会看到,在为应对新挑战的一系列目的而建构的国家组织的适应能力这一令人着迷的问题上,在大量的其他同等重要的议题上,本篇中的历史性文章对国家的经济干预从不同方面所做的跨国比较和国际比较,充实了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所提出的关于分析的问题。第一篇概念性的文章和随后的历史探索在洞察力上此呼彼应,就这样,这些文章的兴趣点也大为扩充。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互为补充的;但它们并没有提供能够自动扩展到在外国和其他时代进行国家干预的这种别有不同的方面。话虽如此,在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原因和结果问题上,这些研究还是提出了丰富的建设性假设,这些假设或许可以用于对20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进行探索,或者可以用于考察已被本篇中的作者深入调查过的国家之外的众多国家。



## 二 国家与经济转型

### ——一种支撑有效干预的条件分析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彼得·埃文斯

44 有效国家干预目前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成功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波兰尼和格申克龙<sup>[1]</sup>的经典解释戳破了最初将工业革命视作一个纯私人过程的神话，将国家带到了欧洲的工业化问题的分析前沿。在第三世界，一直以来人们对私人企业主阶级担负工业化重任的能力都更为怀疑，就连传统的经济分析也已承认国家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工业化初期还是末期，国家政策都被认为能够影响资本积累的形式和速度，从而发挥着重要作用，足以决定通常都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负面的分配效应是有所减轻还是更为恶化。

关于为何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大背景下进行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理论界存在大量的争论，在此有必要扼要地重提一下。由于经济转型包含了市场交换的制度化或进一步涉及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化，即使是最狭义的新古典模型也留有国家的一席之地。正如涂尔干(Durkheim)在其反对功利主义的辩论中强有力地论证过的，市场需要足够多的规范性基础才能运转自如。如果不能让这些规范性基础得到制度化的有效保证，“交易成本”就会高到足以使市场根本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sup>[2]</sup>这一观点中所强调的国家角色是受到严格限制

的,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交换方式正与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争夺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另一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同样重要的观点可以围绕阶级结构来进行论证。假设某一主导阶级在生产工具的转型过程中不存在结构性的利益,这一阶级与国家机器掌控者之间的分裂就很有可能会成为启动(资本)积累进程这一斗争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国际大背景之下运行,其政治—军事上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经济生产力水平上获得比较优势,国家管理者几乎是被迫卷入与这类主导阶级的冲突之中。斯考克波关于农业官僚问题的历史讨论,为国家机器与主导阶级之间的这类冲突提供了很有启发意义的范例。<sup>[3]</sup>

然而,对国家干预之必要性的论证不仅仅局限于市场交换机制的强行引入或推翻前资本主义时代精英阶层的过程。即使在理想化的市场模型中还存在“公地牧羊”(sheep on the common)的问题。<sup>[4]</sup>如果缺少某些制度化机制来保证市场理性的原子化程度较低,集体利益就得不到充分保障,负外部性也无法控制,而(资本)积累的速度也相应地会受到影响。只要市场还未完全成为竞争的理想形态,国家就仍是一个相对受限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市场结构偏离了理想形态的标准时,将积累的责任完全托付给仅由市场约束的私人决策者,将会导致困难急剧增多。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基础产业很可能高度垄断,金融或公司组织很可能占据了大量的不同的产品市场,依靠“市场信号”促进资本积累的学理辩护就会销声匿迹。在第三世界国家,更狭小的市场和技术的进口依赖,将会使寡头垄断现象变得更为普遍<sup>[5]</sup>,即使是最为谨慎的利润最大化者所做出的决定,可能也不会符合工业化的某种最佳战略。<sup>[6]</sup>

一旦放开竞争性市场的假设,就不再可能同时依赖市场来激励和约束企业家的行为。如果主要的经济主体都是惬意的寡头垄断者,就像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部门那样,国家就可能不得不强行闯入以引入企业家精神。<sup>[7]</sup> 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更为复杂。主导阶级很可能包括一批彼此密切勾连的寡头垄断企业家(其中部分成员的主要兴趣在跨国层面而非地方),以及一批同样互相关联的农业精英(其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祖辈相传的,其行为偏好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此外,认为第三世界的工业精英主要是风险偏好型利润最大化者而不是寻求垄断的安全最大化者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在这种环境下,对其他的积累中介的需求是无可否认的。

简言之,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倾向或基于生产工具私有制的资本积累固有的不合理性的假设,仍有理论上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只要资本主义经济是要维持资本积累和达到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国家干预就是必需的。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而言,我们都必须非常直接地肯定,集体倾向的行政理性是个人理性在市场中集合的基础和对应表现,并且必须将此视为资本积累的“正常”特征。

如果不考虑积累而思考分配问题,对“市场外”中介的需求就越发明显了。给定一个在经验上无可回避的前提假设——市场交换是在预先存在的不平等条件下建立的,那么就没什么理由期望不平等状态会逐渐减少,在“不完全”市场下更是如此。的确,有很多经验上的或理论上的理由,使我们能够预期到如果缺少某种能够引导并平衡市场力量的配置标准或机制,情况会日益恶化。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不断无产化和赤贫化的预言,不受拘束的市場所导致的分配结果就更是消极。给定现实的市场结构和这种结构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就算是那些极力争辩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出现的市场竞争

将产生平等的分配结果的人们,也难以释怀于国家出于分配目标而进行干预的现实。

还可以列出很多关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的证据来,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只要辩论完全集中于国家行为相对于市场功能的问题上,就会致使大量十分有趣且事实上颇具批判性的关乎国家自身的议题乏人问津。辩论国家干预之必要性是一回事;确定国家何以能进行有效干预的条件则是另外一回事。

从流行的假定——即“看不见的手”及其看得见的私人对应物<sup>①</sup>在充当积累或分配的媒介方面满是缺陷——出发,必然要求引进其他的中介,但我们将尽力避免陷入功能主义者铺设的陷阱——即国家是“必须的”,因此国家就自然拥有完成其必须之角色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我们将集中考虑推动实施有效干预的国家结构的性质以及可能促进这种干预的社会结构条件等诸如此类问题。<sup>[8]</sup>已经有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谈到了这些话题,但目前仍只是一大堆文献,急需进行整理与合成。本文的目的就是为这样一幢合成大厦的地基添加几块砖瓦。

## 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所采用的关于国家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韦伯式的定义:我们认为,国家就是一系列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具有能够做出对人民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权威,并在法律上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疆域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暴力来推行其决定。我们并没有选择那种将国家仅仅视为一个官僚体系的定义方式。相反,正因为我们认为国家可以同时表达多个互相矛盾的意向,我们所接受的定义并没有预先设

<sup>①</sup> 指私人公司,读者可参见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译注



定在某一既定的历史背景下解决那些紧张关系的方式。

但国家必然是一种统治工具。国家及其各个部门与最有权势的阶级或阶级派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决定整个“统治契约”的特性。与此同时,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暗示着它的第二种角色,即集体行动者(corporate actor)。正如卡多佐(Cardoso)所观察到的,不能把国家“仅仅当作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看不到这样一种代言需要一个组织机构出面,既然这种组织机构必然是一种由人组成的社会网络,那它必以其自身名义而存在,并拥有自己的利益”。<sup>[9]</sup>一致性的国家行为将是国家精英们的考虑,其目的是为动员外部支持,而这种考虑也可能会使国家精英们甚至在没有主导性利益的情况下,也要在冲突之中保持中立。

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国家以集体行动者的身份存在是很有问题的。尽管国家管理者显然愿意团结行动,但他们也可能因为各种实质性目标而四分五裂。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团结行动的能力会因为国家同时也是社会冲突的舞台这一事实而大为受限。除非社会主体是铁板一块,否则,无论如何,国家机器在一个社会的现实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沦为社会冲突的竞技场。各种集团,无论是高居主导地位还是从属于下,都会想方设法将国家用作实现其特定利益的工具。往极端上说,为应对各种外部势力可能会使国家组织“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前述各集团群体的行为就会导致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国家的碎片化和瘫痪。

抵抗强加于国家的各种压力——压力源于国家是社会冲突的竞技场——是国家的第四种且非常现实的角色:这就是国家必须要宣称维护自己所管辖的社会之普遍利益。尽管这样一种声明为维持国家的统一与团结行动的能力提供了方便之门,但由于它假定国家行为的目标不是来自国家机器内部,而是受公民社会普遍利益之指引,因此,

它仍然与国家作为独立集体行动者的角色相互矛盾。但更根本的是，国家代表普遍利益的声明与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角色也相互冲突。

尽管如此，这种声明也并不能因此就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强调而轻易忽视。正如奥唐奈(O'Donnell)所说，“一方面，国家是社会统治的担保人与组织者是一项基本事实，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某种普遍利益（尽管这一利益实际上既特殊又有限）的代表也并非虚妄，而这两种事实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则是一切国家的特点。”<sup>[10]</sup>这种紧张关系对于能够超越个人能力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说是必需的，对于处在国家追求普遍利益这一使命核心的个人利益也必不可少。捍卫主权、保卫国防、维护基本国家制度，从而保护国内安宁并便利个人和群体行为，便是任何正常国家所要承担的任务。这些核心议题为关于“共同利益”的更为精细的概念阐释提供了分析起点。如果有人非要争论说，这种概念深化实际更偏袒局部利益，那么这些人也应该认识到，支撑前述核心任务的国家行为很有可能也具有偏袒性。举例来说，霍维茨(Horwitz)就证明了19世纪美国法律的司法转型不仅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还将资本家的经济负担系统性地转移给了农民、工人和消费者。<sup>[11]</sup>但无论如何，追求“普遍利益”已然成了一项几乎具有普世意义的国家角色，正是它吸引着从国家管理者到外部集团等各种不同力量为之努力。

让我们重申前文要点：尽管我们对国家的定义采用了权威和执行这类形式化术语，通过大量历史事实（方法各有不同），我们也发现，国家倾向于或是作为统治契约的一种表述，或是以集体单元身份采取一致性行动，或是演变成社会冲突的舞台，或是将自身标榜为普遍利益的卫士。很显然，这些倾向彼此之间存在摩擦，并不能立刻成为唯一主宰。本文对有效干预的研究，自然地主要关注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将高度重视国家的这种角色有何不足。关

键的要点在于,国家的效能总是要依赖这样一种模式,即无论是在内部结构还是在国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上,上述那些相矛盾的倾向都是混合在一起的。

本文对支撑有效干预之条件的分析主体将分为两大部分:其一分析国家机器自身在组成结构上的差异;其二关注国家与主导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每一部分,我们都将遵循某个一般性命题来展开讨论,这些命题显见于相关文献之中,从常识来看也貌似可信,但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论证这些命题,而在于追踪这些命题所引申出的更有意思的推论。

在考察国家的内部结构方面,我们延续了韦伯的脉络,遵循那经典的命题,即有效的国家必须拥有完善的官僚机器。但我们在论证初下手处先略为放宽一下韦伯的严格限定。有凝聚力的官僚体系的建构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一个工具性目标,不能认为创造出一系列带有相应激励结构的正式的组织间联系就万事大吉了。相反,一套完善的官僚机器的建立,有赖于一个更细致而长期的制度建设过程,正是由于这种过程的要求,那种认为某个国家只要需要官僚体系时就自然会拥有这种体系的想法就变得不那么可信了。同时,我们还要指出,随着国家更深地卷入到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国家机器各部门间的非官僚主义关系模式将变得愈发重要起来。由于直接参与市场能够说明国家试图干预的范围,本文就通过讨论国有企业来分析构造国家组织的非官僚模式当中的矛盾关系。

在本文的第二大部分,我们的论证主要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国家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于”主导阶级的“自主性”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转型。尽管对于何谓“相对自主性”,各种学说差异甚大,而且主要取决于其理论背景。同样一种理念(可能有所放宽),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多元主义以及最近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方法中都能



找到某种形式的映射。<sup>[12]</sup>的确,支持这一命题的许多论据与赞成国家干预之必要性的一般性理由颇为相似。我们认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之重要性如同国家需要一套官僚机构一样无须赘言,本文只着重论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是必需的,它不仅帮助形成集体目标,而且更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本文的大部分篇幅将重点讨论极有可能提升国家自主性的社会结构条件。与此同时,本文还将试图对自主性与效能之间的假设性关系提出几点重要限定条件。

本文分析的两大部分将在结论处会合,结论部分将关注国家实现其集体行动者之角色的能动范围,及其可视为独立于主导阶级的程度,与国家作为经济转型执行者之效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在文末部分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那种认为这三个特征之间是简单的相互强化的关系的观点进行批判。那种观点倾向认为,官僚机器的发展能增强国家的自主性,自主性能促进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运作的的能力,而这两者都提高了国家进行有效干预的可能性,反过来这两者也会被国家干预的扩张所强化。其结果就是国家的形象变为一个永远不断自我膨胀的神。而我们则提出关于这些特征之间更具双重性的相互关系:国家在构筑其集体行动者身份上的极度成功,可能会削弱其维持自主性的能力,而有效的干预可能会扩大国家变成一个社会冲突竞技场的范围。

对“经济转型”的整个讨论过程将主要围绕资本积累来进行。但在许多不同方面,我们还尽力考察国家在分配目标上进行干预的特殊逻辑。当然,促进积累与改善分配两种努力本身之间的差异在关乎自主性的结果时,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讨论官僚和非官僚国家结构的建构时同样也不能忽视这一点。

尽管我们的论证具有一般性,但在几个重要方面,其应用范围还是受到局限的。我们的大部分讨论围绕利益及其可能得以实现的方



式而进行,却忽略了与政治目标的意识形态建构方面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讨论政党对国家结构以及在协调国家与其他社会主体之关系方面的组织性影响。我们的大部分案例来自所谓的“半边缘国家”,即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较大和较富裕的欠发达国家,仅偶尔地谈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国家或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但我们集中关注“半边缘国家”并非出于偶然。这些国家是关于经济转型的最令人着迷的当代典型代表,当然对现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过程的进一步考察,很可能会修正我们目前的结论。

最后一点,我们将自己的讨论严格限定在国内层面。由于放弃了考虑国际环境因素,我们也失去了考察可能是最能够体现国家作为普遍利益代言人的这一范畴的机会。未考虑国际精英势力也失去了探讨相对自主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尤其是对“半边缘国家”来说。尽管有诸多不足,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论证已足够复杂,对国际层面进行单独讨论或许更为合适。<sup>[13]</sup>

就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但颇具局限性的尝试所产生的,就是一些启发性的思想,这些思想来自现有的讨论国家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如何阻碍或扩大了国家的干预能力的诸多文献。

### 国家结构与干预能力

国家机器的何种特征会使国家干预变得更为有效?经典的答案出自马克斯·韦伯:官僚组织是组织大规模行政活动的最有效的形式。遍布广泛的、内部团结的官僚机器的存在,就是有效国家行动的第一要件。韦伯提出的理想形态确立了大量的关键性问题:组织的凝聚力,(官僚组织)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和隔缘性能,明确的决策权与权

威路径,培育工具理性与行动主义的内部特征(尤其是,合适的雇用与晋升惯例以及能够使人员更替和必要的机构与职能重组遭遇的障碍最小化的组织设计)。

一套有效的官僚机器是解开国家干涉能力之谜的钥匙。然而,对致力于经济转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套机器的运转必须与市场的运作相衔接。在某种意义上,对国家结构的分析必然涉及对市场结构的分析。接下来的讨论将从与国家官僚体系之运作本质相关的几个问题着手:颇具争议的官僚体系制度基础的本性,符合特定任务与国家精英之独到见解的组织胜任能力,以及凝聚力与分权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会直接导向对国家组织与市场之互动关系的考察,我们将主要通过观察国有企业之行为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我们的研究还是要从讨论韦伯的观点开始:在多大程度上,国家的第一目标必然是建构一个完善的官僚体系?

### 建构官僚机器

要理解一个不发达的官僚体系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国家的干预能力,就有必要认识到建构这类机器这一任务的长期性。除了维持一个大型官僚体系所需的物质资源以及该体系运转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的积累之外,要建构一套官僚式国家机器,还需有一样不易察觉但同样重要的因素。任何制度建设都要求超越个人的工具理性行为。正如涂尔干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市场交换体系之基础是“契约的非契约因素”(noncontractual elements of contract),官僚组织中也有其类似的对应物。一个有效的制度建设过程,必须重新塑造核心参与者的目标、优先事项和责任感,灌输共享的假设和共同期望,从而在此基础上培育出共同的理性。<sup>[14]</sup>核心公职人员中特殊的集体主义精神(esprit de corps)的增强,是上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反过来通常伴随着

(较高级别)官员作为“特权集团”的出现,这种“特权集团”有着特殊的社会声望以及有特权的协会,还具有排他性。这样的制度建构既使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也很可能需要数十年功夫才能完成。

认真思考建构一套完善的官僚机器的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和集体形成的问题,就很容易得出我们的第一个推论。在一个没有发达的官僚机器的国家里,任何特定的行政机构的建构都必须被视为一个长期的制度问题,而绝非一个短期的组织问题。即使国家精英正确地判断出了国家所需的干预种类,有这种政治意愿,并且调度了采取行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他们可能仍无法实现目标,仅仅因为所需要的官僚机器无法及时地创造出来。关于第三世界的研究文献中充满了这样的案例,同一问题在20世纪的美国也依然醒目。<sup>[15]</sup>

上述观察的反面同样重要。一种接近于官僚制形式的国家机器或许在历史的偶然发展中已经被创造出来,然而,为获得有效的经济干预能力而进行的制度建设或许要经历相当程度的迟滞之后才能开花结果。因此,举例来说,有学者可能就会认为,正是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和台湾进行的殖民统治建设,后来就成为这两地建设有效国家(地区)组织的资源,帮助这些地区顺利地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前面论证中隐藏的假设——官僚制组织是任何国家行为的替代性工具——意味着重要的问题本身就值得认真探讨。官僚组织能够成为与自身创立之目标行为完全不同的政府行动的关键性制度资源,这的确不假。但官僚组织是为较好地完成某些事情而创立的,作为组织,它们不能随意转换或扩张到其他行为领域中去。组织结构往往会有配套的特定类型的政策工具,从而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混合体系。比如,一个有效的军事机构就没有必要具备高效征税或运营公共企业的能 力。(或许这意味着军事制度与“自由企业”经济政策之间特殊的相似性,两者都不需要特定的国家干预,因为干预难以产生

效率。)当然,这种现象不单单只限于军事领域,对于教育系统甚至对产业开发政策来说,公共企业中的有效行政管理,都绝不是其成功的保障。

而且,前面阐述的这种过程,不仅将一系列的不同类型的官员和职位熔铸成一个有着共同的思想信仰和假设的、富有凝聚力的组织,而且也在国家管理者中间稳定了特定的政策倾向。专业技能与特定的人员和组织形式之间错综复杂的融合过程对这种政策倾向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列宁和韦伯这两位风格差异巨大的观察家都看到了这一现象在全国层面上的重要性。<sup>[16]</sup>这一过程对于特定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也同样重要。尽管在设计上,官僚机构只负责执行政策,而事实上,它们还能塑造政策。构筑制度基础和官僚机构的执行能力的过程,同时也是限定政策选择范围的过程,对于后一过程,国家机器是欣然从事,也是十分有效的工具。

与国家精英的基本倾向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涉及有效国家行动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与知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组织发达的官僚机器就自然具备在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与模式的相互关系中进行有效干预的充分知识。在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方面,还不存在相关而论证充分的专业理论。同样重要的是,有关特殊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以及过往干预之效果的数据必须收集却难以获得。尤其在政策形成与实施中无法将市场信号作为合适的基础时,信息收集本身就需要极强的组织能力。<sup>[17]</sup>

如果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精英们具有出众的知识和洞察力,那么,借由其结构地位,他们有机会发展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来吗?他们是否会形成特殊的观点、视角和问题表达方式,从而使他们有别于其他的精英?我们比较认同这种想法。

传统观点认为,国家管理者之所以具有不同于主导阶级私人成员



的视角,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对短期利益的考虑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共同的技术训练也许还能生成独特的见解。在意识形态层面,国家喜欢自视为普遍利益的维护者的倾向,很有可能会使国家管理者在意识形态理念的形​​成上产生一种特殊的相似性——都用普适性术语来表述,这种相似性反过来还会促使他们形成更为具体的偏好。尽管某些官僚精英分子可能更加地偏向短期利益的考虑(如国有企业的经理),或是受制于官吏增选方式(cooption)从而无法发展出不同于其原有成员的观念来;因此,国家管理者发展出独特观念的潜力仍然是国家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结构可以提供的政策有别于或者偶尔优于私人精英们所支持的选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种独特的观念对于国家实现(即使是部分地)其集体行动者之角色的能力至关重要。

### 组织能力与分配政策

要检验进行干预所必需的高效官僚组织和议题胜任能力与经验知识,最合适的切入点也许是国家对收入再分配所做的努力。在直接干预中,以收入再分配为目标的机构必然从定义上就涉及主导和从属集团之相互关系。与大多数执行积累政策的机构完全不同,它们显然不能依赖于市场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处理和协调机制,而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寻求平等的结果。它们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以按市场标准衡量表现良好为由来使其行为合法化;它们的干预行为常常是与融于习惯和其他国家机构所追求的政策中的既定社会规范相冲突。总之,收入再分配政策必然是典型地与市场和社会规范之原则大相径庭。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巴西国家土地开发与改革局(INCRA),一个负责促进亚马逊地区殖民化的巴西机构。巴西当局把少数几项分配政策中的一项——为东北部迁来亚马逊地区的农民提供新的土

地——交由该机构,事实证明该机构缺少有效实施该政策的能力。<sup>[18]</sup>它既不能设法促进殖民地居民的生产能够获得有效回报,也不能破除那些阻碍殖民地居民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法律程序上的障碍。最终,其行为给予测量公司和大地主的好处等比于甚至多于无地的东北部移民们。

诸如巴西国家土地开发与改革局这样的再分配机构存在的问题,并非其不够独立于主导阶级这么简单,这同时还是从事逆市场逻辑和基本的社会制度(如法律体系)的行为所需要的官僚机构能力的问题。直接重组分配模式要求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全面侵入。就算是可以认定国家具有自主性,这样的侵入仍然极难付诸行动。

坦桑尼亚在其经济重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合适的案例。那些持左派观点<sup>[19]</sup>、注意到私人资本之弱点的人,这样批评坦桑尼亚政权:必须把集体农庄计划在改善农民生活上的有限效果看作是一个指标,它指示着国家机器中的官员按自私自利的模式行事——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程度大小。尽管这样的批评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它忽略了施行这样的社会变革计划所必需的强大的信息和官僚能力。<sup>[20]</sup>某一既定的经济变革政策越是想独立于市场过程而运作,就越是需要对信息的有效处理和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对个人行为的成功塑造。简言之,具有深刻渗透性的国家干预行为,如那些直接面向再分配的政策以及所要遭遇的障碍,可能既来自于主导阶级的反对,也来自于对官僚和政治能力的更高要求。

任何稳定的国家都必须从私人行动主体中攫取足够的资源用于自身运作。这也涉及国家对公民社会深刻的、具有入侵性质的干预,尤其是当国家主要通过收入税来创造财政时。的确,在这方面,我们很可能最后发现的是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组织能力。但随着依国家

行为的扩张而扩张的财税征收,最终膨胀到在国内总收入中占了重要比重时,无论其有意与否,国家都已然陷入了收入的社会分配过程。致力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即使是在等差税率之外再施行收入转移——此时会建立于现有的组织能力之上,而不会遇到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为对收入生成过程进行直接干预而需建立有效的机构这样的问题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然采纳这类政策或者是采纳后能够有效执行。尽管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进行有效干预所遭遇的尤为重大的障碍是缺乏组织能力,但主导利益的影响、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国家自主性的问题,同样都是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其重要程度比它们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还要高。

### 集权与分权

在本文开篇关于诸多论述国家的理论视角的评论当中,我们指出了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与国家作为社会冲突之场所之间的内在矛盾性。有效的国家行为要求国家各个组织内部及彼此之间至少存在最低程度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这反过来也预设了国家独立于公民社会中诸种力量的最低程度。这不仅仅是或者并非主要是一个抗拒双重职业——即在职官员能够视公职为私人事务,即能够任意玩弄“裙带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不是使单个官员脱身于外部社会经济纽带之牵缚的问题。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国家机器各组成部分对国家行为的内部指导与协调,而不是外部利益与要求的反应敏感度问题。

由于许多类型的国家行为都要求分权以获得最大效率,上述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在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下,信息和命令沿层级传递时出现的信息丢失和命令失真,进一步放大了前面讨论过的制定并执

行例行政策所需的知识基础不足的问题。<sup>[21]</sup>相对于某个集中式命令链条的从属关系剥夺了下层机构争取主动和利用自身可以获取的有关特定环境信息的机会。为了效率最大化,决策过程必须(就像组织理论的规范性结论所说的那样)能够最好地获得各种相关情况的情报信息。

下层子机构的“脱钩”<sup>①</sup>之所以很关键,不仅是为了有效的信息利用和合乎情境的决策,还是因为这些子机构的领导者们所必须扮演的政治角色。韦伯本人就坚持认为中央官僚体系顶层的领导阶层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sup>[22]</sup>下级国家机构同时还必须能与受到威胁的利益群体进行谈判并能争取潜在选民的支持。国家希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渗透得越多,下层执行机构的领导人就越是无法只充当一个官僚命令链条中的从属部分。为了确保有效决策,同时也出于更为有效的政治关系的考量,国家必须对其活动进行分权,使其子机构运作中的某些方面摆脱中央官僚体制的控制。

然而,由于给予子机构上述自主性,国家也由此出现了集体凝聚力和协调性的严重问题,当公民社会中强大而充满分歧的各色力量都竭力要俘获国家机器的某些部门,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更是如此。此时国家便陷入瓦解其自身独特功用的危险当中,而其功用正是有赖于国家在一种更为普遍性和包容性的观念的基础上运作,而不为市场中的私人主体所驱使的能力。如果分权破坏了国家以反映普遍目标和要求的方式采取一贯性行动的能力,国家之功用的独特性质也就丧失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否存在某种补偿性整合机制使得人们有可能将一致性和有效协调与一种分权制度(并非只是机构在地理上的分散)结合起来。

---

① “decoupling”一个经济学术语,指两个经济体或两种经济范畴的发展失去关联度;此处指下层机构相对于上层机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上层机构不完全同一步调。——译注



这里只要提几点有关这种机制的特征就足够了。我们只需提醒大家,高级官员群体中独有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够将官员们的相对自主性与某种共同的目标认同结合起来,从而能发挥一种非固定形式的协调功能,而官员们对集体身份的认同会强化这一作用。这种独有的认同感,尤其当它与公务员作为一种特权群体的出现相结合时,会进一步发挥对外部影响的屏蔽作用。然而,当这一特权群体及相关的社会联盟和排斥模式凌驾于国家管理者之上时,他们反而会与特定的外部精英相勾连,并变得极容易受外部影响。

实行中央计划并对分权机构的财政资源进行中央控制或许能实现协调,但资源的中央控制通常难与决策需要授权的现实需求相平衡。另一种整合机制就是创造一种双重官僚制结构,即设立一套与执行性的主体组织地位平行、但对中央意图更为负责的职位,这一部分职位负责给中央提供信息,同时通过制裁手段和职业道德鞭策,来负责控制和引导官僚体系的主体部分。这种双线控制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意识形态坚定的党派、有特定团队精神的军事机构,或者还有基于复杂分肥关系的党派;卡岑斯坦关于战后的奥地利党派控制国家机器的分析就可以沿着这种思路进行解释。<sup>[23]</sup>这种双重组织形式能够极大地促进协调,但它们自身也能变成紧张的源头,还能引发它们自身的协调性问题。

当国家机器试图干预市场过程时,分权的问题就到了关键点。国家的行为可能会遏制市场机制的运转、取代行政指导和协调。国家可能通过征税和补贴将经济资源从一个收入群体转移给另一个收入群体。最终,国家还可能亲自参与到资本形成过程当中,其形式有为学校、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还有一种日渐重要的形式是经营公共企业来获取利润。我们将就这最后一种国家行为来做更为详细的讨论。这最后一种形式并非代表国家干预经济的最具侵扰性

的形式,但它对于探索国家行为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有启发意义,而且它还能更好地强调分权与国家行为的一致性的问题。

## 国有企业

借助公共企业,国家成为了生产和市场交换的积极参与者,还部分地取代了市场在融合知识、激励经济力量方面的作用。即使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非常接近私人企业,它们仍然代表了明显的国家干预:国家通过它们排挤了私人的资本积累并亲自成为资本积累的代理人。传统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克服了外部性问题对私人投资的阻碍因而具有合理性。更多的近期分析则认为,当风险和诱因在私人企业采取行动之前就达成平衡时,国家更重要的责任是提供企业家精神。<sup>[24]</sup>此外,在一个垄断的市场中,国家还可以参与挑衅式的竞争,以诱导出企业家行为,使那些供给垄断者不会过得那么舒服。<sup>[25]</sup>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国有企业的创建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核心部分。的确,对于这类国家而言,一系列具有战略地位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很可能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的前提条件。“战略地位”一词在此非常重要:市场结构与国家主动性相结合的方式是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

从经验来看,国有企业常常建立在这样的部门,即巨额的资本要求和较长的回报周期,使得只有极少数强势主体才能分享该市场。<sup>[26]</sup>国家插手这样的市场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市场会影响到大型官僚化组织的运作,而且因为我们不能指望竞争的纪律和激励会促使私人资本方做出最佳的行为选择。如果这些部门具有重要的前向或后向联系(forward or backward linkage),国家参与的效果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最后,有证据证明部门内部技术“纪律”的存在会加大这样一种可能性——既使得国有企业保持对中央官僚机构的独立性,又能为积累过程做出积极贡献。<sup>[27]</sup>

试举几例说明让国有企业显得卓有成效的几种战略位置。电力生产如果不是自然垄断的话也必然是高度集中的,它要求参与该行业的企业具有严格的技术纪律性,并由于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而具有重要的前向联系。国有公司传统上都在这一部门扮演重要角色。<sup>[28]</sup>钢铁业是另一种典型的战略行业,它使国家能够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sup>[29]</sup>炼油和矿产冶炼通常也是垄断型或者至少是高度集中的行业,由于其重要的创税能力而具有重要的相关性,并且能为半边缘国家提供支持资本积累的重要的资源优势。<sup>[30]</sup>石油化工产业常为少数企业所主宰,它与(通常是)国家控制的石油部门密切相关,还有着严格的技术纪律性,它还和各种制造行业有着重要的前向联系。<sup>[31]</sup>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部门当中进行国家干预,绝不意味着必然成功,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石油化工行业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与那些通常以原子化竞争为特征的部门相比,在上述部门中进行干预的成功机会要大很多。

这里再扼要考察一下有关农业的截然不同的战略,就能进一步说明将干预的形式与市场的性质相结合的重要性。农业生产往往很零散,和前面提到的工业部门相比起来,即使是高度集中的农业也显得极其分散。就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直接干预也是问题重重,对实行资本主义的半边缘国家来说,则更是完全不可行。而对销售过程进行干预,尤其是在国际层面上,则可能会有成效。<sup>[32]</sup>通过改变土地所有权结构,国家也有可能进行有效干预。但如果是进行间接的企业式干预,效果很可能会更好。比如,国有企业参与化肥行业,就能为建构农业中的资本积累奠定良好基础。台湾的农业发展战略正是使用的这样一种组合方案<sup>[33]</sup>:通过土地改革的重组,农业仍然保持私有制,但剩余提取和促进积累都是通过化肥产业的国家控制来实现的。

国有企业不仅帮助国家直接参与资本积累过程,还能减少分权可能带来的某些风险。市场,即使是寡占型的,都会给低效率和腐败的概率设定一些限制门槛;市场还会提供一种衡量尺度(价格、生产和利润),使得中央官僚机构能够大体把握住市场表现。尽管如此,侵入市场还会产生某些其他类型的控制问题。很显然,除了积累资本外,国家很难将企业当作一种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工具。此外,在国有企业与私人资本共存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会结合成一种寡占型共同体,并且将本行业内的积累当作首要动力而牺牲更广泛的积累这一目标。<sup>[34]</sup>

营利型的国有企业既有权控制自己的资源而不受中央预算过程的制约,还因为其明显具有效益而拥有一种合法性。此外,如果它们在其部门性的寡占共同体中找到政治同盟,它们就很可能相对于中央集权型官僚体制拥有了更大的“相对自主性”。包含有高度发达的国有企业部门的国家结构是很有可能得到[用阿布拉奇斯(Abranches)的话来说<sup>[35]</sup>]“四分五裂”的下场,也就是说,由半独立运转的不同部分组成,即使存在整合也只出现在最高的政策形成层面上。

当国家注重分配而不是积累时,为有效干预市场而设计的国家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就更加明显。国有企业,就像一般的大型寡头垄断企业那样,会强化正常的市场倾向即分配不平等。它们会偏好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喜欢在收入已经高度集中的地区运营,还会动辄利用自身的市场力量优势来限定价格。因此,很难找到国有企业部门扩张与收入分配改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证据。<sup>[36]</sup>

## 国家结构:启示与结论

本文借用了韦伯的定义来开始我们关于国家结构和干预能力的讨论:有效的国家干预是建立于一套完善的官僚机构的存在基础上



的。我们对国家结构约束有效干预方式的回顾所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也直言不讳,尽管给它赋予了涂尔干的术语,但这一结论仍然是直接承袭韦伯的思想脉络的。为“官僚制运转”建构“非官僚式基础”,也就是为官僚制机构,尤其是其精英们的凝聚力创造出非工具性源泉<sup>①</sup>,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这样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因为有进行强势有效的行政干预的需要,就在变动不居的政治性紧迫情形下,在很短的时间内专门设立起来。而且,这样的发展,对于一个既定的官僚机器所乐意并能够完成的任务和政策来说,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任何意欲解释官僚机构的干预能力或能力之缺失的尝试,都必须认真考虑它的历史特性。

第二个结论与第一个结论密切相关,尽管分析方法截然不同,但对本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同样重要。国家能以实行一致性干预的集体行动者身份出现,这一假设问题太多。这么说并非我们认为“官僚政治”和国家机器内的行动主体在有限理性上的差异会导致分裂倾向,尽管这显然是真实的现实。我们是要指出,内部凝聚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看作是建设出来的——通过长期的制度建设过程才建设出来的,而并非简单地创造出一套与激励结构相配套的正式的组织联系就会自然产生。那些将国家的角色当作一个社会行动者严肃对待的学者们尤其要认真考虑集体凝聚力的问题。此外,什么是对有效国家干预的可能性最重要的单一限制因素,我们还没有分析过。

我们已经尽力理清积极干预自身会使得国家机器的持续的集体行动变得困难重重的原因。深入渗透(社会)的国家行为必然要求超然于大规模行政组织的内部责任的分权制度。那些能够处理因环境而异的诸多问题并会影响到不同的利益格局的干预行为,要求分权机

---

<sup>①</sup> 指不是靠纯粹的外在激励来维持官僚体系的凝聚力,而是如前文所言,让其产生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译注

构具有大范围的政治独立性而不仅仅是在行政上有所区分。这反过来又引发不同利益集团为自身目标竞相俘获并影响这些机构。国家机器由此变成社会冲突的竞技场。于是,作为国家干预的后果之一,公民社会的自相矛盾常常会在国家内部不断地自我复制,<sup>[37]</sup>从而削弱了国家采取一致性集体行动的能力。

深入渗透(社会)的国家行为还需要有效的组织间关系,即能够对分权的需求与保持一种普遍的凝聚力的必要性二者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做出反应。在市场经济中运营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模式的表现之一,尽管它绝不是完全成功的一种。要理解公共企业作为国家干预工具的成功使用,就首先需要对充当这种国家干预行为及其与私人资本之相互关系的背景环境的各种不同市场结构进行分析。其次,还需要分析国有企业是如何适应于其他的国家结构并与之相互动的。同样,这两种调查的重心为:实现一致性集体行动的能力和国家对经济发展做出独有的潜在贡献两方面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与在各种不同的背景环境下采取有效行动、对市场关系做出有效干预,以及对私人资本发挥有效影响等三方面所需的前提条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

## 国家行为与阶级关系

我们以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自主性是有效的国家行为的前提条件来开始下面的分析。假定资本主义精英们天生就具有“公地牧羊”的个人主义偏见,那么,在寻求维持社会经济体系的生存能力并保持普遍的资本回报率的政策过程中必然很可能会牺牲某些资本部门的利益。由于各种局部利益急剧增加的权力,上述这个问题在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必然会格外严重。在个别案例中——卡岑斯坦对瑞士的分析也许就是发人深思的范例<sup>[38]</sup>——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

的政治性高层理事会 (political directorate) 可能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从字面意义上讲, 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行政理事会”有可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凝聚力, 倾向于系统性要求的集体目标, 同时能控制一套高效率的官僚机器。通常, 这些任务将被移交, 从而使得能够声称代表与国际势力相对的集体利益的制度结构有能力在其内部做出有约束力的集体决策, 并且能够加以实施 (必要时通过强制手段也就是国家机器来推行)。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 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既独特又必要: 独特是因为它超越了竞争性市场的逻辑, 必要是由于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下, 为了体系的维持与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求一定的“集体产品”的供给, 而这种产品无法由经济当中的竞争性行为主体予以提供。无论是对于适当的政策目标的设计还是实施, 国家机器都有必要至少具有一定的集体凝聚力。缺乏最低限度的自主性, 国家的贡献就会丧失其独特性, 从而无法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系统性需求提供服务。<sup>[39]</sup>

以免上述论点被人误解, 我们将重新回到有关国家结构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过的几个要点并加以阐述。国家管理者并非黑格尔逻辑中的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他们常常缺乏形成有助于促进积累和体系维护的“正确的”政策所必需的知识。而且, 即使国家管理者们碰巧制定出了的确是“正确的”政策, 如果没有早已建构好的、有着合适的行动能力并随时可供驱遣的官僚机器, 他们也无法实施这一政策。

尽管相对于彼此竞争且一心只顾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而言, 国家管理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确偏好更为全面的考虑, 但他们也有可能只关心短期的政治支持率, 就像韦伯所戏谑的“议会痴呆症”。<sup>[40]</sup> 就其自身在那可被描绘为普遍利益的特色关怀中的既得利益而言, 国家管理者也有可能在与资本积累最大化不相容的情况下继续追求



意识形态的目标。<sup>[41]</sup>

最后,还有一些政策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家精英自身的眼前利益,比如,为了自身而追求国家官僚体系的扩张。在其发展初期,国家很可能完全是寄生性的,而且掠夺成性。对于经济转型而言,这种掠夺型国家若是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其后果可能更多的是负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削弱国家的自主性,尽量使其成为主导性经济精英们的附庸,应该反而会使其成为一个更有效的积累工具。<sup>[42]</sup>只有当国家在其倾向上成为彻底的资本主义者时,国家自主性与积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才可能变得显著起来。

即使偏好和全部意图实现了这样一种结构性整合,仍然无法保证国家干预会完全适合那些历史性变化的系统性问题。从极端上讲,令人萦绕于心的是对自主性国家精英可能酿成“集体性灾难”而不是提供系统性要求的“集体利益”的担忧。然而,我们绝不能过高估计这种激进干预出现的机会。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性都会受到严格的约束。用布洛克(Block)洗练的语言来说,“那些管理国家机器的人——无论其自身持何种政治理念——也要依赖于某些合理层次的经济行为的持续存在”,这既是为了有财力支撑国家之运转,也是为了维持其政治支持,“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经济行为的层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家们的私人投资决策。这就意味着,资本家们以其作为投资者的集体身份,拥有对国家政策的否决权。”<sup>[43]</sup>随着国家活动及其税收需求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大幅度扩张,这种约束就更为有效。战略性市场不断加剧的独占和垄断使得公司的权力进一步膨胀。

非中心国家的自主性甚至更为受限。即使对那些在与私人资本的关系中显得处于最强势地位政府所属国家来说,“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模式。<sup>[44]</sup>不管是为了促进积累,还是为了



生产出国家也有份分享的剩余，国家仍然得倚赖于私人资本，包括外国的和本国的私人资本。在相互依赖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运转的国家，所受的严格限制与社会民主政体所遇到的严重问题极为相似，如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和牙买加的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所遇到的情形。由于政策不被私人资本所认可，就连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政权（PRI）也亲眼目睹了投资流动的戏剧性变化。<sup>[45]</sup> 证据通常表明，即使在最具有自主性的国家，主导阶级特殊的政策利益也会让政府倾耳，因此国家实际上是不可能用政府行为来取代市场的运作的。

因此，我们必须从三个根本性的方面来限定自主性是有效国家干预的前提这一说法。首先，我们不能将此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应用到前资本主义国家。其次，自主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高人一等的知识和能力；由于错误的假设和信息缺乏或者是由于国家机器的能力不足，国家的干预可能会失败，甚至会带来巨大灾难。最后，自主性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即便是最具自主性的现代国家，仆从角色也是其所担当的全部角色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然而，就算在这些限制之下，自主性的增强与国家干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只是看似可信；相应地，有可能增强自主性之可能性的社会结构条件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 产生更大自主性的条件

能够产生更大的自主性的最明显的社会结构条件就是主导阶级内部的分裂。比如，在拉丁美洲农业出口精英称霸的时代，国家的角色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处理国际环境的任务。随着一个包括城市和工业集团的更为复杂的精英结构的出现，国家的干预也伸展到国内经济领域。<sup>[46]</sup> 另外，目前存在的工业精英内部外国资本与地方资本之间的分裂也为国家提供了扩张的空间。

由于私人部门精英内部的分裂是自主性的一个如此重要的前提条件,对主导阶级之构成成分的分析理应受到重视。蔡特林(Zeitlin)及其同事对前阿连德时代的智利所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sup>[47]</sup>他们的研究没有为关于农业与工业资本之分裂关系的传统假设提供任何证明依据。相反,他们发现,正是在人际关系网中整合了农业与工业利益的那些个人很有可能承担起主导阶级的政治领袖职责。此外,有关外国资本与地方资本之间的想当然的分裂关系也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假定。<sup>[48]</sup>

来自从属阶层压力的增强,是国家相对于主导阶级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的第二个源泉。令人称奇的是,不断深化的阶级冲突通常会扩大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由于在镇压下层集团时,国家机器会被动员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它也会变得更愿意采取与主导阶级相对抗的行动。奥唐奈(O'Donnell)关于官僚权威国家在其统治初期和最具镇压性质的阶段对地方资产阶级的要求变得不闻不问的描述就是很好的例证。<sup>[49]</sup>在镇压由秘鲁军队政治化所引发的农村暴乱中,国家最终扮演的角色则是另一证明。军人不仅掌控了国家机器,并且反而利用国家权力来对抗农村精英。<sup>[50]</sup>

上述模式与传统上对作为体现国家自主性的基本模式之一的“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截然不同。在波拿巴主义模型中,国家是被阶级力量的平衡推上领导位置的,而在这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中,从属阶级(以农民阶级为代表)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在国家机构中的所谓的代表。典型地,国家利用所获得的平衡杠杆在保持现状的同时也维护了主导阶级的利益。在这里,国家并没有像奥唐奈的案例那样(对主导阶级的利益)“不闻不问”。

从属阶级压力的增强导致国家自主性的增强这种情形,不能混淆为可能是一种逆向工具主义(inverted instrumentalism),在后一种情况

下,从属集团可能最终获得了足以利用国家为自身目标服务的权力。当然,这后一种可能性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关国家参与再分配及其他与主导阶级的利益相对抗的行为的思想基础。<sup>[51]</sup>这也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要点,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在消亡前会成为以前的从属阶级的阶级工具。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案例都还可以作为另一种情形的体现,即作为仆从的国家——在本例中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仆从——可能比自主性国家更为高效。但是,在这一点上,逆向工具主义不是其主要兴趣所在。这种工具主义只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主导利益完整不可分的社会结构会极大地压缩国家的自主性空间,而不论主导阶级利益的具体内容如何。

最可能有助于增强国家自主性的环境是这样一种格局,即统治契约内部存在重大分化,来自下层的威胁会诱使主导阶级让渡大量的自主权给国家,或者是从属阶级要求获得足够的权力以瓦解主导阶级对政治控制的垄断。我们能够看到类似格局的各种形式,每一种都可以作为增强型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但我们不能认定这种社会结构的分裂能够自动地扩大国家的自主性。主导阶级内部的分裂与从属阶级的施压能够提供扩大国家自主性的机会,但这种分裂同样也可能导致国家机器的不同部门被不同的利益俘获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巴尔干化”。最后的结局更倾向于这种矛盾结果中的哪一种,更有可能取决于国家结构内部的控制与协调关系,取决于国家机器与外部势力的相对力量,还取决于协调国家与社会利益结构两者关系的特定政治模式与过程(这一点本文还没有讨论过)。

即使上述因素的平衡并不利于国家自主性,最有可能的结果也不会是由于多个反对势力而导致一致性国家行动彻底瘫痪。更有可能的结局是,在主要的竞争性力量之间达成妥协,即这些力量彼此僵持一段时间后终于为国家行为确定下大的指导方针和约束条件。妥协



形式从勉强无争议的事实性僵局到明确公认的体制契约,不一而足。<sup>[52]</sup>如果能够至少提供成功实施任何政策系列所必需的最低程度的一致性,这样的妥协往往(事实上是必然地)会为国家机器让出一定的自主行动的空间。一旦变化的环境提供了机会,这种有限的自主性空间就能为扩大国家机器之独立性的努力提供基础。

社会经济危机,乃至不太严重的新政策问题的累积,也有可能提供类似的机会。社会政治妥协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它们常常会保留它们所发源的历史格局。这种妥协不仅代表了权力平衡,同时也体现了过去的政策构想并有可能经空前的政策问题而一直累积到临界点。一旦到了那种即便是运行良好的制度契约也无法处理的危机状态之下,国家机器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并因此有了新的扩展其自主性的机会。

至今为止,我们全部的论证都假定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分化是基于利益的分化。但是,基于利益的分化与国家自主性之间潜在的正相关关系必须与族群和宗教分化的后果区别开来。利益性群体之间的冲突更容易受到物质利诱和国家能动用的强制措施的影响。相比之下,族群或宗教的团结与排外并非是工具性的,反而常常是弥漫性的而且无所不包,因此对国家政策的反应也不那么灵敏。此外,在一个在族群及宗教方面存在分化的社会,国家将尤其难以维持其关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声明——这种声明也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具体案例来佐证这一观点,包括作为国家被原始(血缘)分化所削弱的极端案例的黎巴嫩,以及作为强国的日本(其相对自主性地位被其运作于同质性民族社会之中的事实所强化)。然而,不幸的是,族群与国家自主性的相关关系并不像这一论点那样直观。

尽管原始分化有可能会削弱国家,这或者是由于分化会渗透国家机器自身或者是由于分化使得国家根本无法具有合法性;但在特定的



条件下,族群和宗教分化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但当族群分化是层级排列的,并且某个单一族群成功地获得了对国家机器的持续控制时,族群分化有可能扩大国家的自主性。南非白人政权相对于南非的英国经济精英们的相对自主性或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国民党政权与台湾地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合适的案例。简而言之,自主性既可以因为可能控制国家的外部集团的内部分歧而增强,也会因为将国家机器的掌控者束缚在一起并使之与强势外部选民隔离开来的忠诚感而得到扩展。

既然通常来说自主性是有效干预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样的条件很可能还会促进干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即使没有特定合适的能扩大自主性的结构条件,也不能完全排除实现有效干预的可能性。对国家在再分配方面的可能干预进行简要分析就能说明这一点。

### 自主性与分配

相比之致力于促进积累的国家干预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主导阶级的直接控制对于面向再分配的国家干预来说更为重要。除非国家具有从主导阶级抽取一定份额的剩余所必需的最低程度的自主性,否则就连它维持自身的生存也必须通过对从属阶级征收累退税才能实现。即使在这一较低限制之上,主导阶级对明显的再分配政策的反对,将比对国家在积累过程中的扩张之抵触更加坚决和强烈。正如前文对于面向收入再分配的直接干预所要求的国家结构分析所提示的,这样的机构尤其不可能胜任其复杂的行政和政治任务,同时它们特别经受不住那些俘获和招安的阴谋。

对再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将需要满足国家自主性和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所需之凝聚力两方面的苛刻条件,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这一领域无法实现有效干预。如果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行动效果是间接性

的,类似行动所要求的国家自主性程度也会大为降低。

如果我们有必要反复强调国家不能假定为拥有足够的知识并能够采取一致性行动,对于社会阶级甚至是主导阶级,我们也应该持同样的观点。因此,当国家行为与再分配目标直接挂钩且显而易见时,当反对意见在地方和个人层面都已经非常强烈而用不着协调成一次统一的阶级行动时,我们最有可能看到对再分配政策最强有力的反对。相反地,从这一观点我们也能推导出在何种情况下最不可能出现主导阶级对再分配政策的强烈反对。在再分配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情况下,政策可能不易被主导阶级所察觉。当政策出于其他目的而提出并因此为人所理解时,作为政策副产品的再分配效应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了。所以,相对于直接的、明显的干预法,间接的再分配方法所要求的自主性程度要低得多。

我们还可以以台湾地区为例说明。台湾改善收入分配的经验,尽管被公认为是基于明确的再分配型农业政策(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但似乎也被一些出于其他缘由而实施的政策所增强。<sup>[53]</sup>为了提高出口业绩,台湾大力发展劳动吸收型制造业,但这一政策事实上也提高了实际工资并改善了收入分配。奈特(Knight)指出巴西也有着类似的可能。<sup>[54]</sup>他认为,为刺激更偏向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的发展而设计的政策将更节能,将能够与制造业出口的扩张保持一致,并且能够最终增强地方资本而非外国资本的力量。因此,不论其再分配效果如何,这样的政策对巴西的资产阶级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此外,极为不同的间接性再分配政策类型也值得说一说。主要致 6  
力于降低社会冲突和争取对政权的政治支持的国家,有可能会选择那些能够增强从属集团谈判地位的政策。秘鲁就是一个最佳范例。<sup>[55]</sup>人们组织农村合作社,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创建参与竞争政权的农村阵线。合作社并没有成功实现招安,反而增强了农民阶级的政治战

斗性,这种战斗性不仅针对大量被取缔的农村地主,还针对国家机器自身。“工业社会”的建立并没有促成工人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反而增加了罢工和其他产业冲突。<sup>[56]</sup>(这些后果与在发达国家观察到的现象非常相似。)<sup>[57]</sup>除非政策被后续事件所削弱(正如秘鲁大量出现的情况),否则这些政策会为今后的再分配创造出一个政治和组织性的基础——一个非常不同于政策创始人预期的基础。<sup>[58]</sup>

在更发达的工业社会,工人阶级和其他从属集团的组织水平,足以在必要时要求实施直接性再分配战略,有关间接性再分配国家政策的可能性的思考,可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来说,对分配问题的讨论如果只局限于资源的直接转移行为,其成果将难以超越对土地改革的分析。关注间接性手段不仅是确定国家再分配行为所需之自主性程度的有效工具,也许还是突破国家在促进再分配方面为何永远缺乏足够的自主性能力这一研究空白的最佳路径。<sup>[59]</sup>

对今后的研究来说,这也意味着对再分配领域的阶级关系的进一步研究。从属阶级不断地增强组织化和战斗力,这迫使国家变得反应敏感(结果是国家相对于主导阶级的自主性逐渐增强),这样的事例是将国家理解为社会冲突的舞台的最好的案例吗?或许它们只不过表明,积累的逻辑碰巧提供了进行一定的再分配的可能性,而国家一方面继续完全服务于主导阶级的利益,同时能够将它作为集体行动者的能力对这些可能性加以利用?

自主性是有效国家干预的必要条件。我们全部的讨论都无意否认这一通则。但我们竭力想说明的是,躺在这一通则上不再思考可能是一个错误。有必要对这一通则进一步描述清楚,对它所适用的条件进行更充分的讨论,找到在何种条件下需要更多或更少的自主性,以及何种条件下我们能够期望发现更多或更少的自主性。此外,我们已

试图列出几种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对有效国家行为来说光有自主性是不够的。尽管上述所有的讨论并没有完全穷尽,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清楚地展示对自主性的变化而不是自主性是否存在的有关关注所获得的成果。结论部分我们想试着再前行一步,我们将探讨一下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 结 论

在发达工业国和半边缘国家,数量日增的国家行为和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日益深化的渗透,似乎在帮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和管理社会经济冲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国家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关系限制了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目标时对公民社会进行干预的能力。

本文的分析集中于考虑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克服上述局限的两种观点。其一,为了采取有效干预,国家必须组建具有集体凝聚力的国家官僚体系。其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于主导利益具备一定的自主性是必要的,这不仅使得一致性国家行为能够追求一切持续性政策构想,还因为为了实现体系所要求而私人利益无法提供的“集体利益”,经济与社会中的部分竞争性利益,甚至包括在结构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利益,都不得不做出牺牲。尽管本文的主要努力在于修正上述观点,但同时也对这两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本节结论部分,我们将主要围绕扼要地考察国家干预行为对自主性以及国家以一个有凝聚力的集体行动者身份采取行动之能力的影响。一个颇吸引人的观点是认为这两者相互强化。是的,我们将会证明,相互强化的关系不仅存在,而且常常会居于主导地位。干预的经历锻炼了国家官僚体系的能力并提高了作为一个集体行动者的行



动能力。干预扩充了国家对资源的掌控,进而减少了国家对私人生产型资源的依赖,从而增强了国家自主性。如果这是互惠效应的唯一的形式,情况将沿着自主性、能力以及干预范围相继提高的路径顺利发展。自主性和一致性合作行为的能力反过来也会提高进一步干预的能力,这一过程将循环往复。但是,我们要指出,在不断提高的国家干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

在干预并没有反过来增强国家的自主性或是进一步干预之能力的情况下,自主性和集体行动者的凝聚力,或许也能提高国家作为经济转型推动者的效能。随着国家行为超越了为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重大干预所需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最低制度条件提供保障这一范畴,国家自身的特性连同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本质的改变。

国家关于“普遍利益的捍卫者”的声明本身隐含着问题,就算国家行为只局限于为个体化竞争行为提供基础条件,<sup>[60]</sup>随着干预的不断广化和深化,这一声明也明显变得问题重重。与市场或其他被视为准自然性的制度的运作相比,国家干预会不断引发如何将那些至少显得对其受益者来说是蓄意的、特殊化的结果合理化和合法化的问题。<sup>[61]</sup>逐步深化的干预行为破坏了国家关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声明,从而也削弱了国家管理者得以捍卫国家自主性的一个主要基石。

渗透深远的干预行为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超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合法化的范畴。国家对公民社会不断的渗透会激发政治反应、增加社会利益集团入侵并瓜分国家的可能性。不断增强的干预使得国家愈发成为社会冲突的舞台,其组成部分也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追逐目标。换句话说,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渗透越深,公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在国家机器中也就嵌入越深,<sup>[62]</sup>从而潜在地削弱了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凝聚力以及国家的自主性。

从一种包含正反两面性的观点来看待国家干预的后果,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两种关于国家角色演变的错误看法。有关自然相互促进的预设会直接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相对于社会其余成分的力量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就会不可预测地膨胀下去。这种观点不仅在经验上未经确证、在理论上值得怀疑,而且很可能致使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遭到扭曲,使得限制国家能力和自主性成为私人精英们的首要政策目标。

简单的互惠性强化的观点还可能使得人们对那些缺乏进行干预所需的最低能力和自主性的国家产生错误的预期,即认为干预能力不足会使得国家不可能发展出必要的、最低水平的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一种更加全面的观点承认上述问题是现实的,但仍认为尚未进行过重大干预的国家也有可能具备一定的长处,能够构建起自主性和一致性合作行为的基础。

只要相信有效干预对自主性和能力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对国家角色演变的预想就不会陷入上述恶性循环的幻象当中。当然,这种包含正反两面的观点的确使得我们做出一般性预测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复杂,但这也正是这种观点的本质所在。

尽管我们希望能够就支撑有效国家干预的条件因素问题提出一些建议性的有实质意义的看法,我们也同样能够为下一步应当如何进行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意见来。现有对相对自主性和国家干预积累过程之能力的争论,常常都是一些条条框框式的理论性声明,而不重视对历史变化的分析。本文自始至终都试图强调具体的结果不能通过形式化的资本主义理论做出预测,更不能由涵盖面更广的所谓工业社会的逻辑推出。它们只能被看作是复杂的、偶然的,只有通过细致的比较历史研究才能探究出其真相。

## 附录：

### 对所研究的社会关系特征的一点说明

对法律制裁的有效性<sup>[63]</sup>研究已经强调了对理性工具行为与蕴藏在情感和生活方式当中的“表达性”行为之间的差异(回到经典的社会学理论<sup>[64]</sup>)的运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具理性行为——尤其是在角色和组织分类制度化化的情况下——对法律行动和物质诱惑的反应要比表达性行为更加灵敏,当后者已为文化所认可并且成为社会习俗时更是如此。因此,法律行动在变革商业企业的规范约束时,要远比改变与家庭和性别角色相关的行为习惯有效得多。

上述观点具有相当大的适用范围;但它仍然需要加以一定的约束条件,其中部分约束显而易见,还有部分则十分微妙。前面所谓“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前提首先是指一次特定的竞争当中所涉及的对抗性利益的密集度和力量强度,以及作为结果的权力平衡等因素。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按照工具性思维引发和激励出来的理性实际上是有用的资源。很显然,有着与某些政策目标相抵触的强大利益的强势公司并不是政府能够轻易干预的对象;但若因此就得出力量而非目标行为的特征才有意义,这样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就算是权力资源的分配极不合理,那些早已习俗化、根深蒂固的表达性行为模式,仍有可能竭力反抗国家所推动的变革尝试。<sup>[65]</sup>

另一种更不易察觉的约束条件是,除了强制力和物质利诱之外,还应该考虑规范性诉求;它们可以直接生效,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明显地修正规范约束的影响,通过合法化和丧失合法性的过程来改变抵抗力量的大小。

最后,我们还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旧的激励模式和社会安排在

引发新的结果之后有可能改变其自身,从而改变了整个状态。但国家干预和其他变革对行为习惯的直接性影响却没有这么深刻。尽管这个因果路径对于我们系统地理解社会变革,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很显然,这样的直接效果极其难以预测和规划,因此也只是国家干预的一个极不确定的基础。

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的限制条件,从前述基本观点上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启发和推论。社会关系(某一社会、总人口中的某一群体或是某一社会生活的功能领域内的社会关系)越是接近契约式市场交换和官僚组织的形式,进行有效国家干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市场交换和官僚组织都是鼓励工具性行为并且通过制度性区分和隔离来保护这种行为的主要制度形式。这并非不承认在任何情境下都不应当低估理性行为的作用,也绝非要否认稀缺性和强烈的利益是驱使人们采取理性行为的动机——哪怕该理性行为直接受到习俗、不知情状态,以及确定何种选择为合理或“不能考虑”的规范等因素的障碍。然而,理性行为还是会受到上述障碍因素的阻挠。契约和官僚组织会从多方面协助理性行为,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帮助也许是能够制度化地使部分诉求脱离开多个异质目标的纠缠——这种纠缠会使得采取理性行为变得非常困难,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变得完全不可行。

市场交换和官僚组织对公民社会的不断渗透,部分地解答了与农业社会的世袭统治相比,现代国家所表现出的大为增强的(即使不是无限制的)转型能力的原因。然而,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不是这样一种类似演化规则的局部解释,尽管这种解释也考虑到了国家组织转型能力的长期增长。对我们来说,前述基本观点最为重要的启示在于它暗示了不同国家之间、同一国家不同部门之间、不同职能领域之间,以及干涉类型之间在实现政策目标之可能性上的差异。



前述基本观点的确指示出某些政策目标会比其他类型的政策目标更难以实现。最明显的暗示就是要求同时进行家庭模式变革的经济行为的转变,要比不要求进行类似相关变革的转变更难以实现。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启发涉及族群和相关的社会分化形式,这一启发对于不平等的经济发展及其收入分配的后果似乎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族群团结和排斥可能会对发展和分配政策构成格外难以逾越的障碍。用市场交换和官僚组织等术语对前述基本观点进行重构之后,该观点也指出了能够克服族群对公共政策构成的障碍的一些基本条件。事实证明,即使是像美国南部官方认可的种族隔离那样如此根深蒂固的状态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有关的地方决策交由服从于法律约束的公共官员和商人,以及交由联邦资金和市场机遇的诱惑——换句话说,即只要对官僚和市场关系(这种关系与有关种族仇恨的重大偏见在结构上截然不同)进行干预就可以了。

社会生活的非理性方面之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对诱惑和规则约束进行抵抗或不做反应的根本原因。任何制度建设都要求超越个人工具理性行为的局限。涂尔干提出的“契约的非契约因素”的法则必须广义地来理解,它能够应用于任何制度建设和集体的形成。<sup>[66]</sup> 目标、优先项和承诺——这些行为要素都是理性计算中的参考因素,因此在功利主义分析中往往被认为是想当然的——在有效的制度建设和集体形成过程中会被重新塑造,至少对关键性行动者来说是如此。这一非常通用的理论观点引领我们得到一个简单却十分有效的结论:在国家干预要求设立新制度的任何地方,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洞察力、政治意愿和国家精英们掌控的资源会自然导致相应的制度创造的出现,我们必须估测可能的困难、延误和失败,从而探索出能够培育新的社会认同和制度形式的特殊社会过程来。国家这一制度结构自身的建设本身就是很好的范例。只要考虑到制度模式和集体认同,有效

家行动的条件就会延伸到历史深处,通常会深远至使得整个分析与政策规划关联甚弱(即使有联系,也主要是负面影响)。

## 注 释

[1]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inehart, 1944);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Douglass C. North,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tate in Economic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6(1979): 249 - 259.

[3]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参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5] M. Merhav,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Monopoly and Growth* (New York: Perfection Press, 1969)。

[6] 参见 Albert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7] Stuart Holland, ed., *The State as Entrepreneu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2)。

[8] 从抽象思维的不同层次入手,学者还可以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如作国家干预目标的社会关系的特征,以及社会关系影响到这类干预的成功几率方式等。尽管本文重点关注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层次,但同时也想对前述这些基础、更抽象的理论争论提供启发,我们将在附录中简述我们的观点。

[9] F. H. Cardoso,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ed. D. Colli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1.

[10] Guillermo O'Donnell,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ed. Collier, p. 290.

[11] 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 – 18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 比如, 可见诸: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LB, 1973); Fred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volution* 7(3) (1977): 6 – 28;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Eric A. Nordlinger,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 彼得·埃文斯所执笔的本书第六章。

[14] Dietrich Rueschemeyer,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Efficiency and Pow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1) (1977): 1 – 25.

[15] Theda Skocpol, “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 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 *Politics and Society* 10(1980): 155 – 201.

[16] 参见 Eric O. Wr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17] 比如可参见 Gerd Spittler, “Administration in a Peasant State”, *Sociologia Rurali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Rural Sociology* 23 (1983): 130 – 144; G. Spittler, “Abstraktes Wissen als Herrschaftsbasis”, *Koelner Zeitschrift fue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2(1980): 574 – 604。

[18] Stephen G. Bunker, “Power Structures and Exchange between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4(1979): 56 – 75; S. G. Bunker, “Barreiras Burocraticas e Institucionais a Modernizacao: Um Caso da Amazonia”, *Pesquisa e Planejamento Economico* 10(1980): 555 – 600; S. G. Bunk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A Case from Brazil”,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8(1) (1983): 33 – 58.

[19] 参见 Issa Shivji, *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Susanne Mueller, “Retarded Capitalism in Tanzania”,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80*, ed.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London: Merilin Press, 1980), pp. 203 – 226。

[20] 参见 Louis Putterm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Village Democracy in Tanzania”,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ganizational Democracy*, vol. 2,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al Democracy*, ed. B. Wilpert and A. Sorge (New York: Wiley, 1984), pp. 473 – 493。

[21] 参见 O. E. Williamson, *Corporate Control and Business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ince-Hall, 1970); O.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22] Max Weber,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a Reconstructed Germany: 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Critique of Officialdom and Party Politics”, Reprinted in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 Roth and C. Wittich (New York: Bedminister, 1968, originally 1917); 也可参见奈特在《阶级、危机与国家》中的讨论 (Kn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此书前面已有介绍)。

[23] Peter Katzenstein, 本书第七章。

[24] Albert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A. Hirschman, *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7)。

[25] Holland, ed. , *The State as Entrepreneur*, 论工业重建局 (th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IRI)。

[26] 参见 L. P. Jones and M. E. Mason, “The Role of Economic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 Sector in Mixed Economy LD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Boston Area Public Enterprise Group Conference, Boston, March 1980)。

[27] 参见 Hirschman, *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 论钢铁行业部分。

[28] Judith Tendler, *Electric Power in Brazi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Richard J. Newfarmer, *Transnational Conglomerates and the Economics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Greenwich, Conn. : JAI



Press, 1980).

[29] Werner Baer, *The Development of Brazilian Steel Industry* (Nashville, Tenn. :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9).

[30] Frank Tugwell, *The Politics of Oil in Venezuel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T. H. 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e: Copper in Chil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David G. Becker, "The New Bourgeoisie and the Limits of Dependenc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Peru since 1968"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1).

[31] F. Sercovic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Worl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The Case of Commodity Olefins in Brazil"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96, delivered at the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1980); Peter B.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B. Evans, "Collectivized Capitalism: Integrated Petrochemical Complexe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Brazil", in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Brazil*, ed. T. C. Bruneau and P. Gaucher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81), pp. 85 - 125.

[32] 有关咖啡产业的案例, 请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Manipulating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 Brazilian Coffee Policy 1906 - 1962," *Public Policy* 21(4) (1973): 493 - 523。

[33] Alice Amsden,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3) (1979): 341 - 380; 也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34] 有关巴西钢铁业的分析, 请参见 Sergio Abranches, "The Divided Leviatha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 Formation in Authoritarian Brazil"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8); 有关石油化工产业, 请参见埃文斯的 "Collectivized Capitalism" and "Reinventing the Bourgeoisie: St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ependent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ed. Michael Buroway and Theda Skocpo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 88, 1982: 210 – 247)。

[35] Abranches, *The Divided Leviathan*.

[36] Werner Baer and A. Figueroa, “State Enterpris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ed. Burneau and Faucher, pp. 59 – 85.

[37] 参见 Claus Offe,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Frankfurt: Suhrkamp, 1972); and Claudio Pozzoli, ed., *Rahmenbedingungen und Scharankern statlichen Handelns* (Frankfurt: Suhrkamp, 1976)。

[38] Peter Katzenstein, 本书第七章。

[39] 在此有必要提醒读者重视诺德林格在其有关国家自主性的讨论《论民主国家的自主性》(Nordlinger,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中所强调的观点。国家管理者和权势集团的政治代表做出一致性政策选择这种情形,不是(国家)缺乏自主性的证据,反而却是一个关于自主性的特殊的例证。因此,日本政府,若以与主导阶级的冲突为主要标准就当评定为自主性程度非常低,若按照上述更宽泛的意涵,则可能会被更正确地视作具有相当程度自主性的国家。根据这一思路还能够更好地阐释瑞士案例。

[40] 参见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41] 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参见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Herbert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ntheon, 1974)。

[42] 我们很感激艾伯特·赫希曼提醒我们重视这一观点。

[43]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p. 15.

[44] 参见 E. V. K. Fitzgerald,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u Since 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45] 参见 Gary Gereffi and Peter B. Evan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State Policy in the Semiperiphery: A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Mexico”,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6(3) (1981): 31 – 64。

[46] 参见 Nora Hamilton, "State Autonomy and Dependent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2(3) (1981): 305 - 329。

[47] M. Zeitlin and L. A. Ewen, "'New Princes' for Old?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in Chi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1) (1974): 87 - 123; M. Zeitlin and R. Ratcliff,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Dominant Classes: The Case of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in Chil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0 (3) (1975): 5 - 61; M. Zeitlin, W. L. Neuman, and R. Ratcliff, "Class Segments: Agrarian Property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Capitalist Class of Chi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6) (1976): 1006 - 1029.

[48] 参见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Newfarmer, Transnational Conglomerates*。

[49] O' 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50] 参见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Cynthia McClintock, *Peasant Coopera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eru*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51] 参见 John D. Stephens,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the Parliamentary Road to Socialism: Lessons from Chil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Meeting, Bloomington, Ind., October 1980); E. H. Stephens and J. Stephens,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Dependent Capit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Manley Government in Jamaica", *Politics and Society* 12(3) (1983): 373 - 411。

[52] 比如可参见 Terry Karl, "Petroleum and Political Pacts: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Venezuela"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and Latin Europ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June 4 - 7, 1981)。

[53] John C. H. Fei, G. Ranis, and S. W. Y. Kuo, *Growth with Equity: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54] Peter T. Knight, "Brazilia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for the Eighties", in *World Development* 9(11/12) (1981): 1063 - 1082.

[55] 参见 Stepan, *State and Society*; Evelyne Huber Stephens, *The Politics of Worker Participation: The Peruvian Approach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McClintock, *Peasant Cooperatives*.

[56] E. H. Stephens, *Politics of Worker Participation*.

[57] 比如可参见 Skocpol, "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 讨论《瓦格纳法》(the Wagner Act); 以及 J. D. Stephens,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讨论左翼政党执政对工会组织水平的影响。

[58] 关于最后一个案例还有需要提醒读者当心的重要一点。尽管国家有可能引发交战状态而不是它所期望的合作式增选模式,但它所从事的政策仍然出自于国家相对于主导阶级相对较高的自主性这一背景。从根本上说,国家有意摧毁传统的乡村土地阶级,并且也想限制工业资本家们的行动自由(参见 Stephen, *State and Society*)。在墨西哥和巴西,从属集团的组织是在国家和主导阶级关系较密切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结果更接近于传统的统合主义范式,而鲜有长期的再分配意涵。

[59] 参见 Albert Hirschman, *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5), 对改革交易(reform mongering)的讨论。

[60] Horwitz,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61] 参见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Offe,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62] Ulrich K. Preuss, "Zum Strukturwandel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m bürgerlichen Verfassungsstaat", in *Rahmenbedingungen und Schranken Staatlichen Handelns*, ed. Pozzoli, pp. 71 - 88.

[63] Yeheskel Dror, "Law and Social Change", *Tulane Law Review* 33(1959): 749 - 801; Lawrence M. Friedman,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64]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See also Talcott Parson,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51).

[65] Gregory J. Massell, *The Surrogate Proletariat: Moslem Women and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1919 – 1929*(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66]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也可参见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 三 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艾丽丝·阿姆斯登

“二战”后的台湾历史有两大特点令人震惊。其一，它是继日本之后从明显的全面贫困进入到“发达”行列的少数几个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一。<sup>[1]</sup>其二，台湾当局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了领导的角色。该政权成功地使自身在关键的经济参数，如从农业中提取的剩余的规模和工业的利润率上占据了明显优势。因此，要理解台湾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理解其强势政权。

当遇到政府的初衷是如此清晰地指向军事和地缘政治而非经济的事实时，理解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面临的挑战也就陡然大增。1949年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占据台湾时，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只有一个目标：加强军事力量以备反攻大陆。正如埃德温·温克勒（Edwin Winckler）坦率地指出的：“蒋介石集团，如果有其他办法的话，是不会为发展经济花费半个子儿的。”<sup>[2]</sup>如果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军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必然会相互冲突，会为同一稀缺资源而相互竞争，那么台湾的成功就必然显得有些蹊跷了。

如果政府的角色对经济发展非常关键，那么为什么一个处于武人专政之下的经济体最终会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佼佼者之一？<sup>[3]</sup>台湾案例中能够消除军国主义负面效应的最明显的因素就

是美国的援助,该援助压缩了资源竞争的范围。但是,我将试图证明,在促使军国主义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美国援助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绝非必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我将提出,经济增长这一事实自身,既诱使军政府偏离了初始目标,又改变了它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并因此进一步放开了资本积累的过程。

9 尽管我们主要关注台湾“经济奇迹”中的国民党政权,但仍有必要先考虑有助于“二战”后该岛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期的遗产。接下来,我们就将从讨论殖民时代开始,从这里来观察国民党政权自身,考察它在农业和工业中的作用,观察它如何从一个以军事目标为首要任务的政权,逐步转变成军事目标与更关注经济增长这两种兴趣共存的政府。

### 殖民遗产<sup>[4]</sup>

认为台湾奇迹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和当局对贸易和货币事务管理的放宽,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就出现了实际国民生产总值(real GDP)相对较快的增长(表3.1)。当时农业是主导部门,同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工业经济体制处于幼稚产业保护阶段。在日本占领统治时期(1895—1945)的经济增长也很迅速。除1941—1945年的战争阶段外,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在半个世纪内几乎翻了一倍。考虑到此期人口也增长了大约43%,那么这一数据是相当惊人的。<sup>[5]</sup>

日本人在台湾开创的经济局面是通过慎重的规划与对主要资源的政府所有(与日本的私人资本家合伙)而实现的。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经济的主导效仿了日本特色的明治政府的主导模式,这使得它与英国和法国的殖民机构在重要方面大为不同。<sup>[6]</sup>蒋介石集团从日本

政府垄断的遗产中受益匪浅,日本人开发日据区的整套干涉主义方法也为国民党所继承。

从一开始,台湾就被当作农业附属区进行开发以作为对日本本土的支撑。在这里,一种双料经济(糖和稻米)主要按照帝国模式发展。台湾殖民经历与他国不同的一个方面在于,其主要的生产并不局限于外国人聚居地,而且产量并非仅仅是维持生计外略有盈余。许多能够接触到耕地的农民为市场而生产大米,以便满足日益增长的日本消费者的需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通常都是通过大种植园来种植甘蔗,但在台湾,种植甘蔗的既有实施大规模土地种植的日本糖业公司,也有小规模自耕农和佃农。因此,台湾农业很快就实现了普遍商业化。<sup>[7]</sup>

表 3.1 台湾地区平均经济绩效年度增长率指标

时 期	人口	国民总 产值	人均 GNP	农业 产量	工业 产量	交通和 通讯	台湾地区 零售价格	台湾地区 批发价格	出口	进口
1953—1962	3.5	7.5	4.1	4.8	11.7	10.4	8.7	7.6	19.5	17.0
1963—1972	2.9	10.8	8.1	4.0	18.6	15.7	2.9	1.8	29.9	23.5
1973—1980	1.9	8.7	6.6	2.4	11.9	19.0	12.4	12.0	25.0	27.7

注:第3—7列的增长率为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1981).

日本人改造了古老的“三重”租佃体系,剥夺了“大”地主的土地,使第二层承租地主拥有了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并且直接向国家纳税。日本人还取消了原有的产出比例税制,代之以固定税额的土地税,这激励了地主进一步压榨下属佃农的产出。地租仍然很高(通常是50%甚至更多),但新的结构为消化新型农业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租来的土地上生产出了全台湾65%—70%的作物<sup>[8]</sup>的农民,使用着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提供的新品种苗和其他技术发明。就这样,殖民政府确立了科学耕作的模式,至今这仍是台湾农村经济的



特点。<sup>[9]</sup>

在政府和富农的保护之下,一个精心构建的农协网络为农民提供继续教育、合作购肥、联合仓储以及其他多种服务。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政府会动用警察力量强迫抵触变革的乡村社区接受现代技术。<sup>[10]</sup>事实证明,小佃农在应用新品种技术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及其对科学耕作的熟练化,都对后来中国国民党进行土地改革的努力有莫大的助益。由日本人引入的农业协会构筑起的广泛网络,被用来加强政策监督并帮助控制地方群众。如今,这些协会仍然存在,并且是当局管理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

20世纪30年代,日本转变了其欲将台湾改造成成为母国市场的粮食供应基地的政策初衷。了解日本日渐嚣张的军国主义和对太平洋地区疯狂扩张的大背景,就能理解这一政策上的改变。虽然为时已晚,但为了满足其战争储备和占领东南亚与中国南部的野心,日本人仍丧心病狂地企图将台湾改造成一个工业卫星国。

在20世纪30年代前只有少数产业具备较强的地方优势(如糖和水泥),到30年代,台湾的工业开始急剧膨胀,化学和冶金产业相继投入建设;随着“二战”取消了免税产品的流动,许多进口替代产业也纷纷上马。尽管日本人期望将台湾建设成为东南亚和南中国地区的工业桥头堡,但这一梦想从未实现。<sup>[11]</sup>这一政策刚开始没多久,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尽管历史表明,为配合军事作战和工业需求而坚持建设到最后一刻的交通运输和海港设施,的确给战后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但战争爆发时,多数项目仍然停留在图纸上。

因此,考虑到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我们可以认为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经历了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包含了人均收入增加的经济增长;根据穿衣、住宿、银行存款等福利指标,台湾农民的福利在20世纪前50年可能确实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农民。<sup>[12]</sup>然而,日本占

领时期最持久的遗产,还不是生活水平的改善,而是一个相对高素质的人口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共产党在中国赢得胜利致使大陆人大批涌入台湾,岛上的人均收入优势几乎丧失殆尽(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得以恢复),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日本人所移植的经济结构还是保存了下来。但是,日据时期的主要经验是,要开发台湾的经济潜力绝不能仅仅依靠无情的市场力量。它要求深思熟虑的政府政策,这似乎是来自大陆的进入势力很难有可能予以提供的。

## 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从日本人手中接掌台湾政权的,是一个由单一领袖蒋介石主宰的高度信奉军国主义的官僚集团。这一点学界都有公认。但是该政权的内部结构、内部不同派系的相对实力,以及按照韦伯的观点该政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真正的官僚组织等问题,都值得争议。只要有了相关材料,学者们就能有把握地描绘出台湾政权的特征;但温克勒这样解释了描述性材料匮乏的状态:

该政治体系的基本性质仍不清楚。要说这个岛是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附庸,我们对这一关系的国际间和官僚机构间的运作情形又一无所知……要说这个岛是蒋介石及其儿子统治下的独裁政体……我们又缺少二人统治台湾时代的政治编年史;要说这个岛是一个被军事利益集团所控制的警察国家,我们又不了解其内部和外部安全机构的制度细节和政治发展史……要说这个岛在管理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我们又没有相关人物、机构和利益的政治记录。要说这个岛早就为国民党所统治,除了该党的华丽

的宣传册所载之外，我们对这个党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又知之甚少……最终，我们需要弄清楚背景、人物性格、安全形势、经济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相对权重，还要知道这些因素是如何组合到一起的。<sup>[13]</sup>

温克勒的哀叹是千真万确，那些意欲考察该政权角色的学者们当然除了仔细筛查手头的证据并做出看起来最为合理的推论之外，别无选择。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军国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将着重关注台湾当局的军事和技术官僚两个方面。对于后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台湾的新统治者是一个称职的团体。另一种从较早期历史出发的观点却不作此夸赞。这里引用西蒙·库兹涅兹(Simon Kutznets)的话作为对乐观看法的总结：

统治集团中大部分都是岛上的新来者，没有深厚的利益根基，与岛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也没有确定的联系……因此，他们能够充当独立的仲裁者，有可能达成长期共识，并号召部分利益集团为整体之福利而牺牲小我。如果我们假定，在决策集团和接受服务的较大集团(包括本岛居民和大陆移民)之间存在重要协定、所有集团中的历史和文化共同体是达成共识的足够的基础，还假定**决策集团有做出必要而及时的高效决策的足够经验和人力资源**，我们就可以认为，岛民与大陆移民的这种结合将是有助于像台湾这样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黑体加注是笔者所加)。<sup>[14]</sup>

正如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所提及的，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乔·史迪威(Joe Stilwell)将军对国民党的“经验和人力资源”

印象很不好,将军在“二战”前与蒋介石共事时就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通过一种“恩威并施”(用史迪威将军的话来说)的策略使其竞争对手丧失地位,蒋介石就显得强大而且必不可少,但他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一个政府。尽管资历高,但他的思维狭隘,文化程度有限。他最大的劣势就是缺乏有能力的政府公职人员。他从不将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任命到重要职位,以防此人变得过于强大。因为他选人的标准是忠诚而不是能力,他身边全是碌碌庸才。他的姐夫……统领国民政府并同时兼任财政部长的行政院副院长,被英格兰银行驻华代表嗤之为“只有12岁小孩的智商。要是我当时录下了他和我关于金融业务的谈话内容并回放的话,再也不会有人瞧得起蒋的政府了。”<sup>[15]</sup>

但是,历史未必总是反复其道,而且足以令人欣慰的是,老狗有时也能学会新的把戏:

蒋作为领袖的权威不仅来自他操纵政治的伎俩,也来自他能够将干将置之要职的选拔方式。在这方面,他在台湾的表现要远胜于在大陆,尽管在大陆,国民政府最突出的弱点就是他任人唯亲的倾向。忠诚度在台湾也很重要……因此,他在台湾的军事和内政官员都必须忠心耿耿,但是许多人还是很有才华的。<sup>[16]</sup>

而且,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使团还需要有称职的技术官僚与之共事,该使团利用其影响力保护那些技术官员并帮助他们进行政治性竞争。<sup>[17]</sup>

因此,我们可以说,台湾很早就具备了一个经济技术官僚团



体——尽管比较年轻——而且这绝非自我欺骗，因为这些技术官员再不需要像在“二战”前的大陆那样表现得像地痞流氓了。

尽管如此，战后初期这些倾向发展的技术官僚还是被军事重心所掩盖。除了黄埔军校的学员之外，战前国民党派系的大部分人都与获胜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晚期的台湾当局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围绕当时的安全长官（蒋介石之子）所展开的权力角逐进行探讨。然而，要理解战争刚结束时台湾当局的政策倾向，我们只需注意到这众多文献中的如下一点共识，即蒋介石的首要政治任务不可动摇，以及他“比任何其他人都……具有更为坚定持久的反攻大陆的信念……他坚持加强权力控制并极力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军事和安全目的上去”。<sup>[18]</sup>

在这个普遍承认的关于国民党国家机器的概貌基础上，政权看起来根本无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然而，自这一统治之初国民党官僚机构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尽管看起来是为了经济同时/或者更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但对于该岛最终的经济增长却是非常关键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业领域。

## 农 业

到国民党政权抵达台湾时，农业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其占GDP的比重两倍于工业比重，占总出口的比重更高达90%。此外，它在政治上也举足轻重。国民党在大陆时就已经领教一个走投无路的农民阶级的潜在威胁，因此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重建农业。从一开始，国民党的农业政策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行动是增加农业产出的关键；另一方面，农业部门持续不断地受到压力，被迫为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必要的剩余。当局两方面政策的奠基石就是起自1949

年、完成于 1953 年的土地改革。

农业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农田地租被限制在最高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总产出的 37.5%。其次,原先为日本国民所有的公共土地按照分期付款的方式优先分配给承租者。第三,强迫地主将其名下土地以不低于规定的最小面积的规模划分成块并按照《耕者有其田》法案(the Land-to-the-Tiller Act)出售给其佃农。<sup>[19]</sup>这种取消封建地主所有制、创造一个小农所有者阶级的设想出自孙逸仙博士。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耕者有其田项目仅仅是一纸空文,因为将要被剥夺的地主阶级正是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与之相对的是,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与台湾的乡村士绅没有任何瓜葛。尽管两边都是中国人,但他们在民族和社会上之差异宛若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区别。作为对剥夺其土地资产的交换,地主获得了土地置换债券和公共企业股权。部分地主从所得企业股权中大获其利并成为成功的实业家。其他人则最终破产。<sup>[20]</sup>无论如何,如同半个世纪前的大地主阶级一样,地主阶级最终消亡。

因此,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台湾的乡村不再为一小撮大地主所主宰,而出现了一大批只拥有极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到 1973 年,几乎 80% 的农村人口为自耕农户,另有十分之一为部分所有权人。<sup>[21]</sup>只有 6% 的耕种收入归地主和贷款人所有。<sup>[22]</sup>这无疑支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台湾的(户均)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要远低于大多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更接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然而,这并不代表台湾收入分配十分平等。<sup>[23]</sup>

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台湾 1953—1968 年间的农业产量的年均增长率,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同样令人称赞的还有农业对工业的资本溢出效应,因为不管日本人的统治对农业压迫有多深,蒋介石政权的压榨都更为严重。因此,1911—1940 年间农业的净实际资本外流量

每年增长 3.8%，到 1951—1960 年间，这一增长率陡增为年均 10%。<sup>[24]</sup>但是，快速增长和农业资源向城镇的转移，既不是自由市场力量所致，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绿色革命——的自发结果。相反，它们反映了乡村的所有权结构和对几乎一切可获益经济行为的国家管理。

众所周知，当发展中国家引入与绿色革命有关的新型技术时，总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如较大的农场主）收入剧增。但不同的是，台湾的绿色革命几乎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的生活。而且，这样一种对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似乎完全取决于当局对资本积累的控制。政权在群体农民中间平均分配资源，这是市场机制做不到的。因此，大部分农民从中获益颇丰。那一小撮大地主阶级也没能东山再起（他们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反对当局的潜在利益集团）。于是，台湾农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存在大量的与个人主义的家庭耕作资产阶级模式相适应的小农业主，而唱好这出戏的正是高度集权的政府官僚机构。

两位人类学家通过对台湾三个农村水稻耕种的研究得出了这些观点：

在这个人口流动频繁的小岛，当局的军队实际上延伸到了除山区以外的每一个农场。这是台湾农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和行政特征。

作为（土地权益改革）的结果，村中的地主乡绅阶层从此消亡。当局的权力于是直接延伸到每一个村庄。过去的佃农现在只需要直接向当局缴纳土地税和水费。<sup>[25]</sup>

1965 年，台湾当局各部门或相关的信贷机构提供了全部农业借

贷的65%。而在土改之前,私人放贷业务占全部贷款的82%。<sup>[26]</sup>至于农业教育和市场营销等活动,政府借由日本人设立的农业协会网络来实施控制。<sup>[27]</sup>

当局对化肥的垄断或许是促进生产和提取农业剩余最重要的手段。福尔肯(Falcon)总结了化肥垄断对农民的积极影响:

它使得所有农民都能获得关键的现代化投入。它取代乡村放贷者成为信贷的源泉。它降低了农民可能遭遇的价格风险。(普遍重视降低风险在台湾农业政策中显而易见,而且似乎是它重要的教训之一。)<sup>[28]</sup>

与此同时,化肥垄断对于提取农业剩余也很关键。当局用化肥来交换农民手中的粮食,而且交换率对农民极为不利。1964—1965年间,台湾农民每百公斤硫酸铵所支付的价格几乎要比日本、荷兰、比利时、美国甚至印度农民所支付的价格高40%。<sup>[29]</sup>

从农业中抽取实际净剩余的其他机制还有:土地税、当局的强制性粮食征购、还贷,以及《耕者有其田》项目下清偿转售给佃农的土地(参见表3.3对农业和非农业家庭税赋负担的比较)。所有这些征收都采取以货代款的方式。所有征收都可算作是“隐性税收”,因为当局的征购价明显低于潜在的市场价格。当局在粮食征收中的获利不可胜数。1963年以前,这些隐性的粮食税都要超过每年的收入税的总额。<sup>[30]</sup>

有三个经典的问题显然会妨碍小农生产成为资本积累的坚实基础。首先,小农生产由于不科学,所以通常是没有效率的。其次(根据斯大林为捍卫集体农庄制而宣扬的观点),小农生产阻碍了国家对剩余价值的征收,这是因为由于人均收入很低,据说农民会自己消费



掉多余的产出而不会出售(比如,他们可能更不情愿进行产品宣传)。在土地稀缺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成功地克服了这两个问题。当局通过提供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基础设施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由于科学耕种提高了人均收入,第二个问题也自行解决并迫使农民贡献出部分收成以交换化肥和必要的消费品。

赫拉·迈因特(Hla Myint)则描述了历史上农业生产所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当农民成为市场的专职生产者时:

(他们)无法再自给自足,就必须从所能求助的主要来源——高利贷者——那里进行借贷。由于他们对变化迅速的市场信息一无所知,往往会因此而债务缠身,在土地可以自由转让的地方,他们将土地用于抵债从而沦为佃农。<sup>[31]</sup>

与此相反的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当局通过稳定价格和支持信贷(如不经过市场而人为模仿一个完全信贷市场)成功地维持了一种小农所有者为主的农业结构。蒋介石政权还清除了外国经纪人的干扰,这种人常常在他国的乡村地区进行垄断,用现金从农民手中廉价购买粮食再高价售出。<sup>[32]</sup>

因此,在台湾,一个长时间地辛勤耕作以实现每公顷产出最大化的自我剥削型农民阶级,和一个从不间断地高效率地强购农民辛劳之产出的高度剥削型政权,相互配合,成效显著,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这样做有利于谁?因为台湾不是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社会,通过压榨农村,政权为一个精英集团的利益而服务。不幸的是,尽管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台湾的统计数据数之不尽,但关于阶级分析的信息却鲜见公开。然而很清楚,要追溯国民党的国家社会

主义及该党之阶级属性的历史根源,我们不仅要考察日本殖民统治时代,还要追忆在中国大陆上发生过的那些事件。我们可以这样假设,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连同它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全部理解,都随着国民党的迁居移植到了台湾。尽管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并不利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却非常适合于台湾。1953年的土地改革和随后的农业发展为国民党政权注入了新的生命,国民党政权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也在改革和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存活下来。

总之,台湾的农业为工业资本提供了劳动力、农业剩余以及外汇。即使在“二战”刚结束的经济混乱时期和在人口增长位居世界前列的时期里,台湾农业所提供的剩余也有效地满足了岛内最低消费需求和出口剩余。<sup>[33]</sup>良好的收成是台湾粮价(以及实际工资)保持低廉优势的主要原因。同样重要的是,高农业生产率也带来了丰富的外汇。<sup>[34]</sup>农业还为台湾的工业产出(尤其是化学产品和农具)提供了重要的需求源,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农业结构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也足以将最谨慎的外资企业吸引到岛上来。其农业生产率甚至还足以为工业工资确立了最低标准。在1974—1975年经济大萧条时期,返乡务农的工厂女工最后都拒绝为通行的工资待遇而回到工厂。<sup>[35]</sup>台湾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劳动力短缺(并非出现在欠发达阶段)。接下来我们也该谈谈台湾的工业化了。

## 工 业 化

台湾的工业化常常被误认为体现了“自由放任”战略的成果。人们争辩说,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地区)不同的是,台湾的成功归结

于它拒绝实行保护幼稚工业的政策。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了一份研究,比较了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开篇就直接揭穿了上述幻想。<sup>[36]</sup>该研究表明,在台湾出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出口之前,曾实行过进口替代战略。幼稚工业保护战略绝非台湾经济史可以忽略的经历。在经合组织重点考察的1966年,台岛对岛内产品的市场销售所提供的保护,远远超过以高度保护主义而闻名的墨西哥。<sup>[37]</sup>

在1956—1961年间,当局实施了配套改革将台湾经济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当局重新设计了货币和财政政策,重新估定并统一了汇率,从而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出口利润极其可观。所有这些变化都被冠之以“自由化”头衔,并被视作台湾运用经典律条赢得成功的证明。尽管如此,令人们不满的是,台湾对关键性进口替代品的保护从来没有过丝毫放松。<sup>[38]</sup>就在“自由化”后出口厂商们获准免税进口其生产投入品时,关键性的第二阶段进口替代项目继续受到保护而免受外来资本的竞争。这其中包括半成品、耐用消费品和运输设备。尽管生产用的机器设备很少得到关税保护,但这种保护需求在当时并不大。台湾设备的尖端程度使其所占据的相应的市场份额并不低于美国或欧洲的设备。台湾关税体制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机器设备在技术上可以自由进口——但是,对于本地可以提供的机器而言,自由只能提供给机器的使用者而不能给销售商,同时还要排除为数很少的、碰巧对本地机器制造商构成真正威胁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台湾当局这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大部分进口税完全是多余的摆设——也就是进口税率一定要高于必要的额度。<sup>[39]</sup>在自由化鼓吹者强有力的宣传中,上述情况往往被轻描淡写以掩盖高关税的事实。

在世界银行一份证明出口导向型增长之价值的研究中,高度密集

的数据背后揭露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仅已经开始补贴出口,同时还在继续保护进口替代项目,台湾地区也不例外。<sup>[40]</sup>因此,对制造业部门的净有效补贴率的平均值在阿根廷是38%,哥伦比亚是10%,以色列是7%,韩国是-11%,新加坡是-4%,而台湾地区是10%;从这一估算来看,台湾的补贴率不仅相对较高,而且也显示出当经济体从较低级向较高级转型时常常出现的扩张态势。因此,不仅在台湾地区,而且在其他准工业化国家,较高级别的转型(如第二代进口替代)的净有效补贴率的平均值要比前述的数据高得多。在保护制造产业的策略中,进口配额控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sup>[41]</sup>

台湾地区在1949年引入的是内向型增长模式,部分是无意的(传统的农业出口不再受到保护,也失去了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市场),部分却是有意而为的(这在政治上有利于支撑已经占据部分日本遗留设施的资本家阶级)。到1949年,由于失去大陆市场又再次面临日本产品的竞争,小企业主们纷纷陷入严重困境。<sup>[42]</sup>当局通过控制进口、外汇以及许可证来拯救小企业使之不至灭绝,同时减轻国际收支失衡的严重局面。

然而,台湾岛内小市场的内向型增长模式很快就流产了。尽管它为部分群体带来了高额利润,但也引发了通货膨胀、垄断、生产过剩,过度依靠美国的硬通货援助以及全面的腐败。直到制造业开始起步之后,台湾当局才犹豫不决地决定往出口导向型增长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点。首先,“自由化”绝不能解释为“市场经济”在台湾的复兴。正如前面所证明的,当局对资本积累的管理通过关税保护(如果其他手段不算的话)得以延续。其次,尽管经济学家们将出口导向型增长视作更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模式,台湾当局却绝不是受任何理论说教的指引才赢得利润的。一位公职人员这



样写道：

无组织的生产和出口常常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在国外市场上的残酷竞争，而竞争过度，又必然会引起价格的急剧下降、质量降低，并最终丧失出口市场。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当局才鼓励在往国外市场出口时统一或联合进行销售，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出口配额、质量改善，以及出口产品的统一报价来限制生产。<sup>[43]</sup>

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卡特尔都是当局所支持的，并且一度存在于台湾主要出口品的绝大部分领域：纺织品、罐装蘑菇和芦笋、橡胶、钢铁、纸业和水泥。<sup>[44]</sup>当局曾试图使所有出口产品的营销都置于台湾人之手，因为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都对日本大型贸易公司对海外市场的袭击非常敏感；这一设想全然不顾日本贸易公司的高效和台湾同类公司的蹩脚表现。

我们要争论的不是想狡辩，说台湾当局对台湾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过支持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承认的程度。相反，要点在于台湾当局从来没有接受过自由市场之类的原则的引导；因此，将台湾地区的成功归结为忠于类似的原则，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误导人的观点。自中国大陆败逃台湾后的国民党最为关注的是经济稳定问题。据台湾当局政策主要设计者之一的李国鼎（K. T. Li）先生所言，“在整个 50 年代……经济考量中压倒一切的就是稳定问题。”<sup>[45]</sup>而在 70 年代：

能做的一切都是要维持价格稳定，即使这要求较少考虑经济增长率。我们庞大的政府部门雇用着数不清的军事人员、文官，还有教职人员，任何的价格上涨都会给这些人造成严重影响。<sup>[46]</sup>

而且：

我希望强调一点……我们不是要追求过分的快速增长，而是希望一种稳步的、平缓的、朝向最有利于我们民族利益方向的经济扩张。<sup>[47]</sup>

为了实现稳定，台湾当局似乎有时是小心翼翼地考虑尽可能地不让经济受到市场力量的破坏，有时则会利用市场力量，但从来没有出于信仰而推崇备至、视之为深信不疑的经验法则。

## 外国援助，外国资本和国有企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对台援助，以及更近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台湾的资本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资金流，尤其是初期美援的慷慨解囊，不仅为台湾提供了资金，还显然影响着当地的政策和政治。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援助的重要性。1955 年，美国援助达到峰值，其数额已经超过台湾总投资的一半，直到 1964 年，<sup>91</sup> 这一比重才降到 20% 以下。<sup>[48]</sup> 从政治上来看，援助也极为重要：通过在居民绝望之际引入大量的消费品和生产品，这些援助帮助将通货膨胀从 1949 年的 3400% 减少到 1953 年的 9%<sup>[49]</sup>，从而维护了政府的权威。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援助的影响则相对较小。<sup>[50]</sup> 大部分援助都用于了军事目的，余下部分则投放到了广义的基础设施之中。（从这一点看，对台援助对美国而言是成功的，因为援助的目的就是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持政治稳定。）因此，只有从市政工程项目和技术以及台湾技术官僚行政能力的增强这些方面的发展来看，援助

的效果才可以说是永久性的。我们很难说台湾向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的程度要归功于美国的压力：现在所有相关方都急于为自己揽功。能肯定的只是，所谓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包括自由的外资企业）都是由美国援台使团鼓吹的。从其主要捐助人的倾向这一角度来看，国民党政权坚持其“国家社会主义”的程度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重点关注公共部门生产和公共决策。

1952年，台湾地区整个工业生产的57%（依1966年价格计算的附加价值算）和制造业产出的56.7%都由国营企业产生（表3.2）。自那以后，台湾当局就不断受到压力，要求它要么缩减其所持资产的规模，要么就彻底冻结它。1954年，部分地在美国国际发展局的劝说之下，四家国营企业（一家盈利丰厚、另两家明显要弱很多）的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股权被让渡给了地主，作为1953年土地改革中地产充公的部分补偿。还有来自本地资本家要求去国营化的零星压力，这些人有的希望不被挤出信贷市场，有的则希望在盈利性国营企业中捞得更多的份额（然而，在1982年，15家国营企业中有14家是负债的）。<sup>[51]</sup>最后，还有来自可以称作是自由化游说团的压力，他们要求减少关税保护并压缩国营企业的营业范围。

然而，国民党政权拒绝被剥夺，遵照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传统，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52]</sup>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公共部门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20%。尽管如此，在诸如重型机械、钢铁、铝、造船、石油、人造革、化肥、工程，以及最近兴起的半导体等行业，都仍然由当局主控。台湾地区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或全部或部分地为当局所有（1969年以前外国银行禁止在台开设分支机构）。所有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都受到当局的监管。<sup>[53]</sup>因此，如果台湾当局没有牢牢“把握控制高度”，

它必然在这个方向上要走很多的弯路。

当局对剥夺自身资产一事迟迟不决,主要有两个原因。从一开始,国营企业的作用就是服务于巩固大陆籍官僚的权力。而近来,国营企业也帮助国民党政权拥有了对抗外国资本的力量。国营企业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就是使得台湾的关键性经济部门为当局而非多国公司所控制。这样说并非是藐视多国公司的权力,也不是暗示当局的生产性行为 and 外国投资者之间缺乏有机的团结。近来,在汽车行业中,两者试图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扩张的核心。但当局在几个关键领域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台湾出口出现繁荣景象之后,当局才放弃其传统的对外资的保守态度。一直到那个时候,投资台湾的外资企业才达到较多数量。

到 1971 年,海外华人投资和其他外国资本大概占到总注册资本的七分之一(大体与巴西情况一致),尽管这当中对外资的统计还有问题。<sup>[54]</sup>但是,外国资本已经集中在了以出口为目标的电子、化学以及纺织行业上。外资并没有对当局转向重工业的计划蜂拥而上。根据一项纪录,在 1973 年至 1980 年间,外国企业占到了电子产业部门总投资额的一半和总出口额的 20% 以上,但只占制造业总投资额的 10%。<sup>[55]</sup>最后,台湾并没有为资助其重工业而在国际银行负债累累。正如我们简单讨论过的,相对较低的对外资的依赖度取决于国内较高的储蓄倾向。而且,尽管按照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标准计算,台湾已经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借债方,但其国际偿债比率<sup>①</sup>仍然很低——大概在 5% 到 10% 之间,这主要归结于其出口极其快速的增长。<sup>[56]</sup>

① 偿债比率:一国偿还外债(包括还本及付息)的金额占该国出口收入的比例,用于衡量一国的债务负担。本解释取自路透中文网投资频道和 OECD 官网的统计学术语表。——译注



表 3.2 台湾地区工业部门部分指标,1952—1980

指标	年代			
	1952	1962	1975	1980
工业产出指数(1952 = 100)	100	303	2010	4108
工业占 NDP <sup>a</sup> 比重	18	26	39	46
工业占总就业比重 <sup>b</sup>	9	(25)	36	42
公有企业占全部工业生产的比重	57	46	19	18
工业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	8	51	84	91
		1951	1971	1980
<b>工业生产部分所占比重</b>				
采矿业		10.2	3.5	1.9
食品加工		18.4	7.2	10.1
纺织业		18.4	20.8	11.2
化学、石油、橡胶 和非金属材料		10.4	22.3	19.1
金属产品、机械和电子机械		5.6	17.3	20.1

注释: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

<sup>a</sup>NDP: net domestic product, 净国内生产; 所有比重都以百分比表示。

<sup>b</sup>1952 年的数据来自 Gustav Ranis(参见尾注 49); 圆括号中的数据是 1967 年的。从 1967 年开始, 数据表示的都是每 1000 名工人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1981); *National Inco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s, Accounts, and Statistics, 1981)。

因此,不能说蒋介石政权把台湾交到了外国人手里——这意味着或者是让外国银行控制了信贷,或者是让外资企业主导了制造产业。也不能说该政权完全被自己的技术官僚(大部分接受美国教育)所把持,并认为这些官僚鼓吹降低关税和对公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尽管在政权机构中的露面日渐稀少,但军方的声音还是时常能听到的(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位陆军将军兼任经济部长)。不仅如此,这些军方意见似乎总是要求继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维护国防和社会治安——很多还是国民党的老一套。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另一个有着高文化水平人口的小的发展中国

家——智利,看看他们的军方人员都做些什么。这里的军官们确实认同经济自由主义,相信技术专家治国论、要求关闭国有企业、开放外国进口产品和投资——但其后果却是灾难深重。<sup>[57]</sup>关键点在于军国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在台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确是积极的。

考虑到资本形成问题,台湾地区的公共部门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当局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已经从1958年高峰时期的62%开始减少,但到1980年该比重仍然多达50%。<sup>[58]</sup>当局开支大部分用于资助在基础设施建设、合成钢材、造船,以及石油化工等方面的十大主要开发项目,这些充分证明了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无论在广度(制造业占GDP比重)还是深度(“复杂”产品和工艺在整个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与1952年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占36%而制造业只占一成相比,到此时农业仅占9%,制造业则超过了三分之一。<sup>[59]</sup>到1980年,全部工人(15岁及以上)中有42%都在工业部门就业(表3.2)。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人数就一直在减少。从历史来看,这样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在美国,农业就业人数在绝对数量上的减少也一直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sup>[60]</sup>

而且,台湾地区的制造业并不像神话曾一度流行的那样,只限于生产“假发套和钱包”。在所谓六个“计划时期”中(顺便提一句,这些计划最多只能被看作是“象征性的”),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在前两个计划时期(1953—1956和1957—1960),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是领导部门。<sup>[61]</sup>然而,就在第二个计划期内,非耐用消费品尤其是食品加工业的贡献明显减少,而中间产品(水泥和纸)则迅速发展。化工产品(化肥、苏打灰、塑料和制药)则在第三个计划期(1961—1964)中表现卓著。到第四和第五个计划期(1965—1968

和 1969—1972),耐用型产品(电子和非电子机械,如收音机和缝纫机,以及交通设备如自行车和轮船)以及石油产品的生产和投资都飞速增长。第七个计划期(1976—1981)是重工业的快速成长时期。这些结构性变化在表 3.2 中都能找到证明,尽管也不能夸大这些情况。1977 年,所谓的轻工业在制造业总产出中的比重仍然占到 48%,但和 1970 年的 54% 和 1960 年的 60% 相比,已经是有所减少的了。<sup>[62]</sup>

### 利用世界市场

1956 年到 1961 年间,当局推动的 19 点改革计划使台湾的出口赚得盆满钵溢。出口厂商们不仅得到税收和信贷方面的补贴,而且所享受的关税税率比在战前中国的额度还要低。于是,出口商们既能利用世界先进的生产率来进口生产投入品,同时又能利用台湾当地奇异的工资水平来促进出口。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帮助台湾从世界市场上获利的供给方面的因素,我们的注意力直接指向当局的作用。

由于低成本和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水平,台湾地区的出口产品(其中 90% 是制造业)很有竞争力。在整个 1954 年到 1971 年间,台湾每单位产出的工资成本相对于其竞争者都要低很多,尽管目前许多具体的数据尚不确定。<sup>[63]</sup> 1973 年的能源危机之后,尘埃落定之时,与日本、甚至与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相比,台湾地区仍然因为其低工资水平而仍可看作具有成本优势。因为汇率的扭曲因素和各国数据采集的口径不一,我们很难进行国际性的工资比较。尽管如此,表 3.3 中对全部工业部门的估算仍是支撑上述情况的;从表中能够看出,在所有行业,台湾的工资水平都要远低于其他竞争国家。

表 3.3 比较工资和薪水,1978 年年中(每月薪水均值 a,以美国美元计算)

职业群	台湾 地区	韩国	香港 地区	新加 坡	菲律 宾	泰国	印度尼 西亚	马来 西亚	日本	联邦 德国
工业工程师	358	639	618	821	190	437	752	552	1587	2884
机械工程师	407	587	627	710	191	460	786	677	1244	2884
电子工程师	322	509	590	803	203	492	299	762	1025	2884
会计	482	930	904	923	189	498	733	949	1521	1923
总经理	1051	1192	2389	2097	809	1784	1513	2672	3413	5495
生产经理	729	1049	1203	1215	498	669	851	1050	2488	3745
部门主任	461	889	1015	518	219	392	439	786	1587	3222
行政秘书	435	590	729	503	175	425	496	404	1360	1465
打字员	184	318	245	211	73	153	214	133	756	1099
低级职员	150	344	258	198	114	135	173	180	785	1190
工头	369	493	425	413	198	203	241	390	1500	1328
熟练工	167	318	255	206	81	86	137	181	1161	1282
半熟练工	115	311	189	133	70	76	96	129	942	1145
生手	93	146	158	102	52	51	65	84	698	915
工匠	245	330	303	210	64	135	482	304	665	1465
清洁工	120	208	170	108	59	77	53	82	550	824

a 除了每月发放的薪水,大部分公司还定期发放奖金,幅度从1个月的工资到12个月的工资不等,随公司和国家而异。为了让每月工资信息在真实成本核算中有意义,这一调查将奖金也算入了每月工资基数。但是,额外的奖金、特殊奖励、任务报酬等不计算在内。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Hong Kong, 引用和改编自 Anton Galli, *Economic Facts and Trends* (London: Verlag Welforum for the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1980)。

表 3.4 工业工资、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的长期变化(年度变化率)

	1954—1961	1961—1973	1973—1975
实际工资	2.5	6.3	5.2
货币工资	11.4	9.7	29.5
劳动生产率 <sup>a</sup>	4.2	10.8	6.0
单位劳动成本	7.2	-1.2	23.5

注:数据所示均为百分比。

<sup>a</sup>第一列是1954—1961年年均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 Lundberg(尾注64)的数据改编。



即使剔除汇率造成的扭曲,台湾地区的工资水平仍然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工资的增长率较低。而且,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移动是朝向有利于节约单位劳动成本的方向。仅仅从这两个方面,细心的人就能看到当局的影子。因为从理论上说,台湾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罢工也遭到禁止。推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教育的极端重视,而这种教育是由一种快速递减的税收体制所支撑的。

表 3.4 展示了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这些因素正是台湾出口成功及其非同寻常的价格稳定的直接原因。<sup>[64]</sup>与其他国家相比,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一直都是相当低的,尤其是当把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率(可以把这一指标看作是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条件的替代)相对比时更能看清楚。<sup>[65]</sup>同样令人吃惊的还有,从 1961 年到 1973 年这一关键时期内,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

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并非是自发出现的,但可以理解为其自身快速增长这一累积过程的结果。随着增长的加速,通过量(throughput)时间大为缩短,盈利能力得以增加,从而对外国技术的投资(表现为单纯的机械进口而不包括外国的技术服务)飞速增长。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张,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也因此大为加强;最终,经验积累所需的时间得以缩短,利用这些经验改善生产工艺和产品的机会也大大提高,工厂层次上的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得以实现。<sup>[66]</sup>

台湾地区对外国技术的消化之高效,就如同其培养出不在少数的高素质人口一样。在“二战”后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结束之时,台湾人被认为是全亚洲除日本之外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此后台湾继续对教育进行高投入,而且不断增强技术方面的教育。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每 1000 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台湾工程师人数要高于所有其

他具备有效数据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除外。<sup>[67]</sup>自那以后,随着产出的增长,对教育的投资也不断加大;在1975年和1976年,到海外学习工程技术的学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而在1968—1969年到1972—1973年间,在台湾学习工程技术的学生人数也翻了一倍,在1973年至1982—1983年间,这一数据又翻了一倍。<sup>[68]</sup>台湾所培养的工程师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要比美国的比值高50%以上。<sup>[69]</sup>

尽管对台湾的企业来说并不缺少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而且储蓄的利率也相当低;然而,这么多年来,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台湾的储蓄也成绩斐然。就像前面讨论过的那样,这使得台湾地区幸免于深陷国际债务的泥潭之中。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52年还不足5%,1962年是6.5%,1972年上升到26.8%,10年之后更是接近了1/3。<sup>[70]</sup>储蓄的结构也有所改变。外资储蓄的比重,从1952—1960年间美援全盛期的大约40%,一路遽减,到1972年之后已经变为负比,与此同时,台湾岛内公共和私人储蓄的份额大幅上升。<sup>[71]</sup>

根据隆伯格(Lundberg)的研究,<sup>[72]</sup>储蓄率的显著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国民收入中总利润高而且不断增加的比重。对当局来说,尽管其实际开支增长了五倍,但通过开源节流的手段,它能够做到有多少就可以储蓄多少。在支出方面,国防花费比重——预算中最大的单一项目——已经减半,而社会、健康和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和西方相比都一直处在相当低的水平。收入方面,台湾的税收结构保持了递减模式。起初,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投资资本。现在,税收收入大部分来自商业;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既微不足道,又极易逃避。总之,“台湾拥有利于资本形成的良好环境,而又基本不用担心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sup>[73]</sup>

很少有评论家认为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和台湾企业之间关系融洽,

也就没有人认为台湾当局一心只为资本的利益服务。比如说与拉美的某个国家相比,台湾当局使其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能力,部分来自当局对私人制造商的旁敲侧击。因为在任何地方,私人生产者的支配权并没有清楚的界定,所以一切资本都认为政府会侵犯其领域,但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为何这样的抱怨在台湾尤其响亮。

我们已经提到“政府之手”是如何“伸展到每一个农户家”的。<sup>[74]</sup>

8 同样地,“政府也深深地卷入工业的方方面面”。<sup>[75]</sup>即使在解除大部分的进口和外汇控制之后,当局仍然能够推行其意志,其手段有:把持经营企业所必须的各种许可;在引进外资借贷和签订技术协议方面要求事先批准;坚持银行体系的国家所有(其利率远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有意使税法条文含糊不清,从而可以用审计来威胁那些在政治上不合作的企业,诸此种种。所有商人都同意,当局出于任性就可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让他们停业。当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像韩国那样的巨型联合企业能够带来巨大产出时,台湾仍然是小农和小企业主的天下。<sup>[76]</sup>近来,政策已经开始转向鼓励农业联合和工业兼并。但是,且不说这些政策的确遭到利益相关方的抵触,我们也完全可以猜到当局对这一政策的矛盾心理,因为小的实体要比大的威胁性更小,而且更易管理。

在过去,台湾的食租者和资本家们都尝试过能使其丧失身份或能力的行政权力的滋味:前者被土地改革没收了土地,后者则屈从于引向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自由化改革。每当当局确立一条新的经济路线,既有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在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多国案例中,阶级冲突都源自货币贬值和通货紧缩。进口的自由化也伤害了那些进口替代型企业以及投资这些企业的银行。对于外资企业或银行来说,他们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消化这些新的政策指令。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转型在台湾的后果就相对较为温和。首先,台湾地区的经

济相对于某些拉美经济体来说,其工业化程度和通货膨胀率都要低得多,因此受到影响的既得利益很少。当局还控制了不少行业(否则就必然会受到伤害),而且这里还没有外资企业和外国银行。尽管如此,岛内对出口补贴和对第二代进口替代型行业进行保护这点甜头有所不满的私人企业,还是全都被清除出场了。简而言之,台湾地区比其他的穷国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这是因为无论在当局与劳工还是与资本之间的权力天平都要更有利于当局一方。

的确,由于其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性,台湾地区在出口能力方面较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占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势:台湾对前殖民者的认真学习使它吸取了日本经济的经验,从而能够认识到出口导向型增长是一种可行的战略。此外,出于民主同盟的考虑,在美援之后,由日本出口商及美国的多国公司(它们都把台湾当作出口平台)所先后铺就的接受台湾产品之路则稳定了台湾的出口。然而,这些关于台湾利用国际市场之能力的解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似乎最终都是反被国际市场所利用——很显然敌不过那种聚焦于台湾当局对政治经济的强力操控的解释。

## 经济增长与不断变化的政权性质

本文开头探究的关于台湾当局角色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应用面来看,台湾实在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实例,它体现了国家干预与经济增长加速之间的积极关系,这种关系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已是普遍接受的。<sup>[77]</sup>台湾特别吸引人之处在于,尽管国防军事明确优先于发展,而且军事力量在国家机器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政权仍然极为高效。但我们的讨论至今为止并没有解决这个困惑。相反,向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型,似乎使



得军事力量对政权的明显主宰与成功的经济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令人费解。

国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如同当局早期推动的经济自足一样,是完全可以被假设为符合军事利益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较低地依赖外国投资者,以及致力于基本粮食产品的更高产出,所有这些都迎合于军事独裁倾向。相反,出口导向型增长似乎与军事力量所喜爱的政策相矛盾。为什么一个热衷于国家安全的政权会接受这样一种政策转向,使得台湾经济对外国供给与需求关系变得极为敏感,而且更加依赖于外资企业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首先,应该强调对国际市场和资本的依赖有所增强只是民营经济的特征,尚未扩展到国防产品领域。军队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国有企业给它们提供基本的原材料。除国有企业之外,还有许多地位特殊的公司,它们受到当局的偏爱和/或激励。在这当中有国民党或退伍士兵职业协助委员会所拥有或投资的企业——一个由40多家企业组成的复合体,据说是这个岛上最大的个体企业。<sup>[78]</sup>到1960年,兵工厂生产出了台湾军队所需要的大部分设备、较低级别的武器和弹药。1969年,台湾获得一项贷款建设一家[与贝尔直升机公司(Bell Helicopter Co.)]合作生产军用直升飞机的工厂。到那一年,台湾已经开始生产M-14来福枪、机枪、炮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国防物资。<sup>[79]</sup>不久之后,台湾又迈出了走向自给自足的另一小步,与诺思罗普飞行器公司(Northrop Aircraft Co.)签署了合作生产F-5E型战斗机。<sup>[80]</sup>军事经济的繁荣发展可能让将军们没有太在意民品部门自足性的降低。

于是,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得以继续,甚至有所扩大到以前自给自足的、对战争非常关键的一些行业。尽管如此,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早在台湾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开始之初,军事力量对经济

事务的影响力就已经开始消退。比如,当局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这曾一度是被国民党元老们所极力反对的,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政策会减少反攻大陆所需的军人数量。<sup>[81]</sup>由于专营出口获利更大,台湾也停止了在粮食生产上的自给自足。国防开支占 GNP 比重和占政权开支的份额都开始下降(一直持续到现在)。1960 年,当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刚开始启动时,军事开支占 GNP 比重为 13% 左右,占政府开支的 65%。<sup>[82]</sup>而到 1978 年,这两项分别下降为 8% 和 34%。<sup>[83]</sup>

对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与军事利益之间这一明显的矛盾的部分回答是,在当局政策中,这些军事利益已经不像刚刚占领台湾时那样占据绝对性地位了。而且,就算是军人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除了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外也没有别的选择。在假定已经充分利用了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外汇储备战略的情况下,继续追求自给自足将可能导致经济上的自杀(尽管在这种功能主义的观点中不适合用依赖这样的词汇),因为只要某项决定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即使是以地缘政治目标为代价,军事力量也有可能同意。

然而,只要进一步考察一下长时间以来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就能获得更好的理解。一方面,随着共产主义政权那边证明自己是可持久的,反攻大陆的梦想就越来越晦暗。重新占领中国“刚开始是一种强烈的决心;接着变为一种渴望;再之又变为一个神话,最终成为一种仪式”。<sup>[84]</sup>与此同时,台湾是否能够仅仅依靠其反共立场来确保其主要盟友美国的支持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明了了。从这一点看,由出口导向型增长带来的对外资日益增强的依赖性,或许无论是对保证强有力的政治同盟还是赚取经济利益都是有意义的。<sup>[85]</sup>

但是,关于台湾国际地位不断变化的逻辑关键还在于面包和黄油。同共产党中国一样,台湾也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的经济

体,它对通货膨胀及快速发展的控制就是一种证明。台湾在经济上的生存能力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集体的大陆人居民不再需要通过反攻大陆来富强自身了。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台湾所实现的经济收益不像他们在1945年到1949年间的那样,是一时的暴富,也不像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早期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低买高卖发投机财,而是奠基于资本积累的持久性基座之上的。我认为,相对于其他解释原因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军事力量接受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并从台湾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退出。

在最后的分析中,尽管军事力量在这个政府中持续握有实权,台湾为恩格斯的经典论断提供了饶有意思的注解,恩格斯曾说:“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sup>[86]</sup>恩格斯所关注的是对经济反应敏感的精英们试图通过政治手段维持其统治的努力与经济变革的转型力量之间公开的竞争。台湾并不完全适合于这一论断,但人们的确能在台湾观察到经济变革对政治势力之倾向性的强有力的影响。军事力量并没有被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所征服,但是,似乎它已经发现了这种发展所提供给自己扩张的机会,相比于继续死守地缘政治斗争带给它的不断萎缩的前景,这种机会更令它垂涎。

因此,台湾不仅仅是一个能够观察到国家(地区)机器对经济发展之贡献的案例,它还是展示了国家(地区)机器的结构与经济增长过程之间的互惠性互动的活生生的证明。台湾当局,尽管在从大陆初上岛时似乎是不愿意促进发展的,结果却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与此同时,政权性质的变化自身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总而言之,台湾当局可以说是既转变了台湾的经济结构,又转变了它自己。

## 注 释

[1] 此处“发达”是指一种充分就业的经济,其产出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同时也因为生产率的提高。

[2] Edwin A. Winckler, *Remarks to a conference on Taiwan*( Columbia University, 1982).

[3] I. M. Little, “An Economic Reconnaissance”, i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OC*, ed. Walter Galenson(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48 – 507.

[4] 本章中关于台湾殖民的遗产和农业的文字部分主要借用了 Alice H. Amsden,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July 1979: 341 – 379.

[5] A. Y. C. Koo, *The Role of Land Refor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 Praeger, 1968).

[6] H. Y. Chang and R. H. Myers, “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 – 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1963): 433 – 449; S. P. S. H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1895 – 1949”, in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Gustav Ranis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87 – 327.

[7] R. H. Meyers,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China”,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ed. W. E. Willmott(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73 – 191.

[8] A. J. Gradanzev, *Formosa Today*(New York: 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 1942).

[9] S. P. S. Ho,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Colonialism: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1968): 313 – 340; R. H. Myers and A. Ch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23(1964): 555 – 570; R. P. Christensen,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tudies, Foreign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port no. 39(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8); S. C. Hsieh and T. H. Le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Input-Output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of Taiw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hinese-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Economic Digest Series, no. 17, Taipei, 1966. Teng-Hui Lee, *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 - 1960*(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10] Myers and Ch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11] Ho,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12] T. Ouchi,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and Japanese Villag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5(1967): 597 - 627.

[13] Edwin A. Winckler,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ed. Emily A. Ahern and Hill Gate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 - 37.

[14] Simon Kuznets, "Growth and Structural Shif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ed. Galenson, pp. 15 - 131.

[15]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 - 1945*(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4).

[16] Ralph N. Clough, *Island China*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7] N. 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New York: Praeger, 1966).

[18] Clough, *Island China*.

[19] 参见 Christensen,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0] Koo, *Role of Land Reform*.

[21] *Taiwan Agricultural Yearbook*( Taipei: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Provincial Government, 1974).

[22] Lee, *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

[23] John C. H. Fei, Gustav Ranis, and Shirley W. Y. Kuo, *Growth with Equity: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979).

[24] Lee, *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 p. 28.

[25] Sung Hsing Wang and R. Apthorpe, *Rice Farming in Taiwan: Three Village Studies*, monograph ser, B, no. 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74), pp. 10 - 11.

[26] Christensen,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7] 王(Wang)和阿普索普(Apthorpe)还提出台湾当局的目的与经济规划无关(*Rice Farming in Taiwan*):

至少只要台湾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保持目前的状态,或许当局会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支持目前对警察力量的运用方式,这种力量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了。比如,令那些早已熟悉了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人们惊讶不已的是,在1971年,国民党当局的内政部长曾多次提到为促进岛上的社区发展,要把培养警务人员作为最重要的人才发展目标。村民们也谈到了警察对他们部分日常生活的密切参与。(p. 10)

[28] W. P. Falcon, "Key Issue in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dustry of Free China* 41(4) (1974): 2 - 7.

[29] Christensen,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0] Shirley W. Y. Kuo, "Income Distribution by Size in Taiwan Area: Changes and Causes", *Industry of Free China* 45, nos. 1 - 3 (1976): 9 - 38, 9 - 21, 20 - 34, respectively. 有趣的是,尽管台湾农业已高度商业化,当局却很少依赖市场力量来从农村提取剩余。粮食收购采取以货代款模式,用粮食来交换化肥。能够说明当局在避免利用市场机制的事实是,当局曾试图(尽管未能成功)不仅要求用粮食交换化肥,还要求用来交换棉布、自行车、豆饼,等等。参见 Kuo, "Income Distribution".

[31] Hla Myint, *The Economic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Praeger, 1964), p. 48.

[32] T. H. Shen, "A New Agricultural Policy", in *Agriculture's Place i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The Taiwan Experience*, ed. T. H. Shen (Taipei: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1974), pp. 38 – 58.

[33] Hsieh and Le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4] 甚至在开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之后,台湾仍然有贸易赤字。贸易逆差一直维持到1969年。在1974年和1975年又成为净进口地区[台湾统计数据手册(*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1981)].这主要是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进口高速增长(尤其在1973年以后)的结果(参见表3.1)。大量出口产品还依赖于生产投入品的进口。如果不是台湾农业生产率高,贸易赤字会更加严重。

[35] *Free China Review*(Taipei, March 1976).

[36] I. M. D. Little, T. Scitovsky, and M. Scott, *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7] OECD的这份研究比较了七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的有效保护率(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结果发现墨西哥最低,其次是台湾(有效保护率衡量进口限制政策使生产价值增值超出该政策缺省情况下价值增值度的比重)。然而,该研究警告说,尽管“台湾对全部制造产业的平均保护水平较低,但这是由于台湾对出口品的零保护甚至是负保护所导致的。台湾对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品的生产活动的保护,比墨西哥要高很多。”(Little, Scitovsky, and Scott, *Industry and Trade*)

[38] 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e Change in Taiwan*, ed. Galenson, pp. 308 – 383.

[39] Teng-Hui Lee and Kuo-shu Liang, “Taiwan”, i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emi-industrial Economies*, ed. Bela Balass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82), pp. 310 – 350.

[40] Balassa, 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41] Rober Wade, “Dirigisme Taiwan-Style”, *IDS Bulletin* 15(2) (April 1984): 65 – 70(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ussex, England).

[42] Ching-Yuan L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1946 – 1972: Trade and Import Substitu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York: Praeger, 1973).

[43] H. D. Fong, "Taiwan's Indust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olicies and Control", *Journal of Nanyang University* 11(1968).

[44] Mo-Huan Hsing,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dustry and Trade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5] K. T. Li, *My Views o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llection of Essays from 1975 - 1980* (Taipei, 1980), p. 10.

[46] 同上, p. 15。

[47] 同上, p. 3。

[48] 参见 Little, "An Economic Reconnaissance"。

[49] 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ed. Galenson, pp. 206 - 262.

[50] 不同意识形态流派的经济学家曾经对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性进行争辩。支持出口导向型增长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以及支持第三世界自立的人尽管推理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倾向于贬低援助的后果(参见 Scott, "Foreign Trade", 内中有关于该辩论的不同的观点,包括他本人的看法)。相比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援助》这一关于对台湾援助最详尽的研究的作者雅各比认为,假定军事开支不减,如果没有这些援助,人均收入就会陷入停滞。详细考察这些辩论,加上历史的后见之明,我倾向于认同那些蔑视援助者。

[51] 台湾政府和台湾商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个谜,但是可以参考 Robert Silin, *Leadership and Value: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该书还探讨了台湾的管理实践。毫无疑问,这些也对台湾的发展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52] P. M. A. Linebarger, *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Se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37).

[53] Hsing,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54] "Manufacturing (Taiwan Area),"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ensus of Taiwan and Fukien*, vol. 3, Table 16 (Taipei, 1971). E. L. Bacha, "Issue and Evidence on Recent Brazilian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6(1977): 46 - 47.



[55] 这一信息由国立台湾大学的薛琦 (Chi Shive) 教授编辑, 并被《经济学家》所引用 (*The Economist*, July 31, 1982, pp. 1 - 14)。

[56] Morgan Guarantee Trust,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New York, June 1982).

[57] Alejandro Foxley, *Neoliberal Experiments in Latin Americ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也可参见 Alfred Stepan, 本书第十章。

[58]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1).

[59] 同上。

[60] S. Lebergott, "Labor Force and Employment, 1800 - 1960", in *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 S. after 1800*, vol. 30 of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on Research on Income and Wealth, New York, 1966), pp. 126 - 131.

[61] 后面关于早期工业化的分析, 基于 Teng-Hui Le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Agriculture's Place i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ed. Shen, pp. 66 - 70, and o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ensus of Taiwan and Fukien* (1971).

[62] Li, *My Views o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63] Scott, "Foreign Trade".

[64] 1952 年到 1961 年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是 12.3%, 1962 年到 1972 年间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2.9%。相比之下, 同时期的韩国是 33.9% 和 13.6%; 参见 Erik Lundberg,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Galenson, pp. 263 - 307. 但是, 台湾的价格表现, 自能源危机之后就开始每况愈下。1974 年度的 GNP 紧缩率高达 32.3%, 1971—1981 年间平均也达到 10.4%。经济学家们无法解释这一恶化情况, 只能认为是需求推动与成本上扬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普遍结果。[ Shirley W. Y. Kuo, *The Taiw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

[65] Richard Webb, "Wage Poli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ed. By Charles R. Frank, Jr., and Richard C. Webb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p. 215 - 258.

[66] Alic H. Amsd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Market: The Taiwan Machine Tool Industry Revisited”(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83, Mimeographed).

[67] Manuel Zymelm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industries*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80).

[68]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3).

[69] *The Economist*, July 31, 1982, pp. 1 - 14.

[70] 总资本形成也在增加,从1952年占GDP的15.4%到1980年的36.3%。后一个数据是当时的世界纪录;参见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1)。

[71]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2).

[72] Lundberg,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73] 同上, p. 300。

[74] Wang and Aphorpe, *Rice Farming in Taiwan*, pp. 10 - 11.

[75] Silin, *Leadership and Values*, p. 18.

[76] 关于韩国工业结构的信息,请参考 L. P.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关于韩国和台湾两方面的信息,请参考 S. P. S. Ho, “Small-Scale Enterprise in Taiwan”, *Staff Working Paper* no. 384(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1980)。

[77] 参见 Rueschemeyer and Evans, 本书第二章。

[78] Silin, *Leadership and Values*.

[79] Clough, *Island China*.

[80]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Yearbook*(London: Taylor & Frances, 各个年份)。

[81] Clough, *Island China*.

[82] Ho,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83] 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69 - 1978*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

[84] Brian 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Scriber, 1976).

[85] Denis Fred Simon, "Taiwa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86] Frederick Engels, *Anti-Duhring*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p. 202 – 203.

# 四 国家结构与国家以凯恩斯主义应对大萧条的可能性

## ——以瑞典、英国和美国为例

玛格丽特·韦尔

西达·斯考克波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横扫西方工业民主国家，破坏了公共财政领域经典的自由主义教条。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开始质疑那最重要的信条，即政府应该平衡其预算、维护金本位制度，然后让商业在经济低迷时期自动回复到平衡位置。人们开始要求政府代表工人、农民和其他遭遇不幸的人们采取特殊的行动。原有的政治联盟开始解体，政治家和政党们也就有了新的机会设计应对时代危机形势的措施，并以此来吸引民众的支持。此时最大的困境之一是，如何解决突然的严重经济萎缩所引发的空前的失业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的困境在政治实践和经济理论上都催生出了新的理解，即国家今后应该扮演一种更加积极的角色以维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增长和就业。这就是“凯恩斯时代”的由来，因为它可以回溯到经济理论史上那个骄傲的突破性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 1936 年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然而,各国对这场大萧条危机的反应不一而足。<sup>[1]</sup>许多国家或者保守不动,或者转向流行的威权主义。而在那些避免了民主制度崩溃的国家当中,瑞典和美国的改革型政治家们做出了最勇敢的应对。受产业工人和农场主选民的支持,美国的新政和瑞典的“新政”[布贾尼·布拉托伊(Bjarne Braatoy)在1939年如此称呼]都采用赤字财政项目提供紧急救济,通过公共工程创造就业岗位,同时扩大民众的社会保障覆盖面。<sup>[2]</sup>

不仅如此,瑞典和美国还发展出了逻辑完整的经济观点来支持政府扩张开支的行为,将这种行为合理化不仅是一种对危机状况的人道主义反应(老一套说法),而且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适当战略。起初,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是或明确表现为“凯恩斯主义”,但它们的确在关注能够通过政府赤字开支刺激消费者需求、私人投资和再就业的方法。<sup>[3]</sup>在瑞典,这类经济观点被当作一种处理危机的全国性政治战略而更加迅速和彻底地获得了认同。在美国,只在20世纪30年代末才设计出一种谨慎的借用赤字财政的复兴战略,而且这一战略事实上在新政期间并没有予以充分实施。<sup>[4]</sup>

的确,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突破最终在两个国家确立的制度也大相径庭。自1936年起,瑞典一直努力想成为一个将高水平的公共收入配置给社会福利的、充分就业的经济体,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也达到了这一目标。瑞典不仅采用凯恩斯的宏观管理和公共福利方法,同时还通过干预劳动力市场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sup>[5]</sup>与此同时,从1938年到1946年间的美国实践,不是瑞典式的“社会凯恩斯主义”,而更适合称之为“商业凯恩斯主义”。<sup>[6]</sup>这是指联邦政府通过减税和公共开支的“自动”(而不是政府自主决定的)调整来管理经济,其政策目标更注重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消除失业。<sup>[7]</sup>的确,在美国,联邦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比20世纪30年代以前要增大了许多,但美国国

内公共开支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和产业干预也并没有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效结合起来。<sup>[8]</sup>

尽管最终的结果不同,瑞典和美国的确都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应对大萧条的改革策略。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英国本来可以成为最早和最成功地实行“新政”的国家(指利用凯恩斯的经济战略巩固一个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毕竟,在为工人阶级建立全面的公共社会保护方面,英国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先行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领导人就设立了工人的赔偿金制度、养老年金制、健康保险,而且最了不起的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制失业保险计划,该项目到战争接近尾声时,实际上已经覆盖到了整个产业工人阶级。<sup>[9]</sup>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大规模失业在英国一直就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1929 年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同台竞争的目标都是要解决失业问题。<sup>[10]</sup>凯恩斯本人大力支持的自由党的竞选策略,就是号召通过政府借债建设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自由党宣称:“我们能够战胜失业!”在工党最终赢得 1929 年选举并组建少数派政府之后,也正是大萧条开始之时,自由党和凯恩斯给这个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既提供了赞成实施此类项目的议会,又给予了智识上的支持。几年之后,在 1932—1934 年间,正是对失业问题和全国经济萧条的反应迫使瑞典向一个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转型,而且为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确立了持久性的政治霸权。

然而,英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创新局面。1929 年,工党政府在迟疑不决中度过了痛苦的两年,它试图对自己的政治基础削减社会开支却归于失败,于是不得不在 1931 年 8 月下野。此后工党分裂,其政治地位也急剧下降,自由党人则从此近乎销声匿迹。1931 年,一个多党的“民族政府”上台,实际上的主宰是保守党。该政权使英国摆脱了金本位体制,设立了多项关税,得意洋洋地坐上了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国家政体

的头把交椅；然而，尽管英国逐渐获得了强有力的全面经济恢复，其失业率却始终居高不下。<sup>[11]</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没有采纳凯恩斯式宏观经济战略；一直到那场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英国才对其公共社会福利实行改革与扩展，并最终发展成一个全面的“福利国家”。<sup>[12]</sup>

### 解释各国对大萧条的反应之不同

为什么瑞典和美国会设计出大体相同的应对大萧条经济危机的政治措施？又为什么，尽管二者的改革反应相同，但最终瑞典发展成为社会凯恩斯主义，而美国却走向商业凯恩斯主义？为何与瑞典及美国的“新政”相比，英国却未能用创新的方法来应对这场大萧条？

这些历史问题都会在本文中得到额外的关注。但我们的论证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目标。我们希望能够证明一种特殊的解释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特别强调国家的结构特征和先前的公共政策遗产。我们尤其会重点分析瑞典、英国和美国所具有的不同国家结构和政策遗产，是如何对那些在政府应该怎样处理萧条困境这一问题上积极进行政治斗争的集团和政党的政治倾向和能力产生影响的；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思想创新和专家参与决策中枢的过程的——通过这样的过程，新的经济理念能够（或未能）融入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政府战略的形成过程当中。

但是，在分析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目前已被用来解释瑞典、英国和美国模式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视角。<sup>[13]</sup>在解释清楚我们何以认为当前的这些分析视角存在不足之后，我们将勾勒出自己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理论框架，并随后应用于实证分析。

#### 经济条件与国家的反应

我们可以将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先放到一边，这种观点乍

看上去似乎能够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事件做出一种合乎常理的解释。纯粹的功能主义和物质主义视角可能会试图从大萧条对具体国家造成打击的严重程度来寻找 30 年代政治改革的范围,这种视角认为危机越深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更具有创新性。然而,正如图 4.1 和图 4.2 所揭示的,在我们所举的三个例子当中,美国是受萧条打击最重的国家,而尽管瑞典和英国所采取的政治措施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比美国恢复得更快和更稳定。瑞典的恢复政策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末期,比英国和(尤其是)美国的恢复都要更加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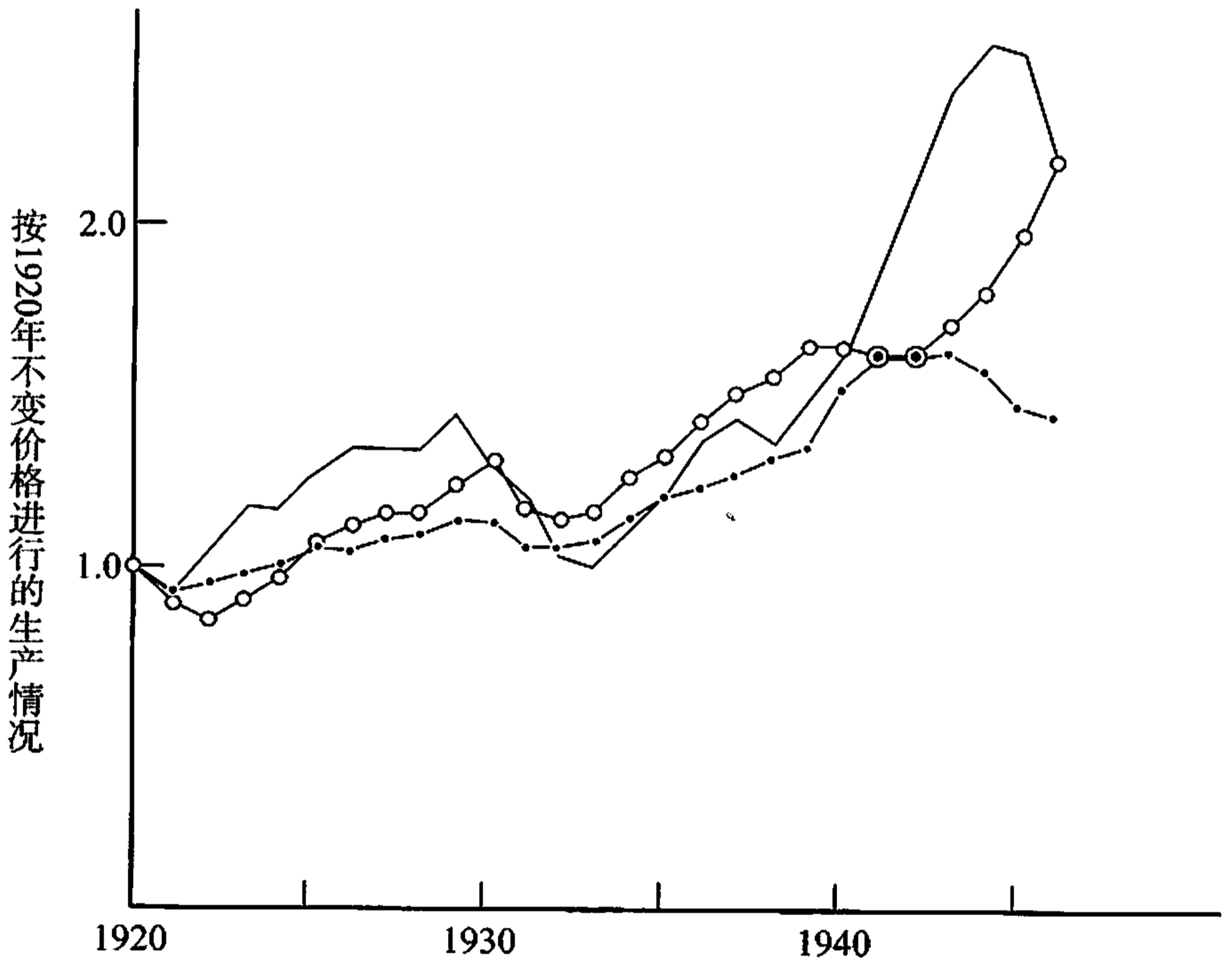


图 4.1 1920—1946 年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全国生产状况

瑞典:国内生产总值 ○-○-○;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1, Washington, D. C., 1975, p. 224; B.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 - 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89 - 79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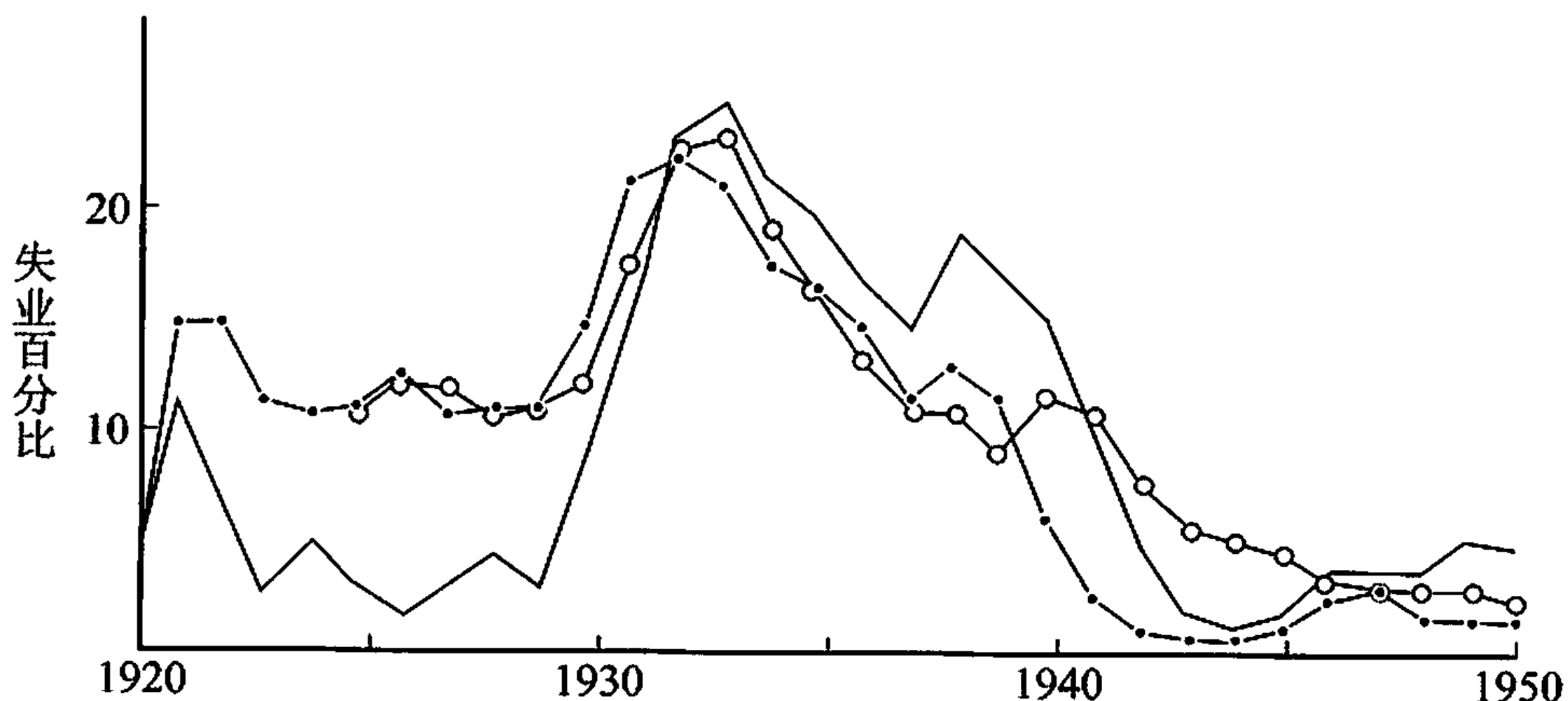


图 4.2 1920—1950 年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失业百分比

瑞典：享受失业补贴的工会人数比，○-○-○；英国：1920—1923 年间是工会中的失业人数比，1924—1950 年间是注册了保险的完全失业人员每月平均比，●-●-●；美国：14 年以上国内劳动力失业年平均比，——。（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p. 224；B.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 - 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89 - 790.）

对所有这三个国家来说，很难直接将其经济恢复或倒退的各个阶段归结为政府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我们无意对赤字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或环境相比较下的实际效果做出任何评论。<sup>[14]</sup> 经济史学家并不赞同我们选用这三个案例或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其他国家案例来分析这些议题。而且，大量的当代和历史证据显示，政府政策有时并非是要获得经济上的实效而只是要寻求政治上的成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各个国家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开始从经济衰退的深渊中恢复时，当权的政府和它的政策都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尤其是如果政府及其政策看起来已经和经济困难进行了积极的抗争。但是，对理解英国工党政府为何一直犹豫不决致使最终陷入僵局而在 1932 年英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前过早地下台这一现象来说，上述说法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

## “工人阶级的力量”：对现代福利国家的一种分析方法

也许今天解释发达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之间政策差异性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就是强调政治性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力量。整个 20 世纪对社会经济的公共干预增强程度的差异性，被解释为产业工人阶级对抗资本家阶级并争取自身利益的能力问题。<sup>[15]</sup> 这一立场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提出来的，据说福利国家(最终是凯恩斯式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兴起和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就是具有集权式协调特征的产业工会，它们通过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进行运作。<sup>[16]</sup> 这种政党通过选举政治获得政权，然后利用政府权力实施福利倾向的政策。商业利益有可能会被“引导”到支持这些政策，但从根本上说——该观点继续指出——这些政策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资产阶级更强大的工人阶级的产物，而工人阶级之所以更强大，主要是因为工人们能被更好地组织并动员起来，充分利用选举的民主。

显然，这一模式能很好地解释 20 世纪 30 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上台，瑞典因此走向了利用高水平的公共开支促进社会福利和充分就业的道路。<sup>[17]</sup> 同样，它也能用来解释美国新政为何没有发展出彻底的社会凯恩斯主义，它可以说这是因为美国的产业工会长期以来就比瑞典的工会弱小，而美国的商业集团势力顽强而持久。<sup>[18]</sup> 但是，在我们看来，把瑞典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归结为是工人相对于资方的力量因素，必然是那种极端信奉零和主义并对 20 世纪 30 年代所发生的那么多变动不居的事件持高度目的性立场的人。而且只要把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发展引入比较的范畴，上述观点立刻就会相形见绌。

对与瑞典相比较的美国来说，采用工人阶级力量的分析方法会将最终的历史性结果推回到原始的因素上去。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初,瑞典的产业工人的确是比美国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他们组织成各种产业工会和一个政党,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工人也取得了重大的组织性成就。产业工会迅猛发展,而组织起来的工人对民主党的影响也变得极其重要。<sup>[19]</sup>但随后工人力量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戛然而止;当然,对美国公共政策随着新政改革主义的终结而转向保守这一点来说,这一因素肯定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我们也不能把美国新政最终没有发展出社会民主式凯恩斯主义,直接归结为美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从30年代中期到末期,美国商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处于历史的最低点。<sup>[20]</sup>因此,就商业影响力在公共决策(包括应用凯恩斯主义理念)中的反弹这一现象来说,相比于替代性政治力量的缺失,商业利益集团自身的实力与主动性也同样地重要。

那种假定组织良好、政治影响力强的商业集团,其本质上必然反对那种象征着为社会福利目的而采取高额财政支出的凯恩斯式项目的想法,无论在何种事态下,都是非常错误的。所有类型的凯恩斯式战略都是把全国经济看作一个整体,其目标则是通过扩张经济,使得所有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从而缓和集团之间或阶级之间的冲突。<sup>[21]</sup>事实上,瑞典的资本家长期以来就组织良好,并且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式组织基础,尽管他们不会催生瑞典的充分就业型福利国家,但他们是政治谈判过程中的一分子,正是这种谈判使得瑞典的福利国家模式自30年代后期以后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sup>[22]</sup>

在大萧条时代,瑞典的公共政策的确是极大地加强了劳工阶层的组织性力量和团结程度,并因此而壮大了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sup>[23]</sup>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不能把事情的结果解释为其原因。回看20世纪3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并不必然地会采取它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当时如果是其他党派争取到了主动,或者像英国那样围绕更加保守的政策而出现政治僵局的话,可以肯定,瑞典产业工人的组织

性力量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实力将会被削弱,而不会因大萧条危机及其政治后果而得到增强。

就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提出一种改革性的公共支出战略的能力和意愿来说,有其特殊的因缘。<sup>[24]</sup> 其特殊性并非该党阶级基础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只要与英国的工党相对比就能看得很清楚。<sup>[25]</sup> 拿 30 年代的这两个党派进行比较当然是合适的。尽管这两个党注定了在 30 年代之后会前途殊异,但在 20 年代,这两个党在主要方面的境遇都基本相同,只是由于各自所处环境的不同,对彼此优劣势的影响而各异。<sup>[26]</sup> 英国的工党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发家于相对较强的工会运动,并且都有较高的选举(主要是工人)支持率。<sup>[27]</sup> 的确,社会民主党是瑞典的议会第一大党,而且是 20 年代瑞典四大政党中实力最强的党派;相比之下,英国的工党,英国议会政治中的后起之秀,1929 年以前一直都是落后于保守党。<sup>[28]</sup>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无法组建多数派政府,而且在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这两个党都面临着更为保守性的政治力量的坚决反对。

用议会中的行话来说,英国的工党于 1929 年上台之后,立刻就在推动赤字财政式经济恢复战略方面具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当然,这两大党派都受到工会领袖以及工人阶级选民的压力,要求它们为解决失业问题而采取大胆的措施。然而,当 1932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少数派身份组阁后,就不得不与代表农民的农业党(the Agrarian Party)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一种微妙的妥协(从社民党的观点来说是不完美的),这样社民党才得以推动其重视失业问题的社会工程提案。<sup>[29]</sup> 相比之下,1929 年(及其后)的英国工党却得到了自由派的充分支持,得以利用财政借贷资助公共工程来应对失业。<sup>[30]</sup> 工党不需要对农业利益做出让步,这是因为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英国,农民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分量都极其微弱。<sup>[31]</sup> 的确,考虑到英国社会结构中通常都是



产业工人阶级占据极大的比重,而且世界上最广泛的公共社会福利最初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起始于英国,从“工人阶级的力量”模式的假设出发,我们很容易推断,英国而非瑞典将是最早也是最全面地采取凯恩斯模式应对大萧条的国家。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充分解释公共政策的发展的话,第一个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应该出现在英国。

### 部门联合及其与国际经济的联系

近来,对阶级分析法宏大概念的不满催生了一种更复杂(也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法,该方法将政治产出与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这些我们称之为“经济联盟论”的分析家们试图寻找商业内部由部门属性所主导的利益性联盟,这种联盟或者与农业部门相关联,或者与有组织的产业工人相合作。<sup>[32]</sup>而利益定位则通过辨别行业及企业相对于劳动成本和技术水平的位置,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国内外市场的位置来确定。依照行业和企业对开放式国际贸易的态度以及不同商业部门对于向劳工做出工资和公共福利上的让步的宽容程度的不同,这些跨部门的联盟会偏好并支持政府的某一类经济政策。

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和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就用这种联盟方法来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弗格森毫无疑问是一位遵循将政治事件归因于其背后的商业影响的这种特定的美国“比尔德式”<sup>①</sup>传统作家,他在解释“第二次”美国新政时特别强调来自国际化、低劳动成本的商业部门领导人的影响力。<sup>[33]</sup>古勒

---

① Beardian: 比尔德式,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比尔德,其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开创从经济基础来分析美国宪政结构的先河;此外,比尔德在1934年出版的《国家利益理念》(*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一书中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安全利益而是经济利益。因此,比尔德的方法在美国也成为从经济基础来分析政治或政策的代名词。——译注

维奇的关注更为广泛,而且没那么强调商业领袖的魔力。他试图在瑞典、美国和德国都找到同样的企业—农民—劳工联盟。<sup>[34]</sup>毫不顾及德国在魏玛时期民主的式微,以及在纳粹时代威权主义的强大这些与瑞典和美国持续的自由民主制度完全不同的背景,古勒维奇似乎要证明,在这三个国家,相似的社会经济联盟催生并支撑了赤字财政政策。对于与此截然相反的英国案例,他则强调,许多经济部门的利益都在于维持金本位制度和—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总之,他认为伦敦的金融家对英国政治具有支配权。

因为强调了现代诸多社会政策的正和特性,联盟分析法是对阶级斗争模式的一种改进。而且,因为允许对社会集团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别,联盟分析法能够突出公共政策决策的社会经济性影响,而这一问题从来都被那些高度重视产业工人的组织性力量的理论家们所忽略。尽管如此,联盟分析法还是有着严重的漏洞。一方面,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特定部门利益的政治影响力随时间而变化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在“一战”以前,英国“大城市”的金融势力不能阻止社会福利政策这类创举,而在1929—1930年却能够实现削减社会开支,阻止依靠财政赤字的公共工程的上马?答案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因为英国经济的国际化倾向,这种倾向在上述两个时代都同样强大。下文将要证明,财政部对英国社会政策的控制力的变化源自英国公务员体系结构自身的变革,而不是该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

联盟分析论者还可能会低估利益和集团联盟在政治上的易变性。对于特定的集团来说,总是有可能选择替代性联盟的,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该集团的“利益”也可能被重新定义。现有的国家干预模式和政治领导人的创新能力,通常会在一系列可替代的联盟组合中激活某些特定的利益和利益联盟。而且,在决定各种利益和联盟的影响渠道和力度方面,国家的制度结构往往起着关键性作用。下面通过

对瑞典和美国的“新政”中农业利益最终形成的影响力之殊异性的讨论,我们将证明上述观点。

### 凯恩斯《通论》的作用

对20世纪30年代国家恢复战略的政治分析的最后一种分析路径与前面所讨论的社会—集团模式的分析方向正好相反。一种知识决定论的视角认为,只有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发表了其相应的新经济理论之后,政府才有可能设计出赤字财政型战略。人们有时用这种论调来解释,为什么美国联邦行政政策的制定者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而不是1933—1935年“第一次”新政期间才有意识地设计出利用赤字的恢复战略。凯恩斯《通论》的前言和结尾所提供的处理模式可以被理论家们用来影响政策创新。“既得利益之势力,”凯恩斯写道,<sup>①</sup>“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被过分地夸大……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无论对错,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sup>[35]</sup>

对于那些通常被标记为“既得利益集团”影响力的被夸大现象来说,凯恩斯的判断的确是正确的;但是,他声称思想的力量是强大的,却并没有揭示与政策相关的思想是如何出现的,也没有说明这些思想可能会如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就凯恩斯自己的经历来说,其思想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曲径通幽,主要依靠他在学术界的先占声誉。在写作《通论》之前,凯恩斯花费了多年精力试图说服英国的

---

<sup>①</sup> 本处译文采用徐毓楠先生的翻译,由于本文只是部分引用,为了文意通顺故而略有改动。参见凯恩斯著,徐毓楠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译注



政客们实施新的实践项目,但很少成功。<sup>[36]</sup>这本书本身代表了凯恩斯这位公共活动分子的一种新的行动策略。首先,一种新的、高度抽象的理论将会说服学术型经济学家,克服他们“观念上的高度分歧……这种分歧状态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摧毁了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影响力,而且只有解决这一分歧,经济学理论才能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新的、被学术界所接受的理论将会极大地影响政治家及公务员甚至“煽动家们”的政策创新。凯恩斯觉得,在正常情况下,这种通过思想来间接影响(政策)的过程可能需要花费 25 或者 30 年,但在危机进程中可能会更快地发挥效力。<sup>[37]</sup>

正如克里·肖特(Kerry Shott)所言,“在这种预期之下,应用型经济政策通常会在理论提出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出现。这当中所强调的假设是……注意……国家只不过是其经济学家建议的积极应答者。”<sup>[38]</sup>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假定是,经济理论只在学术圈内自我发展,然后才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然而,尽管这种模式看起来很有诱惑力,尤其是对大学城里的学者们来说,但它却丝毫解释不了英国、瑞典或者美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发生的事情。<sup>[39]</sup>

在英国,无论是在《通论》发表之前还是之后,英国政府都没有采取凯恩斯模式来应对大萧条危机。无论是作为宣传家和政策建议者的凯恩斯本人,还是其所取得的伟大学术理论成就,都没能说服其祖国按照他的理念来设计经济恢复的战略。在美国,对《通论》原则的一种特定的学术解释,的确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渗透到了国家的政策制定当中,其过程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或公共资讯团体当中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的作用。然而,我们很快会看到,赤字财政型恢复政策原理最早既不是来自凯恩斯,也不是来自学术圈。因此,最初在美国得到学术界鼎力支持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所提供的政策处方并不是政治上最为成功的政策处方。最后,在瑞典,经济学家及其思想对



1930年代社会民主党的改革确实非常关键,但可以肯定,启发瑞典1932—1934年政策的不是凯恩斯的《通论》。支撑这些改革思想基础的影响过程非常复杂,并不是从一个“学术机构”到政府和政党领袖那么简单。

凯恩斯在其《通论》的简要附录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即有关知识的政治影响力这类社会学问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这些问题需要学者们对决定专家与政治家之间相互影响过程的国家内外结构进行更加认真细致的分析(这是凯恩斯本人及其后许多学者所重视不够的)。在下文考察瑞典、英国和美国的思想和政策发展过程时,我们会详细观察这种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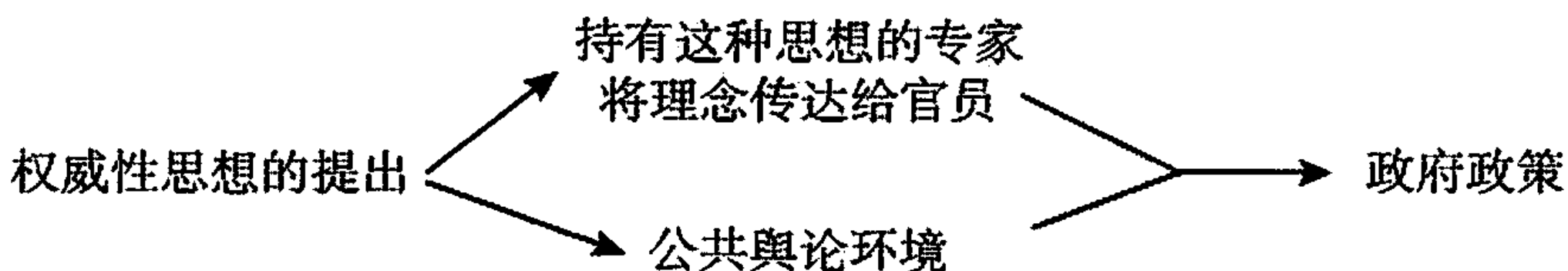
### 国家结构与政策发展

在前面回顾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政治研究的视角中,有两种视角——工人阶级力量分析法和联盟分析法——都将政治视为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策产出由社会当中相对直接表达出来的需求所决定:

来自社会的需求 → 某些集团或政党的目标 → 政府政策

这种视角下的政治就是阶级或集团利益斗争的平台,而政府则是这类社会性政治斗争所最终达成的共识、妥协或权力平衡的代理人。新政策的提出,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或结构转型时期,则可以理解为阶级力量平衡的改变或社会经济利益联盟变化的结果。

在前一节中所讨论的最后一种分析方法也认为,政策产出根源于非政府性环境,我们则理解为一种更加理想主义的模式:



尽管这两类视角差异很大,但其共同点是,不重视将国家视作政府官员自主性行为的潜在场所或者现有政策和制度的复合体。政治既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利益相互斗争的平台,也可以看作是那些试图理解形势和决定可以(或者应该)对当前形势采取什么措施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一种思想性对话。这两种理解政府的思路都有很多优点,但如果能够严肃地将国家视作行为主体或者一种结构的话,其分析效力就能大大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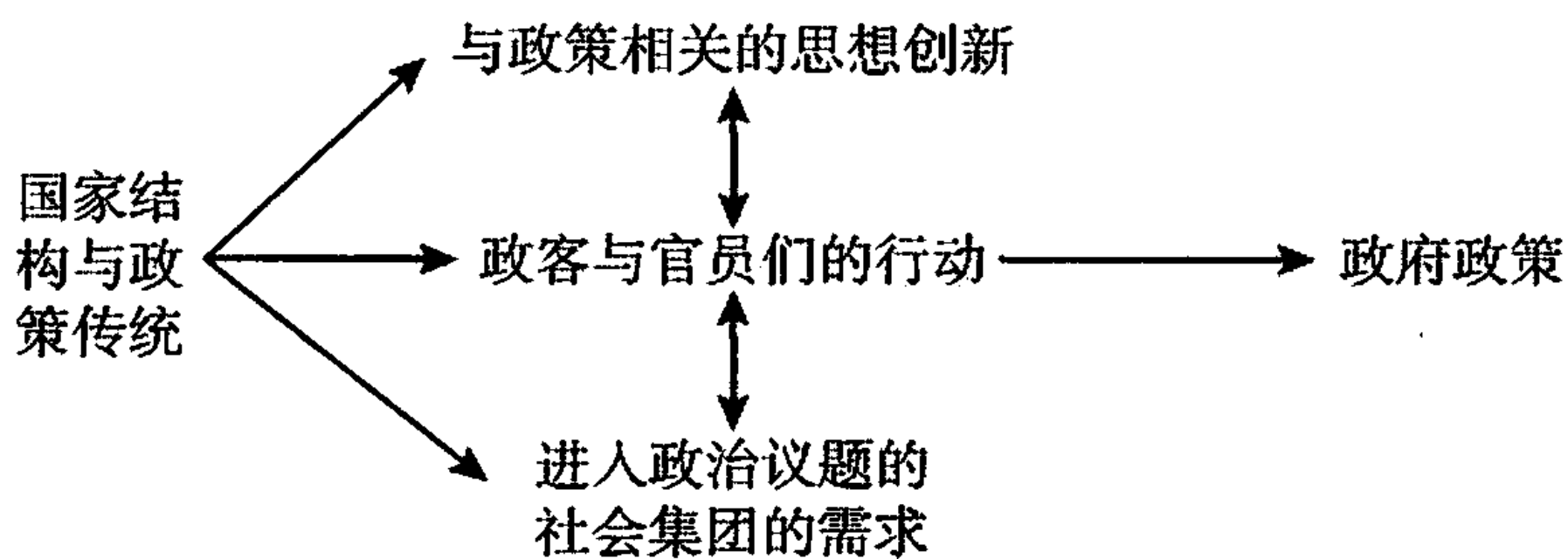
国家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影响政策产出的结果。其一,国家可以是官员采取自主性行动的平台,不可化约为任何社会集团压力或偏好的结果。这种观察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无论是任命型还是选举型官员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利益和职业利益,他们在设计或执行政策时只会进一步推进其自身利益,或者说至少不会损害这种利益。当然,选举型和任命型官员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国家所必须运行于其中的社会偏好和经济环境保持敏感。但是,政客和官员们同时还存在内部斗争,而且他们必须利用与经济相关或是能够动员起社会支持的政策行动来参与这种斗争,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借助(或者是考虑)他们所处的国家结构中所能动用的各种强制的、财政的、司法的和行政的能力。如果某个国家的结构不能提供现成的或者是可预期的“政策工具”以备采取某些行动,政府官员就不会去从事这些活动,而有抱负的政治家们也不可能提出有关政策来。反过来,只要现有的国家能力适合(或者经过调整就能)采取某些行动,以便官员们能在与竞争性政治力量的相互斗争中占据优势,政府官员(或积极的政治家们)就很有可能提出领先于社会需求并考虑充分的新的设想。

对本文所考察的历史话题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国家的组织结构会间接地影响到与社会中所有集团都相关的政治。这种影响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发生。政治科学家们早已熟知的是,能够(或未能)被各种

地位不一的社会集团用来影响政策过程的组织和策略事实上潜在地都是政府结构所塑造的,各种集团必须在政府结构之下进行运作。不仅如此,特定国家在行政管理、财政、强制力和司法等方面的安排,以及国家长期追求的政策,都会影响到集团或其代表们的观念,使其得以可能确立自己在政府行动领域内所想望的或最终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正是国家结构激发了社会行为主体希望通过政治来寻求满足的需求。

对于与政策潜在相联的现象颇感困惑的学者们来说,国家结构的重要性不亚于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现代国家与社会科学是共同成长起来的,这不仅是因为国家自身会搜集社会现实并设计出相应的理论,还因为为经济和社会福利之目的而增强的国家干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理论化工作。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各种具体的国家结构塑造了专家及其思想在特定时间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的路径模式。反之,专家们是否接触到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心的途径的这一现实本身,也会影响到社会理论和研究自身的发展。

我们可以用一个因果关系的模式来试着概括前面所阐述的复杂关系,在进行全面分析时,我们应该沿着前面提到的两个图解中所揭示的相互关系来探索这种因果关系。



上述图解模式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只能体现静态,体现不出历史性。因此,让我们接受休·赫克罗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即决策本

质上是一个历史的——也就是历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会有意识地继续或者反对在相同(或者类似)问题上沿用前期政府的做法。<sup>[40]</sup>这意味着,那些活跃于政界的集团、政策智囊以及政治家们,绝不可能轻易地忽略他们当前的结构性位置(不论如何定义“结构”)。相反,这些投身政治的人物必须考虑对先前的政策做出有意义的反应。这些反应会文饰这些汲汲于政治者在某一特定时候为自身定义的利益和理念。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我们将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前后,通过对瑞典、英国和美国的比较,找到一种有关这些国家的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之差异性的合理解释。我们的解释将遵循这样的逻辑,即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国家结构和政策传统,影响了新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应用于政府政策创新的可能性,同时还影响到相互竞争的党派和社会集团的联盟的政策倾向和能力。分析过程将分为两步。首先,我们将分析瑞典和英国对待大萧条的不同的初始反应。然后我们引入美国,考察整个新政及其后果的相关特性,将特别强调与瑞典之发展的比较。

## 萧条早期的瑞典和英国:工党政府 遭遇大规模失业困境

为什么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 1932 年上台后就开始启动赤字财政公共工程,以此作为恢复全国经济和减轻失业压力的明确战略,而英国的工党政府在其早夭的 1929—1931 年执政期内却拒绝采取这一路径呢?

从前面考察过的现有方法来看,只有强调国际经济联系的联盟分析法指出了能够回答上面这一一目了然的问题的一个因果性因素。



1932年瑞典社民党上台之时,其国家早已是高度卷入国际贸易、放弃金本位制,因而为国内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战略打开了方便之门。但英国直到1931年才脱离金本位体制,1929—1931年之间的工党政府根本没有像瑞典社民党那样的操作空间——除非工党自己就致力于带领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历史表明,工党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在行将或者遁入保护主义或者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前的1930年和1931年,英国国内有不少政治力量呼吁放弃金本位制,当时的自由党人也愿意支持工党政府为实施债务财政公共工程而提出的一切必要措施。<sup>[41]</sup>而反过来,仅凭瑞典社民党可以从其国家早已放弃金本位制,并且刚刚摆脱对国际贸易的依附这两个条件中获益这一点,仍难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采取新的宏观经济策略以及如何采取新策略。

认为政策选择就是顺从经济形势的指令这种简单思想毫无意义,因为经济环境不会自动提供明确无误的指示,就算是在非常严重的危机时期也一样。我们对英国工党和其同时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迥异的策略选择之解释,主要集中于这两个民族国家的两个特点:一是,它们现有的政策对失业问题的态度,二是,它们允许经济专家参与政策决策的制度机制。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在这两方面,英国和瑞典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将这些差异综合起来考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同时都是由以工人阶级为政策基础的政党所主持的政府,在面对萧条早期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时会采取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

### 社会政策遗产与政党倾向

即使当类似于大萧条这样的重大破坏催生出新的政治需求以及可能进行政策创新的机会时,政治上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仍会继续受到早期政府行为模式的影响。现有的政策会影响彼此竞争的集团和

党派的政治需求,而这些集团和党派通常会根据当前的实践来确定自己的行为选择。以前的干预模式也会影响行政官员和政客们的观念,他们会依此认定什么是可行的,因为某一领域所具有的行政能力无法轻易地改变以配合一套全新政策的实施。培养新的能力所需的资源与时机会妨碍进行激进的政策变革,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或许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此时的任何举动都会有快速的结果反应。在本节我们将看到,长期致力于推动失业保险的英国工党政治家们仍然只关注此类政府行为;而在瑞典,由于全国的公共工程都由一个保守的失业委员会来监管,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此问题上的长期斗争经历,也影响了该党对大萧条的反应态度。

1911年,由于自由党改革派政治家以及贸易委员会官员们的努力,英国引入失业保险制度,而“一战”后工党的新首相则将该项目迅速推广到全国绝大部分产业工人。<sup>[42]</sup>1911年,经过劝诱,各个产业工会也开始支持失业保险,他们的支持后来被继续引向取消受雇工人所要求的雇主雇员共缴制这一方向(未获成功)。英国的工党随着“一战”后选举制度的民主化而迅速壮大,它很快将失业保险问题作为自己的核心政策,而被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对这个问题起初最多只是谨慎地表示支持。<sup>[43]</sup>20世纪20年代,工党成为扩大失业保险范围并放宽限制的主要倡导者,与主张限制失业工人之资格以及偿付额度的保守派成为议会中的主要对手。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包括工党在内的全部英国政党,都在担心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sup>[44]</sup>在1924年的选战中,即将组阁第一届工党政府的领袖们承诺广泛建设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但真正当权之后,少数派的工党政府继续推动放宽对失业保险的限制,而很少顾及公共工程建设(尽管它也的确引入了一项房屋补贴项目,该项目具有福利和就业双重效应)。<sup>[45]</sup>这届政府在上台九个月之后即下野,随

后工党开始鼓吹放宽在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和内容两方面的限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警告说失业保险可能“腐蚀当前的政府并使他们放弃寻找补救的措施”,这一论断对倒阁后的工党仍然深具洞察力。<sup>[46]</sup>

在工党政府于1929年再次上台之后,其改革的重心仍然集中于失业保险问题而不是引入公共工程。<sup>[47]</sup>失业议题主导了1929年5月的这场选举,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大萧条,本特利·吉尔伯特(Bentley Gilbert)称之为“爆炸性失业”<sup>[48]</sup>(explosion of unemployment)很是恰当。1930年底,面对着全部受保工人中有19.6%的工人失业<sup>[49]</sup>的严重局面,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发现,与闯荡出一条官僚集团内部无人支持的新路径相比,减轻当前困境对工人之压力的更显见的方法就是扩大失业保险。由于在大型或集中管理式公共工程开支方面缺乏应有的经验,要启动任何类似的行动似乎在行政管理上都存在巨大困难。工党政府的领导人与自由党发言人就实施新的公共工程是否能够尽可能地缓解失业困境而争论不已,自由党人建议合作开展一项包括解决失业和阻止经济衰退在内的综合项目,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工党拒绝。

政府拒绝建设公共工程,英国工人能够借以抵抗大萧条之蹂躏的屏障就只有失业保险和政府“救济金”的微薄补充。由于没有任何有助于经济恢复的项目,这些福利也只是杯水车薪——这话即使不适合那些能够得到最多救济的工人,却是定可形容工党自身的,因为工党政府已然深陷“自筹经费式”失业保险计划在危机时刻所固有的矛盾之中。<sup>[50]</sup>一方面,党内后座议员(party backbenchers)<sup>①</sup>和英国工会联盟(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逼迫政府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并放宽其资格限制以满足经济危机时期的人道需求。另一方面,财政部官员

---

<sup>①</sup> Backbencher,指在英国议会中坐在后排席位的政党的普通议员,非政党领袖人物。——译注



严重警告政府,为充实几近枯竭的“保险”基金而采取的无节制借债行为将对英镑的坚挺地位造成灾难性后果。尽管不情愿削减福利,但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Prime Minister Ramsey MacDonald)却又感觉自己没有反复向政府借债的经济权限。

1931年英国首相决定听从五月委员会报告(the May Commission Report)中关于财政赤字的严重警告,削减失业福利;这导致工党内部分裂并加速了工党政府的下台。这为由保守党人控制的“国民”内阁(the“national”government)的上台铺平了道路;30年代剩下的几年都由保守派当政,从而独揽了摆脱金本位制后经济开始复苏的红利。当然,在英镑贬值和提高关税问题上,国民内阁在恢复战略上背离了自由放任训条,但其政策却也不是诸如凯恩斯这类创新型经济理论学家们的政策主张。事实上,国民内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自1931年后的九年内避免进行任何重大的政策创新,因此[按莫厄特(C. W. Mowat)的说法]“它就这样毫无建树地踟躇前行,直到1940年下台。”<sup>(51)</sup>

回看英国从开创现代福利国家到早期成长的全部经历,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英国的早期做法使得其后更难以向通过赤字财政公共工程统合“社会型”干预和“经济型”干预的方向发展。在大萧条之前,英国率先推动失业保险制度,并将该项目扩大为覆盖绝大多数工人的大型救济体系的举措,使得英国在政府提供失业援助方面成为全世界的先头军。但这种领先性成就也束缚了工党的行动选择,使其无法同等地考虑提供就业的其他替代性方案,1929年的一幅政治漫画就描绘了这一令人发笑的政治困境(图4.3)。

很显然,要发展成为充分就业型福利国家,并不能像诸多社会科学理论所暗示的那样一帆风顺。最先或者最快起步的国家可能并不是最早实现目标的国家。我们只要来看看瑞典从“一战”后到整个20世纪30年代处理失业问题的举措就能更加确认这一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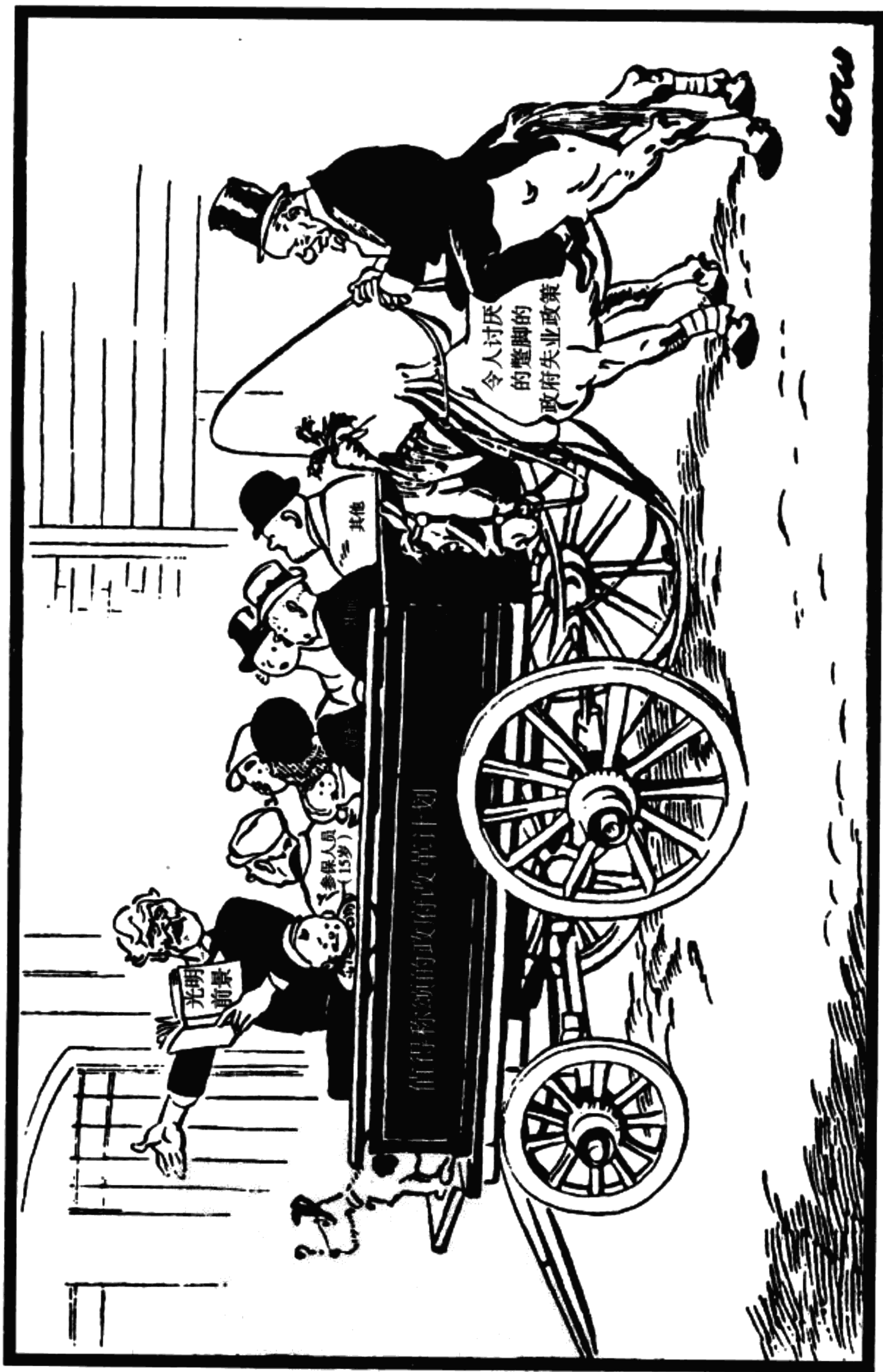


图4.3 本末倒置

图片来源：图4.3摘自《伦敦快报》（the London Express）。  
（Robert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The Labour Government of 1929-1931*. London: Macmillan, 1967.）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致力于解决失业福利问题。而瑞典的自由党人在 1914 年倒阁之前已经非常接近(但最终失败)取得其英国同僚推行失业保险所实现的成就。<sup>[52]</sup> 因此,当“一战”结束使瑞典像英国那样失业人数剧增时,瑞典并没有可供扩大覆盖范围的现成失业保险项目。和英国一样,瑞典政府对战后失业问题采取的措施因袭了旧有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套路,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一个全国失业委员会来管理救济性工程。<sup>[53]</sup>

瑞典全国失业委员会成立于 1914 年,最早是一个研究和咨询机构,但很快就开始负责为战时经济混乱的受害者提供救济。因为这类救济并非保险性质,因此地方在执行时往往要求受助方以工作来换取救济,在失业集中的地区,委员会还亲自建设专门的就业项目。失业委员会的工程项目所提供的报酬要远低于市场工资,但这些项目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瑞典长期性失业提供了解决之道。慢慢地,失业委员会又扩大其行动范围,加强了对地方项目的控制,而且像瑞典许多行政机构一样,设立了多种日常政策,同时这些政策没有受到在政局动荡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中频繁更迭的政府之干预。

我们能够理解,在与失业委员会相较量的过程中,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必然形成了其自身的许多需求,而且发展出了关于如何处理失业问题的理念。和英国的工党一样,在激烈的全国政治竞争中,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也因“一战”之后选举权的民主化而受益。与英国同僚一样,社民党人也担心失业,而且他们发现,与其推行新的替代性政策,不如调整现有的国家项目更加可行。因此,尽管社民党游说政府补贴工会所管理的失业基金的行动遭遇失败,但当他们自己上台后,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以应对工会对失业委员会的抱怨。但他们并非一上台就能改变委员会的做法。在 1923 年和 1926 年两次与失业委员会的辩论中,都是社民党组阁的少数派政府拜了下风。<sup>[54]</sup>

由于持续失业,整个20世纪20年代社会都在关注瑞典的工人和工会,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长期面对如何应对一个早已积极于这一问题的国民政权的挑战,而该党及其支持者对这一问题的考虑都欠周详。1928年赞成实施激进的遗产税的政纲失败后,社会民主党开始起草一个新的政治纲领,目标是提高其选举声望,使该党摆脱前期社民党政府无能的形象困扰。<sup>[55]</sup>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政党领袖,恩斯特·魏格福斯(Ernst Wigforss)成功地推动了以普遍工资施行公共工程的计划。这些计划直接回应了工会对现有救济项目之工资低于市场比例的关注。当社民党用一个新的、永久性机构(该机构负责规划地方和全国性公共工程)来替代失业委员会时,它再一次遭遇了其短暂的参政期内所遇到的挫折。

就这样,通过与瑞典政府现行措施的重要沟通以强调失业工人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应对经济萧条之战略的核心提案于大危机来临之前完型。瑞典与英国案例之相似性和差异处都是令人惊叹的。在英国,工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在与一个负责管理为失业工人而兴建的公共工程的全国性机构就失业问题相竞争。斗争双方都只是对其国民内阁曾采取过的处理失业问题的手段及其影响简单地应对了事。

尽管如此,工党在公共工程上的努力比其前期就个人接受失业福利的具体条款所采取的行动,要更加接近于原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战略。这不仅仅是因为公共工程在全国性条款中更容易概念化和得到认可。同样重要的还有,在瑞典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热衷于政治的人们更容易相信在危机时期通过政府赤字资助“有用的”公共工程是合理的。因此,在缺乏失业保险制度的情况下,瑞典的社民党之所以会比英国的工党同僚更愿意接受公共工程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这种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 国家结构、经济专家和政策创新

如果瑞典的社民党在上台执政时早就准备好改革公共工程,那么我们仍需要思考为什么它们能够将改革后的公共工程纳入一种融合国家经济复兴与失业救济的复合战略。毕竟,在萧条初期的瑞典就和在英国一样,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来广施公共工程对于保守派舆论领袖来说无疑像是一种诅咒,因此,对前面一直在讨论的为何社民党会选择这一路径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

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政府之适当角色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还很有政治影响力。主流观点认为,政府绝不应该试图去调整国内市场的“自我均衡”的运行机制,而应该通过基于金本位制的“硬”通货来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尽管有这类政治教条存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学界还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思想。<sup>[56]</sup>研究商业周期的学者们提出,公共开支在平滑经济波动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甚至还能促进经济摆脱衰退步入恢复。此期还出现了支持政府在管理货币和利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新观点。到20世纪20年代末,原始凯恩斯主义关于民族国家的经济职能的思想——都是些尚未系统化为逻辑一贯性理论的理念——经由极少数可敬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来,当然,其中就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本人。

要评价这些原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念为什么以及如何创新性地赢得或者未能赢得有能力推动这类政策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我们必须探究的不是某些个体或理论思想的存在,而是主要的政府机构对于创新性观点的发展和利用,到底持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态度。有效的方法是,我们必须考察政府平常与有学识的专家们合作的机制如何促进或者阻碍了经济政策上的创新。

如果政治上可行的新经济理念自身就是确定无疑的话,那么英国



就会是第一个采取新的宏观经济战略来应对失业的国家。早在1924年,凯恩斯就开始提出与主张降低工资和政府厉行节约的传统补救措施完全不同的观点。<sup>[57]</sup>四年后,随着自由党名为《英国工业的未来》(*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的“黄皮书”的发表,凯恩斯的思想在政治辩论中开始占据中心地位。在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将之作为其1929年竞选运动的主张之后,凯恩斯的非正统理论再次成为自由党宣传册《我们必将战胜失业》(*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中的主要论点,这本书在公众当中着实掀起了一股热潮。<sup>[58]</sup>利用政府支出以战胜失业的主张,在英国不仅得到了一个政党较早的支持和不遗余力的宣传,而且最终还吸引了几位工党政治家的赞成。其中最著名的有奥斯瓦德·莫塞利(Oswald Mosely),此人作为1929—1930年间工党政府的失业委员会成员,给麦克唐纳首相起草了一份备忘文件,支持一个增加政府开支以战胜失业的项目和一项关于工业合理化的长期计划。<sup>[59]</sup>

尽管有这些支持,但官僚集团反对创新性经济理念的力度和一致性,以及工党对失业福利政策的过分执著,仍然是阻止工党政府采取大胆的创新以应对大萧条的主要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官僚集团的阻挠行为,主要是因为其组织和思想上的束缚性,即其中的一个部门——财政部——笼络了英国内政部门中的其他所有部门。

在“一战”以前,贸易委员会的劳工部是有关劳工的一切事务(包括工资限制和社会保险)的政策创新中心。<sup>[60]</sup>特别是在1906年至1911年间,劳工部官员还能够得到自由党内阁的重视,与一直呼吁限制那些可能要求政府增加开支或扩张机构之新措施的财政部相抗衡。劳工部监察员良好的统计能力和新扩张的基层组织,使得这个不同寻常的部门能够创造性地提出英国的诸多福利政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劳工部一直在利用英国公务员管理中一个特殊的漏洞,从而将许

多职业专家和具有劳工问题处理经验的其他人员从内部晋升为该部门的高级官员。这些高级雇员将有关社会问题的新鲜视角带入政府，从而激励劳工部门在政策态度上明显不同于那些僵化保守的老级别的内政部门——比如地方政府委员会，它们往往直接从剑桥和牛津招聘官员，在晋升上采取年资制。

1916年英国设立独立的劳工部长，劳工部的自主权和地位也明显提升。但事实上，影响到作为整个公务员体系的战后行政机构重组，反而损害了早期有利于政策创新的环境，从而实际上抵消了新部长可能得到的较之于早期部门的那些优势。<sup>[61]</sup> 1919年，财政部常务部长成为整个内政部门的领导，从而拥有了控制政府一切部门中高级职员之职业发展的权柄。同一年还取消了允许内部职员晋升到高级职称的特殊规定，使得官员们的思想从此变得更加迟于变化。财政部进一步收紧了对其他部门的行政管理和人员开支上的控制，1924年之后，任何部门要求增加政府开支的提案都必须经过财政部的审核才能递交当时的内阁。经过这些组织性变革，官员们提出的利用政府行政权力或财政经费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新的试验性提案常常会胎死腹中，而且不会有再次提出的机会，因为官员们都清楚自己的职业前途取决于讨得财政部的赏识。<sup>[62]</sup> 于是，整个英国国家机器中弥漫的就是反对任何有悖于正统经济训条的政策创新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因此，当工党政府于1919年上台之后，尽管其首相和内阁官员是新的，但所听到的仍然是大小官僚们反对通过非均衡预算、新的社会工程和创新性计划来实现国家经济恢复的千篇一律的论调。在工党短命的执政期内，唯一可能给工党领导人的战略思考带来不同理念的途径，就是通过麦克唐纳首相于1930年设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当然，该机构完全是特设的，对于深陷困境的工党政府来说，它的出现已经太晚了。而且，这个委员会的设置

从总体上来说非常不实用。它遵循 20 世纪英国公共委员会的经典模式,几个部长大人加上各行各业的政府外人员:企业家、工会头目以及职业经济学家;但是不会包括政府的普通公务员<sup>[63]</sup>。

在这样异见纷呈的团体里是不会形成一致性观点的,正因为如此,该委员会(经凯恩斯推动)后来又在内部组建了一个由经济学家构成的小型委员会。凯恩斯和庇古(A. C. Pigou)是该专家组的领导成员。在 20 世纪 30 年代,该小组致力于逐步修正财政部可能为英国构想的经济政策<sup>[64]</sup>,但在 1930—1931 年间,就连这样一个经济专家组成的更易控制的小团体也无计可施,无法迅速改变英国决策系统内部特别委员会在实践上的低能状态。它也不能即刻培养出政府官员和政客们严肃对待“外部”专家的理念。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其经济专家组仍然被排斥在负责失业问题的政府机器之外,并被财政部长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视作对其控制财政政策之权力的威胁。<sup>[65]</sup>因此,无论有关国内公共投资、失业保险改革以及总体关税的计划是多么温和、建议态度是多么谨慎,都没有任何机构愿意为之引荐给英国政府。<sup>[66]</sup>令人颇感讽刺的是,似乎就是在经历这种挫折之后,凯恩斯才认定需要一套新的、完整的宏大理论来推翻“经济正统论”的主宰地位。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某些新的经济政策建议如此闭目塞听,《通论》可能根本就不会发表!<sup>[67]</sup>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财政部控制的政府的内部打压,以及自我封闭式日常运作的英国政府机构的有意躲避,那些关于可行性公共政策的新经济理念,尤其是那些呼吁建设公共工程、借助财政赤字的观点,根本无法被政府资助项目所接受。在这种环境下,除非工党坚持并明确认定自己的政治需求是一套对抗失业和国内经济衰退的大胆的、由政府资助的创新计划,才有可能绕过英国的国家机器和社会上相互争执不清的嘈杂观点、采行凯恩斯的新思维。但我们早已看到工党为何



会对失业问题情有独钟。总之，英国进入萧条时的社会政策传统和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英国政府对创新性思想的充耳不闻，似乎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929—1931年间倒霉的工党政府会错过一个将社会进步和萧条时期国家经济恢复战略相结合的重大机遇。

让我们重新回到瑞典，此时我们就会发现瑞典政府及其与经济专家的关系当中的一些重要之点，让我们借助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来观察这一点。托马斯是伦敦经济学院商业系的助理讲师，他在1933年至1935年间到过瑞典，与当地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进行过内容广泛的谈话。1936年，托马斯发表了《货币政策与危机：关于瑞典的经验研究》(*Monetary Policy and Crises: A Study of Swedish Experience*)。尽管托马斯的经济分析成果早已被超越，但他的许多更具社会学意义的观察至今仍熠熠生辉。托马斯强调说，瑞典政府具有一种追求相互协调的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的特殊能力，这是因为“瑞典银行归公众所有并对瑞典国会的银行委员会负责。”<sup>[68]</sup>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瑞典非常尊重职业经济学家。这些人在瑞典社会当中备受尊崇，这和他们在个国家(指英国)或者是美国所遭遇的怀疑或有礼貌的冷淡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意思的是，尽管(瑞典经济学家)……时常也会参与到政治的喧嚣当中，但他们的声望却丝毫无损。<sup>[69]</sup>

在给托马斯一书的序言当中，伦敦经济学院的休·道尔顿(Hugh Dalton)教授对此做出了一点解释：“自很长时期以来，那个国家(指瑞典)的经济学家就比别国的同行更接近实践事务，这对这个团体以及对公共政策都有好处。”<sup>[70]</sup>的确，有关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32—



1934 年间为何会推行赤字财政式恢复战略的回答大多都指向瑞典政府自前工业时代就开始的历史经历及其长久以来就存在的政治机制——即将专家、官僚和政治代表聚集到一起商议持久性公共政策规划的习惯。

除了议会制约王权的短暂时期以外，瑞典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早期都是一个实行官僚集权制的君主政体。<sup>[71]</sup> 17 世纪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 (Gustavus Adolphus II) 和首相阿克塞尔·奥克森斯滕 (Axel Oxenstierna) 建立了中央行政委员会，负责监督皇家任命的地方官员的治理政绩。因此，政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行政委员会主导性地位的影响。<sup>[72]</sup> 这些委员会分为各种互相独立的部门，参与政策制定，因而在长期政策规划中发挥很强的作用。而且，这些皇家研究委员会会不断地协商制定新的全国性政策，其成员则包括政府官员和主要社会集团的代表。议会常务委员会——其成员或是来自各阶层的代表，或者来自 1866 年两院制全国代表体系取代四级会议之后的国会两院——也会定期与国王的官员合作达成意见妥协并通过提案措施。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20 年代之间，瑞典很快就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君主制官僚国家转变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国。<sup>[73]</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实际上的联盟所领导的尖锐而非革命性的政治斗争，把瑞典逐步引向全民普选制和充分负责的议会制政府。尽管有这些根本性的变革，但公共政策决策领域的创新并未因此顺其自然地发展成为议会辩论模式。相反，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尤其是那些人选国会的人，连同各经济利益集团的领导人一起，被吸纳入瑞典这种融协商、咨议和政府主导为一体的根深蒂固的现代化决策体系之中。<sup>[74]</sup> 在新的民主政体中，由行政官员指导的顾问委员会和议会常务委员会继续存在。通过让教授、研究生和其

他研究人员直接参与政策调查项目,这些机构不断动员起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知识和技术。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就容易理解社民党的一个关键领袖恩斯特·魏格福斯及瑞典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对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失业问题做出审慎的政策抉择的。在短暂的下野时期,社会民主党于1926年任命了一个失业问题调查委员会,考察失业的原因及可能的补救措施。<sup>[75]</sup>恩斯特·魏格福斯和当时最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戈斯塔·巴奇(Gosta Bagge)均就职于该调查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典型的从容不迫的运转岁月中,魏格福斯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关于以普遍工资实施公共工程的新建议。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还“聘请了实际上是全瑞典的青年经济学家”,包括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阿尔夫·约翰森(Alf Johansson)、纳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和贝蒂·俄林(Bertil Ohlin)<sup>①</sup>。<sup>[76]</sup>在官方调查的支持之下,大量的经济学专著得以出版,而参与其中的一些较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学派”。<sup>[77]</sup>

经济思想史学界对瑞典经济学界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决裂的原因有过激烈的辩论。<sup>[78]</sup>一种观点认为,借助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所建立起来的瑞典理论传统,瑞典经济学家对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政府赤字作为经济恢复工具的可能性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分析高度。该观点认为,这些青年经济学家影响了恩斯特·魏格福斯的思想。另一种解释则认为,魏格福斯主要是受英国自由党和凯恩斯的启发,因而反过来,是魏格福斯影响了正在形成中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工作。然而,不管到底是谁影响了谁,有

---

① 这些都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而且这些经济学家都积极参与政治。其中缪达尔和俄林分别是1974年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马舍尔德曾任瑞典财政部副部长、瑞典银行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获1961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一点很明显，在1926年建立的委员会对调查和讨论的支持之下，许多重要的与政策相关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很有可能的是，魏格福斯和青年经济学家们都获益于对公共调查工作的参与。

全球性大萧条于1930—1931年席卷瑞典，社会民主党于次年赢得选举胜利，这为政党领袖与创新型瑞典经济学家们之间的继续合作并走向高潮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为设立新的中央银行以缓解国内通货紧缩铺平了道路。<sup>[79]</sup> 由于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失去工作<sup>[80]</sup>，失业对社民党来说成为空前紧迫的问题；于是瑞典国会也任命了一个新的失业委员会，其指导人物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的顶梁柱——缪达尔、俄林和哈马舍尔德。借助长期积累下来的研究和思想，该经济专家组与魏格福斯（此时的财政部长）紧密合作，共同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恢复战略。<sup>[81]</sup> 社民党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一些建议，兼顾人道主义和需求刺激型经济措施的合理化，呼吁通过借贷建设公共工程，从而可以按工会工资发放工人工资。该党长期以来一直考虑的改革公共工程项目以促进失业工人福利的设想，与经济学家关于财政措施很可能刺激国家经济恢复的理论，彼此相得益彰。

经过国会6个月的谈判，社会民主党所提议的一份计划获得通过。社会民主党和农业党之间最终达成的妥协被称之为“母牛交易”（Cow Deal）。（我们将在后文探讨瑞典的国家结构如何帮助达成了这一协议以及最后的工农妥协。）为了帮助农民，母牛交易案要求为农业提供100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还实施农产品价格保护。<sup>[82]</sup> 作为对工人失业的重视，国会通过了大批公共工程建设拨款。<sup>[83]</sup> 原有的失业委员会此时还在履行监督职能，但将所管项目发给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了普遍的市场工资水平。<sup>[84]</sup> 单独管理的新工程则按工会工资给付。令人颇感讽刺的是，1933—1934年间，建筑业工人一场旷日



持久的罢工拖延了公共工程提案的全面实施,但自1934年以后,新的公共工程得到更多的重视,从而获得了比失业委员会管理之下更为充分的资金支持。<sup>[85]</sup>

今天,多数分析家会认为,促使瑞典相对较快的经济恢复的主要原因,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赤字财政项目,而是瑞典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的及早复苏。<sup>[86]</sup>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论证,正是社会民主党的项目确保了维持一种出口导向型恢复所必需的国内条件。<sup>[87]</sup>1935—1936年,瑞典的全国生产回复到大萧条以前的水平,此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尽管瑞典的残留失业率与别国一样久病不愈)。<sup>[88]</sup>无论如何,20世纪30年代早期社民党的恢复战略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辨明其经济后果之困难,而在于其为持续的社民党执政所奠定下的稳定基业。而且,社民党结好专家,不断将后者请入政府任命的委员会,从而逐步扩大了瑞典政府的经济和福利职能。<sup>[89]</sup>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的瑞典国家政策和结构促使社会民主党在1933年提出了原始凯恩斯主义式的非凡的恢复战略。针对该国已有处理失业问题的措施,社会民主党不断寻找改革公共工程之实施过程的途径。而国家赞助的调查委员会这一独特的制度机制,使得经济专家、社民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能够——在大萧条发生的几年之前就开始——合力思考如何能够设计出政治上和行政上可行的、同时又是有理论依据的公共政策来抵抗大规模失业问题。当然,他们所设计出来的答案中同样也包含着不可忽略的个人的创造性因素,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瑞典的这种机制的确是在《通论》发表多年之前最好的、有助于形成“凯恩斯式”宏观经济战略思想的结构载体。

## 美国的国家结构与美国新政的局限性

如同瑞典社会民主党因为大萧条的来临而赢得选举一样,美国民



主党及该党内部由来自纽约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所领导的“新政”派也因此危机而受益。当罗斯福和民主党人于1932—1933年赢得全国大选之时,一场按照国际标准来说极具破坏力的经济危机,迫使他们采取大胆的联邦政府行动——包括空前规模的公共开支——来资助农民,减少失业并促进国家经济复苏。

为了应对这场严重而且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反复引发的政治压力,新政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下面将分节来讨论每一个阶段。<sup>[90]</sup>早期新政采取一种事实上的联邦赤字政策来资助公共工程和紧急救助,但并没有因此而启动一个明确的全国经济复苏项目。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即1938—1939年间,罗斯福才最终接受凯恩斯式的经济逻辑,认可为社会目的而扩张公共开支的理念。此时,自由主义新政利用体现了瑞典社民党目标的社会凯恩斯主义的术语而重新定义。但是,尽管有如此之多适合采取新政改革的条件,美国最终还是走向了商业凯恩斯主义。

在我们依次分析美国新政的各个阶段时,我们必须牢记大萧条在美国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利用全国性政府现有能力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争论,而且引发了美国联邦政府和行政部门内部有关实施前所未有的创新计划的斗争。美国过去那种主要通过国会中的权力交易而非总统主动推动全国性决策协调的、高度分权的国家结构自身,也在新政期内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英国和瑞典,不论地方行政当局还保有多少权力,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两国就都已建立起真正的“全国性”政府和政府体制。而美国新政时代则是集权政府建设和政治全国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对政府该在这两个方向上走多远而争论不休的时代。<sup>[91]</sup>

## 新政早期的双轨战略

到1932—1933年时,美国的大萧条无论在范围、深度还是持久性上,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早期的新政将权力托付给了一位积极的总统和一个急于扩大联邦政府主动性以应对这场危机的民主党。美国新政人士所面临的境遇更接近瑞典而非英国。与瑞典一样,农业仍然在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在1932年大选中,工人和农民也都同样支持政治改革派的力量。<sup>[92]</sup>同时还与瑞典一样,美国没有现成的公共福利项目用来缓解失业或是束缚民主党的视野,公共工程也是公认的处理失业率攀高问题的手段。

的确,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类畅销书的作者和大量的专业经济学家都在催促联邦政府增加公共工程开支以对抗失业和战胜经济低迷。1928年,两位大众作家,威廉·特鲁芬·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瓦迪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发表了其广泛流传的著作《通往繁荣之路》(*The Road to Plenty*),在书中,他们提出政府增加公共工程支出是管理储蓄与投资平衡的必要工具。<sup>[93]</sup>1932年,福斯特亲自面对参议院作证,呼吁提高对所有类型公共工程的拨款,增发公债“直到恢复就业和生产所必需的”程度。<sup>[94]</sup>而专业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毫无例外地要求按照“正统”的路径削减工资、保持财政平衡。根据罗尼·戴维斯(Ronnie J. Davis)的大量史料证明,当时有数十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来自芝加哥、哥伦比亚及许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们,都不断地向国会、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呼吁,实施财政赤字型公共工程。<sup>[95]</sup>这毫不奇怪,因为到20世纪20年代,对商业周期进行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对进行反商业周期行动或是政府主动扶植商业发展这些目标来说,及时的公共工程开支是众所周知的可行措施,在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前沿领域,学者

们的思考正在抛弃新古典的均衡假设。<sup>[96]</sup>

的确,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救济穷人和缓解失业也同样如此。<sup>[97]</sup>但是,到1932年时,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都在请求联邦政府帮助减轻其处理治下百姓之民生问题的负担。民主党政治家也有同样的倾向。因为此时地方财政已经面临崩溃边缘,而该党第一次连续执政12年,看起来很可以动用联邦政府的特权和资金。<sup>[98]</sup>因此,1932—1934年间,美国地方性政权不同寻常的普遍顺从态度使得全国性政府得以趁机从根本上扩张了权力,而且发展了新的职能。

但是,在“第一”新政期内,罗斯福并没有选择实施基于赤字财政的全国经济恢复战略(甚至在1935—1936年间的“第二”新政期内也是如此)。相反,在很多年里,新政是沿着两条明显不相协调的路径进行的。在一个方向上,也是政府意图最明显的路径上,新政的第一个全国恢复战略以及为了在美国创造一个永久性的联邦制福利国家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的主要特征,都是实行管制政策和自筹经费式干预。1933—1935年间的全国复兴总署(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十分重视管制企业行为。<sup>[99]</sup>1933—1935年间的第一个农业调整署(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则通过征收农业加工税来“实现经费自足”。<sup>[100]</sup>在罗斯福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坚实的”财政基础之上,《社会保障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在1934—1935年间形成并获通过,该法授权以向工人征税作为其今后享受失业和养老保险的资格。<sup>[101]</sup>

与此同时,联邦财政赤字从新政一开始就迅速上升,用以空前规模地支付公共工程和救济项目。<sup>[102]</sup>但这些开支都严格限于人道主义目的,并且被谨慎地划入“紧急预算”范畴,罗斯福及其财政顾问们还是竭力维持“常规”预算的平衡。而且,“预算平衡”还被作为衡量新

政成功的一个目标。只要经济危机状况有所好转,罗斯福就反复承诺,一切联邦政府开支都会通过税收实现平衡。<sup>[103]</sup>

要解释为什么新政如此固执地避免采取赤字财政式恢复战略,我们需要考察美国国家结构的形成历史。在19世纪,美国是一个“法院与政党的国家”。由于缺少公共官僚体系和纲领性政党,所以美国一直盛行这种政治组织形式,而这一传统也限制了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的能力。<sup>[104]</sup>

与瑞典、英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反,美国较早地建立了(白种)男人普选权,其时间在任何官僚制民族国家出现之前。<sup>[105]</sup> 尽管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更早而且更普遍地参加选举(事实上其对比程度非常明显),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集体利益却没有在全国性政治活动中得到直接的体现。由于在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白种男人普选民主制建立之时,尚无一个官僚制国家,因此在工业化初期,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由分肥制政党(与法院一道)主宰。竞争性政党在地方选区相互争夺工人的选票,通过种族宗教等认同将工人划分成不同集团,并将这种工人阶级内部的部分群体(subsets)与农民及商业集团联合起来。的确,对工人来说,组织有不少好处,尤其在地方司法方面他们会是稳定的多数派,但美国并没有出现一个主要的工人党或是社会主义政党通过纲领性的全国诉求来支持工会或特定的工人利益。

在新政出现之前,19世纪美国这种国家结构在几个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20世纪早期的进步党改革家努力削弱分肥制政党对公共政策决策的掌控,并在城市、州和联邦三级政府中创立专家主导型行政机构。<sup>[106]</sup> 但是,进步主义改革家并没有创建出典型意义上的能够将权威渗透到地方的全国性官僚体系,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反对政府财政支出权力的重大扩张。其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明确反对



任意支出式“腐败”，他们认为这是分肥制政党的特征，而他们的目标正是要打破这种分肥制政党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垄断。<sup>[107]</sup>而且，进步党的改革派官员的成就相当分散而不彻底，其成果的局部性和这个党在20世纪初期不断衰退的竞争能力反而扩大了美国整体国家结构中政治权威的分散化趋势。总统和国会联盟之间冲突不断，联邦体制下各级政府日益离心离德。<sup>[108]</sup>

主权的冲突、断断续续的行政改革，以及联邦的分权，全都影响了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与美国公共政策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确，“专家”第一次以重要身份进入公共决策领域，就是进步时代的改革家推动的，其中许多是社会科学家，随后的战时动员也扩大了学术专家进入联邦政府的规模。<sup>[109]</sup>20世纪20年代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喜好组织由专家主持的会议和顾问委员会。<sup>[110]</sup>然而，这类会议和委员会精心撰写的报告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常常会被忽视，尤其是那些呼吁增加联邦政府开支的建议。<sup>[111]</sup>国会里的权力交易在20世纪20年代仍居主宰地位，赫伯特·胡佛也没有提倡联邦政府的直接干预。<sup>[112]</sup>

瑞典的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参加政府赞助的调查委员会参与到公共决策过程之中；而由于缺少进入全国性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枢的渠道，美国的经济学家几乎无法为应对大萧条提出一致性的宏观经济干预战略。同时由于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们与决策的实践过程相隔离并且不可避免地被分散在这个国家大型的高校竞争体系当中，他们也难以组织起一个统一的思想流派，从而像瑞典的青年经济学家们那样用论证严格且相互支撑的替代性思想来挑战正统的假设。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似乎只有两个经济学家团体成功地使得政治行政当局考虑蓬勃兴起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理论创新。这两个团体就是“康芒斯学派”(“Commons school”)和一个农业经济学家联盟，前者由威斯康辛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组成，后者倾向于支持美国农业部

(USDA)及其下辖的推广局(Extension Service)的行动。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中期,这两个团体各自都促成了一个特殊的项目,并成为新政的一部分。威斯康辛学派推动了《社会保障法》<sup>[113]</sup>,而美国农业部的经济专家们则帮助新政采取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以及随后的农业规划行动。<sup>[114]</sup>但一直都没有相应的团体能够制定类似的全国性经济恢复战略。

基于美国国家结构的历史发展背景(即由弱全国性行政管理、分立而分散的公共权力,以及非纲领性政党所构成的美国特殊的复合体),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1932—1934年间的新政初期,联邦政府应对大萧条之困境的行动几乎是一团乱麻,它倚重全国复兴总署和农业调整署,但不能实行一致性的赤字财政式战略。在瑞典,集权式的行政政府和全国性议会政党致力于工人阶级集体所需求的充分就业,从而形成综合性创新政策。与之相反,美国既没有强势行政政府,又缺乏纲领性政党。但通过来自地方的国会议员和民主党政治家构造的“临时性”救济项目和公共工程支出,美国的早期新政还是凭借联邦政府对全国利益管制的低成本、渐进性扩张模式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不需借助任何公开重组阶级利益的政治项目,新政改革家就为一切阶级的个人或集团提供了某些好处。他们赋予联邦政府的角色是一个积极的仲裁者,通过管制一切集团内部的“非合作”因素而确保全国经济恢复的共同努力。

此外,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不用经过明确的计划永久性扩大联邦政府开支即预算赤字来完成。对于罗斯福和其他推动新政的改革派政治家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明智的经济策略,在道德上也能够避免永久性的财政扩张。要理解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看到罗斯福本人以及他带入华府的绝大多数重要官员(尤其是来自纽约州和威斯康辛州的官员),他们正好都是从进步时代的政治风浪中成长起来的人

物。对于这些反对“政治腐败”的政坛老手来说，“平衡政府”本身就象征着政府的诚实。<sup>[115]</sup>因此，由于早期克服分肥制民主和把美国创造为一个一定程度的管制而非任意挥霍国家的行动经历，使得成熟的改革派政治家们在入主华盛顿后开始处理经济危机时，不太可能产生有意识地利用赤字财政的想法。

### 新政后期实施社会凯恩斯主义的可能性

与英国工党相反，美国新政民主党人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都稳坐其位并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新政早期激进的人道主义改革使得民主党在 1934 年和 1936 年稳获多数党地位。但是，也不同于瑞典社民党的战略，新政关于全国经济恢复的初始项目并没有计划将经济生产和就业率尽快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围绕全国复兴总署而制定的恢复战略，甚至在 1935 年被判违宪之前就已经失败了。但这里不想讨论 1934—1936 年间的事态发展，我们来看看新政后期的发展，此时事态的变化有可能推动美国步入社会凯恩斯主义轨道。

事实上，在与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较方面，新政的最后阶段比早期阶段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在 1936—1939 年间，美国政治的阶级倾向空前高涨。产业工人的组织性力量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工会和自由派民主党的政策联盟也开始成形。<sup>[116]</sup>在这一大背景下，大量的因素直接指向采纳以社会凯恩斯主义计划作为经济恢复战略的发展趋势，即较长时段地以公共社会支出和宏观经济管理相结合来促进经济发展。

仅举一例来说明，到 1937 年已经建立了大量的联邦项目和机构，通过这些项目和机构增加财政支出就能很容易收到成效。<sup>[117]</sup>而且，特别是工程振兴局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早已建立了一个有关公共工程的全国性项目，可以作为进一步实施联邦政府干预



的基础。尽管 WPA 的项目都是地方所提,但华盛顿批准了全部申请。中央行政管理当局给每个州设定就业岗位配额,并且按月发放项目预算。地方官员将情况反馈给行政主管官员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后者负责监督各州和地方行政当局并提供建议,以保证他们遵从联邦的方针和目标。<sup>[118]</sup>从 1935 年开始,随着项目的进行,政府权力也日益集中。

尽管工程振兴局提供了一个可实施弹性的统筹支出政策的框架,但无论是这一框架还是其他联邦资助项目的设计初衷都并非某个明确的反周期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多年来,联邦政府内部的确是有越来越多的行政官员支持明确提出这样一种战略。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内部最早提出原始凯恩斯主义式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却不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经济学家。此人名叫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是犹他州的一位商人兼银行家,正式学历是高中。<sup>[119]</sup>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埃克尔斯就开始坚信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可以促使经济从萧条中恢复。1934 年,他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这一与众不同的观念也被带入了这一机构。埃克尔斯聘请了一位前哈佛导师洛荷林·居里(Lauchlin Currie)作为自己的助手,此人出色的外交手腕帮助埃克尔斯建立了与其他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而其娴熟的技术技能则最终在 1935 年发展出了一种关键性的新技术,即以月为基础计算“联邦政府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净支出”(net incoming-producing expenditure)。<sup>[120]</sup>就这样,埃克尔斯和居里两人逐步发展了一个具有相同理念的联盟关系网,准备结合经济和人道主义两方面考虑来游说总统扩大社会项目支出。<sup>[121]</sup>该关系网包括多位内阁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工程振兴局长哈里·霍普金斯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以及许多任职于行政部门的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简而言之,埃克尔斯和居里通过在新政政府行政部



门内部做工作,逐渐为美国发展出了一套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瑞典调查委员会所制定的融新经济思想与具体的可行性政策于一体的实施方案。

随着行政管理和思想领域的这些发展,国会内部的权力构成也显示出,那些支持农民和产业工人利益的人可能会合作推动持久性公共支出计划。在1936年第一次宣布农业调整署违宪之前,农场补贴来自对农产品加工的税收收入。该项税收被判非法后,农民们不得不通过国会中的权力交易来获得与他们早已习惯的农业补贴等额的年度拨款。由于在大多数事务上没有自主权,美国农业社团(American Farm Bureau)<sup>①</sup>领袖爱德华·奥尼尔(Edward O'Neal)只能呼吁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威胁这两大集团所期望之政策项目的“经济学弟子们”(economy boys)。<sup>[122]</sup>

最终在一个关键时刻,一直尊奉预算制度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开始接受用赤字财政来解决美国经济的持续萧条。1937年,经济的急剧衰退导致美国近1/3的工业停产,新政因此陷入严重的政治和思想危机之中。<sup>[123]</sup>赞成采取赤字政策的行政部门力促总统放弃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预算平衡思想。图4.4展示的当时《华盛顿星报》的一幅漫画,生动地说明了哪一方赢得了这一关键性的争论。在久虑不决之后,罗斯福终于听从了主张扩张支出者的建议,并于1938年4月宣布了一项高达65亿美元的联邦资助计划,其中超过20亿美元将来自货币杠杆,15亿美元将通过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的债务融资,还有将近30亿美元

---

① 是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AFBF)的下属非营利机构,各州均有。大陆翻译为美国农场局,参见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网站介绍:<http://www.nstl.gov.cn/htm/wldh/kjnrb.jsp?id=528>。由于该组织的非官方性质,并且为保持与第193页的脚注①相一致,本文采取台湾译法,译为美国农业社团。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大型商业化农场主。——译注

则是国会拨款,大部分将拨给工程振兴局和公共工程总署(Administration)。尽管国会中有人也曾试图对这些拨款加以限制,但经济衰退的现实最终还是压倒了这些人的反对意见。事实上,随着七个月后国会的改选,农业地区的代表要求附加等额配比拨款,因此最终通过的资金总额比罗斯福的提议还要多。<sup>[124]</sup>



图 4.4 变调<sup>①</sup>

图 4.4 C. K. Berryman 发表在《华盛顿星报》(the Washington Star) 1938 年 12 月 4 日版上的漫画。(图片来源:Dean L. May, *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The American Liberal Response to the Recession of 1937*.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1.)

<sup>①</sup> 英文“the sour note”,是一语双关,因为“note”既有“音符、音调、旋律”之意,又可解释为“纸币”。根据漫画中的文字,这里同时暗喻“政府扩张开支导致美元贬值”,因而又可译为“发霉的纸币”。——译注

在1938年这一政策转型之后,罗斯福和自由主义新政派继续相信政府支出是融合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手段,简言之即新政早期两大殊异路径的熔化剂。<sup>[125]</sup>罗斯福的1939年度预算和计划促使1938年经济在联邦政府高额支出下获得了预期的增长,从而有力地支持了继续使用赤字刺激国民收入增长。自1937年复苏开始之后,美国经济步入平稳发展,罗斯福政府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颇具分量的《工程融资提案》(*Works Financing Bill*),宣称其目标是推动经济繁荣发展。这一“借贷消费型提案”呼吁国会拨款30.6亿美元建立一个循环基金以资助那些能快速盈利的公共工程。<sup>[126]</sup>

而且,新政官员们思想上的转变,正发生在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于美国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大学扎根繁衍之时。有意思的是,美国学界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演绎使其较凯恩斯本人的原著带有了更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而且,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美国凯恩斯主义支持者经常公开地批评私人企业的特权,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政治上凯歌高奏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正在努力发展与瑞典资本家阶级的和睦关系。<sup>[127]</sup>

对此,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客观地评价道,“在英格兰剑桥奏响的……这一号角,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听得最为清晰嘹亮。哈佛便是凯恩斯思想步入美国的通衢大道。”<sup>[128]</sup>1938年,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从明尼苏达大学搬到哈佛,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对凯恩斯1936年的理论从一个怀疑论者脱胎成为忠实的信徒。<sup>[129]</sup>在哈佛,汉森将一个现成的研究生和青年经济学家团体启发入凯恩斯理论门下,这些人一度被称为“停滞学派”。这一流派认为,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公共财政投入,美国的私人投资很可能无法实现及维持一个充分就业并增长的经济。<sup>[130]</sup>在1938年的一本名为《美国民主的一项经济计划》(*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的小册子中,一群年轻的哈佛和塔夫斯(Tufts)经济学家就借用了这类思想中的一个流行版本,高声赞美自由主义新政及其对1937年萧条的明智对策。<sup>[131]</sup>该手册弥漫着不容置疑的反商业论调(antibusiness tone)<sup>①</sup>,号召增加公共开支,同时要求对美国经济和收入结构中的再分配进行结构性变革。

相比之下,汉森更显谨慎,从他在1938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发言中可以看出这一点。<sup>[132]</sup>但是,随着其本人及其弟子与罗斯福政府中的自由主义官员的联系日趋紧密,汉森的理论抱负和人道主义关怀对提高公共支出水平的要求显得愈发明显和尖锐,<sup>[133]</sup>因为美国的停滞学派凯恩斯主义绝不只是“象牙塔”现象。汉森同时任教于哈佛大学的经济系和新成立的李道尔(Littauer)公共行政管理学院,从1939年开始,其学生和追随者中进入美国政府重要行政岗位的人数相当可观。<sup>[134]</sup>汉森本人也于1939年向国会提供了一份著名的证词,成为重要的咨询专家。

因此,到1939年,“新经济学”的两大源流齐聚美国:以埃克尔斯—居里为代表的赤字财政官员,他们在联邦行政部门努力多年,而来自剑桥学界的新停滞学派凯恩斯主义则为他们提供着理论上的支持和启发。<sup>[135]</sup>反过来,借助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直到后来采用赤字财政应对1937年衰退的新政历程,学者们也寻获了一个能够证明其对凯恩斯主义的出色解读,并能支持其从中提炼出的政策结论的现实的世界。<sup>[136]</sup>

### 阻碍美国施行社会凯恩斯主义的因素

然而,尽管1938年以后的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要在美国确立融

① 指反对商业利益至上原则,核心是反对大企业的垄断。——译注



高水平社会支出于一体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模式,仅仅靠特定的国会支持、靠罗斯福政府官员的思想转型,甚至加上美国杰出经济学家们对凯恩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解读还是不够的。要理解是什么原因妨碍了美国施行社会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是如何使得社会凯恩斯主义模式制度化的。

瑞典有着中央行政指导的长期传统,其全国性议会党派也都拥有严格的党纲,因而“母牛交易”自1933年达成之后,社会民主党就能着手施行并且构筑其社会支出型战略计划。瑞典的公共工程项目尽管是由地方动工建设,但规划却是中央统筹,因为其地方政府早已习惯与全国行政委员会合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瑞典政府得以借由20世纪30年代的事态将原来的地方性职能收到了中央。举例来说,1934年社民党的改革目标就是将劳动力交换市场从地方转移到全国性市场,其手段则是加强中央控制、增加政府补贴并扩大市场运营范围。<sup>[137]</sup>而且,基于瑞典国会与政府领导人及行政部门相互合作的传统,1936—1938年间瑞典的预算规划改革也就相对容易进行。而且,公共委员会的形式虽然陈旧,但它却可以被社会民主党人反复用来设计有关社会开支、劳动力市场干预,以及宏观经济规划等新的内容。<sup>[138]</sup>

瑞典的行政和党派制度易于适应公共工程之实施,而且瑞典的政府运作也相对容易进行进一步调整以适应福利国家内涵的不断深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要在美国持续性地坚持类似的政策目标,则需要对联邦行政机构及其行政官员的角色进行重大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必然会引发政治上的争论。由于联邦政府在新政期间的快速扩张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受制约的方式,大量新设机构的实际运作多多少少都是彼此独立的,因此要推行任何基于社会支出原理的一致性的宏观经济战略,首先需要有更强的协调和控制能力。罗斯福在

1937—1938 年间曾试图让国会通过一项对行政部门进行彻底改组的计划,该项目的支持者就非常清楚上述缘由。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强总统制,使总统独揽“为实施……社会项目所必需的人事、规划和财政控制等多项大权”。<sup>[139]</sup>

联想到整个 20 世纪总统和国会之间就控制联邦行政当局不断扩张之权域而长期势同水火的情形,我们就不会再讶异,罗斯福要求重组行政部门的计划最后被包括不少平日支持他的自由主义人士在内的许多人解读为:一个夺权阴谋,目的是攫取国会的权威并颠覆国会委员会、利益集团和联邦行政机构之间精心培育起来的关系模式。<sup>[140]</sup>因此,这一改组计划最终被国会剜心剔肺之后才得以通过。该计划中最大胆之设想的失败预示着厄运的开始,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整个 40 年代,无论是制定政策规划还是进行财政协调,只要其方式可能有助于凯恩斯式宏观经济管理,或其目标是要建立促进社会福利和充分就业的,必然会持续存在的社会支出项目都困难重重。这一关键条款的失败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尽管一切努力显然都是推动美国的后期新政朝向社会凯恩斯主义模式发展,但既定的围绕国会而运转的决策渠道,却最终是美国进行行政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碍。

推动瑞典和美国的新政结果相异的原因,不仅在于引入并控制社会支出型项目的国家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同样重要的还有,20 世纪 30 年代两国政策联盟中的农业部门迥异的利益需求和政治能力。这些性质上的差异,与两国的国家结构和萧条时期的初始政策得以强化,两国各自包含农民在内的政策联盟的可能模式的途径,密不可分。

在瑞典,1933 年的“母牛交易”所代表的社民党与农业党之联盟,对于最初引入赤字财政战略处理萧条危机的行动非常关键。这一联盟实际上是瑞典政治史上一个全新的开端。究其原因,既有萧条危机自身的作用,部分也归于早期的社会变革对农业党选民基础的影响,

但这一联盟的确立和巩固,同时还离不开瑞典国家结构和政党体系的运作方式。

自1917年建党之后,农业党一直与右翼党派联盟,因为该党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自由市场和支持消费者的立场,害怕这会导致农村地区也出现高工资。<sup>[141]</sup>到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大农场主不断转投保守党阵营,而农业党领袖们的优先考虑也转向日益增多的小农阶级,对新型联盟的障碍也日渐瓦解。<sup>[142]</sup>当面临1932年英国和德国市场崩溃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时,瑞典的小生产者们转而求助于政府,要求其采取积极行动保护产品价格(但不限制生产本身),而资产阶级政党则不愿意这样做。<sup>[143]</sup>与此同时,农业党人仍在担忧农村的工资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则不愿意支持那些可能增加工人生活成本的政策。<sup>[144]</sup>因此,“母牛交易”从经济角度来说,并非必然结果;但它却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可能性。社会民主党如果没有其他议会党的支持便无法使其计划获得通过,而身陷困境的瑞典农民则发现鼓励消费和增加政府补贴对自身也可能是有益的。

瑞典的政策谈判采取一种集中性结构,包括社会集团和经济专家的代表在内的各方,共同争论什么才可称之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种结构促使农民与工人联盟这样一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且持久性的共同协议。对政府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们关于公共支出的福利效应的观点,强调了工人和农民可能从政府刺激型经济中所获取的共同、非零和性利益,因而促进了1933年协议的形成。而且,由于瑞典的议会制政党和政治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的,因此,在中央政府层面进行一种政策性政治谈判,是渴望摆脱萧条的农民所面临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同时也是农业党扩张其影响力的唯一途径。

这种形势到1933年之后仍然存在,尤其是工农联盟从政策的成功当中又获得了政治上的契机。尽管社会民主党政府在1936年执政



不久,就因为与农业党在国防和养老金方面的争执而下台,但社民党在当年的选举中还是取得了重大胜利,与农业党的联盟也进行了改革(这一联盟经过不断变革一直持续了几十年)。<sup>[145]</sup>社民党一直遵照1933年协议对农民给予支持;在1937年到1939年间,该联盟“发起了一项宏大的社会立法计划”,其中包括完善养老和伤残保险、强化劳动法规、免费的生育照顾、对大规模家庭的租金补贴,以及补助所有瑞典公民的牙齿保健。<sup>[146]</sup>

相比之下,美国民主党内产业工人和农业利益的政治代表尽管也联合赢得了1936年的大选,但两者之间的合作远不如瑞典社民党那么稳定。两大集团之间关于新政政策的矛盾不断加深,尽管农民原本很可能从增加的国内消费和政府的农业干预中获得很大利益,但工农之间最终还是没有形成稳定的联合;新政最终的结果是,南方那些精于商业并倾向出口的大中型棉农与境况较好但同时喜好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中西部种植玉米和小麦的农民联合了起来。这种跨地区联盟,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成形,其标志即为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sup>①</sup>(American Farmer Bureau Federation, AFBF)的建立;由于其广泛的地域代表性,该联合会在国会很有影响力。<sup>[147]</sup>该农业社团联合会不断反对凡丝毫有所损及现有农业生产者之利益的联邦政府改革政策,而汲汲于争取确保生产控制下的价格补贴,完全偏向其大中型农场主选民的利益,而不论其利益是立足于国内还是国际市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该联合会经常与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以及来自南方的民主党人合作,共同反对来自城市地区的自由民主党人的诸多

<sup>①</sup> AFBF:大陆有翻译成美国农场局联合会(见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网页介绍:<http://www.nstl.gov.cn/htm/wldh/kjnrb.jsp?id=528>),但根据该组织的非政府性质,本书采纳台湾的翻译,即“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见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http://tw.britannica.com/MiniSite/Article/id00001588.html>)。——译注



提案。

但是,在新政的早期阶段,这种包含农场主阶层的特殊联盟并不是注定会成为主导形式的。另一种联盟方式可能是工人、消费者与小农(diary farmer)、小型中西部粮农以及南部佃农之间的联合。事实上,全美农场主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可算是这一联合的一个弱势版本,该组织的政策常常表现出对继续实施联邦改革和国内支出战略的同情。<sup>[148]</sup>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新政最初的农业计划,尤其是通过第一届农业调整署和联邦农业推广局实施的生产控制政策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非故意的效果,即从组织上加强了全国农业社团联合会与南部和中西部较大型农场主之间的联系。该联合会与农业推广局联盟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联合会在南部地区的扩张,而在传统上南部是其力量最薄弱的地域。<sup>[149]</sup>为了便利联邦生产控制政策的管理,而对农业社团联合会的南部成员给予鼓励政策,农业调整署通过一个游说组织就缝合了美国大型商业化农场主之间的联系纽带;而这个游说组织,在1935年之后,却对农业调整署发起的农业规划项目,以及自由主义新政试图帮助贫农和佃农的行动,处处设置障碍。

尽管全国农业社团联合会所代表的棉花—粮食农场主的联盟对于在美国增加公共社会开支的支持度,远不如另一种包含农民的联盟方式可能的支持力度,但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此时商业农场主已经从萧条中恢复过来)对自由主义新政政策的反对立场却并非源于其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联邦补助。相反,是由于联邦支出所同时带来的政府控制,激起了最顽固的农场主们,尤其是南部的大地主的反对。1935年之后所推行的许多新政项目,特别是工程振兴局和农业安全署项目,使联邦政府得以入侵地方,而这些一直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地方势力范畴。许多在国会的南方代表与当地地主联系密切,

这些地主阶层已经主宰了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半个世纪之久。扩张中央政府权限或者将地方政府职能转交给华盛顿政府的建议,都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sup>[150]</sup>尤其是随着产业关系的剧变在全国的发展,南方精英阶层开始向罗斯福政府寻求保护,从而促进了联邦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罗斯福政府为数不多的针对黑人的政策建议,则有推翻现有的种族关系等级制度的危险,而这种等级制度无论对劳工控制模式还是对南方的非民主性选举政治来说,都具有根本性地位。

尽管农业地区的代表在国会中并不占据多数,但立法过程以及年资制度给予来自乡村和南方的委员会主席的控制权力,却使得组织完美的农业利益有足够的能量抵制与民主党的自由派达成任何形式的永久性妥协。<sup>[151]</sup>自20世纪30年代伊始,瑞典的农民便只有与产业工人和社民党通过集中谈判达成妥协这一种选择,否则他们就会被彻底挤出权力圈外。而在美国,农场主们,尤其是借助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而巩固了联合阵线的富裕的农场主们,从早期新政特殊的农业项目中获取经济利益之后,就再也没有兴趣与工人和国会中的城市派自由主义者签订长期性协议。尽管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作为第一届农业调整署财政基础的农业加工税无效,从而使得农民们不得不依靠国会投票来争取农产品补贴,上述情况仍是基本事实。甚至尽管国会中出现城乡协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二者之间最终还是没有出现稳定的政策联盟。农业利益的代表们可以就某些特定的立法建议与自由派达成特别协议,却坚决反对其他方面的同盟,并一直没有放弃寻求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合作基础。

国会中的保守派最初并不反对诸如增加联邦支出之类的政策建议,但他们坚持给联邦资金指定专门用途,并且附加其他限制以减少联邦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然而,1938年国会选举削弱了国会对罗斯福的支持,随后,罗斯福在1939年提出的《以贷促支提案》

(Spend-Lend bill)就被否决。<sup>[152]</sup>这一否决是国会反对总统所强力支持的新政重要支出政策的第一个重大标志。凯恩斯主义者本来还想着这类政策力度还不够大,结果连继续增大开支以支持自1938年开始的经济复苏的希望也因为这一挫折而化为泡影。总之,美国的权力的地方基础有实力而且美国国会有决心阻挠更强的联邦行政控制的制度化,这也成为妨碍美国在30年代后期构建一个全国协调的、永久性社会支出体系的两大主要因素。凯恩斯主义流派专家人数的增加原本可能提供的贡献也因而发生了偏离。尽管1938年之后,凯恩斯主义者遍布联邦各行政部门,但他们的成效有赖于在与其他行政官员的竞争中赢得罗斯福的支持,而他们也没有能力与国会中诸多的核心立法权威相抗衡。由于没有一个纲领性的政党,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行政能力,以促成一种支出政策联盟来进行规划和妥协,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在公共政策方面的成就已经无法媲美瑞典的经济学家,尽管两派中不少人的政策倾向都非常相似。

“二战”动员终于打破了新政后期的政策僵局,但冲突也只是被暂时性地往后推迟了。国会当中不断有人支持全国性社会支出和由联邦资助的改革项目,但反对联邦政府进一步扩张的保守性力量也在不断增长。在1939年通过的稀释版《重组法案》支持下建立的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NRPB),在战争期间成为吸引规划工作者和社会凯恩斯主义者的磁石。<sup>[153]</sup>该委员会提出的重要报告《保障、工作和救济政策》(Security, Work and Relief Policies)于1942年发表,展示了对各种救济政策的全面调查,并指出需要对此进行更大的协调和推动联邦社会支出规划。而国会对该委员会的态度几乎是三年后发生的有关充分就业问题的斗争的一次预演。在资源规划委员会存在的每一个年头里,国会不断增加对它的行动限制,而在其主要报告发表之后,国会终止了对该委员会的拨款,终



于迫使其解体。<sup>[154]</sup>

尽管国会中缺少对凯恩斯式社会政策规划的支持,但战后关于如何确保足够的就业机会的讨论,还是吸引了职业经济学家和普通公众,这反映出对战后出现重大萧条的普遍恐慌。1945年初,《充分就业提案》在国会亮相。<sup>[155]</sup>该法案基于凯恩斯主义停滞学派的理论和预期,提出通过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空缺。该法案开始正视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和永久性角色,并且从国会中的自由主义代表那里,从劳工运动及其同盟当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其命运则兆示了战后大部分时期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形态。

无论是在新政后期还是在与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的斗争中,来自南方和乡村地区的保守派都在国会中维持着权力平衡。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美国商会(U. S. Chamber of Commerce)以及其他企业组织对就业提案的反对立场,更突出了农场主和商业集团在限制联邦政府增长方面的共同利益。在国会中占据战略性地位的保守派,尤其是与商会经济学家合作密切的密西西比州众议员威廉·威廷顿(William Whittington),正是竭力取代并促使最终通过一项稀释版就业提案的旗手。<sup>[156]</sup>1946年的新《就业法》没有授权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确保充分就业;它只是允许政府监督经济并向国会提交经济计划。该法确立了一个新机构——经济顾问委员会,其权力只限于为总统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准备诸如年度国民生产和就业预算这类原本由《充分就业提案》初稿所建议的综合性规划。<sup>[157]</sup>

美国1945—1946年间关于《充分就业提案》的斗争,标志着自1932年罗斯福执政以来所上演之戏剧的落幕。那些在瑞典引发对大萧条的社会凯恩斯主义式应对模式的类似因素在美国一度出现并在20世纪30年代积聚起力量,但美国的国家结构最终阻碍了它们建构一种融社会支出与宏观经济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战略。反过来,瑞典和



美国新政的两种命运,也对危机过后商业重新整合入公共决策过程的方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瑞典,社民党的执政地位在1936年的大选中再次确立,促使商业集团与瑞典工会对正在兴起的瑞典福利国家模式让步。顺应社民党持续执政的形势,瑞典雇主组织联盟(Swedish Confederation of Employers' Organization)最终与工会达成协议,从而确保了现有稳定的产业关系,并且阻止了政府对工资谈判的直接干预。<sup>[158]</sup> 尽管1938年的《盐湖浴场协议》(the Saltsjobaden Agreement)中规定的集中工资谈判式“民间”统合主义体系限制了瑞典政府的直接行动范围,但它签订于实施高水平公共支出的大环境之下,通过确立全国标准工资增长谈判的统一的惯例程序,该协议实际上促使瑞典后来的公共政策决策更倾向于发展一种高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简而言之,瑞典的商业集团向社会凯恩斯主义妥协——战后,较大和更有效率的企业正是,也确实从这种体制中大为受益。<sup>[159]</sup>

与此相反,在美国,自1945年《充分就业提案》的支持者被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的农场主与商会企业家们在国会的利益联盟击败之后,在作为大企业利益代言人的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ED)中鼓吹商业凯恩斯主义的势力再次抬头。<sup>[160]</sup> 经济发展委员会与新成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温和派经济学家联手合作,其经济思想根源于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通论》发表以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部分政策推论,而且也一直没有接受哈佛停滞主义学派对美国经济和公共支出所可能扮演的角色的解读。<sup>[161]</sup> 通过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最少引起反感的部分——在一定年限周期内而非每年度实现预算平衡——经济发展委员会及其温和派经济学家联盟得以将反周期政策制度化,但也只限于有赖于自动稳定器的相应政策,而不考虑那些可

能导致增加政府支出及其自主裁量权甚至可能产生更强大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相关政策。

战后美国消费者购买力的维持,部分源于这种联邦政府的自动稳定器政策,但同时也强烈地依赖于工会在反复进行的民间工资谈判中的成就。<sup>[162]</sup> 工会的成功则来源于美国远高于瑞典的产业冲突率。<sup>[163]</sup> 国家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耗资巨大,但随后就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此外,美国经济的发展还得益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导权。而欧洲和日本则忙于战后重建。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国内支出的多种互不相关的项目仍然由国会把持着控制大权,使得来自地方和利益集团的选民们可以不受联邦控制地享受公共资源。在全国层面,宏观经济管理仍然与公共社会福利政策不相关联,而真正全面追求充分就业(被定义为使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政策则仍然不在美国公共政策的考虑范畴之内。

## 结 论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削弱了原有的公共财政理念,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的政府有机会通过社会支出和宏观经济管理相结合的综合战略转变成为积极的社会福利代理人。而实现这种可能性需要有管理国家经济的新思想的出现,要有能强化组织性工人力量的政权更替,同时还有赖于社会中的利益联盟有支持赤字财政政策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所有这些因素仍不能完全解释各种各样的国家政策选择。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政策传统和国家结构,用以解释瑞典、英国和美国对应对大萧条的恢复战略的选择。

我们的重点主要不在于将国家视为官员采取直接行动的场所。

相反,我们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微妙的也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瑞典、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设计和实施公共战略的能力。我们发现:政党,甚至包括那些在历史上就以工人阶级利益政策代言人身份出现的党派,在确定其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目标时会大量考虑现有的政策和它们能够借用的政府能力。我们还发现,愿意支持赤字财政项目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联盟,只有通过国家结构才能获得权衡的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或者分裂开来)以适应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及其后果。我们还考察了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国家结构是如何影响那些创新性的、政策相关性经济思想的形成与成功应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并不想做出某些确切的结论,而想指出值得发展成为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的几点比较观察。

瑞典的“新”经济学家是最早充分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成功者,他们也由此借助其学术和公共职业以及国际声誉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瑞典经济学家们获得政策影响力,既不是像凯恩斯在英国那样,首先提出一种突破性的新型宏大理论,也不像美国的停滞学派经济学家那样,依靠政治党派和互相冲突的政策建议来推动其政策处方。我们的分析证明,早已存在的稳定的接触公共政策行政管理战略中心的渠道,使瑞典的经济学家得以用相对非理论化的、非冲突模式为政府推动型改革提供有效的智识支持。社会科学界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和其他类型的政体)中的公共改革所做的贡献是否都源自类似的条件因素?是否还存在其他条件因素,使得宏大的学术理论或者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表述,在引发公共政策转型的复杂过程中,将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更值得思考的是,专家们在政策上所遭遇的成功或挫折会对思想创新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在两次大战



之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英国很容易就进入到公共决策中心,他是否还会费心构思出那将赋予他历史性荣光的宏大理论呢(该理论还鼓舞了如此多的追随者,在学术界和政治界激发了如此多的政策)?反过来,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瑞典的经济学家是否会竭力声明自己是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成员?如果这些范式和学派都没有出现,经济学的理论化和研究工作,以及战后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辩论,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再或者,如果凯恩斯主义在公共经济学界没有发展成多语言的经典,我们以及我们与之辩论的比较正直的社会学家们,又该如何来对我们讨论的瑞典、英国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方向性问题使之形成概念呢?也许,就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的组织结构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贡献来说,我们所欠下的比我们实际上所感知到的要多得多!

## 注 释

本章脱胎于关于瑞典和美国的一篇早期论文,该文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1-2)(1983):4-29. 本章的初稿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1983年9月2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中名为“比较社会与经济政策”的论坛上首次推出,同仁们对那篇期刊文章以及本章初稿的反馈意见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给我们提出有价值的评论意见和批评的有 Douglas Ashford, Barry Eichengreen, Peter Gourevitch, Barbara Haskel, Hugh Hecllo, Albert Hirschman, Peter Lange, Axel Leijonhufvud, Stephen Krasner, Charles Sabel, Philippe Schmitter, Bill Skocpol, David Stark. 当这篇文章介绍到芝加哥大学工业社会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前沿研究所的一场社会科学学术午餐会,以及杜克大学的一场演讲上时,热烈的讨论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1] 有关各国差异的总体性介绍,请参考 H. W. Arndt, *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1930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W. Arthur Lewis, *Economic Survey* (London: Allen & Unwin, 1960); 以及 Bradford Lee, “Budget Balancing in a His-



torical Perspective: National Priorities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 C., June 1981)。

[2] 给瑞典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改革贴上“新政”标记的是布贾尼·布拉托伊(Bjarne Braatoy, *The New Sweden*, London: Nelson, 1939), 其第一章是对瑞典和美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政策的综述, 还可以参见阿尔恩特《经济教训》(Arndt, *Economic Lessons*) 的第二和第八章; Bertil Ohlin, ed., “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ies in Sweden”,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197(May 1938); Harrison Clark, *Swedish Unemployment Policy: 1914 to 1940*(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Chaps. 5 - 12; Herbert Stein,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chaps. 3 - 7; and Albert U. Romasco, *The Politics of Recovery: Roosevelt's New Dea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偏重政策的层面上,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凯恩斯”观点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本文倾向于采纳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的看法, 即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讯息”(central message)直到 1936 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一书的发表才成形。参见 Don Patinkin, “Multiple Discoveries and the Central Messa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2) (1983): 306 - 323; and *Anticipations of the Gener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尽管如此, 早在 1936 年之前, 在英国的凯恩斯本人以及在该国或其他国家的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都预见到了凯恩斯主义理论要点的一部分, 尤其是其与政策相关的推论那部分。我们在后面会谈到有关的案例。当前, 让我们简单地解释一下, 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术语, 本文会用“原始凯恩斯主义的”(proto-Keynesian)来指代 1936 年以前的这些预测。对 1936 年以后的情况, “凯恩斯式”一词就很适合用来指称那些与凯恩斯的著作同时或单独发展起来的理论或是政策思想, 这是因为凯恩斯的“核心讯息”很快就被用来渲染和象征经济思想中的一次跨越国界的革命。

[4] 参见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chaps. 5 - 7; and Dean L. May, *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The American Liberal Response to the Recession of 1937* (New York:

Garland, 1981), chaps. 6 and 7.

[5] 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起的瑞典政策, 请参见 Gösta Esping-Andersen and Roger Friedland, “Class Coalitions in the Making of West European Economie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3 (1982): 17 – 25; Assar Lindbeck,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Andrew Martin,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n a Keynesian System”, in *The State, Capital, and Liberal Democracy*, ed. Colin Crou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p. 88 – 121; and William Snavely, “Macroeconomi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ome Observations from the Swed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6 (1972): 27 – 60。

[6] “社会凯恩斯主义”是我们的说法。“商业凯恩斯主义”则是罗伯特·李卡奇曼的原创, 参见 Robert Lekachman, *The Ages of Keyn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 287。

[7] 有关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 参见 Lekachman, *Age of Keynes*, chaps. 8 – 11; Robert M. Collins, *The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1929 – 196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s. 6 and 7; and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chaps. 9 – 17. 战后, 美国和瑞典在公共开支和失业与通胀的权衡方面朝向两个极端发展。参见 Andrew Martin,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Tentative View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3), pp. 5 – 20; and Douglas Hibbs,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1977): 1472。

[8] 有关利用凯恩斯式经济干预手段解决失业保险问题的具体困难, 参见 Edward J. Harpham, “Federalism, Keynesia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ationalizing Social Security*, ed. Douglas E. Ashford and E. W. Kelley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forthcoming)。

[9] 关于英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社会政策, 特别推介 Bentley V. Gilbert,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66); Bentley V. Gilbert, *British Social Policy, 1914 – 1939* (London: Batsford, 1970), chaps. 1 – 3; and Peter Flora and Jens Alber,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 Peter Flora and Arnold 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 J. : Transaction Books, 1981), 尤其是该书第 55 页的图 2.4, 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政策的条目和工人覆盖率进行了比较和总结。

[10] 后面的描述主要依据 Robert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The Labour Government of 1929 - 1931* (London: Macmillan, 1967)。

[11] 有关英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恢复情况, 请参考 Arndt, *Economic Lessons*, chap. 4, 该书描绘了一种非常乐观的情景。

[12] 学术界对英国是否曾经全面实施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争议, 尽管许多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凯恩斯主义”政策。参见 Jim Tomlinson, “Why Was There Never a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 *Economy and Society* 10(1) (1981): 72 - 87; and Kerry Schott, “The Rise of Keynesian Economics: Britain 1940 - 1964”, *Economy and Society* 11(3) (1982): 292 - 316. 有关“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贝弗里奇式”改革, 参见 Norman Furniss and Timothy Tilton, *The Case for the Welfare Stat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04 - 109。

[13] 我们只讨论明显是比较视角的观点, 以此来界定我们的竞争者。然而, 在研究单个国家的历史文献中, 通常会强调关键的国家领导人的人格特征和观念。按照这种特殊的解释路径, 经济决定论或“理性选择”立场会失败, 比较的分析方法也会显得逊色。比如可参见彼得·古勒维奇对英国案例的处理: Peter Gourevitch, “Breaking with Orthodox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 (1984): 121 - 122; and Dennis Kavanagh, “Crisis Management and Incremental Adap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The 1932 Crisis of 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in *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Gabriel A. Almond, Scott C. Flanagan, and Robert J. Mund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pp. 194 - 195。

有点讽刺的是, 在有关我们三个案例的研究当中, 相似的领袖人格与观念竟

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结果。特别是,1929—1931年间英国工党领袖都被批评为为了使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全而以全国统一的名义做出了过度的让步,而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美国新政派则因为同样的品格受到赞扬,并被想当然地解释为他们的改革主义创新精神!而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领导人和利益集团的真实目标、观念和标准理想这一问题,而且一定要以历史为根本依据。不能将之视为镶嵌在人格或政党理念中的固定不变的因素,而应当详细分析整个的制度背景、政治文化范式,以及历史长河中领导人物与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的关键事态。

[14] 举例来说,国际货币及贸易波动的精确后果与国家政策及国内经济环境影响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很难评估,但这两个要素在大萧条时期对国家经济的衰退与复苏影响非常大。参见阿尔恩特的《经济教训》(Arndt, *Economic Lessons*),以及尾注 86 中所引用的对瑞典的评论。

[15] 各种工人阶级力量观的支持者包括:Francis G. Castles, ed., *The Impact of Parties*( Beverly Hills, Calif. : Sage, 1982); Esping-Andersen and Friedland, “Class Coalitions”; Walter Korpi,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Walter Korpi,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Martin,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and John Stephens,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79). 有关这一方法对西方福利国家发展之解释的极好评论,请参见 Michael Shalev,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and Beyond: Two Generation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Welfare State”,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6( 1983): 87 - 148.

[16] Stephe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17] 尾注 15 中所引之研究作者探讨的均是瑞典案例,尤其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情况。就从对瑞典社会民主党之兴起的特定理解中推演出跨国性的相关理论来说,工人阶级力量模型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18] 马丁和斯蒂芬斯用这些术语讨论了美国的发展。参见:Marti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ephens,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pp. 149 - 156。

[19] David Brody, “The Emergence of Mass Production Unionism”, 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ed. J. Braeman, R. Bremner, and E. Walter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21 - 262; Milton Derber,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Labor and the New Deal*, ed. M. Derber and E. Young (New York: DaCapo Press, 1972), pp. 1 - 44; and David Greenstone, *Labor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9), chap. 2.

[20] Collins,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chap. 2.

[21] 亚当·索沃斯基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参见 Adam Przeworski, "Social Democracy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New Left Review*, no. 122 (July-August 1980): 27 - 58。

[22] Stephens,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pp. 130 - 131;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p. 86; and Sven Anders Soderpalm, "The Crisis Agreement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in *Sweden's Development from Poverty to Affluence, 1750 - 1970*, ed. Steven Koblic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5), p. 277.

[23] 尤其可参见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此外, 约翰·斯蒂芬斯讨论社民党的执政对瑞典工会实力的“反馈效应”, 参见 John Stephens,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Reference to Britain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4) (1979): 389 - 414, 尤其是 pp. 406 - 407。

[24] 严格来说,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三个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派都在追求实施改革主义公共支出战略: 丹麦社民党(从 1929 年起)、挪威社民党(从 1935 年起)和瑞典社民党(从 1932 年起)。瑞典社民党和经济专家在设计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恢复战略中担纲了领袖角色, 而丹麦社民党则是第一次执政并实施类似战略。在 20 世纪 20 年代, 丹麦社会民主党与代表小农的激进党(the Radical Party)结成联盟, 其农业领域的社会经济状况比瑞典和挪威都更加分化。参见 Francis G. Castles, *The Social Democratic Image of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p. 22 - 23, 113. 而且, 丹麦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 是自由主义国家中推行社会福利项目的早期先锋。但是, 丹麦的失业保险是由工会自愿设计

运作并由政府给予补贴,并非像英国那样实际覆盖整个产业阶级的强制险(由扣缴和公共资助共同分担)。

[25] 和英国的工党一样,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未能成功推行对抗失业的创新政策,尽管几个关键的工会领袖都支持需求刺激型思想。参见 Gourevitch, “Breaking with Orthodoxy”, p. 108; Marti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45 - 46; and Vladimir Woytinski, *Stormy Passage* (New York: Vanguard, 1961), pp. 458 - 472。

[26] 我们能从《向社会主义转型》(*Transition to Socialism*)一书的第145页中看出,斯蒂芬斯(Stephens)也赞成这一点,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瑞典工人阶级组织性力量的可比性,实际上引发了有关用这种力量来解释工党与社民党之间对大萧条截然不同反应的根本性问题。反过来(斯蒂芬斯也赞成这一点),这些不同的反应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之后两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的命运趋异的主要原因。

[27] 斯蒂芬斯在《向社会主义转型》一书的第115—116页中提供了有关瑞典和英国工会化有趣的数据。“一战”之后,英国工人入会高峰人数远高于瑞典;因此,尽管两国自20世纪30年代初之后才出现高度差异性,总体形势还是瑞典比较有利。1930年,英国的工会人数是总劳动力人数的23%,而瑞典是20%。而在1930—1931年间,如果只以非农业工资和薪资工人作为计算基数,瑞典的工会率是35%而英国是31%。根据卡索的《社会民主印象》(Castle, *Social Democratic Image*, Table 1. 1, p. 6)所载,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工党的平均得票率为33%,而瑞典社民党是36%。很显然,两国之间的所有这些比例都比较接近。

[28] Hugh Heclo,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8 - 41.

[29] Soderpalm, “Crisis Agreement”.

[30] Ske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31] 赫克罗在《现代社会政治学》一书第23页的图3中展示了英国和瑞典国民经济中的制造业和农业之间完全不同的比例关系。1930年,瑞典农业部门(含渔、林业)所雇用的人员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36%,而英国则只有6%。数据来源

是 B.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 - 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62 - 163。

[32] 除了后面会引用和讨论到的之外,采用“经济联盟”方法来解释公共政策的重要著作还有: Alexander Gerschenkron,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ew York: Haward Fertig, 1966; originally 1943); James Kurth,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roduct Cycle: Industri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Outco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33(1979): 1 - 34; and Peter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 - 1995”,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8(1977): 281 - 313. 在《魏玛共和国的垮台》[Davi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 Republic*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一书中,大卫·亚伯拉罕就用这种方法解释了一个政体的变革以及不断变换的政策模式。

[33] Thomas Ferguson, “From Normalcy to New Deal: Industrial Structure, Party Competition, and American Public Poli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1984): 41 - 93. 尽管弗格森的文章取名为“从常态到新政:产业结构、党派竞争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公共政策”,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对哪些政策被采纳以及如何被采纳进行详细阐述,尤其是自1932—1934年的新政“第一阶段”之后的情况。很显然,他误将1935—1936年间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和社会保险改革混同为凯恩斯主义了。他似乎还做了一个很强的假设,有关类似的民主党派在影响政策选择中的作用,但没有在其文章中提供经验证明。

[34] Peter Gourevitch, “Breaking with Orthodox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1984): 95 - 129.

[35]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4; originally 1936), p. 383.

[36] 唐纳德·马格里奇(Donald Muggeridge)教授在讨论洛德卡尔多(Lord Kaldor)的《作为经济顾问的凯恩斯》(Keynes as an Economic Advisor)一文中,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未能以政策顾问的身份在短期内实现成功一事进行了

饶有意味的反思。该文发表在 *Keynes as a Policy Advisor*, ed. A. P. Thirwall (London: Macmillan, 1982), pp. 28 – 33. 对凯恩斯所体现的对科学素养和政治关怀卓越的合成同样有着深刻洞察的还有: Elizabeth S. Johnson and Harry G. Johnson, *The Shadow of Key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chaps. 2 and 6; John Vaizy, “Keynes and Cambridge”, in *The End of the Keynesian Era*, ed. Robert Skidelsk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 10 – 24.

[37] Keynes, *General Theory*, pp. vi, 383 – 384.

[38] Schott, “Rise of Keynesian Economics”, p. 292.

[39] 下一段中的论点将在后面的比较历史分析中的适当部分做进一步阐述并提供文献证明。

[40] Heclo, *Modern Social Politics*, 尤其是 chap. 6。

[41]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文中多处提到。

[42] Heclo, *Modern Social Politics*, pp. 78 – 90, 105 – 110; 也可参见 Jose Harris, *Unemployment and Politics: A Study in English Social Policy, 1886 – 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43] Kavanagh, “Crisis Management and Incremental Adaptation”, pp. 175, 181 – 183; and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chap. 2.

[44] 参见表 4.2 中英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失业百分比。

[45] 关于工党的竞选承诺, 参见 Heclo, *Modern Social Politics*, p. 114. 有关英国政府的记录, 参见 C. L.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 – 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 174 – 178。

[46] 引自 Heclo, *Modern Social Politics*, p. 115。

[47] 这一段主要摘自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chaps. 3 – 7。

[48] Bentley V. Gilbert, *British Social Policy, 1914 – 1939* (London: Bratsford, 1970), p. 162.

[49] 同上。

[50] 同上, 第 162 – 175 页; 以及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chaps. 11 – 13。



[51]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p. 413.

[52] 本段摘自 Hecló, *Modern Social Politics*, pp. 74 – 78, 92 – 97. 也可参见 Douglas Verney,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weden: The Swift Rise and Fall of Sweden Liberalism”, *Political Studies* 22(1) (1972): 42 – 59.

[53] 有关失业委员会的分析, 请参见 Harrison Clark, *Swedish Unemployment Policy*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chaps. 2 and 3; and Gustav Moller, “The Unemployment Policy”, *Annals* 197(1938): 47 – 48.

[54] Clark, *Swedish Unemployment Policy*, pp. 49 – 50. and Herbert Tingsten,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s* (Totowa, N. J. : Bedminster Press, 1973; originally 1941), pp. 261, 430.

[55] Castles, *Social Democratic Image*, pp. 24 – 25; Donald Winch,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Swed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2) (1966): pp. 170 – 171; Timothy Tilton, “A Swedish Road to Socialism: Ernst Wigforss an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 (1979): 508; and C. G. Uhr,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ing 1930 – 1936: Sweden’s Experie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1977): 91, note 4.

[56] 有关 20 世纪 20 年代及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政策相关性经济思想的发展趋势的分析, 可参见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p. 131 – 162; J. Ronnie Davis, *The New Economics and the Old Economist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Keith Hancock, “Un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ists in the 1920s”, *Economical*, new ser., 27(1960): 305 – 321; Brinley Thomas, “Swedish Monetary Policy since Wicksell”, in *Monetary Policy and Crises: A Study of Swedish Exper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36), chap. 3; and Everett J. Burt, Jr., *Social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2), pp. 233 – 237 (该书论及凯恩斯自己在 1924—1933 年间的转变)。所有这些著作都很重视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修正如何才能推动充分实施“凯恩斯主义”模式和政策处方。对这些著作所构成的学术史争论的全面理解, 可以参见尾注 3、77 和 78 中所引用的文献。

[57] Roy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Norton, 1951),

pp. 345 - 386. 凯恩斯关于赤字财政型公共工程的首次重要论述是在《失业需要大规模救济吗?》，该文发表于: Keynes, “Does Unemployment Need a Drastic Remedy?”, *The Nation*, May 24, 1924. 此后凯恩斯发表了更多的文章和演讲。

[58]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pp. 51 - 57.

[59] 同上, 第八章。

[60] 该段摘自 Roger Davidson, “Llewellen Smith and the Labor Department”, in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 Century Government*, ed. Gillian Sutherl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pp. 227 - 262; Roger Davidson, “Board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Historical Journal* 21 (3) (1978): 571 - 591; J. A. M. Caldwell, “The Genesis of the Ministry of Labour”, *Public Administration* 37(4) (1959): 367 - 391; 特别是 R. Davidson and R. Lowe, “Bureaucracy and Innovation in British Welfare Policy, 1870 - 1945”,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W. J. Mommsen (London: Croom Helm, 1981), pp. 264 - 277 (论述 1916 年以前的情况)。

[61] 参见 Davidson and Lowe, “Bureaucracy and Innovation”, 尤其是第 277—291 页; Rodney Lowe, “The Ministry of Labour, 1916 - 192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31(2) (1978): 270 - 286。

[62] Davidson and Lowe, “Bureaucracy and Innovation”, pp. 283 - 284, 以及 Lowe, “Eros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pp. 279 - 282, 两文都讨论了有关工党内阁中提出“原始凯恩斯主义”方案或理念的个别官员的非常有价值的案例, 但对这些官员的行为的分析仍归结于财政部的组织控制。

[63]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pp. 134 - 136, 142 - 145. 关于赫克罗对英国委员会的有用价值的评论, 尤其是与瑞典委员会的比较, 可参见 Heclø, *Modern Social Politics*, pp. 44 - 46。

[64]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pp. 202 - 215. 对该组织(1932 年改组为经济信息委员会)的长期影响的讨论, 可参看 Susan Howson and Donald Winch, *The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 1930 - 1939: A Study in Economic Advice during Depression and Recov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在《凯恩斯与

财政部的意见》一文中[“Keynes and the Treasury View: 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Un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W. J. Mommsen(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 184 - 187], Skidelsky 提出要谨慎对待 Howson 和 Winch 关于凯恩斯对 20 世纪 30 年代财政部思想的影响所做的结论。

[65]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pp. 145, 204.

[66] 同上,第 215 页。

[67] 凯恩斯(相当不公地)称其同事经济学家 A. C. 庇古的学说为“正统论”,因为此事,凯恩斯长期处于政治纠纷当中。我们可以把这种正统论理解为“财政部意见”。

[68] Brinley Thomas, *Monetary Policy and Crises: A Study of Swedish Exper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36), p. xviii.

[69] 同上,第 xix - xx 页。

[70] 同上,第 ix 页。

[71] 对瑞典君主如何通过支持自由农民、排挤封建领主贵族阶层而加强自身地位的历史评论,请参见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chap. 7; Hans Brems, “Sweden: From Great Power to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2 - 3) (1970): 1 - 17; Eli F. Hecksch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17 - 128; Nils Herlitz, *Sweden: A Modern Democracy on Ancient Founda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9), pp. 3 - 21; and Stephen Kelman, *Regulating America, 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pp. 119 - 120.

[72] Hecló, *Modern Social Politics*, pp. 41 - 43; and Hans Meijer, “Bureaucracy and Policy Formulation in Swede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4(1969): 103 - 116.

[73] Timothy Tilt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Liberal Democracy: The Swedish Ca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2) (1974): 561 - 571; and Dankwart Rustow,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A Study of Parties and Cabinet Government in Sweden*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chap. 2.

[74] Meijer, “Bureaucracy and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omas J. Anton,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wede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4 (1969): 88 – 102.

[75] C. G. Uhr,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ing 1930 – 1936: Sweden’s Experie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1977): 92; Thomas, *Monetary Policy and Crises*, pp. xv – xvi.

[76] Uhr,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ing”, p. 92.

[77] 按照唐纳德·温奇所述 [Donald Winch,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Swed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2) (1966): 169], “斯德哥尔摩学派”这一名称直到1937年才传开,当时贝蒂·俄林“试图解释瑞典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不同特点”。参见 Ohlin, “Some Notes on the Stockholm Theory of Savings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Journal* 47 (March/June 1937): 53 – 69, 221 – 250. 乌尔(Uhr)在其《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Economists and Policymaking*)一书的第89页注释1中,对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正在形成当中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给予了一种基于群体的定义。

[78] 这场辩论主要是关于理论优劣的问题,而不是有关与本文议题更为密切的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知识创新的宏大问题;对这场辩论的恰当总结可参见:Winch,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Sweden”, and Bo Gustafsson, “Review Article-A Perennial of Doctrinal History: Keynes and The Stockholm School”, *Economy and History* 16 (1973): 114 – 128. 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卡尔-古斯塔夫·朗格林 [Karl-Gustav Landgren, *Den ‘nya ekonomien’ i Sverige: J. M. Keynes, E. Wigforss, B. Ohlin och utvecklingen 1927 – 1939*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60)], 讨论朗格林思想的专题研讨会参见:“The Stockholm School: Ideas, Origin, and Development-A Symposium”, *Economisk Tidskrift* 42 (September 1960). 最近发表的与朗格林不同的结论可参见 Otto Steiger, *Studien zur Entstehung der Nuen Wirtschaftslehre in Schweden-Ein Anti-kritik*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1). Steiger 的观点得到了乌尔的支持,参见 C. G. Uh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Economics’ in Sweden: A Review of



a Study by Otto Steiger”,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1973): 243 – 260. 也可参见尾注 3 中有关 Don Patinkin 的引文。

[79] Thomas, *Monetary Policy and Crises*, pp. 178 – 205.

[80] 失业数据来自瑞典贸易委员会的《瑞典经济评论》，见 the Swedish Board of Trade, *Swedish Economic Review*, no. 1(1936): 14。

[81] Uhr, “Emergence of the ‘New Economics’”, pp. 249 – 250.

[82] Soderpalm, “Crisis Agreement”, p. 270.

[83] Moller, “Unemployment Policy”, p. 51.

[84] Clark, *Swedish Unemployment Policy*, chap. 6.

[85] 同上, 第 95、154 页。

[86] Assar Linbeck,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23; Gustaffson, “Perennial of Doctrinal History”, p. 128; Uhr,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ing”, pp. 116 – 119.

[87] Moller, “Unemployment Policy”, pp. 57 – 62.

[88] Uhr,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ing”, pp. 110 – 115.

[89] 同上, 第 119 页; 也可见尾注 138。

[90] 在历史文献中将新政按 1935 年为界划分为“第一”和“第二”阶段已经成为标准用法。我们这里不对此划分方式多做赘述, 因为(即使在 1935 年转向亲劳工的管制政策和社会保险后)罗斯福政府在思考其在全国经济恢复中的角色时, 保持联邦预算平衡的热情依然是其主要特征; 直到 1937 年出现“罗斯福衰退”(Roosevelt recession) 及其后果, 才使得转向增加社会支出的凯恩斯主义变得明显可能起来。很显然, 我们无法对新政做出细致的阶段性划分, 但可以依据研究的需要而从便于分析的角度进行不同的划分安排。

[91] 关于新政中集权化的意义, 参见 Samuel H. Beer, “Liberalism and the National Idea”, in *Left, Right and Center: Essays on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Robert A. Goldwin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pp. 142 – 169.

[92] 1930 年, 美国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含渔业但不包括林业)仍然占劳动力总数的 21.8%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 139, part 1. ]。这一数据可以和尾注 31 中的数据相对比。1932 年,罗斯福的改革主义竞选更多的是面向农业利益而非城市工人。南部和西部的支持对他获得民主党的提名非常关键,而在大选当中,他得到了来自农业地区尤其是南部以及有着较贫穷的农民或佃农的其他地区的强力支持。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后的年份中,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得到了城市和产业工人的支持而丧失了富裕农场主这一基础。参见 John M. Allswang, *The New Deal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78), chap. 2。

[93] William T. Foster and Waddill Catchings, *The Road to Plenty* (Cambridge, Mass. : Riverside Press, 1928)。

[94] 引自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 - 193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p. 187。

[95] Davis, *The New Economics*。

[96] 同上,第 3、4 章以及 Dean L. May, *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The American Liberal Response to the Recession of 1937* (New York: Garland, 1981), pp. 67 - 76。许多相关的技术和理论创新都或者是直接基于魏斯理·克莱尔·米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和全国经济研究署(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对商业周期所做的前沿性宏观经济研究,或者是受到这一研究的重大启发。参见 John Maurice Clark,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Business Cycles", 其他文章可见: *Wesley Clair Mitchell: The Economic Scientist*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2)。戴维斯(Davis, 第 47 - 60 页)在对芝加哥经济学家保尔·道格拉斯(Pau Douglas)于 1935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控制萧条》(*Controlling Depressions*)一书的讨论中,强调了道格拉斯一书对米歇尔于 1913 年发表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一书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

[97] 参见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p. 12 - 14; Leah Hannah Feder, *Unemployment Relief in Periods of Depression: A Study of Measures Adopted in Certain American Cities, 1857 through 192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36); and Lester V. 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1929 - 194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p. 31 – 33。

[98] 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pp. 48 – 51; and James T.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Deal*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7), pp. 10 – 11.

[99] Ellis W. Hawley, *The New Deal and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rt 1.

[100] 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p. 216.

[101] Theda Skocpol and John Ikenberry, “The Political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6 (1983): 124 – 125; and Mark H. Leff, “Taxing the ‘Forgotten Ma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ecurity Finance in the New Deal”,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0(2) (1983): 359 – 381.

[102] 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pp. 136 – 138, 189 – 207.

[103]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p. 49 – 73.

[104] “法庭与政党”这一用法来自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 – 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 2. 也可参见 Morton Keller, *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s. 7, 8, and 14; and Richard L. McCormick, “The Party Period and Public Policy: An Exploratory Hypothesi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1979): 279 – 298。

[105] 有关整个欧洲大背景下的英国和瑞典模式, 请参见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Wiley, 1964), chap. 3; Ira Katznelson, 本书第 8 章; 以及 Donald J. Blake, “Swedish Trade Unions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The Formative Year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1) (1960): 19 – 44. 本段后半部分对美国案例的讨论, 摘自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1981), chaps. 1 – 4; and Martin Shefter, “Trades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Zolberg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即将出版)。

[106]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and Martin J. Schiesl, *The Politics of Efficiency: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 1880 - 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107] Skocpol and Ikenberry, “Political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pp. 98 - 119.

[108]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part 2.

[109] Carol S. Gruber, *Mars and Minerva: World War I and the Us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0] Carolyn Grin, “The Unemployment Conference of 1921: An Experiment in National Cooperative Planning”, *Mid-America* 55 (1973): 83 - 107; and Barry D. Karl, “Presidential Planning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r. Hoover’s Expert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3 (1969): 347 - 409.

[111] 比如,可以参见 Grin, “Unemployment Conference”; 以及 Willism Chenery, “Unemployment at Washington”, *Survey* 37 (1921): 42。

[112] Ellis W. Hawley, “Herbert Hoover, the Commerce Secretariat, and the Vision of an ‘Associative Stat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1974): 116 - 140; and Joan Hoff Wilson, *Herbert Hoover: Forgotten Progressiv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5)。

[113] 有关“康芒斯学派”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参见 Lafayette G. Harter, *John R. Commons: His Assault on Laissez-Faire*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Daniel Nels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1915 - 193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chaps. 6 and 9; Theron F. Schlabach, *Edwin E. Witte: Cautious Reformer*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69)。



[114] Theda Skocpol and Kenneth Finegold,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 in the Early New De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7(1982): 268 - 278; and Richard S. Kirkendall, *Social Scientists and Farm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6).

[115] May, *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chap. 2; 该书在对罗斯福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 预算观的政治道德基础方面极富洞察力。

[116] 参见尾注 19。

[117]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 106.

[118] Arthur W. MacMahon, John D. Millet, and Gladys Ogden, *The Administration of Federal Work Relief* (Chicago: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rvice, 1941), pp. 200 - 220.

[119] May 的《从新政到新经济学》(*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一书的第 40 - 52 页有对埃克尔斯的简传, 也可参见 Sidney Hyman, *Marriner S. Eccles: Private Entrepreneur and Public Servant* (Stanford, Calif: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6)。

[120] 对居里的介绍, 请参见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p. 165 - 167; Alan Sweezy, "The Keynesians and Government Policy, 1933 - 193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1972): 117 - 118; an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in *Economics, Peace and Laughter*, ed. Andrea D. Willi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pp. 47 - 48.

[121] May 在《从新政到新经济学》一书的第 53 - 66 页, 介绍了埃克尔斯的经济思想和他在 1937 年以前所创建的关系网。May 的书和 Stein 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 的第七章都强调认为凯恩斯(无论是其个人还是其作品)对 1937 年以前的总统或行政官员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122] Christiana McFadyen Campbell, *The Farm Bureau and the New Deal: A Study of the Making of National Farm Policy, 1933 - 194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2), pp. 190 - 191.

[123] 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p. 130; and May, *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chap. 1.

[124]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pp. 234 - 241.

[125] May, *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pp. 152 - 156. May 比 Stein 对 1937 年后的衰退促使罗斯福的观念转向凯恩斯主义的注意力更多。

[126] Robert Collins, *The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1929 - 196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6.

[127] 参见尾注 22。

[128] 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p. 48.

[129] 文中有关阿尔文·汉森的情况及其影响来自: 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p. 163 - 168; 尤其是《经济学季刊》第 90 期关于阿尔文·H·汉森的研究论文集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1976): 1 - 37 ]。汉森最初对凯恩斯的《通论》很是怀疑。在《作为创新性经济理论家的阿尔文·汉森》一文中, 保尔·萨缪尔森很是嘲弄地“冒险猜测汉森接到哈佛的聘请是一个失误。哈佛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汉森也不知道。” [ Paul Samuelson, "Alvin Hansen as a Creative Economic Theori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1976), p. 29 ] 最后的观察是说, 汉森是一位极富创造力和热情的教师, 其受到早已存在于剑桥的青年凯恩斯主义者们的影响, 正如后来他又影响并支持了这些学者一样。

[130] 对“停滞学派”很好的讨论, 可参见: Collin,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pp. 10 - 11, 51. 科林斯写道, 从一开始, 停滞学派的分析就是众多经济理念和政治倾向的复杂混合。它一面解释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 一面又提出一套变革这一体系的项目。但同时, 恰恰重要的是, 它成为一种强调, 一种立场的集合, 一种对未来的观念——即认为经济进步和彻底的社会变革并非水火不容彼此对立。

[131] Richard V. Gilbert, George H. Hildebrand, Jr., Arthur W. Stuart, Maxine Yapple Sweezy, Paul M. Sweezy, Lorie Tarshis, and John D. Wilson, *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38).

[132] Alvin H. Hansen,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1939): 1 - 15.

[133] 到1941年,汉森在“努力呼吁”用一种真正、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来替代新政那不冷不热的“拯救项目”。在这里,科林斯引用的是汉森的《财政政策与商业周期》里的话[ Collins,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p. 11; Hansen,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orton, 1941)]. 也可参见 Hansen, "Social Planning for Tommorrow",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ar*, ed. Alvin H. Hansen, F. F. Hill, Louis Hollander, Walter D. Fuller, Herbert W. Briggs, and George O. Stoddard(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15 - 34; 以及 *After the War-Full Employment*,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134]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 168; James Tobin, "Hansen and Public Polic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1976): 32 - 37; Walter S. Salant, "Alvin Hansen and the Fiscal Policy Semina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1976), pp. 21 - 22; and Byrd L. Jones, "The Role of Keynesians in Wartime Policy and Postwar Planning, 1940 - 194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1972): 125 - 133.

[135] May, *From New Deal to New Economics*, pp. 146 - 150; and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pp. 165 - 168.

[136] 明显用停滞学派理论观点来解释新政具体历史的研究,可参见 Gilbert et al., *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 以及阿尔文·汉森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全面恢复或停滞?》[ Alvin Hansen, *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 (New York: Norton, 1938)]。

[137] Harrison Clark, *Swedish Unemployment Policy*(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p. 118.

[138] Hans Meijer, "Bureaucracy and Policy Formation in Swede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4(1969): 109; 该书的统计显示在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执政的前三十年中,平均每10年都有750个委员会在工作,而在本世纪初(指20世纪)是每10年有450个委员会。

[139] Richard Polenberg, *Reorganizing Roosevelt's Government: The Controversy over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6.

[140] 同上;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pp. 214 - 229; and J. Joseph Huthmacher, *Senator Robert E.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p. 243 - 245.

[141] Sven Anders Soderpalm, "The Crisis Agreement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in *Sweden's Development from Poverty to Affluence, 1750 - 1970*, ed. Steven Koblic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5), p. 262.

[142] Svenska Handelsbanken, "Government Measures for the Relief of Agriculture in Sweden since 1930", suppl. To Svensk Handelbanken's *Index 14* (March 1939), p. 5; and Kurt Samuelsson, *Sweden: From Great Power to Welfare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8), pp. 140 - 141.

[143] Jean Jusissant, *La Structure Economique de la Suede et de la Belgique* (Brussels: Collection de l' 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de l' Université de Louvain, 1938) and Svenska Handelsbanken, "Government Measures", pp. 24 - 25.

[144] Ernst Wigforss, "The Financial Policy during Depression and Boom", *Annals* 197(1938): 31.

[145] Soderpalm, "Crisis Agreement", pp. 275 - 277.

[146] Dankwart Rustow,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 A Study of Parties and Cabinet Government in Sweden*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109.

[147] 参见 Richard S. Kirkendall, "The New Deal and Agriculture", in *The New Deal: The National Level*, ed. John Braeman, Robert H. Bremner, and David Brod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83 - 109; Grant McConnell, *The Decline of Agr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Atheneum, 1969), chaps. 7 - 16; and Campbell, *Farm Bureau and the New Deal*, chaps. 8 and 9.

[148] 有关全国农民协会及其政策, 请参见 McConnell, *Decline of Agrarian Democracy*, pp. 37 - 39, 68 - 69, 108, 137, 146; and Campbell, *Farm Bureau and the New Deal*, pp. 169 - 171。与之相关的激进派改革主义农业组织, 也可参见 John



L. Shover, *Cornbelt Rebellion: The 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 and Donald H. Grubbs, *Cry from the Cotton: The Southern Tenant Farmers' Union and the New Deal*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1)。

[149] Campbell, *Farm Bureau and the New Deal*, chap. 6.

[150] McConnell, *Decline of Agrarian Democracy*, chaps. 8 – 10; Sidney Baldwin, *Poverty and Politic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and Paul E. Mertz, *New Deal Policy and Southern Rural Povert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1] Murray Edelman, “New Deal Sensitivity to Labor Interests”, in *Labour and the New Deal*, ed. Milton Derber and Edwin Young (New York: DaCapo Press, 1972), pp. 185 – 186; and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pp. 334 – 345 and passim.

[152]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pp. 318 – 322; and Collins,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pp. 46 – 47.

[153] Collins,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pp. 13 – 14.

[154] Marion Clawson, *New Deal Planning: The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25 – 232.

[155] Stephen Kemp Bailey, *Congress Makes a Law: The Story Behind 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chaps. 1 – 3.

[156] 同上, pp. 150 – 178, 202 – 205; 以及 Collins,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pp. 102 – 109。

[157] Bailey, *Congress Makes a Law*, pp. 220 – 234, 243 – 248.

[158] 参见尾注 22。

[159] Esping-Andersen and Friedland, “Class Coalitions”, p. 20。

[160] Collins,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chaps. 5 and 6; Stein, *Fiscal Revolution*, chaps. 8 and 9.

[161] 关于芝加哥经济学家与经济发展委员会及对商业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影响, 请参见 Collins,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pp. 71 – 72, 83 – 84; 以及 Davis,

*New Economics and Old Economists*, chap. 3, 该章分析芝加哥学派。很显然,相比于集中性的欧洲式学术机构,美国大学体系的庞大和多中心的特征,使得其更有可能在停滞主义凯恩斯学派集中于哈佛的同时,发展出其他独立的宏观经济思想派系。

[162] 对战后美国“宏观经济稳定化”的极有意义的探讨,请参见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chap. 4。

[163] Walter Korpi and Michael Shalev, “Strike, Power, and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Nations, 1900 – 1976”,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I* (1980): 309 – 316.



## 第二篇

# 国家与跨国关系

编者

一直以来,作为行为主体和制度组织的单个国家就嵌置于政治和经济关系之中,这些关系超越于国家所直接统治的领土和人民而运转。的确,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该体系诞生于欧洲封建时代分裂的主权国家之中,依靠商业关系将西北欧<sup>①</sup>与东欧和拉丁美洲联系在一起),跨国的经济流动以及国际性的地缘政治竞争历来都异常激烈。这种关系直接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和身份认同;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民族国家垄断着强制性主权利。理解现代国家的一个必然途径,就是去观察这些国家的行为与跨越其边界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本篇中的三篇文章就是对这类分析的尝试,它们论证风格各异,却正好彼此互为补充。

乍眼看上去,本篇所收文章的差异性让人瞠目,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极为不同的问题、时代和国度。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以14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历史经验证明了他那

---

<sup>①</sup> 此处原文为“northeastern Europe”,是指“东北欧”。但从文意来看,当是作者笔误;作者的意思应是指“西北欧(northwestern Europe)”。译者冒昧做此揣测与修订,并补注于此,以便读者明察。——译注



将国家视为掠夺者的极具刺激性的经济学模型。彼得·卡岑斯坦选取了瑞士和奥地利，“二战”后两个最不具有掠夺性的欧洲国家，对其国内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巧妙的比较。而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则在《跨国联系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总体性观点，该文主要关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文章在主题和背景环境上的差异如此之大，但所谓殊途同归，它们最终在实质性的关怀与分析战略上有着某些颇为吸引人的共同特征。

将这些文章集合于此篇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它们全都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行动所需的特定能力，更确切地说，关心构建这种能力的过程是如何受到跨国活动的挑战和影响的。这些文章全都没有简单地将国家视作附带现象来构建国内外强势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图。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文章都没有采取那种极端态度，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考察的国家都是单一的、目的明确的行动者。相反，它们都非常重视国家机器内部出现的特定类型的次级组织基础(organizational substructure)，关注这种次级组织基础对国家后续能力的影响。而且，它们同时认为，这种次级组织基础的出现，一方面源自国家权力机构与国内选民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植根于国家权力机构与国际背景之间的关联。

梯利、卡岑斯坦和埃文斯还都高度重视国家与跨国结构之关联中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这三位作者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各位作者都是(必然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分析任务的。

卡岑斯坦在这方面的综合分析着墨最少，这或许是因为奥地利和瑞士的地缘政治目标非常有限，两国刚刚从国际结构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对奥地利和瑞士来说，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目标不是掠夺

财富,而是要维持其政治上的统一、保持与较大国家之间的中立关系,以及保护其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使之不受他国阻挠。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这些国家必须在避免内政分裂的同时,又谨慎管理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参与程度。卡岑斯坦一文的首要着力点在于展示瑞士和奥地利两国政治架构中结构上截然不同但同时又都表现为统合主义的复杂的运作模式,揭示出两国将国家机器和国内社会集团相联结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安排既维持了内部政治观点的一致性,又不会威胁到本国的国际经济能力——这种能力对小的民族国家来说,也已然是维持生存标准的重要因素。

梯利的国家则首先是地缘政治中的行为主体,这种国家不断面临着战争威胁,因此必须奠基于动员资源参与战争的国家能力的建设之上;但他对发动战争的分析中同时还贯穿着极为有趣的经济潜流。梯利首先采用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是“经济主义的”,集中于作为有效掠夺和收取“保护费”——如同有组织的犯罪那样——所得之结果的国家财富积累。更重要的是,他还分析了发动战争与国家机器的财政能力的发展之间的关联。梯利指出,战争对国家发展出财政和汲取能力的需求要远大于其他国家行为。正因为如此,战争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对其臣民征税的能力,还取决于从国际金融资本家争取到资源性帮助的能力,当然这种帮助都是有成本的。

埃文斯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干预其国民经济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受到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的途径,但埃文斯非常细心地意识到,必须将跨国经济联系的发展与地位不同之国家对此发展的反应都置于地缘政治目标与相互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说得更具体些,埃文斯赞成斯蒂芬·克拉斯纳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关心国际关系的官员对地缘政治目标的首要考虑,往往会影响到美国官员对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扩大的经济干预行为的态度,还会影响到其对美

国政府自身在国内经济中的角色的立场。反过来,美国的政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者们的目标和能力也有着重大影响。

就像前一篇的文章一样,本篇中的文章都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假设。而且,综合起来看,这三篇文章更是指向一种知识上的回报,通过对发展中地区国家的比较研究,把当前有关发达工业国的历史与当代状况的知识进行更加系统化的合成,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收获这一报偿。通常来说,对这两大类国家的理论化和经验研究工作都倾向于互不干扰,但当我们打破常规,将所谓“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列相看时,就有了更多令人着迷的研究可能。

比如,梯利在其文章的结尾部分就提出许多关于当代“新兴民族国家”中的军事官员与组织是如何可能与其他国家部门相关联的建设性想法。梯利引用其对欧洲历史中发动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分析结论,进而假设这种关系在今日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相似,也可能完全不同,他的这种直觉就指出了对关键案例进行进一步细致研究的需求。由于主要针对其非常熟悉的第三世界国家案例,埃文斯的结论就难以推论出核心国家中的跨国经济经营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类似关系。但就算是卡岑斯坦的文章,虽然仅仅分析了第一世界的两个案例,也同样暗示着需要对类似议题进行更大范围的考察。在其文章的结尾处,人们会禁不住好奇,将紧密结合的统合主义政治结构与国际经济开放程度高度相关的逻辑是否适用于西欧之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适用,又是为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由于这些文章启发了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强调,就忽视了这些文章自身在分析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通过从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动因角度观察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不仅仅是看作市场扩张或新的生产关系的增长的反映,梯利提出了在理论上最简明又最

有用的公式。卡岑斯坦对欧洲统合主义的探讨,进一步阐发了他对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和作为同时围绕国家和社会的“政策网络”之一部分的这一与众不同的双重视角的观点。因此,他的经验文章充实并且进一步证明了其一般性方法的价值,本书开篇中曾经介绍过这种方法。最后,埃文斯贡献的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框架,其价值远远超过先前的“依附论”文献中对国家的任何理解。他的文章为今后对国家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关系 的辩论提供了极富挑战性的起点。总而言之,对于分析国家在跨国关系中的目标和能力这一长期性的重要任务来说,所有这些文章都为我们提供了宽视角、原创性的贡献。



# 五 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 有组织的犯罪

查尔斯·梯利

## 提 示

如果说黑社会代表了公认的有组织犯罪,那么发动战争(war making)和缔造国家(state making)就算得上是有组织的犯罪之典范,是具备合法性优势的典型的黑社会。即使不能给所有的将军和政治家都安上“凶犯”或者“窃贼”的恶名,我仍然想强调这个类比的價值。至少就欧洲过去数百年的经验来说,将战争的发动者和国家的缔造者描绘成暴力的和自利的冒险家,比另外几种主流的观点更接近事实。这些主流观点包括:社会契约论;开放市场论,即在开放的市场中,军队和国家的管理者为自愿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社会共同体论,即某一共同体之共享性规范和预期催生了特定类型之政府。

以下看法仅仅是用欧洲数个世纪之经验来阐明发动战争和缔造国家与有组织的犯罪之间的相似性,并对变迁原则提出切合历史经验的假设性论证。我的思考源于对当代问题的关注:对战争之破坏力与日俱增的不安,担心作为弱国武器和军事组织提供者的大国的作用日

益膨胀,以及对军事统治在这些弱国中变得愈发重要的忧虑。这些思考也是基于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了解欧洲的经验,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行动的指南。

20 世纪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十六七世纪的欧洲相去甚远。从欧洲国家的历史中,我们难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来。但是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深思和探讨将对我们大有裨益。它会告诉我们,强制性剥夺 (coercive exploitation) 在欧洲国家的形成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也会为我们展示,对强制性剥夺的大众抵抗迫使自以为是的掌权者承诺为人民提供保护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它能帮助我们消除对现今之第三世界与昨日之欧洲二者间异同的模糊而错误的比较。这种澄清将使我们更容易准确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与过去如何不同,从而指明我们应该解释哪些现象。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当前在全球各地隐约可见的军事组织和军事行动。研究的结果或许足以让本人感到欣慰,但也谈不上什么宏伟建树。

这篇文章关注暴力的组织手段在特定政府形式的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我们称这种政府为民族国家:权力相对集中,组织职能相对分化,对居住在一片广袤而连贯的领土上的人口来说,主要的暴力手段或多或少地被这些组织中的官员成功地进行了集中控制。文章的立论源自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法国在 1600 年以后的发展。但是,在历史研究的工作之上,本文的结论又谨慎地往前跨出了几步,从理论的角度作了进一步推进并进行了严格的审视。但结论本身将不再多做阐释,也不提供值得一提的证明。

有如一个已经上路几天的人重新收拾其匆忙塞满的背包——扔掉垃圾,按照重要性把东西整理好并平衡负荷——我已经为即将进行的攀登重新拾掇了理论的行囊;对新包裹的真正检验只有到下一个岔

口时才会出现。经我修整后的论点强调发动战争和缔造国家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这两个过程与有组织的犯罪(在它们并不那么成功且规模较小时我们如此称谓)之间的相似性。战争缔造国家,我如斯断言。我也将断言:强盗行径、海盗行为、黑社会的竞争、维持治安和发动战争都属于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我还要断言:正是在民族国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之主导性组织形式的有限历史时期里,商业资本主义与国家缔造事业相互强化、发展了彼此。

### 保护的两面性

在当代美国用语中,“保护”一词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语气。一种是安慰性的,而另一种却是恐吓性的。在前一种语气中,“保护”让人联想起一位强大的朋友,一项宏大的安全政策,或是一个坚固的屋顶所提供的抵御危险的庇护。另一种语气则让人感到勒索,就像地头蛇强迫商贩交保护费以避免损害——而损害的危险源正是地头蛇本身。诚然,二者的差异只是程度问题。一个宣扬地狱与天谴的牧师只有在教区居民相信异教徒会被打入地狱的预言时才能收到捐献。而在我们居住区里的恶霸,可能正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保证妓院营业免受警察干涉的最佳保护人。

“保护”一词给予何种印象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威胁的真实性和外部性的估计。既制造危险又对提供庇护索以高价的人是勒索者;为人们提供必要的庇护,但无法控制危险之出现与否的人则有资格成为合法的保护者,当其要价不高于其竞争者时更是适合此职。能够提供可靠且价格低廉的保护,使被保护人免于当地黑社会 and 外来劫掠者的伤害的人,是最好的保护人。

一些人会为特定的政府或为抽象意义的政府做这样的辩护:政府

保护人民免受当地的或者外来的暴力的侵犯。这些人宣称政府所收取的费用正好抵消了提供保护的成木。一些人对政府收取保护费持有异议。这些人被政府的辩护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颠覆分子”，或者同时被扣上两顶帽子。但是，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勒索者”的定义：勒索者会人为去创造出一些威胁，又向人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减少这些威胁。从这个标准来看，政府所提供的保护，常常被认定为勒索。在一定程度上，政府保护自己居民免受威胁这样的论断是想象出来的；或者说，威胁本身就是政府自己活动的结果。政府组织了保护性的勒索。政府常常模拟、挑起乃至虚报存在外部战争的威胁。此外，政府压制性的、汲取性的活动很可能是其所辖公民日常生活的最大威胁。因此从本质上看，很多政府的运作和勒索者没有两样。当然，差别在于：按照传统的定义，勒索者从事的活动没有披上政府的神圣外衣。

既然政府是勒索者，为什么它还需要权威呢？这是一个实证的问题，也是一个规范的问题，是政治学最古老的难题之一。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政治观察家认识到：不论政府还做其他什么事情，只要有可能，政府就会组织起暴力机器并加以垄断。我们可以对暴力采取比较狭隘的定义，比如对人和物的损害；我们也可以对暴力采取比较宽泛的定义，比如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与意愿。定义宽窄无关紧要。无论采纳什么样的定义，政府都从其他组织中脱颖而出，垄断了暴力的工具。就事实本身而言，暴力合法与否也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认为合法就是要遵循一定的抽象原则或者是经过政府同意，或者二者兼有，这类前提或许能帮助我们证明（甚至还能做出解释）垄断暴力这一倾向的合理性；事实看起来也并不相违。

无论是哪种情况，阿瑟·斯丁库姆（Arthur Stinchcombe）对“合法性”的幽默嘲讽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分析。斯丁库姆认



为,政治合法性不依靠抽象的原则,也不依靠政府的同意,“被统治者往往不如掌权者重要”<sup>[1]</sup>。合法性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其他权威愿意遵从某一既定权威所做出的决定。我需要补充一点,其他权威可能更会遵从一个尽管受到挑战但掌握实权的权威的決定;它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害怕报复,同时也是希望维持一个保证当前大家所享有的通行规则的稳定环境。这些通行的规则使得权威对权力的垄断显得不那么重要。垄断暴力方式的倾向使得政府所宣称的保护性职责——无论是用好言好语还是威逼恐吓——变得更为可信,而且更难拒绝。

坦白地承认,强制力在政府行为中占中心位置,并不是要我们相信政府“只”依靠或者“最终”需要依靠暴力的威胁来解决问题;也不是要赞成保护是政府唯一的服务这类假设。即便政府对强制力的利用成本高昂,仍然会有人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其他服务还是超过了允许其垄断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对暴力集权化的认识,使我们得以了解政府形态的出现和演变。

我们先来看看本文最抽象化的观点:掌权者对战争的兴趣会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样一个过程:既从他们所控制的人群中汲取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同时也会通过扶持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借贷或采购物资的资本家来促进资本积累。发动战争、资源汲取和资本积累三者交互作用,塑造了欧洲国家的形成。掌权者并不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一种中央集权、职能分化、有自主性并影响范围广的政治组织——而采取这三种影响深远的行动的。他们也根本没有预料到战争、资源汲取以及资本积累会促使民族国家的崛起。

相反,那些控制欧洲某国以及某些正待发展为国家的疆域的人们,借助战争来制衡或者战胜他们的竞争对手,从而得以独享某一稳固的或正在扩张的领土上的权力。为了发动更有效的战争,他们企图寻获更多的资本。短期来看,他们可以通过征服其他地区,通过出售

自身的资产,或者通过威胁或剥夺资产所有者来获得资本。但是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取资源,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一种与那些能够为其提供或找到信贷资源的资本家们相联系的常规渠道;同时还不得不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常规征税手段,以对其辖区内的人民及其所从事的活动进行征税。

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国家的缔造者逐渐发展出了对促进资本积累的持久性兴趣,这有时隐秘地表现为给予其自身企业直接的利润回报。不同的国家在征税的难度、维持特定军备所需之耗费、抵抗竞争对手所要进行的战争数量等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导致了欧洲各国在基本形态方面的重要差异。但不论怎样,这些国家都起源于某一掌权者在毗邻其基地的特定疆域内所进行的垄断暴力手段的努力。

## 暴力和政府

那么,国家所使用的暴力与任何其他主体所使用的暴力到底有何不同呢?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同足以使人们相信“合法性”暴力与“非法性”暴力这样的区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国家的人员所提供的暴力比起其他组织的人员所提供的暴力有如下优势:它的范围更广,形式更为有效,能获得其臣民的更多认可,邻近地区的权威也更愿意与之合作。但是,这些区别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确立的。国家形成初期存在着众多势力派别,它们有的拥有使用暴力的权利,有的虽无此权利但事实上经常借助暴力来实现自身目标,有的则两者兼备。这些派别从强盗和海盗,到依赖征税官的国王、地区性掌权者,以及职业化士兵,不一而足。

在权力链条的上端,“合法性”暴力与“非法性”暴力之间的界限是模糊、可变的。在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很多派别或者有权动

用暴力,或者虽然无权但事实上使用暴力手段,或者既有权利又在实际当中运用暴力。雄心勃勃的国家缔造者与海盗或强盗之间既爱且恨的悠久历史,正说明了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之间的模糊界限。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记录16世纪时写道,“海盗的背后有城市与城邦的支持,而在陆上‘海盗’——匪帮的背后则是领主的长期帮助。”<sup>[2]</sup>的确,在战争年代,那些羽翼丰满的国家的统治者经常会授意私掠船只或者雇用强盗去袭击对手,并鼓励其常备军抢夺战利品。而皇家士兵和水手也常常被默许通过抢劫市民阶层来获取给养;他们霸占民田,强抢民宅,洗劫财物,攫取战利品,几乎为所欲为。这些人在被遣散之后会继续干着同样的勾当,只不过不再有皇家出面担保;被遣散的船只变成了海盗船,被遣散的陆军则成了匪帮。

反方向的转变也同时存在:国王最好的武装力量来源有时就是那些绿林大军。罗宾汉(Robin Hood)摇身一变成为皇家射手的故事或许只是一个传说,但它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对暴力之“合法”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武装力量逐渐得以统一并发展成为常备军。

前面提到,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港口城市和内陆领主们常常会为劫掠者提供保护,甚至是赞助。更有甚者,许多领主尽管没有称王,但是他们成功地昭示了自己征召正规军以及豢养私人武装家臣的权利。因此,如果不能动员起部分领主贡献其军事力量,任何一位国王都无法从事战争;这些拥有武装力量的领主同时也构成了国王的竞争对手和反对力量,因为他们也是敌人的潜在同盟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7世纪以前,对摄政权的争夺常常会引发王国内战;也正是出于同一原因,对每一个想要成为国家缔造者的人来说,裁减各方的武装力量就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举例来说,都铎王朝<sup>①</sup>就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道,“都铎家族最大的胜利就是”:

它最终宣称只有皇室才能垄断暴力——包括私人的和公共的暴力;这一胜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还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能够与英格兰习惯中的这一巨大变迁相提并论的只有这一事态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即警察力量的增长最终巩固了皇室对暴力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的效力从最大的城市一直渗透到最不起眼的小乡村。<sup>[3]</sup>

都铎王朝对大领主武装力量的剪除经历了四个相辅相成的运动:削弱领主与武装家臣之间深厚的个人纽带、拆除其城堡、革除其用武力解决争端的习惯、瓦解其与依附农和佃农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一任务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境地带(the Marches)实施起来更为棘手,因为波西家族(the Percys)和达斯家族(the Dacres)沿着边境修建了城堡并驻扎了军队,他们一方面威胁着都铎的王权,另一方面却发挥着抵抗爱尔兰人入侵的缓冲作用。尽管如此,两大家族最终也归顺了朝廷。

17世纪20年代,红衣主教黎塞留开始了对法国地方武装的大规模裁减。在黎塞留的建议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系统性地拆除了那些叛逆的大领主的城堡,不论其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国王的军队也因此不得不连年征战。黎塞留还公开谴责决斗、随身携带致命武器以及豢养私人武装的行为。到了17世纪20年代后期,黎塞留宣称国王

---

<sup>①</sup> Tudors, 都铎王朝, 英格兰统治王朝(1485—1603), 包括亨利七世及其后代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译注



对武力的垄断是不容置辩的原则。法国人随后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推行这一信条：

投石党人(the Fronde)引发的冲突让人们再一次目击了“贵族们”所聚集起来的军队。只有最后一位摄政王——即路易十四死后的国王,才没有引起武装叛乱。直到此时,黎塞留的原则成为现实。如同三十年战争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the Empire)只有境内公国君王(territorial princes)才有权征集军队,修建要塞……(法国)到处都在拆除城堡,购置火炮的高额成本、宫廷生活的吸引力、贵族也的确变得驯服,所有这一切都帮助推动了黎塞留原则的实现。<sup>[4]</sup>

到了18世纪后期,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君主都控制了一支足以与其邻国相匹敌的职业化常备军队,其力量远远超过境内任何其他有组织的武装势力。国家对大规模暴力工具的垄断也从一种学说变成了现实。

然而,地方敌对势力的消除也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由于国家规模远远超出过去的城邦国家,因此任何国王都无法仅仅凭借武力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也没有一位君主能够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而又确保其有效地将自己的意志传达给普通民众。直到近代以前,欧洲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实现像帝制时代的中国那样的从上到下顺畅的政治沟通;即便是罗马帝国也做不到这一点。法国革命以前,欧洲的每一个政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不得不借助乡绅来间接统治。这些乡绅与政府合作,但是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官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政府势力的支持,但在其所辖领土上又有着广泛的自主权:这种乡绅包括容克地主(junkers)、太平

绅士<sup>①</sup>以及贵族。但同是这些乡绅,有可能成为国王的潜在对手、反叛民众的潜在同盟。

最终,通过两项耗资巨大而行之有效的策略,欧洲各国的政府减少了对间接统治的依赖。策略之一是将其官僚体系扩展到地方社区;其二则是鼓励建立警察武装,该警察系统从属于政府而非私人庇护者,由于他们与发动战争所需的军事力量截然不同,因此也难以被有异心的地方乡绅所利用。然而,所有的国家缔造者都是采用一种混合策略:只要时机合适,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排除异己、镇压叛乱、分裂对手、威逼利诱甚至收买人心。所谓的收买包括给予免税特权、创设荣誉官职、确立获取国家财政资源的权利,以及建立其他诸多机制,地方乡绅的利益也因此而变得必须依赖于现有权力结构的维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的结果是普遍的驯服与国王对强制手段的全面垄断。

## 保护是一项买卖

回溯历史,主权者对不听指挥的竞争者所实施的招安、拉拢或是斩草除根的策略,着实是一项让人敬畏、崇高而有远见的事业,必然地会给一个民族带来和平;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力的扩张。如果一个掌权者能从提供保护的行为中获得收益,其竞争者将不得不认输。正如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在25年前指出来的:不管人们是否需要……政府都要兜售“保护”这一产品。莱恩

<sup>①</sup>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太平绅士, 又译治安法官(见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 出现于13世纪的英国, 是负责地方司法事务的富人团体, 在都铎王朝时期还接受国王的委任。选择“太平绅士”这一译法, 出自香港俗称, 而且这些人并非正式的政府官员, 故避免“法官”一词可能引起的“政府性”歧义(相比于《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同一英文术语在文中明确提到是美国人沿袭了英国旧制, 但去除了原来的贵族性质, 而且由州长直接任命, 有固定任期, 所以在美国的确是政府的“法官”)。——译注

认为,对暴力的生产和掌控倾向于垄断,这是因为同一区域内的竞争会导致成本不降反升。他指出,暴力的生产具有很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基于上述观点,莱恩区分了两个概念:垄断利润(monopoly profit)和保护租(protection rent)。前者又可称为贡税(tribute),是生产成本与从“消费者”那里所抽取的价格之差,该利润属于暴力的生产工具所有者。后者属于那些消费者——比如说商人,他们获得了防止外来竞争的有效保护。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威尼斯的卓越史学家,莱恩还特意考察了这样的案例:政府通过有意袭击其竞争者而为境内商人提供保护租。爱德华·埃姆斯(Edward Ames)和理查德·拉普(Richard Rapp)进一步发展了莱恩的思想,他们用“勒索之赎金”(extortion)这一更为恰当的词语取代了莱恩的“贡税”。在新的模型里,同一政府的华美衣冠之下赫然是掠夺、强制、海盗行径、强盗行为,以及敲诈勒索。

莱恩的模型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国王只需要5000万英镑就能够提供足够的兵力来抵御他自身及其臣民的外部敌人并让其臣民安于秩序,但他实际上能够为此从臣民那里征得7500万英镑的税收收入,那么他赚取的贡税是 $(7500 - 5000 = )2500$ 万英镑。如果该国王治下的某位商人臣民缴纳了自己10英镑税额就得以进入世界市场,而他的外国竞争者们却为此需要向他们自己的国王缴纳15英镑,那么这位商人便因为其国王的更高效率而得到了 $(15 - 10 = )5$ 英镑的保护租。这一逻辑与那些靠暴力吃饭的罪犯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逻辑只存在程度与范围上的差异。劳工敲诈(比如,某位船主为了避免码头工人滋生麻烦,需要不时地给予当地的工会头目报酬)运用的也是同一原则。工会领袖接受了船主的好处而向码头工人施加压力禁止其罢工;船主则避免了罢工,并较之其竞争者在码头工人麻烦方面付出的贡税

更少。

莱恩指出,将提供保护的政府分为下述不同类型,那么我们将看到其管理者的不同行为方式:一是全体公民所有型;二是单一自利君王所有型;三是管理者集体所有型。

如果全体公民能够有效地掌管政府——多么遥远的理想!——我们就可以期望管理者实现保护的成本和贡税最小化,从而使得公民的保护租最大化。相比之下,一个自利的君主则会导致贡税最大化,他会为了实现贡税最大化而有意设置成本,而且毫不在意臣民的保护租的多寡。如果是一群管理者掌控政府,他们将会给自己开出最高的薪俸而拔高成本,并且为了使成本之外的贡税最大化而向其臣民索取高价,同时他们对保护租也会置若罔闻。第一种模型接近于杰弗逊式民主,第二种模型就是可鄙的专制主义,第三种模型则近乎军政府。

莱恩忽视了第四种所有权类型:一个统治阶级掌控的政府。如果他有所涉及,他的研究将会为这样一类观点提供非常有意思的实证标准:即认为某一既定政府是“相对自主的”或是严格从属于某一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观点。可以推知,一个从属型政府会使垄断利润最大化——即提供保护的成本与所征收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该利润归统治阶级所有,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保留丰厚的保护租金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相比之下,一个自主型政府将会尽力使管理者的薪俸及政府规模最大化,并且不会在意保护租的多少。莱恩的分析方法显然启发了新的立论和进行检验的方法。

莱恩还推测,按照形势的发展逻辑,资本主义的历史大体应该依次经历四个阶段:一是无政府状态与抢劫横行的时期;二是贡税的征收者吸引了消费者,通过努力建立排他性的、真正的国家,最终确立了垄断权;三是商人和地主所获得的保护租开始超过统治者所获得的贡税;四是(非常接近现代的阶段)技术变革超越保护租,成为企业家的



主要利润来源。

在对西方世界的新经济史研究中,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以及罗伯特·保罗·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认为上述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出现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国家的缔造者确立了对武力的垄断权并建立了私有产权,从而使得个人能够从他们的促进增长型创新中获得大部分收益。从这一时候起,保护的价值彻底超越了贡税的成本。如果我们承认,受到保护的财产权主要是资本的产权,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有利于运作大型国家所需资金的积累,那么对莱恩的分析模式的扩展,就会为我们提供一种很好的洞察:即发动战争、国家形成与资本积累是同时发生的。

很不幸,莱恩本人没有充分发掘其思想的潜力。为了把自己的分析漂亮地纳入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古典框架之内,莱恩限制了对“保护”的技术化处理:他把所有的纳税人看成是制造保护的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的“消费者”,而全然不顾对“强制消费”理念的批评;他坚持认为“消费者”永远都可以拒绝付费并承担拒付后果,从而将保护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的分割性问题最小化,他还有意忽略了生产暴力手段的总体成本与利用这一暴力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保护的成本之间的差别。莱恩的思想在新古典框架内窒息了,却在这一框架之外获得了生机。尽管如此,不论是在新古典的框架之内还是之外,莱恩的思想都把对政府的经济学分析拉回到了历史现实中的政府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中:战争、镇压、保护与裁决。

最近,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运用类似的逻辑分析了1400年到1600年间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他采用有效武力生产的规模经济,然后抵消了控制与指挥的规模不经济。其结论认为,15世纪火炮技术的改进(加农炮使得中世纪的要塞在成建制的武力面前格外脆弱)移动了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曲线,使得拥有更大规模的军

队、常备军和中央政府的掌权者更具优势。因此,根据比恩的理论,军事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更大规模、耗费高昂、武装良好的民族国家的诞生。

## 让历史来说话

然而,比恩的概括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实际情况是,以火炮为先锋,以步兵为后续主力的攻城战略直到16和17世纪才出现。火炮技术的确在15世纪有所改进,但是新型防御工事,尤其是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nne*)的发明很快又抵消了火炮的优势。由于有效火炮技术出现得太晚,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引起民族国家的领土面积明显增长的趋势。(尽管如此,抵御火炮的防御工事的成本的攀升,的确使得具有多样化财政基础的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

同样地,陆战技术的变革也显然没有像比恩所想的那样发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同一时段发生的是,海战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明显,因而早已让军事优势转移到了诸如荷兰共和国那样的小面积的海权国家。而且,尽管许多城市国家和其他袖珍型自治实体,早在1600年以前就被更大的政治单元所吞并,但诸如哈布斯堡王朝分裂之类的事件,以及诸如波兰和俄罗斯这类幅员辽阔但结构松散的政治实体持续存在的事实,都使得我们无法就此轻易地下结论认为民族国家的地理面积有着显著增长。简而言之,无论是比恩所提供的解释还是他认为必须做出解释的现象的历史真实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如此,抛开他的技术决定论不谈,比恩的逻辑倒是为莱恩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不同的战争形态的确会导致供给成本的极大差异,对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控制程度也将出现重大差别。1400年以后,欧洲人竞相追求各式各样更大规模的、更持久而且耗资

更奢靡的军事组织,从而在事实上推动着王室预算、税收以及任职人员急剧膨胀。到大约 1500 年之后,那些成功建立起各种形式的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的国王们,的确变得更有能力大规模地开疆辟土。

我们不能被“疆土”一词所误导。直到 18 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是海上霸权,海战对于国家的国际地位依然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让我们来看一下费尔南·布罗代尔所罗列的资本主义世界先后出现的霸权政体:威尼斯及其帝国、热那亚及其帝国、安特卫普—西班牙(Antwerp-Spain)、阿姆斯特丹—荷兰、伦敦—英国、纽约—美国。尽管勃兰登堡—普鲁士算是局部性的例外,但总体来说,只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基本属于内陆地带的陆上强国才开始在世界国家体系中崭露头角。海战绝不是历史青睐海权国家的唯一原因。在 19 世纪晚期之前,陆地运输在欧洲各地都异常昂贵,如果没有高效的水路运输系统,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担负为一支军队或一个城市提供粮食及其他笨重物资的重任。要为柏林或者马德里(Madrid)这样的内陆中枢提供给养,统治者将不得不费尽心机而且会让其内陆腹地付出高昂代价。尼德兰洼地得天独厚的水路系统,无疑让荷兰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都具备了极大优势。

让水路交通显得如此关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布罗代尔名单上的大城市全都是主要港口、商业中心和关键的资本中枢。贸易和资本都服务于宏图大略的统治者之目的。因此布罗代尔的观察再次把我们带回到莱恩和比恩的论断,可谓殊途同归。考虑到他们中有两位是经济史学家,出现在他们的分析当中的最大的弱点更加显得让人惊讶:两位史学家都低估了资本积累对军队扩张的作用。

正如简·德·弗里斯(Jan de Vries)谈到 1600 年后的时代时所说的:

回顾历史,人们必然会震惊于绝对主义时期国家政权和军事强权二者与私营经济的效率之间近乎共生的关系。每个成功的朝代背后都伫立着一大批显赫的金融家族。与这些大资本家的私人纽带正是历代君王进行国家建设和实施集权政策的关键。君主们还需要有可直接获取农业资源的渠道,而要动员这种资源,既需要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还要求国王拥有高效的行政和军事手段来推行其意志。但相反方向的因果链条也存在:成功的国家建设和帝国扩张行动,以及城市人口的集中与政府支出这一相关趋势的发展,都为私营经济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独特而且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些规模经济偶尔会影响到工业生产,但是对贸易和金融的发展却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和其他经济力量一样,中央政府的高额税收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农民为市场而生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贸易创造和经济专门化的机会。<sup>[5]</sup>

这种共生关系并不只存在于1600年以后。就法国这一特殊的早熟案例来说,我们观察一下1515年至1785年间皇室支出和岁入的增长情况便可见一斑。尽管在1600年后法国王室收支两方面都相应地加速攀升,但在16世纪期间,二者就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自16世纪初开启的国际扩张进程到1550年之后因法国国内的数次宗教战争而暂缓;但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路易十三(Louis XIII)和路易十四(Louis XIV)[当然是在黎塞留、马萨林(Mazarin)、考伯特(Colbert)及其他追求国家建设的重臣能人的支持和唆使之下]以更加疯狂的热情继续着拓疆大业。基兰(V. G. Kiernan)评价道,“一如既往,有无数的政治利益支持发动战争,同时又有无数的金融难题相阻挠。”<sup>[6]</sup>

借贷和支付债务利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一矛盾共存的原



因。大资本家在交易双方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既是王室贷款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短期资金），同时又是风险高而利润肥的王室征税任务的最重要的承包商。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很有必要注意：

自弗朗索瓦一世时期开始出现的国债都是有实际用途的。1522年9月15日，由于丧失了通往意大利北部的要塞米兰（Milan），弗朗索瓦一世不得不从巴黎商人手中以12.5%的利息……借债20万法郎，用于扩大对查理五世（Charles V）<sup>①</sup>的战争。在市政当局的管理下，这笔债务开创了日后一系列著名债券的局面，这些债券都以巴黎市的财政收入为担保，即有名的“市政厅年金”（*rentes sur l'Hôtel de Ville*）。<sup>[7]</sup>

（顺带提一句，大约在120年后，由于政府未能支付这些年金，使得在投石党运动期间，巴黎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王权。）到1595年，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高达3亿法郎；即使国王能够借助政府破产、货币操控和大幅度提高税收等手段，但到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之时，法国的战争债务总额已经飙升至30亿法郎，等同于18年的王室岁入。<sup>[8]</sup>战争、新设国家机构、税收与借贷四方面因素紧锣密鼓、齐头并进。

尽管法国属于过早发展，但也绝不是唯一的案例。汉密尔顿伯爵（Earl J. Hamilton）深刻地指出，“比法国更为明显的是”：

英格兰的国家债务都是在重大战争期间发起并增长起来的。除了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库略有盈余以外，随着1689

<sup>①</sup> 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自西班牙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后，卡洛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他是弗朗索瓦一生的对手。——译注

年的威廉和玛丽共治开始,国家债务也开始现身。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正是那场始自1688年而终于1697年里斯维克条约(treaty of Ryswick)的战争,为当今大不列颠所欠之巨额债务开启了肇端。”<sup>[9]</sup>

不错,汉密尔顿接着引用了重商主义者查理·达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的话,后者在1689年抱怨政府借贷所助长的高利率束缚了英格兰的贸易发展。然而,达文南特的抱怨也表明,英格兰已经步入了上文弗雷德里克·莱恩所说的国家—资本关系的第三阶段,即商人和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剩余已经超过了保护的提供者所获之贡税。

16世纪以前,英格兰人一直希望他们的国王靠王室财产的收入自给自足,只有战争原因才能对国民征税。埃尔顿(G. R. Elton)留意到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于1534年和1540年为亨利八世(Henry VIII)起草的特支费草案(subsidy bills)所表现出的重大创新:“1540年(的草案)非常小心地延续了1534年的一项真正的创新,即可以在非战争的理由下征收特别税费。”<sup>[10]</sup>然而,除此之外一切还是和从前一样,发动战争依然是刺激税收和债务大幅提高的主要动因;鲜有税收和债务的缩减。皮科克(A. T. Peacock)和怀斯曼(J. Wiseman)所说的“置换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s)(有时其他学者称之为“棘轮效应”)就发生了:战争期间公共收入和支出急剧上升并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随后进入和平时时期时,公共收入和支出将不再滑落到这一新的水平之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税负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5%上升到25%,几乎是当时法国税收总额的三倍。<sup>[11]</sup>

事实上,英国在税收方面具有双重优势:一方面它较之其欧洲大陆上的竞争对手更少依赖于昂贵的土地要素;另一方面它的税收更多

地来自关税和消费税,这类税收虽然易于规避,但征收成本却远低于土地税、财产税和人头税。尽管如此,英格兰与其他地方一样,自17世纪以后债务和税收便持续高速膨胀。上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战争成本的大幅攀升。

## 国家做什么

现在已经清楚的一点是,国家所控制的暴力有多种用途,而莱恩关于保护的分析并没有对此进行区分。在有组织的暴力这一大标题下,各种国家机构通常进行如下四种不同的活动:一是发动战争,尽力消除其领土之外的竞争对手或者抑制其发展,从而确保自己在境内明确而持久的优先动武权;二是缔造国家,在领土之内清除或压制其竞争对手;三是保护,剪除或打击其所保护对象的敌人;四是汲取,获取从事前三项活动——发动战争、缔造国家和保护——的手段。

第三种活动对应于莱恩所分析的保护,但是其余三项也涉及到武力的运用。他们彼此之间不完全地重叠着,而且重叠程度各异;比如,针对本地资产阶级的商业对手而发动的战争,同时也是对本地资产阶级的保护。而如果一国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划分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阶级,当政府有意地偏袒此阶级或者彼阶级时,缔造国家的活动事实上就会减少曾经给予某些阶级保护的程度。

发动战争、缔造国家、保护和汲取,每一项活动都采取了多种形式。比如,汲取就涵盖了从公然的抢掠到定期向官僚化的征税机构上缴贡赋。然而,这四项活动都取决于政府对集中化的强制手段的垄断倾向。在那些主导政府的人看来,所有这些活动——如果能够有效实施——往往会互相强化。因此,一个成功地铲除了内部竞争对手的政府,同时也会使其汲取资源、发动战争和保护其主要支持者的能力得

到增强。就欧洲的早期经历而言,从广义上来说,那些支持者以地主、国王的武装侍从和教士最为典型。

暴力的这些主要运用都会产生极富特色的组织形式。发动战争缔造了陆军、海军和相关的服务机构。缔造国家的行为在领土范围内催生了用于持久性监督和控制的工具。保护依赖于从事战争和缔造国家所确立的组织,但保护也为国家增添了新的机制,使得被保护者能够通过诸如法院和代表大会等机构来要求那些他们应该得到的保护。汲取则引发了财政和会计结构的创新。暴力的组织与配置本身,就说明了欧洲国家结构的诸多特点。

这里的一般性法则似乎是这样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活动的成本越高,其组织残留也越大。比如,就某个政府进行大规模常备军的投资而言——一种从事战争的手段,即使有效成本也会高昂——为服务军队而设立的官僚体系很有可能也会变得非常庞大。而且,相比于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只控制少量人口的政府在建设常备军方面会花费更高的成本,从而其相应的官僚体系也会更为庞大。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就是一个就其可用资源而言所付代价过于高昂的经典案例。为了打造一支能够与其欧陆强邻相匹敌的军队,普鲁士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官僚体系,从而把德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化和官僚化了。

在汲取方面,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资源存量越小,经济商品化程度越低,为维持战争以及开展其他政府活动而抽取资源的困难就越大,其财政机构遍布也就越广泛。英格兰便有力地支撑了这一命题:它的财政机构规模不大,却汲取了相当大量且商品化程度较高的资源。此外,如同加布里埃尔·阿登特(Gabriel Ardant)所主张的那样,财政战略的选择可能也会引发不同的结果。总的来说,土地税比起贸易税的征收成本更高,特别是大规模贸易流通过检查站便可以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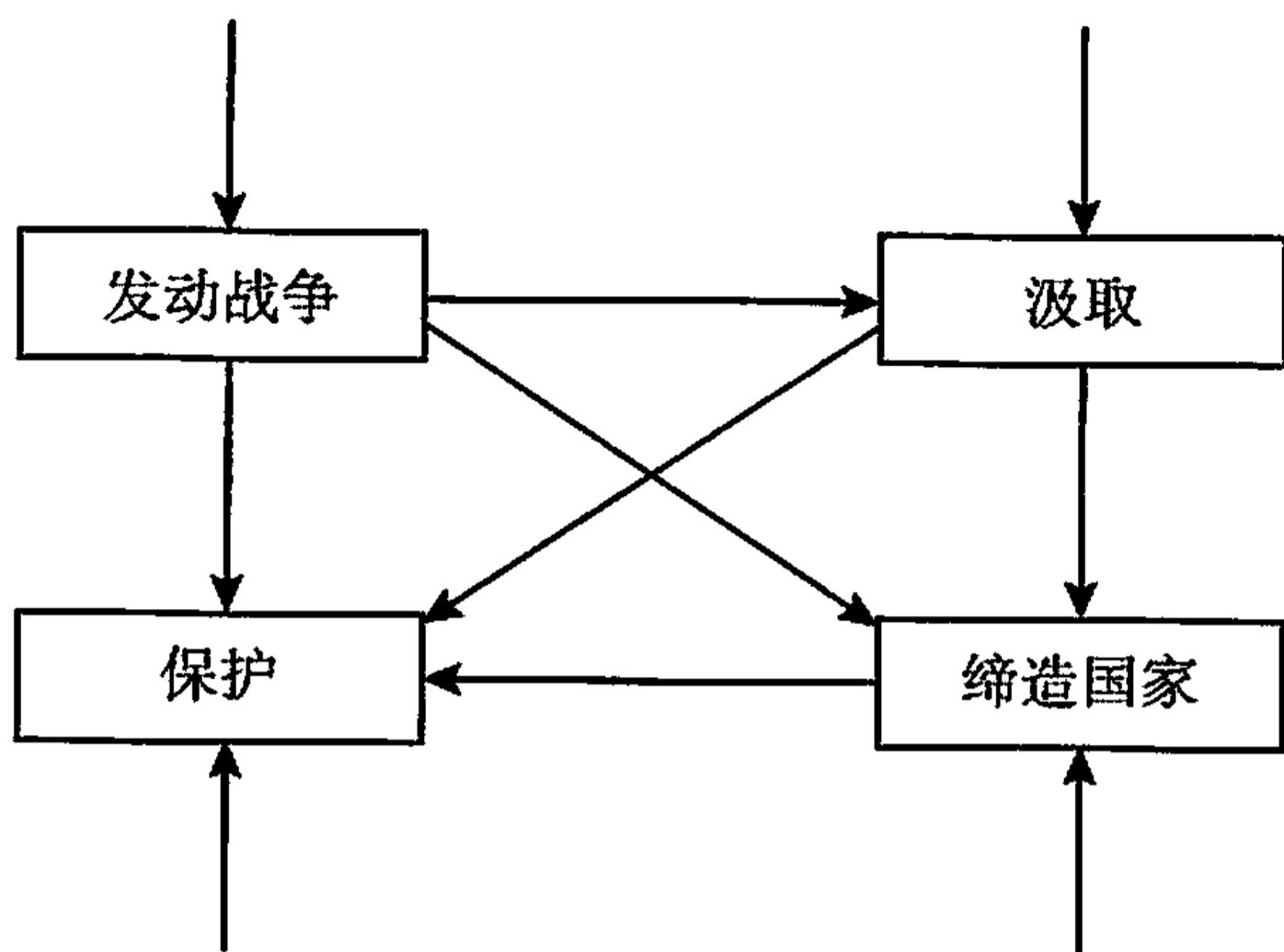
控制。占据着波罗的海人口港的有利位置,丹麦从关税中获取了极其可观的利润。

在缔造国家问题上(指狭义上的消除或压制国家统治者的本地竞争对手),由大地主或多个宗教派系所盘踞的地域,相比于权力分散或文化同质(的区域),将会耗费征服者更高的成本。在这方面,同质化程度高但构成极为分散的瑞典就是很好的例证,它的控制机器相对较小,但控制效力很高。

最后(就替受国家缔造者所保护的對象清除或打击竞争对手而言),保护的成木会随着保护范围的扩展而增加。葡萄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学案例,它试图阻止其香料贸易中的商业对手使用地中海航道,这一保护性的努力并不成功,葡萄牙也为此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因此,政府的规模与国家在汲取、缔造国家、保护,以及特别是发动战争等方面付出的努力直接正相关,而与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和资源基础的广度负相关。而且,随着在汲取、缔造国家、保护和发动战争等方面成本—资源比率的不同,相对应的政府差异性特征也各异。在西班牙,我们看到了宫廷和法院的过度扩张,这是若干世纪来努力清除内部政敌的结果;而在荷兰,我们却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富裕的商品化经济体中,管理如此巨额税收的竟然只是很小的一个财政机构。

很显然,发动战争、汲取、缔造国家和保护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用一种更为抽象的说法,欧洲缔造国家的典型经验遵循以下因果模式,理论上的发展次序是:某位大领主有效地发动了一场战争并成功地主宰了某一资源富裕的领土;然而战争迫使他在该领土上不断强化对作战手段的汲取——包括人力、武器、粮食、住宿、运输、补给品以及/或者购买这些战争物资所需的资金。因此,在完善其战争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汲取能力。这种汲取活动如果进行得很成功,就会帮助



清除或者压制该领主的地方政敌，或者使之归顺；最终的结果便是缔造出了一个国家。作为一项副产品，这一过程创造出了各种形式的组织：征税机构、警察部队、法院、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结果，这些组织又帮助推动了国家建设。在较小的程度上，随着国家机器中常备军、战争工业、辅助官僚体系以及（比较晚近的）学校系统的发展，发动战争也通过军事组织自身的膨胀同时促进了国家的形成。所有这些结构都遏制了潜在的对手和敌人。在发动战争、汲取资源和建设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政府的管理者与特定的社会阶级结成了联盟。这些阶级的成员给予资源借贷、提供技术服务，或帮助管理者确保其余社会阶层的顺从，反过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换取管理者的保护，使该阶级成员免受其自身的竞争对手和敌人的侵犯。经由这些多重战略选择，欧洲每一个主要地域上都矗立起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国家组织。

## 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以上分析如果正确，将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点，民众对发动战争和缔造国家的抵制会产生结果上的差异。如

果普通民众强烈反对这两种进程,政府当局将不得不做出让步:确保公民权利,设立代议制机构和上诉法庭。这些让步反过来限定了以后发动战争和缔造国家的路径选择。很显然,民众运动如果能和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派系结成联盟,必然会极大地增强其行动效果。1640年英国的上层贵族被广泛动员起来共同反对查理一世,使得这场革命给英格兰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影响,比都铎王朝时期的任何一次叛乱都更为深刻。

84 第二点,发动战争、保护、汲取和缔造国家彼此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对它们所催生的政府组织形式有着重大影响。比如,如果战争的进行只需要相对较少的汲取、保护和国家机器缔造活动,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军事力量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更为强大、自主的角色;欧洲最好的样本或许是西班牙。而如果保护活动相对强于发动战争、汲取和缔造国家等活动,如同威尼斯和荷兰那样,那么最终会是被保护阶级的寡头们主宰国家政治。又倘若缔造国家的活动占据了上风,结果必然是治安维持与监督机构(警察)超常规的强大;教皇国便是这种极端案例。20世纪以前,(上述四种活动间)稳定的不均衡关系的类型非常有限。那些未能投入相当大的努力来从事战争事业的国家很容易被历史所淘汰。然而,随着20世纪的缓步向前,某一国家将战争工具出借、赠予或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做法日渐盛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国可能虽然用更多的精力从事汲取、保护和/或缔造国家的活动,但仍然能够存续。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美国和前苏联的附庸国提供了无数这样的例证。

尽管如此,这个简化的模型忽略了能够影响所有民族国家的外部关系。在早期历史中,“内部”和“外部”的区别,与“国家权力”和“与该政府结盟的领主之权力”的区分一样,非常模糊。后来,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将所有后来所说的民族国家纳入了欧洲的国家体系。首先是以借贷和供给形式存在的资源流动,尤其是战争所需的贷款和物资供给。其次是在争议地区的国家间霸权竞争,这刺激了战端并暂时

性地消除了发动战争、缔造国家和汲取之间的差异。最后是断续存在的国家联盟机构,这类机构将各国力量临时组织起来,强迫某一国家以某种形式和身份加入到它们的国际体系中。战争联盟是这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和平联盟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从1648年开始(如果不是更早),所有战事终结之后,各欧洲战胜国都会暂时性地联合起来,针对战败国的边界和统治人选问题相互谈判。从那时起,每当大范围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国家体系便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大重组进程。一般而言,从每一次大型战争之后所存续下来的民族国家,都要少于原先的参战国。

## 作为国际关系的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战争成为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常态,也是一国捍卫或增强其国际地位的常用手段。为什么要战争?最终的答案必然不会太简单;战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可以服务于一个以上的目的。但是,答案的一部分内容确实需要我们回到缔造国家的核心机制上来:某位地方性领主试图捍卫或者扩张其边界,为此目的,他不得不垄断各种暴力工具,从而提高其所获得的贡税收益,这一逻辑的大规模延伸便是战争。在这一过程初期,外部和内部的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只有当大领主战胜其对手,并在一片较大地域上确立自己的控制权时,内部和外部的分界线才变得鲜明起来。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对竞争逻辑的总结切中肯綮:

全球性力量……进一步强化了具备这种力量的民族国家相对于所有其他政治实体或其他类型组织的优势地位。而且,在全球权力游戏中竞争的其他国家也发展出了相似的组织形式和相



似的耐久力：他们也变成了民族国家——这或者是出于一种防卫性的反应措施，因为它们被迫反对或对抗某一全球性强权国家，如法国之面对西班牙和后来的英国；或者是力图模仿某一强权明显的成功之道和有效措施，如德国仿效世界霸主时期的英国，或者如更早时期的彼得大帝以荷兰为样本重建俄国。因此，不仅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成了民族国家，西班牙、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也一一转型。为什么当“大多数欧洲民族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都惨遭失败”之时，上述国家却获得了成功？一个简明扼要的回答是：它们，或者是全球性强权，或者是成功地与这种强权共同作战或是与之对抗。<sup>[12]</sup>

国际体系内缔造民族国家的逻辑，实质上是在更大规模上应用地方性扩张的逻辑；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互为补充。

如果允许对“从内部”和“从外部”启动的国家缔造进程做个粗糙的区分，我们便可以把欧洲国家的缔造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某些掌权者在“外部”斗争中所取得的差异性成功，奠定了力量部署时在地域上的“内外”差别；（2）“外部”竞争催生了“内部的”国家缔造；（3）国家间的“外部”契约更为有力地影响到特定国家的组织形态和国际地位。按照这种观点，那些由各个国家所组成（state-certifying）的组织，例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只不过是欧洲范围内的（国家缔造）进程向整个世界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血腥的或是和平的，去殖民化运动（decolonization）只不过是借助由现存国家联合创造新民族国家的方式进一步完成上述进程。

尽管如此，欧洲范围内的国家缔造进程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并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国家都发展成欧洲的模式。一般说来，诸如对地区性大领主的钳制和对农村地区的征税等内部斗争，导致了欧洲国

家的一些重要的组织特征：军事力量相对从属于文官控制，大规模的财政监督机构，遭受侵犯的利益群体通过请愿和议会进行申诉的代表制度。但总体而言，其他地区的国家发展情况则截然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军事组织上。通过与其臣民的持续斗争以及选择性地将保护扩展到其臣民中的不同阶级之上，欧洲国家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机构。关于保护的协议限制了统治者自身，使得他们受制于法庭、议会，害怕没有贷款、被迫撤军或是丧失重要的专业支持。

那些近来在去殖民化运动中兴起或是由强势国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成立的国家，由于缺乏像欧洲国家那样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相互约束性的缔约过程，因此主要从外部获取军事组织。因为有外部国家持续地提供军事物品和专业知识以交换该国的商品、军事同盟或二者兼有，那些新兴国家得以豢养起足以令其领土内其他组织相形见绌的、强大而不受约束的组织机构。由于外部国家愿意保证其国界稳定，这些军事组织的管理者便在其领土内部掌控了巨大的权力。当军事势力的优势如此强大时，利用这一优势来攫取全面的国家权力的动机也迅速膨胀。尽管欧洲国家在建国过程中，通过战争占据了广大的地盘，欧洲古老的民族国家几乎从未出现过军事组织与所有其他类型的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严重失衡，但当今的这些附庸国家却似乎摆脱不了这一厄运。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可能曾为民权政府(civil government)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庆贺。而在我们这一时代，发动战争和缔造国家(一方面)与有组织的犯罪(另一方面)之间在逻辑上的相似性，正令人悲哀地日益突显。

## 注 释

[1] Arthur L.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 150; 原文是意大利文。

[2]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Armand Colin, 1966), vol. 2, pp. 88 – 89.

[3] 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p. 200.

[4] Dietrich Gerhard, *Old Europe: A Study of Continuity, 1000 – 18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pp. 124 – 125.

[5] 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 –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6] V. G. Kiernan, *Stat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550 – 1650* (Oxford: Blackwell, 1980), p. 104. 有关法国的财政情况, 参见 Alain Guery, “Les Finances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sous l’Ancien Regim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3 (1978), p. 227。

[7] Earl J. Hamilton,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Debt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o* (Milan: Giuffrè, 1950), vol. 2, p. 254.

[8] Ibid., pp. 247, 249.

[9] Ibid., p. 254.

[10] G. R. Elton, “Taxation for War and Peace in Early-Tudor England,” in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Joslin*, ed. J. M. Win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2.

[11] Peter Mathi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2.

[12]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 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78): 231.

## 参考文献

Ames, Edward, and Richard T. Rapp.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axes: A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1977): 161 – 178.

- Ardent, Gabriel.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Badie, Bertrand. *Le développement politique*. 2nd ed. Paris: Economica, 1980.
- Badie, Bertrand, and Pierre Birnbaum. *Sociologie de l'Etat*.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79.
- Bayard, Françoise. "Fermes et traités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sup>e</sup> siècle (première esquisse 1631 - 1653)." *Bulletin du Centr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no. 1 (1976): 45 - 80.
- Bean, Richard.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203 - 221.
- Blockmans, W. P. "A Typology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4 (1978): 189 - 215.
- Blok, Anton.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1860 - 1960: A Study of Violent Peasant Entrepreneurs*. Oxford: Blackwell, 1974.
- Booney, Richard. *Political Change under Richelieu and Mazarin, 1624 - 166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raudel, Fernand.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2d ed. 2 vols. Paris: Armand Colin, 1966.
-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3 vols. Paris: Armand Colin, 1979.
- Braun, Rudolf. "Taxatio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tate-Building: Great Britain and Brandenburg-Prussia."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Steuern und Staatsfinanzierung als Modernisierungsfaktoren: Ein deutschenglischer Vergleich." In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edited by Reinhard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7.
- Carneiro, Robert. "Political Expans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 Exclusion." In *Origins of the State*, edited by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8.
- Carsten, F. L. *The Origins of Prus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 Chapman, Brian. *Police State*. London: Pall Mall, 1970.
- Cipolla, Carlo M. *Guns, Sails, and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 – 1700*.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1965.
- Clark, Sir Georg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States."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5,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 – 1688*, edited by F. L. Carst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Cooper, J. P.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ontinental Government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I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edited by J.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0.
-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4,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irty Years War, 1609 – 1658/1659*, edited by J. P. Coo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Davis, Lance E. "It's a Long, Long Road to Tipperary, or Reflections on Organized Violence, Protection Rates, and Related Topics: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1980): 1 – 16.
- Dent, Julian. *Crisis in Finance: Crown, Financiers,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Newton Abbot, United Kingdom: David & Charles, 1973.
- Dickson, P. G. M.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 – 1756*.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67.
- Elton, G. R. "Taxation for War and Peace in Early-Tudor England." In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Joslin*, edited by J. M. Win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Finer, Samuel E. "State-building, State Boundaries, and Border Control."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3(1974): 79 – 126.
- "State-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Formation*

-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Fueter, Edward.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492 – 1559*. Munich: Oldenbourg, 1919.
- Gerhard, Dietrich. *Old Europe: A Study of Continuity, 1000 – 18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Gooch, John, *Armie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Guenee, Bernard. “Y a-t-il un Etat des XV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s* 36(1981) : 399 – 406.
- Guery, Alain. “Les finances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sous l’Ancien Regim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3(1978) , 216 – 239.
- Hale, J. R. “Armies, Navies, and the Art of War.”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2, *The Reformation 1520 – 1559*, edited by G. R. El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Armies, Navies, and the Art of War” (sic).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3,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 – 1610*, edited by R. B. Wern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Hamilton, Earl J.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Debt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o*, vol. 2. Milan: Giuffre, 1950.
- Harding, Robert R. *Anatomy of a Power Elite: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of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Hechter, Michael, and William Brustein. “Regional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Patterns of State Form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980) : 1061 – 1094.
- Hintze, Otto. *Staat und Verfassung: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allgemein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Edited by Gerhard Oestreich.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2; originally 1910.
- Howard, Michael.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James, M. 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Tudor North: The Rise of Thomas First Lord Wharton*. Borthwick Papers no. 27. York: St. Anthony's Press, 1965.

"The First Earl of Cumberland( 1493 – 1542) and the Decline of Northern Feudalism." *Northern History* 1( 1966) : 43 – 69.

"The Concept of Order and the Northern Rising, 1569." *Past and Present* 60( 1973) : 49 – 83.

John, A. H. "Wars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700 – 176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 7( 1955) : 329 – 344.

Kiernan, V. G. "Conscription and Society in Europe before the War of 1914 – 1918." In *War and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ur and Memory of J. R. Western, 1928 – 1971*, edited by M. R. D. Foot. London: Elek Books, 1973.

*Stat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550 – 1650*. Oxford: Blackwell, 1980.

van Klaveren, Jacob. "Die historische Erscheinung der Korruptio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44( 1957) : 289 – 324.

"Fiskalismus-Merkantilismus-Korruption: Drei Aspekte der Finanz-und Wirtschaftspolitik während des Ancien Regim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47( 1960) : 333 – 353.

Ladero Quesado, Miguel Angel. "Les finances royales de Castille a la veille des temps modern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5( 1970) : 775 – 788.

Lane, Frederic C. "Force and Enterprise in the Creation of Oceanic Commerce." In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 Supplement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0 ( 1950) ], pp. 19 – 31.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 ( 1958) : 401 – 417.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War and Protection." In *Venice and Histor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C. Lane*.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6; originally 1942.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Growth in Early Modern Times." *Journal of*

- Economic History* 35(1975): 8 – 17; with comment by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pp. 18 – 19.
- Levi, Margaret. "The Predatory Theory of Rule." I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edited by Michael Hecht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Ludtke, Alf. "Genesis und Durchsetzung des modernen Staates : Zur Analyse von Herrschaft und Verwaltung."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0(1980): 470 – 491.
- Lyons, G. M. "Exigences militaires et budgets militaires aux U. S. A." *Revue Francaise de Sociologie* 2(1961): 66 – 74.
- Mathias, Peter. "Tax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Britain, 1700 – 1870."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Peter Mathi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Michaud, Claude. "Finances et guerres de religion en France."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8(1981): 572 – 596.
- Modelski, George.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78): 214 – 235.
- Nef, John U. *War and Human Progress: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 – 1640*.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originally 1940.
- Noth, Douglass C. ,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O'Donnell, Guillermo. "Comparative Historical Formations of the State Apparatu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2(1980): 717 – 729.
- Parker, Geoffrey.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 – 16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eacock, Alan T. , and Jack Wiseman.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oggi, Gianfranc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olisensky, Josef V.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618 – 16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ounds, Norman J. G. , and Sue Simons Ball. "Core-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4 (1964) : 24 – 40.

Ramsey, G. D. *The City of Lond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Elizabeth Tudo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5.

Redlich, Fritz.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2 vols. Wiesbaden: Steiner, 1964 – 1965.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en 47, 48.

Riemersma, Jelle C. "Government Influence on Company Organization in Holland and England( 1550 – 1650) . "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0( 1950) ], pp. 31 – 39.

Romano, Salvatore Francesco. *Storia della mafia*. Milan: Sugar, 1963.

Rosenberg, Hans.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 – 181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Russett, Bruce M. *What Price Vigilance? The Burdens of National Defense*.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Schelling, Thomas C. "Economics and Criminal Enterprise. " *The Public Interest* 7 (1967) : 61 – 78.

Steensgaard, Niels.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Stein, Arthur A. , and Bruce M. Russett. "Evaluating War: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 "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 Ted Robert Gur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 Stinchcombe, Arthur L.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 Stone, Lawrence. "State Control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7(1947): 103 – 120.
-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 – 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 Tenenti, Alberto.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1580 – 161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Torsvik, Per, ed. *Mobilization,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s and Nation-Building: A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Stein Rokkan*.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1981.
- de Vries, Jan. "On the Modernity of the Dutch Republic."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973): 191 – 202.
-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 –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Barges and Capitalism: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Dutch Economy, 1632 – 1839," *A. A. G. Bijdragen* 21(1978): 33 – 398.
- Wijn, J. W. "Military Forces and Warfare 1610 – 1648."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4,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 – 1658/1659*, edited by J. P. Coo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Williams, Penry.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War and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ur and Memory of J. R. Western, 1928 – 1971*, edited by M. R. D. Foot. London: Elek Books, 1973.
- Wolfe, Martin. *The Fiscal System of Renaissance Fra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Zolberg, Aristide R.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tates: France and Engl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2(1980): 687 – 716.

## 六 跨国联系与国家的经济角色

### ——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家的分析

彼得·埃文斯

正如内特尔(J. P. Nettl)在一篇关于国家的开创性论文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对国家与外部世界间的关系进行规制是国家权力的传统核心所在。<sup>[1]</sup>作为制度组织存在的国家,除了常常要关注国内,还必须放眼于外界。这不仅因为一个国家得以继续生存的主要前提,是能够在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军事竞争中取得胜利,同时还因为市场从来都是跨国性的。在当代,经济活动的跨国特性已然变得更为普遍了。

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对于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所有国家而言,这已经成为战后经济增长的一个广泛特征。对于最贫穷的国家,发展意味着从相对自给自足、维持生存的生产转变为向国际市场出口初级产品。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经济的日益差异化意味着两件事:首先其主要产业部门正逐渐被跨国公司所主导,同时这些国家最近正日益严重地依赖于国际金融资本。而在像美国这样的中心国家中,其主要的产业公司与金融公司的利润比重正日益倾向于其在国外的经济活动,而且这些公司卓有成效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对外投资而非国内投资领域。

在过去 20 年时间里,各类国家都见证了国际贸易带来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张。无论是工业化市场经济体还是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上升了 50%。而在美国,这一比重几乎翻了一番。<sup>[2]</sup>相对于民族国家国内生产的增长,资本的国际流动也在增多。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直接投资资本流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上升了三分之二,而流入美国的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至四倍之多。<sup>[3]</sup>借贷资本的流动增长最快,超过了贸易和直接对外投资。这对于最具跨国特点的资本市场——欧洲货币市场(Eurocurrency Markets)——来说,尤其如此。

市场正变得日益跨国化,这会如何影响国家的经济角色呢?有假说直接指出,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国家已经过时了。随着私人跨国行为者的范围和重要性不断扩展,合法管辖权在地理上受到限制的国家机构也就相应地被削弱了。这派观点的支持者,不仅包括如乔治·鲍尔(George Ball)<sup>[4]</sup>这样的对跨国公司权力的拥护者,也包括对跨国行为主体的批判者,比如巴尼特和米勒(Barnet and Müller)<sup>[5]</sup>。

对于那些通过依附论途径或是世界体系视角审视跨国经济的人而言,另外一种假说似乎更为可信。日渐频繁的跨国交换所带来的结果,取决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来自核心国家的跨国行为主体的力量会进一步提升其母国的权力地位。日益增强的跨国流动在强化核心国家的同时也更加弱化了边缘国家。贸易关系和资本流动都是不对称的,它们将剩余转移到核心国家,还破坏了边缘国家的资源基础。这两者都有利于边缘国家的精英,他们的利益取决于弱的而非强的国家官僚体系。

还有第三种可能的解释,即跨国流动的日渐重要性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中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国家机器的重要性,这种假说在文献中的地位不如其他解释那么显著。但是,以



下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根据的：最近几十年的特点不仅是跨国经济流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同时国家机器的作用也在增强。“二战”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增长，这种现象并不像依附理论或是世界体系理论预测的那样只是发生在中心国家，而是同时发生在中心和边缘国家。<sup>[6]</sup>当然，跨国化和国家机器的增强也许是同时发生但却相互独立的趋势。不过，这种同时发展表明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国家经济角色扩张和跨国联系的日益广泛，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而非相反的关系。

本文将关注的是第四种，也是在逻辑上最有可能的解释。我将提出：跨国经济联系的增强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绝不是全部）中国家角色的扩张常常是相互联系的；而对于那些已经成为主要资本输出者的核心国家（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中心）来说，跨国经济联系的增强则抑制了国家角色的扩张。我提出这一观点并非只是为了对上述观点进行挑衅，本文有大量的证据作为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详细考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工业国家中，跨国经济联系对国家角色扩张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的混合影响。

对国家经济角色扩张的主要考察根据，是国家控制国内经济资源的日益增长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本文的关注点在于国家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以及它相对于国内私人精英的权力，而不在于国家实现自己经济目标的总体能力（overall ability）。不过，国家实现经济目标这种更宽泛意义上的能力与国家经济角色扩张之间的脱节，将会是本文反复出现的主题。

研读关于跨国联系和国家角色的文献，会使人区别对待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学术界对边缘国家的依附状态的后果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等议题，一直有着很强的研究传统，同时

也有大量的文献在探讨国际经济联系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后果,但对这两类现象的研究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处,从而指出它们融合的可能性,应该是本章的副产品之一,但首先该做的是按照各自的研究路径分别对它们进行探讨。

对于边缘国家,我们将逐一考察贸易的影响、对采掘企业(extractive ventures)的直接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外债。对于核心国家,本文的首要任务是区分出资本输出国与那些以贸易和资本流入为最重要的跨国联系的国家。尽管整个讨论主要是“经济学家式”的,但在很多时候都需要考虑跨国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尤其是那些核心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之间的互动。

## 跨国联系和第三世界国家

在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特性和能力的论述中,跨国因素总是非常重要的。边缘国家一旦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国内生产设备的发展刚刚起步,它们在国际市场中往往被迫处于严重依赖的地位。殖民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以及边缘国家相对于核心国家的军事劣势,都强化了这种对外的经济依赖。在第三世界国家,控制着或者有能力挑战国家机器的统治精英,除了掌控该国国内矿产和种植园的外国所有者之外,还包括该国的买办商人和农产品出口商。这些精英的经济财富主要依赖于保持通畅的国际市场通道,而不在于转变国内的经济结构。一旦第三世界经济体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最具活力的工业部门就会被跨国公司所主导,而这些跨国公司对全球性利润的追求,必定常常与当地企业的资本积累逻辑相抵触。

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机器受跨国联系的制约,这种联系削弱了它们促进国内积累的能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在某些情

况下,普遍意义上应对跨国联系的挑战以及特定意义上与跨国资本展开的竞赛,也许会刺激新的国家能力的发展,还有可能将国家角色在本该属于私人资本专属地的领域内的扩张合法化。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跨国资本可能更偏爱与一个“更加强势”、官僚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机器打交道。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澄清而不是否认国内经济活动的跨国化限制了国家实现其经济目标的事实,并以此来严肃看待跨国联系对国家经济角色所带来的扩张效应。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仔细审视不同时段、不同国家中不同类型的跨国联系所造成的影响。

## 贸易的影响

无论从贸易中能够获得何种经济收益,对国际贸易的过分依赖将使一个社会在经济互动变迁面前变得格外脆弱,因为这种变迁完全处在国家管辖权之外,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去控制它。就这一基本的意义而言,对贸易的依赖经常会制约国家实现经济结果的能力。至少从普雷维什(Prebisch)开创性的著作开始,研究边缘国家的分析家们认为,这些国家进口和出口商品的特性会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然而,在有关不平等交换引起的经济代价这个问题之外,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能力是如何受到影响的;这方面的证据仍然十分模糊。

只与一个特定的伙伴进行贸易,似乎真的和国家机器财政汲取能力的缺乏相关。<sup>[7]</sup>在这种单方垄断性贸易模式下,如果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方正式或非正式地从事着政治控制,与之交易的国家就更难以采取有效国家行动。那些关于不能有效促进发展的殖民地政府的典型案例,以及更为臭名昭著的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新殖民主义都属于这类情况。<sup>[8]</sup>赫希曼(Hirschman)对纳粹试图利用垄断性的贸易模式在东欧和南欧小国建立新殖民关系的记述,也指明了同样的相关性。<sup>[9]</sup>

然而,贸易本身的相对比重,似乎对国家能力并不具有明确的负面影响。初步的检验,比如说,对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以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所衡量的国家能力两者所进行的相关性分析,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稳定的负面影响。<sup>[10]</sup>

系统地分析贸易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后果,需要检验各种不同情况:初级产品和制造品,贸易伙伴和商品集中度高的国家与集中度低的国家,等等。在此,我只想用一个例子来削弱以下这个假设,即严重依赖于一种产品,并将其大部分卖给一个顾客,将会有利于产生或者维持一个消极的买办国家。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对20世纪上半叶巴西政府在咖啡贸易规制中的角色研究,正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案例。<sup>[11]</sup>克拉斯纳表明,尽管巴西的贸易伙伴和商品都比较集中,但是巴西仍然能够操纵世界咖啡市场,增加出口收入,降低收入波动性。国家干预国际咖啡市场的能力与它在控制国内生产者行为方面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干预能力在保持总需求方面产生了凯恩斯式的重要结果。<sup>[12]</sup>

巴西国内的农业精英对难以驾驭的、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的依赖,使他们认识到拥有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规制价格的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因此,在20世纪早期,巴西的咖啡种植者接受了国家的支持,并在关键时刻(1930年革命)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式的、不干涉主义(noninterventionist)的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个政权有意愿也有能力去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sup>[13]</sup>尽管这种对更为积极的国家机器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农作物的特点和国际市场的特性,但是它的确和那些与国家政权相比更偏重国内市场的农业精英的行为大为不同。<sup>[14]</sup>

当然,巴西政府干预咖啡贸易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



出于政治考量而牺牲其本国消费者利益的合作意愿。如果国内咖啡价格对美国政府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或者如果美国不大愿意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去支持巴西的努力,那么,作为规制国际价格基石的国际咖啡协定原本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巴西规避国际市场逻辑的能力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经济大萧条初期,咖啡价格的陡然下跌、整个 20 世纪咖啡消费需求的停滞,以及其他国家对这一曾经专属巴西市场的逐步侵入,都构成了巴西在这一贸易领域中的国家能力的约束条件。

咖啡是检验贸易影响的一个有用案例,因为咖啡不涉及外国对国内生产设施的所有权问题。对于大部分产品和国家而言,它们依赖国际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必须与它们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效应同步考察。的确,有关跨国联系和国家角色的绝大部分研究的产生,都与对跨国采掘业投资后果的考察有关。

### 采掘业中的跨国公司与国家

采掘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保罗·巴兰(Paul Baran)论述的典型依附类型的原型基础。采掘业在其作业地区的运作只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受到地方市场发展的影响,因为发展会使当地劳动力价格更为昂贵;因此采掘业的投资者似乎完全有理由偏爱一个能力仅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国家。但是,对跨国数据的定量分析表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采掘部门所占份额这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up>[15]</sup>历史案例研究也显示出同样的关系。随着这些跨国行为主体广泛地渗透到国内经济当中,有关国家都相继出现了这样的国家机器:它们不仅成功控制了当地的采掘行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成为其国内整体经济中的主要行为主体;而且这类国家机构的兴起与跨国行为体对地方的全面渗透之间的时间差越来越短。

大家都熟悉这个过程,这里就不再赘述。对采掘业的原始投资一旦投入,关于合理分配这些投资收益的谈判就“不再有效”。考虑到大多数采掘行业技术的相对稳定性,初始成本投入之后,当地的生产运作对跨国资本进一步追加投入的需求就会逐渐减少。此时,国家便有了机会能够提高其对资源产出的占有份额,并要求对地方生产作业的更大程度的控制。<sup>[16]</sup>赫希曼对第三世界国家对境内外资所有的出口矿业基地的不同征税能力印象极其深刻,他认为这样的产业产生了一种“财政联系”(fiscal linkage),这种联系类似于其他产业所带来的“后向”和“前向”联系。<sup>[17]</sup>此外,跨国行为主体不仅对所在国政府收入和外汇的主要来源产生重大影响,还对国家机器形成了组织效应。即使是最不积极的政权,也不可避免地至少需要设立官僚机构去监督跨国公司活动的这种需求。

边缘国家从事最具跨国色彩的采掘业——石油产业——的经验给予我们很多启发。特格韦尔(Tugwell)详细记录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出于对国际石油公司活动的必要监督,委内瑞拉一方面继续与跨国公司进行营利性合作,另一方面却建立了一个能够自己经营石油业务的国家官僚体系。<sup>[18]</sup>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东和北非,通过提高政府的收益比重,这些国家逐渐从被动接受和由跨国公司攫取剩余向国有化和国家所有演变。<sup>[19]</sup>在这一进程进行得更为突然的地区,比如墨西哥,最终会出现明显的国家对当地生产的司法控制和组织控制。<sup>[20]</sup>

矿产业中的这一进程被记录得最好。莫兰(Moran)对智利铜矿的经典研究就是一个范例。该研究展示了即使在政治氛围几乎完全倾向接纳跨国公司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如何也有可能出现组织发展。1955年智利通过了“新政”立法,其中包括建立铜矿业部门监督产业活动;如果不是这一立法,跨国经济力量包围下的智利就会成为被动型国家(state passivity)的实例。<sup>[21]</sup>事实上,这个部门继而成为国家管

理者的训练基地。正是从该部门出来的管理者使得智利最终接管该产业的所有权成为可能。

最近,贝克尔(Becker)对秘鲁铜矿业中出现的上述过程的变异进行了极佳的研究。<sup>[22]</sup>在这一案例中,尽管秘鲁没有将其国内主要的跨国公司之一美国冶炼公司(ASARCO)的产权收归国有,但整体结果仍然是国家角色的扩张。巨型国有公司成为这个产业中的主要行为主体。从矿业中发展起来的、强大的技术专家能力被整合进了国家机构,国家成为了秘鲁这个产业中重要的参与者,而不是“最大的缺席者”。

对采掘业的介入会促使国家进一步干预其他产业。如同国家政权内部官僚监督机构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创立铺平了道路一样,这些企业一旦在矿产行业中确立了地位,就会按照它们自己的创业逻辑进军其他行业。在那些不受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约束的国家中,采掘业或许提供了建立充分的“国家主义”经济(“statist” economy)的基础。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国家负责了90%以上的工业投资,并且几乎掌控了工业资产的绝大部分。<sup>[23]</sup>即使在那些主导政治精英的理念并不那么偏好国家干预的地区,采掘业中首先出现的政府介入也会由于组织发展的逻辑,在产业活动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推进。

国家产业政策倡议中第一位的也是最明显的目标,就是前向联系,比如秘鲁矿业公司(Mineroperu)提出的利润丰厚的铜矿冶炼项目的目的就是如此。<sup>[24]</sup>然而,在许多例子中,前向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远远超出了对当地出产的原材料进行冶炼加工这个要求。巴西和墨西哥的国有石油公司(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墨西哥国营石油公司)成为充分发展的石油化学帝国,就是很好的例证。<sup>[25]</sup>最近中东的国有石油生产商有关建立石油化学企业的提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的普遍性。<sup>[26]</sup>最终,国有采掘公司的这些企业家式的努力,甚至可能不会止

步于下游产品的研究开发。比方说,巴西的铁矿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已经介入到其他的炼造行业(比如纸产品)与多样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中(包括肥料生产、铁路建设、咨询业和工程服务业)。<sup>[27]</sup>

国有公司在采掘行业中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用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简明扼要的总结来说就是:

在过去的30年里,国有企业在国际石油产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外占领支配地位的领域还有矿产业全部的重要分支部门,这包括:铝土矿、铁矿、铜矿和其他次要矿石。<sup>[28]</sup>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的角色是否有所扩张,而在于这种扩张是否可以归因于在它之前出现的跨国联系。显然,采掘业所具备的技术和经济特性有利于也鼓励了国家的干预。<sup>[29]</sup>同时,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用来支持前期的跨国公司控制会提高国家介入概率观点。

其一,唯一能够有效抗辩对“国家主义”的控诉的,也许就是民族主义,这个事实非常明显。国家接收跨国企业必定是,也一直都是得到那些强烈支持“私人企业”的集团的拥护。比如说,在智利,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党<sup>①</sup>(Nationalist party)支持对美国安纳康达铜矿公司(Anaconda)的接收,但同时坚称自己反对国家主义(*estatismo*)。<sup>[30]</sup>牙买加曼利政权(Manley regime)最成功的政策行动就是抵制跨国铝矿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获益于私人部门的大力支持。<sup>[31]</sup>秘鲁的军事政权不仅完全没有介入当地资本实力较强的那些矿业部门,而且还承担起强

① 此事发生于1971年,时任总统阿连德本人属智利社会党领袖,但在1970年当选总统时是包括智利社会党、智利共产党在内的六个激进政党的联合候选人,此处根据英文只能翻译成民族主义政党;智利没有国民党或人民党等名号的政党。——译注



化这些部门中的本国民营资本的任务。<sup>[32]</sup>

其二,“民族主义”并非只是一种用于吸引保守派支持国家扩张的意识形态的掩饰;在某些重要的事务上,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利益可能会与“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ist” state)自身的利益相冲突,而国内资本家的利益则不会与国家发生这类摩擦。跨国公司的行为妨碍了发展目标的实现,虽然这种妨碍并非随时随地,但在某些关键时刻,这为那些主张国家必须介入的人士提供了重要的攻击性武器。最常见的例子有,跨国公司没有在当地积极推进前向整合,以及将从当地获取的收益用于在别处的扩张。美国肯尼科特铜业公司(Kennecott)将在智利获得的利润用于在美国马里兰州修建冶炼厂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该公司的利润部分地来自于智利所提供的优惠税收政策,这笔资金原本也可以用于在智利进行铜矿提炼。<sup>[33]</sup>即使是最为合作的跨国公司,都被证明是拒绝前向整合的。<sup>[34]</sup>因此,跨国采掘公司会促使“发展主义”精英分子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变成“国家主义者”。

跨国联系和国家介入采掘业两者之间更为自相矛盾的第三种关系,是由于跨国公司一系列不同的偏好促成的。考虑到在当前全球政治气氛下要完全不受限制地控制第三世界的资源是不太可能的,跨国公司在更具科层组织能力、更有创新性的国家机器形成过程中,可能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尽管这只是巴兰的观点。比如,贝克尔认为,现代的资源型跨国公司偏爱“更具知识和能力的东道国——此类国家的管理者们明白资源开采中的国家利益,能够把国家利益写进准入协议,并确保这些协议能够长时间地被遵守”。<sup>[35]</sup>对于跨国公司对采掘业资源的控制与其后国家参与到该部门中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与联合都发挥了作用。

当然,冲突和联合的结果乃至其可能性都取决于国家本身的特点。比如说,对于某一特定的跨国侵入将在何时成为国家角色扩张的

肇因,国家政治基础的特性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虽然即便是最保守的政权(比如沙特阿拉伯王国)最终也可能会在刺激之下接收跨国公司控制下的采掘行业,但从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Cardenas)到伊朗的摩萨德政权(Mossadegh),再到秘鲁的维拉斯科(Velasco)和牙买加的曼利,诸多例子都表明:事实依然是,相对于国内主导阶级而言,能够拥有一定程度自主权的政府,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主动性干预。<sup>[36]</sup>

国家角色的扩张并非是国家能力提升的同义词。无效的干预、腐败和被其他社会行动主体所俘获,都是国家角色扩张的可能后果。不过,在跨国采掘公司的挑战和国家能力的提升之间,也有着看似可信的联系。首先应该清楚的是,在建设有能力的官僚机构这种意义上的国家能力与国家角色的扩张之间有着良性互动关系。具有最基本的官僚组织能力,是与跨国机构成功谈判的前提;谈判和随后对采掘行业的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作为官僚机构存在的国家的能力扩张。

采掘业中经我们所描述的那个过程与国家相对于国内资本家的权力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关联。前期跨国公司对初级生产的控制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国家控制已经实现的程度来说,它可能不会将控制权分散到当地的民营资本手中,而是完全集中到国家机器手里。因为初级生产对当地资本积累的整个过程十分重要,因此当地的资本家必须通过国家或者附和国家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简而言之,与跨国资本的竞赛提升了国家能力,而私人资本则在国家塑造的形势下谋求利润。

要从国家相对于跨国公司本身的权力提升这一角度来评判国家能力则更为困难。在某些方面,国家机器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然赢得了对其国内财产的一定管辖控制权和资产收益权,这些在以前完全是跨国资本的专有势力范围;但是国家角色的扩张并

并不意味着对跨国资本的排斥。国内层面,跨国公司或者仍旧是合资伙伴,或者依据管理合同保持着有效的管理控制。如果说它们的行动自由和收益的份额都相应减少,那么其风险也大为降低。国际层面,跨国公司的权力大体上未遭撼动。如果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力的确有所提升,那么这种提升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对跨国公司权力的削弱,答案依然难以定论。

如果从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这个方面来看,国家能力增长与国家角色扩张之间的相关性就更成问题了。有一些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至少,有些国家已经更为直接地介入到采掘业,不但其财政收入得以增加,还成功地提高了国内产出。<sup>[37]</sup>同样,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国家的主动性对促进前向整合十分关键。但是国家干预并不必然提高第三世界出口商从全球市场的参与中使收益最大化的能力。

1974年,莫兰警告说,国有矿业出口商正面临着沦为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边缘性生产者的风险,而这个寡头垄断市场正是由于这些企业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疲软和不稳定。<sup>[38]</sup>最近的分析表明,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事实。<sup>[39]</sup>在国际纵向一体化方面,国有公司几乎都比跨国公司程度更低;无论是作为单个企业还是作为一个群体,国有公司也更加难以限制产出。在极端的意义上也许可以这么说,在有能力去实现稳定国际市场,从而保护其矿业市场的目标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情况,甚至还远不如当初由跨国公司主导当地生产的时候。

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强调最后一个论断,对国有企业应对国际市场的能力的诸多消极评价,都是基于对当前十分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的观察而做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有生产者可能会从日渐收缩的矿业市场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国有矿业出口商都处在赞比亚和扎伊尔的国有铜矿公司(最常见的例子)那种可怕



的境地中。最后,国家行为主体的一些明显的劣势也许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组织学习加以克服,这些劣势并非是国有制固有的。<sup>[40]</sup>

抛开约束条件不说,国家对国内生产的控制的强化并没有明显提升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国家对采掘业的控制的加强,使它成为了国内的强势经济行为主体,但也同时将它逼进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它将不得不调节国内经济和不受其控制的国际市场间的关系。因此,尽管无论是跨国公司的存在与国家角色扩张之间,还是在组织建设这个狭隘定义上的国家能力与国家相对于地方私人企业的权力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依赖国际市场的必要性对国家施加的限制仍然很强。

### 制造业投资的影响

有关制造业中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家干预之间联系的论证,不如原材料生产领域那样清晰。制造行业中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保持有力的谈判地位。对边缘国家来说,由于没有哪个制造行业能够发挥像采掘业那样的重要作用,因此,很难让国内精英们相信,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国家应该占有制造业。最后,即使制造业被跨国精英所控制,它们仍然可能与国内的经济行为者有着更密切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民营资本是不大会相信这一点的:国家相对于对跨国制造公司的力量的日渐强势不会对民营资本家自身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有任何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从逐步增加收益份额到最终在法律上确立所有权这一过程在制造业中很是罕见,而且其罕见程度近似于其在采掘业中的普遍性。但即便如此,制造业中强势跨国行为主体的存在,仍然是引发国家不断介入的原因之一。

墨西哥政府与其国内大型跨国汽车制造商之间的谈判历史就是



一个极好的例子，贝内特（Bennett）和夏普（Sharpe）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sup>[41]</sup> 贝内特和夏普从墨西哥国家官僚机构的能力演变入手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缺乏技术上的专业知识以及内部不和，墨西哥的国家管理者根本无法有效地约束那些主宰当地汽车产业的跨国公司的行为；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墨西哥的国家机器已经实现了内部统一并具备了必要的专业知识，从而能够打破汽车公司的攻守同盟，最终达成有利于国家收支平衡和有利于国有汽车零配件公司的协议。制造业如同采掘业一样，应对制造业中跨国公司的挑战，能够推动国家机器在其“学习曲线”上沿着提升官僚组织能力的方向进步。

跨国公司介入制造业也可能被视作“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这和跨国公司控制矿产资源一样都产生了思想意识上的紧迫感，从而使国家角色的扩张合法化。最近巴西电脑产业中的斗争就是一个好例子。跨国公司压倒性的技术优势预示着完全的外国主导，但是这个产业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使得军方无法接受这一结果。政府的支持催生了一批国内生产商，他们和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有着很强的组织联系。<sup>[42]</sup> 国家的参与受到民营资本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逻辑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可能也是民营资本在这一产业中实现重要参与的唯一战略。

与采掘业一样，刺激制造业中国家角色扩张的不仅是与跨国公司间的竞争，还有与跨国公司的联合。对于那些有意扩张到政治上不确定并且经济上有风险的领域的跨国企业而言，让国家成为合作者是一个很具吸引力的方案。国有企业除了能够提供政治上的保险政策可以避免来自其他方面的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之外，比起大多数现成的民营合作者来说，它还可能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稳定性乃至专业技

引力。据戈尔德(Gold)所说：“50年代美国投资普遍都采取合资企业的方式，它们只和国有企业合作，因为这些企业是唯一可以提供广大市场，并具备规模生产能力的企业。”<sup>[43]</sup>对于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兴趣介入巴西基础石化生产的跨国公司而言，与国家联合的方案同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sup>[44]</sup>

此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个有关国家角色扩张的问题在前面谈到采掘业时也曾提及：与跨国资本的竞争效应以及与其联合的可能性真的只是国家与跨国资本二者关系所特有的吗？或者说，这也可能发生在国家与任何强势民营经济行为主体的相关关系之中？我们的答案是明确否定的，支持这一判断的论证已经大量存在。就制造业投资方面来说，一项让人印象相当深刻的双案例比较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

哈格德(Haggard)和程敦正(Cheng)在分析“四小龙”(Gang of Four)时指出，香港和新加坡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对比。在四个地区中，新加坡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它的制造业被跨国公司主控得最为彻底；而与此同时，它的国家机器又与台湾地区及韩国一样，“以官僚体系‘积极’干预、擅长汲取和引导资源为特征”。<sup>[45]</sup>与之对比，香港涵纳了原上海滩上老练的资产阶级。“香港经济主要被民营企业所掌控，在那里(跨国公司)数目少而且不重要”。与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极为不同之处在于，香港的政府机器基本不事干预；香港政府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方式”，其制造业中根本没有国营成分。<sup>[46]</sup>

当然，对香港政府有限角色的解释还有很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解释就是它的殖民地特征。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上述比较，不仅表明了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制造业中的跨国主导和干预型国家机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也表明了强势的民营资本家们可能也偏好受到高度限制的政府体制，尤其是当他们感觉不需要靠政府庇护来对

抗跨国竞争者之时。

那么制造业中国家角色的扩张,与国家组织方面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体的能力或者其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之间,分别又有什么关联呢?就组织能力而言,制造业中国家角色的扩张的结果与采掘业一样,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更强势、技术能力更强的行政管理机构。但就国家相对于国内资产阶级的权力来说,答案就没那么清晰了。在制造业中,无论是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还是联合,都有可能不仅对国家有利,还会让地方上的资本家也从中获益。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巴西和台湾的本地石化企业,以及进入电脑行业的巴西民营企业,都得益于国家角色的扩张。相比起国家控制国内资产阶级的程度,制造业中国家角色的扩张,可能意味着国家更能控制工人。在新加坡,国家和跨国制造公司之间的联盟与对劳工运动的压制同时出现。<sup>[47]</sup> 劳工压制也是其他那些在制造业中成功实现扩张的国家(比如巴西、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特征。

还是和采掘业中的情形一样,国家角色的扩张对国家相对于跨国公司以及国际市场的权力地位的影响,至今仍然无法定论。在制造业中,国家角色的扩张使得国家与跨国公司关系更加紧密而不是变得排斥,这一点要比采掘业中显得更加清晰。在制造业中,国家更难有机会控制国际市场。杰里菲(Gereffi)对墨西哥政府试图遏制类固醇激素市场上的不利发展态势所做的分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面对着企图迁走生产部门的跨国公司,一切国家策略——包括建立国有企业的政策——都显得软弱无力。墨西哥早在1963年就为全球类固醇激素的生产提供75%的原材料,但直到1980年才占领了类固醇激素产品市场的10%。<sup>[48]</sup> 国家对制造业的干预通常与国内资本积累以及制造增值品的国产化相关联,而这种干预,也几乎同等程度地导致了该国对国际市场和跨国营销渠道之依赖度的加深。<sup>[49]</sup>

尽管制造业与采掘业的技术与经济特性全然不同,但制造业中跨国渗入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与采掘业中的情形似乎完全一致。虽然情况看起来还不特别明显,但跨国制造公司的存在更多地导致国家角色的扩张而不是收缩。同样,无论从组织角度还是从相对于国内行为主体(在这里相对劳方的程度要远高于对资方的程度)权力的角度来说,国家能力都得以提升。还有,排斥跨国公司以及更加明确地控制国际市场,仍然不在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

### 跨国借贷资本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跨国借贷资本代替了直接投资(包括采掘业和制造业投资)成为跨国资本最迅速的扩张形式。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都展现了外国债权人如何利用他们获得的力量,来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行为,并有效地排斥很多种政策选择,这种力量通常具体表现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方式。<sup>[50]</sup>总的来说,由债务所附加的外部约束不仅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分配和福利结果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同时也遏制了它们的发展诉求。

毫不奇怪,人们会认为跨国借贷资本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管理者的自主权,还妨碍了这些国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的确,它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它对国家角色引发双重影响的可能性,甚至要比上文考察过的另外两种资本形态更为明显。我们没必要否认借贷资本最终给国家造成的那些问题,但考察20世纪70年代外国借贷资本的涌入如何资助或者强化了国家角色的扩张,以至于这种扩张趋势直到80年代的困难岁月也未能扭转,这一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私人贷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变大,这一点使得这些国家的国家管理者成为了沟通核心国家中的私人银行家与边缘国家中的生产性投资的关键性中介。根据弗里登(Frieden)的研究,商业银



行给第三世界的欧洲货币贷款中有 80%—90% 给了各种公共机构：中央政府自己、中央银行、国有企业、国家开发银行和国有公共事业单位。<sup>[51]</sup>而其他接受贷款的机构也可能有国家做担保。不断流入的跨国借贷资本，促使主要债务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产业增长的监督者以及沟通外国金融家与国内生产性投资的中间人”。<sup>[52]</sup>

外国贷款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相对于国内资本家的权力，这首先是因为国家不用被迫依赖于国内的私人精英作为其获取资源的唯一来源。这对要实施转型战略的政权格外重要，这类战略涉及对部分国内精英势力的取缔（比如维拉斯科时期的秘鲁军政权）。<sup>[53]</sup>国家对外国贷款的掌控，不仅使国家在推行其政策时更少地受到国内资产阶级的约束，而且还是国内企业家项目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朴正熙政权（Park Chung-hee）便是这种可能性的最好例证。

20 世纪 60 年代末，外债在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之大，在第三世界中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哈格德和程敦正的研究，韩国的外国资本几乎占了总储蓄的 40%，而其中借贷资本占外国资本的比例超过 90%。<sup>[54]</sup>在韩国，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尽管后来的表现不再那么极端。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韩国特别偏好于外债的主要动机之一，在于外债能够赋予国家控制当地企业家的权力。外国贷款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偿还保障，所以当地资本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就必须承欢于政府机构。而外国贷款的利率要比国内贷款低得多，所以得到外国贷款，也就是获得了关键性的竞争优势。哈格德和程敦正认为“对外国贷款的偏爱有着政治动机”，他们进一步指出，“外国贷款在使国家能够给予国内企业更多帮助的同时，也为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控制的手段。”<sup>[55]</sup>在林玄镇（Lim）看来，“影响当地资本家，特别是大型企业的资本家最有力的工具，是对银行信贷和外国贷款的控制。”<sup>[56]</sup>

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对借贷资本的依赖就像采掘业和制造业中的直接投资资金流一样,不仅可以与国家经济角色的扩张相协调,而且甚至可能还会提高这种扩张的可能性。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家角色的扩张,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在面对国际市场逆境时能够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也不必然意味着能够在国内实现分配和福利的目标。我们只能认为第三世界主要债务国当前所经受的煎熬是,“债务导向的工业化”(debt-led industrialization)的直接后果,这种煎熬痛切肌肤地提醒人们:贷款,即使是在实际利率几乎不为正的太平日子中获得的贷款,也仍然会增强对外部的依赖性,从而不得不忍受依赖性所带来的问题。

贸易、采掘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借贷资本,并不会必然地削弱第三世界中国家的作用,而是以类似的方式刺激并促进着国家角色的扩张。前面考察过的案例都表明跨国经济联系——无论是商品还是资本的流动——所带来的挑战,有可能会扩大国家经济角色的范围,使国家官僚体系发展出新的组织能力,并使国家比国内私人行为者处于更加强势的战略性位置上。与此同时很清楚的是,这些国家的学者之所以把第三世界和全球经济间的关系称之为“依赖”,正是因为第三世界相对于全球经济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这点并非毫无根据。官僚机构能力或国家的国内权力的提高,绝不意味着它可以规避国际市场的力量,或者进一步说,也不意味着因为跨国企业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表明国家有能力与跨国企业相抗衡。

认为经济联系的日益跨国化,对第三世界中作为制度组织和社会行为者存在的国家具有普遍的削弱作用,这个最简单的假说可以完全地被抛弃了,不过有几项得提醒注意。首先,该讨论的时间需限定在战后。如果关注更早的历史,也许可以得到与这个关于负面效应的假说更为一致的结果。同样地,这里所关注的“国家”也许称为“半边缘

国家”而非“边缘国家”更为合适。有些更小、更弱的国家，它们连捍卫领土完整、构建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的国家机器这种初级任务仍然还成问题。如果考察这些国家，我们也许可以发现跨国联系确实削弱了它们原本就很脆弱的制度能力。基于所有边缘国家来看，德拉克罗瓦(Delacroix)和拉金(Ragin)的研究并非不合理，他们认为跨国联系和国家能力总体上存在着负相关关系。<sup>[57]</sup>而本文所主张的更为复杂的、部分正相关关系则主要适用于较为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战后时期。它能在其他地方适用的主要条件是：首先得发展出拥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和一定“相对自主权”的国家机器。

对第三世界中跨国联系和国家角色扩张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解释的范围已经澄清，接下来的任务很明白，那就是将考察的关注点扩展到发达工业国家，最后对整个世界体系中跨国联系和国家角色之间的关系做出评论。

## 跨国联系和发达的工业国家

跨国联系给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某些困境，同样也出现在发达工业国家。德国和日本比巴西或印度更加倚重贸易，一些小的工业民主国家甚至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除了美国之外，战后大多数的工业国家都遭遇了比本国企业强大得多的外国跨国公司。如果这样的挑战在第三世界引发了国家角色的扩张，那么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认为这种挑战不和第一世界中更为丰富合法的国家活动有关。

只要工业发达国是跨国公司的摇篮和本营，这种相似性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跨国挑战就算有所感知也是相当模糊。“母国”跨国公司的经济力量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延伸而不是对主权的挑战。当一国与跨国资本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国家管理资本的出



口或者国家作为资本的基地时,本文上述那些将跨国联系和国家角色扩张连接起来的论点都是不适用的。的确,我们的第四个假说预测:在核心国家,跨国经济联系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国家角色的扩张。

### 贸易和跨国渗入的影响

有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贸易对国家之影响,一些印象性的观察正好印证了预期的模式。一个极端是美国,其出口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国家机器的经济角色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一个极端是欧洲那些更小的国家,其出口加上进口可能比其整个国内生产总值都要大,从而发展出了广泛且复杂的国家干预机制。现有的研究也是支持这一预测模式的。卡梅伦(Cameron)的跨国数据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梅伦发现,在他的18个发达国家的样本中,贸易开放不仅与国家的扩张正相关,而且比其他的变量能更好地预测到这种国家扩张。<sup>[58]</sup>他因此下结论认为,“在所有被考察的国家中,公共经济的扩张与对国外生产者和消费者较高程度的开放及依赖之间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sup>[59]</sup>卡岑斯坦也注意到了欧洲小国中国家扩张与面临日益“跨国化”经济的严酷现实之间的关联,他引用了这个观点:在欧洲小国,“所有的政府——无论是左翼还是非左翼政党当政——都在开放经济的严酷现实的驱使下扩张了国家角色。”<sup>[60]</sup>

日本的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了贸易依赖对国家经济角色扩张带来的正面影响。日本制定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官僚机构叫做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即 MITI),而不是简单地称为产业省,这是有其代表意义的。国家对日本产业结构变革的资助,通常都是根据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需要而决定的。由于被迫进口几乎所有的工业原材料,它不得不依靠制造业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来保持国内积累的势头,因此日本能够把产业的成本竞争定义成“国家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结果,日



本一系列国家经济干预的复杂机制的发展,变成了政府捍卫国家主权这一特权中天然的一部分。正如博鲁斯(Borrus)所说,“日本一直积极追求国际竞争力,以此作为国家安全的信条。”<sup>[61]</sup>

钢铁业的案例对于说明贸易依赖和国家角色扩张之间的联系很有用。“二战”刚一结束,日本就开始着手建造具有国际成本竞争优势的钢铁产业,以此来转变自然比较优势,尽管在该产业上它还依赖于投入品的进口。在美国占世界钢铁生产的份额下跌了一半的时候,日本的钢铁生产却翻了十番,这“必须视之为国家为了确保国际竞争力进行干预的成果。”<sup>[62]</sup>

贸易依赖引发国家干预,这不仅是因为日本人看到了钢铁出口作为“国家利益”的可能性。钢铁业依赖于进口投入品,正是这一事实才在促进国家干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博鲁斯所说,“国家全套政策工具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对信贷与进口材料进行控制。”<sup>[63]</sup>正是因为日本90%的铁矿和84%的煤都需要进口,对进口的控制才能使国家有效地塑造产业的增长。

跨国公司的渗入或者渗入的威胁,就像贸易依赖一样,对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与其在第三世界引发的结果是类似的。关于这一点,日本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第一次和西方世界相接触开始,日本政府就一直积极限制跨国资本的直接投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在这方面的限制仍然要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为严格。<sup>[64]</sup>保护日本产业不受跨国资本的渗入,就像促进其国际竞争力一样,被界定为国家利益问题,并由通产省主管。

对于跨国资本渗入与国家干预经济能力的提升二者之间的互动,一个更为有趣的案例是法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是工业大国中唯一一个外国跨国资本流入超过本国跨国资本流出的国家。<sup>[65]</sup>仅凭市场规制进行竞争,使法国资本(有几个明显的例外,比如米其林

公司和罗纳普朗克公司)相对于外国跨国公司而言普遍处于劣势。

国家进行政治干预,是对此状况的明确回应。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针对所有的原油都由英、美两国的跨国公司提供这种情况,法国建立了法国石油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Petrol, CFP)。同样的动机导致了法国最近对电子业和钢铁业的干预。<sup>[66]</sup>诚然,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法国发现国际市场结构几乎不受它调整的影响,它在电子产业中遭遇的困难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外国跨国资本的主导给当地经济造成的威胁变成了一个关键因素,它使国家可以合法地发展出一大批经济干预机制,其中包括建立国有工业企业。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当国内经济对变幻莫测的跨国市场十分脆弱,对外国跨国公司非常敏感时,工业发达国家也倾向于扩张国家角色。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威胁的“外来性”使国家干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内资本为免受强大经济对手的侵犯而要求保护,这种自我利益减少了国内资本对国家角色扩张的抵制。同样的逻辑不适用于跨国公司的“母国”,只适用于“东道国”。

### 资本出口与国家的角色

以“母国”跨国公司不断扩张为最显著的跨国联系,这样的国家非常少。如果只考虑工业资本的话,美国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一直到1971年,日本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账目价值还没有美国对西德投资的一半那么多。<sup>[67]</sup>即使到了1979年——在这之前德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已经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海外扩张——美国私人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量,还是非常轻易地就超过了其他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资本输出总和。<sup>[68]</sup>

对于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的“东道国”见到的那种国家干预,北美的跨国公司是没有理由来支持它出现在其“母国”经济

中的。国家必须发展出干预经济的能力,从而保护国民经济免受外部经济力量的负面影响,这个观点在跨国公司看来毫无吸引力。毕竟,它们就是国内经济需要加以防范的外部经济力量。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通过抵制中东低工资电子装配厂来对美国国内经济进行保护,反而会损害美国电子企业的利润,因为这些企业的利润,正依赖于企业内部的地域性劳动分工。

即使跨国公司本身的经济利益不会直接受到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跨国公司仍然害怕这种干预成为其他国家进行模仿的先例。以将股票的50%卖给美国公民为前提条件,从而允许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提案,尽管对于美国自己的跨国巨头而言,可能颇具吸引力(因为它们将会是最有可能的股权所有者),但由于它也会使其他国家的类似做法具有合法性,因而将会受到这些跨国公司的强烈反对。

只要美国国内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普遍的充分就业和主要行业的技术主导地位这些特点,就没有必要借助跨国资本的特殊偏好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国家的国内角色受到限制这一问题。大体而言,美国资本似乎没有动机像非霸权国家中的资本一样去认可国家角色的扩张。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日益上升,以及技术领导权的丧失,使美国和它的竞争国之间在国家角色上的差异变得尤为突出。令人可信的是,尽管美国的跨国公司仍然业绩优良,但如果政府能够有所干预的话,其国内资本的重要部分仍然会从中受益。

美日两国在钢铁业的比较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政府为其钢铁产业的利益积极有效地进行干预,而尽管对于美国而言,这个行业不仅具有很强的吸纳就业的能力,而且还决定着—批金属加工行业的原材料价格,美国政府在这个产业已经不容置疑衰落的事实面前却依然消极无为。所谓的“所罗门计划”(Solomon Plan),是政府对钢铁业问



题做出的主要回应,但其理论假设仍然是:任何计划都“必须避免政府对产业决策的任何直接介入”。<sup>[69]</sup>

这里的要点不在于说跨国资本的偏好能够解释美国国家角色受到限制的原因;关键是说,在跨国资本的偏好能够塑造国家政策这个前提下,跨国资本不会像国内企业那样对国家在国内经济层面的角色扩张产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作为补偿,跨国公司可能更愿意支持国家在国际层面经济角色的扩张;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政府的例子,就会发现跨国公司所期望国家的国际性干预与东道国(而不是母国)经常进行的国家干预之间,存在着结果上的重大不同。跨国公司的主要兴趣在于维持“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能够保障它们行动自由。由于美国正是根据这种兴趣而行事的,所以不仅美国的跨国资本,而且它的竞争者也都能从中获益。就美国为顺应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而维持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所做的努力而言,德国、法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都是“搭便车者”。即使是在干预更为具体的时候,这些干预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带来的影响,也通常是含糊不清的。

当美国国务院重新协商中东石油跨国公司的税务状况时,其结果基本上是美国国家税收的收入减少。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一结果与东道国和跨国采掘公司之间的协商结果恰好相反。<sup>[70]</sup>在贝内特和夏普所分析的墨西哥汽车产业的案例中,美国跨国公司反对国务院进行干预的企图,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和墨西哥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而无需太多考虑美国汽车产业中非跨国企业承受的后果。根据克拉斯纳对巴西咖啡贸易的分析,美国为了维持与一个重要的南美盟国间的积极关系,而不惜牺牲本国咖啡消费者的利益。总之,美国跨国公司利益与其国内经济利益之间的分歧,不仅在跨国公司对待其国家的国内经济角色扩张的态度中得以反映,同样也可以在国际领域观察到。

当然,美国的例子不支持任何认为跨国公司只是实现母国国家利



益的工具的全球经济模型,它支持这个观点:如果一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是该国的跨国资本家,那么这一阶级可能会限制国家角色的扩张。除了美国之外,英国也是这方面的好例证。尽管英国在工业资本输出方面比不上美国,但它是重要的跨国金融资本供给方。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工业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下,英国银行的外汇资产储备仍然是其他主要金融中心(包括纽约)的两倍。<sup>[71]</sup>在避免受到英国霸权的衰落的影响方面,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制度是相当成功的。

英国的金融资本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一方面是因为它一直坚持从事跨国而不是国内金融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的国家管理者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始终与伦敦金融城的目标相一致。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如此总结这种一致性:

比起英国的产业界或者劳工阶级,英国金融界的利益无疑要与战后经济政策更加一致。英国金融界对外部关系及外部交易比对国内产业更感兴趣,也更愿意介入,因此他们强烈支持一切捍卫英镑的努力。<sup>[72]</sup>

即使在维持英镑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已经变得不可能之后,英国的国家政策对于维护伦敦金融城的地位仍然十分关键。齐斯曼(Zysman)评论道:欧洲货币市场

不是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带来的,而是作为英格兰银行政策的一部分而产生的;英格兰银行的政策目标是在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英镑衰落之后,继续维护英格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一政策要求总部设在伦敦的各大银行,自由使用新的国际货币即美元来运行其业务。<sup>[73]</sup>

20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努力维持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政策对英国国内带来的影响,被一位更具远见的英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可悲而荒唐的”。<sup>[74]</sup>为应对国际收支平衡危机与英镑所承受的压力,由于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进行货币贬值和直接控制资本流动,英国政府便通过严格限制国内经济增长来减缓通货膨胀速度。实际上,英国的工人不得不“学着量入为出”,以便伦敦金融城可以继续充当国际金融中心。

无论是在工党还是在保守党统治之下,英国的国家政策都继续关注于外部经济参数,而未能发展出可以有效干预国内经济的新政策工具。当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英国政府都试图促进本国的产业重组时,法国已经拥有“一套齐备的工具用以直接和具体地干预经济和产业”,而英国却不得不依赖于自愿合作。<sup>[75]</sup>法国拥有“英国财政部所不具有的对投资资本的处置权”,英国政府却只能通过财政体系才能发挥作用,而这套财政体系与其说是促进国内产业增长的组织性力量,不如说是“一种世界商业的制度支持”。<sup>[76]</sup>

在本议题上,瑞士代表的是第三种情况。瑞士国小而经济高度开放,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是,瑞士的公共部门非常小,并且令人惊讶地具有“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t)的政治倾向。正如卡岑斯坦所说,“瑞士的国家相对较弱而且高度分权,其行动范围非常有限。”<sup>[77]</sup>而从本文的逻辑来看,瑞士并不是一个十分反常的个案。由于瑞士本国跨国资本的海外活动相对于其国内经济规模而言格外重要,所以国家干预应该会相对较少。与此同时,对贸易的强烈依赖,又迫使瑞士处于一种相反的压力之下,因此瑞士政府会偶尔地表现出一些国家干预的行为,比如对农业部门的介入,但这种情况并不典型。<sup>[78]</sup>

再重复一遍,本节的论点并不在于资本输出(产业的或金融的)解释了国家角色为何会受到限制。本节的论证旨在说明资本输出的

影响有可能会限制国家角色的扩张。虽然这里所考察的三个国家都长期有着不干涉主义的政策传统，<sup>[79]</sup>但我们似乎仍有理由指出，也许正是跨国资本所带来的影响（连同前面讨论过的其他类型跨国联系的影响）导致了过去的30年时间里，各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在行动范围上的差异。<sup>[80]</sup>然而，对英国和美国来说，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跨国资本的偏好对其“母国”发展的影响，还必须放到其与国家官员的地缘政治战略的互动中去理解。

### 地缘政治目标和跨国公司的利益

理解两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国——英国和美国——国家机器行为的关键在于把握，它们都有充当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国际霸权的抱负。就英国而言，尽管成为霸权已是过去的荣光，但我们也不能轻视其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仍然有心保持帝国遗产的事实。<sup>[81]</sup>对美国来说，虽然经济有所衰落，但政治和军事霸权仍在它的掌握之中，其国家机器的行动核心正是努力保持其霸权地位。在这两个案例中，明确承认政治动机的重要作用，是让前面提出的论点更加符合现实的必然要求。

这里主要考虑跨国资本及地缘政治导向的国家官员对国家的国内经济角色的限制。对于以地缘政治为主要考量的国家官员而言，扩张国家在国内经济中的角色，很可能既会占用必要的资源，又会导致国家更深地陷入国内社会冲突之中。因此，只要国内经济政策能产生所需要的财政收入，而且只要其政策表现能够满足“国家安全”论者的要求，那么最少的干预便是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的。

在国际层面上，地缘政治目标和跨国资本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从最抽象的角度来看，两者又有着一致性。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家更偏爱私营企业不受限制的世界，而美国对外政策所追求的

“自由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然而,当考虑到具体政策时,这种一致性并非是必然的。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分析中必须将跨国资本所偏爱的国际主义与国家机器中政治要员们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政策区别开来。<sup>[82]</sup> 克拉斯纳所列举的诸多具体案例,显示了对地缘政治目标的追求,使得跨国采掘公司的直接利益被母国政府所忽略。<sup>[83]</sup> 地缘政治导向的国家官员和跨国导向的资本家们,很可能会同时认可一个对外强大而国内弱小的政府,但它却很可能在什么样的政策内容才体现国家的外部力量方面发生分歧。

一个明显可能发生分歧的场合早已为学界所注意。如同在墨西哥汽车产业之案例一样(参见前文引证过的贝内特和夏普的讨论),当更为强势有力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强迫跨国公司进行的谈判损害到美国的国内利益而美国政府试图保护这些利益时,跨国公司就不再对外在的强国感兴趣了。第二个,也是在理论上更具重要意义的潜在冲突场合则涉及国家规制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能力。最好的案例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跨国银行家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詹姆斯·霍利(James Hawley)富有启发性的解释正展现了这次冲突。<sup>[84]</sup>

随着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更随着在像巴哈马、巴林和开曼群岛这样的地方出现记账式分行<sup>①</sup>(paper subsidiary),跨国银行日益接近跨国资本的“无国籍性”(statelessness)的理想典范。正如霍利所说:“创造货币和发行信贷的能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远离于某个核心国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与交易货币名义上的发行者——的

① 在巴哈马、巴林和开曼群岛所进行的离岸金融交易,只有记账而没有实质性业务,是有名的避税港,不少欧洲银行分别在此开设分支机构,享受低成本,同时逃避银行利润税及营业税。——译注



领土之外。”<sup>[85]</sup>与此同时,相对于跨国资本的其他形式,跨国银行或许更加依赖于国家来保证它们所交易的商品的价值。

由于缺乏一种可预测未来价值的货币来从事交易,国际金融变成了一项极具风险的事业,而且至少自金本位制度崩溃之后,要创造出这样一种交易货币就必须直接依赖于核心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跨国银行既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控制,又最终依赖于国家的规制能力,这种相互矛盾的处境,使得跨国银行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容易受到指责,尤其是在负责维持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价值的美国。

跨国资本和国家决策者围绕资本控制产生的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初逐渐突显出来。<sup>[86]</sup>面对着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美元在国外的供大于求,美国的国家管理者开始相信,要想避免美元贬值,就必须限制资本外流。结果,一系列的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先是自愿的而后是强制性的,逐渐被制度化了。跨国公司进行抵制,并认为国家对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正确回应是,减缓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sup>[87]</sup>跨国公司的头头们还进一步建议说,如果要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与国家所从事的军事和对外援助之间进行选择,应该削减的是后者。<sup>[88]</sup>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跨国银行扩大了对欧洲美元市场的参与,而美国政府根本无权对该市场进行规制。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欧洲货币市场的兴起,被迫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国再一次面临着美元的压力。它的直接回应是,限制国内市场的信贷供给,这是在模仿以牺牲国内积累来维持国际金融信用的英国模式。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提议试图要求政府对欧洲货币市场进行规制。<sup>[89]</sup>跨国银行家们对此进行了强烈而且成功的反抗。美国无法独自对欧洲货币市场施加限制,而从事欧洲货币交易的各个国家又未能达成足够的共识,以采取共同的规制行动。最终的结果非但没有对欧洲货币市场进行规制,反而进一步放松了对

美国国内银行业务活动的重要方面的管制,其标志就是各种国际性银行机构的建立(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它们获准参与欧洲货币的在岸交易而不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

这一结果不能够被简单看作是跨国金融资本对国家机器的胜利。正如第三世界国家对付跨国产业巨头能力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跨国企业能力的丧失,同样地,核心国家规制跨国金融交易之能力的降低,对跨国资本来说,也不全然是好事一桩。首先,跨国银行家们对国家处理国内货币供给方面的无效非常失望,尽管正是他们在发展不受管制的信用创造机制方面的成功,削弱了国家管理者制定这些银行家所期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能力。<sup>[90]</sup>

而从长期来看,可能更为严重的是,跨国金融资本由于自身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而面临的风险问题。不受控制的欧洲货币市场使汇率变得极不稳定。没有强制性的储备金要求或者流动资产比率限制,资本为追求更高利润而过分扩张的风险也明显增大。简而言之,通过削减核心国家规制金融市场的力量,跨国资本也许已然攫取了国家“保护资本不受自身伤害”(用霍利的话来说)的能力。<sup>[91]</sup>

尽管在限制国家的国内经济角色方面,地缘政治目标和跨国利益具有一致性,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因为具有地缘政治导向的国家管理者所提出的政策,正好符合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依靠二者之间的这种无摩擦的共识,就能界定出国家的角色范畴——这种假设实际上毫无根据。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核心国家中的跨国联系,可能更倾向于产生某种特定的结果,但跨国资本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既有可能彼此冲突,又有可能发展出共同的利益基础。

## 跨国联系、国家能力与世界体系

本文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在第三世界,与贸易和资

本流动相联系的并不是消极的、受到限制的国家机器，而是国家的国内角色的扩张。这个论点并不是说，我们正在见证“东道主国家力量的提升”。<sup>[92]</sup>相反，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采掘业中，国家角色的扩张，甚至更加清晰地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相对于国际市场的不利地位。但是，在第三世界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处理跨国联系带来的挑战，导致了国家官僚机构在经济方面的扩张和强化。此外，与跨国公司的冲突和联合，都日益使得国家机器处于协调国内私人资本与国际经济二者间关系的关键位置。同样，对于那些不是跨国公司的“母国基地”的发达工业国来说，日渐深入地参与跨国经济，也导致了其国家角色的扩张。

第二个论点和第一个论点相反。在资本输出国，对一个以跨国资本家为“本土”资产阶级主体的经济体进行管理，会抑制国家国内经济角色的扩张。在需要“外强、内弱”的国家机构这一点上，跨国资本的利益和国家精英的地缘政治权衡发生了重合。美国是一个主要的例子，英国和瑞士也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

上述论点都不代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避免的普遍性逻辑。而且，所发现的上述关系也被假设是由战后时期的历史情境所塑造的。产业性和金融性跨国资本的急剧扩张，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都是战后时期的基本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数目的剧增<sup>[93]</sup>，以及先前已独立国家的组织能力的提升<sup>[94]</sup>。最后，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间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化，以及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间政治和军事斗争日渐尖锐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军事霸权变得尤为重要。有关最后一个特点对跨国资本和第三世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做些说明。

虽然美国的霸权国际地位很明显是服务于对强势有力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限制，限制它们重塑与美国跨国公司（延伸一下，和普



遍的跨国资本)间关系的企图,但是在这一点上也该强调事情的另一面。在很多关键情况下,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会引导美国强化第三世界国家机器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促进它们进行相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角色的扩张。美国国务院同意对中东石油生产商提高生产特许费(royalty payments),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更具扩散性,但从长期来看,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广泛的美国援助对于东亚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的出现非常关键。<sup>[95]</sup> 尽管美国援助具有很强的“支持自由企业”的偏好,但其主要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潮流”。只要受援国仍然致力于追求这一目标,它们就被允许不断地扩张其国家角色,而不必受到盎格鲁—美国理念的制约。<sup>[96]</sup>

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的地缘政治诉求为国家角色的扩张创造了空间,那么它对在传统福利国家活动方面进行的国家扩张则产生了负面作用。从摩萨德政权到曼利政权[更不需要考虑那些更为明显的社会主义政权,比如阿连德政权(Allende)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美国关于“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考虑,接连导致了诸多试图沿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扩张其国内经济角色的国家政权的垮台。简而言之,美国的地缘政治考虑,可以算是促进第三世界国家扩张其国内经济角色的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前提是只要相关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完全信奉资本主义原则的模样。

如果我们所假设的背景形势完全不同,那前文所描述的那些关系也许并不成立。<sup>[97]</sup> 然而,与其花时间考证这一背景假设是否完全正确,似乎更值得进一步思考上述两个论点的含义,首先是它们对于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的演化意义,其次是它们对于今后有关跨国联系与国家角色之研究的启发。

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角色的扩张,以及极少有国家真正排斥跨国公司的现实情况,都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深陷于跨国生产体



系之中,而这个体系是由跨国公司自己首先组织起来的。同时,生产的国际化也加大了跨国公司对于一个强大的、可预测的第三世界国家合作者的需求。即使在跨国公司自己看来,消极的买办型“无国家性”策略选择的时代也已成为历史。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于斯坦利·戴维斯(Stanley Davis)所说的“矩阵”(matrix)组织。<sup>[98]</sup>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实施的局部联合控制之下,生产总量会逐渐提高。跨国公司和国家共同组织生产:前者主要关注如何从全球性组织的既定产品线中获取最大化收益,后者则考虑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中将收益最大化。问题在于这样的安排能否为国际生产体系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

人们可以选择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角色的扩张看成是国际资本的一个胜利。资本需要当地的政治基础结构来保证资本自身的持续积累。先前存在的结构被证明是不够的,日渐增多的国家干预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替代方法。然而,无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些国家可能有多么彻底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观点忽略了这个事实:第三世界的国家管理者所管理的是一个动荡不安、阶级分化的社会,并且如同核心国家的国家管理者一样,它们除了有经济的考虑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即使国家的兴趣只在于利润最大化上,矩阵组织形式所暗示的“地域”和“产品”利益的结合却很难维持。戴维斯将普通公司中的矩阵组织的特征概括为“结构上的不稳定”,因为其“设计上具有内在的冲突”。<sup>[99]</sup>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官员和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们都很清楚,他们的继续生存(至少就其当前地位而言)有赖于他们实现双方都可接受的相互适应的能力。

一种明显的预测就是,尽管参与各方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国家控制与跨国控制的相互交织将会产生一个更加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的确,人们可以认为这种预测已经被国际矿产业市场中的行为所证实。

然而,或许比这种普遍性预测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国际生产的这一视角所带来的研究上的启示。

为了理解这个已经出现了的矩阵组织(甚至是为了证明这是个值得首先采用的有用概念),我们需要更多的“谈判后”(postbargaining)研究,也就是,研究某个产业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的互动,把国家参与作为分析的起点而不是需要解释的结果。和谈判研究不同,这种研究无法进行国别分析,而只能审视某一产业中由国家和跨国行为者构成的整个矩阵。这些研究将不得不认真对待国家行为者,不是将它们假设为一种新型企业,而是仔细考察国内政治压力和地缘政治目标,对它们作为跨国行为者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途径。另外,国家行为者的行为必须被理解成对该产业中所有非国家行为者决策的回应,并且这种回应会反过来影响到这些非国家行为者的后续决策。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已经对采矿业做了一些初步研究,但这些研究远不够充分,而且对采掘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探索。<sup>[100]</sup>对整个国家—跨国公司互动矩阵的充分研究,即使只是在一个产业内进行,显然都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如果要对跨国联系和国家角色进行更深入的考察,这项研究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认为资本输出倾向于使国家经济角色受到限制的这个论点,只是对国际体系的演变给予了一点补充而别无其他含义。如果我们能够假定国家角色扩张失败对国内的资本积累最终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个假设无论从普遍性理论观点,<sup>[101]</sup>还是从战后英国的经济衰落一案来看,似乎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和霍布森(Hobson)有着相似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对核心国家具有负面的经济影响。<sup>[102]</sup>

半边缘国家和主要作为跨国资本东道国而非母国的发达工业国家,发展出了广泛的官僚机构,以构建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比较优势基

础并促进资本的国内积累；而经济霸权国在这个领域始终消极无为，从而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比较优势。结果不仅是霸权国家的相对衰落，也使得国际经济朝着更为多极的方向发展，这种多极化体系被认为更不稳定。<sup>[103]</sup>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用具体的研究来解答。能够预测到某个核心力量在经济上的衰落的确很好。实际上，战后英国力量的衰落只是一系列这样的衰落中最近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要用本文的论点对美国做出这样的预测，这就取决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具有地缘政治导向的国家官员们，继续忽视对美国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的国家干预的机会，包括其面临经济相对衰落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英国的国家管理者和金融资本家正是这样干的，但是拿英国案例来进行类推，却具有误导性。原因有二：其一，英国的衰落对作为整体的跨国体系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极其微弱，因为英国所承担的作为国际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体系捍卫者的角色被美国所继承；其二，由于相比美国而言，英国作为跨国资本中心的角色更多的是在金融领域，因此弱化跨国资本的财富与英国国内经济财富之间的联系要简单得多。

与英国的银行相比，美国的跨国公司仍然依赖于其核心经济来开展其业务，这些业务对于它们维持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地位非常关键；研究与开发只是这样的例子之一。美国的跨国企业能否承担对美国经济发展滞后无动于衷而带来的代价，或许它们能像之前的英国资本家们一样，更多地转向金融领域，或者能够与来自其他工业经济体的跨国资本建立伙伴关系（比如与日本资本），从而保证其技术上的优势地位？又或者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能会变得寄希望于通过支持国家干预，以期来保护自身的经济基础？我们也应该对地缘政治导向的



国家行为者提出类似的问题。除了强劲的国内经济能够有效地产生地缘政治影响力之外,支撑军事优势的是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需要的不仅仅是保持国防业的买家。在这里,有人也许会再一次期望国家行为者朝着支持扩大国家干预的这个方向发展。将两组行为者放在一起,进行以下的考虑就变得很有趣:哪一组行为者更有可能克服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干预的反感?如果一方发展出不同的态度,而另一方的态度却没有相应的改变,对政策结果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根据理论推演,同时辅之以案例支撑,来展现核心国家中跨国导向的行为者——无论是经济界的还是政治场上的——对国家扩张国内经济角色所持的态度。但是这些观点自身表明会出现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此时这些行为者的利益一定会变得更加含糊不清,因此只有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这些利益才有可能可预测的。要对具有跨国导向的美国精英们对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的基本看法进行深入研究,其挑战性不亚于前面提过的矩阵研究;但如果我们能够从中更好地理解,跨国资本如何影响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者,那么,这项研究也和矩阵研究一样十分重要。

对未来研究的两项建议都对最初构成本文出发点的那组假说提出了质疑。前述假说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跨国联系的演变是世界体系中的动力因素,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或者是受害者(尤其在边缘国家)或者是消极的受益者(或许在核心国家)。本文所进行的重述则表明,国家应该被视为一个具有前面分析中所提到的那种自我发展动力的积极因素。更为强烈的是,这些阐述还指出,在战后最初几十年中,国家的作为(和不作为)使得任何渴望理解20世纪80和90年代国际体系的人们无法以同样方式忽略国家的作用。



## 注 释

[1]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1968): 559 - 592.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42 - 143.

[3] H. Peter Gray, T. Pugel, and I. Walter, "International Trade, Employ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Geneva: ILO, 1982).

[4] George Ball, "The Promise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Fortune* 75(6) (1967): 80.

[5] R. Barnet and R. Müller, *Global Reac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4)

[6] John Boli-Bennett, "Global Integration and the Universal Increase of State Dominance, 1910 - 1970," in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ed. Albert Bergese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pp. 77 - 107.

[7] Richard Rubinson, "Dependence,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conomic Growth 1955 - 1970,"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 - 1970*, ed. J. Meyer and M. Ha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p. 207 - 221; J. Delacroix and C. Ragin, "Structural Blockag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Economic Dependence, State Efficacy, and Under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1981): 1311 - 1347.

[8] Paul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Leroy Vail, "Railway Development and Colonial Underdevelopment: The Nyasaland Case," in *The Roots of Rural Povert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ed. R. Palmer and N.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365 - 395; 比如可以参见 Jeffery Paige, "Cotton and Revolution in Nicaragua." In *States versus Markets in the World System*, ed.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E. Stephen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forthcoming).

[9] Albert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10] Rubinson, “Dependence,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conomic Growth,” pp. 212 – 217.

[11] Stephen Krasner, “Manipulating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 Brazilian Coffee Policy 1906 – 1962,” *Public Policy* 21(1973): 493 – 523.

[12] 巴西政府自购过剩产品以防止它们进入市场流通来维持国际市场价格的努力,既保持了其国内的总需求,也缓解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也可参见 Furtad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13] Peter Flynn, *Brazil: A Political Analy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14] 一个有趣的比较案例,可以参见下面这位作者对印度农业精英相对于国家的角色的探讨:Pranab Bardh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Indi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5)。

[15] Rubinson, “Dependence,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conomic Growth,” p. 213.

[16] 参见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 S. Enterp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T. H. 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e: Copper in Chi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Fred C. Bergsten, Ted Moran, and Tom Horst,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17] Albert Hirschman, “A Generalized Linkage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tapl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suppl. (1977): 67 – 98; reprinted in *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 4.

[18] Frank Tugwell, *The Politics of Oil in Venezuel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9] John Blair, *The Control of Oil*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1976); Stephen Schneider, *The Oil Price Revolu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20] 参见 Nora Hamilton, *The Limits of State Autonomy: Post-Revolutionary Mexico*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21] 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p. 123 – 125.

[22] David G. Becker, *The New Bourgeoisie and the Limits of Dependency: Mining Class and Power in “Revolutionary” Peru*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 Jeff Frieden, “Third World Indebted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Mexico, Brazil, Algeria and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5 (1981): 407 – 431.

[24] Becker, “The New Bourgeoisie,” pp. 216 – 218.

[25] 参见 Peter B.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Evans, “Collectivized Capitalism: Integrated Petrochemical Complexe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Brazil,” in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Brazil*, ed. T. C. Burneau and P. Fauch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85 – 125; P. Evans, “Reinventing the Bourgeoisie: St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Class Formation in Dependent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supplement) (1982): 210 – 247。

[26] 参见 David T. Isaak, “Basic Petrochemicals in the 1980s: Mideast Expansions and the Global Industry,” Working Paper WP – 82 – 83 (Honolulu: Resource Systems Institute East-West Center, 1982)。

[27] 参见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pp. 249 – 254; Silvia Raw, “The 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 Goals and Financing Patter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roblemas de Gestión de las Empresas Publicas en America Latina” in Caracas, Venezuela, November 1983)。

[28] Raymond Vernon, “Uncertainty in the Resource Industries: The Special Ro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82), p. 10.

[29] L. P. Jones and E. M. Mason, “The Role of Economic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 Sector in Mixed Economy LD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Boston Area Public Enterprise Group Conference, Boston, 1980).

[30] 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 212.

[31] 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Dependent Capit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Manley Government in Jamaica,” *Politics and Society* (Winter 1983): 373 - 411; E. Stephens and J. Stephens, “Renegotiating Dependency: The Bauxite Policy of the PNP Government in Jama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Detroit, September 2, 1983).

[32] Becker, “The New Bourgeoisie,” pp. 221 - 222, 230.

[33] 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p. 102 - 103.

[34] 参见 Becker, “The New Bourgeoisie,” p. 102。

[35] 同上, p. 325.

[36] 参见 Peter B. Evans,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Third Worl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Harvard-MIT Seminar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February 29, 1984), p. 10. 另一个影响国家干预倾向的因素是通行的国际规则。有关与跨国公司谈判和管理采掘业的专业知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散布流传,使后面的国家得以根据别国的经验沿“学习曲线”向上移动。然而,关于政策相关性知识的国际扩散对国家能力的影响这一问题,不在这篇文章讨论的范围。

[37] 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 133; Becker, “The New Bourgeoisie,” pp. 97 - 131.

[38] 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 241.

[39] 参见 Michael Shafer, “Capturing the Mineral Multinationals: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 (1982): 93 - 119; Vernon, “Uncertainty



in the Resource Industries。”

[40] 参见 Evans,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pp. 13 - 14。

[41] Douglas Bennett and Kenneth Sharp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 Promotion: The Case of the Mex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3(179): 177 - 201; D. Bennett and K. Sharp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port Promotion Policies and U. S. -Mexican Automotive Trade” (Colloquiu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82).

[42] Immanuel Adler, “A Cultural Theory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Policies in Argentina and Brazil”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2).

[43] Thomas B. Gold,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aiwan”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p. 192.

[44] 参见 Evans’s *Dependent Development*, “Collectivized Capitalism,” and “Reinventing the Bourgeoisie。”

[45] Stephan Haggard and Tun-jeng Cheng, “State Strategies, Local and Foreign Capital in the Gang of Fou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2, 1983), p. 36.

[46] 同上, pp. 51, 37, 45。

[47] Haggard and Cheng, “State Strategies,” p. 43; 也参见 Fred Deyo,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Order: An Asian Case Study* (New York: Praeger, 1981)。

[48] Gary Gereffi and Peter B. Evan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State Policy in the Semiperiphery: A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Mexico,”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6(1981): 31 - 64.

[49] 同上。

[50] Cheryl Payer, *The Debt Trap*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Barbara Stallings, “Peru and the U. S. Banks: Privatization of Financial Relations,” and Roberto Frenkel and Guillermo O’Donnell, “The ‘Stabilization’ Programs of the IMF and

their Internal Impact, ”both in *Capitalism and the State in U. S. -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ed. R. Fage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17 - 253 and 171 - 216, respectively; Stephens and Stephens,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Dependent Capitalism. ”

[51] Frieden, “Third World Indebted Industrialization, ”p. 411.

[52] 同上, p. 429。

[53] 参见 Stallings, “Peru and the U. S. Banks”。

[54] Haggard and Cheng, “State Strategies, ”p. 22.

[55] 同上, p. 58。

[56] Hyun-Chin Lim,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System: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1963 - 1979”( Ph. D. diss. ,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p. 147.

[57] Delacroix and Ragin, “Structural Blockage. ”

[58] 应该注意到公共部门在规模上的重大差异,基本上是由福利支出和转移支付造成的,而不是由政府消费本身造成的。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Determinants of State Policy in Switzerland and Austria, ”(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Research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Mt. Kisco, N. Y. , February 1982), p. 51. 尽管如此,公共部门的规模是国家机器力量的重要来源,这体现在两个方面:既促进国家更好地管理总需求,也帮助缓冲必要的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59] David Cameron,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8): 1243 - 1261. 还有一种略微不同的观点,它认为开放对国家扩张的作用受到产业力量聚集度、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聚集度和社会民主党力量发展这三者的影响,关于这种观点的详情,请参见 John D. Stephens,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79). 在卡梅伦(Cameron)后来的著作中,即“Social Democracy, Corporatism, and Labor Quiescence: The Representa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1982), 他似乎也更接近这种观点。然而,即使在这种更为复杂的假说

中,贸易依赖对国家角色的扩张仍然具有积极影响。

[60] 引自 Peter J. Katzenstein, ed.,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61] Michael Borrus,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ve Erosion in the U. S. Steel Industry," in *America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d. L. Tyson and J. Zysman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0 - 105.

[62] 同上, p. 72。

[63] 同上, p. 73。

[64] Michael Yoshino, "Japan as Hos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 Isaiah Frank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Press, 1975), pp. 273 - 292.

[6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p. 161.

[66] John Zysman, *Political Strategies for Industrial Order: State, Market, and Industry in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67] Yoshino, "Japan as Host," p. 249.

[6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p. 161.

[69] 参见 Peter B. Evans,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U. S.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U. S. Industria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Report submitted to UNIDO, Country and Regional Studies Branch, Vienna, Austria, 1983), p. 69; 也参见 Borrus, "Politics of Competitive Erosion"。

[70] Blair, *Control of Oil*; Schneider, *Oil Price Revolution*.

[71] U. 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Special Study on Economic Change*, vol. 9,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U. S. Role in a World Marke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 p. 78.

[72] Stephen Blank, "Britai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Problem of Pluralistic Stagnation," 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1(1977): 623 - 721.]

[73] Zysman, *Political Strategies*, pp. 212.

[74] Andrew Shonfield,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since the Wa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8), p. 218.

[75] Blank,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p. 700.

[76] Zysman, *Political Strategies*, p. 192. 当然,这些差异也许可以归因于历史的延续性,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时期。[比如可以参见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1976): 30 - 75.] 而在英国的例子中,促使英国资产阶级主要成分保持其跨国取向的同一条件却可能也使得一个更具国内导向的资产阶级去寻求更多的国家帮助。

[77] Peter Katzenstein, Chapter 7, this volume.

[78] Katzenstein, "Determinants of State Policy," p. 84.

[79] 关于英国和美国,请参见内特尔 (Nettl) 的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中关于“弱国家性” (low stateness) 的讨论;关于瑞士,请参见 Katzenstein, Chapter 7, this volume.

[80] Katzenstein, 1982: 51 - 52; Stephens,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p. 197.

[81] 参见 Blank,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82]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1973).

[83]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84] James P. Hawley, "Interests, Stat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World System: The Case of the U. S. Capital Control Programs, 1961 - 1974," 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ed. P. McGowan and C. Kegley. Sage Yearbook of Foreign Policy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3); J. Hawley, "Protecting Capital from Itself: Transnational Bank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U. S. State Regu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xico City,



August 17, 1982).

[85] Hawley, "Protecting Capital from Itself," p. 32.

[86] Hawley, "Stat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87] 同上, p. 33。

[88] 同上, p. 29。

[89] 同上, pp. 25 - 31。

[90] Hawley, "Protecting Capital from Itself," pp. 7 - 9.

[91] 同上。

[92] Bergsten, Horst and Moran,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对这个观点做了最精彩的阐述。

[93] 独立国家本身数量的增多,实际上可能不具有正面影响,因为那些还不具备应对跨国联系之挑战所必需的最低国家能力的边缘国家在数目上占了多数。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新独立的国家延用了具有较强的官僚组织能力的殖民地国家机器,比如韩国和台湾。此外,独立国家数目的锐增,对于创建一条与跨国公司进行谈判的“全球性学习曲线”是非常重要的(参见注释 36)。

[94] 要理解为什么跨国联系所引发的结果会如此不同于那些主要依靠战前数据进行分析的学者们(如巴兰)的结论,首先要清楚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家机器的先期发展。

[95] 参见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 (1984): 2 - 40。

[96] 参见 Alice H. Amsden, Chapter 3, this volume。

[97] 特别是,国际贸易或者国际资本流动的重大收缩,可能会在根本上改变国家回应跨国联系的方式。

[98] S. M. Davis and P. R. Lawrence, *Matrix*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7)。

[99] S. M. Davis, *Managing and Organiz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p. 246 - 247.

[100] 比如说可以参见, Sharer, “Capturing the Mineral Multinationals.” Richard Newfarmer, ed., *Profits, Progress and Poverty: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 Latin America*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101] 参见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Peter B. Evans, Chapter 2, this volume.

[102]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8; originally 1902).

[103] 关于英国霸权衰落对跨国体系的负面影响的讨论, 可以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ed. Katzenstein, pp. 593 – 595.

# 七 开放的国际经济中的小国

## ——瑞士和奥地利国家与社会的趋同均衡

彼得·卡岑斯坦

易受国际经济影响是欧洲所有小国的必然命运。由于选择了依靠开放性国际环境的经济战略,这些国家无法将经济变革的成本转移到国外。又由于国内经济规模的局限性,它们无法通过雄心勃勃的产业重组来抢占先行变化之优势。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没能阻止它们为实现国家目标而制定政治战略。欧洲小国通过国内的政治行动来弥补由经济开放和依赖世界市场所带来的损失,而且很多指标显示它们的努力很有成效。它们已经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统合制度(corporatist arrangement),这些制度把支持对外开放与国内补偿,以及灵活、积极反应式的产业调整政策结合起来。

这些欧洲的民主小国所采用的战略、所发展出的国家能力,以及将国家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结合起来的方式,都将其与那些工业大国区别开来。而与此同时,这些小国内部又展现出迥然不同的国家结构和行为模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国家在相同性和差异性的结合方面最为显著。

奥地利和瑞士为关于国家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因为它们似乎如此相似又如此相异。奥地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

范,而瑞士则代表着自由资本主义。奥地利最强的政治势力是劳工运动,而瑞士则是商业集团。在瑞士,国家在社会中只享有有限的权力;而在奥地利,国家的权力广泛而深远。尽管有诸般不同,这两国却都国小而繁荣;尽管受到国际政治变化无常和国际经济压力的影响,却又受益于军事中立和经济上的竞争力。按照大多数政治和经济标准,它们的共识政治体制(consensual politics)在过去的30年中相当成功。

这些不同的形象为本章提供了组织脉络。首先,本章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主体(an actor),有着稳定的制度结构、特定的权限范畴并具有一定实力。在这方面,奥地利和瑞士之间迥然不同。其次,本章将国家(state)视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中的一部分。这种网络结构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着国家的能力。作为包容性合作主义政治体制(collaborative political arrangements)中的一部分,国家能力似乎在瑞士得到增强,而在奥地利则有所衰减。本章最后将简要概述两国的政策来支持上述的两个观点。

我将论证,奥地利和瑞士的不同历史脉络,解释了两国在差异性和相似点之间的这种均衡。奥地利的强国家是大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是由迟发型工业化以及“二战”末期工业国有化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瑞士的弱国家则脱胎于自19世纪初就从欧洲权力政治中渐行消退的联邦制度、先发型工业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种干预还没到彻底国有化的地步)等诸多历史遗产。但是两国历史中的另一脉络也塑造了其国家特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历——大萧条、纳粹主义和战争——促使两国社会中的政治领导人建立起影响深远的政治合作制度,该制度将主要政党和利益集团的领袖人物全都吸纳入国家官僚体系。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要在不断自由化的国际经济中维持竞争力的迫切要求,日益强化了原本可能



褪色的历史记忆。奥地利和瑞士的政治合作制度限制了强者（如奥地利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同时也增强了弱者（如瑞士政府）的政治能力。

## 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

尽管奥地利和瑞士在地理上相毗邻，其历史路径却大相径庭。这两个国家在企业、劳工和国家管理体制等方面截然不同。

历史说明了瑞士和奥地利的商业集团为什么如此不同；两国经历了全然不同的工业现代化之路。18世纪晚期以来，瑞士的企业秉承自由贸易的原则在国外市场上扩张。作为欧洲早期的工业国之一，瑞士苦于自然资源全面匮乏的劣势：缺乏基本的原材料、农业贸易赤字、没有直接的出海口，而且直到19世纪末之前都相对地隔绝于欧洲的铁路和运河系统。这些劣势通过出口诸如纺织品和手表等高质量的制成品而成功地得到克服；出口偿付了在食品和原材料方面的进口。对外移民减轻了国内有限资源的人口压力，而且促进了海外销售。企业家积极创业的精神而不是政府行动，是瑞士工业化的主要动力。19世纪晚期，当保护主义抬头威胁要关闭重要的国外市场时，瑞士企业从出口转向海外生产。此后，它的国际市场导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奥地利则经历了另一条更为坎坷之路。据说后发工业化经济中企业成熟较晚。事实上，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认为当经济增长终于在20世纪初的奥地利降临时，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冲刺”。<sup>[1]</sup>诚然，德意志和捷克各省——上奥地利（Upper Austria）和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工业化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飞速发展，却也比瑞士晚了大约两代。但即使在较高发展速度和较低关税的这几十年中，奥地利企业从未支持过以征服世界市场作为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的自由贸易政策。相反,奥地利企业宁愿在高关税壁垒后享受帝国的收益。东欧为奥地利帝国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肆意控制的广阔而封闭的市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失去这些市场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扩张更使这些市场彻底沦丧;奥地利企业丢失了大量资产并丧失了传统的客户,基业大受折损。而且,再生产的能力由于20世纪20年代强加于奥地利中产阶级身上的毁灭性重负而严重受挫。2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使中产阶级的货币资产严重缩水,而“一战”末期通过的严厉的租金控制法案更阻碍了新资本的积累。最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国有化如此广泛,以至奥地利的公有经济成分至今仍要高于经合组织内的其他任何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私有企业仍然有些畏惧竞争。

历史还导致奥地利与瑞士的劳工运动特征迥异。正如克林格曼(Klingman)所总结的,布尔(Bull)和盖伦森(Galenson)指出劳工运动的特征——其激进度和集中度——是工业化发生时间的函数。<sup>[2]</sup>大体而言,瑞士劳工运动的分散性和改良性符合这种模式。瑞士工业不是出现在大的城市地区,而是沿着能够提供廉价能源的河流和山川地区发展而来。其产业不集中阻碍了工人群体的组织。除此之外,瑞士工人进行激进政治运动的动机也相对微弱。整个19世纪中瑞士所有男人都享有普选权,直接民主制度的参与使得他们有机会能够影响其所在社区。最后,瑞士是欧洲文化最多样化的社会。瑞士的26个州(cantons)俨然就是一个由不同宗教、语言和习俗拼凑而成的五色板。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组织瑞士工人从事激进的劳工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瑞士与奥地利之间的差异是最大的。在奥地利,历史的主要动力推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激进主义和集权。在一个工业化发生相对较晚的社会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大的组织凝聚

力以及完善而激进的政治思想体系。奥地利的工人阶级集中在德意志和捷克各省以及维也纳附近的工业区。由于在帝国崩溃之前一直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奥地利的劳工运动就围绕着争取普选权或通过革命行动改变权力分配等问题而组织起来。最后，尽管民族间的壁垒曾经导致多语种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劳工运动四分五裂，但当帝国缩减到德意志的核心领地<sup>①</sup>时，民族壁垒也一并消除。在第一共和国时期<sup>②</sup>，奥地利的社会主义阵营曾遍布各地，摇摆于谈论革命和实际行动之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但在1934年内战中，奥地利的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最终将这一阵营击溃。失去了革命理论后的奥地利劳工运动，最终在第二共和国<sup>③</sup>的全盛时期被完全容纳并整合，成为共和国的点缀。

最后，历史还造成了奥地利和瑞士在国家管理体制上的大不同。在18和19世纪，奥地利的官僚机构管理着一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辽阔帝国，这促进了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国家出现。对帝国官僚机构的批评曾指责（该批评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有道理）这架宏大机器的运转所造成的只有噪音而没有前进。然而事实仍然是，管理一个多民族的辽阔帝国，将奥地利的国家建成了一个强大的机构。欧洲均势的军事需求强化了强国家的发展。

跨入19世纪瑞士的边界，旅行者看到的不是帝国，而是由伯尔尼的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所管理的小国家。1850年以前，它曾一次性地建立起了瑞士联邦而不是多个州组成的松散邦联，但整个19世纪

---

① 奥地利原本和普鲁士同在德意志公国范围内，共组德意志邦联；由于普鲁士统一后拒绝奥地利加入德意志，奥地利遂和匈牙利联合组成奥匈帝国，又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于“一战”后解体，奥匈分家，奥地利恢复其原德意志民族地区范围。——译注

② 奥地利第一共和国：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奥地利宣布成立共和国，是为第一共和国，至1938年德奥合并时结束。——译注

③ 奥地利第二共和国，1948年4月成立至今。——译注

瑞士都以所谓的中央无政府为特征。国家权力主要在地方和州两个层次上行使。伯尔尼的政治发展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瑞士的永久中立性和全民兵役制更进一步阻止了政治中心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战争发动机。

奥地利与瑞士国家权力规模上的差异,可能在1914年达到最高点。但是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帝国也随之瓦解。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内战、法西斯统治和另一场战争,以及外国占领,如此直到1955年。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开始痛苦地收缩,在随后20年中国家丧失权威,这些都缩小了其与瑞士之间国家能力上的差距。就算按照奥地利的标准,20世纪的瑞士历史可谓风平浪静。在奥地利饱受战争、被占领和遭遇贫困之苦时,瑞士却生活和平,主权完整且社会繁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伯尔尼中央官僚机构亲自组建卡特尔,并创立统合主义的制度安排。它也促使这一民主堡垒中的行政长官更多地通过紧急法令而非民主立法来进行统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论时局是否景气,瑞士政府都逐渐地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脱离出来,而且比日本以外的其他任何工业国都要更加抵制建立一个由公共财政支撑的福利国家。

相比之下,在奥地利,福利国家的基础——在帝国结构解体时涌现出来之后——在“一战”末期得到扩展,并在20世纪20年代由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管理。这次经历在1945年后,无论是为保守主义分子还是为社会主义人士,都提供了一个覆盖所有奥地利人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模型。由于最初为德国、然后为苏联所占领的奥地利的全部工业最终在1955年变成公有制企业,因此这一福利国家模式在奥地利经济中发挥着异常巨大的作用。奥地利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拥有或管理这样庞大的资产。因此,曾是19世纪奥地利国家中枢的



王朝帝国从1945年开始,已经被一个工业帝国所取代。雄踞于维也纳的霍夫堡宫(Hofburg)建筑和伯尔尼低调的联邦议会会址(Bundeshaus)至今都在诉说着帝国抱负和民主政治为奥地利及瑞士的国家体制留下的不同遗产。

这些遗产说明国家在当代瑞士和奥地利的政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其制度结构、权限和实力方面,瑞士和奥地利的国家相去甚远。在瑞士,国家高度分权,行动能力有限并且软弱。而在奥地利,国家集权,行动权限广泛并且强大。

瑞士在实践中严格遵循了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分立;在一个以政治精英的角色积聚为特征的体系中,政府的议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实际上没有人员交叉。与奥地利不同,联邦委员会的成员禁止在主要的利益集团中兼职。瑞士在地域上的分权限制了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在政策问题上,政府必须周全地照顾到州和主要利益集团;如果不能确保其政策在多元化的群体中至少获得默许性的支持,国家的政策就总是可能受到公民投票的挑战。即使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能在联邦议会中获得通过,如果没有国家之外的其他权力中心的支持,通常也不会得到有效地执行。国家官僚机构所掌控的经济资源和制度能力实在有限。与奥地利相比,瑞士的国家机构的分权程度和能力上的限制非常明显。所以,称瑞士为“中央无政府的模板”<sup>[3]</sup>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一弱点致使瑞士政府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局限性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联邦委员会体现的是行政效率原则而不是党派政治。<sup>[4]</sup>瑞士联邦的总统由七个委员轮流担任,他们缺乏政治曝光率和魅力。两种制度实践表现了行政部门的非政治化。第一,政府中的七名成员履行着两种职能,他们既是选举出来的部门政治领袖,同时又是高级公务员。第二,联邦委员不能公开地表明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个人立

场,而且他们也被禁止公开批评已经联合做出的决策。英国的内阁集体责任制原则在伯尔尼完全变了样:保密成为行政部门的特征,而不是一种党派类型的行政政治。官僚的习惯和规范对行政政治的侵蚀,体现出瑞士的国家权力是中立的,这里不存在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联邦官僚机构缺乏正式规定的职业生涯模式和终身雇佣制的保障,它按语种采用比例代表制(*linguistic Proporz*)原则。其职业行政人员体系(*Beamtenprofession*)不是像日本或英国那样,通过共同的社会背景、培训或观念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瑞士政治精英所表现出密切相连的特征,其整个精英群体缺乏凝聚力才更显得令人惊讶。在一个完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etatisme*)原则的国家里,行政机构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都相当有限。相反,它非常依赖那些有组织的集团的合作。瑞士人有理由声称其国家由企业高层联盟所操纵;瑞士人也常说“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商务及工业工会(*vorort*)在为伯尔尼的政府做决策”。

瑞士的联邦官僚机构相对精简(3.2万人),自1945年以来其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sup>[5]</sup>它通过“预备式”(militia)的分散管理制度弥补其规模小的缺陷,这种管理制度主要依靠利益集团和卓越的个人来获取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能力。由于它将这么多的任务——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留待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来承担,所以它有“变成一系列行业协会分封地”的危险。<sup>[6]</sup>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对瑞士4000名受过学术训练的高级或中级公务员来说,每一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外部“专家”,这些专家供职于334个负责给国家官员提供建议的“国会外”委员会。<sup>[7]</sup>

政府和官僚机构的弱点随处可见。联邦政府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政策工具也受到公民权力的限制。比如1977年和1979年,政府两次设立增值税的尝试都被公民投票所否决。与州或地方当局相

比,在经合组织的国家中,不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国家,瑞士联邦政府所得到的税收比例是最低的:瑞士是29%,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比例是58%。因此,政策执行的问题通常涉及各级政府间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sup>[8]</sup>这个情况与对政策工具的一项跨国比较的结果相吻合;该分析显示瑞士是73个样本国中唯一一个坚持经济干预最小化的国家。<sup>[9]</sup>

瑞士国家的软弱反映在它与私人银行系统的关系中;它对瑞士银行正式的政治监管很弱。瑞士银行委员会(Eidgenössische Bankkommission)独立于政府。尽管委员会的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加强,但诸如1977年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丑闻和1978年勒克莱尔银行(the Banque Leclerc)的倒闭案等事件已然证实,瑞士政府对国内600家银行的监管力不从心。但即使是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也未能在政治上过多撼动瑞士银行的运作模式。在谈到对加强银行监管的政治意义时,苏黎世的一位银行负责人表达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嗯,这并不意味着银行会失去任何自由。这只是限制一下其行动的尺度而已。”<sup>[10]</sup>当1982年初银行委员会规定瑞士的银行今后必须要在资产负债表中公布其为填补亏损而动用的隐蔽储备(hidden reserve)<sup>①</sup>时,另一位银行官员将此举视为一种典型的瑞士式妥协。“你仍然可以保留潜在的储备,但是你能不能再隐藏亏损。”<sup>[11]</sup>不论如何,不管存在什么样的正式监管,都不如私有银行和国家银行(瑞士央行)之间的非正式关系重要。中央银行的私有制在发达工业国的央行中是绝无仅有的。瑞士央行在一定的政治控制下运作,而且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以支付股息的形式返还给州和私人股东。它的董事会受10人组成的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其中绝大多数是苏黎世的银行家;

---

① 多数银行所拥有的不动产和投资,其实际市值往往会与账面价值存在一定差值,这差值就是银行的隐蔽储备,又译作账外物资或隐蔽资产。——译注



委员会相应地要向由 40 人组成的银行理事会 (Banking Council) 报告,该理事会中有 25 人由政府任命。这个内部的权力圈被一位观察家视为“一个金融共同体,在这里市民的职责和权利转交给了资产负债超过 5 亿瑞士法郎的公司的经理们”。<sup>[12]</sup> 瑞士银行界的自治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瑞士国家软弱的特点。

相对来说,奥地利强国家的集权结构与瑞士形成强烈对比。第二共和国强官僚国家的行政传统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玛丽亚·特蕾莎 (Maria Theresa) 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 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中信奉重商主义的德意志核心区的统一。此外,奥地利的联邦制度作用甚微,维也纳仍然是国家政治生活无可争议的中心。在过去的 30 年里,奥地利的官僚机构稳步地扩张。如果以人均官员数量来衡量奥地利福利行政机构的规模,它高居其他所有欧洲国家行政机构之首。作为行政人员收入之一的退休金也是欧洲最高的。<sup>[13]</sup> 奥地利的行政机构密切参与到工会和商业集团的政治关系,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中,其所参与的公共政策范畴远比瑞士政府更广泛。至少在奥地利民众看来,国家官僚体系的确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制度组织。

这种权力被国家在奥地利经济生活中的突出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国家实际上拥有所有的交通、通讯和电力行业,还掌控大量的国家垄断行业,其中包括烟草、盐和两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以及最大的八家合资公司中的七家。在所有合资公司中,“1969 年联邦政府在全部分股中占 45%,地方政府占 12%,而国有银行占 10%,多国公司和奥地利私营企业各占 13%”。<sup>[14]</sup> 国有企业雇用了奥地利 28% 的产业劳动力,与外资公司的比例持平;私营公司雇用占比 44%。<sup>[15]</sup> 奥地利约六分之一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政府直接或间接所有的公司。加上狭义公共部门的雇员——如公务员、警察和老师——公共部门占



奥地利国民产出的近三分之一。<sup>[16]</sup>而且,经济中公有制的重要性在奥地利最大的公司中最显著。如果不是诸如奥地利钢铁联合公司(Voest-Alpine)这样的企业在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地利经济会以相对较小的私营公司为主。我们是用营业额、出口量,还是员工数来衡量公司的规模其实都不重要。<sup>[17]</sup>在奥地利最大的50家公司中,国有公司占三分之二强,私营公司略超10%,而外资公司约占总数的15%。并且,奥地利这最大的50家公司占奥地利全部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

除了大量持有工业之外,政府还拥有四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两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和许多其他的金融机构。由于银行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大量的附属公司,奥地利政府从而可以更大程度地间接控制整个工业。计算银行所拥有和控制的产业的数目,是奥地利人最流行的一种消遣。大体而言,奥地利国有银行拥有境内全部合资公司约10%的名义资本,其附属公司的雇员高达6万人。此外,国有银行还拥有大量没有产权归属的手段可资驱遣,尽管它不愿意对此进行精确计算,这种模糊资产制度的确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在奥地利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sup>[18]</sup>

奥地利和瑞士的历史塑造了迥然不同的国家管理体制、商业集团和劳工。在瑞士,国家相对分权而软弱,商业集团强势而且在国际竞争力强,劳工运动则默默屈从,组织分散,其实力相对受到限制。在奥地利,国家集权而强大,商业集团相对弱小而且很有国家观念,其劳工运动地位显赫、行动统一且影响深远。由于这些历史性的差异,公私权力之间的平衡在奥地利严重偏向国家,而在瑞士则倾向社会。

## 国家作为政策网络的一部分

历史使奥地利和瑞士相似,而地理位置却又让两者彼此相异。20

世纪的历史推动了政治上的部分趋同,这种趋同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经历——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奥地利和瑞士。对德国集中营、政治流放,以及在外国占领下生活的共同记忆,促使奥地利消弭了曾在1934年爆发出内战的诸多国内冲突。奥地利政治领导者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缺乏掩护、处境脆弱,他们将狭隘的阶级利益融合并重新定义成涵盖更广的国家利益。联合政府的制度在1945年和1966年将天主教和社会主义者连接在一起,它既是一种象征,也是政治稳定的保障。

在瑞士,自从1937年企业界在政府的压力下与金属制造工人工会协商并达成“和平协定”(the peace agreement)之后,劳资冲突升级的风险被有效地消除。这一协定最终成为瑞士劳资关系制度的模型。1948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政府接受利益集团的咨询,而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的行政部门——联邦委员会——中的永久性地位的确立,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帮助瑞士完成了从“选举民主”到“协商民主”的转型。<sup>[19]</sup>由于这些变化,在战后的几年里,共识型政治体制在两国都很盛行。事实上,奥地利和瑞士两国都把其协作式的政治安排描绘成一种社会合作制度(social partnership),它与有组织的阶级性政治斗争形成鲜明对照;现在奥地利和瑞士的政治领导人对这种斗争已经印象模糊了。

为什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记忆逐渐消退时,两国的社会合作制度还能重新建立?为什么第二代政治领导人没有否定第一代接受的教训?我在其他地方论证过,原因在于不断自由化的国际经济对欧洲民主小国的国内政治结构产生的压力。<sup>[20]</sup>

在向世界市场开放和对其依赖等方面,瑞士和奥地利与其他富裕

的欧洲小国类似。国内市场狭小会导致对市场变化的依赖,而且依赖程度在欧洲小国要比工业大国更严重,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它们无法为现代经济的很多关键产业提供必要的规模经济,欧洲小国必须从工业大国进口大量的商品。第二,国内市场狭小导致奥地利和瑞士在出口市场中追求专业化和规模经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小的工业国家中,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是工业大国的两倍。依赖进口和必需出口,使瑞士和奥地利经济的转型成为国际市场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国家行为的结果。<sup>[21]</sup>

奥地利和瑞士的日常经历再次证实了其在国际经济中的脆弱地位。国际竞争已经大大增强,从而使得由限制国内争论,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的争论所带来的优势更加明显。比如奥地利和瑞士两国每年的罢工次数都屈指可数。每个人——企业界、工会、政府和消费者——都认为,罢工对解决国内争端来说确实是一种代价过大的办法。因为经济如此开放,奥地利和瑞士的精英时刻不曾忘记,他们不过是自己无法完全控制的发展进程中的客体而非主体。因此,精英们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对于国内政治合作的持续至关重要。

在奥地利和瑞士,这种合作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影响极其深远。合作的本质就是将原本可能各行其是的多个政治行为主体缝合成一个复杂网络。要保持这种政治网络的稳固,必须缩小政治行为主体之间巨大的权力差异。这种缩小不是一个自然的调整过程,它更像一种僵持状态。只要政治领袖们能充分认识到外部因素对其社会的压力,为求使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具有可预见性,他们便能够实现相互妥协。我现在要论证的是,权力差异的缩小过程会影响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奥地利,国家的权力被削弱,而在瑞士则有所增强。

### 奥地利

奥地利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在奥地利的统合主义中,政党的固

执己见导致了官僚机构的被动性和国家权力相对党派势力的中立。“各种观点只有获得意识形态上的机会和权力,才能吸引主要的经济决策者们的注意——这无论是对政党还是对民众来说都非常重要。”<sup>[22]</sup>然而在奥地利,保守派的人民党(OVP)与社会民主党(SPO)一直对公共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意见不一;照这样下去,奥地利的经济可能要么被官僚机构要么被其经济伙伴所把持,只不过由于奥地利公共部门规模过大,对经济的政治控制尚未完全定型。人民党在传统上就关注限制公共部门的范围以及使管理遵循“经济的”考虑。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则一直认为有计划的经济和市场经济互为补充;因此国有部门尤其必须考虑其行动战略对整体经济(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不能仅考虑其企业利润。奥地利两大主要政党就经济权力的目标所秉持的理念上的相互冲突,既妨碍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潜力,也降低了鼓励市场竞争的可能。奥地利国有工业和国有银行中的党派渗透,以及对产业政策的制度要求,生动地说明了政党政治如何使得国家权力中立化。

国有工业所能提供的巨大权力基础,使其成为奥地利所设想的共识政治环境中激烈的党派冲突的来源。在过去的30年中对奥地利公有经济的政治控制是由投票决定的。1966年以前,这种控制反映在部委职责的重组中,重组由两大主要政党在联合协议中商定;1966年之后则表现为国有企业的行政改组,这种改组分别出现在1966年人民党当政和1970年社会民主党当选之后。整个战后时期,国有工业很快就开始在中高层管理职位的政治任命上实行权力配比(Proporz Power)。事实上,国有部门中的比例代表制在1956年就合法化了。同一经济部门中的不同公司往往是要么属“黑营”,要么属“红营”。例如,一项研究调查显示,20世纪60年代,89位董事会成员和董事会主席中只有两位是无党派人士。<sup>[23]</sup>经济职权中明确的党派分界使我



们可以计算出,在20世纪60年代,奥地利的国有工业中人民党所主导的公司有6.7万员工,而社会民主党主持的有5.3万人。<sup>[24]</sup>但政治权力不仅在公司之间,而且也在公司内部被分享并由此中立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奥地利联合钢铁公司(Verinigte Österreichische Eisen-und Stahlwerke)通常被视为“红营”权力的大本营;然而六个最高管理职位中有三个——董事会主席、副董事长和两位副董事中的一位——事实上是由保守的人民党任命的。1966年以来奥地利向一党制政府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有企业的内部重组,以及社会民主党在70年代逐步取得成功的权力培植,都帮助降低了奥地利经济生活明显的政治化程度。但这绝非明确地表明,去政治化会如一位高官所预言的那样,“真正意味着将另外一方踢出局去”。<sup>[25]</sup>奥地利国有公司的控股公司——奥地利工业股份公司(OIAG)由社会主义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它仍保留了1956年法律所规定的比例代表制原则中的关键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没有编入公司法,而奥地利的公司法也只管理公司行为的其他方面。比如该公司的监事会就不由每年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相反,监事会中有15名成员由政党根据它们在议会的席位比例提名,其余3名则由政府任命。这种制度既给予人民党充分的利益代表,又保证了社会民主党的有效多数。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工业股份公司控股下的国有公司全部136个监事会委员席位中的36席,由人民党负责指定。直至今日,10位董事会主席中的5位,37个董事中的18位仍由与人民党关系密切的企业管理者所担任。社会民主党则实际上控制了其他所有职位。“这些政治任命的经理对各自党派的忠诚度各不相同,尽管所有这些人都是次级政党组织的成员,这种次级组织则将他们团结在一个俱乐部似的非正式氛围中。”<sup>[26]</sup>克莱斯基总理(Chancellor Kreisky)和他的继任者已经一再肯定奥地利合作式政治结构制度化

的持续有效性。

恰恰在官僚机构发挥显著作用的领域——奥地利国有工业中，国家官僚机构的弱点也非常明显。实际上，奥地利工业中的政府干预明显地受到限制。奥地利国有公司对就业和投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它们强烈地反对直接的政治干预，而坚持完全按照商业利润逻辑来开展业务。政府所能支配的正式的控制工具是相当有限的。自从1946年7月26日和1947年3月26日的两部《国有化法案》将有关的公司股份转交给第二共和国以来，通常情况下，“国家能够影响企业的唯一方式就是行使作为股东的权利”。<sup>[27]</sup>早在1949年，奥地利政府就完全放弃了一切认真制定系统性经济规划政策的努力。这一年也标志着国有企业组织分裂的开始。国有工业和国有银行被划归不同部委管辖，而第一部《国有化法案》对实施协作式经济政策的要求也被否决。<sup>[28]</sup>之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权力的中立化。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长一段时期中，奥地利石油工业由于分属不同政府机构管辖而一直缺乏纵向整合。直到近期，国有公司才享有真正的财务自主。由于奥地利的国有公司与私营公司的法律地位相同，它们既不受专门的管理机构管制，其集体谈判机制也没有不同于私营公司之处。决定多少利润用于公司的再投资和政府红利的，是国有公司的管理层而不是政府。而1962年及70年代的项目也说明，以国有公司的就业和投资决策为基础的反周期稳定政策，已经很难仅靠行政命令和官僚权威来实现了。相反，这些政策需要在政府精心组织的与国有企业的谈判中赢得部长的权威与政党的支持。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清楚地意识到国有企业中组织分裂和政府控制相对缺失的问题，1966年和1970年两党单独执政时分别发起的重组行动就反映了这种认识。20世纪60年代末，人民党通过建立一个集权的国有控股公司，实现了组织管理上的简化，但奥地利工业公司（the Austri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对单个企业和公司的控制权力仍然很小。7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将奥地利工业公司(OIG)从一家信托公司转变成股份公司,即奥地利工业股份公司(OIAG),并且略微增加了其总部的权力,但社会民主党仍然拒绝扩大政府有限的正式控制权。奥地利国有工业展现出“公有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但没有社会主义化的特点……不论好坏,国家作为所有者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sup>[29]</sup>

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中立化在官僚机构与奥地利国有银行的关系中也很明显。<sup>[30]</sup>战后很多年里,银行成功地与政府和官僚机构保持着距离,它们主要根据市场标准来经营其产业帝国。银行的政治自主性得益于它们在1956年至1959年间部分地恢复私营,以及联邦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贷款需求的增加和银行相对雄厚的资本基础。尽管管理信贷机构的立法部门赋予财政部强大的权力,而实际上这些权力大部分被政府委托给了几个银行业机构联盟。此外,在1949年和1979年间,财政部一直被信奉保守主义的人民党所掌管,该党对政府金融干预手段的进一步发展毫无兴趣。自1970年以来,社会民主党政府一直认可人民党在金融高层的强势影响,并且顶住诱惑,没有大量地削减人民党在奥地利国有银行中的存在和影响力。“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欣慰地说,他们需要保守的人民党来经营国有银行。”<sup>[31]</sup>

尽管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奥地利国有银行从来没有像奥地利国有工业那样成为一个政治足球。即便如此,奥地利比例代表制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战后多年里,最大的国有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一直属“黑营”,而第二大银行国家银行(Länderbank)则属“红营”。因为坏账的负担越来越多,国家银行的管理层在1981年春天集体下岗,但是新班子仍然严格遵守了企业界和工会——“黑营”和“红营”——等额代表原则。1978年,人民党在议会主要的经济事务发言人



斯蒂芬·科伦(Stefan Koren)教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sup>①</sup>(National Bank)的行长,这一事件也表明在70年代,政治权力继续在两个经济伙伴中分享。对奥地利中央银行的一项详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实践中,奥地利中央银行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不如它对两大主要政党和主要利益集团的依赖”。<sup>[32]</sup>另一项分析抓住了奥地利民主统合主义的精髓,即驯化但不消除政治冲突;该研究这样形容这种局面:“原则上,中央银行是独立的。实际上,它总是与财政部步调一致。有些人甚至可能会说,是财政部总与中央银行保持一致,但没有人这样要求,这两者似乎是亲密伙伴,尽管它们在公开场合会意见不一。”<sup>[33]</sup>

最后,权力分享和国家权力的中立化,也表现在社会民主党试图为积极的产业政策建立制度化机制之中。<sup>[34]</sup>在20世纪60年代末,奥地利官僚机构遭受了组织上的巨大创伤,这削弱了其执行连贯政策的能力。工业与贸易部(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进行重组,设立了处理特殊产业分支事务的新部门,部分公务员还接受了额外的培训。1968年至1970年间,该部门提出了六项不同的政策措施,奥地利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鼓励创新和奥地利传统工业结构的改革。但是只有两项措施——建立产业研究促进基金(Industrial Research Promotion Fund)和专利促进工作组(the Working Group for the Promotion of Patents)——是具体的政策措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分部门数据不断采集并公布。20世纪70年代,为保证奥地利的充分就业,各国有银行承担了极其有限的财政援助任务,但这些银行极不情愿多增负担;因此,奥地利政府只得加紧发展新机构来为积极的产业政策做准备。但对这一政策的限制相当明显。新的工业委员会 24

① Austria National Bank,又译作奥地利国民银行,但性质是央行,所以本文译为中央银行。——译注



(the Commission for Industry)于1976年成立并由总理亲自主持;但由于人民党的担心,该委员会最终没有演变为一个中央计划机构。相反,它变成了另一个咨询机构,负责对重要的产业部门准备具体意见书。这个委员会没有像企业界先前担心的那样推动行业集中,反而在其早期的会议中鼓励奥地利的中小企业加强合作。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天然联盟是大规模工业企业,这一政策等于是增强了其对手人民党的政治基础,后者一贯支持中小公司。简而言之,这个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成为政府官员急于改变奥地利产业结构的工具,而是致力于成为巩固奥地利合作主义结构的另一个制度性支柱。

## 瑞 士

在瑞士,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差异的缩小,朝着国家相对于其他政治行为主体的权力有所增强的方向发展。认为政府或国家的官僚机构软弱无力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政府为联邦议会的工作提供信息和指导,据说联邦议会在权力和地位上都处于从属位置。而且,政府相对于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的劣势,也会成为一种实力的来源。由于私有部门有着偌大的权力,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分歧与冲突,这不断地将政府推到仲裁者的位置,使其在多元化冲突中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政府通过巧妙地选择进行讨论的制度平台和处理政策过程的适当时机,从而对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至少在数量上,联邦官僚机构和各州主导着议会开会前非常关键的咨询过程中的初期阶段。

国家实力也体现在瑞士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和日本一样,瑞士的经济事务和国家安全也密不可分。如在农业政策领域,这种关系已经促使瑞士采取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这表明国家在这方面拥有不寻常的实力和决定性作用。<sup>[35]</sup>增强农业自给自足的必要性是瑞士人在“二

战”中学到的重要教训之一。1939年时,瑞士农业仅占瑞士面包谷物消费的30%,而且几乎没有水果和蔬菜生产。而到1975年,瑞士消费的70%以上的面包谷物与水果,以及40%的蔬菜都由国内生产。此外,瑞士人还实现了肉类和土豆的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方面的巨大变化产生于一种自觉而不懈的政策努力。每五年,瑞士人就会制定一套计划,确定其农业要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决意增强自给自足,也影响了瑞士在农业上的外贸政策。1966年,瑞士在它获得农业自由贸易原则的豁免权之后才决定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在关贸总协定的记录中绝无仅有。因为自给自足运动导致奶制品长期供给过度和长期环境恶化的威胁(由于过度施肥和未经处理的污水不断增多),瑞士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策中,开始强制限制每英亩草地养殖奶牛的数量。自给自足运动促进了瑞士强国家的进一步行动,即试图解决其政策的非预期后果。“由于强调短期要素成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腐蚀了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理念,为保护人类未来,政府干预日益具有人侵性质……广泛的政策选择使瑞士政府能够采取断然行动,其干预程度和强制水平,让瑞士人自己都坦言很是反感。”<sup>[36]</sup>于是,奠基于广泛的政治认同之上、植根于珍视个人自由作为社群集体主义的组成部分而非对抗理据的政治文化之中,一旦遇到危机情况的瑞士政府,就能够聚集起那些容易被私有部门所忽视的残余力量。<sup>[37]</sup>

其他政策领域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与奥地利相比,瑞士较低的进口关税中,有一部分是为资助一项庞大的经济备战项目而征收的。这一项目是一个更庞大的国防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能保护90%的瑞士人免受核打击。如果说绝大多数其他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协商过程往往很是艰苦的话,对于像国防和货币这些触及瑞士安全和关键利益的问题,协商过程就容易多了。“二战”结束后的30多年

里,瑞士有一半的联邦官僚受雇于国防部门,这反映了其持续的军事备战状态。近期瑞士情报界的一项丑闻揭露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瑞士政府的两名绝密级情报官员竟然受同一名官员的领导,而该名官员同时还主管着一个经营相似业务的私营机构。英国女王在1981年5月访问瑞士时,英国记者被其安全防卫的程度所震惊,有人甚至将其与一个完善的专制政权下的安全体系相媲美。<sup>[38]</sup>

外籍劳工的问题也增强了国家权威的作用,这一问题也反映出人们常常忽视这个潜在的强势国家的存在。相对于更倾向世界主义的边境地带来说,瑞士的排外情绪在地方主义根深蒂固的环阿尔卑斯各州能引起更多的共鸣。20世纪30年代对外来影响之恐惧的增强,表明在瑞士,无论是从政治局势来看,还是从历史因素入手,法西斯主义运动都绝不会赢得广泛的追随者。现今依然实行的严格移民入境法就源于20世纪30年代。而瑞士的联邦外事警察在识别非法移民方面异常高效而且无处不在。与各州劳动力市场管理当局的密切合作,就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显著表现。此外,战后时期外籍劳工数量的急剧扩张与瑞士所坚持的严格的归化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世纪70年代末,瑞士境内的外国人一半以上符合居住满12年便可入籍的正式资格,但自1951年以来这些符合条件的外国人中,得到瑞士公民资格的却不到10%。1975年入籍公民的人数是1万人,约占外籍劳工总数的1%。最后一点,瑞士在70年代采纳了一项异常严格的以配额制为基础的移民归化政策,该政策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来执行,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强势作用。<sup>[39]</sup>

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企业界、工会和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增强了国家的权力。与其他欧洲小国以及先进的工业大国相比,瑞士企业界和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尤为独特。这种联系既有制度化的往来,又有非正式的私人协商。诸如贸易发展处(Trade Development Office)这样



的半公共机构(parapublic institutions)以及近期帮助建立瑞士与苏联、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商贸关系的各种“混合型”贸易委员会的出现,都为政府官员和企业界合作执行商业政策提供了良好平台。企业界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就是瑞士的惯例。此外,还存在一个外贸政策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ssion for Foreign Trade Policy),在所有重要的贸易问题上联邦委员会都必须向它咨询。该委员会有30到40名委员,都来自主要的利益集团;委员们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不是通过多数投票,而是通过漫长的讨论,最终达成各方都接受的妥协性解决方案。由于1973年以来瑞士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陷入困境,该咨询委员会遂于1975年为对外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for Foreign Economic Policy)所取代。新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一个更为狭隘的瑞士精英圈,该委员会现在已是瑞士出口业的主要发言人。正是这个顾问委员会,而非前面的咨询委员会,于1975和1976年间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权力的真正核心,即经济谈判常务代表团(Permanent Economic Delegation for Economic Negotiations),与咨询或顾问委员会相比,更多地负责政策执行。该代表团既缺乏任何合法权力,其成员也不很稳定,只是通常限于政府最高官员、高级官僚、四大利益集团的领导人,还有一少部分数量不定的嘉宾,他们是根据讨论的主题而受邀参与。专题会议的邀请通常直接发给个人而非机构,该常设代表团会议也不做书面记录。所有上述情况都表明,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个小集团决定了瑞士在国际经济中的基本政策。<sup>[40]</sup>

我们倒也不难看到,这种将政治问题在行政圈内闭门解决的做法遭到直接民主制度的挑战。比如在1976年,对瑞士日益参与国际组织持怀疑态度的传统右派和反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新左派在公民投票中联合起来。他们成功地否决了联邦议会两院已经通过的一项议案,



这项议案旨在扩大给国际开发署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的一项贷款。但是从更广的范围看来,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公众对这种闭锁式的权力场的侵入是极其罕见的。从 1920 年到 1974 年,八项要求政府进行公投的对外政策中有七项都获通过;而十四项反对政府政策的公民提案却只有一项被接受。<sup>[41]</sup> 因此正常而言,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企业高层联盟、国家官僚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不会受到公众挑战的。“一般来说,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不同于国内问题的决策。集中和寡头式的对外经济政策决策模式,能迎合国际经济体制的快速变化所要求的效率、灵活和速度。而保守、实用和费时的联合决策……则与民主和合法性相适应。”<sup>[42]</sup>

如同在美国一样,在瑞士,对分权政府的权力的严格限制本身,就是其基本政治力量的源泉,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如此。瑞士宪法“运行简洁,而且一直在重新阐释和重新定义其权威”。<sup>[43]</sup> 自 1874 年最后一次宪法修订以来,公民投票已经通过了九十项修正案。而在危机时期放弃民主做法也不乏历史先例。比如,1919 年至 1939 年间,一半的联邦法律和政令是在宪法紧急条款下出台的,因此也不会受到公众投票的束缚。这些措施中有 60% 是在 1930 年到 1938 年间通过的。相比之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过程,则以复杂而漫长的讨价还价和非正式协议为特征。不过,1964 年的反通胀项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危机氛围中,该法案于一周内就被拟定、讨论并采纳。<sup>[44]</sup>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这种例外几乎变成了常态。例如,在实施浮动汇率制之前,《1971 年货币保护》(Protection of Currency of 1971) 紧急政令授予联邦委员会和中央银行大量的自主权,这些权力在整个 70 年代频繁施威。瑞士政府日益依赖紧急政令来施治的明显例证还有:一项更为严厉的反通胀项目(1972)、区域规划政策(1972)、财政政策(1975),以及失业保险计划(1975—1976)。1971

年至 1976 年间,政府颁布了九项超越宪法权限的紧急政令,并全行经由强制性公民投票批准。而在 1949 年至 1970 年间,这样的政令只有三项。类似地,1971 年至 1976 年间,政府颁布了十五项合乎宪法的紧急政令,约占所有获得通过议案的 10% 和重大政治问题的 15%,尽管宪法规定这些政令可以选择进行公投,但最终没有一项付诸投票。而 1949 年至 1970 年间,这样的政令只有七项。<sup>[45]</sup>从统计数字来看,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两种形式的紧急政令分别年均增加十一项和八项。通过减少政策过程中的干预机会以及参与者的数量,紧急政令的运用增强了国家的权力;但是由于源自 1945 年的协作式政策决策过程,70 年代的瑞士始终没有回溯到 30 年代的危机模式。

瑞士的共识政治增强了这一弱国家相对于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权力。权力差异的缩小对政治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而差异的缩小则有赖于集体代表和集体自律的结合。共识政治限制了奥地利强国家的权力,却扩大了瑞士弱国家的权力。通过所提供的诱惑和所影响的转型,合作对不同体制的国家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在瑞士和奥地利,合作制度是在更广义的国家福祉中重新整合冲突性阶级利益的机制,而这种广义概念的形成,源自一直困扰着开放经济体的脆弱性。这些政治安排的包容性,使缩小权力差异成为可能,而这一差异缩小过程,对瑞士和奥地利的国家特征的影响不尽相同。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历,使奥地利对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完全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安排非常警惕。危机时期迫使瑞士赋予国家以紧急权力,这险些转变了他们的直接民主制。尽管 20 世纪 30 年代的记忆在奥地利和瑞士都已淡去,但催生合作的制度安排已然启动了自动运行的马达。在国际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压力,促使人们愿意接受能够将国家、企业界和劳工紧密联系到一个政策网络之中的政治安排。多重联系的结果削弱了奥地利的国家权力,却增强了瑞士的国家

力量。于是,在国家权力的问题上,现如今的政治关系已然开始脱离其初生时的历史依据。

## 政策结果

塑造奥地利和瑞士的国家权力的历史发展过程,既有不同又有相似之处。历史的差异性解释了为什么在政治上这两个社会分别代表着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历史的相似则阐明了为什么合作政治会产生于地位相对平等的行为主体的政治关系之中。回溯两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所采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我们便可以找到两种发展的结果。

瑞士始终奉行自由主义外贸政策,大量地投资海外,并且大规模地引入外籍劳工。它一直限制公共支出,发展出一套私营社会福利体系,并且总体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相反地,奥地利谨慎地采纳自由主义外贸政策,它大量地资助国内投资,并且全身心地致力于充分就业和一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它的公共支出巨大,慷慨地资助起一套公共社会福利体系,还有一项收入政策来调节劳资协定的工资与价格。这些政策差异表明,奥地利的国家偏向积极有为,而瑞士则喜好消极无为。国家能动主义(activism)认同工人运动在奥地利政治中的核心重要性,而消极的国家则适宜企业界在瑞士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两个国家都不存在任何有关国家的政治角色根本性的政治冲突。

同样重要的是,合作主义政治架构要求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相对平等。这种要求倾向于抑制奥地利的国家能动主义,而在特殊条件下反而促进瑞士的国家积极有为。这两个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并非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为主要任务。相反,它的主要目的是将

两国从应对外部压力中发展出来的合作制度再次合法化。

在社会再分配问题上,瑞士和奥地利的经历相当类似。在其他大多数工业国中也正是如此,我们的确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进一步精确支撑这一判断,但是可资利用的证据都直指这一方向。在瑞士,这一事实不足为奇。瑞士是私营企业界的堡垒,也是借助直接民主制积极捍卫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选民的家园。由于瑞士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左派没能聚集足够的力量,以对抗这一保卫现状的强大联盟,瑞士的国家从来没有在社会再分配的问题上进行过严肃的讨论或行动。

更令人惊讶的是,社会再分配问题在奥地利也沉寂了,即使1945年以后左派的权力地位不断提升后也没有出现转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于希望通过增长战略而非再分配斗争来促进社会民主的目标,奥地利工会运动都做好了接受工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分配比例上的重大损失的准备。经合组织的《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曾多次提到这一情况,并称其是当时发达工业国所享受的黄金时代中浮现的“一种非典型现象”。<sup>[46]</sup>奥地利经济学家没有准确地预测到20世纪70年代那场经济衰退,而奥地利工人于衰退前的1974—1975年间,由于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而获得的意外收益也被1978—1980年工资的急剧下降所抵消。即使我们承认奥地利就业结构上的变化,但事实仍然是,社会主义者所统治的十年并没有改变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sup>[47]</sup>此外,奥地利的增长政策充其量只是维持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分配的现状。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这一政策强化了这种不平等状态;而工会运动,至少在原则上,是应该致力于消除这种不平等的。<sup>[48]</sup>无论是在实际的斗争要求还是意识形态辩论中,奥地利工会领导人并没有强调社会平等的目标,反而选择了插手最高级的政治,即对奥地利在世界经济中的政治战略至关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



在国际经济中的相似地位,使得瑞士和奥地利的经济结构转型主要是出于国际市场的要求,而非国家的积极主导。由于工会和政治左派势力更强,社会再分配问题在奥地利比在瑞士意义更重大;在瑞士,强势的企业界和保守的选民摒除了很多再分配的可能性。但是在奥地利,经济效率的需要和维持左派与右派政治平衡的考虑,严格限制了国家的干预主义冲动。相反,在瑞士,保持社会共识的政治需求,偶尔会促进国家背离有效率的的市场解决方案,而选择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

本文讨论了三。第一,18 世纪的历史发展导致了奥地利和瑞士在企业、工人运动和国家管理结构上的特征性差异。在奥地利,国家相对较强而且集权,拥有广泛的行动范围。在瑞士,国家相对较弱而且分权,行动范围狭窄。要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必须回顾两国在宪政体制、工业化的时机及其过程的本质,以及两国在“二战”后所选择的地缘政治路径等历史性差异。

第二点则是对第一点的补充。历史所沿袭下来的国家作用上的差异与强烈的趋同趋势一直齐头并进。趋同的主要压力来自两国共同的问题。两国都是小国,致力于经济开放,并且与国际经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两国中,日益参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强化了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教训的认识,并促进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合作。它们的共识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缩小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在奥地利这倾向于削弱,而在瑞士则增强了国家的权力。正如两国特征上的差异反映在其社会政策中一样,趋同的趋势也惊人相似地反映在两国的政治战略之中,“二战”后的奥地利和瑞士,正是通过这些战略来解决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

最后一点,本文同时解释奥地利和瑞士在特征上的不同点和相似

性,是为了展示从更多的角度观察国家的价值。文中采用了两个视角。国家既被视为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行为者,又被视为将自身与其他社会行为者连接起来的政策网络的一部分。第一个视角用来强调两国之间的差异,第二个则阐明它们惊人的趋同。每种解释都提供了关于奥地利和瑞士的一半的重要事实。综合起来,它们表明,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的交叉互动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能力和结构。

### 注 释

本章部分材料取自作者先前发表的著作《统合主义与变革:奥地利、瑞士和产业政治学》(*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在此,我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德国马歇尔基金(German Marshall Fund),感谢它们给予本项目的财政资助;我还要感谢本书的几位责任编辑,感谢他们对本文早期版本中肯的批评。除此之外,玛丽·卡岑斯坦(Mary F. Katzenstein)、斯蒂芬·克拉斯纳、彭培尔(T. J. Pempel)、马丁·谢夫特以及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给予的批评和建议也让我受益匪浅。

[1] Alexander Gerschenkron, *An Economic Spurt That Failed: Four Lectures in Austrian Histor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7)。

[2] David Klingman,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 Norway and Sweden, 1875—1965* (Beverly Hills, Calif. : Sage, 1976)。

[3] B. Beedham and G. Lee, "Even in Paradise," *Economist*, February 22, 1969 (Survey), p. v.

[4] Ulrich Klöti, *Die Chefbeamten der schweizerischen Bundesverwaltung* (Bern: Francke, 1971); Thomas A. Baylis, "Collegial Leadership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Relevance of the Swiss Experience," *Polity* 13 (Fall 1980) : 33 - 56.

[5] Hanspeter Kriesi, *Entscheidungsstrukturen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e in der Schweizer Politik* (Frankfurt: Campus, 1980), p. 35.

[6] Jean Meynaud, *Les organisations professionnelles en Suisse* (Lausanne: Payot, 1963), p. 313; as quoted in Roland Ruffieux,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Senior Civil Servants in Switzerland," in *The Mandarins of Western Europe: The Political Role of Top Civil Servants*, ed. Mattei Dogan (New York: Wiley, 1975), p. 250.

[7] Raimund E. Germann and Andreas Frutiger, "Role Cumulation in Swiss Advisory Committees" (Paper prepared for a workshop, Interest Groups and Governments,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Florence, March 25 - 30, 1980), pp. 1 - 3.

[8]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blic Expenditure Trends* (Paris: OECD, 1978), p. 90.

[9] Gottfried Berweger and Jean-Pierre Hoby, "Typologien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Sociolog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Zurich, 1978), pp. 6 - 8.

[10]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79, p. D4.

[11]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7, 1982, p. 31.

[12] Jonathan Steinberg, *Why Switzer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56.

[13] Harold L. Wilensky,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0 - 11.

[14] Ferdinand Lac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strian Public Sector since World War II*, Technical papers ser. No. 7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Office for Public Sector Studie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77), p. 8.

[15] Oskar Grünwald, "Austri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stria*, ed. Sven W. Arndt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2), p. 136.

[16] Sarah Hogg, "A Small House in Order," *Economist*, March 15, 1980 (Survey), p. 8.

[17] Ferdinand Lacina, "Zielsetzung und Effizienz verstaatlichter Unternehm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4 (2) (1978): 143 - 154; Manfred Drennig,

“Vermögensverteilung in Österreich—ihre politische Relevanz,” in *Das politische system Österreichs*, ed. Heinz Fischer (Vienna: Europa Verlag, 1974), p. 481; Volker Bornschieer, *Wachstum, Konzentration und Multinationalisierung von Industrieunternehmen* (Frauenfeld: Huber, 1976), p. 206.

[18] Karl Socher, “Die öffentlichen Unternehmen im österreichischen Banken- und Versicherungswesen,” in *Die Verstaatlichung in Österreich*, ed. Wilhelm Weber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4), pp. 393 – 400; Hogg, “A Small House in Order,” p. 8.

[19] Leonhard Neidhart, *Plebiszit und pluralitäre Demokratie: Eine Analyse der Funktion des schweizerischen Gesetzesreferendums* (Bern: Francke, 1970), pp. 313 – 319.

[20] 参见我的书: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 3, for a full statement of the argument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21] Margaret Sieber, *Dimensionen kleinstaatlicher Auslandabhängigkeit*, Kleine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Wissenschaft no. 206 – 207 (Forschungsstelle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iversity of Zurich, 1981), pp. 156 – 159; Peter J. Katzenstein, *Corporatism and Change*, chaps. 5 and 6.

[22] Uwe Kitzinger, quoted in Andrew Shonfield, *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94.

[23] Christof Gaspari and Hans Millendorfer, *Prognosen für Österreich: Fakten und Formeln der Entwicklung* (Vienna: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73), p. 117.

[24] Christian Smekal, *Die verstaatlichte Industrie in der Marktwirtschaft: Das österreichische Beispiel* (Cologne: Heymanns, 1963), p. 55.

[25] Quoted in Dennison I. Rusinow, “Notes towards a Political Definition of Austria,” part 4, *AUFS Reports*, June 1966: 20.

[26] Erich Andriik,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in Austria’s Steel Industry” (Unpublished paper, May 1982), pp. 12 – 13.



[27]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Policy of Austria* (Paris: OECD, 1971), p. 66.

[28] Siegfried Hollerer, *Verstaatlichung und Wirtschaftsplanung in Österreich* (1946 – 1949) (Vienna: Verband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en Österreichs, 1974), p. 2; Rusinow, “Notes,” part 4, p. 5. Rupert Zimmerman, *Verstaatlichung in Österreich: Ihre Aufgaben und Ziele*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64), p. 78.

[29] Rusinow, “Notes,” part 4, pp. 11 – 12.

[30] “The Austrian Lesson in Economic Harmony,” *Euromoney* (supplement), May 1979; Socher, “Die öffentlichen Unternehmen,” pp. 381, 385 – 388, 437 – 439, 444 – 446, 451, 454.

[31] Hogg, “A Small House in Order,” p. 3.

[32] Socher, “Die öffentlichen Unternehmen,” p. 372.

[33] “The Austrian Lesson,” p. 9.

[34] *Jahr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Wirtschaft 1976/1: Tätigkeitsbericht der Bundeswirtschaftskammer* (Vienna: Bundeswirtschaftskammer, 1977), pp. 30 – 34.

[35] 对此,我要感谢 Irirangi Coates Bloomfield, “Public Policy,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A Comparative Inquiry into Agricultural Policy Approaches and Environmental Out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itzerland” (Ph. D. diss., Boston University, 1981), 尤其是 pp. 181 – 182, 194, 221, 235, 242, 249 – 250, 257。

[36] *Ibid.*, pp. 225, 232.

[37] Benjamin R. Barber, *The Death of Communal Liberty: A History of Freedom in a Swiss Mountain Cant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38] *Jahr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Wirtschaft 1976/1*, p. 110; Paolo Urio, “Parliamentary Control over Public Expenditure in Switzerland,” in *The Power of the Purse: A Symposium on the Role of European Parliaments in Budgetary Decisions*, ed. David L. L. Combes (New York: Praeger, 1975), p. 319; Kriesi, *Entscheidungsstrukturen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e*, p. 36;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81, p. 13.

[39] Dietrich Thränhardt, "Ausländische Arbei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Österreich und in der Schweiz,"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20(1) (1975): 68 – 69; Hans-Joachim Hoffman-Nowotny and Martin Killias, "Switzerland," in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Europe*, ed. Ronald E. Krane (New York: Praeger, 1979), pp. 49, 54, 55 – 58, 61.

[40] Peter J. Katzenstein, *Capitalism in One Country? Switzerl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ccasional papers 13 (Western Societies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January 1980), pp. 100 – 103.

[41] Guido A. Keel, "L' influence des groupes d' intérêt politiques sur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Suisse," in *Handbuch der schweizerischen Aussenpolitik*, ed. Alois Riklin, Hans Haug, and Hans C. Binswanger (Bern: Haupt, 1975), p. 313.

[42] André Jäggi and Margret Sieber, "Interest Aggregation and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he Case of Switzerland" (Paper prepared for a workshop, Interest Groups and Governments,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Florence, March 25 – 30, 1980), p. 46.

[43] Jane Kramer, "A Reporter in Europe," *New Yorker*, December 15, 1980, p. 140.

[44] Jörg P. Müller, *Gebrauch und Missbrauch des Dringlichkeitsrechts* (Bern: Haupt, 1977), p. 8; Klaus Schumann, *Das Regierungssystem der Schweiz* (Cologne: Heymanns, 1971), pp. 175 – 178.

[45] Müller, *Gebrauch und Missbrauch*, pp. 12, 15. Kriesi, *Entscheidungsstrukturen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e*, p. 138.

[4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 Surveys: Austria* (Paris: OECD, 1971), p. 11.

[47] Wilhelm Hankel, *Prosperity amidst Crisis: Austria's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Energy Crun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56, 69.

[48] Hannes Suppanz, "Einkommensverteilung in Österreich," *Journal für angewandte Sozialforschung* 20(3 – 4) (1980): 40 – 45.



## 第三篇

# 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

编者

本篇引论认为，“把国家找回来”不仅是要把国家看作具有特殊目标的组织来进行分析，同时还要找出国家对特定社会中所有集团和阶级政治价值观和参政方式施以影响的各种途径。社会分化与利益 (social cleavages and interests)，并非有如传统智慧通常暗示的那样，是“从外部”通过政治影响国家的原初性给定状态。恰恰相反，国家的组织性安排、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有模式，以及现行的政策，无一不在影响着政治场中人所追求的社会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某些潜在的集体认同得以激活，而另一些没有；某些社会冲突的行为被政治化，其他的却没有。某些诉求得到重视，但另一些则或者是未能进入政策议程，或者是在既定的国家结构和现有政策下被定性为不合理要求。这种部分受到国家影响的政治现实，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未来有关国家架构和政策的斗争。

借助有关美国和西欧的政治文化、政党、统合主义安排、政策议程和阶级形成等议题的一些近期文献，本引论将阐明前述“托克维尔式”理念。再者，本书各篇中的文章在逻辑上很难割裂开来，因此，本书前面的各章，均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前述有关国家与政治和社会之



关系的看法；尤其是最前面的几篇文章，非常重视国家对社会政治冲突的影响力会如何影响国家制定或执行经济战略的能力。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指出，自主而有效的国家干预可能会激发社会阶级提出新的政治诉求或者俘获部分国家机构。韦尔和斯考克波探讨了英国的早期失业政策是如何逐渐将工人阶级和工党后来的诉求，引导至要求扩大失业保障的福利，而不是要求通过赤字财政增加公共工程。类似地，卡岑斯坦关于瑞士和奥地利的研究，考察了在国家根据向国际市场开放的需求而不断调整经济政策时，阶级组织和阶级诉求与国家之间被相互锁定(interlocking)的情形。

本篇刊登的三篇文章则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国家与政治之关系的托克维尔式视角。它们关注的不是国家的能力有多大，尽管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的视野；它们更为直接地聚焦于政治冲突问题，深入探究在决定何种社会冲突或诉求可以成为政治性议题时，国家的结构与行为是如何扮演主要角色的，其中所牵涉的社会集团又有何作用，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在《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Working-Class Formation and the State)一文中，将其《城市战壕》(City Trenches)一书中有关美国的结论作了比较和分析性的拓展。卡茨纳尔逊非常直截了当地采用几个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变量，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倾向进行因果解释。这些变量包括：与工业化有关的选举民主化的历史时机、民族国家行政架构的集权化和科层化模式，以及有利于或压制工作场所或居住社区中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法律环境。卡茨纳尔逊展示了上述有关国家形成、国家结构和公共政策的诸多方面，是如何影响到政党的组织和运作，并影响到那些能够让产业工人产生出作为政治行动者的集体认同的有意义的概念。

卡茨纳尔逊的文章特别有价值之处，在于它对19世纪的英国和

美国进行了比较,而这两个国家通常都被理解为同样典型的“弱国家”。大多数研究英美劳工阶级政治学的学者,都想当然地把这两个国家视为相似的“弱型”自由主义国家,因而将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体的结构,或者是社会经济或种族的差异之上。然而,卡茨纳尔逊却证明了英美两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从而解释了为何英国工人会产生出一种全球性的“阶级政治学”,将发生在工作当中和居住社区里的冲突与群体认同联结起来;而美国工人却同时发展出在工作场所以经济为中心的“劳工斗争”模式,及在居住社区里进行民主化政治选举时的种族动员(ethnic mobilization)策略。因此,卡茨纳尔逊使我们摆脱了将全球国家划为“强型”或“弱型”的简单的二分模式,从而转向对影响一国政治文化和集体认同之形成的国家结构和政策这些特殊的维度进行更加差异化的细化处理。

和卡茨纳尔逊的文章一样,在《霸权与宗教冲突》(*Hegemony and Religious Conflict*)中,戴维·莱丁(David Laitin)引人入胜地分析了何种社会分化现象会变得政治化。通过考察新出现的分化现象,把讨论伸展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莱丁的分析范围大大超越了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的范畴。而至今为止,我们所有有关托克维尔视角的讨论都基于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国家。根据卡茨纳尔逊的比较研究,在19世纪,英格兰和美国工人的社会环境中确实存在着阶级与种族(尤其是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分歧;但国家和政党的运作,令英格兰走向阶级政治化,而在美国,政治化却以居住地一种族认同的形式进行。类似地,莱丁向我们展示了,在约鲁巴,即今天的尼日利亚北部,存在着基督教对伊斯兰教,以及约鲁巴地界上不同的“祖籍城邦”(ancestral cities)这两种交叉性社会认同上的分化。但是只有后一种分化最终变成了政治性问题;而当前无论是“原始效忠论”(premordial loyalties)还是“经济理性论”(economical rationality),都未

能解释为何宗教差异没有政治化。

莱丁认为,能够深入阐释政治冲突之根源的社会认同的选择,有可能取决于“霸主国家”的统治策略,正是这些霸主国才既有动机又有能力对社会集团形成的模式进行建构或者是重构。在约鲁巴的案例中,他得出结论说,只有回溯到英国殖民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历史模式,才能解释为何是对祖籍城邦的倾向而不是宗教差异最终被政治化。莱丁认为,他的这一发现与其他有关非洲“部落认同”,以及有关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宗教身份政治化的研究,在结果上都是一致的。

当然,莱丁和卡茨纳尔逊并不认为政治分化可以不依据任何既存的社会现实而完全凭空创造出来;他们也没有简单地使用马基雅维利或工具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对政治分化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的确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国家会鼓励特定类型的政治认同和冲突,其手段或者是像殖民地政权的“间接统治”策略那样的国家对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或者是当掌权者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建立或强化某一特定的社会认同时,则依靠国家结构和政策所产生的间接效果。

最后,艾尔弗雷德·斯特潘的《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力量》(State Power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带我们去到当代拉丁美洲,接触一些与卡茨纳尔逊和莱丁截然不同的话题。斯特潘没有关注社会认同的政治化过程这一问题,他独树一帜地直接切入一个早已在巴西、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国议程之上的政治议题:从官僚权威统治向民主制转型的可能性。根据当时已经建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对镇压型国家机器的持续存在予以抵抗的事实,斯特潘一方面探讨社会抵抗影响国家战略的不同路径,一方面考察南美国家的结构与战略又是如何影响反对派组织的行动选择与战略的。

斯特潘就其文章中的核心问题所得出的一系列发现与思想颇能

刺激人的神经。比如,他认为,官僚权威政权所推行的经济项目,跟其镇压能力一样,也能影响到社会抵抗力量的前途;当然,其影响途径让人惊异。对巴西和智利的比较研究则表明,意欲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且比较“成功”的国家干预,能够降低国家主导和控制公民社会的能力;相反,国家精简公共部门的审慎努力,也能够瓦解社会势力、削弱政治反对势力,这种情形即使在经济困难快速加深时也有可能出现。

斯特潘还考察了官僚权威统治及政策对阶级冲突的影响,如果后果是深化阶级冲突,就有可能减少社会力量联合抵抗的可能,或者是削弱主导阶级冒险实施民主转型的意愿。他还调查了官僚权威政权中精英内部和部门之间的分歧。一旦存在这种分歧,就可能像巴西那样,使社会反对势力有机可乘,或者如智利一样,只是削弱一个政权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

在展开其分析以及进行个案研究与比较的过程中,斯特潘没有机械地假设国家与公民社会是陷于争夺权力的“零和博弈”中的两个单一的行为主体。他有意识地寻找那些让国家与公民反对势力一同消解或是同时增强其一致性政治行动能力的非零和路径。事实上,斯特潘发现,巴西近来的发展,恰好反映了官僚威权政权的计划和结构导致公民社会中的自主性反对势力重新整合的极佳案例。斯特潘的文章的实证之趣味主要在于其对研究结果的精致分析。其分析引人入胜之处则完全在于,斯特潘使用辩证的方法揭示了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国家计划与社会团体的政治目的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篇中的三篇文章,就算是比不过本书的其他文章,至少也和它们一样代表了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策略与基本命题;它们启发了新的研究议程,也吸引着学人就相似的议题对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域展开探索。而且,这些文章比任何其他文章都更充分地证明:把国家



当作制度性结构或潜在的自主性行动主体来认真对待,不等于要把国家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更不用说无所不能的实体。社会认同、社会冲突和集体性行动——包括对高压国家的镇压性力量的社会抵抗——可能会继续吸引着学术界的目光。只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国家的影响力,才能明白有关现象的形式与动力。

## 八 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

### ——从美国视角看 19 世纪的英格兰

艾拉·卡茨纳尔逊

众议院在调查 1868 年纽约的竞选舞弊案时,揭发出坦马尼·霍尔(Tammany Hall)所策划的一个重大阴谋,此人为了让还未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有投票资格,向移民售卖假冒的国籍归化文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大部分的勾当都是在小区的酒吧进行的。格林威治村汤普森街圣巴纳德酒馆的老板西奥多·艾伦(Theodore Allen)所作的陈述颇为典型:

我拥有一家酒吧。一个名叫詹姆斯·戈夫(James Goff)的人和他的兄弟就在干着买卖归化证明书的勾当,他们常来我的地方……我估计一千份是送去布鲁克林区的,我亲眼见过。他们说,那些归化文件每人可卖得 50 美分。<sup>[1]</sup>

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的每周日晚上,英格兰伯明翰导航街的希望与锚旅馆(Hope and Anchor Inn)均会有辩论聚会。每次 20 至 40 名讲者会就某一题目进行争辩。从中产阶级的立场出

发,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做了如下记录:

这里会有很多吓倒外间观察者的事情:1859年1月23日有关赋予工人阶级选举权的辩题没被反对。1863年3月22日,在有关共和主义的辩论中,支持君主制的一方以16票之差落败。1866年8月26日和1867年4月21日,著名的伦敦改革同盟(London Reform League)成员两次前来观摩,其中乔治·豪威尔(George Howell)还参加了辩论……1871年6月11日,学会以23对15票通过决议表示支持巴黎的共产党人。其激进精神并不限于政治领域。1859年8月21日,伦敦建筑业的罢工工人得到学会22对2票的大比数支持。1864年10月16日,英格兰中部地区正在罢工的矿工,得到学会以45对18票的声援。<sup>[2]</sup>

我希望指出和进行解释的难题就存在于19世纪的英格兰和美国的城市社区中的工人阶级经常流连的酒吧和客栈之中。在蒸汽动力的街车和火车普遍采用之前,英美两国的酒馆就是重要的交通中心;而在之后,它们则成为长短途旅客的歇脚之所。各类酒馆,无论装修或简陋或高档,都是人们(特别是男性)的娱乐去处。这其中有音乐厅,有流氓聚脚之处,还有些根本就是妓院。总之,它们都是人流密集的社交场所,嵌于街角和小区之中。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它们日益成为相同社会阶层的群众聚会之所。

不论在英格兰或是美国,这些酒馆成为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活动最常见的场所。美国的酒吧为政党提供殷勤的聚会场所。酒吧老板往往充当“政治企业家”,帮助建立高效活跃而可靠的地区性政党机器,这种机器能够以可预计的方式分发选票从而交换肥缺。正如一项关于19至20世纪初的政党组织的重要研究的结论所言:“酒吧是两党

地区组织的关键环节。在暗室之后,大佬们聚会商议并决定在本地区选举的计划;吧台之前,领班们努力建立顾客的信任。”<sup>[3]</sup>

正如我另文所述<sup>[4]</sup>,这些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们的政治动员活动与工会以及工人阶级赖以谋生的工作毫不相关。酒馆政治的明显内容不是阶级关系,而是种族和地域情结。它关注栖息在特定居住区内的公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

相反,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旅馆,则是一个反映并宣扬阶级关系遍及一切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工作场所关系)的价值与组织的网络的一部分。对中产阶级而言,这些旅馆与美国的酒吧一样,都是选举时期重要的选民动员基地;但对不能投票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旅馆中的会议室则是从事各种反政府活动(这其中包括最有名的工会团体和宪章运动的组织)的避难所。

英格兰的旅馆与美国的酒吧中的工人阶级活动在政治内容上的差异预示着一种普遍的模式,而该模式在大多数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中被忽视。这些研究结论中的大多数都隐藏着一种将英国与欧洲大陆相对照的视角,该视角质疑那些认为工人的集体表达与行动(尤其是在宪章运动消亡之后)都十分谨慎,只求改良的观点。相反,工人阶级的性情、组织与行为等阶级特征,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作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关于 19 世纪初阶级之出现的重要分析中,一开始便提醒我们“社会‘阶级’的概念及其相关话语是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转变的结果”,他还强调:“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术语之改变,反映出一个基本的变化:不单男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变了,社会本身也变了。”<sup>[5]</sup>

与美国情况的相互比较表明,就算是上面那个如此平淡无奇的解释也值得怀疑,它混淆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和英格兰一样,美国



工人借助渐进主义的宪政框架避开了阶级斗争。不过,在美国,一种割裂的意识正分裂着工人阶级:他们在工作场所中是一名劳动者,在其生活的社区中又是属于某一种族的成员或某一地区的居民。相反,在英格兰却没有类似的分裂意识,社会对阶级的认识也没有局限于工作场所和劳工身份;“阶级”不但没有分隔,反而是连接了工作与“非工作”领域。斯特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就曾指出,英格兰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之处就是,“工业需要与政治需求二者更为紧密的关联……我们很难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需求与政治诉求区别开来,因为工人阶级的领袖自己也甚少这样做。根据纺纱工人的领袖多赫尔蒂(Doherty)所言,普选权‘不过是让每个男人用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免被侵吞的一种权利,除此之外啥也不是’”。<sup>[6]</sup>类似的话语在美国很难听到,而对选举权的讨论也提示着我们该怎样去探索其中的原因。

工人群体所钟爱的小酒馆中的各种政治集会在话语和组织内容上的差异所形成的这个小世界,折射出阶级见解和阶级行动在程度与特征上的差异;这后一种差异道出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史的主流传统,是如何通过假定应该解释什么而削弱我们的理解的,这种削弱进而导致我们对英国与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之形成的比较研究出现偏差。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一(主流)视角简单地将英格兰模式作为阶级形成的范例:作为史上第一个出现并自我建构的工人阶级,它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不可避免的逻辑。这样一来,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分析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模仿,马克思将英格兰视作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的先驱。

不无讽刺的是,有关美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研究,也不幸追随着同一路径。美国很多的激进派社会历史学家(他们更应当被视为比尔德学派(Charles Beard)的新进步论者而非新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找

回并重构工人阶级被忽略的过去。他们所做大量的、颇具启发性的研究,也常常肯定英国的“塑造论”<sup>①</sup>。重要的问题不是阶级到底是在美国、英格兰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首先产生的,而是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

对于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的差异这一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完成这一释疑的任务呢?我将引用欧文·豪(Irving Howe)的如下警句作为起点:“工人阶级是一个现实,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概念而已。”<sup>[7]</sup>探讨阶级形成问题的方法,若过于结构化或过分强调目的论,就断然无法处理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若究其原因,则恰在于这些方法过分地强调从理论中构建出来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并进一步从该“阶级”的利益动机出发,推测这一阶段必然以特定的方式在历史长河中现身和采取行动。<sup>[8]</sup>但我们应把分析之赌注投在哪一些具体的历史因素之上?本文采取以国家为中心的解释。我会简要地考察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劳工贵族论”(labor aristocracy),并指出这种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解释往往会导致无根据的以目的为导向的假设,该解释过于强调工作场所而低估了地域分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它考虑到工作与居所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接下来我要指出,即使我们强调工业化对城市空间重组的影响,重视工人阶级在居住社区中的活动,以及认识到某些理论家视为“自然而然”的现象实际是一种权变的结果,并且将所有这些因素都作为前述论说之不足的补救,也仍然无法解释我们在社区与酒馆政治中所看到的差异。在关键方面,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和城市化对工人阶级居住区所造成的影响上,英美两国的确很相像。我将尝试证明,能够最好地解释英美工人阶级形成模式之差异的,是两国的国家组织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sup>①</sup> “making teleology”,是指英国学界对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过分强调形成的“有意识的建构”这样一种目的论,所以这里译为“塑造论”。——译注

简而言之,本文要讲述的是,对于在语言、立场以及组织中所表达出的阶级这一概念,国家及其政策是怎样塑造并传播对这一概念的解释的。问题在于,国家权威机构所创造的政治环境是如何设定了相关话语和制度形式,这些话语和制度形式最终被工人们用来塑造并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在工业化早期,工人们的这种诉求不仅针对其雇主,还针对国家政权本身。在解释英美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案例时,我会突出两国在利益代表与压制模式上的差异的重要性,而不那么强调它们的共同之处(触角广泛的官僚机构、宪政的延续性,以及法律的重要地位),这些共同点往往被过于笼统地概括在“弱国家”这一宏观比较大标题之下。我认为,若不注意两国在组织和公共政策上的差别,将难以理解二者在阶级形成中的重大差异。与美国相比,英国的工人阶级发展过程在关键特征上有所不同,本文的核心就是要分析为何以及如何使国家导致了这种重大差异。

### 社会中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的解释

如果人们预期工人阶级会以某种好战的或革命的方式“自然”发展,但结果却不是这样,历史学者肯定有兴趣做出辩解。<sup>[9]</sup>大部分关于英格兰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均以工人阶级的温和性作为解释对象,因此它们通常试图解释为何革命阶级的反事实没有出现。尽管我本人既没有此类困惑,又不采用此种研究路径,但有三个原因驱使我从这里下笔:首先这是目前的主流研究方法;其次对它的关注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重要的分析基础;最后这一研究传统下的某些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重构一个更为恰当的分析对象(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与它们不同的话)。

最常用的“辩解”方法是“劳工贵族论”,这当中包括其原型及其



微妙的变种。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标准,譬如薪金水平、工作稳定性、工会会籍、消费方式与文化,以及对特定标准和价值观的效忠等,学者们企图找出分裂工人阶级的断层所在。这种研究的结论是政治性的。正如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所观察的:“马克思有关‘劳工贵族’的理论的一个本质要点就是,假定工人阶级中存在这样一小部分人,他们在政治上非常保守,并且把其保守思想强加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当中,从而掩盖了但绝非消灭了劳动群众的战斗性。”<sup>[10]</sup>

这种方法在经验上和理论分析上都存在着大量的本质性缺陷。“劳工贵族”一词缺乏严谨性。它的意义在不同文献中会有所不同。许多就特定产业部门中手工艺工人(craft)与体力工人(manual worker)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微观研究就反映出,要寻找到劳工贵族与广大劳工群众相对抗的具体的工作场合十分困难。与理论预期相反,经验证据(特别是 19 世纪末期的历史)表明,一般是“经济情况较好的工人在政治上更为好斗和激进,较底层的工人反而表现得较为冷漠或保守”。<sup>[11]</sup>假如工会领导层的关注点确实较为狭猛,例如只强调争取即时性的报酬、工作条件或公共政策上的好处,而不关心根本性的社会转型,那么这些领袖们的其他的策略选项到底是什么?

劳工贵族的研究路径引起对英国与欧洲大陆而非美国的比较。这样的取向突出了某些问题,又同时模糊了另一些——尤其是本文所特别关注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暂时摆在一旁,我们可以发现,将欧洲大陆作为英国个案的陪衬,实是出于对英吉利海峡对岸之实际情况的完全错误的理解。改良主义并不纯粹是英国的问题。在工人阶级挑战现存秩序的局限性问题上,西欧和北美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明显相似。隐含于许多研究中的有关英国工人阶级与欧洲大陆的对比,往往基于一个完全误导性的模型,该模型认为欧洲的工人阶级行动具有持续、英雄主义、倾向革命的特征。<sup>[12]</sup>



或许“劳工贵族论”存在的一个更本质的问题[穆尔豪斯(H. F. Moorhouse)在其一篇重要批判中所强调的一点]在于它一开始就假定了工人阶级中某一部分的重要性;而如果不对工人阶级文化整体进行考察,是无法做出假设中的这种判断的。一种侧重劳工中某一特权阶层的解释,至多是对各种特定环境下工人阶级形成模式之差异的原因进行历史分析的结果,而绝不能是强加于历史分析之上的那种关于吸纳和背叛的模型的自然推论。<sup>[13]</sup>

以上对“劳工贵族论”,以及延伸到对一切有关为何工人阶级没有按实在论(essentialist)阶级模型所预测的模式行动这一问题之解答的解读和批判,为我们开始另一种探索铺平了道路。它引导我们离开将英国与欧洲大陆进行对比中出现的有关渐进主义的困惑(gradualist problématique),通过对比美国经历,转而聚焦于解释英国的整体性或全球性阶级觉悟的出现。它要求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并非工人阶级中的某一部分,而要注意广义的工人群体中的话语和活动;它同时要求我们摒弃那种认为存在一种最有可能的工人阶级发展路径的想法。取而代之,我们应求助于历史及其差异性;就算我们明白有关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每一个案例都同属一个有着共同特征的案例群,我们也需要首先弄清楚:这一历史到底是什么,其中的特征又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汤普森街圣巴纳德酒馆和伯明翰的皇冠与锚旅店找寻一些前进的指引。这些酒馆都突出地体现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许多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与我们所确认过的英美工人阶级在形成模式上的差异直接相关。这些场所均坐落在以住宅为主的小区当中。当地人多在家居以外的地方工作;而他们所居住的小区都是按阶级划分的。和地方消防局、帮派、殡仪馆与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一样,酒吧是各种新型工人阶级居住区网络中的一部分。在前工业化时代,人们都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环境中劳作,各种社

会阶级交相混杂；与此不同，新的城市空间把工作场所与家庭住所分开，也把不同阶级分隔开来。

当我们认识到，将英美两国工人阶级的早期发展区别开来的因素，主要是居住地点而非工作场所的文化和活动模式时，这种空间重组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为了应对所面临的令人困惑的环境，两国的工人都创造了相应的工具。然而，尽管两个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几乎一模一样，但其口号和制度内容却大相径庭。在对阶级之意义的认知方面，美国的割裂式意识模式与英国那种更为强调整体论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核心而言，就是对工人阶级社区的意义和作用及其与工作场所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联两个方面的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在我们尝试解释这种差异之前，需要进一步了解早期工业城市中的空间重组现象。

但首先，我要补充一点。通过将工人阶级视作一个整体，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在其十分重要的《工作、社会与政治：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格兰的工厂文化》(*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sup>[14]</sup>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个与“劳工贵族论”所提的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工人阶级渐进观截然不同的、很有逻辑性的观点。但他的分析与本文也完全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探讨的主要问题与我有异，更因为他还明确地否定了我认为极其重要的空间因素。只要对乔伊斯的著作做一简单回顾，我就能澄清我的观点，并提出我所知道的对该书最有说服力的批判。

乔伊斯留意的是兰开夏郡(Lancashire)和约克郡西区(the West Riding)的工厂，而不是居住区。乔伊斯以斯特德曼·琼斯最初提出的理论为基础，把工人区分为受资本家正式控制的工匠(即熟练技术工)和在工作程序中“真正”受到实质性控制的工厂劳工两大类，他试图证明产业工厂制度的稳固性如何为劳工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现实

(认知),以及工人们的工作经验又是怎样塑造了他们在工作以外的组织形式和思维方式。他认为,工厂所培育起来的服从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现实中的方方面面。

乔伊斯承认工厂与居住区已经彼此分隔,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工厂及其社会关系还是占据着居住区工人的核心认知地位,而工人阶级居住区域中的阶级隔离制度,则嵌套于一个更庞大的、等级森严的服从体系当中。根据这种观点,工人阶级亚文化只不过是制造业主所管辖的各个阶级之间复杂的(人际)交换<sup>①</sup>网络中的一个方面而已;而制造业主们不单控制着政治,还主导着本镇的文化想象,他们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影响则源自根深蒂固的、以工厂为基础的霸权。乔伊斯还坚信,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更加深入,工厂生活模式会进一步渗透到生活的其他范畴;而反过来,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越不发达,工厂中的父权文化的控制力量就越弱。

在推进其主张的过程中,乔伊斯不仅反对认为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的日益分离,会使得一种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政治生活成为可能的观点(这也是我的立场,我后面还会回到这一现象),在结束时他还反驳了“劳工贵族论”的核心论据(他的这种做法却是重塑了“劳工贵族论”的肉身)。他写道:“与其说劳工贵族是‘温和派’,不如说他们是这一时期激进政治的前锋……劳工政治……主要被工厂文化环境之外的人们以及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工匠和技术工人群体所关注。如果说这些人就是劳工贵族,那他们的政治遗产就是其独立性,而非改良主义式的‘合谋’。”<sup>[15]</sup>

在颠覆“劳工贵族论”的过程当中,乔伊斯却接受了该流派夸大工作场所中的手工艺工人与工厂工人之差异的倾向[威廉·休厄尔

<sup>①</sup> exchanges,按照社会学的概念翻译为“交换”,实际上包含人际间的情感、权力、物质等多种资源的互换与交流,而不仅仅是物质交易。——译注

(William Sewell)在描述法国的情况时,指出工厂的转型可能在事实上为手工艺工人提出了新的定义和外延],但他无法解释恰好不属于这两大类别的工人(譬如工程行业中的劳工)的大量存在。<sup>[16]</sup>再者,虽然定义中的“贵族”充当了 19 世纪的工会和政党政治的领袖,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激进的”而非“渐进的”,也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他们是一个没有群众和工厂基础的精英群体。对工会而言,这说法显得很可笑;而就选举过程来说,该问题一定还说不清楚,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大多数工厂工人还没有选举权。

从我将要阐述的立场来看,乔伊斯对“劳工贵族论”的模仿式处理并非意义不大。至少它指出试图在三种划分工人阶级成分的标准中做出清楚而干脆的区分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徒劳的,这里所说的三种划分标准是:(a)在工作中享有相对特权(不管是由于薪金或劳动过程的性质)的工人;(b)在不仅因为阶级之别,而且因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而相互隔离的居住区中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工人;(c)在工会、压力集团和政党中担任政治领袖的工人。一切试图把这三种划分标准打散融合成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分歧的一种标准的做法,都会遮挡有关上述三类行动者(它们之间也有重叠)各自内部的关系这样一些非常有趣的历史性问题。我认为,这三种划分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提问为什么,且在什么情况下,政治领袖会用相同的话语在工作当中向雇主、在工作之外向国家提出诉求(英格兰案例就表现得很明显),以及什么时候他们会在这两种场合中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提出他们的诉求(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 城市空间的转变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乔伊斯对重视工作与居住区之空间隔离现



象这种观点的挑战？他花了不少力气来抨击这种隔离性的重要意义。他写道，从19世纪中期一直到末期，工厂城镇“所保留的乡村味道多于它所获取的城市痕迹。被称为‘步行的城市’的工厂城镇，像细胞繁殖般成长；通过吸纳工厂的居民区，城镇逐渐地扩张”。在世纪之交出现轨道交通与自行车之前，他继续写道：“家居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一直非常牢固，直到这些发明把它割断为止。”<sup>[17]</sup>

假如乔伊斯是正确的，那么对英格兰阶级观所具有的单一而非分裂的性质做出以国家为中心的解释就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可以认为，美英两国的阶级形成之别，只不过是空间关系在客观组织上的不同模式的反映。这样，南北战争前的城市区间上的改变便可以解释美国工人阶级的分裂的意识，这一话题我曾经在别的地方分析过。<sup>[18]</sup>相反，更为单一的英国模式，则似乎可以用工作场所和居住空间之间更为紧密的结合来进行解释。

但这种推理无法继续，因为乔伊斯是错误的。19世纪中叶，就在大中型工业化城市和城镇中存在着大规模的空间重组。最剧烈的变化就出现在最大的城市当中；事实上，我们也不禁怀疑，排除了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兰开夏最重要的工人阶级聚集中心）的研究难道不会让乔伊斯对工作中与工作外的关系之理解出现偏差？即使在较小的城市[我们稍后会看兰开夏的工厂城镇乔利（Chorley）的案例]，人们也不能对有关空间之改变的重要性视而不见。

英国社会大规模的城市化是19世纪中最惊人的特征之一。在1801年至1851年期间，十大城市的人口没有一个增长低于一倍的（相比之下，同时期法国人口翻番的大城市只有一个）。在这令人惊讶的增长之中，利兹和伯明翰的人口三倍于之前之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更是四倍之多。到1851年，十大城市的人口均已超过10万，其中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更已超过30万。到世纪中期，利物浦中上阶层

中“凡是有钱的都已搬离原来的工作地区或商业场所,有的甚至搬到了邻近的城镇上”。他们所居住的新城郊地带,与劳动者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相隔离。在城市的心脏地带,明显可见“属于不同经济与社会独特地带”。劳顿(Lawton)把利物浦划分成八个城区,以此清楚地向我们证明,整个利物浦是如何已经按照不同阶级划分成了彼此相隔的空间地带。<sup>[19]</sup>其他研究也已详细证实,在 19 世纪初期的利物浦,绝大部分住宅区都是为阶级隔离式居住社区中的新兴工人阶级而建造的。到了世纪中期,无论是对利物浦还是其他工业城镇的大部分居民来说,栖身工棚(workshop houses)的日子已然是明日黄花。<sup>[20]</sup>

乔伊斯可能认为大型城市的模式并非典型,但新近的细致研究却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譬如,沃内斯(A. M. Warnes)就对 1780 年到 1850 年间兰开夏的乔利镇进行了研究。他采用萨姆·巴斯·沃纳(Sam Bass Warner)的费城研究的风格,分别对该镇在 1780 年、1816 年和 1850 年的情况拍了三张“快照”。<sup>[21]</sup>该镇在 1780 年前还是一个农业小镇,是其所处乡村地带中的交易市场和商贸区。由于纺纱机械化刺激纺织贸易的发展,其增长在 1780 年左右加速。纵然如此,此时该镇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前工业化时代的模式:“那里没有大型的用人单位;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工作场所中或者住在其附近。”<sup>[22]</sup>

而在 1780 年至 1816 年间,该市的人口增加了 50%,总数达到 6000 人;这一增长主要是因早期小型纺织厂用工所致。在这个时候,工厂以及围绕工厂的成片的居民房成为此镇的地面风貌。不过,这个时期纺织工业的快速增长更多的是因为现有手工作坊(workshop)的扩张而不是工厂模式(factory)对车间模式的取代;而且,“工人的居住地点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做工的地点,同时通常与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异无关”。<sup>[23]</sup>

尽管如此,1816 年该镇的社会地理环境还是远比 18 世纪 80 年

代复杂。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分化模式,这主要体现为:一个更稳定的商业中心、远郊地区更加快速的增长,以及位置分散但可资区分的定居带(这些居民区都与包括印花布业和棉纺厂在内的特定的新行业密切相关)。

1850年,该镇经过了剧烈的转变。自1816年后,乔利镇已成为一个工厂城镇。和乔伊斯一样,沃内斯也很重视这种转型;他指出,曾几何时占人口多数的手摇织布工如今已减少到不足劳动人口的10%。利用1851年普查的数据,他估计“经济活跃的人口中有超过一半都与纺织工业各部门相关,这使得部分人必须要往来上班”。而且他发现,不但家庭用工(指家庭作坊式手工业)急剧衰减,甚至“到1851年,家居与工作地点的邻近关系也被打破,起码对劳动人口中的某部分人来讲确是如此”,从而“一幅可察觉的社会隔离模式开始展露”。<sup>[24]</sup>

注意,我们此时不应夸大这幅图画的现代性。只有极少数工人(约4%)住在工作地点一英里以外的地方,而沃内斯所调查的1813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其住所距工作地点不超过1/4英里。每三个不在工作处居住的工人中就有两个,即大多数只需要经过很短的距离就可上班。“但无可置疑的是,自1816年以来前往工作地点的平均路程已经明显增加,这不单因为有更多的工人搬到工作场所之外居住,更由于人们就业的途径日益增多。”沃内斯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建筑年代越新的工厂,其工人的居住地越远。<sup>[25]</sup>

沃内斯也提出一种假设认为(与乔伊斯对约束型忠诚的强调刚好相反),工作场所的多样化,有可能会减低工人对特定工厂或雇主的忠诚,并导致同一家庭在不同工厂中就业的多元化情况(a diversification of family employment in different factories)。这些改变很可能令家庭成员上班的平均距离增加。与此同时,居住区之间以行业为基础

的分化,渐次被另一种趋势所代替:“收入、教育程度和其他地位特征相近的人,开始集中居住到城镇的某些固定地带。”<sup>[26]</sup>但吊诡的是,只有某些特定行业(纺纱、印刷和漂染)才出现这种工作场所与居住地区相分离的情况。

乔伊斯在分析过居住社区后做出了一个审慎的结论。我们常常认为,20 世纪城镇的非人格化和阶级隔离模式与 19 世纪的情况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我们却忘记了这两个世纪的城镇结构有着怎样的差异。为慎重起见,我们的确需要牢记这一教训;但这一问题与本文目前所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大。在对产业革命的更为宏观的研究中,休厄尔敏锐地观察到:“现在看来属于一个悠长而缓慢的发展时代的充满迟疑的发端事件,似乎正是通往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屈指可数的几个蒸汽机、鼓风炉(blast furnace)以及纺纱厂竟然令从没见过这些机器的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对他们来讲,现代工业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突出标志;他们所身处的是前所未有的工业社会。”<sup>[27]</sup>

工业化的伴随物——空间变化——也是这样。对 19 世纪的人们来说,让他们最不感冒的要数 19 世纪与 20 世纪城市之间的差异度;深深镌刻于他们的生活与意识之中的是崭新的都市形式,它把大部分人而不仅仅是富人的工作与非工作场合分隔开来。在一些市镇,工作与居住的地方可能只相隔一段很短的步行距离,但两地仍是分开的;而且,除了雇主提供住房的情况之外(根据最准确的估计,即使在单一工厂的城镇里,只有极少数工人阶级住房属于这类),工人们都在远离工作所在地的社区集群居住,与其他阶级,以及其他有着不同阶级属性(韦伯型)的工人分隔开来。

空间的革命带来权威关系和地方组织形态的根本性转变。除了在公司城(company town)里的工厂老板可完全支配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外,资本家的角色只限于工作场所,而在没有工头监督的社区里,工



人们能够自由生活。这新出现的自由以劳动力市场与住房市场的这一新出现的市场分工为基础。在工作与居住相结合的手工作坊结构里,两者同节奏地发展。但当这一联系被切开之后,工人阶级社区日益受到房地产投机和建筑商与房东之策略的左右。社区之间开始按收入和生活方式形成级别;而社区本身也成为所有阶层人士企图影响和控制的有意识的环境。<sup>[28]</sup>

在新的环境里,工人阶级群众创造了新的制度、新的关系与新的生活模式。由于学界对“劳工贵族论”的假设这类解释捷径的喜好,以上情况与有关政治和阶级形成的更宏大的模式之间的偶然性联系(*contingent connection*),长期以来都为人们所忽视。

然而,有关阶级形成的研究路径中的这些忽略空间重要性原则的应用研究中,有一例值得我们重视,它在如何提出分析问题以及设计解决问题的路径方面给予我们重要的提示。这便是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的《阶级斗争与工业革命》(*Class Struggl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up>[29]</sup>,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我认为是最僵化的)列宁主义版本的“劳工贵族论”。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在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讨论中注入了社会空间的概念。福斯特在对奥德海姆镇(Oldham)的研究中就跨阶级的联盟、人口与生产模式,以及特定的劳工贵族阶层的形成过程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假说。其中的大部分我都不打算讨论,但这里想突出一点:福斯特对早期工业城镇中的空间转变所给予人们的启示具有罕见的敏感性,他还试图把空间纳入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

奥德海姆纺织业的转变不单牵涉生产组织与技术的变化。当生产在跨阶级的家庭中进行时,几乎无所谓工作内外之别,其社会秩序就是基于面对面的父权关系和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直接监督之上的家长式阶级与权威模式。这一模式的物质追求和道德主张,都随着工

业化进程对家庭作坊式生产模式的摧毁而烟消云散。

福斯特的研究表明,在 19 世纪前半叶,奥德海姆住在工作地的工人已经越来越少。当小镇的各个地区越来越多地被设计成或工作区或居住区时,工人阶级的成员渐渐远离雇主及其监督而生活。通过设计居住地的社会与文化组织,工人们开始独立于雇主的家长式要求之外。而这些组织,扎根于相对自由的工人阶级居住社区之中,为帮助该阶级及其团体塑造相对独立的性情与集体行动提供了潜在的基础。<sup>[30]</sup>

虽然福斯特不仅继承了劳工贵族论中颇有问题的一些要点,甚至还对此做出了贡献,但他将空间、阶级和政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思路却很是可圈可点,该思路为工人阶级街坊组织这一视角在工人阶级生活状态这一更宏观的分析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提供了条件。

出于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这一传统历史学问题的关注,对于这些社会与文化组织,福斯特很强调其中的偶然性方面,他试图去发现它们是发展成有能力团结工人阶级(尽管工人内部也会有分歧)对抗资产阶级和国家的自主性机构,还是让工人阶级中的“贵族”和其余部分分化成不同的团体。

但福斯特也还是遗留了一些相关问题,这是另一些具有偶然性的因素,它们关乎工人们是否或在什么情况下会利用居住社区里的自主性组织、借助阶级的语言,不但对雇主甚至对国家提出要求。换言之,劳工与工作场所中的政治,和与之相分隔的、逐渐浮现的小区政治之间有什么关联?<sup>[31]</sup>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当中,美国和英国在 19 世纪的城市—空间历史方面是最为相似的。<sup>[32]</sup>在一系列为社区生活提供诸多基础设施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组织方面,两国也很相像。<sup>[33]</sup>两地的工人都经历过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的分离,他们都在新的居住空间和社区组

织中发展出对这一经历进行解释并采取行动的方式。正是由于在家庭作坊时代之后的工厂中雇主仍然可以施行相对较严的控制(这是乔伊斯很强调的一点),居住社区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它使得工人能够部分自由地创造出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让我们再回到这些地方组织中来。研究美国街区与政党生活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为地区政党机器的政治行为与地方社交活动相结合的现象所吸引。同样地,英国的男性工人俱乐部、互助会(friendly association)与酒馆也都具有消遣和工具性聚会(典型的是宪章运动的集会)的双重功能。例如,罗利(Rowley)就曾写道,“在为纪念汤姆·潘恩(Tom Paine)诞辰举行的年度餐会上,气氛因激进的歌曲、祝酒词和诗歌吟诵而活跃起来”。但在商业聚会中更常见的则是大量饮酒。<sup>[34]</sup>这类活动在美国强化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分裂,而在英国,它们却更有助于促进普遍的阶级意识的形成。

在美国,工会从早期开始就在工作场所或其附近发展聚会点;但与此截然不同是,英国的工会组织(很多是秘密的和非法的)经常在工人阶级社区里,特别是在酒吧中会面。解决工业纠纷的组织以酒吧为基地,酒吧老板也常兼任罢工协调人或工会的司库。很多工会与特定的酒馆站在同一阵线,与宪章运动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酒馆[比如诺丁汉的七星(Seven Stars)、马背上的乔治国王(the King of George on Horseback)等,其老板都担任当地宪章运动组织的司库],<sup>[35]</sup>同时也是有名的工业和政治活动家们的聚会点。

互助会(friendly societies)——英格兰工人最主要的自助性社会组织——也选择在啤酒屋中聚会。这些互助团体的地方性特别强,它们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工会组织,以此来保护其经费和成员不受法律责难。<sup>[36]</sup>屈居在居住社区中的这类工人阶级组织所创造出的“工会意识”,明显地不同于当时在美国盛行的“工会意识”。在美国,自工会

历史发迹,工会就与工人阶级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其他机构及场所毫无瓜葛。

站在美国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可否把佩林所确立的宏大的文化模式解释为一种政治的与社会的“保守主义”的结合,“然而它还与一种深刻的阶级意识及一种常见明显的不平感相关联”。<sup>[37]</sup>这种融合政治的慎重考虑(这一点被大多数历史评论家所强调)与在生活各方面都感受到的强烈而不容置疑的阶级割裂性[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用“高度阶级性”(high classness)来形容这一处境]<sup>[38]</sup>的奇特混合,与美国模式中的第二项而非第一项特征有很大差异。很明显,英国模式是历史的偶然产物。但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解答此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探究为何英国(而非美国)的工会和政治煽动均被排挤到了居住社区里面。在这种与工作场所相分离的社区里,英国的工人们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他们在此创建了自己的自愿组织,并且学会了用阶级的话语和表述风格向雇主与国家提出诉求。

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发展呢?显然,从工业城市、空间,以及组织模式来看,英国工人与美国同行的处境相似,因此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两国工人阶级在形成历史上的差异。同样,以社会和经济为中心的解釋模式对这一差异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些理论都更为倚重两个社会的共同点而非相异处。在本文余下的篇幅里,我将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两国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与公共政策上的重要区别,是前述历史性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必须补充一句,我将要提出的这一主张只是临时性的,用查尔斯·梯利的话来说,它“可能比初步假设(working hypothesis)更可靠,但在那些历经长时段钻研、坚定不移地考察全球情况的研究来说,我这篇小文章必然是小巫见大巫了”。<sup>[39]</sup>



## 国家结构与国家政策

要将国家作为英美两国阶级形成模式之差异的主要根源时,首先要面对有关国家的宏观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的挑战:即有关研究都倾向于将此两国一同置于盎格鲁—美利坚式“弱国家”这一标签之下。内特尔在其开创性著作中认为,“国家性质”作为一个变量能更好地帮助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观察,因为英美两国都可以排除在“必须以武力推翻的国家清单之外,因为(这两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国家机器可供推翻”。这两国的国家机器都不是“随时可辨的自主行动的平台”;而且,在两国,真正具有很大自主性地位的是法律,而不是国家及其衍生物。<sup>[40]</sup>

从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到更近时期的各种研究(譬如亨廷顿对都铎政体之扩散的著名分析)<sup>[41]</sup>,大多数关于美国“弱”国家的分析,都出于明显的历史性原因而把英国经验视作美国实践的根源。在这一极具说服力的分析脉络中,英格兰被视为现代欧洲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反常案例。1688年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尽管从欧洲大陆的角度来看也算激烈,但它在对抗绝对主义独裁的同时却认可了国会的传统特权。在这里,主权不是被定义为一国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总和(a conflation of the civil and the civic with the state),而是被具体化为代议制,进而最终是以选举机器将国家与社会连结起来的政党体系。

尽管英国的主权明确地体现在一个单一的代表主体中,这反映出与美国的联邦制度大异其趣的集权模式,但英国的主权刨根问底也还是在“人民”手中,因此英美两国的国家形式都与欧洲大陆构成鲜明对比。与普鲁士和法兰西不同,这两国都没有对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国

家垄断。再者,出于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解释的原因,“综观英格兰前期发展的历史,她依赖于海军而非陆军,依赖于不领薪的太平绅士(justices of the peace)<sup>①</sup>而非皇家官员,这都令英格兰中央政府手中的镇压机器相比大陆的强势君主而言要弱小得多”。<sup>[42]</sup>当然,还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就已分享和继承了不列颠国家的特点,在这里,皇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相比之下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于公民社会的自主实体。<sup>[43]</sup>

尽管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大陆激进的工人阶级与其强国家有关。类似地,英美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则与其弱国家特性有关;但若将英美两个弱国家与欧洲大陆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权相比较,其结果并非不辩自明。一再坚持这样的主张,只会愈发地扭曲历史事实而贻笑大方。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对参与革命或支持革命行动一事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倾向;同样,英国工人阶级也经历过暴力冲突[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1832年的情况,跟发生彼得卢(Peterloo)屠杀的1819年相似,“革命变得有可能”,因为“政府已被孤立,而统治阶层中存有严重分歧”]<sup>[44]</sup>,美国工人亦曾冒着极大的风险和代价在工作场所英勇地挑战资本家。

如果说,我们很难从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强”或“弱”性质的评估中推论出该国工人阶级对其政权的态度是革命抑或改良之倾向,那么,对于作为一种观念和行为类型的阶级,到底是将工作和居住社区两个范畴联系到一起还是仅仅局限于工作范畴这一问题,我们就更难做出类似的因果性判断了。

据我所知,肯尼思·戴森(Kenneth Dyson)就曾按照上述分析路径研究过英国案例,但只要将其分析与美国情况进行对比,就能发现

① 对这一阶层的解释,参见本书第五章译注2。——译注

其中的缺陷。按照他的观点,英国的弱国家“帮助固定了其工业与政治系统中两极对立的局面……从而,这一相对‘放纵式’资本主义的经历,不单带来了坏名声,也创造出一种强大但孤立的工人阶级文化,并削弱了工人们在工业与政治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英国于是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阶级结构:由人我之见发展出的固执己见及对他人不信任的态度,不是针对国家,而是针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特权及排他性表现”。<sup>[45]</sup>但我们将看到,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若硬要说英格兰工人阶级的情感倾向与结构绝对没有对抗国家之念头,却又是误导人的。再者,美国的经验看起来也好像与上述论述不符,因为美国以阶级为基础的“我们”—“他们”之区别,也主要限于工作场所的劳资纠纷。

但表象有可能是虚假的。特别当我们调查英国与美国这两个“弱国家”的具体的组织形式;或当我们检视两国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初期所拥有的不同的政治权利束(*clusters of political rights*);假如我们看看其他的公共政策组合;再假如,我们挖掘这些区别对居住社区内的工人阶级组织内容的影响,我们便能对某国的国家及其行为的特征,与工人阶级形成模式上的差异二者之间的联系,做出更具说服力的判断。

19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当然是选举权。在这方面,美英两国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到19世纪3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美国成年男子都可以投票;但在英格兰,成年男子的投票权比例,在1832年改革之后是五分之一,1867年之后是三分之一,到1885年之后还只有五分之三。这一差异对我们的问题有多重要呢?

选举权的产生及其扩大历程,一直是有关西方工人阶级之形成与民众基础之扩张(*civic incorporation*)研究中的常见题材。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在发展马歇尔(*T. H. Marshall*)的学说时

提出,西方国家的公民投票权的扩大历程体现出一种共同的次序,这可以解释为何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均表现出政治上的渐进主义倾向。相比之下,穆尔豪斯对英国(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学界的标准分析对象)的分析,却没有用选举权带来的民众基础的扩大,反而选用工人长时期的被排斥状态来进行解释。然而,这一争论中看似不同的两大主角,反映的却是同一硬币的两面,<sup>[46]</sup>因为争论双方都承认,以下这一点无可置疑:即选举权的扩大及其发生的时机,对工人阶级以特定方式采取行动之倾向构成重要的影响。他们只是对如何影响的过程有不同意见而已。但同样,与美国相对比又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选举权的历史提醒我们,并非只有或必须有一个将公民权普及到每个个体的漫长过程,才会出现(工人阶级的)渐进主义这一结果。

这些对选举权和阶级的熟悉的研究,令人惊讶地回避了有关阶级形成的问题,而该问题正是我们所关注的英美比较中的困惑之核心所在。选举权的扩大在美国迅速而几乎没有任何冲突,在英格兰则漫长而麻烦不断。这一历程之不同,正是解释大西洋东岸发展出普遍的阶级意识而西岸却形成割裂的阶级意识这一差异的关键。

然而,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对阶级形成的影响却并非一目了然。要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还需要将选举权与两国在国家组织结构上的另一种关键性区别结合起来考虑,这一区别就是:联邦制相对于单一制的区别。

刚才提到,最先在当代政治社会学的比较史研究中引入“弱国家”和“强国家”概念的内特尔,也强调美英两国同样拥有相对松散的国家组织,但他却没有深究两个国家在组织形式上的分别。美国那松散的联邦组织结构省却了选举权扩大中的大部分问题,因为这里没有需要捍卫或进行转变的单一的国家机器。一旦清除了实施普选的限制(与其他民主化改革——如增加公职数目、选举频率及其规范性——



同步),美国便拥有了全世界第一例参与型联邦制的政治体制。

在国家组织与民主政治权利的框架内,以群众为基础的新型政党得以创建。这些政治组织,触角伸及全国每一个选区或街道,将美国工人阶级中因空间、种族、宗教及政治认同之分殊而形成的各种亚群体集合到一起。这些组织行为与社会(身份)定性都发生在工人及其家庭居住之处。它创造了政治系统和投票公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公民往往因其不同身份认同被政治化地组织起来,而很少因其阶级属性被组织。此模式还创造了一种制度化的参与结构,该结构与工人为向雇主争取权利而创建的组织截然不同。

美国的参与式联邦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以地区性的紧密团结为基础的投票系统;它同时还是一套进行治理、征税及提供服务的体系。南北战争之前,在工人聚居的城市里,市政服务是地区分肥政治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职业化的警察队伍,设立了专门的城市救济部门,兴建了大规模公立学校系统,还有大量经公众授意的建设工程。政党非常留意这些市政服务与本地各社区之间的关系。地方政治因此变成彼此隔离的、分配式的社区政治。在这种政治形式之下,工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份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特定地区的居民或特定(非阶级性)群体的成员。虽然当时在全国和各州层面的政治议程表上,也有很多与阶级有关的经济问题,诸如改善民生、关税、银行业管制以及奴隶制等,但多数工人所参与的投票过程与这些问题毫不相干,因为这些投票的主题都集中于别的议题。

在上述所提的各个方面,英格兰的国家与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都与美国截然不同。在单一制(非联邦的)国家结构之下,一系列法案[1834年的《济贫法》(the Poor Law),1848年、1866年、1872年和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1839年与1856年的《警察法》,以及1860年与1872年的《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实施最终把分配性公共政策

都集中到中央政府层面。不管主要是由于信奉人道主义和边沁主义<sup>①</sup>的公务员及国会议员的诸多提案,还是因为缓和对工业资本主义的阶级仇视的努力(这两点成为历史学家激烈争议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sup>[47]</sup>,中央政府的扩张的确是异常惊人。1797 年,中央政府所雇用的 1.6 万人中,大多数任职于海关、国内货物税务和邮局。到 1869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10.8 万人,显示出国家行政部门已然承担了新的职能。就整个 19 世纪来说,公共开支实际增长了 15 倍之多。<sup>[48]</sup>

如果说政治分肥制与私有财产权是 19 世纪以前的公务人员的两大标志,那么到世纪中期,“为维护最主要的基石——私有财产权”,分肥制不得不做出牺牲。<sup>[49]</sup>而作为 1830 年至 1870 年标识性进程的中央政府行政管理的职业化,则进一步将全社会各阶级人员的注意力聚焦到位于伦敦的中央国家机器之上。随着国会与白厅(Whitehall,即英国行政部门)在社会政策和规范工作条件等方面承担起新的责任,随着这些机构为更加合理地实施各种规制政策并提供服务而重新整理其业务(流程),两大部门有力地介入到工人阶级的生活之中(既包括工作范畴,更包括居住社区领域)并得以施加影响。每一项新颁布的国会法案、每一轮行政扩张与改革,都更进一步地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及其行动上来。

从一个工人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他/她面对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弱国家”。哈罗德·帕金(Harold Perkin)曾经很贴切地把 19 世纪称之为“为国家而战的世纪”,他这一冠名的第二层含义——为选举权而斗争——就有力地强化了工人阶级与中央

① 边沁:18—19 世纪英国哲学家,创立个人以追求快乐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哲学,以此为基础提出社会和政的行动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称之为“最大的幸福原则”。此处强调当时英国公务员中对于实现这种“最大的幸福原则”必须倚重中央政府的力量观念。——译注

国家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sup>[50]</sup>

正是由于政府的服务和规制渗透到工人阶级的生活当中进而使居住地工人像在工作场所那样强化其阶级认同,英国工人对投票权的要求也只能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这一工人阶级正是因明确的阶级标准而被排除出(政治过程)去的。希瑟灵顿(Heatherington)在1831年12月的《穷人卫报》中写道,只有实行普选,“阶级这一用词才有可能融入一些涵盖面更广的称呼之中,而且这一过程将不会出现流血冲突”。<sup>[51]</sup>虽然无论在1832年之前还是之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改革组织都是地区性的,但与美国的政党机器不同,这些组织将他们对公民权的诉求直接对准中央,也就是英国议会。

国家与居住区工人之间互动的后果之一是,一条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断层(common fault line)出现在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与旧时代的地方主义不同,新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阶级的全国化特征,即使组织能力上尚达不到至少也表现在名义诉求之中。就在从法国大革命到英国1832年《大改革法案》出台之间的某个时点,从早先(群体)联系与利益上的纵向联盟和横向(地区性)的敌对之中,以阶级为基础的横向联合与纵向对立脱将出来,并替代了前者。就在此时……阶级诞生了。<sup>[52]</sup>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1790年至1830年间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体现于阶级意识的提升:该意识是对存在于工人兄弟各团体之间的、不同于其他阶级利益的共同利益的一种认同觉悟;第二,政治与工业领域相应的组织形式的发展。1832年便已经出现了基础雄厚且高度觉悟的工人阶级组织——工会、互助社、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

刊物等,工人阶级的智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模式,以及工人阶级的情感结构。<sup>[53]</sup>

英国工人阶级的自愿组织在两方面呈外向发展的态势。首先,他们没有以同一阶级内部在地域、收入或职业上的差别为基础,来强化自身的地区特性,反而超越了这些界限,将工人群体彼此的活动与感知联系起来。其次,他们把有关政治参与、公共政策及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等的阶级议题,发展成居住社区中的政治关怀。在这方面,宪章运动可谓是 1832 年后上述倾向定型化和深化的最重要的代表;这恰好与美国以街区为基础的工人自愿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形成强烈对比。

宪章运动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性情与组织方面趋向统一的联系纽带。该运动锻造出了工人阶级,这一集体在世纪之交曾一直在经济或政治行动二者之间取舍不定,并将(政治和经济)这两种行动同时融入一个以社区组织为基础的全国性网络之中。经过大约二十年时间,宪章运动创造出了英国独特的阶级整体意识,这一阶级不仅从事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还鼓吹济贫法、工联主义以及工厂改革,它要求实施欧文式社会主义(Owenite socialism)和言论自由,它宣扬千禧年国主义(millenarianism),还要求砸碎机器。

从上述所有行为就能看出,宪章主义反映了一个分化的工人阶级隐藏着的巨大的多样性。如果当地的匠人为数较多,宪章协会就会强调自助和独立的价值观。如果是手摇纺纱工占多数,如兰开夏和约克西区那样,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会更激进。而如果是家庭手工业为主,像东英格兰中部地区(East Midlands)一样,工人们会倾向于与中产阶级中的改革派结盟并寻求指导。<sup>[54]</sup>

不过,总的来说,宪章运动有其一贯的主题,这当中包括试图在阶



级谅解的基础上帮助劳工发表自己的政治声音,还包括对经济问题与政治代表权之间的关系定期发表评论。而宪章运动最有力的表现,在于它掩盖了其他类型的工人阶级运动并赋予这些运动一个共同的定义。哈里森(J. F. C. Harrison)表示,宪章运动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其阶级意识与情绪(temper)……宪章运动者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强调他们的活动是为了促进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的利益”。他们“相信阶级的团结十分重要,他们的领袖则用阶级斗争的语言发表言论”。<sup>[55]</sup>

从有关渐进主义之历史谜团的角度来看,宪章运动似乎是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又一例证。而从与美国相比较的角度看,宪章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于其作为一种阶级组织(在活动上)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它基于阶级分析在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之外提出了一条民主和平等主义的出路。特里格夫·托弗森(Trygve Tholfsen)曾生动地说明,《人民宪章》并不只是一份政治文件,它还是一份清晰的、对社会各方面的阶级宣言。“隐含在宪章里的,既有对政治结构转型的要求,也有关于劳动者应该掌控自己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宏大原则……令宪章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的……是它的一种确信(尽管通常只是隐含的),即阶级是进步与正义问题的症结所在”。<sup>[56]</sup>这一看法反映在宪章运动的组织层面。与在社区里突出阶级特性但在其他领域中却强调跨阶级性的美国政党机构不同,宪章主义“党”完全独立于辉格党和托利党,因此,久而久之,宪章党人便疏离了其中产阶级的盟友。

假若说宪章运动将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它也将政治抱负带入了工人的经济追求,它是一种受经济环境和经济斗争所影响的运动。1832年,主导阶级及其政客成功地利用国家机器拒绝了工人的选举权要求,在此前后,这些人也一直企图将工会运动扼杀之。结

果,宪章主义便有机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核心,并因此将自身塑造成一种对整体而非分裂的阶级意识的共同感知,这一点和工会运动一样,都与美国的情形大不相同。如同公民政治权利上的缺失,致使政治煽动的任务降落到工人阶级的地区性自主组织身上一样,国家对工会运动的立场也造就了相对弱势的工会,并迫使工人将其在工作场所中的组织努力转移到相对受保护的居住社区空间当中。

1799 年和 1800 年的《结社法》使工会组织非法化,从而迫使劳工组织转移到地下,管理较松的社区中的酒吧和互助社便成为这些组织的首选活动场所。即使在该法案于 1825 年废止之后,国家还动用普通法中的条款来阻挠工人的罢工行动。

1825 年后,工会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被禁止,但行动仍然备受干扰。工会的存在虽然不违法,但限制贸易(restraint of trade)的行为却是违法的。1825 年的《结社法》并没有明文宣布罢工违法,却将对罢工是否限制了贸易的裁定权交给了司法部门。此法律状况并没有阻止工会的发展;相反,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公开组织的工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的时候规模还很是壮观。但“1825 年后(政府)援引普通法打击工会的行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之事实表明,艰难的处境迫使工会尽可能将其计划和活动保密,其社区组织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政府的监视。<sup>[57]</sup>再者,残酷的法律环境连同商业周期对工会造成的持续性的压力,令工会变得尤为脆弱。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可听凭经济因素来限制工会,而一旦周期转活、工会势力又有所复苏时,国家便可以援引这一法律来进行打击:“总之,工人团体的任何公然行动——哪怕只是安静地进行的罢工行为,都有可能是反对国家的密谋。”<sup>[58]</sup>

由于上述政治原因,英国有组织的劳工十分脆弱,无法发展出对抗资本的独立的行动基础。而英国工人的政治行动也被迫从工作舞

台转移到居住社区之中。虽然工会本身从来没有参与过宪章运动,但斯洛森(Slosson)发现,“工会行动者中有相当大部分成员宣誓认同人民宪章”。<sup>[59]</sup>

8 相比之下,美国政权对工会较为温和的压制,使工人们还能够在工作场所中建立性质明确而公开的活动组织。在美国,工人也可能因为联合而在普通法下承担法律责任,但在联邦体制下,美国没有一部全国性立法或中央政府命令来进行反工会指控。在一个地区(州)提出的控诉不会在别的地方再被提出,起诉人会发现在一个由陪审团而非地方法官负责的审判制度下很难(对工会)定罪。美国工会在整个19世纪中不断地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到该世纪最后几十年,更面临政府或私人企图压制劳工组织的一波又一波的行动。尽管如此,在阶级形成的初期,工会在法律上遇到的难题尚属次要。当经济繁荣之时,工人们在工作场所加入工会基本不受限制;比如,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市每三个手工艺工人中便有两个是工会成员。<sup>[60]</sup>

简而言之,美英两国的组织形式、宪政及公共政策,对当地工人阶级团体的政治内涵,甚至对两国工人阶级之形成,带来了非常不同的结果。在美国,工人毋须为选票而进行政治动员,而社区中的组织也以跨阶级性的政党为基础,这些政党靠着动员跟阶级无关的团结性来吸引选民。反过来,工会也得以存活于工作场所之内。在其合力之下,作为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就此成型。

但英格兰却完全不同:那里的工人要想向雇主和国家提出诉求,只能通过其居住社区内的组织进行。受制于苛刻的法律、镇压行动、国家组织和公共政策,地区性的自主组织唯有把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融入一种共同体验的、刻骨铭心的阶级意识。<sup>[61]</sup>

## 注 释

自当年参加“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大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Conference) 并提交本章的初稿之后,我便收到很多有价值的回复。那次会议的题目是:“国家与社会结构:当前理论的研究启示”,该会于 1982 年 2 月 25—27 日在纽约州基斯科山第七山泉会议中心举行,本文在此次会议中首次发表。在这里,我要对曾经给予本文热心意见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其中会上有肯·夏普(Ken Sharpe)和西达·斯考克波热心发言,会后大卫·格林斯通(J. David Greenstone)、迈克尔·哈罗(Michael Harloe)、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以及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提供了宝贵意见。

[1] M. R. Werner, *Tammany Hall*(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28), p. 135.

[2] Brian Harrison, “Pubs”, in *The Victorian City*, ed. H. J. Dyos and Michael Wolff(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p. 180.

[3] Roy V. Peel, *The Political Clubs of New York City*(New York: Putnam, 1935), p. 38.

[4]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

[5] Asa Briggs,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19<sup>th</sup> Century England”, in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ed. Asa Briggs and John Saville(London: Macmillan, 1967), p. 43. 布里格斯还曾经做过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阶级形成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且是关于此议题为数不多的精心设计的比较研究之一;参见其《伯明翰和里昂的社会结构与政治》(*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s in Birmingham and Ly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 January, 1950: 67 - 80)。

[6] Gareth Stedman Jones,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no. 90(March-April 1975): 56, 58.

[7] Irving Howe, “Sweet and Sour Notes: On Workers and Intellectuals”, *Dissent*, Winter 1972: 264.

[8] 众所周知,社会历史学家中存在结构主义—文化主义这一激烈争论;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很多在此争论中站在文化主义一方的学者都认同布里格斯的说法,即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按阶级方式组成,该社会就会发展出一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也会将自身创建成一个阶级。在汤普森的权威著作中也隐含了



这一观点：*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也把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读者可以从下面三份期刊中找到关于这一观点的大部分讨论：*History Workshop*, *Radical History Review* 和 *Social History*。

[9]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种解释英格兰工人阶级之形成的方法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当工人阶级的取向被视为是天经地义时，有关改良主义或激进主义的辩论便奇怪地偏离了实际的社会进程、组织以及阶级间相互竞争的能力等事实。其结果，正如埃利(Eley)与尼尔德(Nield)敏锐观察到的一样，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自由主义学说体系——“如果工人进行武力抵抗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改良主义的’或被‘收编’(integrated)了”——的一种复制，而这种学术观点“误解了驱使工人们行动或限制他们不能采取行动的真实原因”。一旦接受这种二分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便有一大部分将屈从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即已形成的工人阶级必定朝着某种特定方式发展。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就必须为整个工人阶级找出一种“理论辩解”来。(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 “Why Does Social History Ignore Politics?” *Social History* 5 [May 1980]: 260–261, 258)。

[10] Henry Pelling, “The Concept of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ed. Henry Pelling, (London: Macmillan, 1968), p. 41. 劳工贵族的概念源于恩格斯 1885 年的文章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并最早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引入当代史学研究。这一研究路径考察工资和工作条件(包括手工艺工人与体力工人的区分)、城市社区的分化(强调空间的隔离、住房条件、自愿组织和娱乐设施——这是让我最觉得趣味相投之处)，以及政治(检视工会和政党领袖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有关劳工贵族概念的发展，请看 Friedrich Engels, “England in 1845 and 1885”, in *On Britain*, ed.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oscow: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pp. 67, 99; 以及 E. J. Hobsbawm,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Labouring Men*, ed. , E. J. Hobsbawm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64.

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经典研究要数白哲特(Walter Bagehot)的《英国宪制》一书[*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London: Collins, 1971)]。其他研究方法包括从个体

政治倾向的总和这一较为狭义视角来强调价值体系和政治文化(参见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强调从宏观历史角度对英国独特的政治发展历程的分析(参见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77 - 200); 强调有效的阶级联盟及意识形态的日渐衰弱的性质(参见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Towards Socialism*, ed. Perry Anderson, and Robin Blackbur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1 - 52)。

[11] Pelling, "Concept of the Labour Aristocracy", p. 56.

[12] 参见 H. F. Moorhouse,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Labour Aristocracy," *Social History* 3 (January 1978): 61 - 82; H. F. Moorhou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abour Aristocracy," *Social History* 6 (May 1981): 229 - 233。

[13] Moorhouse, "Marxist Theory," p. 73.

[14] Patrick Joyce,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0)。

[15] 同上, 第 xv 页。

[16] William H.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u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54 - 161.

[17] Joyce,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pp. 118 - 119.

[18]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Ch. 3.

[19] R. Lawton, "The Population of Liverpool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197 (1955): 93, 94.

[20] James H. Treble, "Liverpool Working Class Housing, 1801—1851," in *The History of Working Class Housing: A Symposium*, ed. S. D. Chapman (Newton Abbot, United Kingdom: David & Charles, 1971), pp. 167 - 209. 其他的研究也肯定了这一利物浦模式。例如, 普里查德 (Pritchard) 就研究了莱斯特 (Leicester) 的空间转变;

在这里,1840年,当地大部分工作和居住地点几乎还是连在一起,但到了1870年,这纽带已被破坏,并代之以现代模式的空间划分。万斯(Vance)对伯明翰和普雷斯特(Prest)对考文垂市的分析结论也差不多。奥尔森(Olsen)、沃尔(Wohl)、谢泼德(Sheppard)以及更多的学者也发现,即使在伦敦,虽然手工业生产依然是该市19世纪的主要生产方式,但这里存在着“一种将伦敦系统性地划分成功能单一、同质化的社区的努力”,工人阶级日渐拥挤到完全分隔的各个社区之中,此外,总之就是大规模的工作与家居地点的分离。(R. M. Pritchard, *Housing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James Vance, Jr., “Housing the Worker: Determinative and Contingent T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irmingham,” *Economic Geography* 43[April 1967], pp. 95 – 127; John Pres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Covent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 S. Wohl,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London,” in *London 1808—1870: The Infernal Wen*, ed. S. D. Chapman and Francis Sheppard[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1]; Harold Pollins, “Transport Lines and Social Divisions,” in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ed. Ruth Glass[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4], pp. 27 – 51; Donald Olsen, “Victorian London: Specialization, Segregation and Privacy,” *Victorian Studies* 17[March 1974]: 267)。

[21] Sam Bass Warner, Jr., *The Private City: Philadelphia in the Three Periods of Its Growth*(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 A. M. Warnes, “Early Separation of Homes from Workplaces and the Urban Structure of Chorley, 1780 to 1850,”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122(1970): 106.

[22] 同上,第111页。

[23] 同上,第119页。

[24] 同上,第120、122页。

[25] 同上,第132页。

[26] 同上,第133页。类似的讨论可以参看:T. C. Barker and J. R. Harris, *A Merseyside Town in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 Helen's, 1750—1900*(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4)。

[27]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p. 143. 为了让人们警惕,不要轻易地把现代的模式当成以往的历史,他引用了地理学家大卫·沃德(David Ward)的话,大卫·沃德指出,与 20 世纪相比,19 世纪英美两国城市的社会地理,呈现出极少的空间分隔样貌。(David Ward, "Victorian Cities: How Moder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2][1975]: 135 - 151)。

[28] 有关这一情况的讨论,请看万斯的《寒士安居》("Housing the Worker")。而认识到空间转变之重要性的少数历史教科书之一有:Eric Hopkin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es*(London: Edward Arnold, 1979)。该书的前两章分别是“工作情况”(Life at Work)与“家居生活”(Life at Home)。

[29] John Foster, *Class Struggles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London: Weldenfeld & Nicholson, 1974)。玛丽·克劳森对福斯特一书的评论中对这些议题进行了很有启发性的讨论。参见 Mary Anne Claws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6(May 1977): 289 - 294。

[30] 与雇主和工人在空间上的分离相伴随的还有工人彼此之间的分离。工作与居住社区的分离伴随着劳动力市场与住房市场的剥离,具有不同的消费能力的工人(韦伯的阶级定义的标志)互相之间在不同城区中日益隔离开来。福斯特认为,上述分离的最终结果是:在地理上出现一个四分五裂的工人阶级,进而出现阶级分裂——用他的术语来说即虚假意识——的倾向。根据这种观点,职业、收入和空间等方面的关系连结在一起,便得以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出一个独特的特权阶层,即一个劳工贵族阶层,该阶层倾向与资产阶级联盟,进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年代盛行的“革命意识”。

[31] 杰弗里·克罗辛克(Geoffrey Crossick)与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发展出了颇具启发性的由空间因素诱发的劳工贵族研究路径。克罗辛克研究了 19 世纪中期肯特郡(Kentish)伦敦市的手艺工人与工业工人在地域上的隔离,该研究展示出这些“贵族们”在价值观和语言结构上的矛盾性;他们对节制、节俭和自重的强调,似乎是在模仿占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但他们同时又坚持独立的,甚至是孤立的工人阶级文化。格雷的作品同样强调了在空间上单独居住的“高级”手艺工人的团体阶级意识(corporate class con-



sciousness) (这儿他借用了葛兰西的术语), 这一团体所居住的街区、住房条件以及生活方式都反映出一种“排外的情绪和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 同时还夹杂着“强烈的阶级自豪感”。按照这种说法, 随后出现了工人阶级中的这一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达成一种相互适应的默契这一复杂模式, 该模式确立了将工人阶级纳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条件。(Geoffrey Crossick, *The Labour Aristocracy and Its Values: A Study of Mid-Victorian Kentish London*, *Victorian Studies* 20[ March 1976]: 301 - 328; Geoffrey Crossick, *An Artisan Elite in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Croom Helm, 1978]; R. Q. Gray,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Gray, “Styles of Life”, p. 429)。

[32] 我之所以能从比较的角度做出这一陈述, 首先要感谢与“工人阶级形成研究计划小组”所进行的讨论, 该小组由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有关美国情况的近期证据, 参看 Theodore Hershberg, Harold E. Cox, Dale B. Light, Jr., and Richard R. Greenfield, “The Journey to Work: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Work, Residence and Transportation: Philadelphia, 1850 and 1880”, in *Philadelphia: Work Space, Family and Group Experience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ed., Theodore Hershber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28 - 173)。

[33] 有关比较情况, 可参看汤普森的讨论: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与 Amy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New York and the Origins of Machine Politic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0)。还有 Ronald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Study of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ulouse, France*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1), pp. 82, 94。关于居住社区纽带之重要性的另一补充讨论是 Michael Anderson, *Family Struc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Lancash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03。

[34] J. J. Rowley, “Drink and the Public House in Nottingham, 1830 - 1860”, *Transactions of the Thornton Society of Nottinghamshire* 79(1975): 76。

[35] 同上。

[36] P. H. J. H. Gosden, *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1815 - 1875* (Man-

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1).

[37] Henry Pelling, "Then and Now: Popular Attitudes since 1945,"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Pelling, p. 165.

[38] E. J. 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Daedalus* 100(Winter 1971): 20 - 45.

[39]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 Tilly(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7.

[40]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July 1968): 577, 584.

[41]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42]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44 (cited in Tilly, "Reflections," p. 632).

[43] 本段的讨论受到阅读此书学者的启发: Kenneth Dyson, *The State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特别是 pp. 36 - 44, 186 - 202. 也可参考 Alastair Rei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A Response to H. F. Moorhouse," *Social History* 3 (October 1978): 347 - 361。

[44]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737.

[45] Dyson, *State Tradition*, pp. 249, 250. 新近有关法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在此我指的是 Hanagan, Aminzade 和 Sewell) 强烈指出,若不考虑长时段的政治权利和镇压情况,根本不可能明白国家对阶级形成及动员的影响。[Michael P.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Artisan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ree French Towns, 1871 - 1914*(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46]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47] 延伸讨论, 请看: Oliver MacDonagh, *Early Victorian Government, 1830 – 1870*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77); 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aul Richards and R. A. Slaney, "The Industrial Town and Early Victorian Social Policy," *Social History* 4 (January 1979): 85 – 101; Robert D. Storch, "The Policeman as Domestic Missionary: Urban Disciplin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Northern England, 1850 – 188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9 (Summer 1976): 481 – 497; D. C. Moore, "Political Moralit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Concepts, Norms and Violations," *Victorian Studies* 13 (September 1969): 1 – 16; John Milton-Smith, "Earl Grey's Cabinet and the Object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Historical Journal* 15 (March 1972): 63 – 82; Henry Parri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 Reappraisal Reappraised," *Historical Journal* 3 (March 1960): 1 – 37; and David Roberts, "Jeremy Bentham and the Victorian Administrative State," *Victorian Studies* 2 (March 1959): 193 – 210。

[48] Perkin,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pp. 123 – 124.

[49] 同上, 第 310 页。

[50] 同上, 第 308 – 319 页。

[51] 引自 Patricia Hollis, ed.,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1815—185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p. 80。

[52] Perkin,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p. 177.

[53]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 212 – 213.

[54] J. F. C. Harrison, *The Early Victorians, 1832—1851*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71), p. 156.

[55] 同上, 第 157 页。

[56] Trygve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5.

[57] D. F. Macdonald, *The State and the Trade Unions* (London: Macmillan, 1960), p. 23.

[58] Gerald Abrahams, *Trade Unions and the Law* (London: Cassell, 1968), p. 28.

[59] Peter William Slosson, *The Decline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 (London: Frank Cass, 1967; originally 1916), p. 46. 也可参考 David Jones, *Chartism and the Chartists* (London: Allen Lane, 1975); Brian Brown, "Industrial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Working Class Contention in Lancashire, 1842," in *Class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Action*, ed. Louise A Tilly and Charles Till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1)。

[60]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也可看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 - 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20。

[61] 有关这些问题的重要研究著作包括: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同样有价值的还有以下文章: H. I. Dutton and J. E. King, "The Limits of Paternalism: The Cotton Tyrants of North Lancashire, 1836—1854," *Social History* 7 (January 1982): 111 - 141. 而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进行详细比较, 从而发现英格兰内部也存在着阶级形成上的重大差异的研究, 请参见 Dennis Smith,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Class Formation in English Society, 1830—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 九 霸权与宗教冲突

### ——大英帝国统治与约鲁巴的政治分化

戴维·莱丁

每个系统都有一个按分化(cleavage)基础划分之等级制度,其政治优先的次序不单每个政体有所不同,在同一个政体内,随着时间流逝也会有所改变。这些社会文化性分化在政治权重上的差异与演变为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难题:地域、语言或种族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造成分化?阶级在什么时候会占据首要位置,在什么时候宗派忠诚和宗教认同也会成为同样重要的分化基础?……我们希望了解:某一种分化在什么时候会比其他类型的分化更为突出,它们会导致什么样的联盟,而所有这些因素合起来又会对民族国家内部的共识建设(consensus-building)有何影响。<sup>[1]</sup>

### 一个困惑

约鲁巴,一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民族,主导着尼日利亚西南部五州的政治舞台,已然经历了三代的宗教分化。1890年之前,几乎每一

个约鲁巴人都遵奉同一种宗教信仰,但自19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概40%的约鲁巴族人改信基督教,还有同样数量的人成为了穆斯林。我在以前的研究<sup>[2]</sup>中曾经提过,在19世纪,当地真真切切地出现了两种宗教亚文化。约鲁巴基督徒跟约鲁巴穆斯林在对权威关系、责任以及参与的意义等方面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一谈到当时热点的政治议题,两种亚文化却又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曾经对这两种成分中的部分成员进行提问调查,用的都是权威关系、参与及责任等应该能够将他们区分开来的问题。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竟然无法分辨约鲁巴基督徒与约鲁巴穆斯林的答案。这对我而言成为了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另一个难题关乎这样一种事实:约鲁巴人以其“祖籍城邦”(ancestral cities)的成员身份组织政治性的活动,但很多的约鲁巴家庭已经数代未曾在其“城邦”居住,也很少由于这种持续性的忠诚而从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更使人困窘的是以下违反直觉的发现:虽然约鲁巴族人的宗教分化能明显解释他们在社会经济机会上的差别,但这种宗教属性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指明约鲁巴地区的政治倾向。当代伊斯兰教的觉醒促使学者重新审视宗教差异对政治的重要意义;受其启发,前述异常情况也迫使我重新提出了这个早在15年前李普塞特(Lipset)和罗甘(Rokkan)(在本书绪论中提到过)就已犀利地指明的历史疑团。为何在宗教分化已然历经一个世纪的制度化历程之后,今日约鲁巴地区在形成社会与经济分化的新基础之时,宗教差异却没有成为该地区政治认同的一个焦点?

在对此异常案例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传统上只用种族分化来解释政治化问题的传统理论存在明显不足。根据诸多基于西尔士(Shils)和吉尔兹(Geertz)的观点<sup>[3]</sup>所建构的理论,个人认同的某些方面是“给定的”,不可能轻易改变。每个人都从其血缘、语言及种族联系等因素之中发展出一定的自我认知。这些联系被称为原始的

(*primordial*)关系,会发展成为政治忠诚的根基,在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中更是如此。这一理论视角有可能引导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即约鲁巴地区的祖籍城邦这一纽带是“给定的”而宗教纽带是“后加的”。但本文将揭示,约鲁巴族人为了更好地配置经济和政治利益,长期以来很有策略地重塑了他们的祖籍城邦认同。因此,所谓祖籍城邦认同既是“给定的”也是“后加的”;它们并不比宗教纽带更原始。

那些突出对认同的策略性操控而非强调原始纽带的理论家们,为约鲁巴地区的文化认同被政治化这一模式所引发的疑团提供了第二种答案。<sup>[4]</sup>这些理论家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他们会从对身份认同的选择中寻求最大的回报。这一视角帮助我们解释了约鲁巴族人为什么会选择效忠于不同的祖籍城邦,他们又是怎样做的。但我们将看到,该视角不能解释,为何几乎没有约鲁巴人会权衡将自己的认同标准从祖籍城邦改成宗教派系后有可能获得回报。基于宗教纽带的政治组织也提供了不错的进行认同感投资的机会,但约鲁巴的政治领袖们却不屑一顾。

受上述原始纽带论与理性行为理论之失败的启发,本文试着提出另一种假设观点,来解释约鲁巴地区的宗教分化为何未被政治化。我将指出,正是英国在约鲁巴地区的殖民政府所采用的控制模式,成功地使该地区的某些社会文化差异被政治化,而另一些差异则仍然保持与政治无关。当某个中央政府有动机和实力来构建某一社会中的政治团体的形成模式时,这一政府可以被视为霸权性的(*hegemonic*)。因此,我会证明,把关注点置于霸权国家的行动之上,才能最好地解释我们在约鲁巴地区所观察到的政治分化模式。

从本文的目的考虑,“霸权”(hegemony)可以做这样的定义:对一个社会中某种集体行动模式的政治性塑造(*political forging*)(不论是通过强制手段还是精英交易)和制度化,同时还有对这种模式的理念

化建构,使之成为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象征体系——即社会常识。葛兰西(Gramsci)<sup>[5]</sup>将“霸权”定义为发源于一个社会内部的某一历史集团所具有的强制性及意识形态的力量,但我要把这一定义扩展一下,使其包括外来(殖民)政权的行为。我会在本文中论证,希望以低成本进行政治控制的英国殖民政府,发现重新扶植起约鲁巴地区各没落的祖籍城邦王国中的国王乃自身利益之所在。在19世纪激烈的社会文化转变中,这些城邦王国(city-kingdoms)难以再对其成员施加社会控制。没有了传统的收入来源,国王们很容易被殖民势力收买。殖民政府官员划分边界、处理政治诉求并将祖籍城邦视为约鲁巴地区唯一现实的政治效忠形式,并据此向国王们发放薪金;通过这些举措,殖民政府使得祖籍城邦中这些国王对自己死心塌地。约鲁巴族将祖籍城邦中的国王视作具有合法性的领袖,这的确不假;但殖民国家也确实利用这种情感建构了一个以祖籍城邦认同为主的制度化的政治系统,祖籍认同在所有社会分化因素中处于最高阶梯位置。

原始纽带论与理性选择的视角均把注意力放在社会的内生变量之上,以此来解释一国的集体行动模式。但两大流派都没有提供这样一种理论:即政府行为如何会塑造各种机会,从而决定社会内部各种分化因素的性质。任何政权在试图统治一个社会时都必须考虑该社会的文化传统。正由于对文化的这一立场超然于一国内任何特定政府之偏好,因此这立场本身可被视为该国家的一个属性。所以,本章所提出来的霸权模型就是对“把国家带回到”政治解释当中这一视角的一个贡献。

## 历史背景

当代约鲁巴地区的历史源于奥约王国(Oyo Empire)(1600—



1836)。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优势,奥约成为西非地面上伟大的草原王国之一。因为地接撒哈拉沙漠,于是奥约的商人可以从沙漠商队那里购买到马匹和奴隶。在舌蝇比马匹还多的森林地带以北,奥约的军事精英得以豢养了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他们常向森林地带进行闪电式突袭,以此维持其政治优势。此外,奥约在位置上还靠近大西洋,商人们可以用奴隶来换取枪炮、布匹、制成品、生铁和贝壳。因此奥约商人以作为两大国际贸易网络的中介而获利甚丰。

统治这一贸易王国的政治联盟由主要的城邦王国构成,我将这些王国单元称之为“祖籍城邦”。奥约—伊莱(Oyo-Ile)——占主导地位的祖籍城邦——由一位国王[当地称为阿拉分(Alaafin)]和一个酋长议事会(council of chiefs)[该议事会称为Oyo Misi,由巴索伦(Basorun)即军事统帅负责领导]共同统治。阿拉分接受各附庸祖籍城邦国王的进贡与效忠,从而为这些附庸国的长途贸易提供保护。巴索伦则通过帝国扩张中的军事征服来获取战利品和奴隶。

到了十七八世纪,一种统一的信仰体系渐渐确立;一个“民族”开始成形。奥约—伊莱城邦在帝国境内宣扬共同的价值观,试图以此来使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合法化。通过与伊莱—伊费(Ile-Ife)(一个曾显赫一时却日渐衰落的商贸中心)的合作,奥约—伊莱确立了伊莱—伊费作为帝国宗教中心和共同宗教之奠基者的故乡这一神圣地位。将伊莱—伊费确立为奥约帝国宗教中心的后果之一,是使奥约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其次便是种下了约鲁巴的民族之根<sup>[6]</sup>。

到了19世纪结束时,当地的政治均势开始倾覆。军事统帅与阿拉分王再也无法回避利益上的分歧。长期的和平增加了商人和国王(他可以收税)的财富,但却威胁到军事领袖的地位和财富。随着奥约城邦内部文官与军队之间冲突不断,其他祖籍城邦开始趁势挑战奥

约。在伊洛林(Ilorin),奥约帝国外籍军团的军事指挥官与伊斯兰圣战组织(jihad)的将领之一结盟,当时伊斯兰军刚刚成功地统一了今日尼日利亚北部的大片地域。这一联盟成功挑战奥约;19世纪20年代,阿拉分王被迫放弃奥约—伊莱,迁至王国以南约一百里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维持统治。从此开始了约鲁巴族的内部战争,并一直持续到1893年;这场内战彻底改变了约鲁巴地区的权威基础。

战争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抵抗伊洛林的强大军队由来自多个祖籍城邦的将领联手组建。军队成功地抵抗了伊洛林的军队,并在约鲁巴地区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权威基础。最后,军队在伊巴丹(Ibadan)停止了前进。伊巴丹从前是个小村庄,自此后很快发展成为新兴的主要城邦,吸引着各祖籍城邦中的约鲁巴族人前来居住。伊巴丹代表着对祖籍城邦的正统性的挑战,因为在这里占合法统治地位的是军事胜利而非血统继承。于是,伊巴丹的权力继承为很多祖籍城邦的约鲁巴族人提供了流动的机会。<sup>(7)</sup>

内战第二个主要后果是为英帝国主义的进入打开了门户。渴望获得约鲁巴地区棕榈制品直接使用权的英国商人,焦急地期待着不列颠的旗帜为他们开路。他们辩解说,约鲁巴腹地的无政府状态不利于贸易。而当约鲁巴地区确实陷入战乱时,他们的说法变得更有说服力。19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官员帮助约鲁巴各部达成停战协议;1895年,英军轰炸新奥约并迫使其屈服,最终将约鲁巴地区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在下文我们将看到,英国政府不仅只是颠覆了伊巴丹政权,同时还把新奥约建设成为了约鲁巴的中心。

战争的第三个后果是引发了难民潮——这些难民都是从祖籍地战火中逃亡出来的约鲁巴族人,他们或是成为其他祖籍城邦中的未来移民,或是开始建设新的城镇。脱离原居住营地的社会控制,这些难民开始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约鲁巴人开始

成规模地加入基督教或穆斯林宗教团体。在半个世纪之内,约有40%的约鲁巴人已经认同自己是基督徒,还有同样比重的约鲁巴人相信自己是穆斯林。两大宗教成功地获得了来自每一个祖籍城邦和约鲁巴地区一切社会团体中的皈依者。战争结束之后,许多难民重返家园,他们开始在自己的祖籍城邦建立起清真寺和教堂;还有不少人则成为“外籍”城邦中的永久居民。

战争的第四个后果也即后遗症是一个约鲁巴民族的凝聚。虽然数个世纪之前,民族之种就已撒播,但直到19世纪末期,民族才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现实。战争是催化剂之一,因为随着奥约帝国的倒台,帝国内说约鲁巴语的人们看到了他们的共同文化之根。对民族发展作用更为关键的可能要算被卖作奴隶的战俘。这一时期正是英国借口反对奴隶贸易实施海上封锁的时期,很多战俘成为“再俘虏”而被遣送到塞拉利昂再给予自由。在再俘虏的过程中,其他非洲族群辨别出了讲约鲁巴语的人们的共同身份,并将他们划归到同一称谓之下。当其中的部分人回归尼日利亚后,他们对约鲁巴民族的认同比对其自身祖籍城邦的认同还要强烈。其中一人把圣经翻译成约鲁巴语,这一事件本身成为约鲁巴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论往后约鲁巴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分化模式,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到19世纪末期,所有这些分化都只会被整个社会视为民族内部的分歧。<sup>[8]</sup>

步入20世纪,约鲁巴地区的分化模式变得五花八门。虽然有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但祖籍城邦认同依然很重要。伊巴丹体制中的军事派系虽是新鲜事物,却是更有分量的权威来源,因而成为又一种分化原因。最后,宗教认同为约鲁巴人增添了新的分化源头。回溯起来,究竟哪一种分化模式会成为此后政治动员的框架,此时并不是很清晰。但突出的事实是,虽然祖籍城邦的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分化之源的效力,在20世纪之中继续减弱,但是,它始终没有丧失作为约鲁巴

人政治认同的基础地位。而且,虽然宗教认同日益成为量度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但它一直没有成为政治认同或政治行动的基础。要揭开这个模式的谜团,我需要重新提出李普塞特和罗甘的疑惑,并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 互相竞争的分化:祖籍城邦与宗教

虽然祖籍城邦一直与血缘纽带相提并论,但它仍不是区分约鲁巴人的无可争议的客观基础。约鲁巴的确是存在地区差异,但祖籍城邦之差异从没有引发诸如泰米尔—僧伽罗人(Tamil-Sinhalese)、瓦隆—佛兰芒人<sup>①</sup>(Walloon-Flemmings)、约鲁巴—伊博族人(Yoruba-Igbo)或是苏格兰—英格兰人(Scots-English)那样的政治冲突。不同祖籍城邦的约鲁巴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很难察觉。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有着一样的政治制度(差不多所有约鲁巴城邦的政府都有着相似的职能和类似规模的官僚队伍);他们以伊莱—伊费为中心祭祀共同的宗教神灵,还流传着同一个关于约鲁巴民族源起的神话故事。这一民族靠着一个一体化的贸易网络维持了数个世纪之久,它经由战争洗礼而日益坚固,最终在19世纪从政治上再一次统一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一个民族真的存在,人们可能预期传统的政治分化之源会日趋减弱。

再者,随着旧奥约的衰落和新伊巴丹的崛起,人们可能期望祖籍城邦的社会意义会进一步消退。难民们亲手建立起新的城镇,因而引致其忠诚感的分裂。伊巴丹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权威基础,遍布约鲁巴各地的进步力量开始仿效伊巴丹。关系着祖籍城邦的支配性地位的

<sup>①</sup> 比利时的两大语言集团。——译注



传统的合法化权威,渐渐失去其威力。

随着 20 世纪的发展,社会在持续变化,人们可能预期祖籍城邦的社会重要性还会降低。尼日利亚的合并(约鲁巴成为三个组成地区之一)使约鲁巴人产生了团结的紧迫感。奥巴费米·阿沃洛瓦(Obafeми Awolowo)——20 世纪杰出的约鲁巴政治领袖——出生在伊杰布镇(Ijebu),这个城邦王国差一点也被并入奥约帝国的版图。尽管如此,他发现强调约鲁巴人的团结对其运动有利。他创建了奥杜杜瓦后裔协会(Egbe Omo Oduduwa),该协会象征着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他的运动,加上约鲁巴人在大英帝国治下日益增强的地理流动性,进一步削弱了祖籍城邦的社会意义。

尽管有上述社会趋势,但在尼日利亚联邦下的约鲁巴族各州(Yoruba states),祖籍城邦至今仍是政治认同和动员的核心基础。在每一个城镇,同一血统的神话仍然在定期举行的祭祀仪式中延续。仪式所祭祀的都是对该城市有着重要意义的神祇,而与仪式有关的节庆活动则把移民及其家庭带回到故乡。<sup>[9]</sup>在这些节庆当中,该城市的客籍子孙中的成功典范会被冠以众多名誉头衔,尤其是那些为“家乡”城镇提供过支持的人。而这些定居于道德颓废的大都会(如伊巴丹或拉各斯)中的约鲁巴人,回到祖籍城邦,看到在各种场合家乡人民都会向他们致敬,还有专门的“赞美歌手”跟随他们穿街过巷,他们的出身之地和在外的成功都被赋予不朽的意义,种种场景无不令这些人欢喜愉悦。祖籍城邦的这些子孙后代也希望保留他们向本镇的国王要求一块风水宝地的机会,他们或者是想退休后来此建造居所,或者是给自己的亲戚们盖所豪宅。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虽然大英帝国的统治在 1892 年结束了约鲁巴的内战,但约鲁巴人的安全意识依然很强,他们始终觉得祖籍城邦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sup>[10]</sup>

内战期间,各祖籍城邦的领袖们,都期望在拉各斯从事商业贸易

的本邦约鲁巴人,能够联系上国际武器运输网,从而为自己提供最先进的军事物资。这种对祖籍城邦之忠诚超过对居住城市之忠诚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民族主义政治的时代。在约鲁巴的土地上,阿沃洛瓦的行动党与阿齐克韦(Azikiwe)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党(NCNC)<sup>①</sup>之间的早期战役,只可被理解为不同祖籍城邦之间的冲突。阿沃洛瓦与伊杰布王国有瓜葛,而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党则通过反伊杰布的政治宣传来征召奥约族人,尤其是伊巴丹人。(阿齐克韦本身并不是约鲁巴人,但他深明如何进行约鲁巴族内的政治斗争。)

约鲁巴地区对公务员职位的竞争也添上了城邦间冲突的色彩。作为受教育的约鲁巴人向上流动之主要渠道的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依祖籍城邦而建立的各种学生会团为工作岗位和成功的机会而彼此竞争。最近又有一份对约鲁巴地区的研究,关注的也是有关社会阶层的概念,其作者发现,约鲁巴人最重要的分别是在祖籍城邦上的差异,这结论和与其观点对立的工人阶级论者不同。<sup>[11]</sup>

1979年,经历13年的军法统治后,尼日利亚首次举行选举;约鲁巴人为此选举组建了统一阵线。在约鲁巴的奥约(Oyo)、翁多(Ondo)、欧根(Ogun)和拉各斯等州,阿沃洛瓦的尼日利亚统一党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在班德尔(Bendel)和夸拉(Kwara)这两个拥有大量约鲁巴人口的州,约鲁巴族选民也团结在阿沃洛瓦的政党周围。但深入地观察会发现,因祖籍城邦认同造成的分化深刻威胁着约鲁巴人的统一立场。在这些选举中,对阿沃洛瓦的民意基础唯一的真正威胁来自奥博莫绍(Ogbomosho)——这是一个奥约族小镇,其领导人长期以来都在约鲁巴的政治组织中反对伊杰布的主导地位。

<sup>①</sup> 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独立前夕,改名为尼日利亚公民国民大会党。——译注

我猜测,今天约鲁巴地区最具煽动性的冲突,当与约鲁巴各镇对“陌生人”(来自其他祖籍城邦的约鲁巴人)在本地的土地租佃的合法性有关。虽然约鲁巴的无产权地的情况很是复杂,但在约鲁巴的政治大背景下,有关租金和所有权的问题,通常都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祖籍城邦中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战。

社会变革降低了约鲁巴地区祖籍城邦的客观相关性,但对多数约鲁巴人来说,祖籍城邦的认同仍是他们理解政治的一个透镜;它依然是政治分化的核心问题。下面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与此相对的一个问题,即宗教认同的社会意义日益增强但始终与政治不相关的问题。

直到19世纪末,约鲁巴人皈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才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两种宗教都向有抱负的年轻的约鲁巴商人提供了关于“现代性”的理想。每个宗教均选择性地对传统习俗提出挑战。基督教传道者提倡一夫一妻制、教会葬礼、祷告时脱帽和废除卜卦等等做法。穆斯林的布道者则要求信众严格遵守一神论、节制饮酒及减少对家族重大事件之相关庆典的重视。两种世界性宗教均没有带来即时的社会变革,却培养出了一个相当规模稳定的领导阶层,这些人可以引述圣经或可兰经的经文,能够独立阅读宗教典籍,并从中寻找到改变集体行为模式的方法。约鲁巴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将其相当一部分的可支配收入用来建筑宏伟的教堂和清真寺,又投入很多的自由时间参与宗教服务和组织活动。如果我们为降低约鲁巴人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意义而认为约鲁巴人“存在信仰调和主义”,那么我们会忽略很关键的一点事实。一切宗教虔诚都代表着一定的历史合成,而约鲁巴的改宗者已然发现自己的社会认同模式中对当前宗教的认同,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原来信义的忠诚。

尽管约鲁巴基督教和约鲁巴穆斯林这两个亚文化群体,在20世纪早期的差异性并不明显,但这种社会分化的确在日益加深。在殖民



地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公务员职位的争夺战中,约鲁巴基督徒的表现远远超过穆斯林。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传教士所提供的教育与殖民地公务员的工作要求紧密相关,因此改信基督教的约鲁巴人很快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们很快就具有了掌握英语的垄断性优势,该优势确保年轻的约鲁巴人在现代化部门找到好的工作,而且成为日后对抗殖民主义的一项重要技能。在中非,大部分针对自由欧洲的反殖民战争,都是由律师而不是游击队参与的。因此,约鲁巴基督徒走在现代教育的前沿,他们占据着现代化部门中的重要岗位,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担纲领导之职。

拉各斯教育发展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1870年,拉各斯的传道学校中(事实上那儿是唯一能学到英语的地方)只有9%的学生是穆斯林;到1893年,这一比例还只有13%。为了抵制这一不平等的待遇,穆斯林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校,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伊莱—伊费乡村地区收集到的另一份数据显示,即使在这个政府办学和免费教育的时代,基督徒学生仍然在入学率上占有优势。在接受调查的农民中,58.7%是基督徒,但他们的孩子占在校学生人数的63.7%。<sup>[12]</sup>在一份对约鲁巴地区的教育状况的全面调查中,费芬瓦(Fafunwa)写道:“这样说应该是不为过的:至少三分之一的基督徒曾经上过学,但穆斯林的这一比例最多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在以约鲁巴族学生为主的伊巴丹大学,约92%的学生自称是基督徒,只有6%的人称自己是穆斯林。<sup>[13]</sup>很多约鲁巴人把从事现代行业职位将获得的工资或退休金用作投资资本(学费)。正是获得了传道教育所提供的技能的机会,为约鲁巴人提供了能捉住新的贸易商机的契机。<sup>[14]</sup>

有关农地财富的可用资料寥寥无几。尽管如此,现有资料似乎表明在土地占有方面,基督徒似乎没有占据优势。这可能因为,直到今天,在约鲁巴地区的土地公开买卖,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在对伊莱—



伊费周边地区的 267 位农民的调查中发现,基督徒和穆斯林所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没有分别。例如,84.2% 的基督徒和 82.3% 的穆斯林拥有的土地不到 10 英亩。不过,对精英农民的调查却呈现不同的结果。比尔(Beer)指出,在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合作社(cooperative committees)中,约鲁巴基督徒成员占到全体成员的 63.4% 以及受教育成员的 100%。贝里(Berry)的数据则显示,信奉基督教的约鲁巴人首先发现并抢占了可可的投资优势,继而从中不断获利。因此,基督徒—穆斯林的差异,并没有表现在对土地的占有面积上,但隐藏于农民间财富和政治影响的分布之中。<sup>[15]</sup>

唐纳德·莫里逊(Donald Morrison)在伊巴丹大学支持下所做的大型调查,也充分反映出约鲁巴地区的基督徒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据的显要地位,该调查的一份子样本就覆盖了将近两千名生活在约鲁巴地区的约鲁巴人。在这子样本中,接受调查的穆斯林有 48% 是文盲,只有 2% 完成了大学本科课程;相比之下,基督徒中文盲只占 36%,获得大学学位的人达到一成左右。所有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五人的父母具有大学文凭,而且他们全都是基督徒。受调查的基督徒的父母的识字率要高于受调查穆斯林父母的识字率。表示自己每天会阅读报纸的基督徒达到 60%,而穆斯林只有 35%。声称拥有收音机、手表、煤气炉、冰箱、缝纫机、电熨斗、汽车、房子或土地、电风扇,以及时钟的基督徒,比例也要高于穆斯林。在所有消费品项目中,穆斯林都没有体现出优势比。<sup>[16]</sup>

约鲁巴基督徒享有的不单是经济机会,他们还享有政治机会。行动党的 61 位创始人和执行党员中只有两位是穆斯林。斯克拉(Sklar)制作的表格显示,1958 年行动党联邦执行委员会的 33 个西部地区代表中只有三个穆斯林,而 12 个地区部长中只有一个穆斯林。最后,行动党的 75 个选区与分区领袖中也只有五名穆斯林。1977

年,尼日利亚制宪委员会里的约鲁巴族各州<sup>①</sup>的代表中,74%是基督徒(我在这里只统计了可以识别出其宗教派系的代表)。<sup>[17]</sup>

伊莱—伊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速度相当,但基督徒始终保持着在精英中的主导地位。在论述伊莱—伊费镇的政治力量的论文中,奥野迪龙(Oyediran)采用了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确认政治精英的方法,他总共列举出八名领袖,而这些人全是基督徒。在该镇的政治冲突中似乎还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唯一一位穆斯林是个文盲,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亦不长久。<sup>[18]</sup>

我也曾亲身观察过伊莱—伊费;在那里,通过定期前往镇上的一个主要的清真寺和一所主要的圣公会教堂,我发现教会每个星期所收到的自愿捐款就相当于清真寺一个季度的资产维修金。在六个月之中,圣公会教会为修大理石地板共筹得资金2.6万奈拉,而清真寺为加盖一层楼而计划筹资1万奈拉的指标却远未实现。差别非常显眼:圣公会教会周日的院子看起来就像奔驰轿车的陈列室。

尼日利亚确实向全体公民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流动的机会。自1911年铁路建成后公务员队伍一直在增长,独立后教育机会不断增加,多国公司寻求与“桥头堡精英们”结盟,当然还有新兴的石油经济,所有这一切都为大批有野心的尼日利亚人提供了出路。尽管如此,在约鲁巴人当中,基督徒掌握住这些机会的相对优势实在明显。因此,当地宗教性社会分化清晰可辨。

然而,大多数的约鲁巴人都强烈否认存在着真正的宗教分化。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对这样的神话深信不疑:“我们都是一家人”。在与不同阶层的约鲁巴人的一个又一个的访谈中,人们对约鲁巴社会中宗教的非政治化现象所给出的最常见的解释,均与家庭的文化重要性有

<sup>①</sup> 此时的尼日利亚以联邦制形式制宪,东、西、北、中四大行政区划分为19州,约鲁巴族主要居住在西区的五个州。即本章开篇提到的尼日利亚西南部五州。——译注

5 关,他们的家庭虽被宗教分开却因血缘而相连。我好几次都发现宗教冲突被家族裙带关系所消融;其中最有趣的事件发生在阿贝奥库塔市(Abeokuta),当地的主教与清真寺的阿訇(Imam)竟然出自同一家庭。

这神话并非毫无道理。可是,既然“家庭”是一个由社会构建而非完全依靠生物本性的结构,因此,即使这一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我们仍要追问为何约鲁巴人不重新构建其家族以与宗教谱系保持一致呢?他们可以为了祖籍城邦这样做:与夫家祖籍城邦不同的妇女之孩子,毫不含糊地认同父家的祖籍城邦。无论如何,我在伊莱—伊费收集的资料显示,约鲁巴家族很大程度在宗教信仰上是同质的。我访问过当地圣公会教堂和主要清真寺中的70位长者,发现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的社交圈子的宗教成分是混合型的,但事实真相却是,在他们封闭的社会网络中存在高度的宗教同质性。仔细看表9.1应能发现,在伊莱—伊费,家族内的宗教同质性与祖籍城邦同样是社会现实。超过九成被访者的妻子接受了跟丈夫一样的信仰,而较大规模家族里的成员也都属于同一宗教团体。在存在宗教差异的个案中(例如表9.1,第V部分),改宗又带来了同构形态。朋友关系也反映着宗教认同的上述现实。虽然第VII部分的数据显示很大比例的受访者也结交持不同信仰的朋友,但70例个案中只有3例表示拥有多于一个属于其他普世性宗教的友人。再者,考虑到被访者都居住在宗教异质但祖籍城邦认同却同质的社区当中,第VII部分关于跨宗教友谊的低比例之发现更令人惊讶。虽然人们一直以为约鲁巴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多元化宗教认同的网络,但事实表明,其中的宗教却是高度地同质。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弄明白这样一个社会学难题:尽管约鲁巴的确存在着以宗教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上的差异,但这种分化并没有在政治舞台上引起反响。虽然外界的观察家时常用宗教框架来演绎约鲁巴的政治,但当地人从来不会这样做。

表 9.1 伊莱—伊费的约鲁巴家庭:宗教与祖籍的同质性比较

第 I 部分			
被访者的妻子属于不同的:			
被访者宗教信仰	祖籍城邦(%)	出生所属宗教(%)	宗教(%)
基督徒	14	9	11
穆斯林	37	40	6
第 II 部分			
目前姊妹所属的宗教			
被访者宗教信仰	基督徒(%)	穆斯林(%)	传统宗教(%)
基督徒	89	3.6	7.4
穆斯林	19	76.1	4.8
第 III 部分			
与妻子……不同的兄弟			
兄弟目前的宗教信仰	祖籍城邦(%)	宗教(%)	
基督徒	13	4.3	
穆斯林	8	0	
第 IV 部分			
姊妹的丈夫出生时的宗教			
姊妹出生时的宗教	传统(%)	穆斯林(%)	基督徒(%)
传统	<u>61.5</u>	15.4	23.1
穆斯林	2.5	<u>68.8</u>	18.8
基督徒	17.6	11.8	<u>70.6</u>
第 V 部分			
与父亲的宗教相同:			
被访者宗教信仰	出生时(%)	现在(%)	
基督徒	11	69	
穆斯林	11	77	
第 VI 部分			
姊妹的丈夫属于相同的:			
被访者宗教信仰	祖籍城邦(%)	宗教(%)	
基督徒	84.2	85.7	
穆斯林	88.9	78.6	
第 VII 部分			
列举的三个朋友中,至少一个属于不同的:			



续表

被访者宗教信仰	祖籍城邦(%)	宗教(%)
基督徒	14	29
穆斯林	17	37

注:表格所有部分取自同一数据库。我于1980年在尼日利亚伊莱-伊费访问了35名基督徒和35名穆斯林。我先是花了五个月,定期前往取样对象所属的教堂和清真寺观察,然后请了一名长者陪伴我走访其教会/寺庙中的部分资深信徒。我没有进一步规定访谈条件。取得准确资料的欲望引导我选择了一个存在偏差的、围绕着我的向导本人的圈子而组成的样本,而不是采取随机取样方式。样本的偏差夸大了那些持相同信仰的人的社会凝聚力,因为这些教会和清真寺联系密切的人明显是由我的向导挑选出来的。可是,由于我选择了中心的教堂和清真寺,因此我没有访问本镇大量外来的约鲁巴人,因为他们只去其他教会和清真寺。因此,这些数据也夸大了祖籍城邦的凝聚力。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即使在占中心地位的伊莱-伊费镇,这个最“传统”的约鲁巴城镇,也是最忠实于祖籍城邦概念的地区,宗教团结已成为社会现实。关于这次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将在我即将出版的著作中讨论:《霸权与文化:约鲁巴的政治与宗教转变》(*Hegemony and Culture: Politics and Religious Change among the Yoruba*)。

19世纪的内战确立了上述模式。有关伊洛林(Ilorin)对奥约之最高地位的挑战最常见的一种解释认为,伊洛林的伊斯兰化以及同期发生的、以伊洛林为根据地的富拉尼族圣战组织(Fulani jihad)向约鲁巴地区的持续渗透导致了上述事实。<sup>[19]</sup>这个解释忽略了伊洛林和奥约的社会现实。第一,伊洛林的国王阿方贾(Afonja)本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也拒绝毁灭圣树林和其他约鲁巴传统宗教的象征物。第二,伊洛林战胜后,奥约的穆斯林并没有遭到歧视,也没有被视为叛徒。许多奥约穆斯林最终改为支持伊洛林的军队,但他们的举动被视为反阿拉分王,而不是支援穆斯林信仰。第三,伊洛林的军事统帅是一位约鲁巴裔穆斯林,但被富拉尼族的幕僚所杀。因此,这场战争被视为一场富拉尼族企图控制伊洛林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教徒企图控制奥约的战争。罗宾·洛(Robin Law)总结说,伊斯兰信仰在动乱中的角色仅限于“它提供了一个基础,让极其不同的元素——富拉尼族、豪萨族(Hausa)和约鲁巴族——可以为了推翻现存秩序而精诚团结起来”。然而,即使这种判断也太过绝对,由于这一联盟非常短暂,因此

根本无法在富拉尼和约鲁巴穆斯林之间实现某种社会融合。<sup>[20]</sup>

约鲁巴地区这种宗教差异非政治化的模式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20 世纪 50 年代,约鲁巴穆斯林控诉他们在寻找职业方面的相对弱势,并把矛头指向传道学校。西部地区的政府因此制定了一项教育法,其中包括给予穆斯林教育机构特别资助的条款。<sup>[21]</sup>在那个时期,身为基督徒的阿沃洛瓦酋长设计了一个赞助约鲁巴穆斯林前往麦加朝拜的创新计划,却没有相应的措施来抚慰基督徒。

在约鲁巴地区能够把穆斯林按其宗教身份动员起来的地方只有伊巴丹。(伊洛林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非约鲁巴族各州的北部地区,需要单独处理。)<sup>[22]</sup>1953 年,阿沃洛瓦的行动党企图从对手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党手中夺得伊巴丹的控制权。行动党暗地里支援伊巴丹的一个穆斯林显贵发展一个穆斯林统一党(United Muslim party)。这一举动最终遭遇惨败,因为阿德拉布(Adegoke Adelabu)——伊巴丹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党的约鲁巴族领袖、一个穆斯林——责难这一做法,并在选举中打败了行动党。1956 年,政治上已处于弱势的阿德拉布试图恢复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亲自前往麦加朝圣,这一举动大大动员起约鲁巴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在 1958 年的这场选举中,阿沃洛瓦模仿了阿德拉布在 1953 年的口号,全国穆斯林联盟(the National Muslim League)则迫切感到需要改名为全国解放联盟(the National Emancipation League)。尽管如此,当年的地方政府选举中该党所获选票不足总票数的 1%,在 1959 年的联邦选举中更是没有捞到一个席位。在 1965 年军法统治前的最后一场选举和 1979 年军人政府结束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利用宗教因素来煽动约鲁巴人。更重要的是,在 1977 年有关伊斯兰教教法法庭(Sharia courts)在新宪法地位的辩论中,来自约鲁巴族各州的代表,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在整个联邦中是立场最温和的。其实,他们为选民提供了一个妥

协方案,让国家免于另一场宪政挫败。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政治上的好处,而只是因为对这些代表而言,将宗教分歧用作政治斗争是难以想象的。<sup>[23]</sup>

约鲁巴族代表在制宪委员会中的行动看起来似乎是非理性的。既然约鲁巴人对北部地区并非漠不关心,他们岂不应该尽量利用在伊斯兰教法法庭议题上的中立立场向北方地区的穆斯林要求好处?但约鲁巴代表的行为恰好体现了约鲁巴政治体系的特色。在我所进行的有关伊莱—伊费的研究里,我以非正式的形式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所能接受的可以替代选举活动的政治方案。以约鲁巴人为主的政党尼日利亚统一党(UPN),由于未能与其他地区结成竞选联盟,败给了尼日利亚民族党(NPN)。尼日利亚民族党发源于人口众多的北部各邦;虽然它在两个非穆斯林主导的东南邦赢得了选举,但依然被视为一个北方穆斯林的政党。尼日利亚民族党千方百计想把约鲁巴团体纳入其竞选联盟,但除了拉过来几个实际没有任何选民基础的显要人物外,尼日利亚民族党根本没有在约鲁巴地区建立一个据点。我询问穆斯林受访者是否会考虑与尼日利亚民族党的结盟。我向他们指出加入尼日利亚民族党可能会为约鲁巴穆斯林带来很多留在尼日利亚统一党而无法获得的好处。他们的反应是,我的利益计算并非毫无道理,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以穆斯林的身份进行政治组织。

在1983年的选举中,尼日利亚民族党实际上在约鲁巴地区取得很大的进展;但他们的胜利全靠利用这里祖籍城邦上的分歧。认同奥约的约鲁巴人再次被动员起来,反对主宰尼日利亚统一党的伊杰布人。在伊巴丹,奥约人与伊杰布人在投票结果揭晓前夕爆发了暴力冲突。在伊莱—伊费,占主导地位的伊费人与阿沃洛瓦及其伊杰布选民密切联手,这里同时还有一个奥约人选区,那里都是一个世纪前迁移至此的奥约难民。尼日利亚民族党对这一选区的渗透相当彻底,在一



场选举竞赛中,该选区投给民族党的选票竟然比该市估计的总人口还要多。祖籍城邦——奥约、伊杰布和伊费——依然是约鲁巴人进行政治思考和行动的考量范畴。在1983年的选举中,宗教认同对政治联盟并没有发挥明显的影响。<sup>[24]</sup>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回顾一下本节探讨的谜题:虽然约鲁巴人的宗教分化的社会重要性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不断上升,其政治意义却一直非常微弱。与此同时,祖籍城邦的相对社会重要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明显降低,但它至今仍盘踞着政治的核心位置。在各种政治分化的等级排序之顶端,约鲁巴地区进行政治解释的主要话语仍然是祖籍城邦。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 解释宗教宽容

### 原始纽带的现实性

约鲁巴人自己对于这种现象的最主要的解释是:祖籍城邦之认同是真确的,宗教的认同则是虚构的。我在对伊莱—伊费家族中有关宗教渗透以及宗教与祖籍城邦方面的数据的讨论中,希望能够证明祖籍城邦的纽带并不比宗教关系来得“真实”。我会在本部分进一步推进这一论断,因为数据会表明,原始纽带不是“给定的”,而是可变的。

与理性选择理论家提出的资料相一致,约鲁巴案例充分证明了对认同的社会定义的可变性。前面所提到的伊巴丹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伊巴丹原来只是一个收容从四处逃来的难民的军事集中营,但很快发展起它自身的“传统”,它的领袖着力培养一种伊巴丹人的集体意识。不久之后,这些领袖开始要求在“传统”等级制度中获得更高地位。通过这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们的努力,伊巴丹也发展成



为一个祖籍城邦。对祖籍城邦“传统”的操纵是很普遍的事情。地处边陲的约鲁巴国王们常与伊莱—伊费的国王进行谈判,要求重新排定他们在“祖传”国王等级序列中的位次。英国殖民主义者正是按照等级次序来决定各位国王的薪水,而重新创造传统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做法,对约鲁巴国王们而言轻而易举。<sup>[25]</sup>因此,无论是有关普世性宗教控制薄弱的假定,还是认为祖籍城邦的血缘关系是“给定的”的假设,都不能解释约鲁巴地区社会分化的政治化形态。

### 分化模式的理性

经过充分证据证得传统更多地充当了政治运作的源泉而非行动的桎梏之后,社会科学家发展出一种新的边沁主义范式,该范式将社会分化的政治化视作谋求价值最大化的个体对自身目标的理性追求的结果。在非洲背景下,这一新范式以如下方式运作。首先,外来的社会和经济转变带来新的奖励机制。居住于矿藏丰富地区或者是可以种植畅销型农作物的这些群体开始比其邻居具有了相对优势。同样受益的还有居住在贸易路线上的人们,或者是居住在新兴的作为重要行政管理中枢的城市地区的人。有时候,好处来自于对传教士的接受:欧洲福音派为他们的受过教育的殖民地学生提供了工作机会。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过去一个世纪中巨大的社会变革造就了新的报酬模式。

其次,报酬与资源必然都是稀缺的,因而为工作、地位以及其他“现代性”象征物而进行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非优越地区的人们便开始迁往外乡去寻求这一环境转变所带来的利益点。<sup>[26]</sup>

再次,精明政治家们发现,按照族群认同来组织群众,比起按阶级认同来进行组织,成本更低。这是因为:拥有同一族群认同的群众一般使用同一种语言,翻译成本大为下降;这些人拥有关于自身血统关系的同一神话信仰,所以凝聚群众的象征性基础已经存在。因此,集

体行动的逻辑适合于对特定的移民群体进行动员,而不适合鼓动那些固守土地的人们(本地居民);但它也不适合动员流氓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sup>[27]</sup>

最后,政治野心家会试图扩大其所领导的族群的外延,用以扩张其权威范围。这并非没有可能。“部族”(tribal)认同概念是可以变化的,关于血统的神话又易被操纵,族群认同的边界(以及种族群体的象征性核心)因而可能被族群领袖或族群自身重新演绎——无论演绎者是谁,其目的均为了增加成功争夺资源的机会。<sup>[28]</sup>所以,基于原始纽带的政治活动绝不是“给定的”;它是某些自利的个人策略地调整集体认同的结果。

这种工具性视角可以、也确实曾经被形式化。但是,针对目前我的研究目的,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部族主义(tribalism)的产生以及部族认同的政治化过程,提出了有趣而且颇具分量的假设命题。<sup>[29]</sup>这些假设背后的逻辑是:在信息不完全、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个人会采取具有短期效应的政治策略,使得他的地位、财富和权力最大化。部族主义便是个人理性策略的宏观社会性结果。从约鲁巴的例子可见,祖籍城邦分化的政治化可以解释为下述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沟通的便宜、祖籍城邦中早已具备进行政治组织的基本条件,以及祖籍城邦在较大的城市中心中具备一定的社会网络。

不仅那些聚焦原始认同的理论面临着有关认同的可调整性和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这两方面的质疑,同样,新边沁主义理论自身也存在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便必须直面这些问题。第一个难题是:理性行为论需要面对族群认同的持久性。让我们换个场景,有论者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欧洲的政治认同会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整个欧洲大陆;斯坦利·霍夫曼(Stan-

ley Hoffman)在回应中指出,民族认同不是一颗可被层层剥离的洋葱,它更像是朝鲜蓟(artichoke)<sup>①</sup>:人们可能会为一点政治好处而转移他们的忠诚——除非你触及他们的核心。<sup>[30]</sup>当然,原始纽带论者经常假定其核心是不能改变的现实。尽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但一旦接受了理性行为视角,一些对原始纽带论者而言属于不证自明的情况,便立即成为工具论者需要解释的难题。

工具主义学派的老掌门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曾经指出:“种族群体得以大规模持续,是因为它们具备从现代化部门获取产品与服务的能力、从而能够满足其成员对现代性要素的需要。”<sup>[31]</sup>布赖恩·贝里(Brian Berry)以类似的思路断言:“我估计族裔群体现象会在美国长期存在,只要它还是一种满足感的来源。”<sup>[32]</sup>且不用说找不到数据在支持这些主张,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些解释是多么地经不起推敲和欠缺说服力。人们不能像辞退工作一样放弃自己的族群;他们亦不能像改变喜好的啤酒品牌那样改变自己的族群认同。因为民族认同牵涉到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的确代表着一种生理上的“给定状态”,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不会去计算可从自己的民族认同中得到多少满足感。没有对满足感的计算和衡量,经济范式便丧失了解释力。族群认同持续发挥影响却没有利益计算的存在,这成为理性行为论的追随者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工具主义范式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能力解释本文提出的疑团,即为何有些社群团体(communal groups)能够进行政治动员但有些却不能。探究这一难题的思路之一,是考察新边沁主义所提出的两大观点之间的张力,这两个观点是:部族认同的组织成本较低和部族认同是可变的。假如部族认同是可变的,那么其组织成本一定比预期的要

① 又称洋蓟,可使用的花蕾部分坚硬难剥离(通常需要用沸水煮一段时间才能剥开)。霍夫曼以此做比,指出共同体的某些核心观念是不可撼动的。——译注



高。如果其组织成本比原先预想的要高,为什么它们在非洲又那么容易被动员起来?而且不论其成本到底是高是低,我们仍缺乏一种能告诉我们哪类认同会被政治化的理论。

理性选择论者以如下论据解答这问题。他们认为一个团体能否成功组成具生命力的政治组织,取决于那些明白组织的“奥尔森”(Olson)问题的政治活动家。既然政治企业家向其选民提供“公共物品”,为何会有追随者愿意再付出一定的成本?难道不是所有潜在的追求者都希望“搭便车”而由其他人为人人共享的东西付费吗?由此可见,一个好的活动家,必然懂得如何为特定的个人提供“选择性激励”以使其为集体出力。当出现一位活动家(或许是本能地)懂得对理性的个人行为进行组织所面临的各种限制时,该共同体就可能会实现政治化。<sup>[33]</sup>这一应答铿锵有力。如果在评估一个组织是否成功之前,能够从独立数据中确立活动家进行策略计算的质量,这一设想的价值就几乎是一种理论上的贡献。

尽管如此,这种过分强调选择性激励的解决模式,很有可能会忽略在诸多类似国家中同期所发生的其他模式。为什么16世纪欧洲的宗教领袖们能够在几乎所有国家实现宗教的不同的政治化?为何欧洲多个边缘民族的政治家们突然会在20世纪70年代同时取得适度的成功?同时,为何宗教活动家能够在没有庞大追随者的情况下,继续活跃于今日欧洲却无法受纳于什叶派的势力范围之内?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在独立后的非洲,为何部族领袖能够成功地动员政治选民,而宗教领袖却显得较为逊色?特定类型的身份认同在特定的时间变得十分重要,而在另一些时刻却在政治上微不足道。工具主义者并不能成功地解答这些普遍的模式,因为他们只关心单个案例中的逻辑。

在本文所举的案例研究中,让工具主义者尤其困惑的是约鲁巴穆斯林显而易见的沉默。莫里逊的调查表明,约鲁巴穆斯林对现有财富



分配状态的批判性还没有约鲁巴基督徒强烈；而且比基督徒更多地感到自己受益于政府服务。穆斯林更看重过去 10 年来尼日利亚的进步，而且和基督徒一样乐观地看待自己儿女的前程。如果考虑到前文展示出的有关教育和经济地位的数据，约鲁巴穆斯林的这种态度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计算。<sup>[34]</sup>而我无法诱导约鲁巴穆斯林考虑在政治上认同穆斯林所主导的尼日利亚民族党所能带来的潜在满足感这一事实本身，也表明祖籍城邦分化之所以仍然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原因超越了部族领袖所提供的激励。

理性选择理论家是很谨慎的，他们会为其范式设定理论界限，并提醒我们微观经济通常关注边际性决策而不考虑结构性转型。一种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框架的理论，或许能解释为何约鲁巴人会比对其父亲的祖籍更多地重视其母亲的祖籍，但不能解释为何他决定接受一种全新的认同模式。结构性转型需要别的理论来解释。但我们还需要问，我们怎么确定某种认同的调整是边际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缺乏做出这种判断的机制，那么诸如声称一个伊杰布人视自己为伊格巴族人 (Egba) 是边际性变化，而一位伊杰布基督徒将自己视为基督徒则是结构性的这样的判断毫无根据。建立霸权控制的模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它试图提出一种理论性解释，来说明政治控制是如何对原本该是边际性的改变制造出结构性障碍来的。<sup>[35]</sup>

### 霸权控制的模型

为本文的疑惑提出解决方案的是葛兰西而非边沁。帝国主义行动逻辑可帮助解释“部族”在非洲政治中的具象化——包括部族分化何以变成政治行动中的主要象征，以及这种分化为何得以持续。

19 世纪末期，卢嘉爵士 (Lord Lugard) 提出“间接统治” (indirect rule) 的战略，帮助界定并细化了英国殖民政府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其

他地区的控制机制<sup>[36]</sup>。该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保持当地的权威结构，但同时殖民地政府保留“驳回”权，即可以指导和操纵当地政府。在非洲的某些地方，比如尼日利亚北部的酋长国，这一思想有一定的现实基础。<sup>[37]</sup>在其他地方却毫无用处，因为那里没有英国人可以借以施治的等级权威制度。尼日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就是如此，尤其是在伊博族的领地上。<sup>[38]</sup>而对约鲁巴族来说，间接统治虽不现实却也并非毫不相关；它只是反动而已。英国人在约鲁巴地区所做的，乃如阿坦德(J. A. Atanda)所详细记述的那样，是创造了一个“新奥约帝国”(New Oyo Empire)。<sup>[39]</sup>新奥约，一个实际上无力面对新崛起的伊巴丹的难民集中地，因为英国殖民者的缘故而重新焕发了生机。

一开始，奥约与英国人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1888年，拉各斯总督艾尔弗雷德·莫洛尼(Alfred Moloney)试图争取阿拉分王的支持来把法国商人赶出约鲁巴地区。他在给阿拉分王阿代耶米阁下的致信中就隐含着间接统治信息，他称阿代耶米为“奥约的阿拉分王、约鲁巴地区元首”，并说道：“众所周知，自亘古以来伊格巴(Egba)、克图(Ketu)、杰布(Jebu)和奥约四方土地就属于约鲁巴，这一地面上居住着所有说约鲁巴语的子民。”<sup>[40]</sup>根据信中所言，如果阿拉分王愿意利用其影响力保持对英国人开放贸易，他将得到丰厚的“奖赏”(薪资报酬)。就连克日吉战争(Kiriji War)的停战协议——约鲁巴内战中的最后一场重大战役，在英国人的影响和权势之下达成了停战条约——也赋予阿拉分王对伊巴丹和伊洛林两地的最终安排进行管理的职权(阿拉分王最终管理失败)。<sup>[41]</sup>因此，阿拉分与英国人之间有着共赢关系，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

尽管如此，1895年，英国人不得不证明自己的强势地位；对新奥约镇的一阵轰炸便迫使阿拉分出逃而该镇投降。虽然这一事件很不幸，但奥约人很快就尝到了顺从的甜头。在殖民者眼里，伊巴丹力量

薄弱而奥约却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伊巴丹嘈杂混乱,奥约却稳定有序。1898年,伊巴丹居民富勒(F. C. Fuller)做客奥约时,形容阿拉分是他“在约鲁巴地区见过”的“最‘高贵的’本地人”。阿坦德注意到,“人们认为,假如赋予阿拉分王的‘约鲁巴元首’这一‘空头衔’一定的真实内容,他们就会得到行政上很大的好处。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伊巴丹的部分领土职权转移给奥约”。<sup>[42]</sup>

当1906年罗斯(W. A. Ross)成为奥约专员时,间接统治战略对奥约与伊巴丹的相对地位的影响开始突显出来。罗斯是间接统治的积极提倡者,他非常喜爱约鲁巴文化,深切渴望能够弘扬和保护约鲁巴传统。他是奥约王储的同龄人和朋友。事实上,当阿拉分王过世后,罗斯还成功地帮助奥约王储当上阿拉分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对奥约的传统做了创造性的重新解释。

要实现其宏大计划,罗斯需要先突破1893年条约的限制;在该条约中英国承诺伊巴丹可独立于奥约实行自治。为此他一直等到1912年成为该地区的代理长官(acting resident)之后,才重新调整当地的权力关系;他的调整如此彻底,就连白人传教士都需要服从于阿拉分王。同一年卢嘉就任尼日利亚总督,他的间接统治学说也成为帝国的明文律令。而罗斯却先行一步,在对伊巴丹的一场权力继承战中,他规定“效忠阿拉分王是竞选的**必要条件**”。<sup>[43]</sup>

罗斯的下一步是把奥约打造成该州的首府、将阿拉分改造成“至高无上的领袖”。伊巴丹的领袖提出抗议,罗斯直接将其免职。卢嘉批准罗斯给予阿拉分对叛乱者处以死刑的权力以及对大量事务的司法控制权。他可以在全州派遣官员,这些官员都是暴虐的掠夺者。不过,罗斯毫不理睬人们对这些官员的不满,反驳说,约束这些官员是阿拉分的责任。<sup>[44]</sup>

罗斯式的间接统治对现代约鲁巴地区的分化结构影响广泛。首



先,罗斯的政策提高了那些自认为是奥约的“传统权威”的精英们的地位,这有助于维持对奥约的认同,即使很多人实际上已经远离自己的祖籍城邦。如果说奥约认同的观念在内战之后已经变得十分模糊,那么英国政府则重新唤醒了这种认同意识,并使之更加具象化(reification)<sup>①</sup>。

第二,其他群体也发现,在殖民政治体制下,他们唯一能够提出的“合理”要求就是基于传统与历史的权利。伊费国王由于代表着有独特历史意义的祖籍城邦,所以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巨大好处。很快地,伊巴丹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它的领袖要求英国赋予该市的领导人在约鲁巴荣耀等级中更高级别的头衔。因此,英国人不单赋予奥约认同以新的力量和意义,也对其他以“传统”认同的名义提出权利诉求的族群提供好处。<sup>[45]</sup>

第三,间接统治的制度还使得那些在旧奥约帝国中没有特殊权力地位的族群起来挑战奥约和伊莱—伊费的进攻。他们能够突围的唯一方法,就是与其他城镇或外人结盟[如埃基蒂(Ekiti)和伊杰布就是与传教士结盟]以争取更多资源。赶超奥约变成了重要主题,而这一主题也进一步强化和鲜活了以祖籍城邦为基础的认同理念。有意思的是,伊杰布和埃基蒂与传教士的联盟在后来有了意想不到的获益,他们的子孙比其他约鲁巴群体更容易得到公务员的工作职位,以至奥约的后代发现自己需要努力追赶。于是,最终定型的不是奥约的绝对优势,而是这种城镇之间的竞争游戏。

① 英文词“reify”及其名词“reification”的原意是使具体化,在本文的语境中,作者用这个词说明殖民政权选择了政治上已经失势的社会势力作为自己的统治手段,使这些社会势力能够获得进一步强化后的合法性地位,并重新拥有控制其他社会力量的权力。“reification”在此有“使复活”并“使之进入民众的常识体系,使人们相信这种现象(可能是某种传统认同观或者是某些传统势力代表的崇高地位)是真实的,而且就是社会现实”这一复合意义。所以本文试着翻译成“具象化”,个别地方意译为“鲜活”。——译注



与此同时,英国官员也把基于宗教认同的权利主张赶出了政治舞台。作为一种统治哲学的间接统治,让英国人偏离了原先希望宣扬基督教的目标。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各自内部的利益仲裁者。例如在1875年,政府尝试以“信仰崇拜的公平和自由”为原则,平息伊斯兰教的一起内部纠纷;另外,1902—1903年间伊比(Epe)的穆斯林发生了派系争斗,总督为此请了一群拉各斯的穆斯林前来调停纠纷。这些活动很可能提高了总督的声望。<sup>[46]</sup>

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如果基督教学校能修改课程设置来适应穆斯林学生的需求,总督便同意予以资助;如若不然,总督就会改为资助穆斯林学校。作为对政府资助的回报,穆斯林帮助总督维持了国家的安定。卡特总督聘请拉各斯的首席阿匍帮助直接呼吁伊洛林的首长与英国达成和平,卡特也由此发现自己成为了穆斯林教内纠纷的协调人。虽然基督教传教士常埋怨政府对穆斯林“过于顺从”,但很清楚,英国的目标其实是要防止宗教诉求成为政治冲突的源头。<sup>[47]</sup>英国的战略是化解宗教矛盾而非支持宗教上的等级制度。这与英国对祖籍城邦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祖籍城邦差异问题上,英国人拼命煽风点火以树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可见,英国人有意识地使一种分歧政治化而又让另一种分歧不被政治化。

## 持续的难题

约鲁巴地区的殖民地结构使间接统治成为有效的控制策略。间接统治需要向政治上已然失势,但在社会上仍受尊重的领袖注入资源。这一策略强化了部族认同的差异又使得宗教认同非政治化。但为什么在政治独立后已经过了一代,尼日利亚的政治流动性也大为增强,约鲁巴地区也不再是统一的行政区而成为尼日利亚的一部分等诸

多变化之下,这一认同模式依然持续?霸权控制模型如何解释在霸权离开后原受控制地区社会分化现象依然持续?难道我们必须倚赖理性选择理论,相信这是因为交易成本太高?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已经间接提到过维持约鲁巴地区现有分化模式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因素,这里再铺陈一下。让我们先看物质方面的原因。现代尼日利亚国家的结构建立在卢嘉所确立的认同框架之上。那些互相进行战争的部落——伊博人对豪萨人、约鲁巴人对伊博人、少数派部族对地区性强势部族——都沿用间接统治所培养出来的族群标准。当约鲁巴地区政治加入联邦之后,政治家们发现,构建所谓“约鲁巴”利益的理念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将其表述为是基于约鲁巴之下的(sub-Yoruba)(也即祖籍城邦)利益基础之上的。独立后的尼日利亚政治仍然以地区划分为基础,因此帮助延续了原殖民地时代的以城邦王国为基础的分化模式。

再者,祖籍城邦仍能提供有价值的物品。它可以为从混乱地区逃难出来的约鲁巴人提供保护,还能提供土地。直到1978年《土地法》(Land Decree)的颁布使部分外邦人在曾经长期工作生活的地区有权要求购置土地之前,约鲁巴国王可以随意为镇上非原住民的子孙承诺土地。国王提供保护与土地的能力也帮助维持了祖籍城邦的政治意义。

另一个物质性因素是独立后尼日利亚的第一代政治精英的利益所在。约鲁巴族领袖阿沃洛瓦,最先提出约鲁巴地区选举策略的人,在本文写作时依然是当地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所有约鲁巴人视他为“伊杰布人”,所有尼日利亚人都认为他是“约鲁巴人”。他已年过七十,很多尼日利亚人都相信,如果他和比他年长的伊博族元老阿齐克韦谢幕之后,尼日利亚可能会出现改变政治联盟基础的新契机。那些在部族主义时代中取得权力的精英们,自然有利益动机继续维护

这种部族主义话语体系。<sup>[48]</sup>

最后,种族政治觉醒的比较理论认为,只要与霸权联盟的一方在经济上还没有衰落,从前处于劣势的集团不太可能将其潜在的敌意化为政治行动。<sup>[49]</sup>只有当约鲁巴人相对尼日利亚其他民族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衰落之时,才值得约鲁巴穆斯林向基督徒发起报复。也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重新调整其政治认同。

尽管这些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它们尚不能合理解释现存于约鲁巴地区的分化模式。考虑到新土地法的实施,阿沃洛瓦也已年迈,再加上尼日利亚因石油收入大幅下降致使财政紧缩而引发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等因素,如果只看到物质层面,就会令人预期不久的将来,约鲁巴地区可能会向宗教认同转变。

但在约鲁巴的土地上并没有穆斯林的政治运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意识形态因素与物质因素结合,一起来维持着殖民地时代的分化模式。约鲁巴各城镇已把旧有的宗教仪式改为本镇的宗教。拉各斯的精英们获邀请,回去朗诵那些过去只有传统精英才有权利诵唱的赞美诗,这些仪式也被定为公共的节假日。<sup>[50]</sup> 仪典活动维系着个体对祖籍城邦的认同,尽管这些城镇已不太可能向个体提供物质性资源。约鲁巴的词汇中出现了大量用于指代外镇居民的专用词语,这也延续了个人对祖籍城邦的认同。

但最重要的还是作为霸权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常识”观念的创造。祖籍城邦代表“血缘”而宗教代表着“选择”——这样一种观念已然深深镌刻于当地人的常识性思维当中,即使实际上的经历与这一观念相悖,也不容易使约鲁巴人从这一“真理”中省悟。殖民统治向约鲁巴人灌输了一种用于自我理解的常识性框架。该框架将祖籍城邦定位为不可变更的现实。理性选择论者正确地指出了改变一己之政治认同需要很高的交易成本,但他们未能掌握这些成本的性质。原始

纽带论者正确地点出了传统认同的强大力量,但他们无法理解原始认同的政治基础。霸权控制模型抓住了分化模式的物质基础,但在当前讨论的问题上,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看似还合理的解释,说明了原始认同怎样被政治塑造,以及一旦塑造成型之后,又如何变成了常识性的现实观念。

## 殖民地霸权控制的比较视角

本文对约鲁巴地区间接统治的讨论,所关注的是一种为原始纽带论和理性选择论所忽略的重要的社会性因素:霸权国家在塑造一种文化产物中所扮演的角色。殖民主义的不列颠的确是一种特殊的霸权国家,但像所有霸权国一样,英国也期望着有效的社会控制。对有效社会控制的需求,使英国殖民当局设法激励某些社会集团去影响和压制另一些集团。在一切国家,但尤其是在殖民地国家,向国家提出诉求的政治组织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行为作用的结果。尽管社会分层的模式可能是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变量的函数,但政治性分化模式最好是被理解为,主要是霸权国家政治控制策略的结果。

由于我们的讨论一直集中在单一案例上,在此有必要提一提霸权控制模型的广泛应用性。在为李普塞特与罗甘(两位学者提出的普遍性问题开启了本文的探讨)合编的著作所撰写的文章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殖民地统治精英都持有这样一个“重要信条”：“有意义的社会实体仍然是部族……借助这一对形势的传统界定,这些精英们希望通过其代理人即那些酋长的控制来维持自身的权威。”在殖民统治的环境之下,民族主义政党发现他们所面临的都是部族性权利诉求,而通过满足这种诉求,这些政党也发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sup>[51]</sup>沃勒斯坦的论证表明:(a)“部族”是一个便



于殖民当局施治的概念框架；(b)一旦选定,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一种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无法否认的现实的部族的存在性,便鲜活起来。勒马尔尚(Lemarchand)最近关于非洲地区国家建设的讨论也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殖民主义国家为实现社会控制而对非洲社会进行了重新分层。<sup>[52]</sup> 重塑非洲文化使得当地居民接受明显的永恒性的合法观,是殖民主义控制的基准策略。殖民当局对文化的重塑,是对短期内创造出政治秩序的军事镇压策略的补充,并帮助确立了长期的政治分化模式。霸权国家军事镇压与意识形态灌输双管齐下,以此来重新构造殖民地的社会结构。

本文对约鲁巴地区政治组织的案例研究,不仅与其他有关非洲殖民策略的研究相互印证,而且也与近期有关在以色列和印度的霸权控制的研究逻辑相洽。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20世纪印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的出现原因的扣人心弦且细致深邃的历史学争论。辩论双方——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与弗朗西斯·鲁滨逊(Francis Robinson)——均同意,正是因为16世纪末期阿克巴大帝(Emperor Akbar)为印度教徒制定的“平权措施”使得众多印度教徒可与时居统治阶层的穆斯林平起平坐,才使得19世纪早期的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没有显著的社会或政治分化。正如鲁滨逊指出:“穆斯林之间除了宗教信仰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而印度教徒之间则连信仰方面都是五花八门的。很多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相似之处可能比其同宗教人士之间更多。19世纪末期[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即今天印度北部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唯一值得重视的政治联系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的地主和政府公务员们所持有的共同世界观和利益基础。”布拉斯并不反对这一看法,而且他寻求找到一种理论来“揭示那些原本就存在的、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区别开来的差异,怎样被强调、传播和演绎,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整个

过程”。<sup>[53]</sup>

布拉斯的答案与前述理性选择模型一致。他指出,20世纪初印度穆斯林的社会流动的速度比印度教徒要快,但这一现象只是使穆斯林不安地发觉,联合省中印度教徒在人数上的优势——这成为宗教冲突的温床——将会使得当前所提出的选举模式仍然有利于印度教徒。明显感觉到政治地位被削弱的穆斯林精英,转而向英国提出要求。他们引用孟加拉的数据——那里的穆斯林在社会发展中事实上受到了相对剥夺,要求在整个印度范围内给予穆斯林以优惠待遇。他们要求在国会中拥有固定数目的议席以保障自己的特权。这些行为诱发了印度教精英的创造性反应,后者成功动员起印度教信徒参与政治行动。提倡使用印度语的运动[该运动有意区别印度语和乌尔都语(Urdu)——由于两种语言除了部分词汇与表音有所不同之外基本一样,因此这是一项极不容易的任务]出现的部分原因,是印度教徒精英为政治行动而创造出一种印度教意识的策略性反应。任何一方的精英所能操纵的用以将自身的共同体与另一方区分开来的意象工具越多,其取得政治胜利的机会就越大。这种政治对弈如滚雪球般无情地膨胀。布拉斯总结说,在印度对权力的理性追求导致了非理性的种族大屠杀。

无论布拉斯的文笔有多么优美,但他未能解释为何乐于兜售宗教意象的政治领袖在数量上要多于选用其他方式来划分人群的政治活动家?或者,即使试图用不同选项来动员选民的政治活动家人数相等,为什么宗教领袖在团结支持者方面远比其他入成功?为回答这些问题,鲁滨逊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英帝国身上。英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熟悉印度社会民情,正是他们为日后的政治动员设定了“背景条件”。鲁滨逊认为:“英国人坚持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话语来讨论印度的政治与社会……他们从刚接触印度社会时就开始这样做……宗教分

歧是最显著和最容易理解的,所以它们也最容易被那些希望描述社会和政治的人所采用。”<sup>[54]</sup>因此,虽然有着大量相反的事实证据,1857年兵变(The Mutiny of 1857)仍然被视作穆斯林策划的一场阴谋。按照穆斯林—印度教徒的划分对印度政治所做的重新诠释,使英国官员也只接受依据这类认同提出的政治诉求,从而激发出高擎这种诉求的政治活动家。在印度人对宗教的情感认同问题上,英国人并没有完全估计错误,因而这类政治领袖也十分地成功。英国请求穆斯林“帮助政府进行统治,回报则是政府会考虑他们的利益”,<sup>[55]</sup>这种行为在结构上与英国政府在约鲁巴地区借助奥约人进行统治的行为如出一辙。不论是在印度或是在约鲁巴,殖民主义霸权能够使一种并不充分为当地社会结构所支持的特定的分化模式逐步具有一种真实感和客观性。

在以色列控制阿拉伯人口的策略上,我们也能观察到霸权国家塑造某种文化并使之具象化的情形。伊恩·勒斯迪克(Ian Lustick)详细地记述了以色列政府为减少对可能从事颠覆活动的阿拉伯人进行社会控制的成本而推出的一系列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重新激活了阿拉伯社会结构中的一些已经失效的认同类型,用以“分割”这一被管治的群体;然后,他们通过“招安”措施来争取新塑造出的“原始”领袖的支持。对于这种霸权策略,以色列人似乎比起在尼日利亚或印度的英国人更加自觉。他们似乎明白,有必要给那些仍然拥有合法性却已丧失维持权威所需资源的阿拉伯精英分子重新创造出部分权力。通过让“传统”精英拥有强制力所需之资源,以色列人赢得了这些人的效忠,并让这些人自己站在了更为激进的反对派精英阶层的对立面。<sup>[56]</sup>

当然,英国在约鲁巴地区和印度的行动与以色列应对阿拉伯裔公民的策略所体现出的统治形态,并非国家寻求霸权控制之理性策略的唯一样板。譬如法国便采取不同的政治控制策略,导致后殖民国家的



政治分化出现截然不同的后果。法国殖民地官员没有使“祖传”权威结构重新具象化,与之相反,他们笼络那些接受法国认同的地方领袖。与英国相比,法国并不倾向把他们自己设计出的种族谱系强加于非洲属国,因此在前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地区,“部族”群体间的制度化冲突并不明显。<sup>[57]</sup>

另外,本文所讨论的霸权国家之策略没有假设霸权统治者觉察其支配力量。英国官员并不欣赏其母国的霸权地位。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们的统治孤注一掷。再者,即使是卢嘉爵士,英国的非洲殖民战略的最有识见和最老练的设计者,也不认为祖籍城邦是一种日渐衰退的社会分化源泉;他本人也并不认为,如果策略性的予以支持,这种社会分化模式会被重新具象化并由此实现政治均衡。他持有一种国家进化论观点,认为像约鲁巴这样的低文明化地区,“部族”是唯一可被合法化的群体。在卢嘉看来,通过宗教精英统治的前提是殖民地的发展程度更高。<sup>[58]</sup>因此,尽管英国官员没有意识到其选择的后果,这种“统治”还是记录下了英国殖民者的行为。

## 总 结

本文的核心是霸权控制模型,目的是为了了解约鲁巴社会中的宗教分化未被政治化的原因。该模型证明,一个有志于在弱国中建立秩序的外来强权,会乐于从该社会中挑选出一批具有高度合法性但行使权力的资源却日渐枯竭的精英分子。随后该霸权会支持那些精英扩张其势力和控制权,同时借助笼络策略牵制住精英自身。[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该策略不是一种“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政策,而是一种“分化再重组,以使其可以通过强势而合法的精英进行统治”的策略。]从这一角度观察这些现象,便可发现原始因素重新具象化(reifi-



ation)的力量。但只有在该社会象征体系中的确存在着支撑某种分化模式的基础,该战略才能获得成功。为那些虽然穷困,但尚有合法性的政治精英重新注入实施强制力的资源之后,霸权统治者便可以安心地“搭便车”了。那些试图挑战霸权的势力此时便不得不面对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打破其社会普遍认为乃属明显及永久合法的事物之合法性。霸权国家可以低成本买得短期的控制,同时又通过使传统文化重新具象化,并确保该传统文化嵌入到该社会的价值网络(a web of significance)之中(无论是霸权自己或是受控制的社会都很难逃离该网络),构筑起一种长期性的政治分化模式。

约鲁巴案例(连带印度和以色列案例的旁证)说明,殖民地官员运用其权力在他们所控制的社会中构造分化等级。在约鲁巴地区,影响目前尼日利亚国家中的社会性能量输入<sup>①</sup>模式,并不是生理纽带或理性群体算计的结果。它更多的是殖民主义国家操控资源,并培植起一种将祖籍城邦视作真实事物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由某个强权行政机器所进行的资源操控与意识形态灌输,就是霸权的定义性特征。

李普塞特和罗甘在其编著(本文开始时曾有引用)中指出,当代欧洲国家中的政治分化模式,是初步选举时代之时的主导性社会分化的产物。早期的竞选联盟被制度化,随后被政治体制永久化。<sup>[59]</sup>但在约鲁巴的案例中,要坚持祖籍城邦认同已被制度化的主张,首先需要追问制度化的根源从哪儿来。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化的模式,等于盲从地接受政治上的社会中心论。在这种社会中心主义的视角下,政治分化被视为社会性集团理性追求战略的结果。但本文的案例清晰地证明了国家行为对塑造一个社会中的长期性社会分化的重要作用。

---

<sup>①</sup> Societal inputs:指当前社会政治中参与的各种力量及其参与的结构模式。这些力量属于政治过程的输入端因素;因此本文翻译为“社会性能量因素”。——译注

我已经向诸位论证了在殖民地国家中,国家机器如何能够构造社会文化的分化等级。对于殖民后时代的社会性能量输入来说,原霸权国家对其性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注 释

本文的较早版本于1982年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年会上发表,该年会举办于1982年9月2—5日。作者在此衷心地感谢阿西瓦茹(A. I. Asiwaju)、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彼得·考黑(Peter Cowhey)、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玛丽·卡岑斯坦(Mary Katzenstein)、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伊恩·勒斯迪克(Ian Lustick)、安东尼·奥野沃(Anthony Oyewole),以及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等提供的宝贵意见。本研究由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提供资助。

[1] 参看 Seymour M.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 6。

[2] David Laitin, "Convers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A Study of (Anglica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among the Yorubas in Ile-Ife,"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Yearbook*, ed. M. J. Aronoff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82).

[3] Edward Shils,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1957): 130 - 145 and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ed. C. Geertz,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3), pp. 105 - 157.

[4] 请看 M. C. Young, *Politics in the Congo*(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特别是有关班加拉人(Bangala)的讨论, pp. 242 - 246; Robert Bates, "Ethnic Compet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6(4) (1974): 457 - 484; Nelson Kasfir, "Explaining Ethn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orld Politics* 31(3) (1979): 365 - 388; Abner Cohen,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and Joseph Gus-

fiel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 an Interactionist View of Soci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Attitudes and Modern Styles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ed. J. D. Legge, (Melborne: Angus & Robertson, 1973), pp. 83 - 104.

[5] 有关葛兰西作品的翻译,我采用这一版的合编卷本: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我所参考的其他著作还包括:Peter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November 1976 - January 1977): 5 - 80; 与 Walter L. Adamson, *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ntonio 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有关“霸权”之定义,我推荐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 6. 我也参考了 David Kertzer, "Gramsci's Concept of Hegemony: The Italian Church-Communist Struggl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4) (1979): 321 - 328. 有关文化的具象化(reification of culture)这一理念,我综合了以下著作:Marshall Sahlins,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和 Andrew Feenberg, *Lukacs, Marx and the Sources of Critical Theory* (Oxford: Robertsion, 1981), 特别是 p. 157.

[6] 我是根据以下颇具争议的文章而做出这一判断的:Robin Horton, "Ancient Ife: A Reassessment" (University of Ife, Spring 1976)。

[7] 有关伊巴丹崛起的精辟研究请参考: Bolanle Awe, "The Rise of Ibadan as a Yoruba Power, 1851—1893" (Ph. D. diss., Oxford University, 1965)。

[8] J. F. Kopytoff, *A Preface to Modern Nigeri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该书详细讨论了被再俘虏的人们的角色。参见 B. Weinstein, "Language Strategists: Redefining Political Frontiers on the Basis of Linguistic Choices," *World Politics* 31(3) (1979): 345 - 364, 探讨约鲁巴语圣经翻译的影响。

[9] 有关祖籍城邦的当代角色之讨论,可参考 Akin Mabogunje and J. D. Omer-Cooper, *Owu in Yoruba Histor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83。

[10] P. C. Lloyd, *Power and In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p. 121; 也可参考 O. Awolowo, *Aw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其中有关于阿沃洛瓦一家怎样利用其乡村作为避难所的精彩讨论。J. S. Eades, in *The Yoruba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63, 提供较近期的例子。

[11] Lloyd, *Power and Independence*, pp. 141, 169.

[12] 关于拉各斯, 参考 G. O. Gbadamosi, "The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Education among Muslims in Nigeria, 1896 - 1926,"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4(1) (1967). 梵登·特里森给我提供了他所研究的伊莱-伊费的部分资料。可惜我没有看到完整的样本。所有数据的完整讨论可参考: I. H. Vanden Driesen, "Patterns of Land Holding and Land Distribution in the Ife Division of Western Nigeria," *Africa (London)*, 41(1) (1971): 42 - 53。

[13] A. B. Fafunw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Nigeria* (London: Allen & Unwin, 1974), p. 72; 也可参考 Pierre Van den Berghe, *Power and Privilege at an Afric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73)。

[14] Richard 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85. 关于伊杰布基督徒和穆斯林表现之差异, 可参考 D. Aronson, "Cultural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the Modern Ijebu Yorub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0)。

[15] 引自梵登·特里森有关土地所有权情况的资料(见注释 12)。也可参考 C. E. F. Beer, *The Politics of Peasant Groups in Western Nigeria*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and S. S. Berry, "Christianity and the Rise of Cocoa-Growing in Ibadan and Ondo,"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4(3) (1968)。

[16] 利用这些资料, 我对约鲁巴穆斯林受访者和基督徒受访者进行了比较。莫里逊也调查过约鲁巴的天主教徒和“独立派基督徒”(Independent Christian)。就算我把这两派再加上新教徒一起考虑, 最后的结果也应该不会有显著差异。在此我要感谢莫里逊教授慷慨提供这些资料。

[17] 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pp. 248 - 249; David Laitin, "The Sharia Debate and the Origins of Nigeria's Second Republic,"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0



(September 1982).

[18] O. Oyediran, "Political Change in a Nigerian Urban Communit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71).

[19] 这传统解释的来源是参见经典之作: Samuel Johnson, *The History of the Yoruba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1), p. 194; 玛杰里·波海姆所写的传记也有描述: Margery Perham, *Lugard* (Hamden, Conn.: Archon, 1968), vol. 2, p. 439。

[20] 参见 Robin Law, *The Oyo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1977), pp. 255 - 258; R. A. Adeleye, *Power and Diplomacy in Northern Nigeria, 1804—1906: The Sokoto Caliphate and Its Enemies* (London: Longman, 1971), pp. 35 - 37; and Johnson, *History of the Yorubas*, p. 194。

[21] David Abernethy, *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Popular Educ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53 - 154.

[22] 有关伊洛林的宗教冲突与团结的精彩故事无法在此复述。有关这个城市的发展之历程可看: C. S. Whitaker, Jr., *The Politics of Tradi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orthern Nigeri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ap. 3。

[23] 有关阿德拉布, 请看 K. W. J. Post and George D. Jenkins, *The Price of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关于1958年和1959年情况, 请看 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p. 251。对伊斯兰法律之讨论, 请参看 Laitin, "The Sharia Debate"。

[24] *West Africa* (London), August 22, 1983, pp. 1927—1928.

[25] A. I. Asiwaju,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Oral Historical Traditions in Africa: The Case of Yoruba Crowns, 1900—1960," *Africa* (London), 46(2) (1976): 113 - 127。关于对“传统”的工具性管理的极佳范例, 请看 T. Chappel, "The Yoruba Cult of Twi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frica* (London), 44(3) (1974): 250 - 265。明显地, 内战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 导致约鲁巴人接受一种新的宗教崇拜——该信仰拒绝“传统”宗教视双生儿为不正常的看法, 改为将之视为恩赐的象征。

[26] Myron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Mary F. Katzenstein, *Ethnicity and Equality: The Shiv Sena Party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Bomba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Paul Brass, "Class, Ethnic Group, and Party in Indian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3(3) (1981): 449 - 467.

[27] 有效政治活动的组织成本在奥尔森的经典文献有全面讨论,参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8] Paul Brass, *Languag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North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 1.

[29] 要了解一系列的假定,请参考: Robert Melson and Howard Wolp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 (1970): 1112—1130; Alvin Rabushka and Kenneth Shepsle,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Columbus, Ohio: Merrill, 1972); and Ronald Rogowski,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a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Cleavage"(还未出版的原稿,1980年9月)。

[30] Stanley Hoffma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ed. J. S. Ny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pp. 200 - 201.

[31] Robert Bates, "Modernization, Ethnic Competiti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Ethnicity, State Coherence, and Public Policy: African Dilemmas*, ed. Victor Olorunsola and Donald Rothchil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32] Brian Berry,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in *Politics and Language: Spanish and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D. J. R. Bruck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Policy Study, 1978), p. 46.

[33] 我要向我的同事塞缪尔·波普金 (Samuel Popkin) 感恩,因他教导我尊重这一方法,并当我尝试反驳时耐心聆听。请看其著作 Samue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259 – 266. 关于“奥尔森”难题请参考 Olson,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34] Morrison, 注 16。

[35] “The Problem with 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Critiqu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rth/Thomas Model of Pre – 1500 Europ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8(1981): 174 – 197. 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J. Field)认为,由于认识论上的问题,人们根本无法采用经济变量对政治结果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对这一看法不置可否,但罗伯特·贝茨帮助我看到微观经济学还是能够对霸权控制模型做出一定的补充的。

[36] 该理论在以下著作中有所阐释: Frederick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1922), chaps. 10 and 11。

[37] 参看 Murray Last, *The Sokoto Caliphate* (London: Longman, 1967), 但阿黛尔却没有在尼日利亚北部发现学界传统认为的明显的等级划分现象,参见 Adel-eye, *Power and Diplomacy*。

[38] 参见 A. E. Afigbo, *The Warrant Chiefs* (London: Longman, 1972)。

[39] J. A. Atanda, *The New Oyo Empire* (London: Longman, 1973)。

[40] Johnson, *History of Yorubas*, p. 574.

[41] 同上,第 584 页。

[42] Atanda, *The New Oyo Empire*, pp. 101 – 102.

[43] 同上,第 118 页。

[44] 同上,第 203 页。

[45] 同上,第 258 页;也可参见 Post and Jenkins, *Price of Liberty*, p. 22。

[46] T. G. O. Gbadamosi, *The Growth of Islam among the Yoruba* (Atlantic Highlands, N. J. : Humanities Press, 1978), pp. 161 – 163。

[47] 同上, pp. 164 – 177, 215 – 216, app. III。

[48] 这是 Olatunde J. B. Ojo 的论据,“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and Ethnicity on the Nigerian Elections of 1979,” *Africa Today* 28(1) (1981): 47 – 58。

[49] Peter Gourevitch, “The Reemergence of ‘Peripheral Nationalisms’: Some

Comparative Speculation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July 1979): 295 - 314.

[50] 例子请看: W. B. Schwab, "The Growth and Conflicts of Religion in a Modern Yoruba Community," *Zaire* 6(8) (1952): 829 - 835. 施瓦伯观察到在尼日利亚独立前八年时,传统的仪式形式就已出现世俗化因素,因此真正希望寻找“现实的”传统的是涂尔干学派的人类学家而非施瓦伯,该派的人类学家因此重点关注那些最不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人们的行为。比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就在其经典著作中高调地否认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参见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通过我对约鲁巴节日庆典的观察,与施瓦伯一样,我被高级官员的角色所震撼,他们从拉各斯前来参加庆典,并为他们的国王高声朗诵“传统的”赞美诗。

[51] Immanuel Wallerstein, "Class, Tribe, and Party in West African Politics,"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ed. Lipset and Rokkan, pp. 501 - 502, 509.

[52] René Lemarchand,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Africa," in *Ethnicity, State Coherence, and Public Policy*, ed. Olorunsola and Rothchild.

[53] Francis Robinson, *Separatism among Indian Musli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3; Brass, *Language, Religion and Politics*, p. 124.

[54] Robinson, *Separatism*, p. 99.

[55] Francis Robinson, "Nation Formation: The Brass Thesis and Muslim Separatism,"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15(3) (1977): 226. 留意布拉斯的回应。辩论在以下著作中延续: David Taylor and Malcolm Yapp, eds.,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 Asia* (London: Curzon Press, 1979)。

[56] Ian Lustick, *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 A Study in the Control of a Minority Popula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57] 关于英法两国的西非策略的最审慎的比较,可在以下著作中了解: A. I. Asiwaju, *Western Yorubaland under European Rule, 1889 - 1945*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6). 摩洛哥潜在的阿拉伯 - 柏柏尔人 (Arab-Berber) 分化的非政治化现象与法国的殖民策略有关: Ernest Gellner and Charles Micaud, eds., *Arabs*



*and Berbers*( Lexington, Mass. : Heath, 1972) 。

[58] Lugard, *Dual Mandate*, chap. 4.

[59] Lipset and Rokka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苏珊娜·伯杰有关法国政治中政教分离原则的永久化过程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李普塞特和罗甘的观点。参见 Suzanne Berger, in *The French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p. 65 - 68。

# 十 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国家 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力量

艾尔弗雷德·斯特潘

分析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从来都不像其在北美地区的地位那么不可动摇。描述社会的“有机国家”(organic statist)模型——假设国家扮演着核心的和相对自主的角色——的普遍流行,深刻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家。<sup>[1]</sup>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对国家的关注日益强烈。随着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民粹主义议会制政治制度的相继没落,有关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社会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型在学界的公信力也土崩瓦解。<sup>[2]</sup>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即工业化的进程必然会催生出自由民主政体,也已被新的见解所取代;新观念认为国家机器是压制被统治阶级和对工业发展过程重新定位的重要工具。吉勒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关于官僚威权政体(BA regimes)的开山之作便是这种新兴关注的最佳例证。<sup>[3]</sup>官僚威权政体总是与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化进程(如巴西的案例)紧密相关(虽然威权政体并不必然是工业化的原因)。这种政权充分显示出在分化、裂解以及禁止潜在的反对群体方面的高效性。在官僚威权政体的起步阶段,公民社会日渐丧失产生进行政治与经济创新的能力,而国家的力量却在不断增

强。因此,对在国家机器内部运作的集团之行动与创新的分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焦点。例如,就我的研究来说,我重点关注作为一种制度组织<sup>①</sup>(institution)的军队:首先关注导致军队担当政府之责的各种因素,其次关心军队在履行政府职责的同时维持其作为一种“制度组织”的一致性(coherence)而产生的矛盾。<sup>[4]</sup>

8 官僚威权政体至今仍在,不过,假若说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南锥体地区<sup>②</sup>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议会民主制的黄金时代的终结,那么80年代似乎要证明官僚威权政体的“穷途末路”。目前<sup>③</sup>南锥体的这些政权既无力招架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经济环境,又备受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困扰。他们的困境又重新激发了学界对威权政体下的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兴趣。在这一议题框架中,国家自身、国家的控制者的目标、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继续进行镇压和经济转型的能力等诸多方面,仍然极为重要。然而,与此同时,只要社会内部还有创新机会,进行变革的创新动力就不断地从公民社会中涌将出来。研究者们为此必须更严肃地考虑政治反对派在国家未来战略塑造中的作用。同样地,学者们还需要认真考察国家结构和战略对政治反对派的行动选项与策略的影响途径。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力量之间的消长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从最抽象的层次来看,这种消长关系共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关系,学界已有所分析:国家权力的增

---

① Institution 一词通常译为制度(抽象意义),但本文强调的是一种组织的形态(具体),强调组织内部结构严密、凝聚力强的特征,因此这里勉强翻译为“制度组织”,读者可以将其揣摩成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制度)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两方面因素的形式化的实体。——译注

② The southern cone:又称南方共同市场,20世纪90年代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四国组成,联系国包括智利和玻利维亚。——译注

③ 本书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译注

长伴随着公民社会力量的衰弱,二者成零和模式。其次,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权力关系也可以是正和的双赢关系。再者,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还可能是两败俱伤:国家控制政治产出的能力减退,而反对派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也大为减弱。当然,最后还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国家机器内部的行为主体的权力江河日下,而国家机器外部的行动者的力量却如日中天。

本章通过研究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四个国家——即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我将探索国家与公民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情况。作为一个群体,这四个国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在1960—1970年间,四个国家分别引入了更具渗透力的新型威权统治体制。四国新威权主义,建立于较长时期的广泛而艰难的工业化进程之后,当时各国内部的阶级冲突日益严重。在每个国家,资产阶级为新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社会基础;新政权的第一个政治行动便是国家利用强制机器(在组织上属军队范畴)拆解和清除各种工人阶级组织。四个国家都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来重新构造资本主义,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因国而异。

一开始,四国的公民社会组织都备受摧残,而国家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却不断提升;但随后在四国中的威权主义国家与民间机构之关系的历史演变却呈现巨大差别。<sup>[5]</sup>我们只在巴西看到了短暂的双赢时期:公民社会重组其制度组织而国家继续增加其权力。在智利,直到八年的威权统治时期过去,期间都没有出现重要的社会运动;尽管近来国家的相对权力也有所削弱,但公民社会相对于强势国家而言依然羸弱不堪。在乌拉圭,经过初期的发展之后,国家和公民社会实现目标的能力都不再增强,双方力量对比进入停滞时期。最后,阿根廷在1979—1981年间走向一种负和关系的互动状态,公民社会与国家双方都元气大伤。只有到马尔维纳斯群岛(Malvinas)战败之后,民间机



构才重新抬头,随后军人政权的权力开始急剧衰退。

本文的目的并非要为上述每一个官僚威权政体提供一个全面而均衡的比较历史研究,所以我并没有观察各官僚威权政体在“可比较的”时刻的表现。相反,我刻意留心了四个国家中的民主反对派与各自国家中极为不同的官僚威权政权联盟进行斗争时所面临的困境的不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希望能够就国家机器的性质差异与和公民社会的结构区别,导致各国结局之不同的作用路径,提供一些有启发性的、丰富的建议。

通过对这四个有着重要的共同特征的威权主义国家的分析,我还希望能够证明出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是怎样地高度不稳定和容易受到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例如,到底国家的资产阶级盟友愿意以雾月姿态<sup>[6]</sup>放弃多少直接的政治(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控制以便换得防卫性保护?既然强制力是诸如官僚威权政体这样的排斥型威权主义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行政首脑、国防三军与主要的情报机构三种力量之间,某些类型的重合或分裂会增强或是降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其作用过程又是怎样的?上述国家机器组成成分内部的斗争又为何会为反对派创造出活动空间,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既然官僚主义的程序与规章是国家控制公民社会的重要手段,那么为特定的国家目的而设立的某些程序和规章,是否也会促进公民社会中出现的新的集体行动和权力创造模式?

### 国家权力增长和公民社会的衰微:

#### 1973—1981 年间的智利

从1973年到1981年,四个南锥体国家中只有智利一个,出现国家权力提升而公民社会力量下降的情况。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由几个

相关因素造成的。首先,在威权主义政权上台之前存在的激烈阶级冲突,令新政权的“计划”较容易取得中高阶层的认同。同样重要的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反抗势力可能重整旗鼓的恐惧,帮助维持了国家机器本身的内部凝聚力。国家“计划”的性质也同样关键。通过集中精力关注控制问题,并审慎设计经济转型政策,以保证其主要结果是强化国家控制,智利政府成功地提升了自己相对于公民社会的权力。

对任何政权,尤其是官僚威权政体来说,领导政权自身的政治盟友的能力,既取决于该政权所拥有的“防御型”和“进攻型”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潜在的盟友觉得有可能利用该计划来保护并扩大自身的利益,又取决于执行这些项目的威权力量。因为强制力是政权力量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镇压机器的内部组织凝聚力的程度也是关键性变量。在从1973年到1981年几乎整个时段中,智利政府在以上各方面都十分强势。

在智利,控制着国家的社会与制度化集团,成功地使他们的潜在盟友相信他们有一项生死攸关的“防卫”计划[对马克思主义左派势力及其“克伦斯基式”(Kerenskyite)基督教民主主义形式的持续镇压]。他们也让盟友相信他们有一项“进攻型”的根本大计,如果该计划能在世纪之交全面推行,将会重构智利的资本主义与公民社会,从而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该经济体制将能经得起重新引入一定程度的代议制政府这一特征的考验。<sup>[7]</sup> 这项“激进的”自由经济计划包括重新修订宪法,以赋予国家机器有回溯效力的紧急权力来压制公民社会和推进该游戏中的经济规则。由1973年到1981年,在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Pinochet)的领导下,智利国家机器的经济部门和强制力核心集团均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高度的内部团结,而皮诺切特将军也有着超强的能力,能融合权力集团中的不同派系。

1980年9月,皮诺切特将军发起了一次全民公决来批准一部高

度威权主义的宪法,投票的结果充分显示了该政权领导盟友的能力。新宪法为皮诺切特将军开启了一个长达八年的“宪政”任期,时间是从1981年至1989年,并且只需要极其简单的程序便可使其任期再续八年。

8月10日宣布将举行全民公决,9月10日便开始投票。在消息公布后的两周内,智利的二十多个主要生产商集团几乎全都积极自费在《信使报》(*El Mercurio*)上刊登声明,呼吁投赞成票批准修改宪法。而大多数主要的反对集团则呼吁民众投反对票,这些声明也都刊登在《信使报》上。

对投票前30天内的报纸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没有一个生产商集团呼吁投反对票,就连投附加条件的赞成票的提法也没有。生产商集团的声明所用的语言,通篇都大谈政权必须负责的防御型和进攻型任务。大多数声明都指称1973年的局势就过于混乱和危险,并表示若大家都投反对票,最后的结果将是重新回到那种混乱的状态。几乎所有声明均辩称,国家的社会与经济计划是对1973年前的状况进行的结构性的改革,因此需要一个较长的特殊统治期,以便让政府的这种改革不可逆转。在这场全民公决的战役中,公民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右翼团体,尤其是妇女组织和职业协会,重新动员起自己的追随者。在投票前所做的盖洛普民意(Gallup Polls)调查显示,在对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的七个等级的满意度中,百分之百的上层阶级(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只有45%)选择了前三等级的满意程度。上层阶级的恐惧感也是同样的高。智利盖洛普调查中心(Gallup Poll of Chile)发放了一份多选性问卷表,调查如果新宪法最终未获通过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显示58.8%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这一比例只有33.2%)表示最坏的结局就是“回到1973年”。<sup>[8]</sup>

资产阶级上层持续的恐惧感,是资产阶级愿意接受会损害上层阶

级自身利益的个别政策(如当时关税的急剧下降和消费者购买力的衰减导致很多本地企业破产)的重要原因,他们视这些政策为保护其整体利益的必要代价。如果不考虑这种恐惧感,便不可能理解智利资产阶级中工业部门的被动性(这种被动,自然增强了国家的政策自主性)。

资产阶级上层愿意为了促进自身利益而放弃部分独立的政治工具的重要证明,是1973年传统政党民族党(*Partido Nacional*)的解散。在几乎十年的时间内,资产阶级上层没有创建任何政党机器。在全民公决的宣传期间,对保守的民族党前主席的一次访问就强调了这种“雾月十八性质”(Eighteenth Brumaire)——即对威权国家让权。当有记者问到,如何看待有关方面所承受的权力损失时,这位民族党的前主席回答说:“我毫不后悔,既不为没有政党后悔,也不为过去七年没有国会后悔;因为我相信,不这样做,就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社会……我们还处在战争状态,战时你能够做的只有保卫自己……我单纯地相信,在这迈向现代国家的整个时期中,智利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政府。”<sup>[9]</sup>

让我们直接转到公民社会中反对集团采取一致行动的潜力这一问题上来。很显然,这种潜力部分地与国家机器的内部团结性、国家机器从其公民社会中的盟友处所争取到的支持程度,以及国家能够且愿意对反对集团施加强制力的程度等因素相关。就智利来说,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在1973—1981年间,所有这些方面都让反对派的一致行动困难重重。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反对派内部在意识形态、阶级和党派方面的紧张程度。在智利,我们所研究的时间段内,这些方面都存在着高度的张力。政党性反对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党以及共产党。在民主时代的智利,程度



最严重的政党分化发生在1964年与1970年的全国选举,以及1973年的国会选举当中。在这三场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为一方,社会主义党与共产党是另一方。在此次公民投票运动开始之初,三党都站到了非正式的反党派阵线上,但过去党派冲突的历史和这些政党之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分歧,都使得一致行动举步维艰。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基督教民主党的部分基层党员,因为惧怕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后果,拒绝支持他们的政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弗雷本人此时还备受谴责,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人背叛了党派间的非正式谅解原则。结果,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好处,因而对牺牲意识形态来与基督教民主党合作一事不再抱有幻想。<sup>[10]</sup>

第二个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派一致对抗国家的能力之影响。智利的“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from above)计划(尤其在1978年至1981年的繁荣时期)是高度镇压型国家所施行的自由主义经济的一种极端形式。关税一律降为10%,使得“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丧失了免受进口制成品挑战的保护伞。如此急促降低关税的结果之一,是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大幅缩减。<sup>[11]</sup>潜在的反对集团在公民社会中的这一十分重要的舞台上的结构性基础就这样被削弱了。

此外,除了初期阶段国家利用直接镇压来控制工人阶级集体之外,1978年之后还出现更为高明的尝试:政府利用政策诱导现有的和潜在的反对集团发生结构性分化。这些政策都反映了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作者]和诸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的、“公共选择”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念。<sup>[12]</sup>事实上,长期以来学界把该威权主义政权的理

论家们标记为“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这一做法忽略了理论、历史和政治上重要的细微差别。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全盛时期是在1973年到1978年间。而在1979年至1981年间,最有影响力的是“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的政治经济学家[布坎南、塔洛克,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布鲁纳(Brunner)]。<sup>[13]</sup>弗吉尼亚学派的研究重点并非市场的一般性理论。他们关注的是国家的“市场化”,即把国家当成一个企业,并把公民社会简化为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市场。但在实践当中,“圣地亚哥弟子”(Santiago Boys)<sup>①</sup>又超越了弗吉尼亚学派。他们代表着世界右翼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因为他们利用了自身在国家机器中的特权地位,设计并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先瓦解进而再按照其激进的市场观来重构智利的公民社会。

皮诺切特的圣地亚哥不会跑到华盛顿、伦敦或者芝加哥。但里根(Reagan)的华盛顿、撒切尔(Thatcher)的伦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倒会前往圣地亚哥去参看未来。在社会保障领域,朝圣者构想着有多个私人企业,每个企业宣传着略有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在实际上会接管社会保障领域中公共部门的资源与角色。这一构想的设计者对于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目标十分清晰:如果设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比例,国家就相当于向公民社会中的各个集团提供了系统性激励,使他们动员集体成员来对抗国家。该构想的意图就是要消灭这种激励。<sup>[14]</sup>

1979年出台的新工会法也有类似目的。据起草者声称,该法案的本意是全面贯彻市场和个人选择原则,从而“自动创造出不带政治色彩的奖励和社会结构”。<sup>[15]</sup>因此,任何群体组建工会和参与谈判的权利只限于工厂层次;理论上,冲突应由劳资双方自行解决,而不需国

---

① 圣地亚哥是智利的金融区,这里用“圣地亚哥弟子”来指代这一金融区的操控者。——译注

家介入。当然,如果市场是在国家禁止工厂停工、禁止进行全行业谈判或者禁止工会领袖在政党中扮演积极角色等背景下运作,那么工会根本不可能离开国家独立生存。不过,通过分化各种工会群体、通过把大部分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职能让渡给私人部门,以及向工会和职业协会强加“自由选择的反垄断规则”,皮诺切特的国家机器向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派的组织潜力发动了大范围的攻击。

假如我们对国家的关注主要在于其在经济中的份额,那么智利政府可以说是萎缩了。在1973年至1981年间皮诺切特统治之下,国有企业角色的转变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这方面智利与巴西呈鲜明对比;在巴西的官僚威权政体中国有企业的角色急剧膨胀,而在智利则几乎是同等程度的急剧萎缩。到1981年,智利国有企业从原来的大约500家减少到不足20家。但假如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与强制合作的能力,智利的“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政策,催生的是一个专门控制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派的“小政府、强国家”的模式。<sup>[16]</sup>

这一时期智利的国家掌控者所信奉的理论可作如下表述。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某些经济结果是无法经由市场运作“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如果国家放任这一部分经济事务,就有可能增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能力。有人甚至可能会认为,智利国家代表着对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的一种超越。在典型的波拿巴式交易中,资产阶级用统治权交换追求利润的权利;而智利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则不仅放弃了统治权,还为了维持长远的阶级特权而认可了在短期内严重损害其赢利权的政策。这种情形并不罕见。譬如,在巴西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初期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当时巴西的资产阶级就经受了经济困难的折磨。智利案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国家竟然能够将这一政策坚持了近乎十年之久。

因此,智利案例启发我们思考的是:当国家欲实施某项与本地的资本积累在客观上相矛盾的计划时,它能寻获支持的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如果它想维持多久就能维持多久,这将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理论的强力挑战。但即使在智利这样的极端情况下,似乎也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应当注意,圣地亚哥弟子模式下出现的首次重大经济危机发生在1981年11月;当时,三家重要银行濒临破产,智利政府违背自己的政策模式,出手拯救并监禁了有关官员。市场的“自然”运作不单损害工人阶级,也可能影响资产阶级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依附型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如此。<sup>[17]</sup>尽管如此,智利政权在“不理睬民族资产阶级”一事上确实是相当成功的。<sup>[18]</sup>

显然,芝加哥、圣地亚哥和弗吉尼亚三大学派的“进攻型”根本大计,在1981年11月后逐渐瓦解,反对派的活动范围和强度也日益增加。可是,在1982—1983年危机期间,智利的国家机器依然相对强势;原因有三点。其一是皮诺切特对陆海空三军和情报机关事实上的统一指挥。其他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没有一个能像智利那样,由一个强人总统遥控全部的强制力机器。其二是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部门,即使不再相信威权国家的“进攻型”计划,甚至不再信任皮诺切特本人,却依然对左派深感畏惧而不愿接近民主反对派,因而默许了强制机器的防御型措施。<sup>[19]</sup>第三个原因是活跃的反派内部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分歧比巴西、阿根廷或乌拉圭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 权力对比的停滞与僵持:1978—1981年 的乌拉圭

乌拉圭在威权主义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权力关系上,展现非常不一 32



样的系统。历史学家把官僚威权政权在乌拉圭的确立时间锁定在1973年6月的国会关闭这一事件上。然而,这一事件只不过是长期行政统治时代的顶峰而已,这一统治时期一直可以回溯到1968年。从1968年到1978年,国家相对于公民社会的权力在不断增长。<sup>[20]</sup>事实上,在乌拉圭,总人口中被警察拘留问话的百分比,比南锥体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其新闻与学术审查更全面,对游击队和劳工的镇压也更残酷。乌拉圭的公民社会在1973—1978年间大幅度萎缩。但在1978—1981年的三年间,该政权领导其在公民社会中的原始盟友的能力却明显下降(但绝对没有丧失镇压工人阶级或左派反对者的能力),而且反对派提出不同意见(虽然没有直接挑战政府)的能力也开始增强。为何乌拉圭和智利会有这样大的差异?

我将先探讨该政权的“防御型”计划。如果我们将智利和乌拉圭两国在出现官僚威权政权之前的情况做一对比,就不难发现,智利的资产阶级比乌拉圭的资产阶级更加强烈地相信自己的经济与社会生存受到威胁。智利资产阶级发展出动员和保护本阶级的大量工具。而乌拉圭则从来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动员。事实上,乌拉圭军队摧毁了该国最主要的权力,主张激进派——乌拉圭全国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Tupamaros),时间就在军队关闭国会并建立新政权的几个月前。所以,与智利的情况截然不同,乌拉圭的军队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救世主”,正是军队关闭了乌拉圭资产阶级的经典工具——国会。自1975年起,图帕马罗斯几乎可以视如不见,根本构不成威胁。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的确是对抗资产阶级的一大源泉,也可以重新形成一股力量;但镇压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乌拉圭工会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未能发动过一次重要的罢工行动。

假如我们对比一下“进攻型”计划,就会看到乌拉圭的国家宣布了一个与智利极为相似(至少在字面上)的野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

划。1978年到1980年,宏观经济指标向着国家计划者所期望的方向运动。在包含国家的资本支出之后,财政预算仍能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大幅降低,而且更重要的是,1961—1968年间一直停留在年均0.3%位置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78年到1980年间,却以每年6.4%的速度增长。<sup>[21]</sup>可是,作为改变乌拉圭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项长期计划的市场自由主义,却很快就失去了动力。

乌拉圭资产阶级虽不如智利资产阶级那样深感恐惧,但在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方面更为强硬。因此,乌拉圭国家规划者从来没有获得像其智利同僚那样多的相对于本国资产阶级的自主权。乌拉圭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集体决策模式,进一步压缩了乌拉圭国家规划者的自主性。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由军政府将军联席会议(Junta de Oficiales Generales)决定,联席会议的法定成员包括来自陆海空三军的所有四星上将。军政府选择这一决策模式,是为了确保三个军种的参与,但它却引发了内部否决权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模式为公民社会放开了多个游说的机会,进而削弱了国家规划者实施自己已明文公布的全面政策的能力。以关税为例,不像智利那样把关税一刀切到10%,乌拉圭直到1981年的关税还高悬在90%。同样地,尽管乌拉圭政权当初也像智利一样承诺把很多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最终没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被撤销。在1973年前,当地八家最大的国有企业的总裁职位很少由军官兼任,但经过五年的官僚威权统治之后,由现役军官担任大型国有企业总裁已然成为惯例。原乌拉圭模式的首席经济设计师也承认,国家机器内部的权力分化使其私有化目标变得难以落实。因此,他并没有费力去推行自己的初衷。他还认为,同样是因为这种权力均衡游戏,乌拉圭的关税绝不可能大幅度低于80%。他偶然地观察到,乌拉圭没有像皮诺切特那样的统一的指挥首脑,与之相反,乌拉圭的“集体领导拖延了决策,还间或地使政策执行变

样”。<sup>[22]</sup>

到1980年,在乌拉圭已经不清楚其政权是否还有尚未完成的“进攻型”社会政治计划。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御层面,该政权似乎已完成了它最初的议程。假如真是这样,在理论上而言,资产阶级应该没有必要再将直接表达自身利益之权利让渡给军政权,这些利益现在可以通过某些代议制机构来进行表达了。而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想到一种特殊时期的政权延续,可能会引起公民社会的态度反应,从而有可能形成对自己的核心利益的长期威胁——这种威胁将在实质上比代议制政治制度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所隐藏的威胁更加严重,那么前述情况就会更加现实。让我们来看看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证据。

1980年11月,乌拉圭军政府举行了一次批准一部新宪法的全民公决,该宪法的主旨与前面提到的智利的情况相似。但与智利的形势相反,在乌拉圭此次公决运动期间,没有一个制造商组织发表声明呼吁投赞成票。尽管也没有人发表声明号召投反对票的,但制造商集团对这一威权国家缺乏积极的支持,是使这部新宪法夭折在这次出乎外界所意料的选举当中的原因之一。

表 10.1 乌拉圭城市地区关于政治开放对经济的影响的民意调查(1980年5月)

	上层阶级(%)	中产阶级(%)	下层阶级(%)
加速	35	48	53
减缓	16	16	12
没有影响	28	20	12
没有回应	14	12	14

注:这一问题表述如下:“根据您的判断,如果我国重新恢复一些政治制度——如选举、政党以及议会——会加速还是减慢我国的经济恢复,还是对经济复苏没有任何影响?”

资料来源:盖洛普民意调查,乌拉圭盖洛普政治民意调查指数(Uruguay Indices Gallup de Opinión Política)。

表 10.2 乌拉圭城市地区关于政治开放对公共秩序的影响的民意调查(1980年5月)

	上层阶级(%)	中产阶级(%)	下层阶级(%)
改善	43	37	29
恶化	6	12	6
没有影响	36	37	53
没有回应	12	10	7

注:这一问题表述如下:“根据您的判断,如果我国实现政治开放,对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资料来源:盖洛普民意调查,乌拉圭盖洛普政治民意调查指数。

尽管制造商集团并不完全等于乌拉圭盖洛普调查中心(Uruguay Gallup Poll)所调查的“上层阶级”,这一民意调查的结果依然值得玩味。调查表明,乌拉圭威权主义政权原来的盟友,不再相信可以在一个政治上封闭的威权体系中扩大自身的利益。1980年5月,乌拉圭盖洛普调查中心就政治开放的议题进行了舆论调查。在同一时期,智利上层阶级的大部分人依然认为政治开放可能会损害经济,并可能引发潜在的危险的冲突,但乌拉圭盖洛普调查揭示出来的城市上层阶级的反应,却与此截然不同。接受调查的上层阶级认为政治开放会加速而不是减慢经济复苏的人数比接近2:1(表10.1)。而更突出的是,接受调查的上层阶级相信政治开放会改善而非恶化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的人数比高达7:1(表10.2)。<sup>[23]</sup>

至于有关公民社会联合进行政治反抗的潜力问题,乌拉圭与智利也是对比鲜明。主要的区别在于,乌拉圭的两大主要政党——白党(Partido Blanco)和红党(Partido Colorado),在政治纲领、意识形态理论或阶级成分等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异。此外,在20世纪的所有选举中,两党的得票加起来从来没有低于80%。虽然两党在选举中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但他们也有过权力共享的经历,甚至还曾推出过联合举措。不像智利的基民党与马克思主义者在短暂的合作尝试中还出现互相指责的情况,乌拉圭两大政党的领导人一致呼吁在全民公决



中投反对票。

事实上,缺乏威胁以及存在可以接受的政党选择,解释了为何制造商集团的领导人会在1981年的大规模访谈中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回到选举政治,可能是他们最保险的选择。在一次又一次的访问中,他们担心特殊政权的继续存在,可能会威胁到乌拉圭目前这种“安全的”政党结构。他们认为,两个传统政党依然保持着70%—80%的选民认同。由于乌拉圭军政权没有能够吸引资产阶级的可信的长期性“进攻型”社会政治计划,资产阶级于是忧虑:如果再有十年不进行政党选举,工人和左派就可能会寻求,而且很可能会找到其他的表达渠道。所以,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原因,乌拉圭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愿意把自身事务的管理权交给国家的强制机器(即军方)。这样一来,乌拉圭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便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曾一度拥有的自主性。

但是,深入研究这个时期乌拉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会发现反对力量面临的现实制约。首先,上层资产阶级虽然没有给予本国的威权主义政权积极的支持,但总体上也没有积极加入反对派阵线(巴西却有很多人这样做)。其次,虽然两个传统政党在单纯的竞选事宜上联手反对政府,但没有一个政党与工会密切联系,或是尝试积极组织对现政权的反抗行动。因此,乌拉圭国家机器的统治成本并不算太高。作为国家强制机器主要成分的军队,虽然内部也有分裂,且出现过重大丑闻,但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动摇军方维持控制的意志或能力。

乌拉圭军方的确曾宣布过将在1984年举行选举,但从对军方政治秘书处所做的访问中可以发现两大问题。第一,军方并不认为自己感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要求放弃政权的强大压力。由于缺乏要求让权的紧迫的社会性或组织性理由,他们为了日后的民主阶段,准备了一份保留军方的“参政特权”的颇为详细的日程。第二,由于政党并

没有与工人阶级进行沟通或积极组织这一力量,乌拉圭的公民社会因而大为削弱;部分军方领袖甚至公开向我表示,今后军方重新进入并控制国家机器的障碍还是很少。

整体来说,在公民社会的内部冲突与国家实现牢固控制的能力二者的关系问题上,乌拉圭案例是对智利经验的一个补充。乌拉圭阶级冲突的程度如此之低,致使资产阶级不再愿意全权委托于威权政府。尽管如此,至少到1983年末,精英们对公民社会内部发生冲突之潜力的介怀程度,依然足以妨碍到为阻止军方在于1985年如期移交政权后重新介入政治设置真正有效的障碍。

## 国家权力的衰落与公民社会的式微:

### 1978—1981年的阿根廷

对阿根廷的分析会更加简要。从1976年至1978年末,阿根廷威权主义政权的四大特征,帮助增强了国家相对于公民社会的权力。第一,虽然阿根廷没有像智利一样采用联合统治的原则(确实,阿根廷军政权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制度化的决策规则:所有的行政与政治单位,包括省、中央各部、国有企业,甚至于中央银行的董事会,都由陆海空三军各占三分之一席位),但在作为一种制度组织的军方(以军事集团为代表,他们认为自己是本国的最高权威)与作为政府的军方(以总统作为代表)之间还起码维持着合理程度的和谐。第二,作为一种制度组织,又作为政府的军方动用强大的强制力量,不让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派有任何风吹草动,与此同时,又在较小的程度上支持负责经济计划的技术官僚团队;阿根廷的经济计划在初期阶段,不单伤害工人阶级,还损害到除金融部门以外的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三,资产阶级上层因为对之前的冲突深感恐惧,所以愿意接受国家计

划所声明的目标(如果不是实际执行的话)。

但在1980—1981年,除了国家机器镇压反对派的能力依然保持强大之外,整个局势有了很大的转变。国家力量已经明显开始衰落。导致这一结果最关键的因素是,国家内部矛盾的攀升,具体来说,就是作为一种制度组织的军方和作为政府的军方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激化。军队机构内部经过大量辩论之后推选出一位军人总统,但总统即位短短数月,军队自己就开始质疑他的权威。经济政策优柔寡断,货币贬值持续混乱,储备流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令人不得不对整个经济计划产生怀疑。任何相信政权力量是一种既可用于镇压又可利用国家机器的资源构建某种结果的能力的人,会不得不认为,在1979—1981年间,阿根廷的国家权力在衰落。

相反,对1976—1981年期间阿根廷的公民社会的分析则显示,尽管在1980—1981年间政权出现解体的迹象,但公民社会中能够进行独立反抗的几乎全部要素——工会、政党和学生组织——在这一时期的权力也在下降。当然,公民社会也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这些成分能够联合推出某种替代方案。到1981年,阿根廷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双方都元气大伤。

阿根廷的案例进一步放大了智利和乌拉圭的经验。公民社会的内部冲突不足以成为国家力量增长的先决条件。在阿根廷一案中,国家机器的核心缺乏凝聚力,结果便是两败俱伤:无论国家机器内部或外部,构建经济或政治结果的整个能力都显著下降。阿根廷的例子甚至比智利的情况更能突显出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传统理论的问题。阿根廷的社会显然是资本主义形态的,其国家也明显地表现出“相对自主性”;可是与某些理论所说的不同,这个国家并没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谋划”并克服资本积累中的问题。<sup>[24]</sup>刚好相反,阿根廷国家机器的行动是虽然经济活跃却始终“发展不完善”的首要因素,有些人

将此形容为“阿根廷的玻利维亚化”。

威权主义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在马尔维纳斯群岛 (Malvinas) 战役<sup>①</sup>之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从1981年7月开始,各政党开始寻求一种称之为多党制国家 (La Multipartidaria Nacional) 的共同方案。事实上,1982年2月,阿根廷各大报纸陆续刊登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提案。<sup>[25]</sup> 抢占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行动立刻让军政府获得了空前的支持。然而,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的军事投降,却让毫无准备的阿根廷民众顿时气愤交加。在战败投降后,我参加了很多次群众集会,民众怀着报复的心态对军政府的懦弱、欺骗和无能大肆鞭笞。与英国商业和金融网络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上层,也发现他们与军政府的联盟极其危险。然而,就本文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之后,不少军官也开始认为,迅速从国家权力中撤退出来已经是一种制度上势在必行的任务。例如,阿根廷国防学院 (Escuela Nacional de Defensa) 的副主任就痛苦地承认,让三军在省、中央各部以及国有企业三分席位可能曾经是军队进行国内统治的一种模式,但阿根廷却陷入了与“三大政党”的战争之中,三军充任的官僚机构完全不能履行统治职责。他提出军方必须退出政府,尽快放弃其以国内安全为主的职责定位,改以北约为假想敌实现军队的职业化,他还提出需要让民主政党去执政。他表示:“假如不这样做,阿根廷可能面临又一场俄国革命。”<sup>[26]</sup>

一直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为止,让军方迟迟不愿退位的重要动机是担心会受到纽伦堡式的审判和报复。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之后,军官们忧虑不堪,国家也有顷刻崩溃之虞,致使军方事实上反而宁愿接受反对派提出的更加苛刻的条件。从一位现役陆军准将的访

① 1982年4月2日—6月14日,英国与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群岛领土归属问题而进行的战争,英国方面称之为福克兰战役。——译注



问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当我问他军队对受到报复的恐惧是否会妨碍他们让权时,他断然地反驳说:“我们一定要退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解体。”<sup>[27]</sup>

国家权力是相对的。国家强制机器的即将崩溃相对地增强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尽管不少公民社会的领袖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重建公民社会与政治共同体而希望限制对军方的攻击。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败后,国家权力明显在瓦解,但公民社会与政治共同体仍然面临着如何重建民主社会的严峻考验。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对自身任务的洞察令人吃惊:“我们不应该把军政府自身的失败,误以为是民主力量的胜利。前面一项正在发生,但第二项全依赖我们的努力。”<sup>[28]</sup>

## 从平行增长到冲突:1970—1981 年的巴西

四个案例中,巴西提出的问题在理论上最有趣也最为复杂。即使没有充分的文献支持,我也想断言,从1970年到1973年,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与反对派的力量同时在提升。在这里先提出两个警告。很显然,公民社会的力量增长的起点相当低。1969—1970年是巴西镇压最残酷的时期。相反,在1973年时,国家将其决定强加于盟友身上的权力非常之大,当然,此时已经开始在孕育着后来会限制国家自主权的矛盾冲突。

国家力量在观察期内的增长有两个特殊条件。第一,在与城市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大环境下,国家安全机关的镇压权力空前独立,任何它认为具有“颠覆性质”的社会活动都可以随意压制。第二,当时巴西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增长阶段。在1967—197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1971年增长了11.3%,1972年

是 10.4%，1973 年是 10%。同一时期，占据国家经济制高点的国有企业也迅猛增长。举例来说，假如我们把巴西 30 家最大的非金融类企业按净资产进行排名，在 1967 年其中有 13 家是国有企业，1971 年是 17 家，1974 年是 23 家。除了国内生产总值急速增长之外，国家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显著提高，从 1967 年的 8.4% 到 1971 年的 10.2%，再到 1974 年的 10.8%。而随着国有银行的强大和国家资金供给能力的增强，国家的金融职能也不断提升。<sup>[29]</sup>

令人称奇的是，巴西国家经济角色的增长，并没有破坏它与私人部门盟友的关系。尽管私人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有所下降，却并没有出现对“国家主义”（statism）的抨击，这是因为国家给予私人部门慷慨的补贴，而且私人部门自身的绝对增长率也非常之高。譬如，巴西的资本品与消费品两大部门，主要都由私人部门所控制，两大部门在 1969—1973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22%。<sup>[30]</sup> 国家机器对 1973 年石油危机的第一个反应，是在国家机器内部进一步集中决策从而增加相对其盟友的自主性。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看起来有一个“确实存在的、暴力的敌人”，所以造就了持续的“防御型”计划与可靠的“进攻型”的计划。

我们凭什么说公民社会在这段时间也增强了力量呢？很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变得惊人的因素，正是源于这一较早时期。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教会内部的转变。教会原本支持 1964 年军事政变，但到了 1970 年，教会高层由于受到国家“防御型”计划的强制力量所冒犯（但没有直接受影响），开始越来越严厉地批评巴西的侵犯人权问题。在内部事务中，教会享有独立于国家的高度自主性。

教会充分利用了这种自主权稳步发展自己的社区组织（Comunidades Eclesiais de Base）。这些基层组织在 1970—1973 年间没有直接对抗政府，但已开始准备自己的意识形态、人力和组织性资源；这些

资源最终能够在公民社会中基层社区成员所工作的领域之间进行横向转移。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准备成为强势城市工会崛起的重要养分,特别是在大圣保罗市(greater São Paulo)的关键地区。它还解释了郊区工会的空前发展,这些工会的自主性也让人震惊。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会一直都被包围在国家创制的统合主义结构之中,这削弱了公民社会中工人组织的自主性。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开始挑战这种结构束缚的新型工会主义,这被很多劳工运动专家视为巴西工运历史的重要一步。根据乔赛·阿尔瓦诺·摩西(José Alvaro Moisés)所言:“无可置疑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人们就在全力创造一种能够让普通工厂工人通过各自的工会表达自身利益的新型结构……现在很清楚了,这种新型工会主义运动的组织结构已明显不同于以往。”<sup>[31]</sup>

这段时期新工会运动的成长,与教会基层社区的增长一样,代表部分公民社会自主行动的增强。跟基层社区类似,工会在一开始也不直接与政府对抗。这可能因为当时工会正在进行的转型,首先是在内部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发生,而没有立即反映到对资本或政府的挑战之中。

到1973—1974年间,新工会运动的代表开始就工厂层面的一系列改革进行谈判。例如,在1973年5月1日,圣保罗市的冶金工业联合会(the Metallurgical Federation of São Paulo)向梅迪奇(Médici)总统提出给予工人成立工厂委员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以及无须通过政府而从劳动部门获取更大自主权的权利。<sup>[32]</sup>事实上,在把工人直接带向政府对立面的1978年第一轮罢工之前,冶金工会已经逐步扩大了其在工厂层面进行直接的集体谈判的范围。<sup>[33]</sup>

渐行强势的工会运动的出现,不仅由于工会自身内部或者甚至是作为整体的公民社会内部的变化;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时也是国家过

去行为无意产生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政府防御型措施的“成功实施”是如何孕育了公民社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新型反对力量。“进攻型”计划的成功也意外地滋养了公民社会中新的反对潜力。“经济奇迹”大大增加了工业劳动力的人数。1960—1970年间,工业部门雇用的工人数量增长了52%,1970—1974年间又增加了38%。<sup>[34]</sup>此外,国家倚赖多国企业并容许产业恣意集中的政策,促使工人阶级围绕着圣保罗市四周迅速增长。正如墨西哥的工人历史说明的,工业增长本身并不会带来工人阶级组织自主性的增强。但是巴西工人阶级数量上的增长(特别是在大圣保罗地区),显然有利于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生,而这一工人运动也成为巴西反对派的中坚力量。最后,还需要提一提,1976年劳工部长放宽了政府监督工会资金的会计程序一事。对大多数工会来说,这意味着经政府批准的工会官员有了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供他们用于个人和笼络事宜。对劳工部长而言,他也由此可以举出意识形态性的理由说,巴西工会的自由化先于政治自由化。<sup>[35]</sup>对十分重要的圣·贝纳多(São Bernardo)工会来讲,这些可自由支配资金对帮助像“卢拉”(Lula)这样的新一代工会活动家建立运动根基极为重要;1978年,正是卢拉发动了巴西十年来的第一场影响重大的罢工。<sup>[36]</sup>因此,巴西政府针对工人阶级的策略,与其他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特别是智利,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对国会、固定的总统任期和政党方面,巴西政府的掌控者也采取了跟皮诺切特很不一样的策略。为了维持军事政变是为了挽救民主的意识形态的这一说法,军政府实行肃清,但没有关闭国会,控制而没有取消选举及其政党,他们甚至还遵循了总统轮任和固定任期的既定惯例。所有这些在军政府早期确立的决策规则,让巴西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像皮诺切特那样长期个人集权的可能,也潜在地帮助日益限制威权国家的自主性,当然,要废除这种自主性却也代价不菲(即使只



是打破国家镇压机器的内部统一)。<sup>[37]</sup>对巴西将军们来说,他们的重要经验就是,只要“颠覆”分子被铲除便乐意容忍政党的存在;在巴西,政党组织都十分脆弱,通常需要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或传统的分肥制结构。简而言之,作为组织的政党,看起来在巴西的威胁性要远远小于在智利的政党。然而,容许政党存在的决定,也无意中维护了巴西官僚威权政体的稳定性。

1965年,一个官方认可的反对党成立,但随着1968年国会的关闭而遭到削弱。1970年,经官方批准的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联盟(MDB),不仅在左派内部得不到尊重,而且也不被认为真正代表了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意见。譬如1970年在圣保罗市的选举中,MDB得到的空白票和故意污损票两倍于赞成票。但到了1974年,随着电视审查的放松、公开选举的增加,经历了在国会持续四年的抗议行动之后,巴西民主运动联盟在全国选举中拿到的废票与空白票比率从33.7%降到了10.9%。<sup>[38]</sup>从全国情况来看,巴西民主运动联盟在1970年只赢得参议院39.5%的选票,但在197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9.1%。<sup>[39]</sup>

当然,1974年的选举超出了我们当下所谈的1970—1973年的范围,而且这次选举的背景前提是巴西政府在1974年下半年启动了自由化进程。尽管如此,要理解此次选举的惊人结果,必须要意识到:在1970年至1973年的整个期间,威权国家一直未能战胜公民社会赢得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而且反对派在长期对抗官僚威权国家的“地位战”中,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我相信我们有理由把1970年至1973年这段时期解读为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各自的主要行动领域都增强了权力的时期。

在随之而来的1974年至1981年,情况完全改变了。国家的经济战略大同小异,但它身处的国际环境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而且1970—1973年间出现的积聚性变化也开始露出端倪。到1973年底,

城市游击运动基本被消灭,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秩序的威胁,而石油危机也开始削弱巴西的经济奇迹。随着令盟友真实可信的威胁的消失,随着负责经济规划的技术官僚们再也不能顺风扬帆,被迫转而逆流直上,在1969—1973年间曾经帮助增强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两大因素也开始减弱。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最主要的反应是:第一,进一步推出宏大的发展计划,其国有企业仍将扮演主要角色;第二,把经济事务更多地集中到计划与财政部门手中,内容包括价格制定、进口标准和特殊的出口补贴。简而言之,盖泽尔将军(Geisel)领导下的政府继承了前几届军政府的做法,以为加强国家的经济角色便能把经济带回到增长的轨道上,从而提高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并减少它的政治难题。对盖泽尔而言,很不幸的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努力并没有产生像前述阶段那样的增长率;相反,巴西由此进入低增长时期同时开始对外举债。更有甚者,这次资产阶级对扩大国家角色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1975年,巴西商界团体发起针对“国家主义”的运动,我们有必要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我们看到,国有企业从1967年到1973年增长迅猛,但这时期的增长很少引发(私人部门)抗议。所以我们必须再三审视始于1975年的反国家主义运动的基本教条。反国家主义,最好把它看成是这样一种运动,该运动的出现是由于国家缺少足够的可支配盈余用作给予其国内盟友的政治和经济性补贴。在巴西,到1975年,尽管打败了游击队,但国家也失去了最重要的防御计划;虽然它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进攻型”计划,但国内资产阶级再也不会无条件地全盘接受。我在巴西的访问显示,保利斯塔大街(Paulista)<sup>①</sup>企业界反对国家主义的理由,不是针对国家作为生产者,而是反对国家

<sup>①</sup> 巴西圣保罗的商业区,著名的金融街。——译注

作为管制者。因此,反国家主义运动代表着国家领导同盟者的能力下降的第一个清晰信号。到1978年,随着著名的“八人宣言”(Manifesto of Eight)(八位企业家发表联合声明)的发表,作为政府原盟友的主要成分的企业家,已经实际上加入了公民社会的自由化运动。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性反对力量的增长,大量的证据也开始显示,国家在新的国际情势下不能推行其经济计划。通货膨胀,一度由1964年的超过60%降到1972—1973年间的低于20%,又迅速回升至1974年的29%、1976年的38%和1980年的超过100%。外债也由1973年的120亿美元冲高到1982年的超过700亿美元。<sup>[40]</sup>面对攀升的通胀和严峻的偿债比率(debit/service ratio)<sup>①</sup>,政府规划者不得不分别于1975—1976年和1980年底两次宣布放弃其发展计划的关键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从1974年到1981年,巴西国家领导其盟友和推行连贯性发展计划的实力显著下降;但与阿根廷不同,巴西从来没有显示出即将瓦解的迹象,而且和智利与乌拉圭一样,巴西始终维持着强大的镇压能力。

最后,公民社会形成新目标和构造政治结果的能力,虽然在前期尚属萌芽阶段,但此时已经开始成熟。到1978年,工会运动随时准备发起十年来最重要的一轮罢工,最后的行动从大圣保罗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市区开始,一直蔓延到巴西东南部和南部地区。当教会的基层社区不只在圣保罗,也在巴西东北部和北部地区成为主要的力量时,它们在人数、热情和活动范围上都不断发展。巴西律师协会(Brazilian Bar Association)和巴西新闻协会(Brazilian Press Association)则对关系着威权政府自主权的重要程序规则持续进行攻击。律师协会

---

① 偿债比率:一国偿还外债(包括还本及付息)的金额占该国出口收入的比例,用于衡量一国的债务负担。本解释取自路透中文网投资频道和OECD官网的统计学术语表。——译注

主要是要求国家机器遵循法治和特别是要求尊重人身保护权。新闻协会则大力抨击政府的新闻审查。经过反反复复的社会要求和国家让步之后,两个协会都帮助公民社会拓宽了免于政府直接压制的活动范围。在这种大氛围下,公民社会的批判性力量大力宣传自己的理念,为社会提供信息和方案建议,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都令人称叹。

公民社会不同领域中的新组织与能量上的同步发展,还产生了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随着各个领域的不断发展,这些领域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日益增强。这种横向联系增强的结果之一,便是每个领域中的变化都促进并强化了其他领域中的变革。<sup>[41]</sup>

由于这种“横向维度”对公民社会力量的整体增长极其关键,因此值得详细分析。公民社会中的几乎全部领域都受惠于教会的重新定位,尤以工会运动为甚。工会活动家们强调,在大圣保罗地区之所以能出现一个更为独立的工会运动,正是得益于教会的基层社区运动的帮助,这不是说这些运动直接参与到工会活动当中(事实上它们没有),而是因为这些社区运动帮助同为工会成员的社区成员树立起一种对社会非正义现象的认识,并促使他们相信社会需要更多的参与式组织模式。当然,除此之外,教会的具体协助,还包括允许工会在当地教堂举行重要会议。

工会也得到言论日益开放的新闻界的帮助,正是媒体的报道让工会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宣传。而且,正是新闻界使得圣·贝纳多乡(São Bernardo do Campo)冶金工会的新领袖卢拉,在第一次重要罢工运动之前就已闻名全国。在罢工运动之前,巴西律师协会一直在进行争取组织和个人法律权利的运动,到罢工开始,这些运动帮助削弱了政府压制措施的合法性。

新闻界的复苏与产业精英中政治反对力量的兴起之间的互动过



程也饶有趣味。在1977年,尽管企业家私底下对军政权的质疑日益增加,但没有一个组织或某个公认的领袖人物将这种情绪公开表达出来创造政治效应。《商业日报》(*Gazeta Mercantil*) (相当于巴西的《华尔街日报》)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它向五千位商界人士发出邀请,请他们评选出“商业阶层中十个最具代表性的发言人”。<sup>[42]</sup>与选举官办的商界联合会不同,对这次“选举”,军政府根本无法插手否决任何可能的候选人。重要的是,现有的由国家一手策划的各大商业集团的主席几乎全部落选。而当选的十位商界人士也成为产业精英合法的公开代言人。他们中的八位签署了极具争议的“八人宣言”。其中一个签署者后来对我说:“宣言发表后,公民社会就立即登堂入室。我们收到很多邀请,让我们与教会、工会、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一起,出席关于巴西当前的问题与未来之类的公开论坛——而这些团体我们以前都完全没有过合作关系。”<sup>[43]</sup>

没有公民社会内部各领域间横向联系的增强,巴西就不可能经历我们熟知的那些政治演变。不过,公民社会中的这些重要发展之所以能够出现,国家在发生条件的设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可以说,最初给予公民社会更大组织空间的决定,不过是解决国家机器内部的某些矛盾的一种尝试。

1974年,盖泽尔政权开始提倡自由化(*abertura*)。自由化进程的主要设计者,席尔瓦将军(Golbery do Couto e Silva)表示,这一政策的重要动机是要减少情报机关(*secret service apparatus*)相对军政府的自主权。在与城市游击队激烈交锋的时期,中央情报局(*Serviço Nacional de Informações*,巴西最高情报机关)与三大军种各自的安全部门都拥有极大的权力。到1974年,安全机关所拥有的自主权和相对于军方的独立性之大,致使身为制度组织的军方也开始将其视为一种组织上的威胁。军政府中至少有部分成员希望国家迈向法治的目

的是希望压缩情报部门所恣意享有的“法律例外”之空间。自由化也被视为帮助公民社会获取资源(如较为自由和敢言的报业)和开展运动(如抗议使用酷刑)的一种策略,这能帮助军政府在“体制内”增强对情报机关的控制。<sup>[44]</sup>

就巴西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也是服务于国家机器自身的利益这一情况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夸大势力平衡转变的性质。国家机器依然强势而且仍旧感兴趣于掌控一切。例如在1981年11月,强制机器的高层人物认为如果不改变1982年的选举规则,他们会蒙受危险的损失。菲格雷多总统(Figueiredo)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这一规则。而在这道政令(fiat)发布后最关键的五天中,巴西全国没有出现任何抗议示威。

和乌拉圭一样,我们无法确定巴西军方是否真的准备退位。但这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巴西的形势演变与乌拉圭相比差异巨大。部分因为政府政策造成的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使得巴西的官僚威权政体与反对派之间的紧张状况变得更加激烈。紧随着本文观察期之后发生的情况便表明了这种紧张局势,最突出的如1982年的选举,反对派赢得了十个州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和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三个关键州;1985年为实现直接选举而兴起的群众运动再次印证了这种激烈对抗。

1982年和1983年的巴西政权也没有像阿根廷那样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自1964年军政权上台后,到1982年,国家机器的领导人获得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点,而遭到来自公民社会的反对也达到了最高潮。尽管如此,军政权在1982年仍然拥有足够的政治机会来改变反对派政党的游戏规则。巴西的例子表明,仅仅是缺乏公民社会的支持,并不足以成为作为制度组织的军方把控制权让渡出去的理由。到1983年,民主反对力量的重要任务之一,显然是要在公民社会的新型

组织与政党之间建立起更具制度化的联系。只有这样,重新实现民主化的要求,才能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以此增加威权国家机器的统治成本,同时针对巴西不断增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明确提出另一种治理方案。这一切终于在1984年发生,一条让反对派联合阵线的候选人在1985年上台的道路也已然铺就。

## 总 结

本文对南锥体地区四个官僚威权政体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之差异性的考察,虽然略显粗糙,但也就国家的性质如何影响反对派政治的演变这一问题,提供了几个有趣的观察。

通过智利与巴西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国家对其“计划”的界定会影响到反对派的机会。在巴西,官僚威权政体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积极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政权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帮助提高了巴西资本积累的速度。因此,“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被定义为在关键的层面进行有效经济干预的能力。镇压能力当然也很重要,但它同时也是引发政府内部分裂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会给予安全机构过大的权力(相对于国家机器的其他部分,甚至相对于军方的其他部门而言)。巴西政府对促进资本积累的关注不仅留给反对派更多的免受压制的活动空间,还无意中为反对派基础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圣保罗地区工人阶级的增长。

在智利,军政府不仅没有将经济干预能力看作一种国家力量,反而竭力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并不是说国家对经济变革的过程没有任何影响。政府从经济领域的退出带来了很多重要的结构性后果,其目的全都是为了减少政治性反对势力的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

一个结果就是工人阶级规模的缩减,而尽可能消除工厂层面工人对经济可能产生不满的根源,更是导致了工人自身的分化。简单来说,直到1981年末的经济危机为止,智利政权的经济策略加强了它作为一种控制工具的力量,这种控制手段也完全不同于那些(通常很有效的)直接的强制性控制。

看看智利与巴西的例子,对于那种认为国家的经济能力会自然加强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政治控制力的看似“理所当然”的假设,显然有必要重新考虑。通过把“经济主义的”问题政治化来进行经济干预,可能会增强公民社会中的政治组织的潜力。反过来说,在依附型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公共部门侵蚀(私人部门)的抵抗,可能既有悖于历史潮流(antihistorical),又违背社情民意(antipopular)——反历史潮流是指它削弱了这样一种信仰:即持续的国家存在是持续的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违背民意则是说,公共部门收缩的最主要的受惠者很可能只是一小撮相互勾连的寡头们。

从四个案例获得的第二个教训,涉及阶级冲突的威胁对塑造国家控制公民社会之条件的重要性。奥唐纳(O'Donnell)已经指出过这一因素的重要性,<sup>[45]</sup>但本文分析加强了他的论证。在智利,对阶级结构进行彻底的重新排序的可能性在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真实,以致后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多会损害到自身经济利益的国家政策,并默许了国家对政治领域相对自主地进行控制的计划。在乌拉圭与阿根廷(直到马尔维纳斯战役之后),对进行阶级结构转变的恐惧感,使得主要的民间精英不敢更多地施压要求政治系统的开放。在巴西,只有当私人部门的精英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在一个更开放的政治环境下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经济与政治未来时,他们才转而严重抗议军政府所据有的过度的自主权。

总的来说,这些案例赋予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可能还是方法论上



的。社会分化(cleavages)一方面会割裂公民社会,另一方面会妨碍公民社会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横向联系的增强;而如果不能理解社会分化的这些性质,就无法有效分析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和一种制度组织的权力。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内部反对国家的力量的演变,一方面受制于国家界定其计划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国家机器自身内部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 注 释

[1]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ap. 1.

[2] 参考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3] 参看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Series, no. 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3), 也可参看 G. O'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3(1978): 3 - 38. 奥唐纳后来详细阐述了他所提出的有关官僚威权主义的八个主要特征,并把它们视为威权国家的一种类型;详情请看: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and Ques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ed. David Collier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91 - 294。

[4] Alfred Stepan,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Changing Patterns in Brazil*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5] 本文最初于1982年初开始写作。其中主要的实地考察部分在1981年和1982年完成。尽管在本文中我增加了1983年发生的事件并更新了原来的结论,但我还是把1984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比如乌拉圭反对派赢得选举胜利、巴西要求进行直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阿根廷首任民选总统阿方辛撤销军方高层的顽固派成员等等)留给了下一份研究。

[6]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中,将资产阶级为了换来政变后出现的强国家的其他方面的保护而甘愿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定性为波拿巴式政权的特征之一。在此,我用“雾月的”一词来指代马克思的文章中的有关情形。

[7] 有关智利政权的基本抱负的最好的全面分析,可参看: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El Proceso Político Chileno* (Santiago, Chile: FLACSO, 1983), pp. 131 – 172. 关于这一根本大计在早期阶段的意识形态层次的颇具价值的分析,可参见:Tomás Moulián and Pilar Vergara, “Estado, Ideología y Políticas Económicas en Chile: 1973—1978,” *Estudios CIEPLAN*, no. 3 (June 1980)。

[8] 数据资料由智利盖洛普调查中心提供。

[9] *El Mercurio*, August 31, 1980, p. D7.

[10] 这些观察来自1981年6月本人在智利与政党积极分子的访谈。

[11] 工业部门的总体就业指数由1974年的110.4点下降到1978年的92点。在经济与政治同样重要的金属产品、机械制造与装备这类的子部门,就业指数由1974年的117.8点下降到1978年的84.3点。请看Alexandro Foxley, *Latin American Experiments in Neo-Conservative Econo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76。

[12] 这三位学者时常访问智利并与该政权的“反集体主义”(anticollectivities)思想库——公共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常有来往。该中心的内部刊物《公共研究》(*Estudios Públicos*)的创刊号主题为“自由与利维坦”(Liberty and Leviathan),并由布坎南、塔洛克、哈耶克、布鲁纳,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撰写的特稿。

[13] 弗吉尼亚(VPI)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了对现代民主制度之日渐严重的病态现象的彻底批判。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 ix – x]一书的开篇中就呼吁:“当政府有了自己的独立生命,当利维坦开始吞吐呼吸,一整套新的控制问题随之而来……要避开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宪政结构上的彻底革命,通过彻底重写社会契约才能做到。但预期这样的一种革

命发生就好比痴人说梦,因此本书也可算得上是准乌托邦(quasi-utopian)之作。”智利就成为他们这种“准乌托邦式”的试验对象。这一学派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Richard D. Auster and Morris Silver, *The State as a Firm: Economic For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Public Choice, no. 3, ed. Gordon Tullock(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79); 以及布坎南与塔洛克早期所做的极有影响力的批判: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14] 这些观点来自 1981 年 5 月本人在圣地亚哥所进行的访谈。

[15] 同上。

[16] 我从曼努尔·安东尼·加雷顿(Manuel Antonio Garretón)那里借来了“小政府,强国家”这一表述。

[17] José Pablo Arellano, “De La Liberalización a la Intervención: El Mercado de Capitales en Chile, 1974—1983,” *Estudios CIEPLAN*, no. 11(December 1983): 5 - 49.

[18] 参看 O'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19] 圣地亚哥地方报(*The Santiago*)每周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什么是解决当前国家问题最好的政府方案?”这一问题时,上层阶级人士中只有 8.5% 选择“皮诺切特政府”,只有 0.7% 选择了“一个绝对的军人政府”。但是,表示期望“一个完全由反对派组成的政府”的上层阶级人士也只占到 21.7%。  
*Hoy*, December 1983, pp. 12 - 16。

[20] 对乌拉圭官僚威权主义政体最全面的回顾,可参见以下著作:Charles Gillespie, “From Suspended Animation to Animated Suspensi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in Uruguay,” in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Transitions for Authoritarian Rule*, ed. Guillermo O'Donnell, Phil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即将出版), vol. 2, chap. 8。

[21] 请参看以下著作的统计附表:Luis Macadar, *Uruguay 1974—1980: Un Nuevo Ensayo de Reajuste Económico?*(Montevideo: Ediciones de la Banda Oriental, 1982), 特别是第 280 页。

[22] 1981年3月在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与维莱加斯(Alejandro Végh Villegas)的谈话。

[23] 从蒙得维的亚的乌拉圭盖洛普(Gallup Uruguay)办公室取得的数据。该办公室也出版了有关公民投票的特别报告：“El Plebiscito Nacional,” *Indice Gallup de Opinión Pública*, no. 315 (January 1981); 有关这段时期的精彩分析, 请看: Luis E. Gonzáles, “Uruguay, 1980—1981: An Unexpected Opening,”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8(1983): 63—76。

[24] 对资本主义国家担当这些角色的理由与途径的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著作仍然是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大作: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25] *La Propuesta de la Multipartidaria* (Buenos Aires: El Cid Editor, 1982)。

[26] 与阿根廷国防学院副主任的访谈,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2年7月28日。

[27]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访问, 1983年7月27日。

[28]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广泛流传的信件, 1982年7月2日。

[29] 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来源于: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72, p. 141; 1973, p. 145. 税收数据也来自同一刊物: 1968, p. 78; 1972, p. 140; 与 1975, p. 167. 国有企业的数据来自: Thomas J. Trebat, *Brazil'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the State as Entrepreneu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9。

[30] José Serra, “Three Mistaken Theses Regar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ed. Collier, p. 121.

[31] José Alvaro Moisés, “A Estratégia do Novo Sindicalismo,” *Revista de Cultura e Política*, no. 5/6(1981): 71. 玛丽亚·戴维奥在其《巴西近来的集体谈判趋势》一文中, 也认为1970—1973年是新工会运动的萌芽时期; 参见: Maria Hermenia Tavares de Almeida, “Tendências Recentes da Negociação Coletiva no Brasil,” *Dados* 24(1981): 160—164。



[32] 参看 *Amaury de Souza and Bolivar Lamounier, "Governo e Sindicatos no Brazil: A Perspectiva dos Anos 80," Dados 24(1981): 145.*

[33] 以下文章中有关于这一趋势的图表: de Almeida, "Tendências Recentes da Negociação Coletiva," pp. 182 - 183.

[34] 参看 Ronaldo Munck, "Th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Crisis of the Dictatorship in Brazil," in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Brazil's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Thomas C. Bruneau and Philippe Fauch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 228.

[35] "Albertura Sindical Antecede a Política," *Estado de São Paulo*, January 1, 1978.

[36] 1981年8月13日与圣·贝纳多乡冶金工人工会的劳工律师埃米尔·帕加罗 (Almir Pazzianotto) 的访问。乡村地区的工会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大量繁殖(目前对这一现象依然缺乏研究)主要是由于巴西的社会保障法上的一处小的改动。这一修改为乡村工人提供了新的合法的组织机会,这一机会被进步的教会、律师和工会运动迅速而合法地利用。参看 Wanderley Guilherme dos Santos, *Cidadania e Justiç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Campus, 1979), pp. 35 - 38, 113 - 123.

[37] 探讨经由领袖自行提出的规范与程序所创造的自主性国家的制度化过程的两篇重要文章是: Juan J. Linz, "The Future of an Authoritarian Situation 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Brazil," in *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 Policies and Future*, ed. Alfred Stepa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33 - 254; and Bolivar Lamounier, "Authoritarian Brazil Revisited: O Impacto das Eleições na Abertura Política Brasileira, 1974—1982" (Paper 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Democratizing Brazil?,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March 9 - 10, 1984).

[38] 参看 Bolivar Lamounier, ed., *Voto de Desconfiança: Eleições e Mudança Política no Brasil: 1970—1979* (Petrópolis: Editora Vozes, 1980), p. 72.

[39] David V. Fleischer, ed., *Os Partidos Políticos no Brasil* (Brasília: Editora

Universidade Brasilia, 1971), vol. 1, p. 222.

[40]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73, p. 143; 1972, p. 140; 1974, p. 209; 1976, p. 172; and, 1980—1981, p. 193. 外债资料来源于: *World Debt Tables: External Deb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1983—1984 Edition*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84), p. 166。

[41] 参看 Paul Singer and Vinicius Caldeira Brant, eds., *São Paulo: O Povo em Movimento* (Petrópolis: Vozes/Cebrap, 1982); 也可参考 Maria Helena Moreira Alves, *The State and the Opposition in Military Brazi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rthcoming)。

[42] 有关这次评选的方法与结果的讨论, 请参看 J. P. Martinez, “Os Eleitos pela Empresa Privada Nacional,” *Gazeta Mercantil: Balanço Anual*, September 1977, pp. 18 - 26。

[43] 与在《商业日报》评选中得票最多的企业家克劳迪奥·巴德勒 (Claudio Bardella) 的访谈, 圣保罗, 1981年8月21日。

[44] 1982年6月16日和7月16日, 在巴西利亚与席尔瓦将军的访谈。

[45] O’ 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and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 结 论



# 十一 迈向更加充分了解 国家的大道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

正如本书绪论所指出,比较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怀抱着不同的现实性关怀的各类学者,纷纷开始将作为一种制度组织及一个社会行动者的国家,作为了研究的重心。但绪论也同时提到,理论上的重新定位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要克服对社会经济过程采取绝对性因果关系这一根深蒂固的假设立场,就必须以慎重而适当的方式在我们对社会转型与社会政治学的研究中“把国家找回来”——这些研究需要持续的理论创新和比较历史分析,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本书即将结束之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回顾与前瞻。这里所收集的文章如何促进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我们能否找到一些共同的脉络,以便为今后的知识积累确立在方法论、概念选择,以及分析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方向?我们对国家的理解还有哪些明显的不足?将来是否还有新的研究课题能够或者应该值得我们去探索?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会结合本书各章的主题和研究发现,确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前沿。对前面各章主题的考察将主要遵循两条路

径。我们首先会回顾本书方法论的样式,继而估测所有这些文章所集中关注的问题,如在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以及有关未来研究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等方面所给予我们的知识和启发。然后我们会集中考虑对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和国家干预、对国家的形成与重组的各个方面等问题的比较研究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文章最后将以反思对国家及其行为的社会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与结论方式作为结束。

## 用分析归纳法与历史比较来研究国家

本书收录的所有研究或许都会被认为题材宏大,但它们显然都回避了精雕细刻或旁征博引、无所不包的演绎式理论框架。相反,不论是从单篇还是从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均采取了类似于弗罗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所说的“分析归纳法”(analytically induction)<sup>[1]</sup>。他们从当前各种理论辩论当中,尤其是通过把韦伯式的国家观和近期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并列对照,提炼出自己的研究问题、概念及因果假设;然后借助比较和历史研究来探索这些思想。每一个调查都源自于对某些分析性问题的关注,而且每项调查都为有可能拓展到其他案例中的研究方向定位或因果假设提供了一次试验。所以,这些研究都是高度致力于理论化的,尽管它们逆用了“宏理论化”(grand theorizing)的通常次序。

本书供稿者采用分析归纳法,不只是因为现有的关于“国家”的宏理论(grand theory)中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还因为这一方法很适合用于比较和历史研究。跨国家和跨时间段的比较、对历史深度的强调、对过程进行历时性追踪,这些都是国家研究的最佳策略。显然,若没有跨国家的比较,即使目标是要构筑一个宏理论,对某个国家的调研最终也只会沦为个案的描述。又由于还有不少宏观社会现象不

会在各个国家(同时)反复出现,所以,如果想要更科学地对国家进行分析,跨国或跨时段的比较必不可少。

国家研究也需要历史的深度,这是因为国家研究不仅与多种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而且还与这些社会结构具有同一特征:历史的韧性与连续性。<sup>[2]</sup>也就是说,国家组织的基本模式以及国家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通常都具有持久性,即使历经重大危机和有意识的重组时期或者国家行为的重新定向阶段也依然可能持续存在。因此,分析者必须识别出持续或不持续的条件,才能解释很多有趣的结果,特别是非预期的结果。

就是在分析归纳法和比较历史方法的广泛范围内,也有一系列不同的研究策略可供学者们选择。<sup>[3]</sup>本书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这种选择范围之广,这里有必要介绍这些文章所提出的大量关于未来研究的建议模型。

有些文章并没有进行案例剖析,而是用经验数据来解释某些概念或模型。譬如在《国家与经济转型》一文中,鲁施迈耶和埃文斯就国家促进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的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提出了普适性假设命题,并通过简要地引述多个欠发展国家中特定的国家干预行为的有关研究(而没有深入分析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明如何对这些概念加以应用并敲定先后顺序(permutation)<sup>①</sup>。埃文斯的后一篇文章《跨国联系与国家的经济角色》风格也差不太多。梯利的文章是关于发动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关系,他在讨论一个理论模型的过程中同样也引述了很多符合其理论解释的历史典故;他的理论模型不是要提出普适性的因果规律,但非常重视贯穿现代世界史历程的变革性环境中值得深入探索的分析性关系。

---

<sup>①</sup> 译者斗胆揣摩此处“permutation”的意思是指研究者对所分析的多个概念确定因果次序或相对于研究主旨的重要性地位。——译注

其他文章通过对两到四个历史案例的深度比较进行比照分析或者建立因果关系。彼得·卡岑斯坦有关瑞士和奥地利的文章为我们描绘了两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图画,以此展示出欧洲统合主义共同框架之下相反的两个极端。韦尔和斯考克波重点分析了三个案例,她们和卡岑斯坦一样提出了一些整体性的特征,但同时也选择性地详细分析了国家组织、政治生态与经济知识水平几个方面,以此来探讨导致英国、瑞典和美国三个国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采取不同应对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卡茨纳尔逊的《从美国视角看 19 世纪的英格兰》与斯特潘对拉丁美洲南锥体四国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相互作用的探讨方式,正好处于韦尔和斯考克波的控制变量式的分析性比较与卡岑斯坦更为整体性的同异对比法之间。

余下的稿件则是对关键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典范。阿姆斯特登对台湾地区政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莱丁对约鲁巴地区族群联盟的讨论,都详细分析了单一对象,但内中也包含了重要的比较元素。在两篇文章中,比较因素体现在对所研究的历史案例的选择之中,并且明确牵涉到对案例研究结论进行一般化扩展(*generalizability*)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本书包含的一系列案例中有关国家自主性的最极端的形式。莱丁检验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经殖民地政府统治后的后遗症,而阿姆斯特登则分析了一个经过日本殖民主义浸染又经大陆中国国民党军事政权统治的不同寻常的政体。通过有意识地选择的极端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与后果,莱丁和阿姆斯登因而能够突显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当然是与其他的决定性因素一道)会更微妙难察的某些过程。

最后有必要强调一下所有入选文章共同拥有的方法论特点。它们无一不对可能被称为“世界历史环境”的大背景——他们的实证案例或样本所处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定的跨国性参数——反应敏感。



因此,卡岑斯坦会强调,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背景下研究瑞士和奥地利;如果换到另一种地缘政治和跨国经济的大环境中,与他所分析的不尽相同的制度模式和因果联系,可能会塑造出不同的公共政策过程。本书第二篇中的其他作者也同样重视其世界历史环境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理的恒定的或变动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参数。

对世界历史背景的关注,定然一直都是“以历史为基础”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的相关关系的分析的核心所在。只在一国边界之内追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分析者必须考虑在多变的跨国关系中民族国家的嵌入程度(embeddeness),这些跨国关系包括战争与国家间联盟或势力均衡、市场要素流动和国际经济中的劳动分工,以及跨国界的信息交流或文化塑造模式,等等。正因为国家本质上具有两面性,所以对于身处跨国进程与国内进程交界处的国家而言,它们的结构、能力和政策总是会受到它们所身处的特定的世界历史环境中的某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正是我们可以确认出来的。

当然,这些文章也探讨了与跨时间和跨地域因素相关的理论问题。只要回顾一下这些文章中曾经提出的关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部分论点,我们就能明白到这一点。

##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决定因素

近来新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最引人瞩目的辩论之一,是有关“国家自主性”的问题。<sup>[4]</sup>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没有自主性,它只是统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工具。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是一种体现阶级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会反复被阶级间的政治斗争所重新塑造。对这些理论家来说,这样的国家没有自主性,但阶级力量与联盟的平衡状态确实决定了给定的政权或政策是否会与

特定阶级或阶级派系的利益相冲突。还有一部分新马克思主义者虽则相信,国家在本质上相对于支配阶级具有组织上的独立性,但仍坚持认为国家不得不致力于促进资本积累,并保护阶级在整体生产模式中的支配性地位。这些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性质的讨论的大部分,采取绝对性的理论立场,目的是要将自己的结论推广到一切具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当中。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我们或许可称为新韦伯主义(neo-Weberian)的圈子里,学者们则习惯于使用强国家与弱国家这样的语言。<sup>[5]</sup>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遵循韦伯传统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国家理所当然地具有自主的潜力,因而强制力和行政工具的控制者,可以追求一些与主导阶级或任何其他社会集团不一致的目标。更能直接引起这一传统的学者们兴趣的,是国家能力之差异。作为该问题的最早的、比较粗糙的处理,一些秉承韦伯理念的比较研究学者,开始对国家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分类,他们根据各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近似于韦伯式的中央集权且充分理性化的官僚制国家理想型——这种理想的形态假定国家能有效地贯彻其意志而不会遭到社会反抗——将各个国家贴上“较强”或“较弱”的标签。譬如,按照这种观点,18世纪的普鲁士就是一个强国家,而美国则一直都是一个弱国家。当然,这种标签系统与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力量观格格不入。如果新马克思主义者真有提到强国家的概念时,他们通常是指某个拥有一个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非常强势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其国家组织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这一阶级的利益。以此来衡量国家力量的话,美国会远胜于18世纪的普鲁士。

虽然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也明确地意识到上述两派观点及其争论,但它们很少花时间辩论国家总的来说是否是自主的。它们也没有纠缠于“强国家”与“弱国家”这样空泛的二元矛盾之中。相反,这些文

章深入挖掘了有关国家结构和行为的各种不同情况。这样一来，它们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有力地补充了前面绪论中的讨论，而且帮助我们完善了这样一种理解：即在什么情况下特定类型的国家机器的掌控者可能会自主追求其目标，而在什么条件下其目标较容易实现。

至于有关国家能力的研究，各章中反复采用的一个有效策略是，找到这样一种/几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这类结构的存在（或缺失）对政府权威有效推行既定任务的能力非常关键。反过来，这种组织结构的存在或缺失，关系到政府以往的政策；因此，要理解某个国家为何具备或不具备某种特殊能力，就必须重视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举例来说，阿姆斯特登就强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汲取农业资源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当局对化肥生产和销售垄断——这一垄断地位是通过“二战”之后对台湾岛上的原日本工业资产的国有化过程确立的。而在韦尔和斯考克波有关英国、瑞典和美国的研究中，也着重应用了通过多个可比较型样本将国家能力与具体组织结构的存在，以及与以往的公共政策关联考虑的分析策略。

各位作者不仅探讨了组织层面的国家能力，他们还证明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之间并非必然存在正向关系。正如斯考克波的《找回国家》（即绪论）一文的主题所显示，国家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不同领域的的能力并不相等。这种在某一时刻（不同能力）或是不同时段（同一能力）上的国家既有能力的不平衡现象，大概是要理解国家会如何面对挑战所必须认识到的最重要的结构性特征。

对瑞士与美国政府干预农业能力的讨论，就展示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之间或完全互不相干或彼此矛盾冲突的关系。卡岑斯坦让我们看到，瑞士政府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干预能力远不如其在农业上的干预能力发达。而根据韦尔和斯考克波的分析，美国的情况也一样。更有甚者，美国政府在新政初期对农业的积极干预，实际上为日后的政



治进程奠定了基础——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和众议院保守派的力量不断增强——这一基础帮助挫败了日后美国政府发展出进行经济规划或管理高水平社会政策支出的更加综合性的国家能力的种种机会。

梯利与斯特潘的文章把不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升到了更高的普遍性分析层面。两位作者都探讨政府使用暴力手段的能力与其财政能力之间,以及与其干预经济的手段之间的关系。梯利认为,国家对暴力的根本垄断的出现和运用与其财政能力的建设紧密相联,而财政力量又随着国内与国际环境中的资源机会的不同而变化。这种财政能力,既包括现代欧洲早期国家从农民和地主手中征收税赋和监督税吏的手段,也涵纳当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中从事出口征税、争取外债或外资援助的政府机构。斯特潘对智利情况的分析明显在与梯利唱反调;斯特潘认为,某个政权在镇压能力日渐增长的同时,也会意识到其干预经济的国家能力正在不断瓦解。

当然,两人观点处理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与情景。斯特潘讨论的是一个官僚体制完备的、在国际上处于附属地位的政权,在面临已经被动员起来的社会集团时采取的内部镇压行动问题;而梯利关注的则是,正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之基业的、互相竞争的政体之间的战争状态。虽然如此,把梯利与斯特潘的观点相提并论,有助于我们坚决地避免任何把国家分成强弱两类的简单二分法,或哪怕是把国家按照某种一般化的谱系划分为较强型和较弱型的做法。两相并论还提醒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时而矛盾,时而似是而非,尤其是当这种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运用时,要更加小心留意。

总的观点并不是要说特定的国家能力在各国间是随机分布的,或是只能用历史特殊论来解释。所有的论文,特别是鲁施迈耶与埃文斯和梯利的以理论建构为导向的文章,均承认某些非常基础的财政和行



政管理能力的重要性,这些能力可以用于不同的任务当中。这些章节所揭示的国家能力之间的不同类型、不平衡性以及相互矛盾的关系,吸引着学者们对有关模式做出更加概括性的(如果不是普适性的)解释,本书的各位作者在这个方向上也有所尝试。而我们的总的看法是,特定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出现,绝不是源自某种整体性的抽象的国家能力或“国家力量”。更具规律性的分析必须探索实际的国家组织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过去的政策创新,以及与国家行为的国内外背景之间的关联。

除了有关国家能力研究的分析策略之外,本书收集的论文也对**国家自主性的动力机制**提出了启发性的思想和新颖的问题。由政府自身的领导官员“从内部”进行控制和指导的国家组织,是否就是最具有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意愿的组织?当政府进行新的干预时,自身会发生什么变化?书中的各项研究特别关注了那些潜在但仍不乏问题的自主性国家与其社会经济环境之间、与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以及与政治上活跃或潜力已被激活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有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倾向于把我们对国家问题的想象指向一些陈旧的方向。譬如,像法国政治学家普兰查斯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就断定,一个能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广泛而连贯的干预的“自主型”国家,会增强其主要国家官员与主导阶级的社会权力,这是因为国家必然要迎合主导阶级的目标和集体需要。<sup>[6]</sup>而另一种视角,即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较为粗糙的韦伯式设想,则更容易得出零和性命题。根据这一视角,官僚主义国家在实现其主动提出的目标时增强的能力,往往会减少国家“以外”的所有社会集团的力量;反过来,掌控着政治性资源之分布的、组织良好的社会集团的存在,也意味着一个自主权较低的国家。<sup>[7]</sup>而普兰查斯式观点和粗糙的韦伯式视角都同时认定,国家自主权与国家有效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是联系在一起

的。但本书中的研究,却提出了比这两种视角更辩证性的可能。

首先,国家自主性与社会集团的力量很显然可以同时提升或同时下降。这可以,比如通过可以称之为挑战与反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的种种模式来实现。本书第二篇中埃文斯的文章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强势社会行动者——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存在,刺激了具有经济干预能力的自主性国家的扩张。在另一个涉及一个非主导阶级的国内政治过程的例子中,卡茨纳尔逊论证了美国的联邦制民主政权与产业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之间的历史性演变关系。在美国,国家组织的分散与分权、自主的全国性官僚体系的缺失,以及缺乏对在居住区和工作场所的工人集体的一贯镇压,种种因素都阻碍了阶级意识或一个与工会相关的工人政党的出现。

在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以及与经济干预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阿姆斯特登对台湾地区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相对立的关系,而联系斯特潘的智利案来看她的分析也能看出这一点。阿姆斯特登表示,初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因为其不寻常地与本土社会阶级的疏离关系而力量大增,从重组农业产权关系以及挪用农业资源的能力方面来看尤其如此。但与此同时,该政权的自主性在初始阶段却妨碍了其推进工业增长的能力,因为这种自主性导致了军人和军事目标在整体国家机器中的优先地位。颇有点类似地,斯特潘也指出,智利的军事统治者为了维持其镇压政策的连贯性,并尽量不让其国家政策与组织成为对当前经济不满的社会群体的针对目标,而甘愿主动削弱其政府干预市场结果的能力。

这最后一点又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在全书章节中反复出现的理念上。不论国家在初始状态是否是自主的,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历经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导致国家自主性的减弱,并致使任何能让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的衰退。正如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所概

括的,增强其经济干预能力的国家,会蒙受这种自主性减弱和能力衰退的风险,这是因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集团往往会动员其力量,然后致力于或是直接渗透到部分国家机器之中,或是赢得否决国家政策的权力。斯特潘对巴西的分析(连同前面提到的智利案例)就提供了很好的证明。斯特潘指出,随着巴西政府日益卷入资本积累的过程,被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开始直接对抗政府并且为减少国家的自主权而奋斗。

卡岑斯坦对奥地利的讨论也为我们的上述观点提供了另一份证明。尽管国有企业在奥地利经济中的非比寻常的分量可能意味着一种高度的国家自主性,但事实上,正如卡岑斯坦所展示的,仔细观察这些企业的运作就会发现,劳工和商业团体已经通过政党代表机制稳当地渗透到企业的董事会中。历史表明,国家角色的扩张,几乎必然地会引起受到影响的经济利益集团寻求减少国有企业潜在自主权的途径,在奥地利,它们的这种努力非常成功。

因此,本书的全部文章从多个方面强化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有关“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的议题——不论其概念是指国家相对于社会集团的自主性,还是国家代表自身或他人进行干预的能力——只有通过允许非零和过程和复杂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的彻底的辩证分析,才可能获得丰富的成果。

最后,有两篇文章还提出国家机器内部的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也可能会改变国家能力和自主程度。韦尔和斯考克波对英国财政部的角色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例。英国财政部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的超强实力,确实让英国的国家机器相对于工党、进而相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更具有自主性。但是,财政部门扩张的权力也阻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因为英国政府进行部门干预或实施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不足,尽管这种能力状况可能有利于部分产业家和除失业工



人之外的国民经济。

另一个例证是斯特潘对巴西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其中特别显示出国家机器内部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到政府自主性的动因的。在斯特潘看来,经过谨慎的自上而下的“自由化”过程之后,巴西政府自主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行政部门的领袖们坚信,只有减少国家机器整体相对于公民社会的自主性,他们才能驾驭自己的安全部门!正是因为国家的镇压性自主权经常被认为是最难从外而内地改变的,所以才激发我们考虑政府内部的分化会导致这种自主权的萎缩的可能性。

本节对有关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决定因素的诸多理念的重温,已经让我们远离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宏大猜想。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概念做进一步精确界定——即使在“资本主义”一词前修饰上“发达的”或“垄断的”或“依附的”等定语——并不能增加我们对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正如本书中的研究所展示的,国家在结构与能力方面令人玩味的差异,常常发生在看似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之间。我们也再不能用区区一个“国家力量”的概念假设,就把国家组织与资源的不同特征归并到一起,甚至更糟糕的是,把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一个与国家履行某种任务的能力混为一谈。

我们并没有总结出一个全新的整体国家理论,甚至连一套全面的假设命题也没有。把我们所获得的一系列比较的和历史的发现放在一起,便能够看到探寻国家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新路径。从中我们发现能够为未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指南的某些启发式的原则,譬如直接从国家可能是自主行动者这样的宽松的前提假设开始研究的价值所在。国家究竟是否自主,取决于国家结构、国家与社会和跨国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给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等因素所组成的综合形势。本书中的研究表明,欲追溯各种关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



的相互关系模式,需要特别留意组成国家机器结构的各种正式组织、非正式网络以及共同规范。这些研究同时还表明,如同我们需要避免认为国家力量存在普遍性的特征一样,我们必须将国家能力的特定维度,以及国家行为者与其他社会集团之间一系列可能的关系细致地进行概念化。

就按照前面总结的原则构建现实的研究来说,卡岑斯坦、卡茨纳尔逊,以及韦尔和斯考克波在案例选择方面的策略,应该可以说是很理想的。这种策略需要研究者首先选择在重要性质方面基本相同的国家或历史情境,然后需要细致分析所选背景下的国家组织和能力上的差异。在本节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想用两个下一步可以进行的新的研究课题来作为说明。

研究之一是可以接着鲁施迈耶和埃文斯、埃文斯,以及阿姆斯特登的章节中所提出的诸多假想,对当代不同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政府在促进基本的经济转型——特别是工业化——上的作用,在巴西、墨西哥、韩国、台湾地区以及印度和尼日利亚尤其显著。再者,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即它们都需要在被本国疆界之外的跨国资本所主导的世界环境中进行工业化。然而,尽管在目标任务和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上基本相似,但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具体的国家结构和国家组织与国内外精英之间的关系上各不相同。然而时至今日,对这些跨越不同地缘文化区域的案例的系统性比较研究仍然缺失,这着实令人惊叹。这样的系统性比较研究,不仅能帮助人们认识当代第三世界中的国家主导型工业化模式的决定因素与结果,还能为有关国家自主性和能力的更一般化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启发。

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比较研究或许易于特别关注国家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相关关系,而我们的第二个研究指南则重视国家结构和政

策与在国内政治中活跃的为数更多的集团之间的相关关系。对当代西方各个“福利国家”进行比较研究,能够让我们发现,什么样的“充分”分配社会福利与服务的国家计划是完美的,而且似乎能够发现,在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模式存在跨国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下的福利极限。行政结构、政策传统,以及国家组织与政策专家、与政治活跃团体之间的既定的联系模式等等因素,如何能帮助我们解释面对同样张力的西方福利国家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很明显,对这一问题的谨慎的比较研究,会依据本书所提出的关于国家与政治冲突模式的重要建议,致力于解决有关国家能力的问题。这样的一项研究最有可能形成的主题之一,是福利国家先前的干预措施对不同的社会分化的政治化的影响,这些分化反过来会影响政府管理者重新认识和重新引导当前政策的可能性。

## 研究前沿:社会知识与国家干预

当我们总结出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时,有关未来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内容的指引也就呼之欲出了。我们将在本节和下一节继续探讨这些问题。但我们不会在前面已经详谈的主题方面再多费笔墨,我们想多谈谈今后的研究方向问题,这一点目前只在本书的某些篇章和绪论的文献回顾中有所提及。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一下关于社会知识与国家干预的理念;而在下一节,我们将大致提一提有关国家结构的比较研究之类的可能的方向。

国家的行动创造了对政府干预试图影响的社会过程与结构的知识性需求。早期的现代社会科学很大部分都是对国家的知识需要做出回应;从以下一些词语的构词形式中我们便可感知这一特点:如“统计学”(statistics)、“警察学”(police science)和“国家学说”(Staat-

swissenschaft)等。事实上,社会研究从很大程度上的规范性和哲学的分析法,转向一种基于事实知识的方法,很可能是现代国家崛起时最重要的知性相关产物。随着现代“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出现,各志愿团体得以提出关乎自身集体利益的措施建议,也激励了人们努力搜寻各种社会问题的信息。这些信息一经散布,会转而引起对新的国家干预的需求,而这些干预又需要更多的社会知识来支持。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随着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相互渗透,对通用性理论知识和有关特定社会与经济条件的信息等的需求,已然有了戏剧性的增长。

然而,国家“矗立在尘世之中,因而一样逃不脱反复无常、机缘凑巧乃至谬误百出的命运”,这是黑格尔的话,他的名字却常与全知全能的国家这一理想化概念相关联。<sup>[8]</sup>国家行动的知识基础,以及国家本身对社会知识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影响的过程,的确是极度重要的研究问题。这里收录的部分论文已经提示了一些可以追求的重要分析视角。因此,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提醒我们,国家很可能只支配着部分的或不完整的知识(信息)。注意到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能够提炼出一个有关国家制定并实施干预政策的能力的更真实的模型。莱丁则就国家行动如何塑造有关社会本质的基本文化认知方面提出了令人着迷的看法。韦尔和斯考克波则阐明了,瑞典、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各自政府的战略性政策决策核心中的不同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学家思想的发展和应用。

展望未来,本文所提出的诸多实质性议题,尽管考虑尚不成熟,但很可能衍生出两条迥异但同样前景远大的比较研究的路径来。第一条路径,在埃文斯有关跨国联系的文章中有一处注释,突显了那些能够帮助锻炼第三世界国家与跨国采掘业企业进行谈判的能力的规范和专业知识的跨国扩散的重要性。该思想指向一个重要的现实:对当



代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国家来讲,政策相关性知识的扩散,在塑造国家不同行动的能力上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直接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政策相关性经济知识的跨国扩散过程进行探索,或许能产生出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来。综观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有关国家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影响国内的经济生活和跨国经济过程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模型的发展和宣传,从来就不曾断缺。相关的理念和制度安排是怎么与特定的民族国家的行为联系到一起的呢?它们又是怎样扩散到其他民族国家中去的?这种联系与扩散又会对国家结构、国家能力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能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它将告诉我们,拥有不同结构和国际地位的民族国家,连同与本国政策制定过程相关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集团,是如何创造、移用或修订那些在多个国家引起反响的经济学说及其相关的制度实践的(例如计划部门或统计能力或用来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价值规范的建立)。我们可能希望对某种经济学说和特定种类的国家结构与国家能力二者之间的“配套性”或其不足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应该更多地掌握经济思想与实践方法赖以进行传播与修正的政治和社会网络的性质。或许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勘察理论、模型或制度形式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过程时,发现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国家行为或经济思想时,我们更需要的是领悟出这一充满矛盾的结果的真正含义。譬如,某个外来的理论先是被某个国家所热情采用,后来又被认为是为其外国祖宗(foreign progenitors)的利益服务的,进而激发该国自己提出一种相抗衡的理论来,就像拉丁美洲对自由贸易教条的受纳,以及“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学派”(ECLA school)后来的反应那样。

有关社会知识和国家干预的第二条未来研究之可能路径,源自韦



尔和斯考克波的文章,她们讨论了瑞典、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与各自政府对经济大萧条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将经济学作为一种职业进行分析,可能让韦尔和斯考克波过多地偏离了文章的核心问题——即探讨在一种特殊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下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她们的论文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目前重视这一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罕见,特别是大部分研究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比较政治社会学家,仍然将国家视为纯粹的(阶级)行动工具。要对国家进行社会经济干预的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知识承载行业”(knowledge-bearing)——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专业——之间的关系的演变。

当代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领域的文献喜欢问一些不顾历史渊源的问题,它们对社会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想当然地持有一种乐观主义进步观:社会科学家是否为自己的研究事业争取到了足够的资源?她们从何处争取资源?公共政策制定者或普遍关注政治的公众,是否得到了最佳的、最新的、理论强大而技术恰当的研究成果?他们又是否愿意且有能力把这“信息”付诸行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又从组织理论或政治社会学中找到什么样的解释来说明这种“非理性的”妨碍所在?<sup>[9]</sup>

我们所需要的,是必须超越于对知识利用的非历史性分析路径,避免得出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共同演化之类的宏大论述。要获得新的启示和洞察,最有可能的途径就是,对国家结构与行为如何影响社会科学自身的学术发展、协会组织及其政策应用的过程进行历史的和比较的深入调查。<sup>[10]</sup>对三到六个自由主义工业国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就有可能发现政府及其行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活动的出现和社会组织、它的学科建设以及学术倾向。然后反过来,对福利国家政策制定的特定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就能从中揭示社会科学的不同组

织与学术倾向又是怎样地影响政府为经济和社会福利目的而进行干预的整体形式和具体内容。

从以上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的简单举例中可以看出,在社会知识与国家干预的相互关系这一宏大范畴中还有很多的关键问题有待探索——尤其是有关实际的政策发展问题,不仅要在国家自身的组织结构背景中进行考察,还要考虑政策发展与一国社会内部及国家间的政策相关性思想与信息的生成与流动的相互关系。我们需要对国家如何<sup>30</sup>使用社会知识处理特定的政策难题的路径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应该留意国家机构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组织或团体(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应该探索国家官员与所有声称掌握信息和社会理论,并以此与国家行为进行政治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以及前面简单勾画的研究案例,我们必然能获得很多关于政策相关性知识的社会学知识,而且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对国家的整体理解还将得到显著的改善。

## 研究前沿:国家的形成与重组

只要回顾一下本书文章提及有关国家在政策制定和社会转变中的角色之种种不得不说的因素,读者定然会惊讶于要想更充分地了解国家自身的不同结构,我们竟然还有如此之多的东西需要知道。虽然“强”与“弱”这种粗线条的国家分类模式已被废弃,但我们还需要寻找能够更好地对国家结构进行组织分类的方法。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有效的划分方法,对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对经济转型和政治冲突的影响的比较研究就将变得更加容易。

我们显然需要调查国家结构的内在复杂性,而不是极端地把国家视为各个相互竞争的机构的一种互不相关的集合。通过对正式的官

僚机制中的预算、法律和意识形态的过程的探索,我们或能发现国家实现自身种种行动的整体协调的不同路径和程度。比较分析还有可能揭露国家结构内部的系统性断层(fault lines)。很有可能,一国政府中成立时间较长、较老的部门,特别是那些从传统的战争政权建立初期便已存在,并主要负责维持治安和从国内人口身上榨取资源的部门,在组织结构和运行程序上都有别于该国在19世纪末才建立的部门;这些较新部门负责处理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范围的扩张而兴起(进而鼓励这种扩张)的社会集团日益增多的需求。再者,不论是历史较长或较新的民族国家,政府内部涉足跨国环境的机构与纯粹负责国内事务的部门之间,也可能同样存在系统性差异。此外,各种半独立的“准国营”实体,譬如国有企业,也可能值得我们进行详细地分析和比较。这些组织通常享有法律地位,但却不在例常的行政部门管辖权限之下;在实践当中它们或者可能嵌于市场当中,或者与某个政党及分肥制度紧密相联。

虽然上述可能性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来进一步解释,但是还存在一个难题:什么样的实证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国家结构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又让我们抓住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就我们编者自身的观察来说,对国家机器的建成或重构这样的重要的分水岭时期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思路。为阐明这种可能性,我们会简单地讨论三个例子:对国家机器进行深思熟虑的改革和重组的事件;对伴随着重大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国家机器的重组的考察;以及对20世纪新型民族国家的形成的研究。每个范畴的问题在本书不同章节中已有所出现,但它们还不是书中文章的核心焦点。

首先,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比较研究来探查,既有的国家结构——特别是行政和财政制度——在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会被重组,这种重组会对政策制定能力和国家组织与行为者跟社会集团之间



的既定关系模式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尤其值得研究在已然稳固建立的国家结构内部所进行的审慎的改革或重组事件,不仅要关注这些事件当中的特定国家在实现事先声明的目标上的成功(这种情形可能为数不多),还要重视其失败和非预期的后果。对这类事件——尤其是在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这些成立已久的国家当中——的比较历史研究,将帮助我们清楚地揭示那些将复杂的现代国家内部的各个部分编织起来,或是将部分国家机构与国家的正式行政权威之外的国内外网络联结起来的结构性和运行性的纽带。由于这些纽带通常对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本身来说都是“看不见的”,因此对重组历程进行宏观角度的研究,能够让分析人员发掘出国家的重要结构特征,而这些特征一般不能透过对政府官员的访谈或研读官员著作等研究手段发现。

其次,无论在民族国家层面还是跨国地缘背景之中都有一类特殊的“重组事件”值得我们进行研究。考察在重大战争完结之时出现的国家重组,特别能启发人们理解有关国家结构的诸多基本问题。军队复员和战时财政措施与经济管制的取消是如何进行的?它们对国家能力和政治分化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国际军事力量均势的变化与随之而来的新的联盟,以及强制力和经济资源的国际流动,如何影响各个国家的国内相关局势?这些问题显然可以通过对某场特定的战争中所涉及的各个国家进行跨国比较而得到解答。此外,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对国际历史中的不同分水岭时期的研究得到解决,这些重要的转折点包括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次大战的战后时期;通过合适的程序与方法,对这些转折点时期进行相互比较,便很有可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最后,研究20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将拓宽我们对不同国家结构的跨文化理解,并在早期的比较政治学之重要成果上进一步深入。由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SSRC'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资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文集的倒数第二本著作,就是由查尔斯·梯利编辑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sup>[11]</sup>这本深有影响的著作开启了关于国家建设的历史导向分析的新天地。正如梯利在这本早期著作及本书的文章中清楚表述的,欧洲现代国家最初赖以出现以及在许多时候接受宪政结构的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等背景环境,与后殖民国家和其他新兴民族国家在当代所遭遇的处境截然不同。在实力相当且竞争激烈的国家缔造者之间的战争,(还)没有在当代第三世界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当代第三世界)这些可能的国家缔造者来说,血缘关系与地方共同体结构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困难和机会。很多当代的国家缔造者已经能够从与世界经济的连结当中获取到比通过向农民和地主征税所获得的收入更大的份额。而且,行政组织模式、经济规划、公共教育,以及一个完善的“现代”国家所应该具有的其他特征在国际间的传播,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国家的建设,在“新的”后殖民国家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更显突出。<sup>[12]</sup>

在过去的十年,从有关第三世界和东欧等地区丰富的地区研究文献中,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国家与政治系统问题的新的发现和论点。因此很有可能,只要把这些充分考虑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地区研究成果,结合那些对影响到20世纪这些国家的世界意识形态、国际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等环境因素的分析,或有可能发现许多关于当代民族国家的独特结构与能力(或缺乏能力)的新的结论。1975年版《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正式开启了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议题,现在是时候可以把现有这些有关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用前述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对民族国家形成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总的目标是,通过将最近形成的民族国家逐一进行相互对比,并且将之

与早期时代形成的民族国家相对比,寻找出各种不同的地缘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以及经济的背景等因素,如何从根本上影响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核心的行政与财政组织。我们还应当留意某些类别的政府机构,正是通过这些机构,这些国家获得了——在某种程度上讲——追求不同公共政策的能力。很显然,这种研究最终能够和对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在促进工业化与其他社会经济转型的角色的比较分析很好地联系起来。

### 关于分析与结论的几点总结性思考

本书的目标是进一步推动近来社会科学界对国家研究兴趣的高峰。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总的来说,采用较宏观的理论角度来研究国家将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相反,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必须利用当前广泛而丰富的比较研究之成果,才能对处于不同社会结构和跨国环境中的国家(复数)的结构和行为,更好地进行概念化,得出新的假设。当然,书中各章所体现出的以及本篇结论所主要谈论的、沿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各种可能性,都还存在非常多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足。试图预期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既不可能又非常武断,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沮丧。但是,有一种元理论性的考虑事关根本,我们不得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也正好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结尾。

有关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其控制的理性化扩张问题,学术界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分析、批判以及提出解决方案。然而,到目前为止,批判与解决提议已然倾向于遮蔽和限制分析。有关政府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宣告,时常主导了关于国家性质的学术辩论。直到19世纪末,对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秩序和个人自由的忠仆的理解方式,在赫伯特·斯宾塞与卡尔·马克思(尽管两人的论证方式截然相反)那里达到高

潮,两人都认为强制性控制以及他们当时所理解的国家形态终将消亡。不无讽刺的是,在大体相同的时间,脱胎于德国历史经济学和自称为“国家治理学”的更强调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阿道夫·瓦格纳,却提出了政府活动不断增长的法则。<sup>[13]</sup>透过瓦格纳的经验总结,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黑格尔关于政府作为“普遍利益”(universal interests)和公共福祉的守护者的规范性国家观的共鸣。

进入20世纪之后,我们见证了在我们之前四代的人们做梦也不能想象到的发展。两场恐怖的世界大战,还有大量试图通过国家发起的全民动员和镇压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极权统治的转型尝试,成为国家力量最为极端的体现。就连现代福利体系和公共经济中出现的威胁程度较低的、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渗透,也已超乎瓦格纳的想象。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渗透已然吸收了其国内全部生产三分之一到超过一半的产值。

这些变化已经修正了早期的国家观,但也没有完全地颠覆,而是彻底地融入到规范与事实的二元矛盾(prescriptive antinomies)之中。尽管认为国家正在消亡的观念现如今只是一种仪式性的声明或乌托邦式的幻想,然而,对一个超大权力国家的恐惧——“1984年式”<sup>①</sup>的反乌托邦式想象——促使人们不断提出关于良治社会的新的模型,以求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国家的行为。当代“福利国家的终结”(end of the welfare state)的理论(以更微妙的方式)得出的也是类似的结论;这些结论认为,国家无法独立于那些总是能够从缩减公共福利活动中捞取好处的强势社会和经济利益集团。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

---

<sup>①</sup> “1984年式”,典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著名政治讽刺小说《1984》,该书动笔于1948年,出版于1949年,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通过一个虚拟的“大洋国”和虚拟的人物,该书描述了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一种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最为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译注



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强大的民众需求和社会紧急事态的压力则要求政府不断扩张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很多次,主流经济学家几乎千篇一律地警告说,要警惕这种国家干预,因为它必然地会带来低效率和结果扭曲;然而,第一和第三世界、更不用说第二世界的政府无一例外地与上述建议背道而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的荒谬之举。它不过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二元悖论和分析与解决方案之间的相互矛盾,在整个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持续彰显。

我们认为,无论是对国家的分析和理解,还是对批判和解决方案进行更细致的区分,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发展出对国家行为与能力的前因后果的更好的理解,而再也不能动不动就认定国家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举例来说,如果社会科学家能够对市场运行、企业控制结构,以及国家行为与经济过程之间的相关关系等的前提条件和相互关系有更全面的掌握,他们就不会再受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很多规范性与政治性假设的禁锢。

然而,学术倾向上的分殊,并不是说只要抛弃某种传统张力中的任何一方就能解决的。规范性反思要想继续存在,那它就不能再武断地拆分分析和理解。事实上,若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硬壳,并进一步完善对国家能或不能有效地做什么的分析,批判性反思的研究也将受益匪浅。当然,批判性的反思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抛弃。

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要想避免对国家不断扩张的干预行为产生误解,更好的分析工具不是仪式化地重申“管治最少的就是管治最好的”(he governs best who governs least)这样的信条,而是对不同情景下的政府行动的原因和结果进行细致的分析。同时,我们还必须接受,那些主攻政府研究的学者有责任对国家为政策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给予冷静的审视。无论是国家提供“集体性灾难”(collective disasters)的案例,还是国家提供“集体福利”(collective goods)



的事件,我们都必须同等地细致分析。不管是社会集团或阶级成功驯服寄生性政府机构的事例,还是自主性国家超越狭隘利益观念促进社会福利的行为表现,我们都必须同等地深入探究。

总之,提倡把国家找回来并赋予其在社会科学的分析议程和研究路径之中更核心的地位的研究者们,必须保持警惕,以免对国家的自由主义批判与对国家能力的理论性轻视之间的旧的串联卷土重来。对国家行为的研究既不应该美化国家的力量,也不要高估其功效。要想改善我们对国家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既不需要化身纯粹的“国家主义者”(statist),也不需要立即在那场接续已久又无可避免的关于我们这些现代世界的公民希望我们的政府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的持续辩论当中选定一个阵脚。

## 注 释

[1] 参考 Florian Znaniecki, *The Method of Sociology*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4)。

[2] 在国家研究中,莱因哈特·本迪克斯的著作特别强调关注制度韧性的重要性。参考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Wiley, 1964) 和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 关于后面段落中提及的不同方法的方法讨论,参考 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The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2) (1980): 174 - 197; 斯考克波在下文中的总结: Skocpol,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amuel H. Beer, "Causal Explanation and Imaginative Re-enactment," *History and Theory* 3(1) (1963): 6 - 29; and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3) (1971): 682 - 693。

[4] 关于近期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好的调查,可参考 Bob Jessop,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77): 353 - 373; and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5] 最先采用“强国家”与“弱国家”这样的分析类别的研究包括: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1968): 559 - 592;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还有彼得·卡岑斯坦对《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的编者总结,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但是,所有这些文章在分析国家能力时也引入了更加细微的概念工具。

[6] 特别参考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 Timothy O'Hage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7] 阿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观点,就包含着这样的零和视角。请参见 Theda Skocpol, "A Reflection on Gouldner's Conceptions of State Power and Political Liber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1(1982): 821 - 830。

[8]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And ed. T. M. Knox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2), addition to sec. 258.

[9] 采用这一研究方法的一个尚佳案例,请参考: Robert F. Ri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and Public Policymak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the Use of Survey Data*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1)。

[10] 我们目前能想到的这类研究的著作包括: Philip Abrams,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ology, 1834 - 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Steven J. Diner, *A City and Its Universities: Public Policy in Chicago, 1892—191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Barry D. Karl, *Charles E. Merria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Martin Bulmer, "Science, Theory, and Val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Pover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6(1983): 353 - 369; 以及 Walter Korpi, "Ap-

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al Notes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An Evalu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 Vincent T. Covello (Cambridge, Mass. : Schenkman, 1980), pp. 287 - 314.

[11] Charles Tilly, ed.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 约翰·迈耶(John Meyer)与其同事曾经探索过“现代”国家形态及其实践的全球性扩散。参考 George M. Thomas and John Meyer, "The Expansion of th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 (1984): 461 - 482; John Meyer and Michael Hannan (eds. ),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3] Adolf Wagner, *Finanzwissenschaft*, 4 vols. (Leipzig and Heidelberg: Winter 1887 - 1901; originally 1871 - 1872).

## 作者简介

艾丽丝·阿姆斯登(Alice H. Amsden) 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院的教员。阿姆斯登的第一本著作是《肯尼亚的国际企业与劳工》[*International Firms and Labour in Kenya* (London: Frank Cass, 1971)], 最新的著作是与金林淑(Linsu Kim)合作,从技术的角度探讨南韩的工业革命,该书即将出版。此研究关注国家在加速韩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六种产业(分别是纺织业、造纸业、水泥业、钢铁业、造船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获取技术能力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她最新的论文有:“‘De-skilling’, Skilled Commodities, and the NICs’ Emerg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2)(1983): 333 - 337; “The Direction of Trade-Past and Present-and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Exports to Different Dire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Market: The Taiwan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the 1970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 本书编者之一,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和西达·斯考克波)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埃文斯已经发表了《依附性发展:多国公司、国家与地方资本在巴西的联盟》[*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以及大量有关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他目前从事的研究是巴



西计算机产业发展中的国家角色。

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 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他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同时还是《国际组织》和《康奈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编辑。他最近完成的两本关于欧洲小国的统合主义与工业调整中的政治的著作是:*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和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他最近在从事一项有关美国、西德和日本的比较研究。

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 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现就职于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与社会学系的 A. 亨利·与勒布·刘易斯教授,目前担任研究生院院长。他主要研究美国和英国的种族与阶级不平等的起源与持续问题。作为《黑色男人、白色城市:种族、政治与移民,1900—1930年间的美国与1948—1968年间的英国》[*Black Men, White Cities: Race, Politics, and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30, and Britain, 1948—196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和《城市战壕:城市政治与美国的阶级模式》[*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 两本书的作者,卡茨纳尔逊最近刚刚又与人合作完成了两本著作:*Schooling for All: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with Margaret Wei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和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edited with Aristide Zolberg;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近来他在研究英格兰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社会阶层问题。卡茨纳尔逊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戴维·莱丁(David D. Laitin)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科学教授。他发表过《政治、语言及思想:索马里实证》一书[*Politic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omali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并撰写了许多有关语言政策与非洲政治的文章。他即将发表的新书《霸权与文化: 约鲁巴民族的政治与宗教变革》(*Hegemony and Culture: Politics and Religious Change Among the Yoruba*)将对他在本书中的文章进一步扩充阐述, 同时还会讨论作为文化系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莱丁目前是一项哈佛基金(Harvard Foundation)和一项德国马歇尔基金(German Marshall Fund)的获得者, 他将利用这两项资助从事对西班牙的语言政治的研究。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 本书的编者之一, 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早先他曾分别在科隆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多伦多大学, 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学。鲁施迈耶曾经研究过知识社会学, 对发展和现代化进行过理论分析, 还探讨过职业化与专家控制的问题。在《律师及其社会》[*Lawyers and Their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一书中, 他将德国法律行业的国家主义倾向和美国律师的商业倾向进行比较, 同时将两国的这些差异关系及其历时性变化与两国的国家在历史上的角色进行比较。剑桥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 Cambridge)即将出版他的理论专著:《权力与劳动分工》(*Pow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鲁施迈耶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 本书编者之一,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教授。她(和彼得·埃文斯)都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斯考克波的第一本专著是《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获得了1979年的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和1980年的美国社会学协会杰出贡献奖(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ward for a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Scholarship)。在过去的几年中, 斯考克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社会政治与英国、瑞典和其他发达工业国的对比分析。她最

近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美国公共社会福利政治的专著。这项研究关注美国独特的、不完善的“福利国家”体制,探讨其自 19 世纪末期时起的发展历程,历经 1935 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直到最近关于这一体制之未来的各种争论。

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 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社会学和历史学,同时负责主持社会变革研究中心。他已经发表了 16 本书和专著,其中包括:*the Vende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5)。他的下一本新书将可能是 *La France Conteste,1598—1984* (Paris:Arthème Fayard)。梯利先生主要研究国家形成、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冲突与民众运动的发展。

玛格丽特·韦尔(Margaret Weir) 目前正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完成她的博士论文,1985—1986 年还将加入哈佛大学的政府系。她是(与艾拉·卡茨纳尔逊)《全民教育:美国的公共教育与工人阶级》[*Schooling for All: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U. S.* (New York:Basic Books,forthcoming)] 一书的合作者之一。韦尔目前的研究兴趣在美国“二战”后期对失业问题的政策反应。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政治局限性:1960—1980 年联邦政府对失业问题的反应》(*The Political Limits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The Federal Response to Unemployment,1960—1980*)。

# 索 引

- abertura*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333, 337 - 338
- Abranches, Sergio 瑟吉欧·阿布兰奇斯 59
- absolutism 绝对主义 179
- accounting structures 会计结构 181
- accumulation 积累 5, 45, 62; state autonomy and... 国家自主性与... 61, 66;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国有企业与 58; *see also* capital accumulation 也可参见资本积累
- Action Group (Yoruba) 行动党(约鲁巴) 291, 294, 298
- Adjudication 裁决 177
-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of state 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 51 - 53, 59 - 60, 353, 357
-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of state 国家行政机关 7, 14;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models of 模式的国际间扩散 362; sovereignty lies in 主权存在于 22; *see also* state organizations 也可参见国家组织
- Africa 非洲 255; reification of tribe in politics of 部族在政治中的具象化 303; social change, 社会变革 300; state 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308; *see also* Nigeria; Yorubaland 也可参见尼日利亚、约鲁巴地区
- Agrarian party (Sweden) 农业党(瑞典) 131, 142 - 143
- agrarian societies 农业社会 71
-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 农业调整管理 134, 136, 138, 144, 145
-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Taiwan), 农业协会(台湾地区), 81, 86
- agricultural policy: Switzerland 农业政策: 瑞士 241 - 242, 352; Taiwan, 台湾地区 66, 97, 98; U. S. 美国 13 - 14, 136, 143 - 145, 352
- agriculture: in recovery strategies (Great Depression) 农业: 恢复战略(大萧条) 142 - 145; state and 国家 40, 58



- 和 Taiwan 台湾地区 79 - 81, 84 - 88, 93, 94, 97, 351, 354; U. S. 美国 133
- air pollution (issue) 空气污染 (议题) 25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98
- Allison, Graham, *Essense of Decision* 格雷厄姆·艾利森,《决策的本质》4
- American Farmer Bureau Federation (AF-BF) 美国农业社团联合会 14, 144, 145, 146, 147, 352
- Ames, Edward, 爱德华·埃姆斯 175
- Aminzade, Ronald, 罗纳德·阿明扎德 282n33, 283n45
- Amsden, Alice, 艾丽丝·阿姆斯登 40 - 41, 42, 43, 349, 351, 354, 356
- analysis: and prescription, 分析: 与结论方式 347, 363 - 365; of state capacities 国家能力 353; structural/historical 结构性的/历史性的 42, 351
- analytical induction 分析性归纳 348 - 350
- analytical strategies 分析策略 42, 348 - 350, 351, 352; in explanation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解释工人阶级形成的 260, 261; in social knowledge research 社会知识研究 358; in state as actor and institution 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及制度组织 3 - 37, 340, 356 - 357; i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国家社会关系 256, 347; in states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国家与跨国关系 165 - 168
- ancestral cities (Yorubaland) 祖籍城邦 (约鲁巴地区) 285, 286, 288, 289, 290 - 299, 301, 306; decline of social significance/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centrality 社会重要性的衰减/盘踞着政治核心地位 299, 306, 311; loyalty to 对... 忠诚, 291; realignment of... 的重新调整 295, 303
- ancestral city identities (Yorubaland) 祖籍城邦认同感 (约鲁巴地区) 287, 290, 303, 307, 312; politicization of... 的政治化 306; reformulation of... 的重新构成 286, 299 - 300; as source of social cleavage 作为社会分化的来源 290 - 299
- antistatism (Brazil) 反国家主义 (巴西) 335
- Arabs in Israel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310 - 311
- Ardant, Gabriel 加布里埃尔·阿登特 182
- Argentina 阿根廷 58, 88, 89, 255; power relations, state-society 权力关系, 国家 - 社会 318 - 319, 329 - 331, 336, 338, 340
- armed forces 武装力量 173, 174, 177 - 178, 181 - 182; see also military (the), 也可见军事 (力量)
- Austria 奥地利 254, 349 - 350, 354; coalition governments 联合政府 235; Finance Ministry 财政部 239, 240;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penness 国际经济开放程度 165, 166;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工业与贸易部 240; Nationalization Acts, 国有化法案 238 -

- 239;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56, 237 - 241; power of state in 在...方面的国家权力 237 - 241; Second Republic 第二共和国 233 - 234, 238;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在...方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227 - 251
- autarky (Taiwan) 自给自足(台湾地区) 99, 100
- authoritarian state 威权政府 6, 63; see also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BA) regimes 也可见“官僚威权政体”
- authority: of racketeer governments 权威: 敲诈型政府的 171 - 172; of state 国家的 48;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88, 290
- authority relations 权威关系 268; in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在工人阶级社区中 267 - 268;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304 - 305
-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 202, 204, 211, 214
- automatic stabilizers 自动稳定器 148
- autonomy, bureaucratic 自主性, 官僚的 56, 60
- autonomy of state 国家自主性 6, 8, 9 - 20, 31n9, 317, 347, 349; and capacity to intervene 干预能力 68 - 70, 354; conditions for greater (自主性) 更强的条件 63 - 65; determinants of (自主性) 的决定因素 350 - 357; and distribution ... 与分配, 55, 65 - 68;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经济转型(中的自主性) 40; extreme 极端(自主性) 9 - 11; limits on (自主性) 的局限性, 62; in policy development 政策发展中的(自主性) 117 - 118; prerequisite for effective state action 有效国家行动的先决条件 60 - 62, 65, 67 - 68; structural potentials for change over time 随时间变革的结构性潜力 14; transnational loan capital and 跨国借贷资本 205; see also relative autonomy of state 也可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 Awolowo, Obafemi 奥巴费米·阿沃洛瓦 290 - 291, 292, 297, 298, 299, 306 - 307
- Bagehot, Walter, *English Constitution*, the 沃尔特·白哲特(又译白芝浩), 《英国宪制》279n10
- Bagge, Gösta 戈斯塔·巴奇 130
- Bahamas 巴哈马群岛 214
- Bahrain 巴林 214
- balance of payments: Taiwan, 收支平衡: 台湾地区 89, 103n34; U. S. 美国 215
- balkanization (of state) (国家) 的巴尔干化 64
- Ball, George 乔治·鲍尔 193
- banditry 强盗 170, 173, 175
-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212
- banks, banking: deregulation of 银行, 银行业, 解除管制 215; nationalized (Austria) 国有化(奥地利) 235, 239 - 240; Switzerland 瑞士 233; see also transnational banks (TNBs) 也可见

- 参见跨国银行(TNBs)
- Baran, Paul 保罗·巴兰 197, 199, 226n94
- Barnet, Richard 理查德·巴奈特 193
- Barry, Brian 布莱恩·巴瑞 301
- ba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omunidades Eclesias de Base) (Brazil) 基层社区组织(巴西) 332, 333, 336
- Bates, Robert 罗伯特·贝茨 301, 315n35
- Bean, Richard 理查德·比恩 177 - 178, 179
- Beardian perspective 比尔德式分析视角 114, 259
- Becker, David G. 戴维·G·贝克尔 198, 199 - 200
- Bendix, Reinhard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 31n7, 272 - 273
- Bennett, Douglas 道格拉斯·贝内特 202, 211, 214
- Berger, Suzanne 苏珊娜·伯杰 23
-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Katzenstein), 《权力与财富之间》(卡岑斯坦), 19 - 20
- Birmingham (England) 伯明翰(英格兰) 265, 280n20
- Birnbaum, Pierre 皮埃尔·伯恩鲍姆 25 - 26
- Blanco party (Uruguay) 白党(乌拉圭) 328
- Blank, Stephen 斯蒂芬·布兰克 212
- Block, Fred 弗雷德·布洛克 62
- Board of Trade, Labour Department (England) 贸易委员会, 劳工部(英格兰) 127
- Bonapartism 波拿巴主义(独裁主义) 63, 324, 340n6
- Borrus, Michael 迈克尔·博鲁斯 208 - 209
- boundaries, state 边界, 国家 184, 185
- bourgeois allies of state; in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国家间资产阶级联盟见“官僚威权政体” 320, 322, 325, 326, 331, 332, 335
- bourgeoisie; and state role in economy, 资产阶级: 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 200, 203, 204, 205 (see also elite[s]): in state-society power relations (Latin America), (也可见“精英”): 参见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拉丁美洲) 318, 319, 325 - 326, 330; transnational capital as dominant fraction of, 跨国资本成为主导性势力, 212, 216 - 217
- Brandenburg-Prussia 勃兰登堡 - 普鲁士 178, 182
- Brass, Paul 保罗·布拉斯 309
- Braudel, Fernand 费尔南·布罗代尔 173, 178
- Brazil 巴西 66, 88, 92, 207, 255 - 256, 317, 356; Bar Association 律师协会 336, 337;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324; computer industry 计算机产业 202; corporatism, 统合主义 10, 34n27, 76n58; INCRA, 巴西国家土地开发与改革局 54; power relations, state-soci-

- ety 权力关系, 国家与社会 318 - 319, 331 - 338, 339, 340; Press Association 新闻协会 336; regulation of coffee trade 咖啡贸易的管制 196, 211; state autonomy 国家自主性 354, 355;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 198, 323; TNCs 跨国企业 203, 204
- Bretton Woods System 布雷顿森林体系 215
- Briggs, Asa 阿萨·布里格斯 259, 279n8
- 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 英国工业的未来 126
- brumairian abdication of power 雾月式让权 319, 321
- Brunner, Karl 卡尔·布鲁纳 323, 341n12
- Buchanan, James 詹姆斯·布坎南 322, 323, 341n12; *Limits of Liberty, the* 自由的局限 341n13
- budget, balanced 预算, 平衡的 107, 134, 137, 148
- Bull, E., E. 布尔 229
- bureaucracy (ies) 官僚 40, 48 - 49; agrarian 农业的 45;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30, 231, 232 - 233, 234, 237, 238, 239, 240, 241; and capacity for economic intervention, 进行经济干预的能力 42, 50 - 51, 53 - 55, 59, 68, 71 - 72; construction of... 的结构 51 - 53, 59; Guomindang state (Taiwan) 国民党国家(台湾地区) 82; ideal type 理想型 351; mechanisms in... 的机制 56, 61, 360; necessity of... 的必要性 68; porous 渗透性 260; and transnational linkages 跨国联系 197, 198, 200, 202, 206, 207, 219
-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BA) regimes, 官僚权威(BA)政体 317 - 343; coercion as component of, 强制力作为(BA 政体)的组成成分, 319, 320; in East Asia, 东亚地区, 217
-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ule 官僚权威统治 255, 256
-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Halperin) 官僚政治与外交政策(霍尔珀林) 4
- bureaucratization 官僚化 254
- business: American Keynesians critical of 商业: 美国凯恩斯主义对... 的批评 140;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27, 228 - 229, 232, 243, 246, 247 - 248; Brazil 巴西 335, 337; in explanations of national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商业) 在国家对大萧条的反应的解释中 112 - 113, 114; in policy making (商业) 在政策制定中 147 - 148;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ment (Switzerland) (商业) 与政府的关系(瑞士) 243 - 244; in/and U. S. policy making 在美国政策制定中 13, 27
- business cycles 商业周期 134
- cabinet (s):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of 内阁: ... 的集体责任 232



Cameron, David 戴维·卡梅伦 208, 224n58

capacities of state 国家能力 347, 358; adaptability of...的适应性 42 - 43; determinants of...的决定因素 350 - 357;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经济转型 40; fiscal 财政 166, 352, 353; impact of state on social conflicts and 国家在社会冲突问题上的影响力 348 - 349; to realize policy goals 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 8, 9 - 20; in recovery from Great Depression 从大萧条中恢复(的能力) 148 - 149; small nations in op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小国家在开放国际关系中(的能力) 227, 228, 232; in/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在跨国关系中(的能力) 165 - 166; understanding of 对...的理解, 364

capacity of state to intervene in economy 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 166 - 167, 194;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on 制造业投资对...的影响 202 - 204; effect of TNCs on 跨国公司对...的影响 197 - 201; effect of trade on 贸易对...的影响 195 - 196, 209 - 210; limits to...的局限性 68; state autonomy and 国家自主性与... 68 - 70; state structure and 国家结构与... 50 - 60;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跨国联系与... 209 - 210, 216 - 221; U. S. 美国 142

capital 资本 63, 216; foreign, in taiwan

外国(资本), 台湾地区 90 - 94, 99; international centers of...的国际中心 193, 212 - 213; see also transnational capital 也可参见跨国资本

capital accumulation 资本积累 46, 348 - 349; and military expansion...与军事扩张 179; peasant production as basis for 农业产品作为...的基础 86 - 87; state 国家 39, 44, 49 - 50, 219; and state domination of civil society...和国家对公民社会的主导 339; state in (Taiwan) 国家在(台湾地区) 78, 85, 89 - 90, 101; state projects in contradiction to (Latin America) 国家计划与...相矛盾(拉丁美洲) 324, 339; Third World states 第三世界国家 40, 194 - 195; in war making...在发动战争中(的作用) 172

capital controls 资本控制 215 - 216

capital exporters 资本输出国 193, 194, 210 - 213

capital exports, and state's role in economy 资本出口, 和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 210 - 213, 219

capital flows: asymmetrical 资本流动: 不对称 193; control of 控制... 215; international 国际 192 - 193;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216

capital formation: by state 资本形成: 国家(促进)... 57 - 59; Taiwan, 台湾地区 90 - 91, 93 - 94, 97, 105n70

capital markets 资本市场 193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6, 62, 357; attempts

- to restructure(Latin America) 试图重新建构…(拉丁美洲) 318, 320; bureaucratic(China) 官僚(中国) 87; role of government in 政府在…中的角色 126; and state making…与国家形成 170, 172, 176 - 177, 179; *see also* liberal capitalism 也可参见自由资本主义
- capitalist state(s) 资本主义国家 6, 7, 50, 350, 355;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challenge to theory of 拉丁美洲的经验对…理论提出挑战 324, 330; state ac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中的国家行为与阶级关系 60 - 62;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46; *see also* industrial-capitalist nations 也可参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 Cardenas, Lazaro 拉扎罗·卡德纳斯 200
- Cardoso, F. H., F. H. 卡多佐 47
- cartels, 卡特尔 90, 231
- Catholic, Church, in Brazil 天主教徒, 教堂, 巴西, 332, 336
- Cayman islands 开曼群岛 214
- censorship: Brazil 审查: 巴西 334, 336; Uruguay, 乌拉圭, 325
- center countries, *see* core countries 中心国家, 参见“核心国家”
- centralization 集权化 55 - 57, 254; and agriculture(Taiwan) …和农业(台湾地区), 85 - 86, 87; Austria 奥地利 231, 235; England 英格兰 271; of labor movement 劳工运动的… 229 - 230
- challenge and response patterns 挑战和反应模式, 353 - 354
- change: initiatives for(Latin America) 变革: 就…提出议案(拉丁美洲), 318; state-propelled 国家推动型 17; *see also* economic change; social change 也可参见经济变革, 社会变革
- Chartism 宪章运动、宪章主义 258, 269, 276 - 277, 281n30
- Cheng, Tun-jeng 程敦正 203, 204, 205, 206
-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322 - 323, 324
- Chile 智利 63, 255 - 256, 329, 330, 334, 336, 339, 352; military 军事 93; “Nuevo Trato” legislation “新政”立法 198; power relations, state autonomy 权力关系, 国家自主性 354; state-society 国家与社会 318 - 324, 339 - 334; takeover of Anaconda 接管阿纳康达(铜业公司, 美国企业) 199
- China 中国 87, 100, 174, 178
- Chinese Nationalists: 中国国民党 81, 84
- Chorley(England) 乔利镇(英格兰), 265, 266 - 267
- Christian Democrats(Chile) 基督教民主党(智利) 322, 328
- Christian Yorubas 约鲁巴基督教徒 285, 289, 282 - 289, 302 - 303, 305 - 306, 307
- Cities, social geography of 城市: 地理社

- 会学 281n27
- city-kingdoms, Yorubaland 城邦王国: 约鲁巴地区 287, 288
- city space, *see* urban space 城市空间, 参见“市区空间”
- city-states 城邦 174, 178
- City Trenches* (Katznelson) 《城市战壕》(卡茨纳尔逊) 26, 254
- civil servants: *esprit de corps* 公务员: 集体主义精神 51, 56; policy making by 由...制定政策 11 - 12
- civil service: Austria/Switzerland 公务员: 奥地利/瑞士 232, 234; Great Britain 英国 115, 127, 128, 274; Nigeria 尼日利亚 294
- civil service jobs, competition for (Yorubaland) 公务员职位: 竞争... (约鲁巴地区) 291, 292, 305
- civil society: contradictions of, embedded in state 公民社会: 与...相矛盾, 嵌于国家之中 69; state and 国家与... 6, 7 (*see also* state-society relations, 也可参见国家 - 社会关系); state domination of 国家对...的主导 256, 320, 323 - 324, 329, 338, 349; strength of, vis-à-vis state power (Latin America) ...的力量, 相对于国家权力(拉丁美洲) 317 - 343
- class: as cleavage 阶级: 作为(社会)分化的... 285; emergence of, ...的出现, 258 - 259; global consciousness of ...的全球意识 258, 262, 263, 265, 269, 270, 273, 275, 276, 277, 278; politicization of ...的政治化 254, 255; and right to vote (England) ...和投票权(英格兰) 273, 275; and work/community ...和工作/社区 272; in working-class dispositions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工人阶级的性情、组织与行为 258, 259, 260; *see also* dominant class, 也可参见“主流阶级”
- class alliances 阶级联盟 280n10
- class conflict 阶级冲突 5, 259, 350; and autonomy of state ...与国家自主性 63; Chile 智利 320; economic change and 经济变化与... 98; impact of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ule on 官僚权威统治对...的影响 256; and state domination of civil society ...与国家对社会的主导 339 - 340; in state-society power relations (Latin America) 见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拉丁美洲) 318, 320, 329, 339 - 340; strength of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s and 工人阶级组织与...的力量 112 - 114
- class formation 阶级形成 3, 253; franchise and 选举权与... 273; spatial arrangements and 空间分布与..., 268
- class identity(ies) 阶级认同 300
- class interests: Austria 阶级利益: 奥地利 235; reintegration of ...的重新整合 245; state autonomy and 国家自主性与... 253
- class model working-class formation 阶级模型, 工人阶级的形成 261 - 262
- class relations 阶级关系 6;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与收入再分配 67;

- state action and 国家行为与…39, 60-68; Taiwan 台湾地区 87
-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 by state 阶级结构…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44-45
-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ster) 《阶级结构与工业革命》(福斯特) 268-269
- classes, protection and 阶级, 保护与… 181, 184, 185-186; *see also* dominant class 也可参见主流阶级
- cleavage bases, hierarchy of 分化基础…的层级 285, 287, 299
- cleavage patterns: clerical-secular political (France) 分化模式: 政教分离(法国) 316n59; as function of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control …作为政治控制战略的功能 308; India 印度 309-310;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86, 289-290, 300-303, 307-308
- cleavages: clerical-secular political 分化: 政教分离 316n59; competing (Yorubaland) 竞争性…(约鲁巴地区) 290-309; and state autonomy …与国家自主性 64-65; *see also* political cleavages; social cleavages; socio-cultural cleavages 也可参见政治分化、社会分化、社会文化的分化
- coalitions, in national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联合, 见国家对大萧条的反应 114-115, 117, 120, 148; of states 国家间的联合 184
- coercion 强制 61, 65, 70, 169-170, 287, 350; in BA regimes 官僚威权政体中的…319, 320; demise of state 国家的消亡 363; monopolization of, by state(国家)对…的垄断 175, 181; *see also* violence 也可参见暴力
- coercive apparatus of state 国家的强制机器 7, 14; in state-society power relations (Latin America) 国家与社会间权力关系中的…(拉丁美洲) 318, 319, 320, 322, 324, 325, 328, 329, 338, 339
- coherence 一致性 55, 56, 57, 60, 61, 64;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与收入再分配 66; of state as corporate actor 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国家…68-70
- Colbert, Jean Baptiste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 179
- 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 256; logic of …的逻辑 300; need for …的需要 48; potential for …的潜力 321-322; state routines and statutes and 国家惯例和法令与…319;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 268
- “collective disasters” “集体性灾难” 62, 364
- collective goods 集体利益 61, 62, 68, 364
- collective identities, formation of 集体认同, …的形成 72, 254; in state apparatus 国家机器中的…47, 51, 59-60
- Colombia 哥伦比亚 89
- colonial administration(s) 殖民地政府/殖民当局 195; influence on politiciza-



- tion of sociocultural cleavages 对社会文化的分化之政治化的影响 286 - 287, 308 - 312 (see also colonial heritage 也可参见殖民地遗产); as resource for state organizations ... 作为国家组织的来源 52, 79 - 82
- colonial empires, dismantlement of 殖民帝国, ... 的解体 6
- colonial heritage 殖民地遗产 226n93; Taiwan 台湾地区 79 - 82, 86, 87, 98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194, 255, 349; battle against, in Africa 反抗... 的斗争, 在非洲 292 - 293; Great Britain (Yorubaland) 英国(约鲁巴地区) 285 - 316
- Colorado party (Uruguay) 科罗拉多党(乌拉圭) 328
- Combination Acts (England) 《合并法案》(英格兰) 277
- commercial Keynesianism 商业凯恩斯主义 41, 108, 109, 133, 147 - 148
-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Taiwan) 商业化, 农业(台湾地区) 79; and size of government ... 与政府规模 182
-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ED) 经济发展委员会(CED) 147, 148
- "common sense", as ideological force of hegemony "常识", 作为霸权的意识形态力量 307 - 308, 339
- "Common school" 公立小学 136
- communal group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社群团体, 对... 的政治动员 302
- communal identities, persistence of 共同体认同, 对... 的坚持 301 - 302
-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交流, 国际... 8, 9
- Communists (Chile) 共产主义者(智利) 322
- Compagnie Francaise Pétrole (CFP) 法国石油公司 209
- 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 淡水河谷公司(巴西铁矿石生产商) 198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lonial hegemonic control in 比较的视角: ... 下的殖民地霸权控制 308 - 311; ethnic political arousal in ... 下的种族政治的起源 307
-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比较历史研究 70, 348, 363; cleavages in ... 中的分化议题 285; questions to be addressed 需要强调的问题 347, 356, 358 - 359; on social knowledge 关于社会知识的... 358; on state structures 关于国家结构的... 21 - 25, 360 - 363; strategies in ... 的战略 356 - 357 (see also analytical strategies 也可参见分析策略)
- comparisons: cross-national 比较: 跨国... 18; historically grounded 基于历史的... 348 - 350
- competition 竞争 6, 57, 227; ideal typical model of ... 的理想模型 45; for resources, reward 资源..., 回报 300; among states 国家间... 8, 184, 185,

- 192, 208, 209, 217, 228, 236, 245 - 246
- compradore merchants 买办商人 194
- computer industry 计算机产业 202, 204
- conflict(s): socioeconomic 冲突: 社会经济的...68; state as arena of 国家作为...的平台 47, 60, 64, 69 - 70; with TNCs 与跨国公司发生...200, 203, 216; *see also* class conflict; social conflict 也可参见阶级冲突、社会冲突
- conservatism: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保守主义: ...对经济大萧条的反应 107, 112; of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的...261, 270
-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Great Britain) 保守党政府(英国) 213
- Conservative party (Great Britain) 保守党(英国) 108 - 109, 113, 121, 122
- Conservative party (Sweden) 保守党(瑞典) 143
-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 (OVP) (Austria) 保守派的人民党(OVP)(奥地利) 237 - 241
- constitution(s): Chile 宪法: 智利 320 - 321; Nigeria 尼日利亚 298; Uruguay 乌拉圭 326 - 327
- constitutional continuity 宪政连续性 260
- Constitutional Drafting Committee (Yorubaland) 宪法起草委员会(约鲁巴地区) 298
-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state autonomy in 宪政政治学, ...中的国家自主性 11 - 14
- "Constitutionalism, Clas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 in U. S. Foreign Policy" (Katznelson and Prewitt) 《宪政主义、阶级与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约束》(卡茨纳尔逊和普鲁伊特) 18, 22
- Continental European perspective 大陆欧洲的视角 7 - 8
- continuity: constitutional 连续性: 宪政的...260; historical 历史的...348
- contract 契约 71; noncontractual elements of ...的非契约因素 51, 72
- cooptation 增选(招安) 53, 60, 66, 67, 175; by hegemonic state 由霸权国家...310, 311; of local rulers by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由殖民当局...当地统治者 287
- copper industry 产铜业 198, 201
- core countries: decline of 核心国家: ...的衰落 219; power of ...的权力 193;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elites and state managers in ...中经济精英和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167;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跨国联系与... 192, 194, 207 - 216
- corporate power, transnational 公司的权力, 跨国...193
- corporations, transnational, *se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公司, 跨国..., 参见跨国公司(TNCs)
- corporatism 统合主义 18, 22 - 24, 76n58, 166, 167, 253, 254, 349; Austria/Switzer-

- land 奥地利/瑞士 231, 237, 240;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9 - 10; private 私人 147; small nations 小国 227
-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U. S.) 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 147
- countertheory 与...相抗衡的理论 359
- courts 法院 181
- "Cow Deal" (Sweden) "母牛交易"(瑞典) 131, 141, 142, 143
- credit 信贷 17, 20, 179; agricultural (Taiwan) 农业(台湾) 86, 87
- Crenson, Matthew 马修·克伦森 25
- crisis(es): civil service response to 危机: 政府官员对...的反应 11 - 12; and state autonomy ... 与国家自主性 14, 64 - 65; state response to 国家对...的反应 10 - 11; *see also* economic crisis(es) 也可参见经济危机
- Crossick, Geoffrey 杰弗里·克罗辛克 281n31
-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文化人类学家 3
- cultural diversity (Switzerland) 文化多元性(瑞士) 229 - 230
- cultural product, role of hegemonic state in fashioning 文化产品, 霸权国家在塑造...方面的作用 308, 311, 312
- culture: common (Yorubaland) 文化: 共同... (约鲁巴地区) 289; fashioned and reified by hegemonic control 被霸权控制所塑造和具象化的... 308, 310, 311; homogeneous 同质... 182; stance of government toward 政府对...的立场 287;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 281n31
- currency(ies): sound 通货: 硬... 126; stable 稳健... 215
- Currie, Lauchlin 洛荷林·居里 138, 141
- custom(s) 习惯 53
- Dalton, Hugh 休·道尔顿 129
- Davis, J. Ronnie 罗尼·J·戴维斯 133 - 134
- Davis, Stanley 斯坦利·戴维斯 218
- debt: Brazil 债务: 巴西... 335 - 336; national 国家... 133, 179 - 180;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94, 205 - 207
- debt service/export ratio (Taiwan) 偿债比率(台湾地区) 93
- decentralization 分权 51, 55 - 57, 60; federal (U. S.) 联邦... (美国) 135;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 58 - 59; Switzerland 瑞士 231 - 232, 235, 244, 248
- decision making 决策 4; Argentina 阿根廷 329; Brazil 巴西 332, 334; collegial, Uruguay 大学..., 乌拉圭 326; efficient 有效... 55 - 56
-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185, 186
-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Krasner) 《捍卫国家利益》(克拉斯纳) 12 - 13, 214n83
- defense 国防 48
- deficit government spending 政府赤字财政 107, 108, 111, 115 - 116, 253; as recovery strategy ... 作为一种恢复战略

- 148, 149; Sweden 瑞典 120, 129, 131 - 132; U. S. 美国 132, 134 - 135, 136, 137, 138 - 139, 141; *see also* public spending 也可参见“公共支出”
- Delacroix, Jacques 雅克·德拉克罗瓦 207
- delegitimation 丧失合法性 70
- demands (on state) (对国家的) 需求 357, 360; politicization of ... 的政治化 254; state's response to 国家对... 的反应 253; for workers 工人... 260, 264, 270, 274, 278
- democracy: direct (Switzerland) 民主: 直接... (瑞士) 244, 245; Jeffersonian 杰弗逊式民主 176; transition to 向... 转型 255, 256
- Democracy in America* (Tocqueville)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21, 271
- Democratic party (U. S.) 民主党(美国) 112, 132, 133, 134, 137, 143 - 144, 145
- democratic socialism 民主社会主义 63 - 64; Austria 奥地利 227, 246
-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 26, 254; U. S. 美国 26, 27
- Denmark 丹麦 182;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153n24
- dependency 依附, 依赖 168; loan capital and 借贷资本及... 206; Third World states 第三世界国家 194, 197
- dependency approach 依附论 193
- depression (s) (经济) 萧条 228, 231, 235; *see also* Great Depression 也可见“大萧条”
- despotism 专制主义 176
- developing countries: green revolution in 发展中国家: ... 中的绿色革命 85; post-World War II “二战”之后 192 - 226; *see also* Third World 也可见“第三世界”
- developmentalism 发展主义 20
- developmentalist state 发展主义国家 199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专政 64
- diseconomies of scale, in command and control 规模不经济, 指挥和控制上的... 177 - 178
- displacement effect 替代效应 180
- distribution 分配 44, 46, 49 - 50;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组织能力与... 53 - 55; politics of ... 政治 274; state autonomy and 国家自主性与... 65 - 68;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国有企业与... 59
- divisibility (of political goods) (政治利益的) 可分割性 177
- domestic order 国内秩序 9, 10, 11, 12
- dominant class; and protection-providing government 主流阶级: ... 与提供保护的政府 176; relation with state 与政府/国家的关系 10 - 11, 40, 44 - 45, 47, 48, 49, 54, 62, 63 - 66, 68; and state autonomy ... 与国家自主性 63 - 65, 353
- domination; cleavages in pact of 统治: ... 契约内部的分化 64 - 65; interstate 州



- 际间...8; state as an instrument of 国家作为一种...的工具 47, 48, 339 - 340; state over civil society 国家对公民社会的... 320, 323 - 324, 329, 338, 349; strategies of, of hegemonic state ... 战略, 霸权国家的... 战略 255
- drinking places, working-class 酒馆, 工人阶级 258, 262, 269 - 270
- Durkheim, Emile 埃米尔·涂尔干 44, 51, 59, 72
- Durkheimian school 涂尔干学派 316n50
-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 178
- Dyson, Kenneth 肯尼思·戴森 272
- Eccles, Marriner 马里纳·埃克尔斯 138, 141
- ECLA school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ECLA) 学派 (拉丁美洲) 359
-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经济条件, ... 与对大萧条的反应, 110 - 111
- economic crisis (es): Chile 经济危机: 智利 324; effect on public finance 对公共金融/财政的影响 107; state response to 国家对... 的反应 41 - 43; Swiss response to 瑞士人对... 的反应 244 - 245
-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经济发展 (增长) 68; Brazil 巴西 331 - 332; protection and 保护与... 177; state and 国家与... 3, 7, 39 - 43; Taiwan 台湾地区 78 - 106; transnational flows of goods and capital and 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与... 192; uneven 不平衡 71
- economic goals: and expansion of state's economic role 经济目标: ... 与国家经济角色的扩张 194, 201, 211 - 212; state's capacity to realize 国家实现... 的能力 201, 204, 206
- economic historians 经济史学家 3
- economic ideas, new,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经济理念, 新的..., 以应对大萧条 109, 115 - 117, 119, 126 - 132, 148, 149
- economic planning: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models of 经济规划: ... 模式的国际间扩散 362; Taiwan 台湾地区 79, 94
-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 An* (pamphlet) 《为美国民主而实施的经济项目》(一本小册子) 140
- economic relations, transnational 经济关系, 跨国... 8, 165, 166
-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 107, 364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tate and 经济转型, 国家与... 44 - 77, 356, 360
- economic-determinist theory, variation in national responses to Great Depression 经济决定论, 各国家对大萧条的反应的不同 110 - 111
- economics 经济学 41; Keynesian 凯恩斯... 41 - 42, 43 (see also Keynesian-

- ism,也可参见“凯恩斯主义”); as a profession 作为一种职业 359
- economics of scale 规模经济 236; in production of violence 暴力生产的… 175, 177 - 178
- economists 经济学家 364; access to policy centers 进入政策中心的途径 129, 130 - 131, 133 - 134, 136, 138, 140 - 141, 146, 147 - 148, 149, 358
- education: Nigeria 教育: 尼日利亚 294; Taiwan 台湾地区 96 - 97;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91 - 292, 297, 305 - 306
- efficacy of state 国家的效力/效益 48, 55 - 56; as agent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作为经济改革/转型的代理人 68 - 69; autonomy and 自主性与…49
- Egypt 埃及 10
- “Eighteenth Brumaire, The” (Marx) 《雾月十八日》(马克思) 340n6
- elections: Brazil 选举: 巴西 334, 338; Chile 智利 322; Uruguay 乌拉圭 328;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91 - 292, 298
-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 电力生产 57 - 58
- electronics industry 电子产业 209
- Eley, Geoff 杰夫·埃利 279n9
- elite(s): bureaucratic 精英: 官僚…59; capitalist 资本家 60; Christian dominance in (Yorubaland) 基督徒在…中的主导(约鲁巴地区) 294; colonial ruling 殖民统治 308; and extreme autonomous state action …与极端自主的国家行为 9 - 11;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63; local, in hegemonic control model 地方…, 霸权控制模型中的地方…309, 310, 311; peripheral 边缘/外围…193; political 政治…231, 232, 306 - 307; precapitalist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45; religious 宗教…311; rule by …统治 101; splits among …内部分歧 256; state 国家…16 - 17, 47, 51, 52, 53, 61 - 62, 232; state power vis-à-vis 国家相对于…的力量 194, 196, 200, 202, 204, 205; Taiwan 台湾地区 85, 87;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94, 198, 199, 202; transnational 跨国…167, 202, 220;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305
- elite bargaining 精英谈判 287
- Elton, G. R. G. R. 埃尔顿 180
- Employment Act of 1946 (U. S.) 1946 年就业法(美国) 147
- employment legislation (U. S.) 就业立法(美国) 146 - 147
- enforcement: by state 强制执行: 由国家…47, 48; *see also* coercion 也可参见“强制力”
- Engels,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101, 279n10
- England 英格兰 178; fiscal structure 财政结构 182; government and violence in 政府与在…的暴行 173 - 174; national debt 全国性债务 180; as weak

- state 作为弱国家 271 - 272; working-class formation 工人阶级的形成 257 - 284; see also Great Britain 也可见“大不列颠”
- English Constitution, The* (Bagehot) 《英国宪制》(白哲特) 280n10
- English Revolution of 1640 1640 年英国革命 183
- 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精神 45; supplied by state 由国家提供...57
- esprit de corps 集体主义精神 51, 56
- Essence of Decision* (Allison) 《决策的本质》(艾利森) 4
- étatisme 国家社会主义 232; Guomindang regime 国民党政权 87, 91
- ethnic cleavages 种族/族群分化 65, 285; politicization of ...的政治化 286 - 287
- ethnic groups 族群 3; persistence of 坚持...(特性) 301, 307
- ethnic identity(ies) 族群认同 300; persistence of 坚持...301
- ethnicity: as cleavages 种族划分: 以...为界限 285; in saloon politics 沙龙政治里的... 258, 259, 271 - 272; and state autonomy ...与国家自主性 65
- Eurocurrency markets 欧洲货币市场 193, 205, 212, 214; regulation of 对...进行规制 215 - 216
- Europe 欧洲 148; impact of state on politics in 国家对...政治的影响 22 - 23, 24 - 25;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208; 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us differences in ...宗教差异的政治化 302; state structure 国家结构 271;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in 战争发动与...国家的形成 169 - 191;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工人阶级的形成 261 - 262
- Evans, Peter 彼得·埃文斯 40, 42, 43, 165, 166 - 167, 168, 253, 348 - 349, 352 - 353, 354, 356, 358
- exceptional rule 例外法则 326; Chile 智利 321; Uruguay 乌拉圭 328
- exchange, unequal 交换, 不平等...195
- exchange rates 汇率 216; flexible 弹性... 245
- executive, depoliticization of (Switzerland) 行政官员, ...的非政治化(瑞士) 232
- executive power (U. S.) 行政权力(美国) 142
- expert access to policy-making centers 进入决策中心的专家渠道 118 - 119;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在对大萧条的反应中 109, 120, 146, 147 - 148, 149; state structure and 国家结构与...125 - 132, 135 - 136
- expertise; and effective action 专业知识: ...与有效行动 52 - 53; necessary to bureaucracy 对官僚机构非常必要 51; in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tate 在今后有关国家的研究中 357 - 360; and policy development ...与政策发展 126; in Swedish policy planning 在瑞典的政策规划中 130
- exploitation, coercive 剥削, 强制性...

- 169 - 170
- export-led growth, Taiwan 出口导向型增长, 台湾地区 88 - 90, 91, 96, 98, 99, 100, 101
- exports: Brazilian 出口: 巴西的... 196, 211;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 192; capital 资本 210 - 213, 219; Sweden 瑞典 131 - 132; Taiwan 台湾地区 94
- expressive behavior,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and 表达行为,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 70 - 72
- extraction 征收/汲取 7, 166, 171, 181 - 184, 195; regressive 累退式... 66; for war making 为发动战争而... 172
- extractive industries 采掘业 216, 358; effects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on Third World states 对... 直接投资的效果, 第三世界国家 194, 197 - 201, 202, 203, 204, 206
- extractive investments, Third World 采掘业投资, 第三世界 196 - 201
- factory(ies) 工厂 269
- factory system 工厂制度 263 - 264
- factory town(s) 工业乡镇 264 - 265, 268
- Fafunwa, A. B. A. B. 费芬瓦 293
- Fainstein, Norman 诺曼·费恩斯坦 18, 27
- Fainstein, Susan 苏珊·费恩斯坦 18, 27
- Falcon, W. P. W. P. 福尔肯 86
- false consciousness 虚假意识 281n30
- family, cultural importance of (Yoruba) 家庭, ... 的文化重要性 (约鲁巴) 295, 296t
- family employment, diversification of 同一家庭就业情况, ... 的多样化 267
-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农业安全局 144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28, 230, 235, 243
- Federal Aliens' Police (Switzerland) 联邦外事警察 (瑞士) 243
- Federal Reserve Board 联邦储备委员会 138, 215
- federal system: Switzerland 联邦体制: 瑞士 228, 230; U. S. 美国 271, 278, 354
- federalism, participatory (U. S.) 联邦主义, 共享式... (美国) 273 - 274
- Ferguson, Thomas 托马斯·弗格森 114
- fertilizer industry 化肥工业 58, 86, 351
- feudalism 封建主义 165
- Field, Alexander J. 亚历山大·J·菲尔德 315n35
- financial markets, regulation of 金融市场, ... 管制 216
- financial resources 财政资源 16 - 17; central control of 对... 的集中控制 56
- Finegold, Kenneth 肯尼思·芬戈尔德 13 - 14
- First World 第一世界 167
- fiscal capacities of state 国家的财政能力 166, 353; and monopoly on violence ... 与对暴力的垄断 352



- fiscal linkages 财政联系 197
- fiscal structures 财政结构 181, 182, 185
- Food and Drug Acts (England) 《食品与药品法案》(英格兰) 274
- force; legitimate/illegitimate 武力: 合法/非法... 171, 173; *see also* coercion; violence 也可参见“强制力”、“暴力”
- foreign aid 外国援助 35n45, 217; Taiwan 台湾地区 90 - 94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 192, 193, 209, 210; in extractive industries 在采掘业方面的... 197 - 201;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与国家经济的干预 202 - 204; Taiwan 台湾地区 99, 100
- foreign policy (U. S.) 外交政策(美国) 12 - 13, 19, 214
- foreign trade policy (Austria/Switzerland) 对外贸易政策(奥地利/瑞士) 242, 246
-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The* (Tilly) 《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梯利) 362
- forward integration 前向整合 198, 201
- Foster, Joh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约翰·福斯特, 《阶级斗争与工业革命》268 - 269
- France 法国 20, 24, 185;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tate expansion 资本积累与国家扩张 179 - 180; clerical-secular political cleavages 宗教阶层与世俗阶层的政治性分歧/政治性的政教分歧 316n59;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殖民统治/殖民地管理 310 - 311; Fronde 投石党 180; government and violence 政府与暴力 174; growth of state 国家的增长 170; labor aristocracy 劳工贵族 264; policy instruments 政策工具 18, 312; social protest in... 的社会抗议 23; state structure 国家结构 271; working-class movement 工人阶级运动 25 - 26
- franchise 选举权 230; Sweden 瑞典 130; *see also* suffrage; vote 也可见“选举权”、“投票”
- free-market principles, lacking in Taiwan economy 自由市场原则, 台湾地区经济中缺少... 88 - 90, 103n30
- “free ride” 搭便车 211, 302, 311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21
- Frieden, Jeff 杰夫·弗里登 205
- Friedman, Milton 米尔顿·弗里德曼 341n12
- friendly societies 友好社会 269 - 270
- Fulani, *jihad* 富拉尼族, 圣战 295, 297
- full employment: Austria 充分就业: 奥地利 240, 246; Sweden 瑞典 108, 109, 112; U. S. 美国 148
- Full Employment Bill (U. S.) 《充分就业法案》(美国) 146, 147
- full-employment welfare state 充分就业福利国家 112, 114, 123; Sweden 瑞典 113
-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功能主义视角 46, 110 - 111; *see also* structure-func-

- tionalist perspective 也可见“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140
- Galenson, Walter 沃尔特·盖伦森 229
- Gazeta Mercantil* (Brazil) 《商业时报》(巴西) 337
- Geertz, Clifford 克利福德·吉尔兹 286
- General Agreements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 242
-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The* (Keynes)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107, 115 - 117, 128, 132, 147, 150n3
- generalizability, of causal hypothesis 一般化扩展, 因果命题的... 348, 349
- generalizations, middle-range 普遍化, 中层 28
- geopolitical aims 地缘政治目标 194; and interests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 ... 与跨国资本的利益 213 - 216, 217, 219 - 220, 248
-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地缘政治竞争, 国际... 165, 166, 167
- geopolitical factors 地缘政治因素 8; in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中的... 100 - 101; and U. S. foreign policy ... 与美国外交政策 13
- George, Lloyd 劳埃德·乔治 126
- Gereffi, Gary 加里·格雷菲 204
- Germany 德国 20, 115, 182, 185, 231;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153n25; transnational linkages 跨国联系 207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39, 44, 229
- Gilbert, Bentley 本特利·吉尔伯特 122
-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 England) 光荣革命(1688, 英格兰) 271
- Gold, Thomas B. 托马斯·B. 戈尔德 203
-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107, 109, 115, 120, 122, 126, 215
- good society, models of 美好社会, ... 的模范/模型 364
- Gouldner, Alvin 阿尔文·古德纳 365n7
- Gourevitch, Peter 彼得·古勒维奇 114 - 115
- government(s): activities of 政府: ... 的行为 177; growth of: England 政府的增长: 英格兰 274 - 275; modes of control influence politicization of cleavages 控制分歧影响政治化的模式 286 - 287, 305, 306, 308, 312; ownership of resources (Taiwan) 资源的所有者(台湾地区) 79 (*see als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也可参见“国有企业”); professionalization of ... 的职业化/专业化 274; provision of protection by 由... 提供的保护 171 - 172, 175 - 177; role of, in liberal theory ... 的角色, 自由主义理论中... 的角色 126; size of ... 的规模 182; as umpire ... 作

为仲裁人 137; views of,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关于…的观点, 社会科学中的…观点 4; and violence …与暴力 171 - 175; *see also* state(s) 也可参见“国家”

government agencies: in policy decision 政府机构: 政策决策中的…4; *see also* state agencies 也可参见“国家机构”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see*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参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government regulation 政府管制 97 - 98, 134, 136

gradualism, working-class 渐进主义, 工人阶级 261, 263, 264, 273, 276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281n31, 287, 303

Gray, Robert 罗伯特·格雷 281n31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英国) 20, 185, 351; Board of Trade 贸易委员会 121; capital exports 资本输出 212 - 213; civil service 公务员 232;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255, 285 - 316; decline as power 权力衰落 219 - 220; deficit-financed public works 通过赤字财政支持的公共工程 41, 43; early Depression years 大萧条早期 120 - 132;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 经济顾问委员会 128; geopolitical aims 地缘政治目标 213, 217; impact of state on politics 国家对政治的影响 22, 23; Local Government Board 地方政

府当局 127; Ministry of Labor 劳工部 121, 127; as model for worl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作为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型 6; policy instruments 政策工具 18;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 [*see also* Conservative party (Great Britain); Labor Party (Great Britain) 也可参见“保守党(英国)”、“工党(英国)”]; possibility of Keynesia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对大萧条做出凯恩斯式反应的可能性 107 - 163, 349, 359; state autonomy 国家自主性 11 - 12, 14; state-centered theory 国家中心主义理论 7; Treasury control of policy 财政部对政策的控制 115, 122, 127, 128, 355; Unemployment Committee 失业委员会 126; weak state 弱国家 254; working-class movement 工人阶级运动 25 - 26; *see also* England 也可参见“英格兰”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41, 196;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response to 对…的反应的解释变量 109 - 119; possibilities of Keynesian response to 对…做出凯恩斯式反应的可能性 107 - 163, 349, 359

green revolution 绿色革命 85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 195, 331, 332; Taiwan 台湾地区 79; trade as percent of 贸易占…的比重 192 - 193; Uruguay 乌拉圭 325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Brazil 国

- 民生产总值(GNP); 巴西 332; trade as proportion of 贸易占…的比重 195
- group alliance, political mutability of 集团联盟, …在政治上的易变性 115
- group formation 利益集团的形成 21, 22; patterns of …的模式 255
- groups 集团 47, 365; actions and initiatives of …的行为及动机 287, 317; demands of, and state structure …的需求, …的需求与国家结构 360;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的政治动员力 302;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nd capacities of,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的政治倾向与能力, 在对大萧条做出反应中的… 109, 119, 149; and state autonomy …与国家自主性 353 - 354; see also interest groups; social groups 也可参见“利益集团”、“社会集团”
- Guomindang regime (Taiwan) 国民党政权(台湾地区) 41, 43, 65, 78, 79, 90, 91, 92, 93, 99, 349, 351, 354; nature of …的性质 82 - 84; policy toward agriculture 面向农业的政策 84 - 88
-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178, 230, 234
- Haggard, Stephen 斯蒂芬·哈格德 203, 205, 206
- Halperin, Morto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莫顿·霍尔珀林, 《官僚政治与外交政策》4
- Hamilton, Earl J. 汉密尔顿伯爵 180
- Hammarskjöld, Dag 达格·哈马舍尔德 130, 131
- Hanagan, Michael P. 迈克尔·P. 哈纳根 283n45
- handmaiden state 仆从国 64
- Hansen, Alvin 阿尔文·汉森 140 - 141
- Harrison, Brian 布赖恩·哈里森 257
- Harrison, J. F. C. J. F. C. 哈里森 276
-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140 - 141, 147
- Hausas (tribe) 豪撒(部族) 306
- Hawley, James 詹姆斯·霍利 214 - 215, 216
- Hayek,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哈耶克 341n12; *Road to Serfdom* 《通向奴役之路》322
- health insurance 健康保险 108
- Heclo, Hugh 休·赫克罗 14, 119;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英国与瑞典的现代社会政治》11 - 12
- Hegel, George 乔治·黑格尔 257, 263
- hegemonic contro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霸权控制: 比较视角下的… 308 - 311; model of …模型 303 - 306, 307 - 308
- hegemonic states, strategies of domination by 霸权国家, …的统治策略 255
- hegemony; common sense as ideological force of 霸权: 作为意识形态的常识 307 - 308, 339; defined 定义中的… 287; and religious conflict …与宗教冲突 285 - 316



- hierarchy(ies) 层级 55
- Hindu-Muslim conflict (India) 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印度) 309 - 310
- Hintze, Otto 奥托·欣策 7, 8
- Hintzean perspective 欣策式视角 9, 13
- Hirschman, Albert 艾伯特·赫希曼 195, 197
- historical conjuncture; economic role of state 历史关联: 国家的经济角色 217; state autonomy 国家自主性 13
- historical depth, in study of state 历史深度, 国家研究中的 348 - 350
- historicity 历史性 70; of social political structures 社会政治结构的... 28
-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171
- Hobsbawm, Eric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70, 279n10
- Hobson, J. A. J. A. 霍布森 219
- Hoffman, Stanley 斯坦利·霍夫曼 301
- Holland 荷兰 178, 182, 184
- Homans, George C. 乔治·C. 霍曼斯 30n6
- Hong Kong 香港 94; TNCs 跨国公司 203
- Horwitz, Morton J. 莫顿·J·霍维茨 48
- Howe, Irving 欧文·豪 260
- Huntington, Samuel P. 塞缪尔 P. 亨廷顿 271
- Ibadan (city, Yorubaland) 伊巴丹(城市, 约鲁巴地区) 288 - 289, 290, 291, 299, 303, 304, 305; development of ... 的发展 299 - 300; Muslims in ... 的穆斯林 298
- ideal type(s) 理想型 50; state 国家 351
- identity(ies); aspects of 认同: ... 方面 286; fluid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 的社会发展的流变性 299 - 300, 301, 303;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集体... 的形成 254; persistence of communal 对社区... 的坚持 301 - 302; reified 具体化的... 306; strategic manipulation of 对... 的战略性操纵 286; see also ancestral city identities (Yorubaland) 也可见“祖籍城邦认同”(约鲁巴地区)
- Igbos (tribe) 伊博人(部族) 303, 306
- Ijebu (city, Yorubaland) 伊杰布(城市, 约鲁巴地区) 290, 291, 299, 305
- Ile-Ife 伊莱 - 伊费 293, 295, 298, 299, 305; kings of ... 的国王们 300; religious center of Oyo Empire 奥约帝国的宗教中心 288, 290, 294
- Ilorin (city, Yorubaland) 伊洛林(城市, 约鲁巴地区) 288, 295 - 297, 305, 306
- immigration policy (Switzerland) 移民政策(瑞士) 243
- imperial action, logic of 帝国主义行为, ... 的逻辑 303 - 306
- imperialism, effect of, on core 帝国主义, ... 的影响, 核心国家... 的影响 219
- import substitution 进口替代 317; Taiwan 台湾地区 81, 88, 89, 98, 99, 100, 101

- imports/exports: small countries 进口/出口:小国家 236; *see also* exports 也可参见“出口”
- incentives, selective 激励,选择性…302
-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分配 53 - 55, 71, 349; Taiwan 台湾地区 85; *see also* distribution 也可参见“分配”
- India 印度 88, 207, 255, 356; hegemonic control in 霸权国对…的控制 308 - 310, 311
- indirect rule 间接统治 255, 303 - 306;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Yorubaland) …与政治分化(约鲁巴地区) 305, 308
- individual(s): rational pursuit of goals by 个人:…对目标的理性追求 300 - 301; *see also* rational instrumental behavior 也可参见“工具理性行为”
- industrial capitalist na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tate structures and politics in 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对…的国家结构与政治的比较研究 21 - 25;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in …的收入分配政策 67; post-World War II “二战”后/战后 199 - 226; role of state in …中国家的角色 68, 107;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in …中国对经济的干预 41 - 42;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跨国联系与… 207 - 216
-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的产业分工 6
- industrial growth 工业增长 333
- industrial policy (Austria) 产业政策(奥地利) 237, 241
- industrial relations (Switzerland) 产业关系(瑞士) 235
-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产业重组 20
- industrial revolution 产业革命 44, 267, 268
- industrial sector 工业部门 79, 81, 85, 91 - 92, 93 - 94, 97 - 98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7, 254;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28 - 289, 230, 248; debt-led 债务推动型 206; import-substituting/export-led 进口替代型/出口导向型 42, 317, 318;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10; role of state in 国家在…中的角色 39, 40, 44, 45, 356; Taiwan 台湾地区 88 - 90, 99, 100, 101;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92, 194;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与市区改造 265, 267; working-class formation 工人阶级的构成 260, 262
- inequality 不平等 46; income 收入… 54 - 55
- inflation 通货膨胀 108; Brazil 巴西 335 - 356; Great Britain 英国 212; Taiwan 台湾地区 88, 91, 100, 105n64; U. S. 美国 215; Uruguay 乌拉圭 325
- information 信息 53, 54, 55; access to 获取…的渠道 271, 301; social 社会… 357 - 358; *see also* expertise; knowledge 也可参见“专业化”、“知识”
- institution building 制度建设 48, 51 - 52, 59 - 60, 72
-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expert par-

-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 制度机制:让专家参与决策的...120,125 - 132;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政策实施的...18
- institutions:working-class 机构:工人阶级 268 - 270,275 - 276,277;see also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s 也可参见“工人阶级组织”
- instrumentalism, inverted 工具主义,逆向...63,64
- instrumentalist perspective, cleavage patterns in 工具主义视角,...下的分化模式 301 - 303
- intellectual innovation:in policy development 知识创新:政策发展中的...119,149;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在对大萧条的反应中的...109,115 - 117,125 - 132
- intellectually determinist perspective, in explanation of national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知识决定论视角,在解释国家对大萧条的反应中的...115 - 117
- intelligence service (s): Latin America 情报机构:拉丁美洲 324;see also security apparatus 也可参见“安全机构”
- interest groups: Austrian/Swiss politics 利益集团:奥地利/瑞士政治 231,232;and policy development ...和政策发展 118,119;and state autonomy ...和国家自主性 14,15;studies of ...研究 23 - 24;Switzerland 瑞士 241
-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利益代表,...和工人阶级的形成 260
- interests 利益 23,50,253;class 阶级...25 - 27;competing 竞争性...68;and income distribution ...与收入分配 55;political mutability of ...的政治易变性 115;power of ...的能量 60 - 61;and sectoral coalitions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在对大萧条的反应中的...与部门联合 114;and social cleavages ...与社会分化 65;state as guardian of universal 国家作为普遍...的守卫人 47 - 48
- international economy 国际经济 212;links to, and national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与...的连接,...和国家对大萧条的反应 114 - 115;open 开放式...115,120,126,165,167,208,227 - 251,254;unstable 不稳定的...218 - 219
- international markets:power of TNCs and 国际市场:跨国公司的权力与...206;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国有企业与...201,204,209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5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r as 国际关系,作为...的战争 184 - 186
- Islam( Yorubaland) 伊斯兰教(约鲁巴地区)255,292,295,297
- Islamic jihad 伊斯兰圣战组织 288
- Israel 以色列 89;hegemonic control in 对...的霸权控制 308,310 - 311

- issue agenda(s) 议题日程 21, 22, 25, 28, 253
- Italy 意大利 20;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
- Jacoby, N., *U. S. Aid to Taiwan* N. 雅各比, 《美国对台湾的援助》104n50
- Japan 日本 20, 94, 96, 148, 185, 231, 241; autonomy of state 国家的自主性 75n39; civil service 公务员 232;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42, 52, 79 - 82, 86, 87, 98;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 210;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207, 208 - 209; Meiji government 明治政府 79;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 10;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通商与产业省 (MITI, 通产省) 208; policy instruments 政策工具 18;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211; strong state 强国家 65; transnational linkages 跨国联系 207
- Johansson, Alf 阿尔夫·约翰森 130
- joint ventures 风险投资 200 - 201, 203
- Johns, Stedman 斯特德曼·琼斯 259, 263
- Joyce, Patrick,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帕特里克·乔伊斯, 《工作、社会与政治》263 - 265, 266, 267, 269
- Junta de Oficiales Generales (Uruguay) 将军联席会议 (乌拉圭) 326
- jurisdictional scope of state 关于国家的司法视角 288;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31
- Katzenstein, Peter J. 彼得·J. 卡岑斯坦 18, 56, 60, 165, 166, 167 - 168, 208, 213, 253 - 254, 349 - 350, 352, 354 - 355, 356;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在权力与财富之间》19 - 20
- Katznelson, Ira 艾拉·卡茨纳尔逊 254 - 255, 349, 353 - 354, 356; *City Trenches* 《城市战壕》26, 254; and Prewitt, Kenneth, "Constitutionalism, Clas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 in U. S. Foreign Policy" ... 与肯尼思·普鲁伊特, 《宪政主义、阶级与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约束》18, 22
-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09, 122, 126, 128, 131, 140, 149, 160n121;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The*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07, 115 - 117, 128, 132, 147, 150n3; in U. S. 在美国 140, 141
- Keynesian era 凯恩斯时代 41, 107
- Keynesian revolution 凯恩斯革命 6, 41
-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 34, 42; crisis of faith in 对...的信仰危机 357; defined 定义中的... 150n3; possibilities for, as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 作为对大萧条的反应策略的可能性 107 - 163
- Kiernan, V. G. V. G. 基兰 179
- kings of ancestral cities (Yorubaland) 祖籍城邦的国王们 (约鲁巴地区) 287, 288, 299 - 300, 305, 306
- kinship 血缘关系 286, 300



- Knight, Peter T. 彼得·T. 奈特 66
- knowledge 信息 61; economic 经济… 349; and effective action…与有效行动 52 - 53, 55, 66; expert, in policy making…专家, 决策中的…27 (see also expert access to policy-making centers, 也可参见“进入决策中心的专家渠道”); needs of state for 国家对…的需求 357 - 358;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有政治影响的…117;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of policy-relevant 政策相关…的跨国传播 358 - 359, 360
- Korea 朝鲜 89, 205 - 206, 226n93;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殖民统治 52
-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148
- Krasner, Stephen 斯蒂芬·克拉斯纳 17, 19, 167, 196, 211, 214;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捍卫国家利益》 12 - 13
- Kuznets, Simon 西蒙·库兹涅兹 82 - 83
- labor; Brazil 劳工: 巴西 333; foreign (Switzerland) 外国…(瑞士) 242 - 243, 246;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U. S.)…的组织性力量(美国) 137; state's role in economy and 国家经济与…中的角色 204; in Swedish welfare state 在瑞典福利国家中的… 147; see also unions; working-class movements 也可参见“工会”、“工人阶级运动”
- labor aristocracy 劳工贵族 281n30, n31
- labor aristocracy approach 劳工贵族论 268, 269; in explanation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在解释工人阶级形成中的…260, 261 - 262, 263 - 264
- labor cost, Taiwan 劳动力成本, 台湾地区 96
- labor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unemployment (Great Depression) 工人政府, 对失业的反应(大萧条) 120 - 132, 349, 359
- labor market interventions (Sweden) 劳动力市场干预(瑞典) 108
- labor movements; Austria/Switzerland 劳工运动: 奥地利/瑞士 227, 229 - 230, 235, 246, 247 - 248; see also working-class movements 也可参见“工人阶级运动”
- labor racketeering 劳工敲诈 176
- Labour government (Great Britain) 工党政府(英国) 109, 111, 120, 121 - 122, 128 - 129, 213
-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工党(英国) 108 - 109, 113 - 114, 120, 121, 123, 126 - 127, 128 - 129, 137, 152n13, 355
- Lagos (state) 拉各斯(州, 属尼日利亚) 291, 305 - 306, 307;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教育发展 293
- laissez faire 自由放任 27, 41, 88
- Laitin, David 戴维·莱丁 254 - 255, 349, 358
- Lancashire 兰开夏郡 263, 265, 267
- land ownership (Yorubaland) 土地所有

- 权(约鲁巴地区)292,306,307
-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67; Taiwan 台湾地区 66,84-85,86,87,91,98
- land tenancy (Yorubaland) 土地租赁(约鲁巴地区)292
- Länderbank (Austria) 土地银行(奥地利)240
- landlords 地主 182; in Taiwan 在台湾地区的...84-85,86
- Lane, Frederic 弗雷德里克·莱恩 175-177,178,179,180,181
- language 语言 286; as cleavage ...分化 285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9-10,18,255-256,349; state autonomy in ...的国家自主性 63;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的国有企业 40; state power vis-à-vis civil society in ...的国家权力相对于公民社会 317-343; U. S. neocolonialism in 美国在...的新殖民主义 195;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countries 也可参见“在单个国家之下”
- law 法律 48; autonomy of ...的自治 271; significance of ...的重要性 260; *see also* rule of law 也可参见“法治”
- Law, Robin 罗宾·洛 297
- Lawton, R. R. 劳顿 265
- leaders, leadership: lack of, in Brazil opposition 领导人,领导力:缺乏...,巴西反对派中...337; political nature of...的政治天性 55; in political decisions 政治决策中的...4 (*see also* state officials, 也可参见“国家官吏”);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对大萧条的反应中的...107,113-114,137,148,152n13; of unions 工会...261;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 264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185
- learning curve(s) 学习曲线 202,223n36; global 全球...226n93
- Lebanon 黎巴嫩 65
- Left: Austria/Switzerland 左派:奥地利/瑞士 224,247; Brazil 巴西...334; Chile 智利...320,324; Uruguay 乌拉圭...328
- legal exceptionalism: Brazil 法律例外论:巴西 337-338; *see also* exceptional rule 也可参见“例外法则”
- legal sanctions 法律制裁 70,72
- legitimacy (state) 合法性(国家)65; of BA regime 官僚威权政体的...318; and use of force ...与武力的使用 171-172
- legitimation 合法化 70
- Lemarchand, Rene 勒内·勒马尔尚 308
- Lenin, Nikolai 尼古拉·列宁 52,64,279n10
- liberal capitalism (Switzerland) 自由资本主义(瑞士)227,246
- Liberal party (Great Britain) 自由党(英国) 108-109,114,120,121,122,126,127; (Sweden)...(瑞典)130
-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333,337-338; Brazil 巴西 334,335,337-338,355; Taiwan 台湾地区 88,89,91,98; Uruguay 乌拉圭 325-326

- libertarianism from above(Chile)来自上层的自由主义(智利)322,324
- Lim, Hyun-Chin 林玄镇 206
- Limits of Liberty, The* (Buchanan)《自由的局限》(布坎南)341
- linkages: forward/backward 联系:前向/后向 57, 58, 197, 198; transnational 跨国...9
- Lipset, Seymour Martin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31n7, 286, 290, 308, 312
- literacy: Taiwan 文化程度:台湾地区 82; Yoruba 约鲁巴 293 - 294
- local organization, in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地方组织,工人阶级社区中的 267
- London 伦敦 178, 280n20, 281n31
- London financiers 伦敦金融家 115
- Louis XII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三,法国国王 174, 179
-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 179, 180
- Lugard, Lord 洛德·卢格德 303, 304, 306, 311
- Lustick, Ian 伊恩·勒斯迪克 310
- McDonald, Ramsey 拉姆齐·麦克唐纳 122, 126, 128
- Machiavelli, Niccolò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171
-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宏观经济管理 39, 41, 43, 355; national, as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国家..., 作为对大萧条的反应的...6, 108, 109, 120, 125, 126, 132; U. S. 美国... 137 - 138, 141, 142, 147, 148
- macroscopic studies 宏观研究 18, 21, 28
-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he*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姆森)279n8
- Malvinas (islands) 马尔维纳斯(群岛) 319, 330 - 331, 340
- Manchester, England 曼彻斯特, 英格兰 265
- “Manifesto of the Eight” (Brazil) “八人宣言”(巴西)335, 337
- Manley, Michael (Jamaica) 迈克尔·曼利(牙买加)62, 199 - 200, 217
- manufacturing (Taiwan) 制造业(台湾地区)93 - 94
-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effect of, on Third World States 制造业投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 194, 202 - 204, 206
- maritime states 海权国家 178
- market(s) 市场 6, 46; bureaucracy and 官僚与...51;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与收入再分配 53 - 54; for labor and housing 劳动与住房供给... 267 - 268; natural operation of ...的自然运作 324; open 开放... 169; small domestic 小国...236; state and 国家与...3, 39;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与国有企业 57, 58, 60; transnational 跨国...192, 193; see also international markets; world market 也可参见“国际市场”、“世界市场”

- market change 市场变化 236
- market economy (Chile) 市场经济(智利) 320, 323, 324
- market exchange 市场交换 71 - 72;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 国际化 44, 45, 46; noncontractual elements of contract in ... 合同中的非契约因素 51
- market liberalism: Chile 市场自由化: 智利 322, 324; Uruguay 乌拉圭 325
- Marshall, T. H. · T. H. 马歇尔 272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6, 25, 61, 259, 363; "Eitheenth Brumaire, The" 《雾月十八日》340n6
- Marxism, Marxists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 25, 46, 49; Austrian 奥地利... 230; Chile 智利... 322, 328; labor aristocracy 劳工贵族 261; *see also* neo-marxism(ists) 也可参见“新马克思主义(者)”
- material forces, in cleavage patterns in Yorubaland 物质力量, 约鲁巴地区分化模式中的... 306 - 307
- material inducements 物质利诱 70, 72
- matrix organization 矩阵组织 218 - 219
- Mexico 墨西哥 76n58, 88, 356; and automobile TNCs ... 与汽车行业跨国公司 202, 204, 211, 214; oil industry 石油产业 197; protectionalism 保护主义 103n37;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 198
-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 303
- middle class: Chile 中产阶级: 智利 320; and working class ... 与工人阶级 282n31
- Middle East, state-owned oil producers 中东, 国有石油生产商 197, 198, 211, 217
- militancy, working-class 战斗性, 工人阶级的... 279n9
- militarism 军国主义 6; Taiwan 台湾地区... 40, 41, 78, 79, 82 - 84, 93, 99 - 100, 354
- military( the ): Argentina 武装力量: 阿根廷 329, 330 - 331; Brazil 巴西 334, 335, 337 - 338, 339; Chile 智利 354; as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 作为政府和制度组织的... 317, 329, 337 - 338; Uruguay 乌拉圭 325, 326, 328 - 329
- military expans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军事扩张, 资本积累与... 179
- military innovation 军事改革 177 - 186
- military junta(s) 军事小集团 176
- military organization 军事组织 170, 178, 184; difference between Europe and other states 欧洲与其他国家... 的差异 185 - 186; Switzerland 瑞士 242
- military professionals 职业军人 9 - 10
- MineroPeru 秘鲁矿业公司 198
- mining industry 采矿业 58, 197 - 199, 201, 218, 219
- missionaries 传教士 292, 300, 304, 305, 306
- missionary schools (Africa) 教会学校(非洲) 293, 297



- mobility (Yoruba): geographical 流动性 (约鲁巴):地理...291; social 社会... 291, 292 - 293
- Modelski, George 乔治·莫德尔斯基 185
-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Heclö)《英国与瑞典的现代 社会政治》(赫克罗)11 - 12
- modern state 现代国家 8, 118, 165; ca-  
pacity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经  
济转型能力 71; emergence of ...的兴  
起 363;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models  
of ...模式的国际扩散 362; normative  
antinom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规  
范与事实之间的二元悖论以及分析  
与解决方案之间的相互矛盾 364;  
and shift from normative/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one grounded in factual  
knowledge ...与从规范性/哲学性方  
法到基于实践经验的方法的转移  
357
- modernization (approach) 现代化(方  
法)6, 317
- Moisés, José Alvaro 乔赛·阿尔瓦诺·  
摩西 332 - 333
- monetary fluctuations, international 汇率  
波动, 国家间...152n14
- Monetary Policy and Crisis* (Thomas)  
《货币政策与危机》(托马斯)129
- monopolistic trade patterns 垄断贸易模  
式 195, 196
- monopoly(ies) 垄断 62, 234, 351
- monopoly, capitalist economies 垄断, 资  
本主义经济...45
- Moore, Barrington, Jr. 小巴灵顿·摩尔  
39, 272;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极权与民主的社会  
起源》26
- Moorhouse, H. F. H. F. 穆尔豪斯 262,  
273
- Moran, T. H. T. H. 莫兰 197 - 198, 201
- Morgenthau, Henry 亨利·摩根索 193
- Morocco, Arab-Berber cleavage 摩洛哥,  
阿拉伯人 - 柏柏尔人冲突 316n57
- Morrison, Donald 唐纳德·莫里逊 293 -  
294, 302
- Mowat, C. W. C. W. 莫厄特 122
- Müller, Ronald 罗纳德·米勒 193
-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多国公司 3,  
98; Brazil 巴西...333; Nigeria 尼日利  
亚...294; see also transnational corpo-  
rations (TNCs) 也可参见“跨国公司”  
(TNCs)
- Multipartidaria Nacional, La (Argentina)  
多党制国家(阿根廷)330
- Muslim Yorubas 约鲁巴穆斯林 285,  
289, 292 - 293, 302 - 309, 305 - 306,  
307
- Mutiny of 1857 (India) 1857 年兵变(印  
度)309
- Myint, Hla 赫拉·迈因特 87
- Myrdal, Gunnar 冈纳·迈尔达 130, 131
- Napoleonic War 拿破仑战争 180, 362
- national economic recovery strategies  
(Great Depression) 国家经济复苏战

- 略(大萧条) 120, 122 - 123, 125 - 126, 129, 131 - 132, 349, 359; U. S. 美国 134, 136, 137, 138
- national identity(ies) 民族认同 301
-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international trade as “国家利益”问题, 将国际贸易视作… 208, 209
- National Party of Nigeria(NPN) 尼日利亚民族党(NPN) 298 - 299, 303
- National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Budget(U. S.) 国家生产与就业预算(美国) 147
-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 国家复苏管理局(NRA) 134, 136, 137
-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NR-PB), (U. S.) 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美国) 146
-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in economic role of state “国家安全”议题, 国家经济角色中的… 202, 214
- national states 民族国家 39, 133, 358, 360 - 361; boundaries and identities of … 的边界与认同 165; formation of … 的形成 3, 167, 362; new 新兴… 6, 167, 185 - 186, 361, 362; organized violence in growth of … 成长过程中有组织的暴力 179 - 191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99
- nationalist movement(Africa) 民族主义运动(非洲) 293
- nationalist party(Chile) 民族主义政党(智利) 199
- nationalization; Austria/Switzerland 国有化: 奥地利/瑞士 228, 229, 234 - 235, 237 - 240;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 197; Taiwan 台湾地区 351
- navies 海军 181
- NCNC(Yoruba)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党(约鲁巴) 291, 298
- neo-Benthamite paradigm 新功利主义范式 300 - 301, 302
-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195
- neo-Maxism(ists) 新马克思主义(者) 5, 6, 8, 11, 20, 28, 259, 348; state autonomy in … 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 353, 355; state in research of … 研究中的国家 350, 351
- neopluralist(ism) 新多元主义(者) 8
- neoprogressive 新进步论 259
- neo-Weberian perspective 新韦伯式视角 350 - 351, 355
- Netherland 荷兰 185
- Nettl, J. P. J. P. 内特尔 13, 192, 271, 273;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The” 《作为一个概念变量的国家》 22
- networks; domestic 网络: 国内 361; policy 政策… 19 - 20, 167, 228, 235 - 246, 248; political 政治… 358; social 社会… 289, 358
- neutrality (Austria/Switzerland) 中立(奥地利/瑞士) 227
- New Deal(U. S.) 新政(美国) 27, 107, 108, 116, 119, 152n13, 352; agricultural policies 农业政策 13 - 14; failure to result in social Keynesianism

- 没有产生社会凯恩斯主义 112; limits of ... 的局限性 132 - 148;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Keynesianism in later 在后来的... 中实施社会凯恩斯主义的机会 137 - 141; "second" "第二次" ... 114, 134; two-track strategy of early ... 初期的双轨战略 133 - 137, 140
- New York City 纽约市 178, 278; election fraud in ... 的选举欺诈 257
-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50, 356;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in ... 中国对经济的干预 4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 中的国有企业 57; see also national state, new; Third World 也可参见“民族国家, 新兴...”、“第三世界”
- Nield, Keith 基思·尼尔德 279n9
- Nigeria 尼日利亚 255, 285, 288, 289, 290, 303, 306, 307, 349, 356; societal inputs into state ... 国家中的社会性能量输入 311 - 312; socioeconomic mobility 社会经济流动性 294
- non-Western states 非西方国家 3, 6; see also Third World 也可参见“第三世界”
- non-zero-sum process 非零和过程 355
- Nordlinger, Eric A.,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埃里克·A. 诺德林格《论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31n9, 75n39
- norms: international 规范: 国际... 223n36; shared 共同... 169; appeals to 诉诸... 70;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s ... 与收入再分配 53 - 54
- North, Douglass 道格拉斯·诺斯 177
- Norway 挪威 153n24
- O'Donnell, Guillermo 吉勒莫·奥唐奈 47, 63, 317, 339
- Offe, Claus 克劳斯·奥菲 33n22
- official collectivities: policy initiatives of 官僚集体: ... 的政策提议 9 - 10, 11 - 12, 14 - 15, 20 - 21, 28; see also state officials 也可参见“国家官员”
- Ohlin, Bertil 贝蒂·俄林 130, 131
- OIAG (Austrian holding co.) OIAG (奥地利控股公司) 238, 239
- oil crisis (1973), effect on Brazil 石油危机 (1973), 对巴西的影响 332, 335
- oil economy (Nigeria) 石油经济 (尼日利亚) 394, 307
-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 197, 199
- oil revenues 石油收入 35n44
-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Tocqueville)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21
- old-age assistance 老年救济 11 - 12, 108
- oligopoly(ies) 寡头垄断 45, 57, 58, 59, 62, 339; international 国际... 201
- Olsen, Donald 唐纳德·奥尔森 280n20
- Olson, Mancur; "Olson" problem of organization 曼瑟尔·奥尔森; 组织的“奥尔森”问题 302
- On the Autonomy of Democratic State*

- (Nordlinger)《论民主国家的自主性》(诺德林格)31n9,75n39
- open international economy 开放式国际经济 115, 120, 126, 165, 167, 208; small nations in ...中的小国家 227 - 251, 254
- opposition (Latin America): to BA regimes 反对派(拉丁美洲):抵制官僚威权政体的... 317, 318, 319, 320, 322 - 323, 324, 325, 328, 329, 330, 334, 335, 336 - 337, 338; Chile 智利 320, 322 - 323; effect of state character on 国家特性对...的影响 338 - 340; tension within ...内部的张力 322, 324; Uruguay 乌拉圭 325
- “organic statist” model (of society) (社会的)“有机国家”模型 317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88, 210, 229, 233; *Economic Survey* 《经济观察》247
-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distribution policy 组织能力, ...与分配政策 53 - 55
-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states) (国家的)组织结构 21; effect on social conflicts 对社会冲突的影响 253, 260; federal vs. unitary 联邦制 Vs. 单一制 273 - 274; see also state structure(s) 也可参见“国家结构”
- organizational costs 组织成本 300, 302
- organized crime,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nd 有组织的犯罪, 发动战争和国家形成与... 169 - 191
- Oyo (city, Yorubaland) 奥约(城市, 约鲁巴地区) 290, 295 - 297, 299; and British ...与英国人 303 - 305
- Oyo Empire 奥约帝国 287 - 289, 291, 305; “New Oyo Empire” “新帝国” 303 - 306
- pacification 和解 175
- Pakistan 巴基斯坦 88
- Papal States (the) 教皇国 184
- “parastatal” bodies 准国营机构 360 - 361
-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议会民主(拉丁美洲) 317, 318
- party: see political parties 党派: 参见“政党”
- Patinkin, Don 唐·帕廷金 150n3
- patrimonial rule 世袭统治 71
- patronage 分肥制 24, 26, 56, 135, 137, 258, 274, 361
- Pax Americana 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 6
- Pax Britannica 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 6, 291
- Peacock, A. T. A. T. 皮科克 180
- peasant cooperatives (Peru) 农民合作社(秘鲁) 67
- peasant production, as basis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农业生产, 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 86 - 87
- peasantry 农民阶级 36n68, 63; Taiwan 台湾地区 81, 84, 85, 86, 87
- Pelling, Henry 亨利·佩林 261, 270



- PEMEX (Mexico)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墨西哥) 198
- penetration, transnational 渗透, 跨国... 197; effect on state's role in economy,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 对国家在经济中之角色的影响, 发达工业国 208 - 210
- per capita income (Taiwan) 人均国民收入 (台湾地区) 79, 81, 82
- peripheral states: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外围国家: 跨国联系与... 193, 194; state autonomy in ... 的国家自主性 62; *see also* Third World 也可参见“第三世界”
- Perkin, Harold 哈罗德·帕金 275
- persistence: of ethnicity 坚持: ... 种族特性 301, 307; historical 历史性... 348; of social cleavages ... 社会分化 306 - 308
- Peru: corporatism 秘鲁: 统合主义 10, 18, 34n27;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s 外国投资 19;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分配 67; military 军事 63, 205; TNCs 跨国公司 198, 199
- Petrobras (Brazil) 巴西石油公司 (巴西) 198
- petrochemical industry 石油化工 58, 239
- Philadelphia 费城 266
- Philippines 菲律宾 88
- Pigou, A. C. A. C. 庇古 128
- Pinochet, General 皮诺切特, 将军 320, 323, 324, 326, 334
- piracy 海盗 170, 173, 175
- plebiscite campaign: Chile 公民投票运动: 智利 320 - 321, 322; Uruguay 乌拉圭 326 - 327, 328
- plunder 抢掠 181
- pluralist perspective 多元主义视角 4, 5 - 6, 20, 49
- Poland 波兰 178
- Polanyi, Karl 卡尔·波拉尼 39, 44
- police forces 警察部队 175
- policing 维持治安 170, 184
- policy (ies) 政策 4, 15, 254, 351, 359;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28, 231 - 232, 246 - 247; capacities to pursue 执行... 的能力 17 - 18; effect on social conflicts ... 对社会冲突的影响 253; made by state officials 国家官员制定的... 9 - 10, 11 - 12, 14 - 15, 20 - 21, 28, 31n9, 118; models of ... 模式 8; and state autonomy ... 与国家自主性 356 - 357;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 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260, 270 - 278
- policy development: social knowledge and 政策发展: 社会知识与... 359 - 360; state structures and 国家结构与... 117 - 119
- policy goals: ability of states to achieve 政策目标: 实现... 的能力 15 - 17, 71 - 72; form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 的形成与实现 8, 9 - 20
- policy implementation 政策实施 15 - 17, 20; by state officials 由国家官员进行的... 20 - 21

- policy innovation, state structure and 政策创新, 国家结构与...125 - 132
- policy instruments 政策工具 18, 20, 118, 213; Austria 奥地利 238 - 239;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and 官僚组织与...52; Switzerland 瑞士 233
- policy intellectuals 政策智囊 357; *see also* expert access to policy-making centers 也可参见“进入决策中心的专家渠道”
- policy legacies 政策遗产 357;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31, 246, 247 - 248; and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与对大萧条反应 42, 109, 117 - 118, 120 - 125, 129, 135, 148
- policy making: in constitutional polities 决策: 立宪政体中的...11 - 14; Great Britain 英国 126 - 129; is inherently historical process ...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过程 119;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应对大萧条的...149; socio-economic influences on 对...的社会经济影响 115; studies of ...研究 28; Sweden 瑞典 147; Switzerland 瑞士 241; transnational capital in ...中的跨国资本 211; U. S. 美国 135 - 137; *see also* expert access to policy-making centers 也可参见“进入决策中心的专家渠道”
- policy network (s) 政策网络 19 - 20, 167; state as part of 国家作为...的一部分 228, 235 - 246, 248
- policy planning: analysis of effective state action and 政策规划: 对有效国家行为的分析与...72; Sweden 瑞典 129 - 132, 141, 143; U. S. 美国 142
- political action (s): collective 政治行动: 集体 21, 22 - 24, 25, 27; drinking places as locus of working-class 作为工人阶级...地点的酒馆 258, 262, 269 - 270; primordially based 基于原始纽带的...300 - 301
- political alliances, in national recovery strategies (Great Depression) 政治联盟, 国家复兴战略中的...(大萧条) 142 - 145
- political arrangements, collaborative 政治安排, 合作式...228;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35 - 236, 238, 241, 242, 245 - 246, 248
- political capacities, of social classes 政治能力, 社会各阶级的...25 - 27
- political cleavages: state's effect on 政治分化: 国家对...的影响 255;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85 - 316
- political conflict 政治冲突 254, 255; state and 国家与...28, 360
- political control, cleavage patterns as function of 政治控制, 作为...功能的分化模式 308
- political culture 政治文化 253, 254, 280n10; effect of state on 国家对...的影响 21, 22, 25
- political development 政治发展 5; Great Britain 英国 280n10
- political economists 政治经济学家 3

political economy (Chile) 政治经济(智利) 322 - 323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政治商人 302; India 印度 309 - 310;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86, 299 - 300

political force, effect of economic change on 政治力量, 经济变化对...的影响 101

political identity: changing of 政治认同: ...的变化 307; state and 国家与... 255

political opening (Latin America) 政治开放(拉丁美洲) 327, 340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ommunal groups 政治组织: 社区群体的... 302; as function of state actions 作为国家行动功能的... 308; potential for ...的潜力 339; U. S. 美国 135;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92, 301, 308 - 30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orking-class 政治参与, 工人阶级 275 - 276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 - 25, 26, 50, 253, 254, 330, 361; Austria 奥地利 237 - 241; Brazil 巴西 334, 338; Chile 智利 322; control over state apparatus ...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56; demands of ...的需求 42; in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中的... 107; as mediators between electorates and conduct of state power ...作为选民与国家权力行为之间的协调人 23; party machines 政党机器 258, 269, 275;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nd capacities of, in response to Great De-

pression ...的政治倾向与能力, 在应对大萧条中的... 109, 113 - 114, 120 - 125, 128 - 129, 131, 134, 135, 141, 143, 148 - 149; Saloons as gathering places for 沙龙作为...集会的地点 258; U. S. 美国 24, 135, 136, 276 - 277; Uruguay 乌拉圭 328, 329; working-class-based 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 112;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273 - 274, 278

political rights, and class formation 政治权利, ...与阶级的形成 272, 273, 274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 4

political sociology 政治社会学 23

politicians, and policy development 政治家/政客, ...与政策发展 115, 118, 119

politicization: of economic issue 政治化: 经济学问题... 339; of ethnic cleavages 族群分化... 286 - 287; of social cleavages (Yorubaland) 社会分化...(约鲁巴地区) 254 - 255, 300 - 303, 357

politics 政治学/政治 6; bureaucratic 官僚... 4; class 阶级... 137, 254; "classness" of ...的阶级化 25 - 27; of community 社区... 269; comparative 比较... 362; consensual 同意的... 227, 235 - 236, 237, 242, 245, 248; impact of state on 国家对...影响 8, 20 - 27, 253; of labor 劳工... 269; local (U. S.) 地方...(美国) 274; mili-

- tary in ...中的武装力量 184; nationalization of( U. S. ) ...全国化( 美国) 133; neighborhood 邻居 260; Nigerian 尼日利亚人 306; in perspectives of explanation of national responses to Great Depression 在解释国家对大萧条的反应的视角下 117 - 118; role of state in 国家在...的角色 231 - 232; saloon 沙龙...258, 260; social science and 社会科学...359; state structure and 国家结构与...117 - 119; studies of ...研究 28; working-class formation and 工人阶级的形成与...268; of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工人阶级组织...278; Yoruban view of 约鲁巴人的...观点 285; *see also* opposition ( Latin America ); reformist politics 也可参见“反对派( 拉丁美洲)”、“改革主义政治学”
- polities, constitutional 政体, 立宪...11 - 14
- port cities 港口城市 178 - 179
- Portugal 葡萄牙 182, 185
- “postbargaining” dependency studies “谈判后”依赖研究 219
- Poulantzas, Nicos 尼科斯·普兰查斯 33n22
- Poulantzian perspective 普兰查斯视角 353
- power 权力 175, 184;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平衡 235, 246; brumairian abdication of 雾月党人退位 319, 321; class 阶级...55; divided, in BA regimes ...划分, 官僚威权政体中的...319, 326, 329, 330 - 331; economic ( Austria ) 经济... ( 奥地利 ) 237 - 241; executive 行政...142; global 全球...185; local base of ( U. S. ) ...的地方基础( 美国) 134, 145 - 146; political 政治...134, 148; social 社会...353; zero-sum struggle for ...的零和斗争 256; *see also* corporate power; state power 也可参见“公司权力”、“国家权力”
- power holders 掌权者 175; and monopoly on violence ...与对暴力的垄断 171, 172; in state making 国家形成中的...185
- power relations, state-society 权力关系, 国家社会...318 - 343; horizontal dimension 水平维度 336 - 337, 340
- Prebisch, Raul 劳尔·普雷维什 195
- predation 掠夺行为 166, 175
- prescription ( normative ) 事实分析( 规范) 347, 363 - 365
- Presidency ( U. S. ) 任期( 美国) 13
- Press, Brazil 新闻舆论, 巴西 336 - 337, 338
- Prest, John 约翰·普雷斯特 280n20
- Prewitt, Kenneth, Ira Katznels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Clas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 in U. S. Foreign Policy” 艾拉·卡茨纳尔逊和肯尼思·普鲁伊特, 《宪政主义、阶级与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约束》18, 22



- PRI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Mexico) 革命制度党(墨西哥) 62
- price stability (Taiwan) 物价稳定(台湾地区) 88, 90, 96
- primordial (the), reification of 原始纽带, …的具象化 311
- primordio identity(ies), reality of 307
- primordial loyalties 原始忠诚 255
- primordial ties 原始纽带 286, 287; reality of …的现实性 299 - 300, 301, 307, 308, 312
- Pritchard, R. M. R. M. 普里查德 280n20
- private sector: Brazil 私人部门: 巴西 332; power of, Switzerland …的权力, 瑞士 241; support for state takeover of TNCs 支持国家接管跨国公司 199
-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生产: …国际化 218 - 219; organization of …组织 268
- production relations 生产关系 5
- productivity 生产力 46; Taiwan 台湾地区 88, 94, 96
-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职业化, 政府行政管理 … 274
- professions, growth of (现代) 职业的增长 27
- profit rate, 利润率 45; Taiwan 台湾地区 78
- Progressive Era 进步时代 135, 137 - 141
- “projects” (Latin American BAs) “计划”(拉丁美洲官僚威权政体) 320, 324, 339; offensive/defensive 进攻型/防御型 320, 321, 324, 325 - 326, 328, 332, 333, 335
-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260; see also working class 也可参见“工人阶级”
-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 3, 177
- Proporz system (Austria) 比例代表制(奥地利) 232, 237, 238, 240
- protection 保护 170, 181 - 184, 185 - 186, 306; abdication of power by bourgeoisie in exchange for 资产阶级让出权利以换取保护 319, 320; as business 像商业一样进行保护 175 - 177; double-edged 双重保护 170 - 172
- protection costs 保护成本 171, 175, 176, 177, 182
- “protection racket” 保护勒索(黑社会) 166, 169, 170, 171
- protection rent 保护租 175 - 177
- protectionism: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保护主义: 发达工业国 209, 210; Switzerland 瑞士 229; Taiwan 台湾地区 79, 88 - 89, 98, 103n37
- protest 抗议 3, 22 - 23, 24
- proto-Keynesianism 原始凯恩斯主义 125, 126, 132, 138; term 术语 150n3
- Prussia 普鲁士 10, 271, 351
- public economies 公共经济 363
- public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models of 公共教育, …模式的国际传播 362
- public enterprises 公共企业 360; see al-

- s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也可参见“国有企业”
- public finance, orthodoxies of, undermined by Great Depression 公共财政, …的正统理论, 被大萧条所削弱 107, 148
- public goods 公共产品 302; protection as 作为…加以保护 177
- public Health Acts (England) 《公共卫生法》(英国) 274
- public houses 酒馆 258, 262, 269
- public ownership: Austria/Switzerland 公共所有权: 奥地利/瑞士 231, 234 - 235; see als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也可参见“国有企业”
- public policy, see policy(ies) 公共政策, 参见“政策”
- public sector 公共部门 7, 339;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发达工业国 213; Austria 奥地利 237, 238 - 239; state efforts to shrink 国家收缩…的努力 256; Taiwan 台湾地区 91, 93 - 94
- public services,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U. S.) 公共服务, …与工人阶级的形成(美国) 274, 275
- public spending 公共开支 6, 352; England 英国 274;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应对大萧条的… 126 (see also deficit government spending, 也可参见“赤字政府开支”); for social welfare 社会福利… 41, 112, 113; Sweden 瑞典 112, 141, 147; Taiwan 台湾地区 93, 97; U. S. 美国 108, 132, 137 - 138, 140, 142, 144 - 146, 148
- public sphere, emergence of 公共领域, …的兴起 357
- public works as recovery strategy 作为复兴战略的公共工程 107, 253; Great Britain 英国 121, 122, 123; Sweden 瑞典 120, 121, 125 - 126, 131, 132; U. S. 美国 132, 133, 134, 138
- racketeering 敲诈 175; labor 劳工… 176; protection as 作为…的保护费 171 - 172
- radicalization, of labor movement 激进化, 劳工运动的… 229 - 230, 264
- Ragin, Charles 查尔斯·拉金 207
- Rapp, Richard 理查德·拉普 175
- ratchet effect 棘轮效应 180
- rational-action theory 理性行为理论 300 - 303
- rational-choice theory 理性选择理论 309; in Yorubaland ancestral city ties 约鲁巴祖籍城邦情节中的… 286, 287, 299, 300, 306, 307, 308, 310 - 311
- rational instrumental behavior 工具理性行为 51, 71, 302;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and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 70 - 72
- rationality: administrative 理性: 行政… 46; of autonomous state actors 自主性国家主体的… 14 - 15; economic 经济… 255

- raw materials production 原材料生产 12 - 13, 19
- recovery strategies, *see* national economy
- recovery strategies (Great Depression) 复苏战略, 参见“国民经济复苏战略 (大萧条)”
- redistribution: economic 再分配: 经济... 307; social 社会... 246 - 247; state and 国家与... 39 - 43; *see also* distribution 也可参见“分配”
- reform(s): administrative (U. S.) 改革: 行政... (美国) 135; political 政治... 3; state-initiated 国家主导型... 9, 10 - 11, 17, 18, 28
- reformism 改良主义 261; English 英国... 273;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 268, 271, 275, 276, 279n9, n10
- reformist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改革主义政治, 对大萧条的反应 110, 111, 135, 137, 144, 149
- region, as cleavage 地区, ... 分化 285
- relational perspective 相关关系分析视角 19 - 20, 28
- relative autonomy of state; in BA regimes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官僚威权政体中的... 319, 326, 328, 330, 331, 332, 334, 335, 340; from dominant class 国家相对于主导阶级的... 49, 54, 55, 56, 62, 63 - 66, 67 - 68, 70, 176, 200; of state vis-à-vis transnational capital 国家相对于跨国资本的... 207;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的... 59
- religious cleavages 宗教分化 65; India 印度 309 - 310; Yoruba 约鲁巴 311
- religious conflict, hegemony and 宗教冲突, 霸权与... 285 - 316
-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Yorubaland): non-politicization of 宗教认同 (约鲁巴地区): ... 的非政治化 255, 290, 292, 294 - 299, 306, 311; politicization of ... 的政治化 302; as source of social cleavage 作为社会分化源头的... 285, 290 - 299, 305 - 306
-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代表大会 181
- repression (state) 镇压 (国家) 9, 171, 177, 352, 363; Argentina 阿根廷 329; Brazil 巴西 331, 336, 337, 339; emergency powers of (Chile) 的紧急处置权 (智利) 320 (*see also* exceptional rule, 也可参见“例外法则”); military in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中的军事... 308; and state autonomy ... 与国家自主性 355; Uruguay 乌拉圭 325;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 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260; of working-class movement, England 对工人阶级运动的..., 英国 277; U. S. 美国 278; *see also* coercion; violence 也可参见“强制力”、“暴力”
- Republican party (U. S.) 共和党 (美国) 144
- research: analytical strategies in the state 研究: 国家... 中的分析策略 3 - 7 (*see also* analytical strategies, 也可参见“分析策略”); crossnational 跨国...

- 14; on state as actor and structure 对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和结构的…20;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对国家—社会关系的…256; see also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也可参见“比较历史研究”
- research, future 研究, 未来…8; on form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states 对国家的形成与重构的…360 - 363; 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对收入再分配的…67; on social knowledge and state interventions 对社会知识与国家干预的…358 - 360; on state autonomy and capacity 对国家自主性及其能力的…70;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对国家—社会关系的…347; on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state 对跨国联系与国家的…167, 218 - 221
- research questions 研究问题 347, 348, 356
- residential community: effect of government action on 居住社区: 政府行为对…的影响 274 - 275; as locu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al activity …作为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地点 277, 278; segregated by class 被阶级隔离的…262, 263, 265, 266, 267 - 268, 281n30;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260, 262 - 263;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in …中的工人阶级组织 270; work-place organizing efforts brought into 将在工作场所进行组织的努力带进…277
- residential-ethnic identities, politicization of 居民种族认同, …的政治化 254, 255, 273 - 274
- resistance 抵抗 70, 72; effect on state strategies 对国家战略的…效应 255, 256; to war making, state building 对发动战争的…, 国家建设…183
- resource bas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自愿基础, …与政府的规模 182
- revenue extraction by state 国家的征税 195; see also extraction 也可参见“征收”
- revolution(s) 革命 3; from above 来自上层的…9, 10 - 11, 17, 18; role of state in 国家在…中的角色 28
-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imberger) 《来自上层的革命》(特里姆伯格) 10 - 11
- revolutionary orientation, of working class 革命倾向, 工人阶级的…271 - 272
- Right: Austria/Switzerland 右派(政治势力): 奥地利/瑞士 247; Chile 智利 320; Switzerland 瑞士 244
- Road to Plenty, The* (Foster and Catchings) 《通往繁荣之路》(福斯特和卡钦斯) 133
- Road to Serfdom, The* (Hayek)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322
- Robinson, Francis 弗朗西斯·鲁滨逊 309 - 310
- Rokkan, Stein 斯坦·罗甘 286, 290, 308, 312
-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174
-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32, 134, 137, 139,



- 140, 142, 145, 146, 147, 160n121
- Rueshemeyer, Dietrich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40, 42, 43, 253, 348 - 349, 352 - 353, 354, 356, 358
- rule: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统治: 官僚权威... 255, 256; costs of ... 成本 328, 338; Europe 欧洲 174 - 175; patrimonial 祖传... 71; *see also* exceptional rule; indirect rule 也可参见“例外法则”、“间接统治”
- rule of law (Brazil) 法治(巴西) 336, 337
- ruler/ruled relationship, in new states 统治/被统治关系, 新兴国家中的... 186
- Russia 俄罗斯 10, 178, 185; *see also* Soviet Union 也可参见“苏联”
- Salisbury, Robert, “Why No Corporatism in America?” 罗伯特·索尔兹伯里, 《美国为何没有统合主义?》23 - 24
- Sandinistas (Nicaragua)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尼加拉瓜) 217
- Santiago School (economics) 圣地亚哥学派(经济学) 323, 324
- São Paulo 圣保罗市 332, 333, 334, 338, 339
-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200
- savings (Taiwan) 储蓄(台湾地区) 93, 97
- Schott, Kerry 克里·肖特 116
- Schurmann, Franz 弗朗兹·舒尔曼 214
- science, in agriculture 科学, 农业中的... 81, 85, 87
- Security, Work and Relief Policies* (U. S. report) 《安全、工作与救济政策》(美国报告) 146
- semiperiphery 半外围 50, 67, 68, 207, 219
- separation of powers (Switzerland) 分权(瑞士) 231 - 232
- Sewell, William H. 威廉·H. 休厄尔 264, 267, 283n45
- Sharpe, Kenneth 肯尼思·夏普 201, 211, 214
- “Sheep on the Common” problem “公地牧羊”问题 45, 60
- Shefter, Martin 马丁·谢夫特 24; “Trades Union and Political Machines” 《工会与政治机器》26
- Sheppard, Francis 弗朗西斯·谢泼德 280n20
- Shils, Edward 爱德华·西尔斯 286
-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289
- Singapore 新加坡 89, 94, 97; TNCs 跨国公司 203, 204
- Sklar, Richard 理查德·斯克拉 294
- Skocpol, Theda 西达·斯考克波 13 - 14, 41 - 43, 45, 253, 349, 351 - 352, 355, 356, 358, 35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国家与社会革命》26
- Slosson, Peter William 彼得·威廉·斯洛森 277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80
- social change 社会变革 6, 54, 259; Africa 非洲 300; state and 国家与... 21,

- 71; studies of ...研究 28
- social cleavages 社会分化 253, 340; persistence of 坚持...306 - 308; politicization of ...的政治化 254 - 255, 300 - 303, 357;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87
- social conflict: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and 社会冲突: 收入分配政策与...67; patterning of ...的模式 253 - 256; state as arena of 国家作为...场所 47, 48
-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169
- social control: in hegemonic state strategy 社会控制: 霸权国战略中的... 308, 310, 311;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87
- social/cultural institutions, working-class 社会/文化制度, 工人阶级 268 - 269
- social democracy (Sweden) 社会民主(瑞典) 137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Denmark) 社会民主党(丹麦) 153n24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O) (Austria) 社会民主党(SPO)(奥地利) 237 - 241
- 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 社会民主政体 62
- Social Democrats (Sweden) 社会民主党人(瑞典) 109, 112, 113 - 114, 117, 120, 121, 123 - 126, 129, 130, 131 - 132, 137, 140, 141, 142 - 143, 145, 147, 152n13, 153n24
- social geography 社会地理学 281n27
- social groups: demands of 社会群体/集团: ...的需求 42; influence on policy processes ...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118, 119; resistance by ...的抵抗 9
- Social Keynesianism 社会凯恩斯主义 41, 112, 133; obstacles to, in U. S. 实施...的障碍, 美国...141 - 148; possibilities for, in later New Deal 实施...的可能性, 在后来的新政中...137 - 141; Sweden 瑞典 108, 109, 133, 147
- social knowledge, future research on 社会知识, 对...进一步研究 347, 357 - 360
- social networks 社会网络 358; Yoruba 约鲁巴 289
-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 268; maintenance of ...的维持 26; see also domestic order 也可参见“国内秩序”
-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Moore) 《极权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摩尔)
- social partnership, Austria/Switzerland 社会合作制, 奥地利/瑞士 235 - 236
- social policy, Austria/Switzerland 社会政策, 奥地利/瑞士 246 - 248; foreign models of ...的外国模式 12; positive-sum character of ...的正和特征 115
- social relations: state penetration of 社会关系, 国家对...的渗透 363, 364; target 目标 70 - 72
- social science professions 社会科学专业 359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社会科

- 学研究协会 35n44;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较政治学委员会 5, 362
-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118; comparative 比较 … 3, 5, 7, 8, 28, 43, 347; knowledge needs of state in 国家对…的知识需求 357; in relation to politics … 与政治学相比 359; research in … 研究 4 - 7 (see also research, 也可参见“研究”); in Swedish policy planning 瑞典政策规划中的… 130
- 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 107; Chile 智利 323; (U. S. ) (美国) 134, 136
- social structural 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社会结构条件, 国家能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的… 46, 49, 62, 63, 64, 68
- social welfare, see welfare state(s); welfare system 社会福利, 参见“福利国家”、“福利体系”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357; Sustria 奥地利 230, 231, 235
- Socialist party (Austria) 社会党(奥地利) 238
- Socialists (Chile) 社会主义者(智利) 322
- Society-centered theories 社会中心主义理论 4 - 7, 8;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关于政治和经济转型的… 317; of politics 政治学的… 312;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 260, 261 - 264
-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社会经济环境 11; and state autonomy … 与国家自主性 353; states in relation to 国家与… 相比 19 - 20, 28
- sociology 社会学 4, 70
- solidarity: through ethnic identity 凝聚力: 通过种族认同而具有… 300;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 269
- South Africa 南非地区 65
- South Korea 韩国 94, 96, 98, 203, 356
- sovereign integrity (of state) (国家的) 主权统一 16, 17
- sovereignty 主权 48; coercive 强制 165; conflicts of (U. S. ) … 冲突(美国) 135; England 英国 271; locus of … 核心 22; national, challenged by TNCs 国家…, 受跨国公司挑战的… 202, 207, 208; U. S. 美国 271
- Soviet Union 苏联 184, 231; see also Russia 也可参见“俄罗斯”
- Spain 西班牙 178, 182, 184, 185
- spatial arrangements 空间结构 261, 262 - 263, 264 - 270
-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6, 363
- Stagnationist school (of U. S. Keynesians) (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中的) 经济停滞学派 140 - 141, 146, 147 - 148, 149
- state(s): as actor and institution 国家: 作为行为主体和制度组织 3 - 37, 165, 167, 192, 228 - 235, 248, 256;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of 理解…的方法 347 - 366; as arena of social conflict 作为社会冲突舞台的… 49,

55, 60, 69; changing nature of (Taiwan) …变化的本质(台湾地区) 99 – 101; in Continental European perspective 大陆欧洲视角下的… 7 – 8; contradictory tendencies of …的矛盾倾向 40, 47, 48, 55, 60, 329 – 330; as corporate actor …作为集体行动者 47, 48, 49, 55, 59 – 60, 66, 67, 68 – 70; debates on nature of 对…本质的争论 363 – 364; defined 定义出的… 46 – 47, 48; as economic actor …作为经济主体 193 (see also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也可参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and economic growth 国家与经济增长 101;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与经济转型 44 – 77; evolution of role in economy …之经济角色的演化 69 – 70; explanatory centrality of …的中心解释模式 6; extranational orientations of 超越本国视野的倾向 9, 11; fears of overpowering 对超强…的恐惧 364; form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的形成与重构 27, 183 – 184, 254, 347, 360 – 363; grand theory(ies) of 关于国家的宏理论 4, 5, 28, 149, 363; as guardian of universal interests …作为普遍利益的维护者 47 – 48, 53, 65, 68, 363; “insulated” parts of …的“隔绝”部分 13; maritime 海权… 178 – 179; in neo-Marxist view 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 350, 351; as part of policy network …作为政策网络的一部分 235 – 246; and

patterning of social conflicts …与社会冲突模式 253 – 256; and patterns of politics …与政治模式 20 – 27; and political capacities of social classes …与社会各阶级的政治能力 25 – 27; as predator 作为掠夺者的… 165; as promo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distribution …作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 39 – 43; in relation to socioeconomic settings …与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关关系 19 – 20; small, in open international economy 小…, 开放的国际经济中的… 227 – 251; study of, through analytical introduction and historically grounded comparisons 有关…的研究, 通过分析性介绍和基于历史的比较 348 – 350;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78 – 106;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与跨国联系 165 – 168;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ction of …行为的无意识结果 333 – 334, 337 – 378; vanishing 逐渐消逝的… 364; working-class formation and 工人阶级的形成与… 357 – 384; see also modern state; national state 也可参见“现代国家”、“民族国家” state actions 国家行为 181 – 184, 246, 351; and class relations …与阶级关系 60 – 68; expansion of …的扩张 363, 364; new hypotheses re 关于…的新假设 363; study of 对…的研究 365



- state alliances, with TNCs 国家联盟, 国家与跨国公司的联盟 199 - 200, 203, 204, 216
- State and Society, The* (Stepan) 《国家与社会》(斯特潘) 9 - 10, 20
- state apparatus; and changing state capacities and autonomy 国家机器: ... 与不断变化的国家能力与自主性 50 - 60, 355; contradictions within ... 内部的矛盾 47, 60, 64, 69 - 70, 337, 340; as instrument of repression and of reorient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作为镇压与确定产业发展新方向的工具 317, 318, 319; internal unity of ... 的内部凝聚力 47, 51, 59 - 60, 322, 324, 326, 329, 330 - 331; organizational substructures 组织基础 166; reorganization of, through wars ... 的重组, 通过战争进行... 361 - 362; salience of, as economic actor ... 作为经济主体的重要性 193; structuring sociocultural cleavage 构造社会文化分化 312;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95, 196, 197, 199 - 200, 202, 203, 204, 207, 217; and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 与跨国联系, 发达工业国家 208, 213 - 214, 217
-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The” (Nettl) “作为一个概念变量的国家”(内特尔) 23
- state autonomy, see autonomy of state 国家自主性, 参见“国家自主性”
- state builders, Third World 国家建设者, 第三世界 362
- state building 国家建设 42; Africa 非洲 308; analysis of 对... 的分析 362; constraints on 对... 的约束 183; U. S. 美国... 133; war making and 发动战争与... 167, 170, 172, 181 - 184; see also state making : 也可参见“国家形成”
- state capacities, see capacities of state 国家能力, 参见“国家能力”
- state-capital relations 国家 - 资本关系 176, 180
- state-centered approach 国家中心主义方法 7, 49, 363; to working-class formation 研究工人阶级的形成的... 260, 265, 270
- state-certifying organization 国家担保组织 185
- state-economy relations 国家 - 经济关系 39 - 43, 200; effect on social conflict 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影响 253; see also economic role of state;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也可参见“国家的经济角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 state intervention(s): existing patterns of 国家干预: 现有... 模式 115; future research on 对... 的下一步研究 357 - 360; research on 对... 的研究 347; in social relations 对社会关系的... 253, 255; warning about 对... 的警告 364
-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39 - 43, 352, 353, 363;

- analysis of conditions underlying effective 分析实现有效…的条件 44 - 77; Austria 奥地利 237, 238 - 241; and economic growth (Taiwan) …与经济增长 (台湾地区) 99 - 101; effect of …的效果 255 - 256; effect on autonomy and capacity of state as actor …对国家作为行动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力的影响 68 - 70; effect on political domination of society …对社会之政治主导的影响 339; necessity of …的必要性 44 - 46; in response to economic crisis 应对经济危机时…107 - 109, 111 (see also Great Depression, 也可参见“大萧条”); state autonomy and 国家自主性与…354 - 355; U. S. 美国 146 - 147; see also capacity of state to intervene in economy; economic role of state 也可参见“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国家的经济角色”
- state making: capitalism and 国家的形成: 资本主义与…170, 172, 176 - 177, 179; external/internal 外部/内部…184, 185; international 国际…185; as organized crime 类似有组织的犯罪 169 - 191; war making and 发动战争与…23, 349; see also state building 也可参见“国家建设”
- state managers 国家管理者 47, 56, 69, 183; autonomy of …的自主性 62, 205; British 英国 212; conflict with dominant class …与主导阶级的冲突 45; policy inclinations of …的政策倾向 52, 53, 61, 75n39, 357; of protection-providing government 提供保护型政府中的…176;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67, 218
- state officials 国家官员 16, 55;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 …与经济干预 41; geopolitical aims, strategies of 地缘政治目标, …的战略 167, 213 - 216, 218, 219; as initiators of strategy 作为战略提议者的…9 - 10, 11 - 12, 14 - 15, 20 - 21, 18, 31n9, 118; monopoly on violence …对暴力的垄断 170; power of …的权力 353; relative autonomy of …的相对自主性 56; and social protest …与社会抗议 23
- state organizations 国家组织 7, 46 - 47, 349; adaptability of …的适应性 42 - 43; administrative 行政性…7, 14, 22, 362;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s …与经济干预 42, 43; patterns of …的模式 348; uses of violence …对暴力的使用 181 - 183
-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 40, 49, 57 - 59, 60, 198;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发达工业国 209; Austria 奥地利 234 - 235; Brazil 巴西 331 - 332, 335; Chile 智利 323 - 324; in extractive industries 采掘业中的…198 - 199, 201, 202; manufacturing 制造业…203;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 197; Taiwan 台湾地区 90 - 94, 99; Uruguay 乌拉圭 326
- state power 国家力量 69, 363; Austria/

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27, 230 - 235, 236, 237 - 246, 248; over domestic or transnational nonstate actors and structures 国家相对国内或国际间非政府主体和结构的力量 19 - 20; forms of, and suffrage ...的形式, ...与选举 24; locus of ...的核心 192; is relational ...是相关的 331; and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Latin America) ...与公民社会的力量(拉丁美洲) 317 - 343; Taiwan 台湾地区 98; unevenness across policy areas 各个政策领域不均衡的... 17 - 18; vis-à-vis domestic elites ...相对于国内精英 194, 196, 200, 202, 204, 205; see also strength of state 也可参见“国家的力量”

state-society relations 国家 - 社会关系 19 - 20, 25, 27, 39, 60 - 68, 253, 256, 347, 348; analyses of ...分析 350;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27 - 251, 349; in authoritarian context 威权环境中的... 317 - 343; questions re 关于...的问题 356; and recovery from Great Depression ...与从大萧条中复苏 148 - 149

state strategies, effect on political opposition (Latin America) 国家战略, ...对政治反对派的影响(拉丁美洲) 318, 333 - 334, 337 - 338, 340

state structure(s) 国家结构 351, 358;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48; and capacity for economic intervention ...与经济干预能力 50 - 60; comparative

studies of 关于...的比较研究 21 - 25; deliberate reform and reorganization of 对...的慎重改革与重组 361; and economic experts, policy innovations ...与经济专家, 政策创新 125 - 132; effect on political opposition (Latin America) ...对政治反对派的影响(拉丁美洲) 318, 319, 322, 329 - 330, 338 - 340; effect on social conflicts ...对社会冲突的影响 253, 254, 255; future research on 对...的进一步研究 357, 360 - 363; Great Britain 英国 149;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和收入再分配 66; and interests and coalitions ...和利益与联盟 115; and national recovery strategies ...与国家复苏战略 142, 148, 149; new hypotheses about 关于...的新的假设 363; and policy developments ...与政策发展 117 - 119; and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与用凯恩斯主义应对大萧条的可能性 107 - 163; and public spending for social welfare ...与社会福利公共开支 41 - 42; required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有效干预经济所要求的... 46, 48 - 49, 50; small nations 小国家 227, 228, 230 - 235; and state autonomy ...与国家自主性 356 - 357;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与国家经济的干预 68; state monopoly on violence and 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 与…181 - 183; Taiwan 台湾地区 82;  
U. S. 美国 27, 132 - 148; and work-  
ing-class formation …与工人阶级的  
形成 270 - 278
- state system ( Europe ), reorganization of  
国家体系( 欧洲), …的重组 184
- “stateness” 国家性 22, 271
-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 Skocpol )  
《国家与社会革命》( 斯考克波 ) 26
- statism 国家主义 198, 199, 365; Brazil  
巴西 332
- steel industry 钢铁工业 58, 208 - 209,  
211
- Stepan, Alfred 艾尔弗雷德·斯特潘 7,  
11, 18, 19, 255 - 256, 349, 352, 354,  
355;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  
parative Perspective* 《国家与社会: 比  
较视角下的秘鲁》9 - 10, 20
- Stephens, John 约翰·斯蒂芬斯 112,  
224n58
- Stinchcombe, Arthur 阿瑟·斯丁库姆  
171 - 172
- Stockholm school ( Swedish economists )  
斯德哥尔摩学派( 瑞士经济学家 )  
130 - 131, 136, 149
- Stone, Lawrence 劳伦斯·斯通 173 -  
174
- strength of state 国家力量 228, 350 -  
351, 352, 353; analysis of 对…的分  
析 355; see also strong state ( s ) 也可  
参见“强国家”
- strikes: Austria/Switzerland 罢工: 奥地  
利/瑞士 236; Brazil 巴西 333, 334,  
336, 337; England 英格兰 277
- strong state ( s ) 强国家 273, 352, 360;  
Austria 奥地利 228, 230, 233 - 234,  
248; and working-class militancy …与  
工人阶级的战斗性 271 - 272
- structure/historical analysis 结构/历史  
分析 42, 351
- structuralist-culturalist debate, working  
class in 结构主义 - 文化主义之争, …  
中的工人阶级 279n8
- structural-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结构 -  
功能主义视角 4 - 6, 20, 28; see also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也可参见“功  
能主义视角”
- subcultures, working-class 亚文化, 工人  
阶级 263
- subordinate classes: and autonomy of state  
从属阶级: …与国家的自主性 63 -  
64, 353; income redistribution policies  
and 收入再分配政策与…67
- suffrage 选举权 24, 26, 259; Great Brit-  
ain 英国 121; Sweden 瑞典 123; U. S.  
美国 135
- surplus, transnational appropriation of 剩  
余价值, …的跨国份额 197
- surplus extraction 剩余价值榨取 66;  
Taiwan 台湾地区 78, 86
- surveillance ( by state ) ( 国家 ) 监督  
181, 184
- Sweden 瑞典 182, 351; Commission on  
Unemployment 失业委员会 131; Com-  
mittee of Inquiry into Unemployment  
失业问题调查委员会 130, 131; defi-



- cit-financed public works 赤字财政公共工程 41, 43, 349, 359; early Depression years 大萧条前期 120 - 132; possibility of Keynesia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用凯恩斯主义应对大萧条的可能性 107 - 163, 349, 359; Riksdag 国会(瑞典) 130, 131, 141; state autonomy 国家自主性 11 - 12, 14; state structure 国家结构 129 - 130; Unemployment Commission 失业委员会 121, 123 - 125, 131
- Swedish economists 瑞典学派经济学家 358; *see also* Stockholm school 也可参见“斯德哥尔摩学派”
- Switzerland 瑞士 60, 217, 253 - 254, 349 - 350; agricultural policy 农业政策 352; bargaining in politics of ... 的政治谈判 233, 235, 244; Federal Council 联邦委员会 231, 232, 235, 244, 245;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penness 国际经济开放度 165, 166; power of state in ... 的国家权力 241 - 246; Protection of the Currency decree 《货币保护》法令 245; rule by emergency decree 紧急状况法令 244 - 245; state-society relations 国家 - 社会关系 227 - 251
- Taiwan 台湾地区 40 - 41, 42, 43, 226n93, 349, 351, 356;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殖民统治 52; developmental strategy 发展战略 58;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分配 66; state autonomy 国家自主性 354; sta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78 - 106; TNCs 跨国公司 203, 204
- Tanzania 坦桑尼亚 40, 54
- tariffs: Chile 关税: 智利 322; Taiwan 台湾地区 88 - 89; Uruguay 乌拉圭 326
- taxation 征税 54, 56, 166, 172, 182; England 英格兰 180; Taiwan 台湾地区 86, 97; of TNCs 对跨国公司... 197
- technocracy, economic (Taiwan) 专家治国论, 经济... (台湾地区) 83 - 84, 91
-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s” 技术“纪律性” 57 - 58
- technology 技术 202
- teleological assumptions, in explanations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目的论假设, 在解释工人阶级形成时的... 259 - 260
- territory (ies) 领土 61, 184; stable administrative-military control of ... 的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 16, 17
- textile industry 纺织工业 268
-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323
- theoretical frameworks 理论框架 4, 5, 28, 149, 340, 363; state autonomy in ... 中的国家自主性 353 - 354
- theoretical reorientation 理论再定位 4 - 7, 8, 347
-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51 - 52, 167, 169, 170; agrarian exporters 农业出口国 194; autonomous states 自主性国家 217, 226n23, 353; capital accumu-

- lation 资本积累 45;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资本主义发展 99; domestic economic policies 国内经济政策 165;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39, 40, 41, 192; export-led growth 出口导向型增长 89;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44, 356; research on 对…的研究 194; state builders 国家建设者 362; state role in economy 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 216, 218; TNCs 跨国公司 214, 215 - 216, 217, 218;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跨国联系与… 194 - 207, 358
-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174
- Tholfsen, Trygve 特里格夫·托弗森 276
- Thomas, Brinley, *Monetary Policy and Crises* 布林利·托马斯,《货币政策与危机》129
- Thomas, Robert Paul 罗伯特·保罗·托马斯 177
- Thompson, E. P. E. P. 汤普森 271;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79n8
- Tilly, Charles 查尔斯·梯利 23, 165, 166, 167, 349, 352 - 353;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The*《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362
- 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271;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旧制度与大革命》21
- Tocquevillian approach 托克维尔式的方法 21, 253, 254
-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6, 363
- trade: effect on state's role in economy,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贸易:…对国家之经济角色的影响, 发达工业国 208 - 210; effects on Third World states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 194, 195 - 196; international 国际… 152n14, 192 - 193, 207; monopolistic 垄断… 195, 196
- trade policy(ies) (Austria/Switzerland) 贸易政策(奥地利/瑞士) 228, 229, 242, 246
- “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 “工会意识” 270
- trade unions, see unions 工会, 参见“工会”
-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Shefter) “工会与政治机器”(谢夫特) 26
- tradition 传统 300, 316n50
- transition costs 转型成本 306, 307
- transnational banks (TNBs) 跨国银行 (TNBs) 214 - 215
- transnational capital 跨国资本 195, 218;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发达工业国中的… 209; centers of …中心 193, 212 - 213; effects of, on state role in economy (Third World) …对国家之经济角色的影响(第三世界) 192, 204 - 207; interests of, and geopolitical aim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的利益, ……和发达工

- 业国的地缘政治目标 213 - 216, 217, 219 - 220; restrict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role of 对…国内经济角色的限制 214; role in policy making …在决策中的角色 211; statelessness of …的无国家性 214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跨国公司 (TNCs) 219, 353;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发达工业国 207, 209 - 212, 214, 216, 219 - 220; and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与制造业投资 202 - 204; power of …的力量 206; and state, in extractive industries …与国家, 采掘业中的…… 197 - 201; state(s) and 国家与… 168; state takeover of 国家接管… 199 - 200;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92, 194, 197 - 204, 215 - 216, 217, 219, 358
- transnational linkages 跨国联系 358; and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与发达工业国 207 - 216; and economic role of state …与国家的经济角色 192 - 226; and probability of state intervention …与国家干预的可能性 199 - 201; and state capacities and world system …与国家资本和世界体系 216 - 221; and Third World …与第三世界 194 - 207
-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embeddedness of nations in 跨国关系: 国家在…里的嵌入性 350; states and 国家与… 165 - 168
- tribal identities 部族认同 255, 300, 302; politicization of …的政治化 201
- tribalism 部族主义 301, 307
- tribe, reification of, in African politics 部族, …的具象化, 在非洲政治中… 303 - 306, 308, 311
- tribute 贡赋 175 - 177, 181, 185
- Trimberger, Ellen Kay 艾伦·凯·特里姆伯格 9; *Revolution from Above* 《来自上层的革命》 10 - 11
- Tudor polity (Huntington's analysis of) 都铎政体(亨廷顿对…的分析) 271
- Tudors 都铎王朝 173 - 174
- Tugwell, Frank 弗兰克·特格韦尔 197
- Tullock, Gordon 戈登·塔洛克 322, 323, 341n12
- Turkey, Ataturk revolution 土耳其, 土耳其革命 10
- unemployment: Great Britain 失业: 英国 108 - 109;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107, 108, 111 - 112, 114, 120 - 132
-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失业保险 11 - 12; Denmark 丹麦 153n24; Great Britain 英国 108, 121 - 123, 253; Sweden 瑞典 124, 125
- unionization 工会化 154n27
- unions 工会 112; Argentina 阿根廷 330; Brazil 巴西 332 - 334, 336 - 337, 343n36; Great Britain 英国 121, 275 - 276, 277; meeting places of …集会地点 269 - 270; Sweden 瑞典 124, 125; Taiwan 台湾地区 96; U. S. 美国 148, 270, 278; Uruguay 乌拉圭 325; see also labor; working-class movement

- 也可参见“劳工”、“工人阶级运动”
- unitary state 单一制国家 273 - 274
- United Austrian Iron and Steel Works 奥地利联合钢铁公司 238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85
- United States 美国 20, 100, 178, 184, 185, 351; agricultural policy 农业政策 136, 143 - 145, 352; and Brazilian regulation of coffee trade …与巴西咖啡贸易管制 196; capital exports and economic role of state 资本输出与国家的经济角色 210 - 212; commercial Keynesianism 商业凯恩斯主义 41; foreign aid 外国援助 78, 90 - 91, 97, 100; geopolitical aims of …的地缘政治目标 167, 213 - 216, 217; impact of state on politics 国家对政治的影响 22, 23 - 25;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国际领导权 148;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208; lack of corporatism in …缺乏合作主义 23 - 24; lack of labor party in …缺乏劳工党 135, 354; as “lead society” …作为“主流社会” 6;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195; obstacles to social Keynesianism in 对在…实施社会凯恩斯主义的障碍 141 - 148; policy instruments 政策工具 18;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 135, 136, 276 - 277; possibility of Keynesian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用凯恩斯主义应付大萧条的可能性 107 - 163, 349, 359; state autonomy 国家自主性 11, 12 - 14, 18; state role in economy 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 219 - 220; state structure 国家结构 4, 132 - 148, 354; state-centered theory 国家中心主义理论 7; trade as percent of GDP 贸易占 GDP 比重 192 - 193; weak state 弱国家 254, 271, 275, 351; working-class formation 工人阶级的形成 257 - 284; working-class movements 工人阶级运动 26, 27
- U. S. Aid Mission to Taiwan 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援助使命 83, 91
- U. S. Aid to Taiwan* (Jacoby) 《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援助》(雅各比) 104n50
- U. S. Chamber of Commerce 美国商会 146, 147
- U. S. Congress 美国国会 138, 142, 144, 145 - 146; control of public spending 公共支出控制 148;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 257
-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美国农业部 (USDA) 13 - 14, 136; Extension Service …推广局 144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国国务院 13, 211, 217
- U. S. Supreme Court 美国最高法院 145
-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133 - 134, 147
- upper class: Chile 上流阶级: 智利 320; Uruguay 乌拉圭 327
- urban guerrillas (Brazil) 城市游击队 (巴西) 331, 335, 337
- urban space 城市地区 262; transformations of …的转型 264 - 270



- urbanization,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城市化, …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260,  
262, 265 - 266
- Uruguay 乌拉圭 255, 330, 336, 338; power  
relations, state-society 权力关系, 国  
家—社会…318 - 319, 325 - 329, 340
- value systems, working-class 价值体系,  
工人阶级…280n10, 281n31
- Vance, James, Jr. 小詹姆士·万斯  
280n20
- Venezuela 委内瑞拉 58; TNCs 跨国公  
司 197
- Venice 威尼斯 178, 184
- Vernon, Raymond 雷蒙德·弗农 198 -  
199
- vertical integration 垂直整合 201
- violence: government monopoly on 暴力:  
政府对…的垄断 171 - 175, 177,  
181, 185, 352; organized 有组织的…  
170; use of state-controlled 国家控制  
下的…使用 181 - 184
- Virginia school (political economy) 弗吉  
尼亚学院(政治经济学) 323
- Voest-Alpine (Austria Co.) 奥地利钢铁  
联合集团公司(奥地利) 234
-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working-class 志  
愿组织, 工人阶级…269 - 270, 275 -  
276, 278
- vote: right of 投票, …权 272 - 273,  
274, 275, 278; see also franchise; suf-  
frage 也可参见“公民权”、“选举权”
- Vries, Jan de 简·德·弗里斯 179
- wag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工资: 国  
际比较 94, 95t; Taiwan 台湾地区 88,  
94, 96
- Wagner, Adolf 阿道夫·瓦格纳 363
- Wallerstein, Immanuel 伊曼纽尔·沃勒  
斯坦 308
- war(s) 战争 228, 363;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作为国际关系的…184 -  
186; and reorganization of state struc-  
ture …与国家结构的重组 184, 361 -  
362
- war making 发动战争 166, 352; con-  
straints on 对…的限制 183; financing  
of …的财政 179 - 180; as organized  
crime 类似有组织犯罪的…169 -  
191; and state making …与国家形成  
23, 167, 170, 172, 181 - 184, 349; in  
Third World 在第三世界…362
- Ward, David 大卫·沃德 281n27
- Warner, Sam Bass 萨姆·巴斯·沃纳  
266
- Warnes, A. M. A. M. 沃内斯 266 - 267
- Wars of Religion (France) 宗教战争(法  
国) 179
- water, access to 水, 取水途径 178 - 179
- 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 (pam-  
phlet) 《我们能够战胜失业》(小册  
子) 126
- weak state(s) 弱国家 13, 260, 271 -  
272, 273, 350 - 351, 352, 353, 360;  
Great Britain 英国 254, 275; Switzer-  
land 瑞士 228, 230 - 233, 235, 241,  
245, 248; U. S. 美国 254, 271, 275,

- 351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7 - 8, 48, 50, 52, 55, 59, 281n30
- Weberian perspective 韦伯式视角 7 - 8, 9, 13, 46 - 47, 48, 51, 348; autonomy in ...下的自主性 353
- Weir, Margaret 玛格丽特·韦尔 41 - 43, 253, 349, 351, 352, 355, 356, 358, 359
- welfare state(s) 福利国家 108, 109, 356 - 357;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31; Great Britain 英国 122 - 123, 127; policy making 决策 359; Sweden 瑞典 147; theories of end of ...的终结理论 364; U. S. 美国 134, 148, 217; working-class-strength approach to 研究...中的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思路 112 - 114
- welfare systems 福利体系 363; Austria/Switzerland 奥地利/瑞士 246; Sweden 瑞典 108, 112; Taiwan 台湾地区 81 - 82; U. S. 美国 134
- West Germany 西德 210
- “Why No Corporatism in America?” (Salisbury) 《美国为何没有统合主义?》(索尔兹伯里) 23 - 24
- Wicksell, Kurt 克努特·威克塞尔 130
- Wigforss, Ernst 恩斯特·魏格福斯 125, 130 - 131
- Wilson, Graham K. 格雷厄姆·K. 威尔逊 23 - 24
- Winckler, Edwin 埃德温·温克勒 78, 82
- Wiseman, J. J. 怀斯曼 180
- Wohl, A. S. A. S. 沃尔 280n20
- work/home connections 工作/家庭联系 260, 262 - 263, 265, 267, 270
- work place: as base for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工作场所: 作为工人组织基地的... 278; diversification of ...的多样化 267; effect of government action on 政府行为对...的影响 274 - 275; politics of ...政治 269; separate from home/community ...与家庭/社区相分离 263, 264 - 265, 266 - 268, 269, 270
-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Joyce) 《工作、社会与政治》(乔伊斯) 263 - 265, 266, 267, 269
- workers' compensation 工人赔偿金制度 108
- working class: affected by growth of government 工人阶级: 受政府扩张影响的... 274 - 275; autonomou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自治性的文化政治生活 263, 268 - 269; differentiation among ...内部的差异 264; fragmentation of ...的分裂 281n30; Great Britain pioneer in social protection of 在对...实施社会保护方面英国的先驱地位 108, 114, 121 - 123; militancy of ...的战斗性 271 - 272;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的政治倾向 254 - 255; saloons, pubs of 酒吧, ...的酒馆 257 - 258, 262, 269 - 270; split consciousness of (U. S.) ...分裂的意识

- (美国)259,263,265,269,273; U. S. 美国...135,354
- working-class formation, and the state 工人阶级的形成, ...与国家 254 - 284
- working-class movements; Brazil 工人阶级运动: 巴西 333 - 334, 339, 354; England 英格兰 ... 276 - 277; state structure and 国家结构与...25 - 27
-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s;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工人阶级组织; 发达工业社会 67; politics of ... 政治学 278; in state-society power relations (Latin America) 国家—社会权力关系中的...(拉丁美洲)318, 322, 323, 325, 329, 339; *see also*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working-class 也可参见“志愿组织, 工人阶级”
- working-class strength, as explanation of national response to Great Depression 工人阶级的力量, ...作为国家对大萧条的反应的解释 112 - 114, 115, 117, 148
-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工程振兴局(WPA)138, 139, 144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89
-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managing interdependence in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在...中管理相互依赖 19 - 20
- world historical context(s) 世界历史背景 349 - 350, 356
- world system 世界体系 165, 192;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state in 跨国联系与...中的国家 193, 207, 216 - 221
-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229, 230, 231, 362
-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81, 146, 148, 229, 231, 235, 362
- xenophobia (Switzerland) 排外主义(瑞士)242 - 243
- Yoruba (people) 约鲁巴(民族)255, 285 - 316; civil wars 内战 288 - 289, 291, 295 - 297, 304; indirect rule 间接统治 303 - 306; as nation 作为国家的...288, 289, 290;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 政治组织 286; religious differentiation among ... 内部宗教差异 285, 286, 289, 292 - 299, 302 - 303
- Yorubaland 约鲁巴地区 255, 285 - 316, 349; historical background 历史背景 287 - 290; Land Decree《土地法令》306, 307
- Zaire 扎伊尔 201
- Zambia 赞比亚 201
- Zeitlin, Maurice 莫里斯·蔡特林 63
- Znanięcki, Florian 弗罗里安·兹纳涅茨基 348
- Zysman, John 约翰·齐斯曼 212

## 译 后 记

英文版《找回国家》于 1985 年就已面世。它以“二战”后流行的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为批判方向,变革了过去国家研究学者只关注国家政权机器和不同政治体制架构等形式主义和法律主义研究模式,开始重视现实中的国家运作机制,试图用国家来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本书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比较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数名优秀学者之重要研究于一身,从多个角度、多个领域折射出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即接纳韦伯等社会科学先驱的整体国家观,强调国家可能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或者一种制度组织的身份,充分重视国家的作用,重视用历史的和比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本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确立。以本书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把国家(state)看作一种超越于具体某个政府(government)之上的持续性的行政、立法、官僚和强制系统,同时认为它具有作为一种制度组织(托克维尔国家观)或者作为一个独立行为主体(韦伯式国家观)两种潜在身份。前者可以无意识地影响到社会中各种力量所追求的利益及追求方式;后者则更能有意识地影响甚至建构



本国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社会自身内部的重要关系纽带。在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中,国家中心主义研究学者深入探讨了“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的可能性和“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两个重要概念。他们的许多重要成果不仅打破了主流观念中的许多偏见,还具有高度的实践价值。而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成果,不仅出现在对发展型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战略研究领域,而且出现在对成熟发达国家的具体政策领域的横向和纵向历史比较之中,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国家间差异性的识别,以及对国家特性、行为模式与能力的认知。

本次译介特意选取作为“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确立标志的《找回国家》一书收入“公共政策译丛”之中,目的是帮助国内学者和读者更多地了解西方学术界对与国家和政策相关问题的主要的和重要的研究路径,帮助国内学者和读者培养宽角度、多比较的视野,更好地认识各种研究视角和时兴理论的价值与不足;当然,译者们更希望本书能在帮助从事相关政治经济事务的实践工作者们树立更为明确的建设目标,进而选择更为恰当的行动手段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如同本书的集结是一项共同努力的成果,本书的翻译也是集体合作的结晶。选定本书进行翻译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教授一直尽心致力于我国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工作,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朱天飏教授不仅是最早推荐译者们阅读和认识本书的老师,其撰写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是帮助译者深入理解和翻译本书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朱老师更是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发展战略的研究与教学领域辛勤耕耘着。参与本书翻译的正是薛澜和朱天飏两位教授的学生们,他们都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和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其中:方力维负责翻译本书《绪论》和第二至四章;黄琪轩和李俊负责翻译第五章;叶静负责第六章;

刘娟凤负责第七章；莫宜端负责翻译了本书第八到十章和《结论》部分。本书的各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保持密切交流，争取对全书概念有更为准确和标准的把握。方力维最后负责了全书的校对和索引工作。此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扬同学（在本书即将付梓时已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也多次参与讨论并就具体的翻译问题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三联书店的领导和编辑更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诸多心血。在此，我们对所有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和诚挚的谢意。

我们深知，不同语言的翻译实难尽善尽美，而由于学术能力的差距和历史视野的局限，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纰漏和错误，我们翻译人员愿意承担所有这些不足的全部责任。翻译的过程本身也是对我们的学习成果和能力的反复检验和提升的过程，我们全体译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在此衷心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经典，也希望广大的学者和读者能在阅读当中就书中翻译和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宝贵的批评和意见。

译者 谨识

2008年10月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 找回国家

[美]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 编著

方力维 莫宜端 黄琪轩等 译